

关于冷战年代的报告之二

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

——1949年至1960年中苏关系的演变

李丹慧 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编者前言 战后中苏关系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角度	(员)
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走向	(员缘- 员源)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薛衔天	(圆)
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	(员源- 员缘)
..... 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 沈志华	(圆)
毛泽东、斯大林与满洲的斗争	(员缘- 员源)
——民族主义还是国际主义	
..... 美国西南密苏里州立大学 盛慕真	(圆)
斯大林、冷战与中国的分治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布·默里	(圆)
论中苏同盟的起源	
.....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牛军	(圆)
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	
.....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 谢·冈察洛夫等	(圆)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 愿望和结果	
..... 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 沈志华等	(圆)
中苏同盟与美国 战争、政策与理解	(员缘- 员远)
..... 挪威诺贝尔研究所 奥·韦斯塔	(圆)

苏联的对华援助及民间合作

.....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黛·凯佩尔 (苏联)

中苏经济合作的瓦解 (苏联) (苏联)

——从文化心理角度所作的解释

..... 美国马里兰大学 张曙光 (苏联)

中苏分裂的军事因素

.....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 谢·冈察连柯 (苏联)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远东与苏中关系

.....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 塔·特罗拉科娃 (苏联)

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杨奎松 (苏联)

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 (苏联) (苏联)

..... 当代中国研究所 李丹慧 (苏联)

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的兴衰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杨奎松等 (苏联)

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 北京大学 牛大勇 (苏联)

苏联外交部对分裂前夕苏中关系的估计

..... 美国哈佛大学 马·克莱默 (苏联)

对 20 年代中苏论战中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薛钰 (苏联)

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

..... 中央文献研究室 李捷 (苏联)

回顾和思考

——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

..... 当代中国研究所 丁明 (苏联)

对 1959 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

——来自中国新疆的档案材料

..... 当代中国研究所 李丹慧 (苏联)

1952年的中苏边界冲突

——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档案的新证据

..... 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克·奥斯特曼 (编)

中苏边界冲突 对亚洲冷战的新探讨

.....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大卫·沃尔夫 (编)

冷战国际史研究及其他

——“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丛书总序

“冷

战”作为世界现代历史上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阶段^①,已经结束了。正是因为 20 世纪中叶出现的世界两大阵营相互对抗已经成为历史,人们才有可能在冷战格局已不复存在的条件下,回过头来对于冷战的起源、美苏冲突的演变过程、中苏结盟和走向分裂的原因、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内部结构、冷战对苏联解体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比较客观的重新思考。于是,从 20 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关于冷战及其历史的研究和讨论掀起了新的热潮。^②在参与学者的人数和国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题目的种类和范围以及档案资料所涉及的语种和国家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几十年的研究状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在西方学界把冷战史称为冷战国际史。^③

① 对于冷战的概念,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冷战发生的年代也有各种说法。有的认为冷战发生在战后美苏对抗开始的年代,有的认为发生在战时后期苏联与西方盟国之间出现矛盾和裂痕的时候,还有的认为早在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冷战时代就开始了。不过,一般说来,第一种看法为多数人所接受。尽管在导致冷战爆发的具体时间和事件上尚有分歧,但冷战的特定意义在于以美苏两国为中心的世界两大集团的形成并处于对抗状态则是共识。

② 有人统计,目前在国际互联网上,仅 1995 年一个网站中即有有关冷战网址 200 多个,而有关冷战的网页则达 10 多万之多。

③ 我在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时,曾与那里的学者讨论了“冷战”这一概念的含义,故有此说法。

冷战年代以前,东方^①各国,包括中国学者,对冷战历史的研究还十分薄弱。他们大多没有加入国际学界这一领域的研究行列,即使有所涉猎,主要也是资料性和介绍性的论著。^②那时的冷战史研究似乎只是西方学者的专业特权,其研究的主体和中心则在美国。这不仅体现为研究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来自美国档案,而且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也是以美国在各个时期的相关政策及其得失为主。于是,美国学者在冷战研究中便自然处于明显的世界领先地位,他们的论著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而且形成了不同学派。^③

在冷战结束的冷战年代末、冷战年代初,作为冷战一方的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其中特别是以前作为冷战主角之一的俄国,开始大量解密和公布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这成为20世纪末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④由于过去苏联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历史资料处于封闭的状态,人们对于冷战历史中诸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往往是片面的、迷惑的、不确定的,甚至是错误的。只有在这些历史档案大量解密并陆续公布于世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重新认识。而这一状况从根本上改变了冷战史研究集中体现在冷战一方——西方学术领域的现象。由于可用档案和史料范围的扩大,导致了相应的结果:其一,这些新档案文献来源地——俄国、中国以及原东欧国家的学者纷纷加入了冷战史研究行列。不仅他们本身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与西方学者直接对话,而且他们的论著也不断得到评介、引用,并被译成其他文

① 这里使用的是广义上的东方概念,其包括了东欧、苏联和亚洲地区。

②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刘同舜教授主编的大型资料性著作《战后世界历史长编》,该书自1984年出版第1卷,至今已有12卷,按专题介绍了西方有关冷战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史料,可以称为中国冷战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③ 在冷战激化的年代,占主流地位的是传统学派;美国反战高潮时期,产生了修正学派,到缓和呼声响彻世界时,后修正学派又应运而生。这本身也说明了当时美国在冷战研究领域中的中心地位。

④ 关于俄国档案解密及其利用的情况,参见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载《历史研究》1999(3)。

字,引入世界论坛。^①其二,研究领域大为拓宽,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角度也越来越多样化。研究者有机会接触到俄国、中国和东欧各国的档案文献,因而就有必要和可能从冷战的角度,即战后世界格局划分的特点来重新思考和评价这些国家当时的发展模式和外交思路,或者从国际的角度,即以一种能反映苏联、中国、东欧以及西方的观点来重新思考和评价冷战的起源及其历史进程。^②

当然,冷战史研究国际化的趋势并不是自然和自发产生的,它离不开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不过,在这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当首推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1985年设立的冷战国际史项目)和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与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签订了一项合作协议。该协议的特点是通过由威尔逊中心出资组织专题学术讨论会的形式,向会议和与会学者提供有关题目的俄国档案材料。作为该协议的执行人,冷战国际史项目与各国研究机构合作,连续组织了若干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③在这些会议上,各国学者不仅发表了许多优秀学术论文,展开了深入讨论和交流,而且从不同国度和角度提供了大量有关冷战各种专题的最新档案文献。冷战国际史项目还每年出版一期学术刊物——《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免费寄送给需要这些材料的各国学者。^④该刊物的最大特点是:一方面发表各国学者对于冷战研究的新成果,一方面刊载大量译成英文的中国、俄国和前东欧

① 尽管没有统计,但近年来,在美国历史研究刊物上以英文发表的俄国、中国和原东欧各国学者关于冷战的论著和有关资料,显然是空前的。甚至在西方单独或与西方学者合作发表专著的也不乏其人。

② 美国冷战史研究大家、耶鲁大学历史教授约翰·盖迪斯1985年出版的那本专著的书名——《冷战的起源》,以及他在序言中对此书名的解释,特别能说明这一现象。

③ 这包括:1985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冷战会议”,与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合作);1985年11月的华盛顿会议(“朝鲜战争历史”);1985年11月的香港会议(“冷战在亚洲”,与香港大学合作);1985年11月的北京会议(“冷战与中苏关系”,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和当代中国研究所合作);1985年11月的奥斯陆会议(“关于冷战历史的档案文献”,与挪威诺贝尔研究所合作)等等。

④ 该刊物已经进入国际互联网,网站:<http://www.csiis.org> 网址:csiis@csis.org

国家关于冷战的档案文献，从而大大促进了各国学者之间的交流，方便了各国学者对不同语种档案文献的利用。此外，冷战国际史项目还提供资金，每年组织一批中国、俄国和前东欧国家学者前往华盛顿作数月的访问研究。^①不仅为他们创造了优越的研究条件，而且毫无保留地向他们提供各国档案的复印件。^②这些做法对于推动冷战国际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在互补和交流中提高各国学者的研究水平，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冷战史研究之所以在冷战结束后出现如此繁荣局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看到，冷战思维（例如对抗）和冷战策略（例如遏制），并没有随着具有特定意义的冷战时期的结束而结束。产生冷战现象的条件还存在，产生冷战思维的基础还存在，那么，是否还会出现新的冷战？对抗双方的主角会是谁？一旦出现新的冷战将把人类社会引向何方？这是萦绕在政治家和学者头脑中挥之不去的疑虑和担心。于是，人们需要历史，需要研究历史上究竟是哪些因素的合成造成了人类对峙的冷战局面，究竟是哪些力量的聚合使得人类曾经走到了自我毁灭的边缘。特别是面对 20 世纪的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人们力求历史给予答案，以避免人类社会曾经经历过的愚蠢行为，避免那些可能给自身带来灾难的不理智和不明智的举动，使 20 世纪真正成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世纪。

中国的冷战史研究才刚刚起步。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学者在冷战历史的某些领域是颇有建树的。例如关于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中苏同盟的起源、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以及朝鲜战争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可以在国际论坛上与各国学者对话的水平。这就构成了我们把冷战国际史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发展起来的良好基础。然而，也正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基础还显得十分薄弱。

首先，对于冷战史研究的许多方面，我们还涉足不深或刚刚开始探索。例如，伊朗事件、土耳其危机、马歇尔计划、柏林危机、共产党情报局、苏南冲突、核武器的发展与军备竞赛、华约与北约的对抗、苏联与东欧各国的关

① 据我所知，自 1984 年起在冷战国际史项目作访问的中国学者有牛大勇、陈晓鲁、郑永平、张小明、任东来、李丹慧等人。

② 我和李丹慧仅 1985 年 10 月至 1986 年 10 月在那里工作期间，即复印了 苑纸箱约万余页美国、俄国及一些原东欧国家的档案材料。

系、匈牙利事件、加勒比海危机、柏林墙危机、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战争,如此等等。而所有这些都与冷战发展密切相关的事件,都是目前国际史学界十分关注的课题,而且有关这些历史事件的档案文献也已经陆续公布出来。至于有些领域,我们则根本没有涉及。例如,冷战与经济的关系:如何使用经济手段进行冷战,或反过来,冷战如何影响了经济发展道路。^①在这些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上,我们必定是大有作为的。

其次,我们较少从中国的角度来考察和评价冷战的历史,或者从冷战的角度来研究和解释中国的历史。中国在冷战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中国的政策如何影响了冷战,冷战又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发展?如果我们把中国当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纳入冷战的框架进行考察,例如中国对美政策的演变、中苏关系的恶化、台海危机及对台政策、中印边界冲突、中国与越南的战争、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与第三世界的交往,等等,特别是充分使用中国的档案文献,那么,我们无疑将对冷战国际史研究做出独到的贡献。

还有,目前中国对冷战历史的研究还处于单兵作战的状态,没有形成系统和规模,学者之间也缺乏交流和互补。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我们组织起来,加强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为此,北京大学历史系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联合建立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代史料与研究中心,希望通过这样的学术机构,组织专题讨论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同时,收集和介绍各国有关冷战历史的档案文献,并在条件成熟时设立专业史料保管和利用机构,并以此联络各方面从事冷战史研究的学者,把中国的冷战国际史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

这些也正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代史料与研究中心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发起和组织出版这套“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系列论著的宗旨和出发点。本系列采取自由投稿的方式,纳入系列的著作形式不限,可以是专著,也可以是译著,可以是论文集,也可以是文献资料集。但无论何种形式,必须保证以足够的历史档案文献作为论著的基础,因为利用第一手

^① 不过应当指出,在这方面,西方的研究也刚刚开始。直到 1964 年美国才出现了第一部专门讲述经济在冷战中的作用的专著,即 阎 春 霖 著 孙 志 华 译 《冷战中的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

史料从事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条件，目前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①而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与国际学术界展开对话，才能把我国的世界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最后应该指出，虽然冷战国际史研究正在成为中国和世界历史论坛中的热点，并且逐步引起世人的关注，但以后的道路很可能是艰难的和漫长的。所谓艰难，是说人们——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要摆脱以意识形态对立为基点的冷战思维，要摒弃以武力威胁为行动准则的冷战策略，要真正树立以维持世界和平为己任的新观念，必然会有一个对以往教训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所谓漫长，是说新的档案材料——特别是东方国家的档案文献——还需要不断挖掘，更要求使档案文献的保管、解密和使用逐步走向科学化、正规化和制度化。而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就迫使学者不断地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表述。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以及还没有得到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在这个意义上，爱德华·卡尔的一句名言特别值得回味：“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②

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 沈志华

1995年 9月 14日

① 近年来，不仅中国的有关档案文献相继出版，美国的冷战史料不断引入中国，而且大量译成中文的俄国历史档案也即将与学者见面。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重点科研项目、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拟于今年开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陆续分卷出版。这套 16卷、1500万字的大型文献集预计 1995年出齐。

② 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中文版，188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

编者前言

战后中苏关系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角度

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是国际冷战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不仅是因为苏联和中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在一个时期内携手同行,于两大阵营的对抗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而且还在于中苏两国关系的演变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从而改变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与命运,促成了国际力量的重新组合与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对整个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

二十世纪 缘- 愿年代中苏关系史研究概况

纵观冷战时期对中苏关系史研究的状况,起源于意识形态对立的东西方抗衡,给这个课题的研究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特别是在中国和苏联,由于受到中共和苏共两党关系的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态势更是与两国关系中的政治因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研究状况

在缘年代前期中苏结盟的‘蜜月’阶段,中国学术界对于中俄、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完全是配合中苏友好的政治宣传,单一地反映苏联对华援助

及中苏友谊的历史，不仅未曾谈过斯大林时期苏联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以及对中国国家 and 民族利益的伤害，甚至连沙俄侵华的历史也基本没有提及。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实施了对华政策新方针，将斯大林时期苏联在双边关系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权利归还中国，基本上解决了斯大林时期的遗留问题，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感受到与苏交往中前所未有的平等气氛，开始在对内对外的一些谈话中一吐怨气，讲到他在见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并谈及斯大林不平等待人，“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等问题。^①应该说，这种状况为中国学术界客观地、全面地研究中苏关系提供了可能，但它终未成为现实。由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是信仰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强调意识形态的一致高于国家利益的一致，从而要求两党、两国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但中苏两国民族特征、文化背景、政治和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及国际地位的巨大差异，使这种兄弟式的步调一致不可能长久存在。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苏两党在探索各自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对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的认识发生重大分歧，并逐渐发展为两党之间意识形态领域的公开论战。当苏联开始非斯大林化运动时，中国则以列宁、斯大林的对内对外政策理论否定赫鲁晓夫的改革尝试，批判苏共的对内对外政策是“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这即在事实上肯定了斯大林的对内对外政策，其中对华政策的错误也就随之淡化。此后，两党关系的恶化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紧张，边界争端肇始，中国发动了旨在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文化大革命”。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两国关系甚至走到了战争的边缘。这时的中苏关系问题已成为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乃至共产主义千秋大业的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从而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中国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实事求是地、全面深入地研究中苏关系这一课题，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禁区。取而代之的是全面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论著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1983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

的发表与出版,其政论性之强已大大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畴。与此相应的是中俄关系史,尤其是沙俄侵华史研究的大发展。史学界针对苏联官方和学术界在中俄关系上的论点,特别是就领土和边界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论说,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尽管囿于两国关系紧张的现状,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片面性的问题,但它还是从一个方面为战后中苏关系史这一课题的研究,积累了资料,提供了线索。

进入 1970 年代后,中国共产党在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反省的基础上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及制定各项政策的出发点,从而逐渐冲破了中苏关系史研究领域中的樊篱,特别是在 1980 年中苏关系的改善出现转机至 1989 年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这一时期内,中苏关系的研究得到较大的发展。不过,就战后中苏关系史这一课题而言,虽然一些学者对《雅尔塔协定》与苏联的远东政策、斯大林与东北问题、《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斯大林是否劝阻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但从总体上看,这方面的研究仍显薄弱。这里还应提及的是,台湾学者一直比较重视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和有关资料的整理及出版工作,其于 1940 年代至 1970 年代编辑出版的《中俄关系史料》、《“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等书籍,为该项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档案材料。

苏联研究状况

苏联的俄中、苏中关系史研究同样受到国内政治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其状况与上述中国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1950 年代初,苏联史学界继续受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沿着 1940 年代中期以来的研究导向,在俄中关系史研究中美化沙俄侵华政策。1956 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揭露之后至 1980 年代末,苏联史学界开始对以往美化沙皇政府对华政策的倾向提出批评,试图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对俄中关系作出评说。但是,1950 年代苏联史学界在苏中关系史的研究中基本上还是回避了苏联对中国革命及中国的民族利益有过伤害的问题,而是多从苏联对华政治支持与经济援助的角度评说两国的关系。在 1940 年代至 1970 年代苏中关系恶化、两国由盟友到敌手的对抗时期,苏联的

俄中和苏中关系研究也配合苏联政府对华政策的需要，违背历史事实，重新为沙皇俄国的侵华政策辩护，并批判中国的“大汉族霸权主义”，攻击当代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1950年代苏中关系解冻以来，苏联方面停止了反华宣传，而且还开始了对以往的对华政策的反思。一些学者在评述战后苏中关系时，谈到苏联通过1950年《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实际获取了中国东北和新疆两个势力范围等问题，探讨了国家关系与民族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并总结了苏中关系由联盟走向对抗的历史教训。但此时期苏联史学界对战后苏中关系的研究也还未深入下去。

西方研究状况

1950年代至1970年代，当中苏关系史研究为政治性大批判所取代时，西方史学界却开始加强了对这个课题的研究。过去西方的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阵营是铁板一块，所以中苏分裂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西方学者特别着重于对中苏分裂的起源和内在原因进行分析与研究。如在美国，除有大量中俄、中苏关系方面的著作重版外，还有一批论述当代中苏关系的新作问世。但是，因受档案材料阙如的局限，直至1980年代末，西方学者对中苏关系特别是战后中苏关系的研究，也大多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缺乏深入的、有说服力的分析。同时，这些研究往往从反共的立场出发分析中苏两党、两国矛盾及冲突的起源，带有冷战时期所特有的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因而不免失之偏颇。

总之，纵观1950年代以前中苏关系史，特别是战后中苏关系史的研究状况，由于中苏双方都很少公布有关的档案文献和原始材料，研究者对各种问题多是从结果推论原因，由中国和苏联当时公开宣布并执行的政策追寻双方制定这些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或者根据后来中苏双方有关的官方出版物来判断中苏关系史发展的进程，其中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1990年代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

随着1990年代的来临，尤其是苏联解体，国际冷战时代的结束，上述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首先是中国于1989年末、1990年代初陆续出版了《建

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共中央文件选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和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文选等一系列重要文献资料和一批回忆录、传记和访谈录(台湾也开放了部分新的档案材料)。其次是 20 年代初俄国发表了大量涉及苏中关系的回忆录和采访录,特别是解密了一批有关战后苏中关系问题的重要档案文献。这些原始档案材料和口述史料的披露和传播,把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引向了深入。在中国、俄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对这批新材料进行充分利用的基础上,在对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史进行反思的氛围中,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的角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这首先表现在各国研究者都注意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避免传统政治观念的影响,把这段历史作为一门学科进行客观的分析和研究。其次,由于大量档案和口述史料的出现,研究的重点也从一般性、综合性分析转向更深层次的具体问题的探讨。如在战后东北问题、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刘少奇访苏、毛泽东访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朝鲜战争、中苏经济合作和军事合作、中苏分裂及其原因、中苏边界冲突以及中苏关系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个人作用等方面,都出现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

本书断取战后中苏关系从 1945 年苏联政府将对华政策的重点逐步移向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对华关系的“转轨”,到 1959 年中苏发生边界流血冲突,两国关系恶化达至顶点这一阶段的历史,选入了近几年来中、俄、美等国学者利用中俄两国发表和解密的新的档案材料及口述史料,对此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双方关系演变的原因进行研究的最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国际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

战后初期中苏关系及其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从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在远东继承了沙皇俄国的传统战略,制定了以夺取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目标的外交方针,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保证则是《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此,斯大林当时对华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政府,其重点在于保护和实现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这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只是苏联外交斗争中的借用力量。由此,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关系,也

即苏联与未来新中国的关系，是在一种不愉快、不和谐的状态下开始的。但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大势迫使斯大林要考虑改变苏联的对华政策。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战略及其对苏联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中苏之间真正合作的基础得以初步建立。刘少奇访问莫斯科后，中苏两党在原则上统一了认识，虽然涉及双方根本利益的分歧尚未得到解决，未来双边关系发展的目标还是确定了下来。随之，尽管中国共产党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毛泽东为了体现新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并构筑对外关系的新基础，仍然决心与苏联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然而，斯大林以东北问题关系到苏联在远东的根本利益之故，难以接受新中国的主张，这样，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对话一度陷入僵局。但是，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冷战的世界格局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共同的战略目标，使中国与苏联不断协调各自的战略利益，解决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最终签订了新的条约，结成了新的战略同盟关系。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苏联丧失或即将丧失它通过雅尔塔体系和 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获得的在远东的权益，即由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港所保证的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斯大林开始重新考虑其对远东的政策，认为可以替代中国东北而保持苏联在远东的政治、经济权益的地方是朝鲜半岛。这样，朝鲜战争爆发后，在美国出兵干涉、形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斯大林迫切需要中国出兵援助北朝鲜。毛泽东出于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和承担国际主义义务的考虑，也决心与世界头号强敌美国进行一番较量。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成为中苏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斯大林因此消除了对中国的猜疑和顾虑，彻底改变了对毛泽东的态度，开始采取与中国全面合作的方针。

对于这一阶段，即从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到 1949 年 12 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从中国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缔结的旧的中苏同盟破裂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新的同盟关系的确立，中苏两国关系转轨时期的研究，本书选入了一组文章。薛衔天《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走向（1945—1949）》一文，以战后东北问题为核心论述国共两党和苏、美三国四方关系变化的组合及中苏关系的走向，认为战后东北是远东

国际矛盾的焦点,是国共两党及苏联和美国争夺的战略基地。东北问题是《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构造的中苏美三国关系框架的支柱,而其如何解决则成为中苏关系的基础。战后中共抢先进入东北,打破了美苏对华关系的构架,而美苏两国也从战争中的同盟关系转化为对抗和争夺的关系,国共两党和美苏四方随即各自选择盟友,蒋介石投入美国的怀抱,中共与苏联则在东北结成盟友。1945年中苏莫斯科会谈,东北问题仍居核心地位,只是在交还大连港、移交中长铁路权利和财产、允诺旅顺口撤军等关键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才使中苏双方缔结了新的条约,将两国的同盟关系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在此期间,除了中苏关系中的焦点东北问题之外,中苏双边关系中的新疆问题则始终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状况,苏联对新疆的政策也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5-1957)》一文,在考察了1945年至1957年苏联对新疆的政策趋向之后指出,不论苏联是与新疆地方当局结好,还是同少数民族联合,是支持新疆独立,还是强调自治,其目标一直是在中苏走向同盟关系的大前提下,从政治和经济上确保苏联在新疆的优越地位和特殊影响。尽管在对华政策中,新疆对于苏联的重要性次于外蒙古和东北,但其对新疆的控制和影响仍然不容忽视,且这种影响直至新中国成立15年后才逐渐消除。

关于中苏缔结新约,为以后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一事,谢·冈察洛夫等人《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通过分析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刘少奇访苏活动及其为与斯大林的会谈所准备的书面报告,评述了斯大林的全球战略对中苏双边关系的影响,指出在考虑对华政策问题时,斯大林如果认为苏联需要首先承担风险,就会立即采取强硬的不妥协的态度加以拒绝,如果中国人的想法与其战略设想相吻合,他便会采取热情的合作的态度予以支持。而中共方面为能与莫斯科结盟,依靠其帮助抹去中国对外关系中一切不平等的痕迹,准备付出暂时承认苏联利益的代价,同时以尽可能小的损失争取与莫斯科更加平等的关系。沈志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愿望和结果》一文,利用近年来俄国新解密的档案材料,对1953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的主要内容和谈判过程进行了具体

而详细的考察和描述，并对中苏新约签订的最终结果是否符合双方最初的愿望这一问题作了分析和判断，由此为准确理解和评价在中苏新约基础上形成的中苏同盟的历史地位问题，提供了史料及史论上的依据。

另外，奥·韦斯塔的《中苏同盟与美国：战争、政策与理解（1945-1950）》一文，以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制度对立的视角评述史事，反映了西方学者的一种研究倾向。文章认为对于中苏联盟而言，与美国的冲突既是产生内聚力的要素，又是出现分歧的焦点。在朝鲜的反美战争加强了中苏联盟，但 1950 年台湾海峡危机时中苏双方对美政策的分歧又导致了这个联盟的分裂。中苏友谊的内容首先是作为一种反美的联合，它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战后出现在亚洲的美国以及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朝鲜战争不仅是金日成为实现朝鲜民族统一而必然采取的手段，也是由于斯大林的优柔寡断和判断失误而导致的一场冲突。这场战争加强了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该文还提出，美国未表明其进攻中国的意图和决心，从而使毛泽东认为美国的威胁正在减弱，故此反对苏联与美国缓和的政策，这种对美政策的分歧致使中苏走向对抗。

由于此期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在东北关系的发展是战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此后中苏关系发展的基石，因而这一组里的几篇文章都利用新的史料，着重对莫斯科在中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并作了新的阐述。不过，尽管作者们所利用的材料基本相同，但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及论点也即存在差异。例如，盛慕真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满洲的斗争（1945-1949）》一文认为，抗战胜利伊始中共即迅速采取行动，抢先在满洲占领地盘，而苏联从一开始（1945 年 8 月）就支持中共抢占地盘，斯大林不仅鼓动毛泽东实施快速开进满洲的战略，而且还向中共提供了大量苏军缴获的日军武器，使中共在满洲的军事力量迅速发展。斯大林很了解毛泽东与美蒋竞赛中的问题，与美国明目张胆地支持国民党的同时，苏联也在暗中越来越强有力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当斯大林屈从于华盛顿和重庆的外交压力而改变了他的满洲政策时，毛泽东从国际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出发，自愿服从斯大林的政策，

并一再调整自己的政策以适应苏联政策的变化。毛泽东与斯大林在东北的秘密合作中,关系亲密,而且合作成功。布·默里《斯大林、冷战与中国的分治》一文则指出,苏联人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会有成功的开端,更不用说会有胜利的结局。新的档案材料表明,苏联试图限制中共对东北的军事渗透,竭力阻止中共接收满洲的主要城市沈阳。日本投降后,苏联红军对中共军队驻扎满洲持敌视态度。苏联人不仅迫使中共撤出满洲的城市,而且还在 1945 年 8 月断绝了与满洲共产党的所有联系。直至 1946 年 1 月,苏共中央发布两项关于增加对满洲中共武装力量援助的军事命令之后,苏联才开始援助中共,同时还警告中共不要急于发动全面统一中国的进攻行动。而此前的援助是很有限的,实质上是没有的。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一文,从斯大林为维持以美苏为中心的远东国际体系,以其自身的战略利益为本考虑中国、中共问题和中苏关系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配合其外交政策的角度,分析了斯大林对东北政策的变化过程与中共中央处理对苏关系的过程,从而说明了这一时期苏联与中共关系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表现的原因。

在苏联与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变化中,还有一个热点问题,即苏联是否曾劝告过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划江而治。对此问题,研究者也是利用新的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各抒己见。布·默里的文章指出,台湾国民党档案馆里的文献材料证实了下列观点:当 1949 年初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向全面胜利之时,苏联仍然主张以长江为界划分中国。国民党“外交部”关于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华外交活动的记载清楚地表明,罗申的使命与中国共产党人回忆录等材料中所说的米高扬的使命是相似的。作者认为,台湾档案馆里的苏联文件,不论其是假情报还是真文献,都说明莫斯科希望中国划江而治,而使苏联不必冒与美国对抗的风险。苏联想要中国回复到军阀割据的时期,因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获胜并且归入苏联集团,苏联就有与美国发生对抗的危险。而在苏联看来,由于欧洲的冷战正在炽热地进行,这种对抗对苏联来说是不利的。安·列多夫斯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的文章《米高扬访华的秘密使命》(本书限于篇幅未予收入),则根据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中有关米高扬此行的文件及其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政治局其他委员们会谈的记录材料，一方面澄清关于米高扬曾劝说中共以长江为界分治中国的说法，一方面论说苏联在中国东北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援助和这种援助的巨大作用，以及米高扬同中共领导人就中共政策的内容和前景问题，苏联以后对中共的军事、经济援助问题进行讨论的情况，否定关于苏联对中共的援助微乎其微，斯大林干扰中国革命、不相信中共能战胜国民党，并且欲使中国划江而治等观点。

全面合作时期中苏关系及其研究

中苏两国缔结新约，特别是中国出兵朝鲜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双方在政治上相互支持，在经济、文化领域相互合作，关系得到平稳发展。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相对提高，而斯大林的去世又为中苏关系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性和新的转机，使苏联第二代领导人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其与中国的关系。1956年11月，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即开始调整苏联的对华政策，提高驻华大使的级别，扩大对华援助规模，加强苏中在文化、科技领域和对外政策方面的协作，在相互交往中尊重中方意见、照顾中方利益，并将以往苏联在双边关系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权利归还给中国。1957年12月，苏联政府又正式照会中国，废除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放弃苏联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两个“势力范围”，解决了斯大林时期的遗留问题，彻底消除了两国之间的不平等因素。这样，至196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得到全面发展。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中苏之间相当密切的经济合作，对新中国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起到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双方在友好合作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分歧，也为中苏关系的恶化埋下了伏笔。

对这一阶段苏联援华，中苏经济合作、军事合作发展变化过程的研究，过去一般都是泛泛而谈，缺乏系统性。而今，这方面的研究与前一阶段，以及中苏走向分裂阶段的研究相比，依然比较薄弱。这也许是由于有关的材料尚嫌不足或系统性不够，抑或是这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军事合作问题仍旧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敏感性，故而使该项研究尚未成为学术界关注的新

的热点。本书收入的一组文章中，黛·凯佩尔的文章《苏联的对华援助及民间合作》利用有关苏联顾问计划的官方档案材料及对百余位该项计划参与者的采访资料，从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顾问的角度，为苏联顾问计划勾勒出一幅更为全面的图景，并就这项计划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作出新的评价。文章通过述评苏联顾问计划的规模、顾问的重要作用、苏联专家在华情况、苏联顾问与中方的关系及其冲突等问题，反映了以往中苏关系中为人所不知或少知的一个侧面。文章论析说，控制顾问计划的苏共中央自上而下地发布命令，对其在华顾问进行管理，在事关中国自己国家发展问题的重大决策上不让中国参与，过于注重自身安全问题，而对大多数苏联顾问工作的基本情况却毫不了解等倾向，像主旋律一样贯穿在两国关系之中，并在 1957 年以后成为构成双方交往障碍的焦点。中苏友谊如同苏联的社会状况一样，无意中成了苏共中央错误的管理方法的牺牲品。张曙光《中苏经济合作的瓦解（1957—1960）——从文化心理角度所作的解释》一文，则着重在文化心理的视野中对中苏经济合作的衰落作出解释。文章论说的重点不在中苏经济合作的过程，而在于通过分析双方经济合作中的问题，阐述中苏冲突的原因，指出这种冲突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特点是其源于两国经济关系上的持续不断的摩擦，认为经济上的矛盾是导致中苏分裂的主要原因。而源于文化背景的心理因素、思维方式左右了中国共产党对苏经济政策，毛泽东及中国领导人以一种民族情感来处理外交事务，对外部威胁的感知来调整应付对手的策略，这样，当赫鲁晓夫以“经济讹诈”来对抗北京的挑战时，中苏经济关系上的摩擦终于演变为国家关系上的分裂。

关于中苏军事合作问题，冷战时期，由于中苏双方都不愿将有关材料公布于众，都对这项合作的历史保持沉默，因而学术界在研究中苏关系时，往往回避或忽视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冷战结束后的今天，随着俄国部分档案的解密，该项研究也较以前有所发展。谢·冈察连柯的文章《中苏分裂的军事因素》较详细地论述了苏中双方军事合作的背景、发展阶段、特殊军事领域中的合作、核能领域中的合作、苏对华军事技术援助在军事合作中的作用等问题，并分析了双方合作中的裂痕，认为军事因素是构成

中苏关系破裂的基础。文章评论说, 1950年代苏中两国在军事领域中的合作相当密切, 尽管其过程没有公开报道。对苏联来说, 这种合作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 但是这项合作是双方受益的: 苏联为它在东亚的盟国创建了工业实力, 而中国则增强了自己的国防力量。当 1960年代初双方的军事合作终止时, 中国已从中得到了很多, 并未被困住。

此外, 还有一篇利用苏联地方档案和地方报刊杂志研究赫鲁晓夫时期苏中关系对苏联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形势影响的文章——塔·特罗拉科娃的《赫鲁晓夫时期苏联远东与苏中关系》。该文评说了苏联东亚地区与中国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地区性交往情况, 指出赫鲁晓夫执政后的解冻政策, 对于苏联东亚地区的发展及中苏关系的发展是一个良好的机遇。1950年代中至 1960年代初, 尽管两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受到各自中央政府的强有力的控制, 但是苏中民间的直接交往却以互利的形式发展着。应该说, 对中俄地方档案的开掘及利用, 目前还是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在材料选择上的一个薄弱环节, 有待于引起研究人员的重视。

中苏关系破裂时期及其研究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后, 中苏两党分别开始全面探索各自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当 1950年代后期这种探索使两党在政治、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上产生分歧, 并且矛盾不断加深时, 中苏两党关系逐渐从友好合作的巅峰走向低谷。1960年代末 1970年代初, 中苏两党在内政外交方面出现重大背离, 开始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率先将两党的思想分歧引入国家关系, 撤走技术专家、撕毁有关的两国经济合作协议, 先行迈出了把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的第一步。中苏两国的边界纠纷也随之肇启。中苏两党在国家的发展道路上分道扬镳, 双方合作的基础发生根本性动摇, 终于导致分裂局面的出现。至 1960年代末, 所谓的中苏同盟早已名存实亡, 随着珍宝岛边界流血冲突事件的发生, 两国关系甚至走到了战争的边缘, 国家关系的恶化达至顶点。战后的中苏关系由缔结同盟, 共度“蜜月”, 至裂痕加深, 进而走向了全面对抗。

中苏之间由两党关系恶化发展至国家关系破裂的演变过程及其原

因,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研究战后中苏关系史的一个热点。本书收入的一组文章从导致中苏分裂的原因、中苏关系恶化的具体影响及中苏边界冲突的缘起等几个方面,探讨了这一阶段的有关问题。关于中苏分裂的原因,杨奎松的《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和李丹慧的《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1949—1959)》两篇文章,都是着重从中苏两国领袖个人的思想认识活动对两国关系的影响这个角度探讨问题,既强调了领袖个人的作用,又将其置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之中,避免了某些西方学者将个人凌驾于历史时代之上,以历史人物的个性推论历史事件的发生等偏颇、流弊。杨奎松的文章认为,在中苏两党反目成仇,双方关系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本改变的过程中,毛泽东起了决定性作用。因此,文章以毛泽东苏联观的变化原因剖析问题,从历史上的恩怨、毛泽东独特个性的作用、民族利益上的矛盾和革命理念上的歧异,论述中苏关系的演变历程。根据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变化的过程和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关系变化的情况,强调导致双方关系迅速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还是革命理念上的歧异。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否定毛泽东过去一切成功的实践和一系列正在进行的新的革命尝试,就是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种认识使毛泽东从根本上失去了对苏联的信任。李丹慧的文章则认为,中苏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以及从本国立场和利益出发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是确定 1949 年至 1959 年中苏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指出这种探索和认识构成了中苏两党两国制定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及对外方针政策的基础,而这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趋同或分歧又反过来造成了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或对立。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一致,相互之间还以信任为主时,中苏关系就表现为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发生背离,双方的基本利益背离,相互间猜忌、戒备胜过信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淡,乃至趋向分裂。

此外,杨奎松和陈兼的《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的兴衰》一文,着重从毛泽东与中国政治发展变化的关系这个角度论说中苏关系演变的原因。文章认为,毛泽东为迅速改变中国自身地位而发起的一系列政治变革与政治

斗争,不可避免地对中苏同盟关系造成了重大影响。指出,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严重估计使中国共产党人决心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此后,斯大林通过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对毛泽东形成的充分信任,促使中苏同盟进入“蜜月”时期。但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将党内、国内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一切矛盾冲突都重新纳入到阶级斗争的轨道,与赫鲁晓夫的分歧越来越大,中苏两党围绕究竟谁是列宁主义的捍卫者展开激烈争论,最终促使两党两国走上了对抗的道路。牛大勇的《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文,则以中苏关系对中国国内政治影响的视角,论述了苏联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是如何促使中共领导核心在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指导下,走上“文化大革命”之路的。文章从新的角度认识“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理论的起源,指出:反对美国某些政治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防止苏联“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在中国取得政权,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反应,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缘起的国际背景。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致使中苏关系更趋恶化。这即从一个方面排除了西方学者以浓厚的宫廷政治色彩述说这段历史的弊病。

目前,重新论析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特别是专门评说 1960年代两党之间那场公开论战的文章尚不多见。马·克莱默的文章《苏联外交部对分裂前夕苏中关系的估计》,分析介绍了 1960年 10月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米哈伊尔·齐米亚宁为赫鲁晓夫访华准备的有关中国背景材料的绝密报告中关于苏中关系的部分,指出该报告承认苏中双方交恶的起源可追溯至斯大林时代,强调了由苏共二十大和中国“双百运动”所引发的苏中双方各自的反思及批评对双边关系的不利影响,列举了苏中意识形态上的一系列分歧。认为该报告虽然对苏中关系的结论是积极的,并认为苏中冲突的全面爆发是可以避免的,但其报告内容本身已说明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已趋于恶化。薛钰《对 1960年代中苏论战中若干问题的再思考》一文,对中苏两党争论的焦点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关于“战争与和平”议题,文章认为,中共把苏联的和平共处方针上纲到是反列宁主义的阶级投降政策的高度,过分强调了两种制度的对抗和冲突,以及时代的革

命潮流和新的世界大战的不可避免性。关于“和平过渡”议题,文章提出,中共异常强调了暴力革命,抨击“和平过渡”的主张是背叛革命。但事实上解决国内政治矛盾的方法、道路多种多样,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去探索。关于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社会变化的评价问题,文章评说苏共二十大反个人崇拜引发了一次思想解放高潮,其影响深远。而其后苏联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又为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李捷的文章《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则着重分析了导致中苏两党之间意识形态论争的原因,指出:当苏美关系紧张,中苏的战略利益相同时,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就暂时得到控制;而当苏美关系缓和,中苏的战略利益发生冲突时,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即凸现出来,并演变成意识形态方面的论争,继而揭开了中苏大论战的序幕。

1992年5月,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和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联合在北京召开了“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者除了研究中苏关系史的中外学者,还有一些直接参与当年中苏最高层会晤的当事人,如来自俄罗斯的曾在苏共中央社会主义联络部国际部任职的杰留辛和曾任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以及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担任翻译的李越然、阎明复等先生。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就中苏两党分歧、双方关系破裂的过程和原因等问题,与他们进行了直接对话,并由丁明根据录音将这次交谈整理成《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一文。几位中苏关系发展变化亲历人提供的史实、线索、信息和观点,不仅十分有趣,而且对于启发研究者的思路大有裨益。

过去由于有关档案史料的缺乏,中外学术界一直未能对中苏关系恶化的具体影响问题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近年来,有的学者已注意在开掘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回顾与评说中苏关系恶化中的一些重要史事。李丹慧《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来自中国新疆的档案材料》一文,把1962年春夏中国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及所属塔城地区大规模边民非法越境逃往苏联的事件,放入中苏关系恶化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中去加以考察,根据大量历史档案资料和当事人采访录,分析评

说了该事件发生的过程及其根本原因，提出了不同于西方学者“大跃进运动使然论”的观点。

关于 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事件，过去除了中苏两国的官方声明和新闻报道等材料外，双方披露的有价值的档案、文件等资料很少，加之边界问题的敏感性，妨碍了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近年来，有关该事件的情况通报、会谈记录等材料的有限公布，使研究者可以从新的角度对中苏边界事件中的种种问题进行剖析，而不是泛泛地从现象去推论原因、动机和影响。克·奥斯特曼的文章《1969 年的中苏边界冲突——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档案的新证据》，利用前东德统一社会党的档案，论述 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的过程、中苏双方各自的动机及对危机作出的回应，认为中国在珍宝岛事件中展示的进攻性姿态，表明其对外政策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中国领导集团在边界谈判中打“俄国牌”，使尼克松与之联手，而这个战略最终是成功的。但文章将中国军民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行动说成是对苏联边界的挑衅活动和入侵行为，不免有失客观公允。大卫·沃尔夫的《中苏边界冲突：对亚洲冷战的新探讨》一文，通过评说中苏边界冲突及边界谈判时期苏联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不同认识，主要是苏联远东地区对苏中关系恶化的判断，地方政府关于同中国改善关系、重开边境贸易的要求，以及苏联汉学家对苏共中央制定对华政策的影响等问题，为冷战史及战后中苏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

利用新的档案文献资料研究此问题的成果中，还有几篇较重要的中国学者的文章，本书限于篇幅未予收入。这些文章一方面以尊重历史的客观态度指出，中苏珍宝岛之战是中国方面有计划、有准备的一次边界自卫反击战；一方面又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对这类冲突的缘起及其对中国政治、军事和外交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评说。徐焰（国防大学教授）《1969 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一文（载《党史研究资料》1992 年第 5 期），认为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实际是两国矛盾长期摩擦引发的一个冲撞点。尽管这类事件是在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强调“反修防修”，进行国际反修大战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进行斗争的指导思想和一些政策、策略存在着“左”的局限性，但就斗争的本质而言，仍是中国捍卫自己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反对

苏联霸权主义行径的行动。李丹慧的文章《195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指出，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日趋恶化，面对苏联愈益严重的军事威胁，特别是不断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事端的形势，毛泽东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开始着手对中国的外交战略进行调整，并将中苏边界问题也放入其对外总体战略中去思考，从而把边界问题作为缓和对美关系、联合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突破点，通过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完成对外战略目标的转移。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演化为珍宝岛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即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发生的。文章认为，珍宝岛事件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冲突的双方哪一方有所准备，也不在于谁先开了第一枪。毕竟，这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是中国对苏联不断挑衅的反击，而且事件发生在中国的领土上。作为历史研究的着眼点，关键问题在于这次事件选择的时机，在于一个小小的边界事件在中国和国际上引起的轰动效应，它表明中苏边界争端已成为中国对国际战略问题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构成了中国调整对外战略策略的一个关键性环节。毛泽东用边界问题在对苏政治斗争中做足了文章，使中国得以在国际战略大格局的变动中把握住了外交上的主动权。杨奎松《从珍宝岛事件到缓和对美关系》一文（载《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3期）则提出了不同于李文的论点，认为珍宝岛之战从中国方面来说，直接目的不过是想给苏方以教训，使之收敛其挑衅行动，其中不包含任何准备与苏联开战的意图，也未必有诱敌深入的意思，毛泽东并不想扩大事态。中国改变对美政策并非毛泽东声东击西的“英明决策”的结果，是其审时度势后所采取的一种正确的外交选择。

存在的问题

战后中苏关系问题作为国际冷战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是一项十分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要确立起这一课题研究的基本框架，形成学科研究的完整体系，还存在一些问题。

其一，战后中苏关系研究虽然已成为近年来新的历史研究热点，且利

用新材料,在新的角度上探讨史事,使这个课题的研究从总体上看较以往有所深入和发展,但就其研究层面而言,仍存在许多薄弱环节,还有一些带全局性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尚未澄清,一些前沿课题尚少触及。如从意识形态因素对中苏关系演变的影响看意识形态问题与国家、民族利益的正确关系,中苏分裂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影响,战后中苏关系走向与中苏两国内政的因果联系,国际冷战的大背景、国际多边关系对中苏关系的影响等问题;又如中苏关系发展演变的分期,越南战争、中印之战中的中苏关系,中苏关系与第三世界等具体问题、具体史事,以及个案的研究等,都有待于引起学术界进一步的重视,以利于摆脱研究中指导思想上的含混局面,走出误区,并且拾遗补缺,点面结合,保持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此外,在材料的利用上,还须注意开辟新的途径,在利用中央档案、口述史料的同时,也应重视地方档案的挖掘。

其二,对战后中苏关系问题的探讨应把握住客观的尺度,尊重历史事实。这对国内研究而言,应该是继续清除思想上的障碍,以此为基础澄清上述重大理论问题,并对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中苏关系的正负面影响等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估,对毛泽东时期的对苏政策等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认真总结两国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就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而论,也应该进一步排除意识形态上的、观念上的干扰,对战后中苏关系诸问题作出客观的、公正的评说。当然,任何一名学者在研究问题时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身立场、观点的影响,对此不能苛求,但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就是要以尊重历史的客观态度对历史发展的进程作出更符合其原貌的解释。信史虽难,却应是学人一生追求的目标。对于本书中一些文章在观点、结论和材料选择等方面所表现的较强的政治倾向性,编者当然不能苟同,它们也不代表编者的看法。这里收入不同认识、不同色彩的文章,其目的即在于摆脱观念上的束缚,兼收并蓄,使中国学者对目前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状况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以知己知彼,考辨论证,借他山之石攻玉,抓住目前的有利时机,在该领域中与国际学者在同一层次进行对话,从而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

其三,要克服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客观地分析、评价史事,解决重大理

论问题,澄清史实,使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全面、系统、深入地开展下去。取得研究上的更大突破,史料的进一步开掘是基础。目前,战后中苏关系的研究仍带有某种程度的敏感性,故各国文献的解密也还受到一定限制。与俄国方面有关历史档案材料的解密、公布相比较,中国方面档案材料的发掘工作还有一定的差距。而各国学者只有在综合利用中俄双方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才能摒除俄方档案公布上的倾向性所致的流弊,才能对档案文件、当事人回忆材料中的偏颇和疏漏加以分析、甄别、辨正,减少研究中的失误和分歧。尤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依据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出反映本国立场和观点的战后中苏关系史,钩玄提要,探赜索隐,澄清国外学者对有关问题论说、评价上的偏见与失实之处,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我们期待着俄罗斯、中国(包括台湾)及其他国家有关中苏关系的档案进一步解除限制,由此促进这一学科研究的新繁荣。

二〇一〇年 圆月

战后东北问题与中苏关系走向

(~~观察~~ 观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薛衔天

近

年来,学者们就新中国外交对苏“一边倒”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出版了一些与此问题有关的专著。这些文章和著作深入挖掘各方面史料,不乏精辟之论,但大都对东北问题与“一边倒”形成的关系未加注意或未予应有的注意,而且没有将中共对苏“一边倒”与国民党对美“一边倒”合并考察。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憾,并以此就教于各位先行者。

一、战后东北问题是中、苏、美关注的焦点

中国东北地区东邻日本,南抚朝鲜,西控蒙古,北连苏联,更是中国京津腹心地区的屏蔽,兼以幅员广大、物产丰饶,其战略意义在远东地区处于无与伦比的地位。因此,从 20 世纪末开始这里一直是远东国际矛盾的焦点。日本侵华战争首先在这里打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在这里结束。战后东北集中了最多的日本战俘,有除日本本土之外最强大的日资产业和武器储备,显然战后东北问题如何解决、东北地区将由何种政治力量主宰,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和前途,而且直接关系到远东局势甚至世界

格局的变化与发展。因此,战后中(国共两党)、苏、美三国四方都把注意力集中于东北。

战后美苏关系和世界格局是雅尔塔会议确定的。《雅尔塔协定》是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它构筑了战后远东国际关系的基本框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则是《雅尔塔协定》的派生物。因此《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美、中、苏三国紧紧地连接到了一起。《雅尔塔协定》的达成使苏联出兵东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则是苏军占领东北全境的产物^①。苏联出兵东北的直接作战目标是日本关东军,但其最终目的则是恢复沙俄在 1904 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侵华权益。《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满足了苏联的要求,这样,美苏就以牺牲中国的利益达成了联盟,战后出现了美苏协调一致的对华政策。

但是美苏联盟很快就破裂了。这是因为:第一,1947 年美欧出现了冷战观点,东西方关系开始恶化,逐步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营垒对抗的格局。在这一总的形势下,美苏为加强对华影响,各自在华选择了自己的同盟者。美国选择了蒋介石,首先支持他向东北运兵,接着又全力支持他打内战。而苏联则利用其在远东的优越地位,支持中共在东北发展和壮大力量。这样,美苏便打破了它们自己设计的战后远东格局。第二,苏联并不满足于恢复沙俄时代在东北的侵华权益,它要通过取消大连自由港的地位和与蒋介石达成垄断性的东北经济合作协议,变东北为独占的势力范围,将美国势力排除出东北,从而使美苏在远东的力量配置失去平衡。美国则以垄断战后对日事务报复苏联。这样就形成美(对日)、苏(对东北)在远东“你走一里,我送两里”互不相让的局面。

中国国共两党的斗争正是在以上美苏矛盾斗争的总背景下展开的。蒋介石认为美苏必战。为消灭中共,他将希望寄托在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上,一头栽进美国的怀里,拼命挑拨美苏矛盾,执行反苏反共的方针。而中共则将未来建立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执行独立自主的方针,它不仅利用美苏矛盾,而且巧妙地利用美蒋之间的矛盾。与蒋介石相反,毛泽东

^①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于 1945 年 8 月 14 日,苏军对日作战已基本结束。

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并无可能性，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之说，是国际反动派借以控制中间地带的舆论。鉴于美蒋勾结日益紧密，毛泽东在对外政策上决定依靠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支持，但在策略上处处考虑到国内舆论和照顾苏联当时的处境（与蒋介石政府的同盟关系），这就使中共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处于不败之地。正是中共方针策略的正确，从东北这一具有特殊的国际背景的战略地区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促使战后三国四方关系不断产生新的组合，最终以新中国对苏外交的“一边倒”代替了蒋介石对美的“一边倒”。

二、由《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确定的战后中苏关系的基本框架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中苏为战胜日本和防止日本再次发动侵略战争的政治和军事联盟条约。该约将中苏在战前业已存在的同盟关系进一步用法律条文固定了下来，它对粉碎日本关东军、尽快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具有重大意义。但是与该约同时签订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和《关于旅顺口之协定》，以及关于外蒙古独立的中苏互换的照会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据以上协定和照会，中长铁路为中苏所有并共同经营，旅顺口为苏联军港，大连为自由港，外蒙古实行独立。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战胜国、而且是四大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竟承受如此大的损失，实在是骇人听闻！

当时以“抗战领袖”自居的蒋介石何以隐忍接受了上述严重损害国家主权的規定呢？除美苏的共同压力外，主要是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中苏缔约谈判中共虽然不得参与，但未出场的中共代表参加了谈判的全过程，因为谈判双方都考虑到了中共的因素。在中苏缔约谈判临近最后时刻，斯大林发表谈话说，你们如不赶快达成协议，“中共就要进入满洲了”^①。蒋介石正是害怕苏联将东北交给中共，才答应了苏联的要求。可以说，从蒋介石政府同苏联签订盟约之日起，这一脆弱的同盟关系就时刻受到中共

^① 赫尔伯特·菲斯著，吕浦等译：《中国的纠葛》第10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

因素的威胁。

促使蒋介石签约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苏联出兵后造成的新局势。在条约临签字之前,苏联红军已彻底粉碎了日本关东军,占领了东北全境。当时,外蒙古独立已是既成事实,特别是苏联挟外蒙古军队对日作战并取得了胜利,使这一独立趋势已再无法阻止。而新疆三区革命在苏联的支持下正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若苏军长期占领东北,蒋介石就将承担第二次丢失东北的罪责,如苏联将东北交给中共,中共必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实力和丰富的资源,把东北变成取得政权的基地。无论出现哪种情况,蒋介石都必将失去他的领袖地位。若新疆有失,必将震动整个大西北,陕、甘、青、宁又会处于长期动荡之中。面对三北出现的严峻形势,蒋介石采取了舍一北(外蒙古)保二北(西北与东北)的方针,即以承认外蒙古独立和苏联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换取苏联承认国民政府对东北和新疆的主权。他所关注的这两大问题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东北问题。苏联要按时撤军。“在日本投降以后,苏联军队当于三星期开始撤军”并“在三个月以内撤完”。^①东北军政必须全部交给国民政府。中华民国政府派代表“在(苏军)业已收复之领土”上,“依照中国法律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并“建立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及非正规军”;“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②

新疆问题。条约要求苏联须从新疆三区革命中脱手。苏联重申对“新疆最近事变(三区革命)”本两国“彼此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与互不干涉对方内政之原则”解决之,苏联“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③

对蒋介石国民政府来说,只要苏联履行以上条约中关于东北和新疆的有关规定,就达到了基本要求,对苏同盟关系就可继续维持。

对苏联来说,为防止日本的重新崛起,牵制美国独霸远东,也需要同战后四大国之一的中国保持合作和一定的同盟关系。但是苏联并不看重这

① 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4 册,页 42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年。

② 王铁崖主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4 册,页 427。

方面的利益，它最为关注的是恢复沙皇时代俄国在中国东北和新疆这两个独占的势力范围。由于通过三区革命苏联已控制了新疆局势，而且那里没有美国的势力，苏联便把主要精力集中于东北。

二战后期起，斯大林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吸取二战初期的教训，保证苏联的安全问题。《雅尔塔协定》就是斯大林确保战后苏联远东安全战略的具体化。斯大林的安全战略是沙皇俄国安全战略的继承和发展，其核心思想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即通过无限地扩大领土以及在相邻国家和地区制造大量的中间地带（势力范围），以赢得保障中央俄罗斯安全的时间。《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斯大林十分得意地描绘了苏联边界从西到东向外扩大的情况，关于东部边界，他说：“这边怎么样呢？千岛群岛如今是我们的了，库页岛全是我们的了，您看，多棒呀！就连旅顺口、大连都是我们的了。”接着，他用烟斗沿着中国画了条线说：“就连中长铁路也是我们的了。中国、蒙古——一切正常……您瞧，对我们的边界我还能不满意！”^①斯大林在进行上述谈话时，东欧、南欧邻国已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在亚洲邻国中已控制了外蒙古与北朝鲜，并为控制伊朗正同美英进行激烈的斗争。在亚洲最大的邻国中国，由于雅尔塔体系的限制，红军没有越过山海关。但对与苏联交界的新疆和东北地区，斯大林绝不允许第三国染指，他脱口而出——旅顺口、大连、中长铁路“是我们的”，并非一时口误，而表明他早已将东北看作是苏联独占的势力范围了。因为不如此，苏联亚洲部分，就形不成一个从中亚到千岛群岛领土相连的“安全圈”。对斯大林来说，只要蒋介石保证第三国势力不进入东北和新疆，允许苏联在这两个地区实现垄断性的经济合作，他就帮助蒋介石实现包括东北在内的全中国的统一，与国民政府保持联盟关系。

为达到在东北和新疆建立两个独占势力范围的目的，苏联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与美国相协调的方针，即支持蒋介石统一全中国。对中共，斯大林参照法共和意共的模式，说服其参加蒋介石政府，改编军队，放弃武装斗争，以实现全国和平。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扶蒋限共”，即通过扶植和

^① 菲利克斯·邱耶夫：《莫洛托夫秘谈录》，51页，莫斯科，大地出版社，1988年。

壮大国民党的力量,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将中共融和在国民政府之中,以达到最终消灭共产党的目的。这样,苏联的对华政策便与美国的对华政策协调了起来。它们都是通过牺牲中国主权和中国革命利益来同国民党做交易,中共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为防止中共力量的发展,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的当天,美国总统批准了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命令,宣布东北日伪军只能向苏军投降,中国其他地区的日伪军只能向蒋介石的政府军投降,剥夺了中共军队接受日伪军投降的权利。当天,中共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向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递交了一份说帖,提出中共军队有权按有关国际文件接受被其包围的日伪军队的投降,对麦克阿瑟的命令表示反抗。^①说帖虽然是致美、英、苏三国的,但中共主要是指望能得到苏联方面的支持。然而苏联方面对中共的要求未予理会。1945 年 8 月,蒋介石三次电约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中共拟派周恩来前往。这时斯大林在两三天内连续给毛泽东发来两封电报,电报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电报又说,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协商国事,如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电报还表示,毛如去重庆,毛的安全由美、苏两家承担。^②此前,在整个抗战期间,斯大林从未直接与毛泽东有过电函往来。这时斯大林多次致电毛泽东,表明了他支持蒋介石的明确立场。在内战全面爆发之前,中共为改变美国在调处国共两党关系中明显偏袒国民党的情况,多次要求苏联参加调处,又都被拒绝,国民党遂在美国的支持下挑起了全面内战。即使对苏联最为关注的东北问题,斯大林也准备按条约规定,按时撤军,并把主权交给国民政府。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当天,斯大林就发表声明,在日本投降 1 个月内苏联从东北全部撤军。8 月 16 日,斯大林向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表示,苏联准备按与宋子文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1483-1484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14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4。

达成的协议从东北撤军，并希望国民政府派兵到东北接管治安。^①这样，以《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纽带，形成了美苏协调、共同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基本框架。经过八年艰苦抗战，拥有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八亿以上的人民，组织了八百万以上的正规军和八百万多民兵的中国共产党，在战胜日本之后居然在对外关系中没有它的应有地位，这就使美苏构筑的战后中国对外关系的框架失去了重要基石，从而注定了这一框架必然倒塌的命运。

三、围绕东北问题中、美、苏三国四方关系的重新组合

前已论及，东北问题是中、美、苏三国四方关注的焦点。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多次发表谈话，强调接收东北的重要性，把东北喻为“国家的生命线”，并集中最主要的精力筹划接收东北工作。他于1945年8月末和9月初，组建了以熊式辉为首的东北行营，任命了东北九省各省省长，准备首先接收东北行政，还任命张嘉璈为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自己的儿子蒋经国为特派员，作为国民政府的经济谈判代表，准备在长春与苏联进行经济合作谈判。蒋介石志得意满。他依恃美国的支持，又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保证，自认为接收东北万无一失。

但是蒋介石的1945年消极抗日给自己造成了短时间难以弥补的致命弱点。他把军队集中在大西南和南方沿海一带，从这些部队驻地到东北隔着广大的、由共产党部队控制着的解放区。要想把大批军队运进东北，蒋介石就必须请美国的海军与空军帮忙。这就给美国提供了介入东北事务的机会。

同苏联一样，美国也十分关注东北问题。早在1945年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就首先向蒋介石提出战后把大连作为自由港的要求，并得到了蒋的同意，条件是苏联必须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在德黑兰会议上，罗斯

^① 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2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

福又提出,苏联使用大连港的办法,可采用国际监督下的自由港的形式。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接受了国际监督的办法,罗斯福表示感谢。^①《雅尔塔协定》的达成,实际是美国以牺牲中国在中长铁路、旅顺口的主权,换取苏联承认大连为自由港的结果。罗斯福坚持大连为自由港就是坚持美国一贯的门户开放政策,为战后美国资本进入东北创造条件,打破苏联将东北变为其独占势力范围的企图,为此美国曾准备抢在苏军之前占领大连港。^②日本投降后,美国十分担心苏联支持中共在东北发展势力,尤其害怕苏联把东北建成“由它控制的自治国家”,将美国势力排斥在东北这一战略基地之外。因此,日本投降后,美国极力想插手东北事务。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通过正在美国访问的宋子文向美国提出帮助自己向东北运兵,给美国插手东北事务提供了绝好的时机。美国立即应允,从8月下旬起大批美国军舰满载国民党军队从南方驶向大连。

前已提及,把东北变成苏联独占的势力范围、不允许第三国势力染指是斯大林的安全战略。这个“第三国”就是指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虽然接受了罗斯福大连为国际监督下的自由港的建议,但他并不准备开放大连。因为开放大连,就意味着向美国开放整个东北。特别是在中苏盟约谈判期间,美国始终坚持东北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引起了斯大林的严重不安。如果美舰在大连登陆,就给美国势力进入东北提供了方便,斯大林把东北变为苏联独占势力范围的计划就将全部落空。这是斯大林绝对不能容许的。恰恰在此之前,中共的军队已抢先进入东北,给斯大林送来了美蒋最害怕的一张王牌。

前文提到斯大林准备参照意共和法共的方式解决中共问题,想以中共加入国民政府的方式帮助蒋介石实现全中国的统一。但是中共不是法共,也不是意共。它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已经成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完全成熟的政党,能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事务和抵制来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左”的和右的错误路线的干扰,能洞明国际和国内形势并相应

① 张之毅等：《关于雅尔塔会议若干学术争论问题析疑》，载《外交学院学报》1982(4)。

②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在中国道路上》(1945-1949)·回忆录，第10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2。

地确定自己的战略和策略。还在 1945 年初，中共中央就预见到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和介入解决远东问题的可能性，及时将党的对外工作重心调整为配合苏军作战，相应地确定向热河、冀东和辽宁等地发展的方针。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把“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列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重要条件。苏联对日宣战后，毛泽东立即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全国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愿月 16 日，中共中央命令吕正操等原东北军各部以及冀热辽边区李运昌所部分别向察、热、辽、吉诸省前进，配合苏军作战，并接受日本投降。^①李运昌率部 1 万余人奉命出关，在赤峰和山海关同苏军会师，并同苏军一起解放了山海关。其中曾克林部于 10 月 10 日占领锦州，11 日进入沈阳。^②这样中共部队就抢在国民党军队的前面进入了东北的中心地区。

苏军初到东北，人地两生，又面对敌伪匪特的严重骚扰，急需有中国军队出面安定地方秩序。随苏军打回东北的原东北抗日联军仅 1 万余人，不敷使用。于是东北苏军当局决定曾克林等部以“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名义维持地方治安。曾克林担任了沈阳市卫戍司令，很快同苏军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从此，苏军当局打破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迈出了允许中共部队进入东北的第一步。

但是这时苏联尚未得知美国军舰欲在大连登陆的消息，仍准备将东北按条约交给国民政府。10 月 15 日，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派代表别洛鲁索夫（旧译卫斯别夫）携带他的亲笔信同曾克林一起飞赴延安。该信向中共领导人解释了苏联同国民政府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情况，并要求中共照顾苏联的处境，撤出东北，到热河和锦州一带去发展力量。^③但是中共中央不但没有按马林诺夫斯基的要求撤出东北，反而根据曾克林带回来的信息，果断地确定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第 100 页。

② 曾克林：《山海关—沈阳—延安》载《中俄关系问题》（总第 100 期），第 100 页。

③ 谢德明：《往事回忆》，手稿本，第 100 页。谢德明即西季赫缅诺夫，别洛鲁索夫的译员，与曾克林同飞延安。

战略方针,从新四军以及陕甘宁、冀东、冀中、晋绥、冀鲁豫和山东各军区抽调 10 万官兵、10 个团架子部队干部和包括 100 个中央委员与候补中央委员在内的两万党政干部进驻东北,从而为将东北建设成解放战争可靠的战略基地提供了干部保证。这样,中共就打破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在国民政府与苏联脆弱的同盟关系中打进了一个坚实的楔子。

10 月 15 日,苏联政府正式通知国民政府,苏联将于 10 月下旬开始从东北撤军,至 11 月底撤完,但就在这一天得知,美国船只运送国民党军队将于 10 月 15 日左右于大连登陆,美国插手东北事务已成定局。^①于是苏联政府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决定延缓国军进入东北,并支持中共军队在东北适当发展,以对抗美国。

10 月 27 日,苏联通知国民政府,美舰于大连登陆,违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大连港为自由商港、任何兵舰不得进港的规定。在一再交涉下,苏联同意国军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但事先将这两个港口交给中共部队,并向国民政府表示,如在这两个港口登陆,苏方不能保证安全。^②此后美国的舰队自行驶入大连港海面,美舰队司令亲自与苏方交涉,要求登陆,也被断然拒绝。^③美舰只好折返关内在秦皇岛登陆,国民党军队亦只能经北宁线出关。但铁路线大部分都已毁坏,铁路沿线许多地段还驻守着中共部队,北进国军直到 11 月中旬也未能进入东北。国民党在东北的接收官员强烈不满,暗地组织地下军攻击苏军,并造谣斯大林重病在身,大权已被剥夺。苏军当局遂进行报复,封闭国民党长春党部,限制东北行营自由活动。^④国民政府只得于 10 月 25 日将东北行营撤回关内,宣告东北接收失败。

在国民党部队登陆受阻期间,大批集中于烟台等港口的中共部队,在苏军的支持下,相继在大连、金县(均为苏军辖区)和庄河登陆。为照顾苏联外交需要,登陆部队一律改用“东北人民自治军”的番号。苏军司令部通

①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01-102页。

②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01-102页。

③ 在中国道路上(魏晓范、魏晓琦·回忆录)100页。

④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01-102页。

知各部队，凡带“东北人民自治军”标志的部队“可以自由行动，各地苏军不加限制”^①。此外，苏军还给登陆部队大批的武器支援。在苏联军队的多方协助下，中共部队在东北得到了迅速发展。至1945年11月，军队已发展到100万人，连同工作人员计达150余万。中共党政干部放手发动群众，抓紧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先后在沈阳、安东、本溪、旅大等重要城市建立市政府，并在铁路沿线地区开辟了大片的解放区。

中共力量在东北的发展壮大，极大地加强了苏联与美国抗衡和牵制国民政府的有利地位，也促使斯大林开始改变对中共的态度。面对美国和蒋介石联合对抗苏联的局面，斯大林认识到，对抗美蒋的进逼，保住苏联在条约中取得的权益，必须扶持一个强大的国民党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除了中共之外，他别无选择。进入东北的中共党政军干部优良的军政素质、高超的斗争艺术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就使东北苏联军事当局从切身体会中认识到，中共比国民党更有希望，从而推动苏联政府实行“扶共制蒋”的政策。可以说，这时在东北地区已形成了中共与苏联初步的结盟关系。中苏新联盟关系正是从此发育成熟的。另一方面，苏联把中共“放进”东北等于在蒋介石的心脏插上一刀，国民政府同苏联的关系急剧地冷却了。双方都不再把刚刚签订的盟约作为促进友好关系的纽带，而是作为互相进行外交斗争的工具。美苏关系也拉开了距离，从此苏联在对华政策特别是对中共的政策上与美国的矛盾越来越大。美、蒋、苏三方四国关系的重新组合，为中共力量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中苏关于东北经济合作谈判的破裂 与国民政府对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上述苏联支持中共在东北发展力量的做法，并不意味着苏联已经将中共作为依靠力量，而仅仅是作为对抗美蒋的借助力量。这是因为：斯大林对中共并不信任。从延安整风时起斯大林就怀疑中共是民族主义的党，反法西斯战争后期，斯大林又多次在国际场合说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

^① 《中共党史资料》（第8卷），1983年，125页。

党。在斯大林眼里,中共与国民党并无本质区别,甚至后者还优于前者。^①斯大林还需要蒋介石。因为斯大林要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独占势力范围,还必须与国民政府签订垄断性的中苏东北经济合作协定。没有这样一个协定,美国资本随时可以打入东北,与苏联竞争。就经济力量而言,苏联是无法与之抗衡的。但中共的力量在全国来说还是弱者,它能否取得全国政权还是未定之数。在中共未奠定全国胜利的基础之前,斯大林绝不冒险全面支持中共。对蒋介石来说,在苏联撤军之前,他仍然需要斯大林。因为不管怎么说,中苏联盟依然是蒋介石借以牵制中共与苏联接近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围绕苏联撤军与东北经济合作谈判问题,苏联与国民政府又展开了第二轮的斗争。

中苏东北经济合作谈判从 1945年 7月开始,至 1946年 7月苏军开始撤退之前仍未能达成协议。双方的主要分歧之点是:东北日本资产的归属问题。苏联坚持东北所有日本资产均为苏军的战利品,为苏联所有;中国则坚持,所有在东北领土之内日伪所设工矿企业,均应列为日本对华战争赔偿品,一律归中国所有。在双方坚持不下的时候,美国又插手进来,提出德日等战败国所有境外资产应一律完好保存,由战后赔偿委员会裁决,作为有关战胜国的战争赔偿品。美国的方案虽与国民政府的方案有差异,但对苏联大肆拆运东北工矿设备是有力的打击,使苏联十分气恼。关于合作范围。苏联提出将前日伪时期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和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经营的各项企业全部纳入中苏经济合作项目之内,等于将日伪时期东北重轻工矿企业全部一网打尽,用张嘉昇的话说,这“无异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故伎”,使国民政府难于接受。但为了换取苏联撤军和交还东北主权,国民政府同意将一些项目(包括一些重工业项目)拿出来与苏联合作,但苏联并不满足。关于达成协议的时间。苏联主张,将达成经济合作协议和撤军问题合并解决(即政治经济不可分),在撤军前达成协议,实

^① 直到 1945年底和 1946年初,斯大林在同蒋经国谈话时还说:“中国共产党人知道,苏联政府坚持与他们不同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知道,苏联政府与他们并不一致。”(约·维·斯大林同志与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谈话记录,1945年 8月 14日,《近现代史》1982年第 8期。)

际上是以达成经济合作协议为撤军条件，国民政府则主张先撤军后达成协议。这些分歧对双方来说都是原则性的分歧。

双方之所以在谈判桌上都不肯作出原则性的让步，主要是美国因素起了关键作用。为防止美国势力打入东北，苏联必须在东北取得对重要工矿企业的垄断性的合伙经营权；而蒋介石又恰恰想借助美国力量抗拒苏联的要求，所以怎么也谈不拢。到了1945年底，双方对对方的疑惧心理都在迅速加深。为解决东北问题，蒋介石派出自己的私人代表蒋经国访问莫斯科，试图缓解斯大林的威逼，探索解决东北问题的可能途径。

对于蒋经国访苏的目的，苏联方面十分清楚。苏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在蒋经国访问前夕的报告中指出：“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蒋介石既想利用苏联，也想利用美国，尤其是想利用这两国之间的矛盾巩固国民党政府，使中国作出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革。”^①所谓“利用苏联”就是利用斯大林的个人威望和联共（布）对中共的影响，由苏联出面劝诱中共接受国民党的统一。蒋经国一再向斯大林转达蒋介石的这一意图。斯大林回答说，“中国共产党人不从属于俄国共产党人。共产国际也不复存在。俄国共产党人很难进行调停，因为他们不想提出最终将会被拒绝的建议”，从而一口回绝了蒋经国的要求。^②对苏军当局支持中共组织和中共军队在东北开辟和建立根据地这一关键问题，斯大林采取回避态度，他说：“当共产党人提出要进入满洲时，苏联统帅部并未放行，因为苏联政府并不想干涉中国内政。一般说来，外国军队干涉中国事务对蒋介石并不利，因为这会导致中央政府权威的削弱。”^③

关于利用美苏矛盾问题，蒋经国转达蒋介石的话说，“在到过中国并同蒋介石谈过话的美国代表（尤其是马歇尔将军）中，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次不对苏联表示反感”，但是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中国与苏联较为亲近”，

① 洛佐夫斯基：《关于蒋经国来访给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同志、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引自安·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蒋经国的谈话》第 6 号文件，《近现代史》1985 年第 3 期。

② 约·维·斯大林同志与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谈话记录，1945 年 12 月 14 日。

③ 约·维·斯大林同志与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谈话记录，1945 年 12 月 14 日。

中国愿意与苏联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中国不会相信挑拨离间的人。^① 其实,斯大林明白是蒋介石在挑拨美苏关系。他系统地驳斥了所谓美苏必战的论调后,针对蒋经国为驻华美军辩护的言论说:

你们中国人要明白: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它们的利益的工具,它们必要的时候,是会牺牲你们的。苏联愿意把本国生产的机器、汽车以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供给中国,同时,也希望中国能把自己出产的矿物、农产品供给苏联。苏联又可以帮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并发展新疆的经济,但是,我再三声明,也是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绝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只要国民政府能保证今后美国不在东北得到利益,我们苏联一定可以作必要的让步。^②

斯大林谈话的用意非常清楚,就是以经济合作为手段,在美蒋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使国民政府执行联苏反美的政策。但斯大林这样做等于缘木求鱼,因为联美抗苏反共是当时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其中反共是这一方针的中心环节。只有联美,才有能力反共。苏联在东北支持中共,更加坚定了蒋介石联美抗苏的决心。怎么可以想像蒋介石抛开美国与支持中共的苏联一起去反对中国共产党呢!

1945年11月末,蒋介石将苏联在东北经济合作谈判中的要求告诉了马歇尔,以取得美国的支持。马歇尔随即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答应苏联的要求,即使苏联推迟撤军也在所不惜。12月中旬,美国政府又分别照会苏中两国政府,指出按1945年8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除中长和南满铁路归中苏共管外,条约并未给予苏联对其他工矿企业共管的权利。中苏如就这些工矿企业达成合作协议,都将被认为违反门户开放原则,是对美国商业利益的歧视。照会还驳斥了东北日本资产为苏军战利品的说法,指出这些资产因涉及战胜国的共同利益,应归赔偿委员会处理。^③ 有

① 约·维·斯大林同志与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谈话记录,1945年10月14日。

② 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7编“战后中国(一)”,1986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5。

③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81页。

美国的公开支持，国民政府的谈判立场更趋强硬，于猿月末终止了谈判。中苏东北经济合作谈判遂宣告失败。

原来，苏联为达成经济合作协议，曾与国民政府两次协商延期撤军，最后撤军期限定为 员源年 圆月 员日。在延期撤军期间，东北苏军当局还协助蒋介石的接收人员，接管了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以及辽北、松江和嫩江各省的行政（由于苏军未撤，国民政府军未有接防）。但由于经济合作谈判相持不下，苏联撤军大大超过了最后期限，引起了中国民众和国际舆论的严重不安，斯大林不得不开始撤军。

国民政府不但不接受斯大林的严重警告——拒绝美国插手东北事务，反而请美国对其进行公开支持，使斯大林十分恼怒，于是再次借助中共的力量对蒋介石进行报复：实行闪电式撤军，使国民政府军措手不及，以便使中共部队顺利进入苏军撤出的城市和地区。猿月 圆日苏联通知国民政府，苏军将于 源月底全部撤完。就在当天，中共中央即指示东北局速与苏方联系，“允许由我方派兵占领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①。苏军全面撤退前，国民党军队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市只有少许的警察部队维持治安。苏军只允许国民党正规军在它撤出的猿天之前方能入城，又不通知撤出的具体日期，从而使屯驻于城郊周围的中共部队得以抢先入城，致使国民政府在一些城市的接收官员，乃至国民政府驻苏军军事代表团都未来得及撤走，只得随苏军撤至苏境，再绕道回国。这样苏联实际上把东北交给了国共两党。缘月 猿日苏军全部撤完。^② 东北形成国共两党对峙的局面。

东北经济合作谈判失败意味着斯大林变东北为苏联独占势力范围的战略落空，而中共军队进入长春、哈尔滨和铁路沿线也使蒋介石借助苏军阻止中共进入东北的企图彻底失败，双方从此都失去了改善关系的兴趣。随着中共力量的日益强大，蒋介石彻底抛弃了中立苏联的策略，走上了联美、反苏、反共的道路。而苏联对中共，也从以其为借助力量转变为以其为依靠力量了。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0) 555页。

②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285页。

五、东北战略根据地的形成与中共和苏联结盟的确立

苏军在撤离东北之前给中共部队留下了大量武器装备,据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提供的情况:“中国人民解放军得到了巨额的缴获的武器储备。仅我们两个方面军转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就有 1000 门大炮、迫击炮和掷弹筒, 200 辆坦克, 100 架飞机, 约 1000 挺机枪, 将近 100 个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一些舰艇。稍后又转交给他们大批的苏联武器。苏军司令部还关注使全部武器保持完好以适于作战使用。”^① 为尽快进入东北,中共从南方调往东北的一些后续部队把随身携带的武器都留在了原来驻地。正是苏军留下的武器弹药装备了中共东北军队,使其成为全国各解放区内装备最好的部队,顶住了蒋介石军队的猖狂进攻。

国民党军队东北登陆失败、转秦皇岛登陆后,即集中优势兵力占领山海关、锦州,打通了北宁线。然后海陆军并进,很快在东北集中了用美国装备武装起来的 9 个机械化王牌军,于 1948 年 9 月 15 日占领沈阳。9 月 16 日蒋介石一边和中共下达全国停战令,一边却在东北发动大规模的内战,从沈阳向南北两个方向展开进攻:向北占领四平、吉林、长春,一直打到松花江边;向南占领海城、鞍山、安东等地,使中共南满部队只保有临江等 9 个完整的小县。中共在东北处于十分困难的局面。这时苏联又通过驻旅顺口的苏军给予必要的援助。应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肖劲光的请求,驻旅顺口苏军司令部转请苏联滨海军区司令部批准,从朝鲜给北满部队运去从日军缴获的两军列武器,又从旅大经海路向北满解放区运去 10 车箱的武器。^② 在国民党军队大举向辽南进攻的时刻,驻旅顺口苏联第 1 集团军司令部派代表与国民党军队代表达成协议,在旅大苏军辖区以北的 100 公里处划出一条“安全线”,国民党军队不得越雷池一步,使该线至旅大苏军辖区之间宽达 100 公里的地带成为中共南满部队自由进入的安

① 《在中国道路上》,第 107 页。

② 《在中国道路上》,第 107 页。

全区，并一度成为辽南党政机关进退自如的后方。^①尤其重要的是，苏军当局将旅大地区（含旅顺口、大连和金县）的行政管理权完全交给了中共，中共旅大地委充分利用大连的工业优势和海上交通的便利条件，在大连建立起一批重要的兵工厂和生产各种军需物资的大工厂，大批武器、弹药、药品、服装等急需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东北和华东解放区，其中仅迫击炮就有 1000 多门。旅大地委还利用这里的特殊环境，为东北前线输送 1000 多名经过训练的兵员以及通讯兵、装甲兵骨干，并为解放区培训了大批党政干部和各种人才。^②苏联的这些支援，大大缓解了国民党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给东北解放军造成的压力，使东北中共几十万军政人员度过了从 1947 年春至 1948 年上半年最困难的时期。

四平、吉林、长春等大城市和铁路干线被国民党军队占据后，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各部队执行“放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依靠自己的力量，到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去建设巩固的根据地。通过剿匪建政，实行土改和开展忆苦练兵运动，到 1947 年上半年东北各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特别是经过 1947 年夏、秋、冬三次攻势，东北民主联军大量歼灭了敌人并扩大了解放区，使南北满根据地连成一片；与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对比也从攻势前的 100 万对 300 万变为 300 万对 100 万。这一力量对比的变化将解放全东北的决战提上了日程，中共中央决定于 1948 年 9 月开始举行大反攻。由于铁路和桥梁被破坏，恢复交通运输成为当务之急。应中共请求，苏联派出以茹拉夫廖夫为首的大批铁路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连同必需的技术设备来到东北，帮助修复铁路。到同年 10 月，共修复 1000 公里的铁路线和包括第二松花江大桥险段在内的 1000 多米大中型桥梁，做到了“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保证了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为缓解东北战略物资的短缺，苏联有关外贸机构与东北民主政权开展积极的经贸合作，于 1947 年底、1948 年 1 月和 1948 年 3 月签订两个贸易合同和一个换货协定，总贸易额和换货额为 100 亿卢布。依据合同与协定，东北

^① 《在中国道路上》145 页；韩光：《旅大人民的支前工作》，《辽沈决战》（上），12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② 韩光：《旅大人民的支前工作》，《辽沈决战》（上），125—126 页。

向苏出口粮食和土特产品,进口急需的军用和民用物资。这些物资为保证辽沈战役的胜利进行和恢复东北经济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各种条件均已具备的情况下,东北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9月至11月举行了辽沈战役,一举全歼国民党军队100万人,解放了全东北,自己的兵力上升为150万。东北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革命的战略基地。

陈云在分析辽沈战役胜利原因时指出:“在抗日战争结束前,我们党在东北的力量与全国其他各个根据地相比最弱。然而不到3年,却在那里打响并且打胜了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大战役。所以能够出现这么大的变化,绝不只是和战役的参加者和战役的组织、指挥以及具体战斗有关,而且有着多方面原因。”除党中央、毛泽东所作出的完全正确的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外,“首先,是由于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关东军。这为我们的大部队能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这个地区,为改善我们的装备,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那时,苏联党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并有《雅尔塔协定》的约束,但他们还是尽力帮助我们的。东北背靠苏联,东邻朝鲜,这对于我们在和国民党作战中的后勤补给和病号的运送、安置也是十分有利的条件”^①。陈云的这些分析是十分中肯的。本文已充分论证,从中共部队进入东北之日起,苏联所给予的各种援助从未间断。正是苏联的援助及其他各种原因促成了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在全东北实现彻底解放过程中所培植起来的中共与苏联的友谊,也就奠定了新中国与苏联结为友好同盟关系的基础。

六、中共全面调整对美、苏政策与“一边倒”政策的形成

抗战胜利后,中共对处理美苏关系是十分清醒的。1945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中精辟地分析说:“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而蒋之政策则在打共时企图中立苏,而在反苏时又必望连上共。故苏联目前对华政策在形式上乃不得不与中共隔离,在对美斗

^① 陈云:《编写辽沈战役一书的意见》,《辽沈决战》(上),15-16页。

争时有时中立蒋，在对蒋时亦常不联系美。”^① 既然美国政策是“扶蒋、打共、反苏”，中共就绝没有可能联美，苏联在形式上与中共隔离，实际上必然靠近中共。这就在总体上决定中共必然执行联苏、中立美、集中力量打蒋的政策。

其中，中立美国的政策，也“只是在对蒋斗争中的一种策略……并非不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的政策，也非不抗议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和参加中国内战的政策，更非在美军进攻我们时采取不抵抗政策”^②。还应特别指出，这一中立美国政策的提出，是中共为了争取美国在调处国共关系时能持公正立场，以便结束内战，实现全国和平。但是事实证明，美国在“扶蒋、打共”政策上越走越远：从美军赖在中国不走，到 1945 年 8 月苏军撤出东北、中国战区正式撤销之后，大批美军仍留驻华北，为蒋军守护交通要冲和战略物资，帮助蒋军打内战，1946 年 1 月设立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直接参加中国内战，继续大量运送国民党军队至东北和华北，1946 年 1 月再延长对蒋介石的租借援助，至 1949 年 1 月援助额已达 20 亿美元，用这笔钱装备了蒋介石 100 多个陆军师、八九个航空大队，还为蒋培训了大批海、空军人员。随着美国出钱、出枪帮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的日益暴露，中共不断修正自己的对美方针，从不公开批评美国转为谴责。1949 年 8 月间，毛泽东在接见美国记者斯特朗等人时，强烈谴责了美国援蒋打内战的政策，对马歇尔也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新华日报》也明确宣布，经过美国两次调处试验，中共“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了”^③。这种谴责与批评表明中共放弃了“中立美国”的政策。中共和美国的彻底决裂是 1949 年 1 月《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商约》）的签订之时，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逼迫中共不得不实行反蒋必须反美的政策。该约集 19 世纪以来，除领事裁判权之外的美国对华要求之大成：中国全部国土一律向美国资本开放，美国公民、团体、法人可在中国居住、旅行，从事经商、制造、加工、金融、科学、教育、宗教以及慈善事业，并可购置和保有房地产业，享有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第 13 卷，第 100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第 13 卷，第 100 页。

③ 《解放日报》1949 年 8 月 16 日。

中国公民、团体、法人同样的权利；美国商品在中国内地行销，税收与中国商品同等待遇；美国商船有前往中国任何开放口岸、地方及领水的自由。^①此外，该约还在实际上给予美国“无条件和无限制的”最惠国待遇。围绕该约，国民政府还同美国签订了一系列的协定和秘密协定，保障美国在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排他性地位。《中美商约》是为美国资本全面占领中国、压倒民族工商业，最终变全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它将美国自抗战胜利以来在对华关系上所散布的自由、民主、统一等友善言词的虚伪性暴露无遗。1945年12月，中共发布严正声明，昭告国内外：国民政府自1945年11月10日至今，与外国（美国）谈判并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已经使并将继续使中国陷于内战、反动、丧权辱国、殖民地化、混乱与崩溃的危机之中”，中共现在与将来均不承认。^②同年12月中共提出鲜明的“打倒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口号，表明反蒋必须反美，实行反蒋与反美相统一的政策。中共不承认美蒋签订的一切条约，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拒绝承认中共的政策。全国胜利前夕，美国多次试探中共继承并履行美国同国民政府所签订的条约的可能性，均被中共拒绝。美国与中共建立正常关系的一线希望便消失了。

《中美商约》以及其他一些协定的签订，表明二战后蒋介石政府与美国政府所形成的反苏反共的特殊关系已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亦即表明国民党先于中共实行了“一边倒”的政策，只是对象不同罢了，国民党实行的是对美“一边倒”。面对美苏两大营垒对抗的世界格局，中共要取得民族解放斗争的彻底胜利和新政权的巩固与发展，除实行对苏外交“一边倒”的路线之外，别无选择。

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一致是联结两党的坚强纽带。联合苏联，取得苏联的同情和支援，以促进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民族革命的胜利是中共的一贯政策。毛泽东本人对斯大林也充满尊敬和感激之情，早在1945年他就著文称“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第二年他又在其名著《新民主主义论》中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

①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页103-104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页103-104页。

革命的一部分，回答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核心问题。尽管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曾受到了来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种种误解，甚至是严重打击，但直到斯大林逝世之前，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尊敬和支持联苏的信念始终不渝。特别是苏联在东北所给予中共的实际援助，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得到的来自苏联方面的最大实惠。因此，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中共就与苏联结成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对苏“一边倒”在中共一方不存在任何问题。

但对苏联来说，正如前文所指出，存在两个障碍，即斯大林对中共的无产阶级性质和中共能否取得全国政权心怀疑虑。对于后者，由于中共在 1948 年取得了反攻作战胜利，斯大林主动地改变了对中国形势的看法。1949 年 1 月他在会见南共领导人时说，战后，“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前景”，“根据中国现在的情况，我们承认是我们错了”。^① 辽沈战役胜利后，斯大林对中共取得全国政权的疑虑便从根本上消除了。为消除斯大林前一种疑虑，中共在 1948 年夏苏南两党冲突中主动地站在苏共一边，参加了对南共的批判。1949 年 1 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2 月，中共中央便作出相应的决议，表示坚决拥护情报局的决定。决议明确指出，情报局的决议是国际共产主义者为保卫马列主义原则应尽的职责，并要求全党干部认真研究情报局的决议，“借以加强党内关于阶级的、党的、国际主义的、自我批评精神和纪律性的教育”^②。这实际上表明中共在国际共运中与南共划清了界限。同年 10 月，毛泽东借纪念十月革命胜利 30 周年之机，发表了题为《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的论文，高度评价了十月革命和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理论的伟大意义，并着重地批判了“中间路线”即所谓“第三条道路”，申明中共“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③，绝不会走南共式的“第三条道路”。中共主动参加对南共的批判，大大地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共是否坚持无产

① 弗·杰吉耶尔：《铁托传》365 页，伦敦，1953 年。

② 《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141 页，解放社，1949 年。

③ 《中苏友好文献》234—235 页，北京，1953 年。

阶级国际主义路线的怀疑。这样,到 1945 年底,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和中共对南共的批判,斯大林对接纳中共为其盟友的障碍便基本上消除了。这导致了 1949 年 1 月底至 2 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刘少奇于同年 2 月访问莫斯科。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与米高扬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关于中苏关系问题,米高扬主动地提出,作为 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重要组成部分的《关于旅顺口之协定》“是不平等条约”,“因此苏联政府已决定,废除这一不平等条约,同时一旦同日本缔结和约,立即将自己的军队撤出旅顺港。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立即撤出军队是适宜的,那么苏方准备满足中共的这一愿望”。^①苏联政府的这一决定等于承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不平等条约。这就使毛泽东在全民族面前可以作出切实交待:中共与苏联结盟不是损害国家主权的结盟,而是恢复国家主权的结盟!因此,毛泽东不待刘少奇访苏结束,就于 1949 年 2 月 20 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布了对苏外交“一边倒”的政策。建国后毛泽东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赴苏访问,与之签订新约,以废除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旧约,兑现米高扬的承诺。这样,解决好东北问题便成了中苏缔结新约的关键。苏联鉴于自 1945 年中苏签约以来远东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及新中国“推行了与苏联友好合作的政策”,其远东安全有了可靠的保障,同意放弃在东北的特权,于是两国顺利地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根据该约与协定,苏联将大连港完全交还中国,将共同管理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不迟于 1950 年末实现移交;苏军不迟于 1950 年末完成从旅顺口撤军,苏联恢复和建设该军港的费用由中国偿付。^②正是这些关键问题的解决,才开辟并巩固了 1949 年代中国对苏外交“一边倒”的格局。

从 1945 年 8 月 14 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盟约,至 1949 年 2 月 14 日新中国废除这一盟约并缔结新盟约,东北问题一直是构成中苏关系的主要内容,并制约着国共双方对苏关系的变化和组合,离开东北问题探求战后

① 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 1563 目录 1 卷宗 1563-1565,引自《远东问题》1949 年第 1 期。

② 《中苏友好文献》,288-292 页,北京,1950 年。

中国外交格局的形成过程和原因，就难以避免发生舍本逐末的偏颇。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收入本书时作者略作了修改。)

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

(来源 页码)

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 沈志华

第

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中苏缔结了友好同盟条约。几年以后,中国政权发生更迭,而同盟关系则又上了一层楼。在此期间,中苏双边关系中的新疆问题始终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地位,苏联对新疆的政策也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本文拟对这一过程进行讨论,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民国以来,新疆长期处于中央政府实际控制之外,军阀割据,内乱频仍。1944年中期,苏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全面援助和支持盛世才政权,排除以往英、日在新疆的影响,而把新疆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的。不过,当时国际形势风紧云急,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苏联处于日、德反共同盟势力的东西夹击之中,迫切需要中国拖住日本,稳定东方战线。所以,尽管盛世才有心使新疆脱离中央政府,投靠苏联,斯大林却还无意承认一个独立的新疆政权,以免由此刺激中国。^①而中国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也十分需要得到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不愿为一个鞭长莫及的地方与苏

^① 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二)》),来源-页码,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来源;艾伦·怀廷和盛世才:《新疆:是工具还是枢纽?》,来源-页码,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出版社,来源

联形成对抗。于是，保持新疆的相对独立，即成为斯大林和蒋介石都可以接受的状态。

不久，国际局势骤变，苏德战争爆发。在苏联初战失利的情况下，盛世才见风使舵，转而投靠蒋介石，并采取种种措施迫使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势力全部撤出了新疆。^① 当 1945 年底蒋介石颇为自豪地宣称：新疆归顺中央，是“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② 的时候，中苏两国关系降到了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最低点。

然而，就在苏联势力被迫撤出新疆之际，欧洲战场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到 1945 年夏季，苏联不仅能够正式提出在远东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而且还完全有时间和精力策划如何对新疆卷土重来了。

三区革命 苏联策动和支持的民族起义

1945 年初春，中蒙在新疆与外蒙交界的阿尔泰地区发生冲突。^③ 对于苏联重新染指新疆的企图，蒋介石的态度十分强硬。他一方面调兵遣将，摆开了不惜一战的架势，一方面不断向罗斯福告斯大林的状，试图对苏施加外交压力。^④ 但是，美国对阿尔泰冲突和蒋介石的申诉反应极为冷漠。罗斯福先是在 1 月 15 日建议中国政府“冻结”新疆事件，到战后再解决，继而在 1 月 25 日劝告蒋介石对苏联要忍耐，要顾全大局，后来甚至禁止中国

^① 艾伦·怀廷和盛世才前引书，194 页；约翰·加佛：《1945 年的中苏关系：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194 页，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 年；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94 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 年。

^②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 14 册，124 页，台北，“中央”日报社，1952 年；转引自李嘉谷：《盛世才与新疆》，载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年。

^③ 外蒙古当时已完全在苏联的控制之下，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只是表面上的，其经济、军事和政治均由苏联垄断，除与个别国家有关系外，蒙古甚至基本没有外交。

^④ 《战时外交（二）》，194 页；约翰·加佛前引书，194 页。

再扩大反苏宣传。^① 罗斯福所说的大局非常清楚,即为了最后在亚洲战胜日本,中苏必须联合,共同对敌。为了战后远东秩序的稳定,必须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而这是需要莫斯科认可的。中国不得不考虑美国的意见。源月 愿日,蒋介石批准了一项缓解中苏在新疆的紧张关系的计划,决定先严令新疆当局力避任何边界冲突,再寻机将盛世才调离新疆,以取得苏联的好感。^②

不久,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苏联和中国,以推动中苏接触。王世杰受蒋介石委托于 远月 愿日专程到迪化迎接华莱士,并叮嘱盛世才不得在华莱士面前公开攻击苏联。远月 愿日华莱士离开重庆时,蒋介石托宋美龄致函罗斯福,答应美国倘有任何改进中苏关系的办法,中国必全力以赴。^③

然而,此时解决中苏双边关系的主动权掌握在苏联手手中。在这场未来的外交较量中,无论是实力地位还是国际影响,苏联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虽然从国际环境考虑,苏联也感到有必要改善苏中双边关系,但两国之间在处理战后关系方面,毕竟存在着需要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的重大利害冲突。因此,在盟国之间酝酿中苏双方应该进行建立友好同盟关系的直接谈判时,苏联的策略是,一方面向蒋介石作出某种友好的表示,特别是表明苏联对中共的不支持立场,一方面则不断加紧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在谈判桌上能够取得预想的收获。

缘月中旬苏联大使潘友新向蒋介石作出明确保证: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不再援助外国共产党。苏联政府现在不给,将来也不会给中国共产党任何援助。^④ 怨月 愿日,罗斯福的私人代表纳尔逊和赫尔利大使告诉蒋介石,莫斯科对华空气现已好转。莫洛托夫对美国人说:苏联愿意见到中国

①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集》(云鼎书社),《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集》(云鼎书社),第 远卷,苑苑-苑苑页,华盛顿特区,员愿。

②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 源册,愿愿-愿愿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员愿。

③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 源册,苑苑-苑苑页。

④ 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集》员愿年第 远卷,苑苑-苑苑页。

强盛和统一，中共并非共产党，苏联也无意支持中共。^①

与此同时，斯大林显然认为需要让蒋介石切实体会一下苏联的力量和决心。1950年12月，苏联从成都、西安和兰州撤走了最后一批大约150名苏联军事顾问。同时，苏联的报刊也增加了批评中国民族主义倾向的评论和报道。12月间，苏联还向美国表示，苏联政府不愿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与中国一起讨论未来的联合国组织问题，而建议单独举行两个三国会议。更为严重的是，1951年1月，苏联接受位于外蒙古西北边界的图瓦人民共和国加入苏联，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图瓦自治州。关于唐努图瓦地区的问题，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期间曾特意向罗斯福提起，认为应在战后同蒙古问题一道与苏联谈判解决。^②现在，苏联竟如此轻而易举地吞并了这片曾属于中国的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无疑是在向蒋介石发出的一个警告信号。然而，与上述一切相比，真正使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受到威胁，并使蒋介石政府感到震惊的，是苏联在新疆采取的策动和支持少数民族武装暴动的行动。这就是新疆历史上著名的伊宁事变，或称三区革命。

早在苏联势力退出新疆的时候，莫斯科就开始策划一次以少数民族反抗汉族统治为特征的武装行动了，并为此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军事准备。

在思想方面，苏联的方针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据当时在塔城地区任副专员和政府秘书长的哈吉耶夫说，苏新关系破裂以后，苏联曾一度试图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共产主义措施，指望通过宣传共产主义鼓动人们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但是由于少数民族都不接受这些宣传而没有成功。以后，苏联才改为利用当地少数民族的反汉情绪和宗教信仰，特别是泛突厥主义，来达到控制新疆的目的。^③苏联在北疆大规模号召少数民族起来反对汉族政府的压迫是从1950年开始的，那时，塔什干出版的《东方真理》和阿拉木图出版的《哈萨克国土》等维文、哈文报刊，已经大量运进新疆，这些报刊不断发表声援和支持新疆少数民族斗争的文章。1950年

① 《汪世杰日记（手稿本）》第19册，145-146页。

② 约翰·加佛前引书，195-196、198-199页。

③ 笔者1982年12月1日与新疆学者徐玉圻、高朝明、杜瀚、周清霖的座谈记录。

夏季,在迪化、塔城和伊犁经常发现有“新疆解放”等地下组织散发的传单,而这些印刷精美的传单显然不可能是在新疆印制的。在这些传单中,传播最广、影响颇大的是一种专门对伊斯兰教民的传单,该传单介绍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伊斯兰教人民大会,并直接号召伊斯兰教徒团结在苏联周围以争取民族的幸福和解放。^①

在组织方面,苏联积极帮助新疆少数民族建立各种秘密团体。苏新关系破裂初期,后来成为三区革命主要领导人的阿巴索夫等人在伊宁成立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其中就有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共产国际情报员瓦西里·瓦西里诺维奇参加。^②苏联军官还直接出面领导反抗组织,如 1945 年在阿拉木图成立的“新疆突厥民族解放委员会”,就是曾经帮助盛世才剿灭马仲英和张培元的红军将领叶夫西爱夫组织的,该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联络伊犁民族上层,组织武装暴动。^③当时在新疆最大、最有影响的地下组织“伊宁解放组织”,也是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支持和帮助下,于 1945 年 9 月 20 日成立的。与苏联在新疆的政治鼓动和思想宣传相一致,该组织的主要领导力量是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宗教、大牧主等民族上层人士。^④这种组织结构,决定了三区革命初期的政治走向。

在军事方面,苏联的主要作用是大量向新疆少数民族反抗组织提供武器,在苏联境内为武装暴动培训军事干部,并派军事顾问参与对新疆游击活动的领导和组织。早在 1945 年驻守哈密的红八团撤退回国,经过伊犁边卡时,便将该部队的武器悉数藏匿于民间,以为日后采取武装行动所用。^⑤1945 年 12 月,在苏联接受军事训练达两年之久的达列力汗回到阿山地区进行游击活动时,苏联应其要求,派出了 10 人顾问团,随同他经外蒙古到达青河。1945 年 9 月上旬,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乔巴山以视察边

① 朱培民：《新疆 1945 年至 1949 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演变》，载《中共党史研究》1992 年增刊 156 页。

② 朱培民前引文，156 页。

③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 1 册，237 页，台北，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 年。

④ 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远，156 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年。

⑤ 《新疆风暴七十年》第 1 册，237 页。

境为名来到新疆青河县，会见了反抗组织首领乌斯满，并给他派来了一批军事顾问，运来了武器弹药。在乌斯满和达列力汗发动阿山暴动过程中，他们不断从外蒙古方面得到大批武器。^① 苏联还为新疆少数民族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和指挥人员。当时，苏联在阿拉木图和安集延建立了两个军事训练基地，专门训练逃亡到苏联的新疆少数民族反抗人士。阿拉木图基地负责正规战训练，而安集延基地负责游击战训练。^② 三区革命的主要军事领导人伊斯哈克伯克在 1950 年初逃往苏联后，就在苏联的支持下，将聚集在那里的 1000 余名逃亡者组织起来，编为两个大队，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并在苏联筹建了蒲犁解放组织和蒲犁游击队。^③

1950 年 10 月 10 日，鉴于在伊宁发动武装暴动的条件已经成熟，“伊宁解放组织”便派遣阿巴索夫去苏联，洽谈购买军火事宜，并很快组建了一支近百人的游击队。10 月 15 日，“伊宁解放组织”根据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建议，趁伊宁驻军的主力部队已调往巩哈县的机会，秘密发动和武装群众，同时派人与巩哈游击队取得联系。10 月 20 日，阿巴索夫偕同苏联军官亚历山得洛夫率领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从苏联经霍尔果斯口岸潜入伊宁，会同“伊宁解放组织”组成了以亚历山得洛夫为首的军事指挥部，并决定在 10 月 25 日举行全城暴动。^④

暴动开始以后，苏联军人立即投入了战斗。随着战事的展开，又不断有增援部队自苏联入境。10 月 25 日，由苏联军官波里诺夫率领一支现代化装备的俄罗斯族部队入境参加作战。10 月 26 日，伊斯哈克伯克和苏联军官斯坎德尔率一营骑兵，越过国境攻打艾林巴克。到 1950 年 11 月初，苏联又在其境内中亚地区各穆斯林民族中组织了一支部队。这支部队进入新疆后，一部分去果子沟阻击迪化政府的增援军队，一部分参加了攻打艾林巴克的战斗。鉴于大量苏联军官和军事人员进入新疆，为了协调关系，

①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195-196 页；朱培民前引文，196-197 页；达列力汗烈士纪念文集》196 页；阿勒泰地区纪念三区革命烈士殉难四十周年活动筹备领导小组 1982

② 笔者 1982 年 10 月 10 日采访陈锡华记录。陈锡华是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及民主革命党创始人之一，并在邓力群到新疆后为他做俄语翻译。

③ 朱培民前引文，196 页。

④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195-196 页。

协助指挥。1949年11月下旬,苏联派出了以柯兹洛夫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和以斯特潘诺维奇为团长的内务部顾问团(代号分别为“一号房子”和“二号房子”)来到伊宁。不久,苏联又派出一批苏联军事教官,在霍尔果斯口岸举办军官培训班。每期1个月,先后举行了3期。毕业的学员分配到各游击队担任军事指挥员。^①

1949年12月21日第13集团军总司令李铁军致省府电称:“阿拉木图为策动伊变之中心”,“此次作战,伊匪除尚未使用飞机外,使用之武器种类数量威力,均较我为优,据我前线所虏获轻重武器,均为苏造及德意志出品”。敌军围攻,其炮火之猛烈,“一日常以数千发计,此种武器,绝非普通土匪所能具备”。至于敌军成分,除了由阿拉木图训练的正规军外,还有所谓苏联的叛军。“查匪中班长以上指挥官及其特种部队技术人员,均为苏联所派遣”,并“屡次发现有苏联军队及极整齐精锐之骑兵参加”。另据当年的海关官员记述:“至攻陷霍城后,边卡通行无阻,军火大量输入,异族男子随时可至匪司令部领取枪支弹药。”围攻伊宁空军教导队时,“入夜即是大队汽车灯火闪耀,自西方开来,旋即机枪、炮声大作,彻夜不绝,天明炮声渐稀,未几闻汽车向西开去。……每至夜间,苏联友军即来助攻,天明即去”。^②

此外,在新疆的苏联侨民也纷纷参与了三区革命。作为伊宁事变先声的1949年12月“巩哈暴动”就是苏联侨民帕提斯·莫斯里莫夫等人利用在苏联境内换取的武器,组织游击队发动的。^③另据1949年11月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管理总局的调查报告说,绝大多数旅居新疆的俄罗斯侨民“怀有对自己祖国的爱国主义感情”,正在积极投入武装起义。^④

显然,曾在伊宁工作的中共代表彭国安的结论是可信的:“伊犁的局面确实是靠苏联军队打出来的。”^⑤

①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新疆人民出版社,朱培民前引文,1983,287页。

② 《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册,1981,287页;第2册,288页。

③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1983,287页。

④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全宗192,目录10,案宗192,10,100页。

⑤ 1949年11月21日彭国安同志谈三区革命情况,转引自朱培民前引文,287页。

新疆独立：与中国结盟谈判的外交筹码

伊宁暴动发生后，新疆当局马上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苏联。1955年11月15日，新疆军政首脑朱绍良和吴忠信联名致电蒋介石：以目前情势而言，对苏外交如无彻底调整办法，则如伊宁事变，自必层出不穷，新疆前途亦将日趋恶化。蒋介石在11月15日的回电中也感到问题严重，他一方面进行军事部署，一方面指示新疆当局立即就地与苏方进行交涉，只要能够保全领土和主权，可以在经济合作方面尽量迁就。伊宁失守以后，1955年12月15日，吴忠信致电蒋介石称，如此下去，新疆恐怕将成为第二个东北，只有通过外交渠道的有效疏解，才能收拾目前局面。^①

事态的发展表明，吴忠信对新疆势必大乱的形势估计是准确的，蒋介石对领土和主权的担心也不是无的放矢。因为，伊宁事变的最初目标就是要将新疆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去。苏联驻伊宁领事在暴动的第二天就派人与“伊宁解放组织”领导人热合木江联系，商议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并就政府成员名单进行了讨论。11月18日，“伊宁解放组织”即宣布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由艾力汗·吐烈担任临时政府主席，定国旗为绿底中镶黄色星月旗。1955年12月15日，临时政府委员会第1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宣言》明确宣布“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脱离中国而独立。^②

然而，在新疆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不是苏联对华政策的真实目标，也不是苏联策动和支持三区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伊宁事变中，如果说三区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真正把新疆的独立作为这次革命的最终目的，那么莫斯科不过是利用新疆地区的民族矛盾作为实现苏联在华利益的一个手段。

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环境来看，苏联都不可能要求和实现把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的目标。就苏联国内情况而言，与新疆接壤的主要是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加盟共和国，如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这些共和国的主体民族与新疆的少数民族在种族上、宗教上乃至血缘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①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144—145页。

② 朱培民前引文，第126—127页；《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145页。

苏联国内在战后仍然存在着需要解决的民族矛盾,可以想像,如果苏联支持在这些共和国的边疆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会对本国的少数民族产生如何严重的负面影响。既然新疆的少数民族可以脱离中国而独立,那么苏联的同类民族就不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吗?①就苏联的国际环境而言,与中国的关系既受制于对付苏联在远东的宿敌日本,又不得不考虑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和政策。无论如何,从国际形势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处理战后世界格局的总体原则出发,苏联需要的是同中国保持友好和盟国关系,而绝不是为新疆问题与中国对立,甚至兵戎相见。

当然,战后成为世界强国的苏联对大而弱的中国不是没有所图的,不过,这里有一个利益限度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俄国的在华利益涉及与中国接壤的三个地区,即东北、蒙古和新疆。早在19世纪末,俄国就为了在太平洋寻找不冻港和出海口而与日本激烈争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而为了保证西伯利亚铁路动脉的安全,则致力于在蒙古地区建立一个广阔的缓冲国。斯大林正是依据俄国在远东的传统外交战略,确定了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目标:在东部,以夺取中东铁路和恢复对旅顺口的控制,建立从苏联内地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为目标;在中部,以策动外蒙古脱离中国,建立苏联卵翼下的独立国家为目标。②显然,面对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和美国对亚洲事务的干预,苏联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已非易事,如果再搞出一个新疆独立的事件,势必影响全局。因此,苏联对中国西部的目标是满足于保持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影响,促成一个在莫斯科控制之下,或至少是亲近苏联的新疆地方政权。从现实的角度看,在新疆实现这样的目标比较容易,且不会引人注目。

在这方面,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分析是比较准确的,尽管中国提供

① 谈到“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阿巴索夫曾经对陈锡华说过,他在苏联境内接受训练时,一位当地的负责人讲,苏联的少数民族希望在新疆有一个维吾尔斯坦,因为这样他们自己也可以在苏联抬头了。见笔者1982年11月16日采访陈锡华记录。

② 关于笔者对战后苏联远东政策的分析详见拙著《朝鲜战争揭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2年)第二章“这里是被冷战遗忘的角落?——分析战后朝鲜及远东局势的变化”,《斯大林、毛泽东与韩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2年)第二章“重温远东梦——苏联的远东政策与中苏同盟的起源”。

的情报极力渲染新疆局势的严重性和危险倾向，但他在 1945 年 7 月 20 日致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的电报中认为，苏联“虽然不一定反对在新疆出现自治局面，但是莫斯科的宗旨是始终要对当地政府的政策方向施加压倒一切的影响，尤其要左右新疆的全部对外联系。直接目的可能是要保持对地方当局活动幕后的控制权，而不公开承担任何行政责任”。因此，对于新疆来说，在最近一个时期，“主权问题将处于次要地位”^①。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以及在《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中的表现，充分说明了苏联对新疆问题的真实考虑，说明了苏联策动新疆事变和支持成立一个独立国家的举措，不过是为实现其在华根本利益而施展的手段罢了。

正当三区革命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了关于战后安排的重要会议。鉴于对德战争即将胜利结束，而且这次美苏首脑接触是斯大林正式提出苏联在远东地区全面要求的最后机会，因此可以认为，这次会议的结果反映了苏联在华利益的最根本的要求。在 7 月 24 日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晤和 7 月 25 日关于远东协定的讨论中，根据苏联的要求，苏美英三国领袖一致通过了苏联加入远东作战的条件：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大连作为商港的国际化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苏联租用旅顺港作为军事基地，由苏联和中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但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和中国在满洲的主权。最后，苏联表示准备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友好同盟协定。

在这里，斯大林只字未提新疆问题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时疏忽，这恰恰反映了在苏联对华政策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和根本利益当中，新疆问题只是莫斯科随时准备打出的一张外交牌。因此，苏联一方面希望美国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政府接受这些要求^②，一方面试图把新疆问题作为筹码，通过中苏直接谈判实现这些设想。

为了使中国能够接受《雅尔塔协定》，苏联开始注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且在解决新疆问题上加快了与中国的接触。自潘友新被召回国后，空位近一年之久的驻华大使之职终于有了新的人选。1945 年 8 月，新任驻

① 《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集》1945 年第 47 卷，225-226 页。

② 详见拙文《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载《历史研究》1989 年第 3 期。

华大使彼得洛夫在赴任途中专程在新疆停留,听取了驻迪化总领事的情况汇报。源月 员日,当蒋经国携带蒋介石的亲笔信抵达迪化时,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的负责人会见了,双方就苏联与新疆关系问题交换了看法。^①特别是在旧金山会议上,苏联明显地对中国表现出友好姿态。源月 员日和 圆日,出席会议的宋子文连续电告蒋介石,莫洛托夫对中国代表团的 attitude 变得越来越好。远月 员日,奉命去莫斯科了解罗斯福去世后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是否有所改变的霍普金斯回到华盛顿后,立即与宋子文举行了一次重要会晤。霍普金斯十分明确地向宋子文转达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中国,包括共产党在内,在目前还没有一个能统治全国的领导人,由于苏联不愿与一个分裂的中国谈判,斯大林准备支持蒋介石总统及其政府。而且苏联无意侵犯中国在新疆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主权。苏联将主动邀请中国代表进驻满洲,与苏军合作组织当地的政府。关于中国共产党,苏联认为这是中国内部的事务,与苏联无关。”^②

莫斯科在中苏谈判之前作出的这种友好姿态,当然是为了诱使中国在即将开始的谈判中接受苏联的条件。在处理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问题上,斯大林始终把苏联对外蒙古和东北的要求作为不可更改的目标,而把新疆及对待中共的态度问题作为谈判的筹码。《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大体上就是按照苏联设计的轨迹展开的。^③

苑月 圆日,中苏正式谈判一开始便陷入了僵局,症结主要出在外蒙古问题上。^④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宋子文并没有把蒙古问题作为会谈中的主要讨论内容,因为苏联要求的是在外蒙古“维持现状”,中国对此

①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 苑苑。

② 梁敬尊:《1950年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签订内幕》,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 员集, 圆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85。

③ 以往的研究已经注意到 员950年苏联对新疆策略的转变(见朱培民前引文第 2页,薛衔天提交 员950年 员月“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试析战后苏联对中国新疆战略》),但都认为这种变化发生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以后,并以此作为“苏联对新疆战略和策略的转折点”或标志。而笔者的看法则相反,认为苏联出于对远东国际形势的考虑,恰恰是为了促成《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而改变了对新疆的策略,即策划三区革命、支持新疆独立和主张和平谈判都是莫斯科实现其对华政策目标的外交筹码。

④ 《战时外交(二)》,页 苑苑。

的理解就是仍然保留中国的宗主权。^①因此，斯大林在会谈中提出的外蒙古独立问题使宋子文感到十分意外。在第三轮谈判中，双方在外蒙古独立的问题上争论激烈，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②面对苏联的强硬立场和美国政府在谈判初期采取的妥协和不干预态度，地位软弱的中国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了。7月25日至26日，蒋介石在与王世杰等人商议后，连续给宋子文发出两封电报，表明了中国让步的界限：如果苏联能保证中国在东北和新疆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证不再支持中共和新疆暴动，则中国政府将在抗战胜利后自动提出通过公民投票方式解决外蒙古独立问题的建议，同时，中国同意大连成为自由港，东北的铁路干线和旅顺港由中苏共同使用，但管理权归中国所有。^③

这个消息正中斯大林下怀。于是，在7月26日的第四次谈判中出现了转机。斯大林对宋子文提出的新建议作出了回答：关于东北，苏联愿意尊重中国对满洲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坚持旅顺港须由苏方管理）；关于新疆，苏联同意“禁止私运军火，堵截边境”，同意协助平息暴乱，并认为中国政府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是适宜的；关于中共，苏联认为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并表示此后援助中国的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惟一对象，不向中共供应武器。^④

这样，在斯大林离开莫斯科参加波茨坦会议之前，中苏双方在重大问题上已达成了一致意见。尽管在中国与外蒙古的边界划分，以及旅顺港的管理等一些细节问题上还有分歧，但蒋介石对新疆问题的担忧似乎是解除了。8月1日，蒋介石命朱绍良、吴忠信着手准备在8月间收复伊犁的事宜。^⑤

①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27册，283页-284页。

② 战时外交（二）》283-284页。

③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27册，283-284页；战时外交（二）》283-284页。

④ 战时外交（二）》283-284页。

⑤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283页。

和平谈判：莫斯科施加影响的缓和手段

然而，就在中苏政府代表团忙于就中苏同盟条约进行谈判的时候，新疆发生了一场更大的风暴。“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民族军按预定计划，于7月下旬发动了全线进攻。到8月初，民族军在北线占领了塔城和阿山地区，在南线越过天山冰大坂，并在南疆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而在中线则攻陷了精河和乌苏，直达玛纳斯河西岸，距乌鲁木齐只有100多公里。面对如此局面，朱绍良、吴忠信走投无路，心急如焚，急电重庆政府说：事态严重，前途不测，只有一死殉国！^①

然而，蒋介石另有考虑。1945年8月15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②以后，蒋介石的注意力主要在东北的接收问题上，认为苏联在新疆问题上的首要目的是以此干扰中国政府接收东北，至于“助长哈匪多占地盘”，实现其“侵新之野心”“尚在其次”。故决定对新疆问题不可以武力解决，“即使沦陷，只可暂时忍耐”，外交和宣传也作低调处理，同时积极准备在新疆进行政治和宗教改革。他一方面表示允许边疆民族自治，一方面派张治中赴新疆考察，提出解决问题的报告。^③

如前所说，新疆果真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对苏联实为一种潜在的威胁。因此，当苏联在华的根本利益已经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保证以后，苏联便决定出面调解新疆冲突，阻止新疆独立。这对莫斯科来说可谓一举三得：一则在世界舆论面前表现出苏联的和平形象及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姿态，二则可以免除新疆独立给苏联本身带来的后顾之忧，三

① 曹达诺夫·扎伊尔：《伍军的革命历程》，106-107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3；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195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

② 由于准备条约文本拖延了时间，签字仪式是8月21日举行的。但日本接受投降的电文于凌晨8时已送达莫斯科，苏联为掩人耳目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于8月15日签订。见任世杰日记（手稿本）第3卷，156-157页。

③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册，156页，转引自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45-1950），195页，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128-129页；《张治中回忆录》，195页。

则通过充当调解人巩固和加强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斯大林何乐而不为？

于是，苏联政府在 1945 年 10 月 20 日即向中国政府表示：只要让各民族参加新疆省政府，特务工作放宽些，新疆问题是可以解决的。10 月 25 日，苏联代总领事叶谢也夫会见前来迪化的张治中时也建议，新疆冲突最好设法和平解决，并表示愿意帮助从中疏通和联系。张治中遂电告蒋介石，建议请驻苏大使傅秉常直接向苏联政府提出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并请苏联方面出来调停。^① 10 月 28 日，出席伦敦外长会议的王世杰与莫洛托夫谈话，请苏联调查最近的新疆事件。莫洛托夫友好地表示，此事件只是“过渡现象”，请不必放在心上。^② 同一天，彼得洛夫即向中国外交部表示，苏联准备对新疆事件进行调解，并于第二天送来了正式备忘录。中国政府立即答复，希望“事变分子代表”来迪化与张治中洽商，请苏联伊犁领事代为通知。^③

作为调解人，苏联领事馆始终掌握着整个和平谈判的进程和节奏。和谈伊始遇到的障碍即是苏联领事排除的。三区谈判代表于 11 月初来到迪化时，都佩带着“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证章，并声称他们是代表“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来和中国政府代表谈判的，届时将出示证明文件，中国政府代表也须交验相应证件。对此，张治中坚决反对，并拒绝与其见面。最后，经张治中亲自与叶谢也夫交涉，确定由苏联方面从中斡旋。在叶谢也夫的劝告下，伊犁代表才放弃了原先的主张，使谈判得以启动。^④

在谈判桌外，苏联各部门也积极予以配合。1945 年 10 月 28 日，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给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米高扬的报告说，乌斯满与伊犁起义者协同配合“从中国人手中解放了阿尔泰地区”后，无意承认“东土耳其斯坦政府”，想使阿尔泰成为独立国家，并说这是乔巴山在 1935 年就允诺的，他只接受乔巴山的指示。鉴于目前正在举行和平谈判，贝利亚建议，

①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191 页；《张治中回忆录》，193-194 页。

②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 2 卷第 1 册，154 页。

③ 《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3-194 页；《张治中回忆录》，193-194 页。

④ 《张治中回忆录》，194-195 页。

请乔巴山给乌斯满下达指示：“停止积极反对中国的武装活动，转入防御，协助伊犁起义者谈判，和平解决与中国的冲突。”^①

和谈期间，张治中经常与苏联领事馆保持接触。凡有新的提案，首先征询苏联方面的意见，并请苏联领事人员从中斡旋和疏解，如此才使谈判得以进行下去。特别是当谈判陷入僵局时，苏联领事馆起了重要作用。例如，三区代表第三次来到迪化后，节外生枝地提出了撤销政治警察、事变后调来的政府军队撤出新疆、新疆警察由回教徒充任等三项新要求。对此，张治中态度强硬，表示没有任何商量余地。最后还是经请苏联领事出面进行说服，三区代表才同意暂时把这些要求搁置下来。1945年11月10日，和平条款及附文（一）签字。^②

此期，甚至斯大林本人也对新疆和平谈判起了推动作用。为了促进战后中苏关系中诸多问题的解决，蒋介石于1945年底派蒋经国访问莫斯科。正如苏联外交部事先对蒋经国来访目的估计的那样，在12月14日的谈话中，蒋经国要求斯大林对新疆谈判代表施加影响。蒋经国说，新疆问题已经基本达成协议，但现在三区代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苏联政府出面调停。斯大林表示，苏联政府将尽力而为，并十分有把握地说，三区方面“不会拒绝苏联政府的调停”^③。果然，1946年1月初第二阶段谈判一开始，三区代表便轻易放弃了前次谈判搁置的三条补充要求。当谈判在新疆民族军整编后的数量和驻地问题上历时两个月而争执不下时，也是苏联新任总领事萨维列也夫和副总领事叶谢也夫出面，多次与双方接触，居间调解。到12月20日，附文（二）终于正式签字，和平解决伊宁事变的工作全部告成。^④

不过，莫斯科放弃对新疆建立独立国家的支持，并非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新疆的政策，而只是在国际格局和中苏关系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调整

①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全宗 1000，目录 04案宗 1945-12-17页。

② 《张治中回忆录》，1983，198页。

③ 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莫洛托夫，1945年 12月 10日，斯大林与蒋经国谈话记录，1953年 12月 14日。转引自俄《近现代史》1982（1），152页。

④ 《张治中回忆录》，1983，198页。

了策略和方法。通过在幕后导演和平谈判，苏联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的控制和影响。

武装割据：苏联对新疆三区的全面控制

和平条款的签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新疆问题。1947年10月15日迪化发生了民族冲突的流血事件。与此同时，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在各地采取了强硬的高压政策，新疆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各地武装冲突再次出现。以至张治中不得不把省主席的位置让给民族人士麦斯武德，参加联合省政府的三区代表也陆续回到伊宁。新疆形成了三区武装割据，与地方当局对峙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已无法实现通过维持联合政府及和平局面来保证对新疆进行控制的策略，便暂时把目标转向以加强对三区的控制为主，静观全局变化。

苏联控制三区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大量发展苏联侨民，甚至鼓励新疆少数民族加入苏联国籍。

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以及全盘集体化和驱逐富农时代，有大批俄国人自中亚流入新疆。中国当地政府向这批苏侨发放了公民证，承认其归化中国，称作归化族。就在和谈开始后不久，1947年10月15日，布尔加宁等人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托，提交了政治局“关于接收旅居满洲的俄罗斯人为苏联公民”的决定草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恢复旅居满洲的原俄罗斯帝国国民以及接受失去苏联国籍人员为苏联公民”的命令草案，及审查程序、申请书、居住证样式等相应材料。1947年10月15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这项命令。几天以后，加里宁再次签署主席团命令，宣布关于满洲俄侨的命令也适用于新疆和上海。^① 1947年10月15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发出布告称，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凡以前失去或被取消苏联国籍者及其子女，均可恢复苏联国籍，在中国境内的原白俄侨民，均有恢复苏联国籍的权利。文告张贴后，前往登记者络绎不绝。不久，苏联又延长入籍登记日期，特别是策动哈萨克、维吾尔和塔塔尔人加入苏籍，

^①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全宗 125，目录 10，案宗 156，卷 1，第 100 页。

并许诺对加入苏籍者每月发给布匹 员尺, 津贴若干元, 并可免费看苏联电影。^①

员年 员月, 在伊犁、塔城和阿山分别成立了苏侨协会。苏联驻伊宁领事达巴申声称, 苏联将通过苏侨协会向苏侨和新疆人民提供帮助。苏侨协会完全在苏联领事馆的控制之下, 他们经常向领事馆请示工作, 并汇报情况和提供情报。苏侨协会还有自己的报纸和旗帜, 在三区享有特权, 被人称为“国中之国”^②。这里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此期苏侨人数迅速增长, 而且新发展的侨民, 大多数并非原俄罗斯人, 而是新疆的少数民族。员年 员月, 据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关于旅居新疆俄罗斯侨民的调查报告说, 当时在新疆省居住的俄侨有 圆万人。^③ 据中国档案记载的苏联领事馆发放的护照号码统计, 员年发展苏侨 圆万人, 员年即增加了 员万人, 员- 员年更猛增了 源万人。^④ 到新疆解放前夕, 据苏联驻伊犁领事对邓力群所言, 当地的苏侨及其家属已发展至 远万户, 共 员余万人。^⑤ 在不到 猿年的时间里, 苏侨人数如此剧增, 显然是因为有大量当地居民取得了苏联国籍, 除非发生了一次令人瞩目的民族迁徙, 但历史上没有这样的记载。

此外, 苏联还训练了一批亲苏的华侨, 并将他们送回国内。员年 员月 员日, 国民党迪化情报组报称: 莫斯科、塔什干等地现有华侨 员余人, 请领护照回国。苏方对申请回国的华侨, 有的拖延两三年不发护照, 但如果华侨能接受格伯乌训练, 并充当苏联间谍, 则准许其搭乘苏联飞机来新疆。^⑥

如果说苏联在侨民问题上的做法是为了加强其控制新疆的社会基础, 那么苏联此时更重视的则是在三区领导机构中肃清不忠实和不可靠

① 《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 (员- 员)》, 源- 源页。

②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 员页, 笔者 员年 员月 猿日采访陈锡华记录。

③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 全宗 员, 目录 圆案宗, 员- 员页。

④ 黄金明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委外办的调查报告, 员年 员月 员日; 伊犁州档案馆, 全宗 员, 目录 员卷号, 员- 员页。

⑤ 笔者 员年 员月 猿日采访陈锡华记录; 员月 员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全宗 员, 目录 圆卷号, 猿- 猿页。

分子，提拔和扶植亲苏人物主持政务。和平条款签订以后，苏联本来已经把苏联顾问团、军事指挥人员以及在三区政府中任职的苏籍官员和顾问撤回国内，到 1957 年 1 月底，应三区方面的要求，苏联又重新派顾问团秘密来到伊宁，代号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第二办公室”。同时还派出 1 名多格伯乌秘密特工潜入伊犁，加强对三区人事和局势的控制。^①

作为三区革命初期的头面人物，艾力汗·吐烈具有强烈的独立倾向。当初为了鼓动新疆起事，苏联利用了吐烈在民众中的宗教影响，支持他推翻新疆的汉人政府。但是吐烈在骨子里是反苏反共的，特别是苏联的策略改变以后，其反苏情绪更为强烈。吐烈不满当时在伊犁政府和军队中任副职的苏联人掌握实权，抗议苏联人在边境收购被盗的新疆农牧民的牲畜，反对苏联在新疆大量发展苏侨，以及过多地干预三区政府的事务。最令苏联头痛的是，吐烈坚决反对和平解决伊宁事变。在和谈前夕，吐烈先后在塔城和承化主持召开了“临时政府”委员会流动会议，宣布塔城专区和阿山专区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和平条款即将签字时，吐烈又极力反对苏联顾问停止军事进攻的命令，力主继续进军，趁势解放全疆，甚至在伊宁召开大会，宣布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改为正式政府。^② 对于这样的人，苏联当然不能容忍。于是在联合省政府正式成立前夕，苏联驻伊犁领事馆强行将艾力汗·吐烈等民族上层人物秘密押解出境，送往阿拉木图。^③

苏联选中取代吐烈的人物是阿合买提江。据 1957 年 1 月苏联驻伊犁领事阿里斯托夫向邓力群介绍，阿合买提江是联共（布）党员，是苏联派来搞情报工作的，完全可以信任。在三区革命爆发时，阿合买提江只是一个报纸编辑，并不是当地的主要人物。后来苏联感到吐烈不可靠，才提拔阿合买提江在“临时政府”中担任办公室秘书、军事厅军事科长等职。和平谈

①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 100 页；《新疆风暴七十年》第 1 册，页 20 页。

②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页 100 页；《新疆风暴七十年》第 1 册，页 20 页。

③ 笔者 1957 年 1 月 1 日与新疆学者徐玉圻、高朝明、杜瀚、周清霖的座谈记录；1 月 1 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判前夕,“临时政府”通过 16 号决议,增补阿合买提江为“临时政府”委员。在谈判期间,张治中发现,阿合买提江虽然只有 18 岁,是三区代表中最年轻的,却是和平谈判三区方面的实际负责人。^①此后,阿合买提江便成为三区的首要领导人。

最能说明此期苏联强化对三区控制的,是苏联绝对排斥各种外来势力渗透到三区,甚至包括中共的力量。在当时三区的领导人中,与中共和汉族革命者接触的主要人物是阿巴索夫,而这位三区革命初期的主要领导人后来却为此受到苏联的冷落和压制。

自从盛世才实行反苏反共政策、将陈谭秋等中共干部逮捕下狱以后,中共在新疆有组织的力量已经不复存在。1945 年 10 月,李泰玉、陈锡华等进步青年组织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试图与中共取得联系。1945 年和谈期间,他们借同学关系找到三区代表阿巴索夫,并通过阿巴索夫参加国民大会的机会,请他与南京的中共代表联系。10 月 20 日晚,阿巴索夫秘密前往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见到董必武,详细汇报了新疆和三区的情况。当晚,董必武即将所谈内容电告中共中央。10 月 21 日中共中央复电,建议由阿巴索夫带中共代表及电台一道返回新疆,以便建立与延安的联系。阿巴索夫回到迪化后即召集李泰玉等人开会,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由于中央代表彭国安的电台功率太小,无法与延安取得联系,经过讨论,决定把阿巴索夫秘密建立的“人民革命党”与“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党,并按照中共党章的原则起草了章程。根据董必武关于在新疆的组织不要过早打出共产主义旗帜的指示,该党取名为“民主革命党”,阿巴索夫任主席,李泰玉、艾斯海提任副主席。1946 年夏天,由于迪化形势紧迫,“民主革命党”领导成员及中共中央代表随同阿巴索夫撤退到伊犁。^②

当时,所有这些与中共和汉族革命者的联系,阿巴索夫都是背着苏联

^① 笔者 1982 年 10 月 10 日采访陈锡华记录;10 月 15 日采访邓力群记录;《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185 页;《新疆风暴七十年》第 15 册,122 页;《张治中回忆录》,192 页。

^② 李泰玉:《为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而献身》,徐玉圻:《毛泽东与新疆三区革命》,载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纪念新疆三区革命文集》,1985 年 12 月,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年 10 月 10 日。笔者采访陈锡华记录。

人做的,也不敢告诉阿合买提江。到伊犁后,“民主革命党”又发展了 员多人,主要是那里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但仍是秘密组织。阿巴索夫一再要求党员保密,绝对不能让苏联人知道。后来,苏联领事馆还是听到了有关“民主革命党”的消息。员年 缘月,苏联领事委托阿合买提江找阿巴索夫和赛福鼎谈话,对他们提出警告,并勒令其停止活动,销毁一切文件。此后,阿巴索夫便被苏联人冷落了。协调三区统一行动的“新疆保证和平民主同盟”成立时,阿巴索夫作为三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连组织委员(相当于中央常委)都没有选上。另据邓力群回忆,当时苏联领事对李泰玉也极为不满。总之,苏联绝对不允许外人插手三区事务。①

当然,苏联并没有满足于对三区的控制,而是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变化,随时准备恢复在整个新疆的影响。苏联驻迪化副领事乌里马索夫于 员年 愿月 员日召集苏籍人士谈话时说,“勿以目前迪化市现状而灰心,不久我们苏联即可占领全新疆”。伊犁苏侨会主任吴国林(又名马力牙奴夫)也经常对苏侨讲,苏联对苏侨甚为关怀,你们的前途已露曙光,一切困难即将过去。②

这样的时机终于来了。员年,中国革命迅猛发展,国内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改变了对华策略,开始积极参与中国事务。当时国民党政府因关内战事紧急,已无暇顾及新疆,主持西北政务的张治中则力主撤换在新疆采取强硬政策的军政首脑宋希濂和麦斯武德,缓和与苏联的关系。苏联也希望趁此机会与新疆地方政府改善关系。员年 远月,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罗申表示,中苏双方应先停止有碍睦邻友好的宣传,以促进新疆和平。员月 员日,阿合买提江与外交部代表刘泽荣会晤,表示三区绝无脱离中国之意,愿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问题,并建议张治中今后谈新疆问题时,应特别注意外交关系。③ 莫斯科的意图很明确,即通过改善与地方当局的关系,走出三区,重新控制整个新疆。

① 笔者 员年 愿月 猿日采访陈锡华记录;员月 员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 员目录 圆卷号 猿猿猿愿- 猿页。

③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员- 员页。

议结新盟 保证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利益

正在苏联试图与新疆地方当局恢复友好合作关系的时候,又出现了两个新情况,迫使苏联再次调整对新疆的政策。

一个情况是,到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斯大林遂派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专程到西柏坡与中共领导人会谈,详细地了解了中共的政策和主张,而后决定支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毛泽东则派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商议新中国与苏联结盟的具体事宜,并公开宣布了未来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①

另一个情况是,美国开始插手新疆事务,试图与当地反动力量勾结,加强美国在那里的影响。1949年12月,在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策划组织下,成立了以乌斯满为首的反共反苏反三区革命委员会。^② 1950年10月间,新疆省主席麦斯武德、政府秘书长艾沙与美国驻迪化总领事包懋勋秘密商议,为了保证新疆不落入中共或三区手中,应成立“泛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求得独立。美国率先予以承认,再由美国出面游说中东各国承认,并迅速建立外交关系,造成既成事实。1950年12月,包懋勋进一步确定了新疆独立的具体方案,同时策动坚决反共的新二师师长叶成掌握新疆军权,还积极与马步芳、尧乐博斯和乌斯满等地方反动势力联络,妄图全面控制新疆。^③

这时的新疆,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美国企图乘虚而入,而莫斯科碍于国际舆论又不便公开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帮助新盟友中共迅速接管新疆,显然是保证苏联利益的最佳方案。为此,莫斯科立即采取了积极措

① 详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三章“走向莫斯科——中苏同盟的基础条件和目标”。

② 《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466页。

③ 魏锡熙:《我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后的种种活动》,载《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1956年12月。

施。^①

当时，在毛泽东进军全国的棋盘上，新疆尚未列入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1949年10月10日，中央军委在关于各野战军进军部署的电报中指示，年底以前占领兰州、宁夏和青海，1950年春“开始经营新疆”。12月15日，毛泽东又致电指挥西北作战的彭德怀，如进展顺利，可于“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12月15日彭德怀报告，已消灭胡宗南部万余人，计划“明春夏入新疆”。^②然而，斯大林对这样的安排很不放心。对美国势力渗透新疆的忧虑，使苏联不得不向中共提出及早进军新疆的迫切要求。根据俄国档案文献记载，在12月15日，即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后中苏两党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就提出：“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美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斯大林认为中共过高估计了马步芳的骑兵部队，并表示愿意提供10架歼击机，帮助中共军队迅速入疆。^③

毛泽东非常重视斯大林的建议，立即要刘少奇通知斯大林，中共同意尽快占领新疆，并希望刘少奇在莫斯科具体解决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④此后，毛泽东于12月15日给彭德怀发去电报说，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援助，包括几十架飞机助战”，建议彭德怀“冬季即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⑤接着，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说，中共“同意派邓力群去新疆，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并通告他，如果战事进展顺利，今冬就有可能占领迪化，为此，正在考虑步行进军新疆

① 前面所引朱培民的文章比较详细地讲述了苏联如何帮助加快实现新疆和平解放，本文除补充一些新的材料外，着重说明斯大林此举的背景和初衷。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125-126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③ 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的会谈纪要，1949年12月15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158，目录 15案宗 125-126页。根据中共中央代表团政治秘书邓力群的回忆，斯大林当时的说法是：英、美特别是美国，在策划搞“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徐则浩访问邓力群记录，1982年12月15日。笔者在此感谢徐则浩先生提供的经邓力群校正并签字的访问记录。

④ 刘少奇致斯大林的信，1949年12月15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158，目录 15案宗 125-126页。

⑤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125页。

的问题。^① 愿月 源日毛泽东进一步通知刘少奇、王稼祥、彭德怀报告,“愿月底或怨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②。

进疆的任务迅速提前,而中共对新疆的具体情况却一无所知。根据邓力群的回忆和“力群电台”发出的电报看,为了让中共力量尽早占领新疆,苏联的确做了许多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先后在联共(布)中央联络部和苏联驻伊犁领事馆人员的陪同下,于愿月 源日秘密到达伊宁。此前,驻伊宁的苏联顾问团已全部撤回国内,苏联驻伊宁领事阿里斯托夫接待了邓力群一行,并安排与三区领导人进行了会晤,他们表示“将尽一切力量”帮助邓完成任务。阿里斯托夫也表示“愿以同志关系”和邓“经常往来互相交换意见”。^③

此期苏联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体现在和平解放新疆的问题上。尽管早在 愿年 源月张治中等国民党和谈代表决定留在北平之时,毛泽东已经考虑“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④了,但中共当时既不了解三区的具体情况,与新疆当局也没有任何接触。而苏联方面在 苑月底 愿月初已经通过与陶峙岳、包尔汉的接触,了解到新疆当局有举行和平起义的意愿。愿月中旬苏联总领事萨维列也夫即对陶峙岳等人表态说:中国将于怨月组成新政府,苏联即将予以承认,希望新疆方面及时主动转变。“局势已进入必须转变的阶段,不能有所犹豫了。”这无疑对促进新疆的和平起义产生了作用。

愿月 愿日兰州解放,人民解放军日夜兼程,继续西进,迫使新疆军政首脑下决心举行和平起义。经过与新疆当局的联系,苏联副总领事叶谢也夫于怨月 愿日亲往伊宁,并连续两次会见邓力群。叶谢也夫说,和平解放新疆的形势已经完全成熟,苏联保证国民党方面将无条件接受中共的和

① 毛泽东给刘少奇并转交斯大林的电报, 愿年 苑月 愿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源,目录 员,案宗 猿,页 愿。

② 毛泽东致刘少奇、王稼祥电, 愿年 愿月 源日,载中共新疆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军区政治部编:《新疆和平解放》, 源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愿。

③ 邓力群致中央电, 愿年 愿月 愿日、愿月 愿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 源,目录 猿,卷号 源,页 愿。

④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 愿年 源月 愿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缘卷 猿页。

平条款，希望中共方面抓住时机，果断行事，立即设法开始谈判。叶谢也夫还几次建议邓力群迅速到迪化，直接与新疆当局接触，并表示苏联方面负责从中介绍，同时保证中共代表的绝对安全。经与叶谢也夫商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后，邓力群于 1949 年 8 月 1 日秘密到达迪化，在苏联领事的大力协助下，与陶峙岳、包尔汉进行了正式谈判。不久，新疆国民党当局便通电宣布起义。^①

当然，斯大林建议并帮助中共迅速占领新疆，也有为苏联利益考虑的一面。通过米高扬访华和刘少奇访苏，斯大林已经知道未来新中国的领导人在蒙古和东北问题上是有考虑的。因此，莫斯科把新疆作为礼物奉献给新盟友，无非是希望毛泽东接受在外蒙古和东北问题上的既成事实。^②同时，这样做的结果也使斯大林在新疆问题上有了发言权，从而巩固和加强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及特殊地位。惟其如此，苏联才一再坚持中国应把新疆的省会确定在伊犁。新疆和平解放后，苏联领事馆就曾向邓力群建议，新疆的省会应由迪化迁移到伊犁，其理由主要有两条：在政治上，伊犁是三区革命的策源地，民主干部大多集中在那里；在经济上，伊犁是苏新贸易的重要通道，而新疆经济的改善主要靠的是苏新贸易的发展。尽管邓力群表示兹事体大，个人不能表示意见，苏联方面还是坚持要他转告中共中央。全国解放以后，苏联驻新疆总领事又在一次欢迎来自北京的代表团的宴会上，公开提出这一建议。^③

新疆对于苏联的特殊意义，在中苏最高领导人关于新的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中也有明显体现。1950 年年底，毛泽东亲自前往莫斯科，经过一番艰苦的较量，终于迫使斯大林同意重新签订中苏同盟条约。^④不过，引人

^① 邓力群致中央电，1949 年 8 月 1 日、8 月 1 日、8 月 1 日、8 月 1 日、8 月 1 日、8 月 1 日、8 月 1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 1 号目录 猿卷号 远源怨- 怨缘缘- 远页。另见邓力群：《新疆往事回忆》，载《新疆和平解放》猿猿- 猿猿页。

^② 《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三章。

^③ 邓力群致中央电，1949 年 8 月 1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 1 号目录 猿卷号 远远- 苑页，笔者 1985 年 8 月 1 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④ 关于这一看法，详见沈志华、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谈判：愿望和结果》，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 年第 10 期。

注意的是,当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时,由赛福鼎、邓力群等人组成的新疆省代表团已经先期抵达苏联,陪同的还有驻伊犁领事阿里斯托夫和地质考察团团长期斯图德尼科夫。中苏两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同时还单独要一个省组团参加,这只能说明苏联对新疆是有特殊要求的。果然,在中苏双方确定了同盟条约的基本原则后,斯大林在谈到贸易条约时,似乎是漫不经心地问:“我们是同新疆、满洲和其他省签订单独的条约还是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斯大林知道新疆代表团就在莫斯科,当然是希望与新疆单独签约。毛泽东的回答是:同新疆的条约必须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签,但同时可以和新疆有单独的协定。^①至于当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条约和协定有什么不同的含义,现在不得而知。不过,在后来关于苏新贸易和在新疆开办两个中苏合股公司的谈判中,中国方面均以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为首席代表,议定书也均由中央政府统一签署,只有文化协定是新疆代表团自己谈的。^②

中苏谈判的结果,总的来说是苏联作出了重大让步,条约大体上是按照中方的意见签署的。^③为了保障苏联在东北和新疆的特殊利益,斯大林采取了最后的补救措施。在中苏谈判即将结束时,10月16日莫洛托夫送来一个《补充协定》草案,其中规定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公民参与经营活动。对此,中方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修改意见。为了安抚莫斯科,周恩来甚至还提出,中国准备采取经济措施,逐步减少外国公司和组织在东北和新疆境内从事的经济活动。^④虽然说苏联的这个

①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1月10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158,目录 158,案宗 158,卷宗 158,来源 158,页码 158。

② 笔者 1989年 10月 10日采访陈锡华记录,1990年 10月 10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③ 详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谈判 愿望和结果》一文。

④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1950年 10月 16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58,目录 158,案宗 158,卷宗 158,来源 158,页码 158。这个材料说明以往人们认为中方坚决反对《补充协定》的看法是缺乏根据的(参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0)》,15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1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要求确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但其目的无非是消除西方势力对新疆和东北的渗透，而这在当时对中国并没有什么坏处。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夕，除苏联以外，各国驻新疆的领事馆均已自行关闭，中国方面为此所做的只是要求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侨民限期放弃双重国籍。^① 不过，《补充协定》的签订也清楚地表明，斯大林希望在中国政权更迭以后仍然保持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地位。

纵观 1949—1956 年苏联对新疆的政策趋向，时而与地方当局结好，时而同少数民族联合，时而支持独立，时而强调自治，时而主张强硬，时而倾向缓和，但其目标始终是在中苏走向同盟关系的大前提下，从政治和经济上确保苏联在新疆的优越地位和特殊影响。尽管在对华政策中，新疆对于苏联的重要性排在外蒙和东北之后，但是，苏联对新疆的控制和影响仍然是不容忽视的，而这种影响直到新中国成立 16 年以后才陆续消除。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1989 年第 7 期。)

① 笔者 1982 年 12 月 16 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毛泽东、斯大林与满洲的斗争 (1945-1949)

——民族主义还是国际主义

美国西南密苏里州立大学 盛慕真

满

洲因其历史地位和地理位置，而在亚洲的冷战起源中占有特殊地位。杜鲁门政府在获得原子弹以后就不再愿意让俄国加入太平洋战争，但斯大林决心要在远东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他在广岛、长崎硝烟未尽之前，便命令红军开进满洲和北朝鲜。美国占领了日本和南朝鲜，而苏联则控制着满洲和外蒙古，这样便形成了战后太平洋地区超级大国对峙的局面。不过至少在1945年底以前，莫斯科和华盛顿都表现得不太好战，而是更侧重外交。1945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三大国外长会议上就中国问题达成了协议：至少在表面，所有与会者希望看到中国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之间的内战能够结束。中国国内对峙双方是如何考虑并对满洲微妙而易燃起战火的局势作出反应的？毛泽东是如何看待战后世界形势的？他的看法又是如何从他的满洲政策中反映出来的呢？

关于战后时期满洲斗争的性质，一般说法认为这是一场四方游戏：斯大林对“所有的马打赌”，而具有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色彩的毛泽东和蒋介石则设法得到超级大国的支持。在这一过程中，斯大林背叛了毛，而与蒋做交易，同时毛则努力与美国人进行合作。一些学者认为，毛和斯大林之间“紧张而多疑”的关系，是出于“对他们之间相互矛盾的战略利益的考虑，

以及对过去的背叛行为耿耿于怀”^①。实质上，在对待满洲不断变化的形势的问题上，左右毛和斯大林思想和行为的是民族主义。这种说法多少会使人想起“失去机会”的论点：华盛顿的对华政策不是一碗水端平，从而未能赢得中共反而将毛推进了斯大林的怀抱，于是在战后的亚洲失去了与苏联之间适当的力量均衡，接着发生了朝鲜和越南的悲剧。^②

根据新近掌握的中国和俄罗斯的资料，本文认为左右毛和斯大林对战后世界形势看法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毛所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与他们所说的“国际资产阶级反动派”美蒋联盟的抗衡中，这一看法在他们协调一致的行动上起着支配作用。本文作者认为，“失去机会”的观点或者“民族主义论”与国际研究中的结构主义理论——新现实主义有关，根据汤普森的说法，这一理论取消了“个人”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在新现实主义的历史中，剩下的是“反历史的总计算构架”，在这个结构中，男人和女人是其环境的客体，而不是制造者，占主导地位的结构不是社会各阶级，而是现代国家，是“政治领域自治”中惟一有效的代理者。^③ 本文想说明一个相反的观点：毛的满洲政策受其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依照这一思想，莫斯科是中共革命的天然盟友，而华盛顿则是国民党政府的可靠朋友，因此不可避免的是中共的敌人。这就是毛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核心，这不

① 史蒂文·莱文：《苏美在满洲的对抗与冷战》，薛春图（音译）编：《中国的对外关系》，页104-105，纽约，1965年；冈察洛夫、刘易斯、薛理泰：《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页104，斯坦福，1965年；奥德·阿恩·韦斯塔认为，当毛寻求美国援助时，蒋则试图争取让斯大林压制中国共产党。随着《雅尔塔协定》的实施和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到底蒋得到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支持。于是，毛吸取了教训，决定服从而不是对抗斯大林。由于美苏关系以及国民党与苏联关系在1945年上半年的恶化，出现了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联盟。见《冷战与革命：苏美对抗和中国内战的起因》，纽约，1965年；对于韦斯塔著作的进一步评论，见盛慕真的书评，载《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1965年第1卷，页104-105。

② 关于“失去机会”这一概念的争论见盛慕真《美国在中国失去了机会吗？——中共对美政策的重新评价》，《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1965年第1卷，页104-105；《中共对美政策与失去机会的神话》，《当代亚洲研究》，1965年第1卷，页104-105；《重新评价：美国、中共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太平洋历史评论》，1965年（原稿），页104-105。1965年《外交史》出版一期关于“失去机会”问题争论的专刊。

③ 詹姆斯·汤普森：《理论的贫困及其他》，页104-105，纽约，1965年；理查德·阿什利：《新现实主义的贫困》，《国际组织》，1965年第1卷。

能用中国的民族—国家及其利益这种抽象概念来加以解释,而要用毛的社会—政治和精神—意识形态特色来加以解释,是后者构成了毛的本质。在埃立克森精神分析学理论看来,毛的“自我意识”反映了他的思想或文化,反过来又影响到他的思维和行动。

毛关于世界政治的两大阵营观

毛和他的同志们是作为中国民族主义者开始其政治生涯的,这也是真实的,但在他们皈依马列主义并加入共产国际以后,便有别于其他爱国主义者了。毛式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正如施拉姆所指出的,毛对《共产党宣言》有着浓厚的兴趣,其中最重要的启发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①。根据这一观点,毛及其激进的一代人相信,世界各国人民不是被国家边境线划分开的,而是由社会政治路线来划分的,他们要么属于革命阶级,要么属于反革命阶级。民族—国家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个工具。因此,他们相信“只存在两个‘民族’,一个是资本主义‘民族’,另一个是工人阶级‘民族’。目前,工人阶级‘民族’只存在于苏联,其他地方只有资本主义‘民族’”^②。中国作为一个被地主和资本家的“国家”统治的民族,不应得到热爱,“因为中国过去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和可恶的”,“国家堕落,人民受苦受难,社会黑暗已达到极点”。在毛看来,“世界上第一个文明的国家”不是中国,而是苏俄。^③这使得毛及其同志决心与莫斯科联手推翻中国的国家,他们以为斯大林是世界革命的总指挥,而中国的共产党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观使毛与斯大林建立了亲密而秘密的关系。一种盛行的说法是毛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痛苦的回忆和背叛”,其实不然。最近一些历史记录资料表明,毛是 1953 年被斯大林选中的人。

① 施拉姆：《通向权力的道路，1949-1956年的革命著作》，页 17，纽约，1969。

② 丹尼尔·瓦茨：《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页 11，剑桥，1978。

③ 施拉姆前引书，页 11，1969。

毛的国际主义的另一面使得他把美国看成是中共国内敌人的“外国主子”，是世界革命的主要反对力量。只是在莫斯科的指点下，毛才开始在二战期间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同床伙伴”基础上来对付美国人。^① 根据共产国际的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理论，毛在德苏战争爆发后将世界划分成两大阵营：反法西斯阵营和法西斯阵营。但是随着1945年底德国和日本战败在即，毛看到战后世界的“中心问题”是苏美斗争，就像日本投降后国共统一战线被国共对峙所取代那样。毛及其同志深信，美国因其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而肯定要支持国民党反对中共，这不过是反苏运动的序幕。

中共所看到的战争后期的现实似乎证实了他们的信念。苏联红军将德国人赶出苏联领土并进入波兰后，苏联与西方盟国在战后波兰问题上产生了不和，这对中共来说是个警钟。在毛及其同志看来，如果英美军队进入波兰的话，那么在伦敦的“反动的流亡政府”就会卷土重来，地主、资本家统治的“旧波兰”就会复辟。因此，他们感到庆幸的是苏联红军正在解放波兰，从而使波兰“在被解放的东欧掀起了一场新的民主运动”。在1945年秋的华沙起义期间，德国人残杀起义者而红军却未采取行动。当西方谴责苏联的行为时，中共则指责波兰在伦敦的流亡政府“窝藏险恶用心……用成千上万个波兰爱国者的生命来打赌”。卢布林政府成立时，中共欢呼其“代表了全体波兰人民的要求”，是“东欧民主运动新阶段”的里程碑。毛及其同志还宣称，在诺曼底登陆之前，红军在欧洲对付着所有的德国军队，并一直在与1945年的希特勒军队进行着较量。因此，作为“欧洲的真正解放者”以及“人类文明的保护者”，苏联在战后有更大的发言权，否则，“欧洲将不会有安定和持久的和平”。^②

中共对波兰问题的评价不只是公开表示对莫斯科的忠诚，这也反映出党的领导人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英美军队到中国打日本人时，他们将支

^① 关于这一点的进一步讨论见盛慕真前引文，《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1982年第10卷，第155-156页。

^② 见《解放日报》1945年1月15日、1月16日、1月17日、1月18日、1月19日、1月20日、1月21日、1月22日和1月23日。

持国民党反对中共,正如他们支持波兰的流亡政府那样。当英国斯科比将军在希腊反对希腊共产党时,毛便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美国人到中国后也会这么做。^①因此,毛及其同事对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寄予了很大希望。毛清楚地认为,苏联人到中国后将会支持中共的事业。

毛对战后国民党与美国结盟以及中共与苏联结盟的看法并不是不正确。其实,当时华盛顿的决策者也持这种观点。例如,1945年哈里曼告诉罗斯福,“必须想到苏联人将在北方支持共产党并把红军解放了的中国领土交给中共管理。那时,这种局面对蒋来说将会越来越困难”。罗斯福对此表示怀疑,他让赫尔利告诉蒋介石,让他在苏联人回到远东地区之前解决他与中共之间的问题。罗斯福对赫尔利说:“现在我不能告诉你更多了,但是他(蒋)必须相信我的话。你可以对他强调‘俄国人’这个词。”^②

相比之下,斯大林与毛之间的联系不必像罗斯福和蒋之间的联系那样微妙,因为斯大林与毛之间的关系是极其秘密的,这一点直到近几年才被人知晓。在罗斯福向蒋传递信息的时候,毛已经通过电台与斯大林保持了18年的联系。毛将中共的每一次重要决定都报告给莫斯科,并且紧跟斯大林的政策。反过来,斯大林注意到毛需要得到自主,他向毛提出的建议都是一般性的,不具威胁性,并留有余地让毛作出具体的政策决断。^③1945年初,毛试图在华盛顿与重庆之间找出“矛盾”,但他的企图失败了。于是他认为赫尔利“支持蒋反对共产主义”的反动政策代表了美国政府。到这时,毛认为美国军队已不再是关键问题了,因为斯大林告诉他苏联人正在返回亚洲太平洋地区。

1945年8月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与罗斯福和丘吉尔握手之前,给毛发了一封电报,通知他即将举行首脑会议。斯大林还让毛知道,欧洲战场战争结束以后,红军将很快转入远东。这正是毛想听的消息,毛立即于8月10日电告周恩来,周当时正在重庆参加赫尔利调停的国共谈判。毛告诉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细节见盛慕真前引文,《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1984年第10卷。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中国卷,第108页。

③ 关于1945年以来毛与斯大林之间秘密的电报联系以及毛建立这样一个联系渠道的努力的进一步情况见盛慕真前引文,《中国季刊》1984年第1期。

周，“红军正在逼近柏林，这鼓舞着全世界的人民和进步党派。苏联参与远东战场的可能性也增大了。在这种情况下，美蒋已开始急于对我们作出政治上的妥协”。但此刻毛不想同美蒋取得政治上的和解，他将周召回延安。^①两天以后，毛又致电周，称目前美国政策是“扶蒋，拉共，打日本”，惟有苏联真正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②后来，毛选定 苑月 源日这个日子宣布“靠这几支生了锈的破枪，我能打败日本人，也能打败美国人”^③。显然，抗日战争结束以前毛就预见到在战后分裂的世界中将出现一个分裂的中国，其主要特征是苏联—中共与美国—国民党之间的抗衡。

毛泽东适应斯大林的政策：1945年 愿- 怨月

日本战败后形势的发展证实了毛对战后结盟情况的看法。愿月 怨日在长崎爆炸了第二颗原子弹，斯大林命令红军立即进入满洲。同日，中共的《解放日报》刊登文章，描述了原子弹可怕的能量，称其“在战争的技术方面具有革命性意义”。毛对如此宣传美国的原子弹感到不悦。他召集宣传干部，教育他们不应“夸大原子弹的能量和作用”。几天后，毛又提起此事，说苏联参加战争的“政治意义”是历史性的，是“不可估量的”，而“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试图通过对两颗原子弹的夸张来削弱红军的政治影响，不能这么做！”^④在毛看来，强调原子弹将引起人们对美国军事力量的惧怕心理，从而使人们丧失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勇气。正如苏联在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作为解放者应该决定那里被解放的领土的未来一样，在战后的远东拥有最终发言权的也是苏联而不是美国。正像哈里曼预料的那样，毛期望斯大林支持他的革命事业并把苏联解放的领土交给中共。

与此同时，毛也担心美国人会支持国民党反对苏联支持的中共。在愿

① 关于 苑月 怨日毛电报的进一步讨论见盛慕真前引文，《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1987年第 10卷，153-154页。

② 《周恩来年谱》，194-19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③ 王剑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14卷，197页，香港，1988。

④ 《毛泽东年谱》第 10卷，157-1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毛泽东军事文选》第 14卷，158-15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月怨日的一次会议上,毛说红军在远东地区的出现将使美国的对华政策有所改变,“不过可以肯定,美国会站在蒋介石一边。这样,对付美蒋对我们来说将是一个长期问题。随着日本的战败,一场国内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①。面对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毛需要苏联的支持,他迅速采取了行动。愿月愿日,他发电报给南方的将领:“苏联已参加了战争,日本已投降。一场国内战争在即。考虑到你们的情况,你们不能夺取大城市,不过,你们可利用有利形势扩大你们的地盘,夺取武器,占领小城市。你们应动员群众,为国内战争作准备。”^②在中共领导人看来,南方是传统的英美势力范围,美国人极有可能代表国民党出现在那里。^③

在由俄国人控制而中共力量强大的北方,毛的计划更加雄心勃勃。愿月愿日,毛命令北方将领们尽力消灭内蒙古的国民党军队,然后北上迎接外蒙军队以及红军。同日,他还命令万毅的满洲部队开进东北,与在那里的苏联人会师。愿月愿日,他又致电北方将领们,一周内将派愿愿名干部到满洲,同去的还有林枫的部队。^④在内蒙古和满洲以外,毛命令停止游击战战略,将所有的中共武装力量重整为团、旅、师,扩大中共的领土范围,并夺取华北和中原的主要城市,如北京、天津、太原、南京、上海及沿线铁路。^⑤

毛的雄心勃勃的军事计划是建立在对中共与国民党军事力量对比的错误估计的基础之上的。当时中共军事力量很弱,难以控制主要城市和铁路。例如,愿愿年愿月中共在南满很快就被国民党打败,这时中共的部队

① 《毛泽东年谱》第愿卷,愿愿-愿愿页。

② 《毛泽东年谱》第猿卷,愿页。

③ 从愿愿年夏季以来,中共认为美国人很可能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登陆。愿愿年猿月,周恩来给中共南方领导人林平发电,指示他准备美国可能以斯科比的形式介入。见盛慕真前引文,《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愿愿年第愿卷,愿猿-愿猿页。

④ 《毛泽东年谱》第愿卷,愿页;第猿卷,猿愿页。

⑤ 见毛愿愿年愿月愿日起草的中共决议、愿月愿日和愿日毛的电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猿卷,愿-猿猿-猿源-猿源页;《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缘苑-缘愿页,北京,知识出版社,愿愿;张益民:《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我党战略的变化》,《党史研究》愿愿(员);徐焰:《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我党战略的发展》,《党史研究资料》第苑卷,愿-愿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愿愿。

已接受了苏联的大量帮助。毛低估敌人的力量是常有的事，毛之所以采取大胆的军事行动，还有其他原因。毛肯定估计到斯大林会在满洲和内蒙重复“波兰的解决方式”，会支持中共控制中国北半部。

在这方面，毛不是惟一持此观点的人。蒋也很担心斯大林会支持中共而把中国北方变成远东的波兰。对于斯大林来说，执行《雅尔塔协定》的关键就是使得中国政府签署一个双边条约。中苏谈判于7月初开始，不久便在外蒙问题上陷入僵局。接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于7月21日致电蒋，询问如果斯大林坚持外蒙独立，是否应结束谈判。7月28日，蒋告诉宋，如果斯大林同意以下三个条件的话，上述问题有商量余地，其中一个条件是国民党政府要完全控制中共的军事和行政区域。次日，蒋两次致电宋，重申这一立场。^① 如果斯大林同意削弱中共力量，蒋愿意将外蒙拱手相让。蒋意识到，如果斯大林想要像在波兰那样在蒙古和中国北方支持一个“友好政权”的话，他不需要从莫斯科派人到这些地方，正如他在波兰建立卢布林政府一样：毛及其将领们已在那里了。蒋不希望在中国北方出现“波兰问题的解决方式”，他不可能像波兰流亡政府那样采取顽固而强硬的行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于8月14日签署，蒋于当日致电毛，邀请他到重庆进行谈判。蒋肯定认为斯大林将建议毛向蒋的国民党政府妥协。^②

然而，毛及其同事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看法与西方流行的解释大相径庭。8月14日，赴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主要成员王若飞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对即将开始的重庆—莫斯科谈判的结果发表了中共的看法。他说这一谈判将反映美国和苏联在中国的利益，因此，这不是一次支持中共反

① 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3部分第4卷，255—256页。

② 一些学者相信《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激怒了毛，因为它“破坏了毛1945年广为传播的声明：革命胜利后外蒙古将成为中国联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确定的伙伴》，27页）。他们似乎认为毛在1945年仍然是蒋的民族国家的叛逆者，他的民族主义情绪比蒋还要强烈。他们没有注意到，当毛1945年对一个美国人斯诺公开发表这个声明时，他正在秘密地与斯大林着手建立一个苏联支持的与外蒙古相连的西北军事基地，毛期望从这里得到苏联的军事物资。总的说来，不能把毛对公众的声明与事实本身等量齐观。对于1945年代毛与斯大林关系的进一步说明见盛慕真前引文，《中国季刊》1985年第1期。

对国民党的谈判。因而,中共不该再希望苏联会给中共提供“直接的支持”以反对国民党。王谈到中共党员中有一种普遍认识,认为红军出现在远东后将会以直接而有力的方式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的斗争。那么,中共曾希望的“直接支持”的形式究竟是什么呢?是像英国人在希腊的行为那样让红军直接参与中国内战呢?还是将红军解放了的地区以及日本武器交给中共,以便在中国北部建立一个对苏“友好”的独立政权?王没有,也许是不能详细说明中共不应该再寄予什么希望,以及应该抱有什么希望。不过,他提出了两个中共想当然的观点:第一,苏联不会允许美国支持的国民党统治的“法西斯中国”出现在战后的亚洲;第二,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不会签署一个阻碍中国革命的条约。毛同意王的观点,他相信苏联在中国的出现至少将会阻止美国完全站在国民党一边反对中共。^①毛及其同事完全理解苏联支持的确切形式将会在中共—苏联与国民党—美国抗衡的游戏中表现出来。

由于中国相信斯大林不会允许亲美的国民党在中国得势,所以认为他会在必要时以某种形式来帮助中共。毛也理解,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领导人,斯大林虽然不会明目张胆地代表中共行事,但他肯定会支持中共的革命,刚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会改变斯大林政策的基本方向。毛根据经验知道,如果莫斯科与蒋政府之间的官方国家关系在1945年代没有阻止斯大林在中国西北扶持一个反政府政权的话,那么这个条约也不会“阻碍”中共的革命,这只不过是斯大林的又一个外交行动而已。事实上,1945年8月14日这个条约签订后,毛不仅拒绝了蒋的谈判邀请,而且他的军事计划变得更加积极,特别是计划夺取国民党的老巢上海。

1945年8月14日,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共秘密部队进入上海准备一场起义。不过当天,中共任命的市长张志毅(音译)向党中央报告,除非组织一次军事行动袭击上海,否则,一场内部起义成功的可能性极小。那时,原在上海的汪伪军队已投向了蒋介石政府,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于1945年8月15日发布第1号命令,指示日军只向国民党政府投降。如此一来,上海的中共力量在

^① 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194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人数上和武器装备上便远不如国民党了。但是，毛无视这种形势，驳回了张的意见。愿月 圆日，他批准了中原局送交的起义计划，命令不必等待新四军的主力到达，立即发动武装起义，占领上海。同时，毛还命令北方的将领们准备立即夺取北平和天津。^① 如果毛的命令得以执行的话，中共将遭受极大的损失。

诸如此类的盲目军事行动似乎不合乎毛平常的行为模式。为什么毛在没有充分准备和足够力量的情况下要急于夺取上海？上海是国民党的老巢，是英美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考虑到这一事实，是否有可能是毛试图与美蒋正面对峙以使苏联为中共的利益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呢？无论如何，斯大林不同意毛的军事计划并于愿月 圆日发电报给毛。斯大林说，如果中国出现内战，那么这个国家将被毁灭。毛显然已向斯大林通报了他的军事计划，自 员年年以来毛一直这样做。这不符合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他要毛停止行动。据说毛很生气，后来他抱怨说斯大林不让他“进行革命”。毛曾希望得到苏联的“直接帮助”，现在不难想像毛收到斯大林的电报后该是多么失望。但是，毛仍然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在下达上海举行起义的命令后不到 圆小时，毛于 圆日连发两封电报要求停止行动。同时，毛对蒋的谈判邀请的态度也有所改变。愿月 圆日，他答复蒋，说他将派周恩来到重庆。接着，斯大林致电毛说，由于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渴望和平，毛应该赴重庆与蒋谈判，而美国和苏联将保证毛的安全。如果毛拒绝谈判，那么内战爆发的话，中共会将受到指责，这将对中共不利。愿月 圆日，毛致电蒋，表示他将亲赴重庆谈判。^②

接到斯大林建议后，毛不仅立即改变了其军事计划，而且还开始形成了对战后世界格局以及中国在其中地位的一种理论上的认识。愿月 圆日，毛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苏联、美国及英国都渴望和平，反对中国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肯定会避免……如果苏联支持我

^① 《上海大事记》缘苑- 远苑页；张益民前引文；徐焰前引文；《毛泽东年谱》第猿卷，愿- 怨页。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猿苑- 猿愿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员年；《上海大事记》，远苑页；《毛泽东年谱》第猿卷，愿- 员页。

们,美国肯定会支持蒋,那么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毛还说,在中国,苏联反对美国的斗争应有所限制。“由于要维持和平以及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苏联不能帮助我们。”因而,中共不能夺取主要城市。毛不情愿地说,“我们要面对这个事实”。他建议中共应提出一个新的政治口号:“争取和平、民主和团结。”^①

读毛的讲话,有两点是很清楚的:第一,毛的夺取主要城市以及在内战中打击国民党的军事计划至少部分地是建立在斯大林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帮助他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因此,在收到斯大林的第一封电报时,他就意识到他对红军的大力而“直接的支持”和“波兰问题的解决方式”寄予了过高的希望。无论从感情上讲毛多么失望,他依然对斯大林言听计从。其次,毛不仅根据斯大林的观点改变了自己的政策,而且还试图在战后美国—国民党与苏联—中共抗衡的框架里合理地解释斯大林的政策。毛明白,苏联在面对另一个武装冲突之前需要喘息的机会,因而,斯大林要与西方大国之间保持现状,并且巩固苏联的势力范围。中国不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对毛来说,这是不幸的。毛在愿月圆日的同一个会议上讲,苏联在保加利亚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支持共产党,而在希腊却非如此,这只是因为希腊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他把中国比喻成亚洲的希腊,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斯大林不能公开支持中共。斯大林所能努力的最大限度是力争扩大在满洲和外蒙的势力,以阻挠美国势力侵入北方。^②

毛并没有就此停止,他继续按照自己对斯大林战略思想的理解去执行他的政策。愿月远日,在另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说,表面上看解决中国国内问题的应该是中国人,而实际上是三个大国的介入。“红军不越过长城,而美国不在中国登陆”,这就是毛对自己所相信的苏美在中国维持现状的心照不宣的理解。据此,毛制定了一个三个阶段的军事战略:根据形势,中共首先放弃湖南至广东这一地区;其次放弃长江以南的根据地;最后放

① 《毛泽东年谱》第猿卷,愿- 愿页;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取东北的战略演变与苏联》,《中共党史研究》愿愿年专刊,愿- 猿页。

② 《毛泽东年谱》第猿卷,愿- 愿页;杨奎松:《中国共产党夺取东北的战略演变与苏联》,《中共党史研究》愿愿年专刊,愿- 猿页。

弃长江以北的新四军根据地。但是，中共应力争陇海铁路和外蒙之间的地区。^①毛相信，虽说中国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但满洲和蒙古例外。因此，斯大林肯定会支持那些地区的中共，以建立一个对苏友好的政权。他感到，鉴于条约的存在，应弄清斯大林是否会允许中共军队进入满洲。但是毫无疑问，斯大林会欢迎中共干部去东北。同一天，他命令由 1000 名干部组成的一支部队马上奔赴满洲。^②毛很快就发现斯大林要他在满洲做得更多，以确保满洲掌握在一支友好的中国军队的手中。

毛泽东与斯大林在满洲的合作

斯大林明白，“这场战争与以往的有所不同。谁的军队到达了那里，谁就在他占领的土地上实行自己的社会制度”^③。东北被红军占领后，斯大林也没例外。虽然斯大林与他认为是美国走狗的蒋在国家关系方面达成了协议，但他还是指示他在远东的将领们秘密地支持中共。第一个到满洲活动的中共小组实际上就是由红军从苏联带回来的。1945 年在这里的中共抵抗力量被日本打败后，他们撤退到西伯利亚，组成了红军的第 100 旅，领导人是周保中及其他受过训练会说中文的苏联军官。1945 年 8 月 15 日，红军指挥官指示周保中，第 100 旅返回满洲以后，应作好应付三种可能出现的局面的准备：第一，中共主力部队进入该地区，这样，该旅的任务就是为他们的到来作准备；第二，红军主力可能被挡在满洲以外，而国民党可能占领该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第 100 旅要作好进行持久游击战的准备；第三，如果形势恶化，该旅应返回苏联。为了得到保护，他们每个人都有双重身份：中国抵抗力量军官和红军军官。一旦有人陷入中国政府手中，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外交麻烦，他们都使用军官证上的假名。例如，周保中成了黄少原（音译）。他们被分派到满洲的 100 多个地方，任命为城市卫戍部队的指挥官和行政长官等。8 月 15 日，红军的飞机把后来的中共空军司令刘

① 《毛泽东年谱》第 3 卷，154—155 页。

② 《毛泽东年谱》第 3 卷，154—155 页。

③ 米洛凡·吉拉斯：《与斯大林的谈话》，150 页，纽约，1955 年。

亚楼送到哈尔滨接收原满洲国的电台，把它变成了该地区第一个中共广播电台。一旦中共主力部队抵达满洲，第 88 旅成员及其组织将完全并入中共东北局领导的体系。^①

如果说毛在 8 月 14 日还对斯大林是否允许中共军队进入满洲的态度不很肯定的话，那么这一点在两天后便得到了澄清。8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发出命令，要等待进入满洲的中共干部和军队迅速起程。军队要使用东北地方军队或抗日军队的名义加以伪装，并占领没有红军出现的农村。命令说，只要中共在满洲的行动不给苏联带来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有规定的外交上的麻烦，“苏联将会采取放任态度，并给中共以极大同情”^②。毛在重庆时刘少奇担任党的代主席，他在一次会议上说：“苏联人是红军，我们也是红军，他们是共产党，我们也是共产党。”^③ 中共在满洲的经历证明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

8 月 14 日，曾克林指挥的一支中共部队前进到通向满洲大门的山海关。当日军拒绝向曾的部队投降时，附近的红军帮助曾采取行动夺取了该城。接着，红军让曾的部队乘火车北上。当他们到达满洲南部的城市锦州时，苏联人允许他们留下一支部队占领这个城市，曾的副手任卫戍部队指挥官。其余部队于 8 月 16 日抵达沈阳，那里的苏联人让他们在市府大楼建立了总部。两天后，苏联占领军当局邀请曾和他的同志共进晚餐。苏联人告诉他们，鉴于苏联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共军队不应使用众所周知的“八路军”这一名称。曾决定将其部队重新命名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来，红军发布命令允许曾的部队在苏联人的直接帮助下夺取这个

① 丁晓春：《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第 1 卷，84 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年。
王明贵：《东北抗联人员去苏联整训的经历》，载《军史资料》1983(6)，第 1 页；彭实路（音译）：《在东北抗日联军的一段回忆：苏联北野营的五年》，载《军史资料》1983(6)，第 1 页。
一些学者认为斯大林密谋利用第 88 旅建立一个独立的满洲，而毛泽东对斯大林侵犯中国领土完整的企图表示不满。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 卷，104 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年。

③ 朱元石：《刘少奇与抗日战争结束后东北的斗争》，载《近代史研究》1985(3)，第 1 页。

地区的其他一些地方。曾成为沈阳卫戍部队司令，同时成立了“人民自治政府”。在以后两个月里，曾原来的**源**部队增至**通**人，并装备有苏联人送的**猿**架日本飞机。^①

与此同时，从山东跨过渤海海峡而来的中共部队也在大连地区得到苏联当局的欢迎和协作。好消息很快就传到延安，中央于 9 月 15 日决定再从山东派 **猿** 人的军队到满洲，随后再从华北和延安地区派部队进入满洲。为了阻止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调动，中共还在通往满洲的铁路沿线开始进行战斗准备。9 月 15 日，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派代表在曾克林的陪同下前往延安。在公开的会议上，这位苏联上校转达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正式意见，即苏联撤离之前，中共军队不能开进满洲，而且已进驻满洲主要城市的中共军队应该撤出来。但是在私下的会议上，这位上校表示红军将支持中共以地方武装力量名义进行的活动。他还鼓励中共派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小组到满洲，以便更有效地协调中共与苏联之间的合作。为此，中共中央成立了包括政治局 **猿** 委员在内的东北局，这在中共党内及文件中被戏称为“小政治局”。当时在场的东北局成员于黎明前搭乘苏联飞机，与苏联上校一同飞赴满洲。^②

就在第二天，延安得到了更多的好消息。红军当局通过中共晋察冀无线电发报台敦促中共尽快进入内蒙和满洲，红军将在那里支持中共的军事行动。苏联方面表示，如果需要，中共军队也可撤退到外蒙。苏联人建议，中共的整体战略是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北方，必要时可放弃南方根据地，与此同时，苏联驻重庆大使建议中共确保守住张家口—古北口—山海

① 曾克林：《收复土地 进军东北回忆》，载《人物》**猿** 卷 1 页。

② 杨奎松前引文，曾克林前引文。根据笔者对知情的中共军事历史专家的采访，苏联代表所作的公开声明是为了应付迪克西使团中的美国人。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新成立的东北局成员在黎明前便进入了苏联飞机的座舱。有些学者强调红军代表的确实要求中共军队撤退，甚至宣称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苏联人将使用坦克驱赶他们。然而，这些学者没有注意或者宁愿忽视这样的事实：东北局在一夜之间便成立了，并且乘同一架苏联飞机前往满洲，在以后的两个月里成千上万的中共军队涌入满洲。如见布莱恩·默里：《断大林、冷战与中国的分裂》，载《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工作报告》**猿** 卷 1 页。

关一线,以阻止国民党进入满洲。^①现在斯大林使毛明白了,在 8 月红军如期撤离满洲之前他将全力以赴支持中共夺取满洲的行动,但是在方式上要有所隐蔽。

毛及其同志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采取了迅速而大胆的行动。8 月 20 日,他们决定从山东调 15 万军队到满洲,并派新四军主力北上守住通往满洲的道路。一个新的军事战略形成了:夺取东北,控制热河和察哈尔;在北方采取攻势,而在南方则采取守势。毛说,一旦中共控制了东北、热河和察哈尔,“就没什么可怕的了”^②。这个在苏联鼓动下开进满洲的战略实施得相当成功,中共集中力量以最快速度开进满洲。截至 8 月底,中共在满洲的军事力量已达到 15 万人,另外还有 3 万名文职干部。^③

但是,延安对中共军队开赴满洲的速度仍然感到不满意,尤其是在美国人开始用军舰和飞机把国民党军队从西南运到华北一带时。8 月 28 日,刘少奇致电东北局:美军将在天津和大连登陆,并把蒋的部队送往天津、北平和东北。因此东北局急需调山东的中共军队和干部到满洲,否则,中共将失去在东北的有利地位。^④8 月 28 日和 29 日,刘再次致电山东和满洲的中共领导人,敦促他们在 5 天内通过渤海湾把 15 万山东部队派到满洲。他警告说,美国海军有可能进行干涉,但他强调即使美国海军巡逻艇出现,也不得耽误这次行动。^⑤8 月 30 日,美国海军舰船抵达塘沽,这对中共是不祥之兆。当天,刘少奇再次致电在东北的领导人。他措辞严厉地命令 15 万山东部队迅速开赴满洲。^⑥延安意识到中共在与国民党赛跑,而时间起着决定性作用。

国民党和美国也认识到这一点。8 月初,蒋请美国资助舰船、飞机,以

① 杨奎松前引文。

② 《毛泽东年谱》第 3 卷 151-152 页。

③ 袁伟(音译):《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大野战部队发展实录》,153-154 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④ 见朱元石前引文,152-153 页。

⑤ 见朱元石前引文,152-153 页。

⑥ 《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15 页,朱元石前引文。

便把正在广东的部队运到大连。蒋介石通过迪安·艾奇逊把这一要求传达给杜鲁门总统。宋子文特使告诉国务卿：“根据目前的情况，中国军队要到8月才能被送到满洲，这显然太晚……如果国民政府的军队不进入满洲……中共军队极可能进入这一地区。”^① 杜鲁门总统迅速采取了行动。8月18日，他通知艾奇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保证“在中国军队准备向满洲开拔之日提供足够的运输工具”^②。

美国的军舰、飞机与共产党人的双脚之间展开了一场竞赛。后者显然处于不利地位。比如，黄克诚指挥的新四军第三师于8月18日接到开赴满洲的命令，而其时该师还驻在江苏。这个狭路无人的师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穿过七个省，最后当他们到达那里时，不仅精疲力竭，而且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军队在南满的力量远远大于中共。^③

斯大林很了解毛与美蒋竞赛中的问题，愿意助中共一臂之力。美国人明目张胆地支持国民党，苏联人则暗中支持中共，并且苏联的支持变得越来越强有力。8月底之前，中共的政策十分谨慎。延安命其军队只夺取邻近蒙古、苏联和北朝鲜的边远地区，等待适当时机夺取主要城市和铁路线所在地的满洲南部和中部。中共在8月18日的指示中表示，中共主力应分散部署，以夺取农村，而不应集中在满洲南部挡住国民党进入满洲的通道。^④ 这种小心翼翼的态度于9月初开始改变。

莫斯科在通知重庆红军即将撤出满洲时，苏联在远东的当局则鼓励中共夺取这一整个地区。美国军舰于8月18日到达华北这一消息显然激怒了苏联人。美军出现在满洲的大门口，这使莫斯科对撤出红军并由国民党占领这一地区感到不安。为了与美蒋抗衡，苏联人建议中共在南满部署5万至10万人的部队，“以守住大门”。他们还明确向东北局表示，中共应放弃原来的谨慎方针，大胆行动以夺取整个满洲，苏联人甚至许诺，在

① 1945年8月18日艾奇逊致杜鲁门，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27卷，1500页。

② 1945年8月18日艾奇逊致杜鲁门，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27卷，1500页。

③ 黄克诚：《从苏北到东北》，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12）卷，150页；另见罗荣桓同志谈东北解放战争》载《军事史林》1982年（12）卷，150页。

④ 1945年8月18日中央军委给东北局的命令，中央档案馆；《毛泽东年谱》第27卷，150页。

8月 15日以前,如果国民党向在满洲的中共发起进攻的话,红军将直接与国民党交战。^①在苏联人看来,中共控制满洲定会为他们在远东地区提供一重要的战略据点,而如果国民党控制这一地区,将使该地区成为威胁苏联在亚洲安全的敌对势力的一个前哨。因此,苏联人建议中共派至少 10万主力部队到满洲,即使失去华中和华北也在所不惜。他们认为,由于有发达的工业基础以及友好邻邦,如北朝鲜、外蒙以及苏联,满洲会成为中共理想的根据地。如果中共能守住满洲,那么以后它就能夺取整个中国。由于苏联人的鼓舞,毛于 8月 15日发布命令,放弃原来的谨慎方针。主力部队应集中在满洲南部和中部,即锦州、营口和沈阳地区,干净、彻底地消灭进入满洲的一切国民党军队。毛的新的目标是“独占东北”^②。

然而,按照延安最乐观的估计,8月底以前只有 15万兵力能到达满洲,还有 10万兵力准备开始奔赴东北。这与美国用飞机、军舰向这一地区运送国民党军队的速度是无法相比的。于是,延安建议红军推迟一个半月撤离东北,并在 8月底以前不许国民党军队进入满洲。毛发电给东北局:“请我们的朋友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满洲。”^③苏联人接受了毛的请求。

8月初,大批国民党军队乘美国军船抵达大连,但苏联在满洲的军事当局拒绝他们登陆。8月 15日,苏联驻重庆大使通知国民党政府,苏联拒绝中国军队在大连登陆。国民党与苏联在满洲的军事当局开始谈判,但未达成协议。8月底,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通知国民党,说苏联不反对中国军队在满洲的某些港口如葫芦岛和营口登陆,在这些港口红军将保证中国军队安全登陆。但当美国人和国民党军队到达那里时,这两个港口已被中共占领,中共拒绝他们进入。现在我们知道,在美国军舰到达营口和葫芦岛之前,中共向苏联驻满洲军事当局建议由中共夺取这两个港口,苏联人

① 杨奎松前引文。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3 卷 270 页。

③ 鲍里索夫:《苏联与满洲革命根据地》,1945 年,莫斯科,1946 年。最近中共的出版物承认了这一点。如徐焰说:“由于我们党的要求,苏联拒绝国民党部队在大连登陆,理由是大连是一个商业港口。”[《历史教学》1992(12),15 页。]

同意了。^① 国民党最后不得不放弃在满洲各港口的登陆。他们只能在满洲以外的小港口秦皇岛登陆，这一港口自 1945 年底始已被美海军控制。^② 在同一时期，苏联人公开表示国民党可以使用美国飞机将军队运到长春和沈阳，而他们暗中则鼓励中共夺取机场附近地区。这使美国飞机不可能在此降落。^③

苏联人还向中共提供了大量的日本武器，从而使中共的军事力量发生了剧烈变化。1945 年初，苏联驻满洲当局正式通知中共东北局，将 200 万日本关东军的全部武器送给中共。^④ 虽然还没有材料说明中共收到这批武器的实际数目，但很明显，从那时起，缺少武器已不再是困扰中共的主要问题。事实上，中共非常乐观，以至于通知内地军队在向满洲开拔之前将武器留给地方武装力量。他们得到保证，抵达满洲后会得到更好的武器。^⑤ 到 1945 年年底，中共在满洲的兵力已达到 100 万多人，分为 10 个军区，有些军区还拥有炮兵旅或团。此外，在 1945 年年底，中共在满洲还库存许多战争物资，以便扩大军事力量，当中共被迫撤出主要城市时，他们还专门将这些库存转移到安全地方。1946 年 1 月 20 日中共指令在冬季再组建一支 100 万人的野战部队和 100 万人的地方部队。这表明中共在满洲的武器还可以装备至少 100 万人的部队。到 1946 年 1 月底，中共在满洲的兵力达到 100 万人。^⑥ 如果没有苏联人提供的大批武器，中共在满洲的军事力量不可能发展得如此迅速。鲍里索夫完全有理由宣称“苏联军队把缴获的日本武器

① 杨奎松前引文。

② 1945 年 12 月 15 日罗伯逊致国务卿，《美国对外关系》1945 年第 17 卷，150-151 页，费斯前引书，150-151 页。

③ 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 17 卷第 1 部分，151-152 页。

④ 徐焰前引文，载《历史教学》1985（10），151-152 页，杨奎松前引文。

⑤ 见罗和黄的回忆。

⑥ 《肖劲光回忆录》151-152 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 年。另见袁伟前引书，151-152 页。这是在中共与国民党大规模军事冲突以前，那时中共还没有从战败的国民党军队那里得到武器。事实上，中共武装力量如此迅速的扩展致使军队素质受到严重破坏。据中共自己的估计，到 1945 年年底，新扩展的中共军队中有 100 万人逃跑并当了“土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共在 1946 年 1 月发动了整顿军队纪律的大规模运动。见袁伟前引书，151-152 页；《陈云选集》151-152 页。

提供给人民军队后,它的战斗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①。

此外,国民党驻满洲的机构还遭到苏联和中共军队的骚扰。例如,1945年10月10日,苏联部队搜查了国民党驻长春的吉林省部,拿走了所有文件,并进行审问。苏联当局坚持要审查所有国民党的出版物,要求国民党机构停止其活动,苏联人甚至不许国民党东北总部的工作人员去热河购买冬装。国民党总部的电话线也被共产党切断了。^②毛在1945年10月给彭真的信中承认:“由于老大哥的帮助和我党在满洲的发展,蒋介石军队不能顺利地在满洲前进,也无法接受那里的政权。”^③

由于莫斯科的支持,毛变得愈加雄心勃勃,胆子也更大了。他不仅要独占东北,而且还要控制华北和华中大部分地区。他甚至还打算把中共控制的满洲和华北变成“自治区域”。在1945年10月10日打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毛透露了自己的计划:

蒋已组织 100 万军队向我华北、华中进攻及准备进攻东北,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远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才有可能过渡到和平局面,否则和平是不可能的。^④

第二天及 10 月 11 日,毛两次致电周,重申他关于中共在满洲和华北实现自治的方案。他宣称,根据孙中山的地方自治原则,中央政府无权向满洲和华北派遣官吏,已经派遣的须取消。毛还说,“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治安,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显然,由于苏联的支持,毛要在满洲和华北成立一个中共自治政府以反对国民党中央政

① 鲍里索夫前引书,195页。

② 姚松林(音译)编:《张公权年谱》,引自《传记文学》第 28 卷第 3 期,197页。张的日记现已出版,书名是《在满洲的最后机会》(斯坦福,1983)。

③ 鲍里索夫前引书,195页。

④ 《毛泽东年谱》第 3 卷,194-195页。

府。^①

毛泽东再次调整政策以适应斯大林的变化

为了使满洲和华北控制在自治政府之下，毛需要在军事力量上与国民党相比占有优势，但中共的军事力量远不如国民党军队。中共在军事上失败以后，斯大林不可能介入与美国支持的中国政府的冲突。当中共在军事上退却之时，斯大林不得不在外交上退却。于是，在满洲的苏联人采取了与国民党更加合作的态度，要求中共将主要城市及铁路交给政府军。毛不得不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他做得很出色。

美国装备并帮助输送的国民党军队在秦皇岛登陆后，毛感到十分惊讶，10月1日，他起草一个命令，要求中共的主要军事行动在10月份集中于东北，林彪部队应在葫芦岛—锦州—营口一线阻挡国民党军队，并等待更多部队的到来，然后在南满组织一次大规模战役，消灭那里的国民党军队。^②次日，毛致电东北局：“为了建立和巩固（在东北的）主要根据地，我们务必要将（这一地区）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起来，以便在这场具有战略性决定意义的战役中取得胜利。”^③由于有苏联的支持，毛对自己的计划很有信心。10月1日，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在10月份消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那么在得到巩固后，（我们）就能消灭一切进攻的敌军，并控制整个东北。”^④

10月1日，毛致电林彪、彭真，对参战部队的战略部署作了详细指示。毛称，中共可在南满集结 70 万兵力，这些部队可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几

① 《毛泽东年谱》第 3 卷 128—129 页。毛关于在满洲和华北实现自治的主张对至今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这一观点认为斯大林企图以自治为名把满洲从中国分离出去，而毛作为一个中国民族主义领导人反对斯大林的阴谋。然而，从上面提到的文件看，有一点很清楚，如果满洲自治是一个阴谋，这也是毛的，而不是斯大林的。

② 《毛泽东年谱》第 3 卷 128—129 页。

③ 中央军委关于 10 月作战部署及指示电，1948 年 10 月 1 日，中央档案馆。

④ 中央军委指示电，1948 年 10 月 1 日，中央档案馆。

次大规模战役,中共可在每次战役中消灭国民党部队一个师。^①然而,毛的这种期望是毫不现实的。在毛发出命令的当天,国民党一个师对山海关发动了进攻。毛曾预计那里的中共军队能够守住并在向锦州撤退前消耗敌人,这样中共主力部队将在那里给敌军以致命的打击。但是驻守山海关的中共军队没能在阵地上坚守一天以上,10月10日,他们被迫撤退,山海关被国民党军队控制了。在随后的一个星期里,国民党军队向锦州推进了,中共无法阻止国民党军队的前进。^②

这一军事失败使中共领导人清醒过来。毛突然得了病,并到10月中旬一直卧病不起。^③10月10日,林彪建议,为了避免继续遭受损失,中共应暂时回避大规模战斗。计划中的锦州战役应该取消,同时中共军队应准备放弃锦州及其以北的铁路。10月15日,延安同意了林的建议。^④

斯大林屈于华盛顿和重庆的外交压力而改变了满洲政策,这使中共感到极为沮丧。10月15日,国民党政府命令其东北总部撤出这一地区,以反对苏联阻止国民党对该地区的占领以及对中共的暗中支持。^⑤重庆迅速将这一决定告诉华盛顿,并抱怨苏联人未能执行1945年《苏友好同盟条约》。^⑥这时,斯大林并不愿在满洲与美蒋形成全面对峙。在苏联人鼓励中共夺取满洲的时候,他们也提醒中共,在满洲“只能做,不能说”,特别是不能公开提倡满洲自治和向国民党政府夺取该地区的权利提出公开的挑战。如果中共这样做,“将为美蒋提供借口使苏联处于难堪的境地……而蒋介石将有借口邀请美国进攻中共”^⑦。很显然,莫斯科意识到国民党和美国控制满洲的危险,但它不愿在中国与美国直接对峙,也不愿

① 毛泽东:《关于内线作战方针》,《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100页;另见杨国庆(音译):《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100-101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② 毛泽东:《关于内线作战方针》,《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100页;另见杨国庆(音译):《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100-101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③ 当斯大林得知毛生病后,派去两名医生照顾毛,他们于1945年10月10日到达延安。毛在莫斯科学习的长子也同机到达。见师哲前引书及《毛泽东年谱》第3卷,100页。

④ 杨国庆前引文,100页;《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100页。

⑤ 《在满洲的最后机会》,100-101页。

⑥ 《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10卷,100页。

⑦ 引自东北局向延安报告与苏联代表会谈的电报,见杨奎松前引文。

明目张胆地推翻《雅尔塔协定》。斯大林在满洲对中共的支持是有限度的。

中共失败后，斯大林意识到中共还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夺取并守住满洲。为了保住《雅尔塔协定》中规定的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同时屈于美国和国民党的外交压力，斯大林采取了与国民党政府更加合作的态度，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1945年8月14日莫斯科通知蒋政府，说红军将推迟撤退以帮助国民党夺取这一地区。苏联人还允诺“铲除一切”针对满洲国民党当局的“骚扰活动”。^① 1945年8月15日，重庆表示，如果苏联人愿意帮助国民党向沈阳和长春空运部队以及在海上和陆地的运输，并解除满洲中共军队的武装，红军可以推迟一两个月撤离。1945年8月16日，莫斯科通知重庆，红军将保障国民党军队安全到达沈阳和长春。^②

1945年8月15日，苏联方面正式通知中共东北局，要求中共撤到主要城市及长春铁路地区100公里以外的地方。这些地区将交给中国中央政府，中共在这些地区不可与国民党军队交战。^③ 但苏联人很快又修改了他们对中共的限制：中共的武装力量只需撤到上述地区100公里以外的地方，而东北局以及其他中共机构依然可留下。苏联驻满洲当局甚至还支持1945年8月16日在长春召开“东北人民代表大会”。为了抗衡国民党在满洲增加兵力，苏联人继续从其根据地大连和北朝鲜向中共提供军需物资。^④

中共在感情上也许难以接受苏联的新政策，但很理解苏联采取这一行动的理由。1945年8月16日，延安给东北局发电，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并在1945年8月16日和17日对这一新战略作了详细说明：

（我们）必须把中心放在南满、北满、东满和西满，即放在沈阳至哈尔滨一线之长春路西侧的广大地区中，以中小城市及次要铁路为中心，背靠着苏联、朝鲜、外蒙、热河创造强大的根据地，面向长春路，在长春路及沈阳附近，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以便在苏军撤退时与国民

① 《在满洲的最后机会》，152-153页。

② 《在满洲的最后机会》，152-153页。

③ 《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152页。

④ 杨奎松前引文。

党争夺这些大城市。^①

1945年12月1日,在《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中,延安继续对斯大林的新行动以及中共的战略改变进行解释。指示说,“(战后)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指示还试图解释为什么苏联人要求对中共与苏联的合作进行保密,认为虽然美苏之间的斗争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在本质上是密切相关的,但有时有必要在形式上把它们分开。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扶蒋、打共、反苏”。但为了把美国对中国问题的卷入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苏联决定“在形式上与中共分开”。据此,中共应该“一方面要表现出中共与苏联无关,另一方面在中共反蒋的同时也要力争使美国保持中立”^②。

1945年12月1日东北局的一份文件明确表达了中共对满洲新形势的看法,文件说:

由于我党及武装力量在东北的发展,使蒋不能顺利进入满洲接收政权,美国政府已向苏联发动了外交攻势,中苏外交关系陷入危机。这是一场全球性斗争。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在外交斗争中稳定我们(中共与苏联)的地位……(我们)必须迅速和完全地撤出大城市,撤退到没有红军的地方,这样苏联在履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就没有任何困难了。这是战胜美蒋外交攻势,挫败美国介入中国内政阴谋的必要条件。^③

毛及其同志们把中共的利益与苏联的利益等同起来,因而愿意调整自己的政策以适应莫斯科的外交行动。1945年1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与美英妥协时,周恩来于1945年12月1日写到,没有迹象表明苏联和西方之间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虽然双方有冲突,但正在进行谈判,这样在未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195页。

②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171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195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195页。

来时期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将会是“打打谈谈”^①。基于这种理解,中共在头两个月里对马歇尔的使命予以积极合作。在马歇尔调停下,国民党与中共就停火、改组政府、统一军队问题达成协议。1945年7月,马歇尔使命的前途看来十分光明,于是他决定回华盛顿游说,争取美国对统一了的中国给以更多的支持。然而,当他8月份回到中国时,一切都变了,中共与国民党在满洲的军事冲突使其使命遭到失败。

毛从一开始就根本不信任马歇尔。1945年7月7日,国民党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成员包括两大党各一名代表以及马歇尔。这个三方委员会将负责签订停战协议,监督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中共担心马歇尔是亲蒋派,因而中共在三方委员会中将处于不利位置。于是,周建议苏联应加入该委员会。为使之更具代表性,中共还建议英国政府也加入委员会。毛在1945年7月10日和11日给周的电报中说:“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互相牵制来保持独立,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果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能做到英苏参加更好,如做不到只好让马歇尔单独参加。”^②但是,莫斯科认为延安这一建议缺少外交上的理由,因而不愿加入。这肯定证实了毛对战后势力范围划分的分析,即中国属于美国,就像希腊属于英国一样。

但是,毛明白,根据《雅尔塔协定》,满洲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1945年初苏联方面让中共向马歇尔建议,在国共谈判中应排除满洲,这更加使毛对此深信不疑。苏联人要求将满洲排除在马歇尔的调停之外,是因为他们不愿在这一地区看到美国的势力。既然满洲不在马歇尔的调停范围之内,那么中共相信苏联会主持另一个三方委员会,并充当“满洲的马歇尔”

① 《周恩来年谱》,227页;《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0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5年;章百家:《影响中共对美政策的三个因素》,提交1985年北京“当代中国与世界”会议论文。

②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5年7月10日、11日,中央档案馆;另见牛军前引书,102页。如果脱离上下文,这句话可能会被持“失去机会”论的学者用来证明毛像对待美国一样对待苏联,把它看成是一个更野蛮的“夷邦”。然而,联系上下文来看,毛企图让苏联参加调停是因为他不信任美国。正如我们多次看到的,在毛的眼中,外“夷”也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有一些是中共天然的朋友,有一些则是天然的敌人。

这一角色。如果苏联处于领导地位,延安就可以放心了。中共几次向莫斯科提出这一建议,但遭到苏联方面的拒绝。^①

当马歇尔对其使命的成功充满希望时,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恶化了,斯大林又改变了他在满洲的政策。而毛又一次服从了斯大林。同时,国民党试图让美国卷入这场冲突并站在自己一边。猿月 猿日,蒋告诉马歇尔说:“共产党支持共产主义生存理论,并支持苏俄政权。……目前满洲问题的结局取决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以及伊朗问题上对苏立场的强硬程度;任何一点软弱都将意味着把满洲从中华民族中分割出去。”^② 美国接受了蒋的意见,决心支持恢复国民党政府在满洲的地位。苏俄支持中共,美国支持国民党,国共之间在满洲的争夺成为亚洲冷战的中心。

斯大林 圆月 怨日发表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讲话,丘吉尔 猿月 缘日发表了“铁幕”讲话,从而加剧了冷战,在这种背景下,莫斯科同国民党的关系急剧恶化。圆月 圆日,大约有 员万名重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反对苏联在满洲的行为,中共在重庆的官方机构《新华日报》社和民主联盟的机构《民主报》社被破坏。中共和苏联将这一反苏反共事件归罪于周恩来所说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③ 另外,当红军撤出满洲一些地方后,留下的苏联公民和官员被殴打,有些人被打死。据马歇尔说,有 猿多名苏联公民在长春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拷打、残害和谋杀。于是,苏联人开始使用“法西斯蒋介石暴徒”之类的言语。^④

毛对满洲问题国际背景的复杂性非常清楚。他在 猿月 缘日给东北局的命令中说,苏联想在满洲进行经济上的合作,但到目前为止,美蒋予以拒绝,甚至还煽起全国性的反苏运动。苏联对此的反应是红军推迟了其撤离计划。毛说,当苏联与美蒋在满洲进行斗争的时候,中共与国民党达成妥协是不可能的。毛接着说,由于国民党的反苏运动,苏在满洲的红军可能会更愿意帮助中共,因此,东北局应利用这一形势,立即与‘辰兄’联系。毛

①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 1945年 1月 圆日、猿日,中央档案馆;另见牛军前引书, 圆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 1945年第 怨卷, 225-226页。

③ 《周恩来年谱》, 24页。

④ 鲍里索夫前引书, 24-25页;《马歇尔赴华使命》, 22页。

还要求尽快送他一份关于东北局与苏联当局开会的会议结果。^①

结果，这位“辰兄”采取了比毛预料的还要积极的合作态度。猿月愿日，一红军代表正式通知东北局，红军将撤出抚顺、鸡岭和沈阳地区，红军不会把这些地区交给国民党，中共可以采取行动。因此，在红军撤出时，中共进入并夺取了南满许多拥有坚实的工业基础的城市，如安东、本溪、辽阳、海城、抚顺和通化。^②

同一时期，美国军舰刚刚将另外缘支国民党军队送到满洲，并发起进攻，要夺取中共新近占领的地区。苏联方面对中共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批评中国同志对“美国人太客气”，以致不能阻挡国民党军队进入满洲。他们告诉东北局，中共可以在整个满洲，包括沈阳和四平在内，发起全面进攻，并牢牢掌握对长春以北地区的控制。毛接到苏联建议后，于猿月愿日指示东北局执行莫斯科指示，夺取长春铁路以东及北南满铁路沈阳以北的全部地区，即使引起“全面内战”也在所不惜。^③毛在猿月愿日的一项命令中强调：“我们要在心理上作好（与国民党）决裂的准备，不要害怕一场内战。”^④猿月愿日毛指示：“我党的政策是利用所有力量控制长春、哈尔滨以及整个长春铁路。不管代价多大，我们必须阻止蒋介石的部队占领这两个城市和铁路。”^⑤毛源月愿日致电林彪，命令调更多部队到四平。最后，愿万中共军队集结在四平前线。毛发誓，必要时“（我们）准备把长春变成中国的马德里”^⑥。当国共之间大规模冲突在长春地区爆发时，内战便开始了，马歇尔的使命也随之破产了。在内战的第一个阶段，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队占有优势，将中共驱逐到中心城市以外的地区。但由于得到苏联从友好邻邦如外蒙、北朝鲜以及苏联控制的大连地区给予的支持，中共设法扭转了局势，满洲成为中共据点。毛在愿愿-愿愿年便从这里开始征

① 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指示，愿愿年猿月缘日，中央档案馆。

② 杨奎松前引文。

③ 中央关于不能承认国民党条件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愿愿年猿月愿日，中央档案馆。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愿卷，愿-愿页。

⑤ 《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愿-愿页；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愿卷，愿-愿页。

⑥ 《毛泽东年谱》第猿卷，愿-愿页。

服整个中国。

总而言之,毛是从国际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出发,形成了与中国国内形势相联系的对战后世界格局的看法,而毛的这一看法又反过来决定了他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府的政策。毛的国际主义的核心是他把中共利益与苏联利益等同起来。在毛看来,只有等苏联式的政治体制在中共控制的中国建立后,中国作为一个民族才是可爱的,中共的事业是莫斯科领导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无论如何,毛需要苏联帮助他战胜美国支持的国内敌人——国民党统治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所以,毛十分愿意服从斯大林的政策,并一再调整自己的政策以适应苏联政策的变化。毛和斯大林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中共和苏联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进行的秘密而成功的合作象征着毛所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胜利。

(本文系作者提交 1995 年 1 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沈志华译,张丽华校。)

斯大林、冷战与中国的分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布·默里

冷

战的结束和苏联档案的开放为人们提供了重新看待中国共产党人回忆录中关于苏联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的新材料和重新评估史学界有关“中国的失落”这一传统观点的机会。^①不幸的是，俄国人仍然极其敏感地对待这段历史，结果，苏联解密的有关中国的文件，就不如其所公布的有关欧洲或者甚至朝鲜的冷战史文献那样全面而又详尽。^②在涉及苏联与中共的关系时，情况尤其如此。例如，俄国人把 1945 年 8 月和 9 月同国民

^① 邹谠和拉蒙·迈尔斯对史学界流传的有关“中国的失落”的观点的论述是最为完整的。见邹说：《苏联至 1945 年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芝加哥，1954 年；拉蒙·迈尔斯：《苏联与中国民族主义者收复东北的意图》，载《中华民国史论文集》第 3 卷，台北，1981 年；斯蒂文·莱文和奥德·阿恩·韦斯塔两人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见莱文：《胜利的砧骨》，纽约，1985 年；韦斯塔：《冷战与革命》，纽约，1986 年；斯蒂文·戈尔德斯泰因和何迪则在他们的《冷战史的中国方面的新资料》一文中详细论述了中国方面在这一问题上的新材料，他们的论文载于《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1989 年 1 期，第 1 页。

^② 马克·克莱默：《莫斯科的档案研究：进展与失误》，载《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1988 年 1 期，第 1 页。该文综述了在莫斯科进行的档案研究的状况。威瑟斯比在《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第 3 期上发表了《朝鲜战争的新材料》，在《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研究报告》上刊登了《苏联在朝鲜的目标与朝鲜战争的起源》，这两篇文章均论述了其在苏共档案馆和外交部档案馆从事研究时发现的新材料。威瑟斯比接触到的有关朝鲜问题的文件和其他研究欧洲问题的学者获得的这方面的文件，看来都远多于所能得到的有关苏联与中共关系的文献。

党进行条约谈判的详细记录,包括预备性备忘录和谈判的实际记录,全部予以解密,而我 1956 年初在莫斯科从事研究的时候,苏联同中共 1956 年 1 月的同样的谈判记录却大部分不对外国人开放。^①然而,新公布的苏联档案还是包含了实质性的新材料,这些东西加上在中国大陆发表的最新回忆录中的材料以及中国台湾的新的档案材料的开放,可以对莫斯科在中国内战中所起的作用的那段历史予以新的阐述。本文将从研究的角度简要地评析莫斯科的苏联外交部档案馆和苏共档案馆以及台北的“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咨询处中的档案材料。^②总的来说,这些材料与其说证实了史学界关于莫斯科支持中共执掌政权的传统观点,还不如说印证了最近中共所发表的回忆录里的说法,即苏联不支持甚至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特别是国民党档案馆里的文献材料证实了中共的下列观点:苏联人曾劝告不要在 1949 年发动中国革命,甚至在 1949 年初期主张以长江为界划分中国,其时中共已经走向全面的胜利。这一新证据对美国关于“中国的失落”的论题和苏联方面的材料都提出了责难。苏联的材料对斯大林早期的劝告轻描淡写,对关于苏联试图以长江为界分裂中国的观点表示

① 苏联外交部档案馆,尽管它的正式名称改为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我们以下仍简称为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苏共档案中心尽管正式名称改为冗长繁琐的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我们仍简称其为苏共档案中心。在莫斯科的这两个档案馆里,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更多的解密的案卷是有关苏联同国民党的关系而不是苏联与中共的关系。譬如,有关 1956 年 1 月至 2 月的苏联与国民党的谈判的预备性备忘录和苏联内部的备忘录都能在苏联对外政策档案的全宗 20 目录 2 案宗 1 卷和 2 卷中找到,而谈判的记录则能在案宗 2 卷中获得。如同 1956 年 1 月的情况一样,有关 1956 年 1 月苏联与中共的谈判,惟一能得到的案卷就是会谈的议定书和经谈判达成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初步草案。如见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20 目录 2 案宗 1 卷- 中国和目录 2 案宗 2 卷- 中国。

② 虽然“中华民国外交部”正在考虑对已被批准的目录里的档案实行特殊开放的要求,但是“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咨询处尚未正式开放。这一要求可能由台湾的学术机构作为一种建议提出来,或者至少这一要求将包括台湾学术机构的一封支持信。本文中涉及的这方面档案将首次标出现在的案宗号(单号),而保留了案宗上的显著的标记和原来的分类号(原编单号),因为案宗已用新的号码重新编制了索引,但原来编号在案宗中还很显著。

异议。^①

斯大林阻止革命的建议

苏联人并不认为中共会在中国内战中有成功的开端，更不用说胜利的结局，其第一个证据引自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弗·吉拉斯。据他说，1955年斯大林承认曾在1954年劝说中共与蒋介石议和，不要在中国发动革命。^② 近来，中国的出版物对此说法又有了实质性的补充，说明斯大林曾劝告中共放弃与国民党进行军事斗争。按照中共的材料，苏军驻满洲的军事指挥官试图限制中共对东北的军事渗透。苏联竭力阻止中共接收满洲的主要城市沈阳，只是在经过紧张的谈判后，苏联人才派遣一个军事使团到延安毛泽东的总部，提出苏联关于中共进入满洲的条件。苏联红军代表团在中共军事指挥官曾克林的陪同下于1954年12月访问延安。代表团提出，中共只有在同意苏联三项条件的情况下才能进入满洲：不能开进城市；不能在苏占区公开行动；不能以共产党的“八路军”名义展开活动。^③ 结果，延安的中共中央命令其在满洲的部队，因“外交上的复杂性”而从城市、

① 冈察洛夫与科瓦廖夫的采访谈话：《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载《远东问题》1955年（20）和1956年（1）以及《东亚事务》1956年（1）。谈话提供了俄国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而中国的观点则见于刘晓的《出使苏联》一文，它载于《世界知识》1955年（12），原1-5页。还可见巴让诺夫的《苏中关系》，《近现代史》1956年（1）；师哲的《一个中国翻译的回忆》，载《中国历史学家》第3卷第1期，1956年春季号，第3-5页；余湛和张光佑的《关于斯大林曾否劝阻我过长江的探讨》，载《党的文献》1956年（1），第1-2页；向青的《关于斯大林劝阻解放军过江之我见》，载《党的文献》1956年（2），第1-2页；廖盖隆的《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载《中共党史研究》1982年（1）（特辑），第1-2页。

② 弗拉基米尔·德迪耶尔：《铁托言论集》，伦敦，1954年，引自邹说：《1954年至1955年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③ 刘德喜：《1954年12月至1955年12月苏联对华政策》，载《中共党史研究》1982年（1）（特辑），第1-2页；詹姆斯·雷尔顿·原安德森：《延安与列强》，第12页，纽约，1954年；安德列·列多夫斯基：《美国对华政策与苏联外交》，第12-13页，莫斯科，1954年；聂荣臻：《红星照耀》第1-2页，北京，1955年。所有上述著作均谈到了1954年12月苏联军事使团访问延安的情况，虽然有关苏联向中国所提建议的内容不够详细。韦斯塔在《冷战与革命》（第1-2页）中主要根据曾克林的回忆录详细地叙述了红军第一个军事使团访问延安的情况。

铁路和机场撤出。^① 中共的另一一些材料表明,苏联人不反对使用武力迫使中共服从这些限制。例如,伍修权回忆录叙述了苏联满洲指挥官与中共满洲局负责人彭真的一次交涉。苏联命令中共从沈阳撤出,并说:“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赶你们走!”彭真反击道:“一个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来打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这倒是从来没有的事,可以这样做吗?”^②

由于在获得俄罗斯档案方面所受到的限制,难以最终证实中共的上述说法。不管怎样,苏共档案馆几份解密的报告证明了红军对中共军队驻扎满洲的敌视。第一份销密的材料是关于苏联红军与满洲的中共交涉情况的,它反映在 1945年 9月 21日中共东北地区委员会书记胡福嘉(音译)写给苏共斯克沃尔佐夫的信中。胡书记在信中写到,中共军队于 9月 15日进入满洲与红军相遇,但因为不会讲俄语,直到 9月初,苏联领事官员到来,他们才建立了联系。中共抱怨,红军士兵的所作所为与无产阶级军队的行为不相符合,特别是强奸妇女和剥夺农民的生计。胡书记特别要求斯克沃尔佐夫命令驻哈尔滨的红军指挥官建立军纪委员会,并立即公布命令,将对所有违反军纪的行为予以严惩。胡还要求苏联人开展群众宣传运动以赢得中国人民的支持。按中共的说法,中国人民现在很害怕苏联士兵。胡书记还请求苏共给予援助。他尤其反对苏联人在中共军队到达满洲后立即解除他们的武装,要求苏联人反过来向他们提供武装。胡提出的理由是,中共需要建立自卫部队,因为他们遭到国民党和日本关东军逃兵的袭击。最后,胡还请求苏联人提供钱款、印刷机和纸张,以利于中共在满洲开展宣传和政治工作。^③

给斯克沃尔佐夫的另一封信是由中共山东局第三分局的满洲委员会发出的。信中同样要求苏联人提供印刷和纸张以开展宣传工作,要求苏联人在他们的部队中维持军纪和不要解除该地区的中共军队的武装。中共

① 1945年 9月 21日中共中央给北方局的信,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卷, 158-159页。

② 伍修权:《往事沧桑》, 150页,引自韦斯塔:《冷战与革命》, 158-159页。

③ 胡福嘉致斯克沃尔佐夫信, 1945年 9月 21日,见苏共档案中心,全宗 156目录 158-159案宗, 158-159页。

分局还要求苏联人提供同延安联系的通讯设施，1950年这些通讯联系被日本人切断了，他们需要重建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也属共产党满洲委员会的胡铁朝（音译）后来还向苏共官员表示道歉，因为他对“老大哥”的直率态度违反了党的纪律，并请求苏联共产党人给予指示。他还说，他们同延安的联系被切断了。^①

满洲的中共对莫斯科“兄弟党”“老大哥”的呼吁显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没有发现苏共对中共提出的援助要求给予正式回答的记载）。不管怎样，在苏联中校彼得罗夫斯基与中共满洲的官员李青茅（音译）的交涉中，苏联人正式拒绝了提供印刷机和纸张的相同要求。彼得罗夫斯基中校还拒绝允许中共在苏占区活动，并提醒说，这个问题将由中国的中央政府即蒋介石政府决定。^②

苏联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提供了苏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直接的证明。1950年10月，在苏联人答应把国民党军队运往沈阳和长春机场的空中运输线给予援助后，国民党同意与苏联人进行谈判以共同开发满洲的经济。^③按照中共的资料，苏联人不仅迫使中共撤出满洲的城市，而且还在1950年10月断绝了与满洲共产党的所有联系。^④与此同时，苏联人继续与国民党在长春进行经济合作谈判。蒋介石还派他的儿

① 中共中央山东局满洲工作委员会致斯克沃尔佐夫的信，1950年10月10日；山东局第三分局满洲委员会书记胡铁朝致马尔穆什金的信，1950年10月16日。见苏共档案中心，全宗156目录，案宗156-101-101页。

② 彼得罗夫斯基中校与李青茅谈话记录，1950年10月20日；李青茅致彼得罗夫斯基信，1950年10月20日；彼得罗夫斯基致李青茅信，1950年10月20日。均见苏共档案中心，全宗156目录，案宗156-101-101页。

③ 彼得罗夫斯基致王世杰，1950年10月10日和10月10日，见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56目录，案宗156-101-101页；王世杰致彼得罗夫斯基，1950年10月10日和10月10日，同上，案宗156-101-101页。蒋介石与彼得罗夫斯基会谈记录，1950年10月10日；彼得罗夫斯基致王世杰，1950年10月10日、10日和10日。见“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咨询处，156-101-101-101。

④ 刘德喜前引文，101页。

罗斯的说法更为准确。中国人的说法是，1949年11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了河北省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总部，苏联人更愿意看到中国以长江为界实行分治。

根据中国的材料，斯大林认为当中国内战还在进行时毛泽东不应来莫斯科之后，斯大林派米高扬于1949年11月会见了中共领导人。^① 中共的资料说，米高扬劝说中共不要过长江，赞成按（公元1111—1368年）南北朝的方法对中国划江而治。^② 当然，中共没有理会苏联的劝告（就像在1949年一样），1949年12月跨过了长江，到1949年12月有效地粉碎了国民党在大陆残余的抵抗。

众所周知，苏联人直到最后一刻仍与国民党政府维持正式的外交关系，只是在10月1日，亦即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才与国民党断绝关系。文献还清楚地记载着，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作为外交使团中唯一的成员，于1949年初跟随国民党政府从南京南撤至广州的情况。罗申在中国呆到1949年12月初，这期间他一直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共过江后，他才返回苏联。^③ 虽然与前任大使不同，罗申发自中国的报告仍属机密，但是国民党“外交部”关于罗申在华外交活动的记载，清

① 一份没有署名和日期的电文大约是在1949年年中发出的，内容涉及苏联希望知道毛泽东想来莫斯科的日期。按照中国和苏联的说法，斯大林最后决定，当战争还在进行时，毛泽东最好是呆在中国，作为替代方法，米高扬可去西柏坡访问中共领导人。见冈察洛夫和师哲前引文。

② 在中共的材料中通常的提法是“划江而治，搞南北朝”，见余湛和张光佑前引文，276页。约翰·加弗根据刘晓的书写了《关于苏中关系的新见解：中国驻苏联大使的回忆》（1954—1955）（载《中国季刊》1952年12月第11期，147—148页）。加弗在文中不恰当地把历史上的南北朝与当代朝鲜的现状作了对照。在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中国北部是被长城以北的蛮人统治的，而中国南部则被几个相互角逐的汉人政权所分割。按照米高扬的计划，中国北部同样可以在苏联的支持下与南部的国民党军阀政权断绝关系。

③ 司徒雷登致马歇尔，1949年10月19日，见《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1卷，150页；安德列·列多夫斯基：《老战士的回忆》，载《远东问题》1952（第1卷），1—2页；苏联事务报告，未注明日期，大约是1949年12月，见《我看苏侵略案》，“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咨询处，1952年12月19日。

楚地表明,罗申的使命与中国共产党人所说的米高扬的使命是相似的。^①当米高扬试图把中共限制于长江以北的时候,罗申则力图在中国南部维持苏联同国民党的关系。^②

美国驻华外交官的报告说,罗申曾努力试图单独调停国民党和中共之间的内战,那时是 1946 年,罗申还只是苏联使馆的武官。根据美国的外交资料,罗申于 1946 年秋与国民党负责官员会谈时,主动要求为结束战争进行调停,并表示要对中共施加一些影响。1946 年 11 月,罗申奉召回国,1946 年 12 月 15 日被任命为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回到中国后,从 1946 年到 1949 年继续为调停而与国民党高级官员保持接触,也就是一直调停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事胜利使得调停努力变得不切实际时为止。美国人的报告说,罗申的调停努力在国民党官员中间获得了某些成功。^③更为重要的是,罗申对国民党说,苏联人之所以对调停中国内战感兴趣,是因为他们害怕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美国人太轻视有关罗申调停努力的二手报告,是因为他们认为,国民党只是在与苏联调情,目的是在反共战争中进一步获得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尽管事实上罗申已直接呼吁美国使馆以

① 罗申曾在军事情报局接受过训练,所以很可能是,他的报告在苏联外交部档案馆中仍是保密的,因为在他于 1946 年被任命为大使后,他是苏共派驻中国的双重特务。在这种情况下,罗申的报告可能会在苏共档案馆里找到。化名为“戈杜诺夫”的代表在这段时期里发自中国的报告仍属机密,尽管案宗的名称表明那个“戈杜诺夫”是驻在国民党中国而不是满洲。根据国民党的材料,内战时期甚至在作调停努力和被任命为大使之前,罗申就已经同国民党领导人特别是蒋经国来往了。国民党没有意料到罗申会被任命为驻华大使。驻苏大使傅秉常曾把罗申的履历向“中华民国外交部”作过报告。见傅秉常自莫斯科致南京王世杰,1946 年 12 月 15 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咨询处,来源同前注。有关罗申同国民党领导人的早期来往,见蒋“总统”大事长编》第 2 卷,291-292 页;中国驻苏使馆自伦敦致南京,1946 年 12 月 15 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咨询处,来源同前注。

② 罗申后来在 1949 年被任命为苏联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中共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不礼貌的”,见申晓云:《1949 年代末中美调整关系评析》,载《近代史研究》1992(3),104 页。

③ 这点可以在《关于调整我国外交政策之见解》(1949 年 12 月 15 日)中得到确认,见“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咨询处,来源同前注。

寻求对其调停努力的支持。^①

“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材料极其详尽地证实，在中共过江前，苏联人确实试图结束中国的内战。1949年12月，正当罗申开始在南京调停的时候，苏联驻伊朗大使萨奇科夫向中国驻德黑兰大使郑亦同提出了结束中国内战的相同建议。苏联大使竭力要让中国人相信，苏美关系的倒退并不同样会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萨奇科夫大使称，苏联理解以孙中山思想为基础的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并指出，苏联和中国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苏联认为，美国有关对日和约的政策是与苏联和中国的利益相悖的。萨奇科夫建议苏中就新疆、满洲和国共冲突举行会谈，以此提出了他的新方针。^②所以说，罗申的外交活动并不是孤立的，甚至是苏联为结束中国内战而作的协调努力的一部分，而那时中共正在胜利进军。

继他在南京开展主动外交活动后，罗申又向国民党国防部官员提议进行防止中苏“冷战”的会谈。他建议共同努力以寻求中苏在有关对日和约中的共同立场，他承诺将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增加对国民党的商业贷款，设立能使双方受惠的关于在中苏边界共同开发经济的项目。罗申称，苏联愿意在中国广泛投资以抵制英美帝国主义的影响，从而使中国像明治维新时期日本那样实现工业化。罗申说，只要中国人采纳他的建议，中苏关系中的尖锐问题将很容易解决。罗申挥舞着胡萝卜和大棒补充道，如果中国人不同意接受他的建议，苏联可能被迫沿中苏边界建立“缓冲区”以保卫苏联国家安全利益。^③

国民党军事官员在有关罗申建议的报告中的结论是，苏联提出这一

① 司徒雷登致国务院，1949年12月10日，《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27卷，1083-1084页；司徒雷登致国务院，1949年12月10日和12日，《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27卷，1084-1085页；司徒雷登致国务院，1949年12月12日和13日，《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27卷，1084-1085页；司徒雷登致国务院，1949年12月15日和16日，《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27卷，1085-1086页。司徒雷登报告说，罗申想拉华盛顿参加这种调停努力。司徒雷登致国务院，1949年12月12日，《美国对外关系》1949年第27卷，1084-1085页。

② 郑亦同自德黑兰致南京外交部，1949年12月12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咨询处，1949年12月12日。

③ “苏拟想促进新谈判”，国防部二厅给外交部的报告，1949年12月15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咨询处，1949年12月15日。

最新建议有两个具体的原因：首先，他们认为，罗申竭力利用中国日益增强的反日情绪以使国民党反对美国 and 英国。其次，他们认为，罗申是为了维护 1945 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反击立法院对该条约和外交部长王世杰的攻击，王被莫斯科认为基本上是亲苏的。^①更坦率地讲，国民党军事官员认为，罗申建议中的商业贷款和经济援助是苏联破坏中国领土完整的一种努力。尤其重要的是，他们相信，罗申努力调停国共冲突，是因为苏联想要打消共产党的想法，即共产党将能在第二年打过长江去（尽管苏联作了外交努力，共产党最终还是过了长江）。所以，国民党国防部认为，罗申的目的是延缓共产党人进军长江。^②1945 年 8 月，罗申与王世杰会晤，重申苏联希望调解国共冲突和向国民党提供物资援助。不管怎样，罗申没有重复他早些时候发出过的威胁，即如果国民党不同意进行会谈，苏联就将需要沿中苏边界建立“缓冲区”^③。在同王世杰会谈时，罗申只是更突出了苏联援助的“胡萝卜”的一面，强调与国民党政府的友谊。

然而，就在同月早些时候，中国驻布鲁塞尔使馆从一名苏联信使那里搞到了一些据称是苏联国内文件的复本，它们反映了罗申调停努力中的“大棒”的一面，中国驻布鲁塞尔使馆在王世杰同罗申会谈前把这四份文件

① 苏联外交部有关王世杰的履历，1945 年 7 月 1 日，见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远目录 苑案宗 苑四卷 中国 猿 远页。这份履历认为外交部长王世杰是完全亲苏的，甚至在苏联对日本宣战前，他就支持苏联。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斯基在 1945 年 1 月 18 日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也认为王世杰和蒋经国是国民党领导层里的亲苏派，还指出，按他儿子的话说，蒋介石持相同的观点。见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苑目录 苑四案宗 四四四 中国。

② 《苏拟想促进新谈判》，1945 年 8 月 1 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咨询处，苑四四卷 猿四四页。

③ 王部长与苏驻华大使庐山谈话记录，1945 年 8 月 1 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咨询处，苑四四卷 猿四四页。在会谈中，罗申确证了李宗仁回忆录里的说法，即蒋介石已同意于 1945 年 8 月访问莫斯科。罗申承认，他是中间人，并与蒋经国一起安排了这次访问，在最后一刻访问被取消了。在蒋介石改变主意前，苏联已派了一架飞机接他。见李宗仁和唐德刚的谈话，《李宗仁回忆录》卷四 猿四页；司徒雷登致马歇尔，1945 年 8 月 1 日，《美国对外关系》1945 年 第 愿卷 愿 猿页。

寄给了王世杰。^①

这四份据称在布鲁塞尔获得的含有附录的苏联内部文件，包括一份1950年11月15日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副本、两份日期为1950年12月1日和12月15日的军事命令及一份未注明日期的电文。这些文件，特别是两份军事命令，预示了苏联将急剧增加对满洲的中共武装力量的援助，而以前的援助是很有限的，实质上是没有的。斯大林在讲话中许诺，将给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十倍”的援助。第一份军令是由莫斯科发给苏联驻哈尔滨的军事长官的，它是苏联实施斯大林发出的威胁的第一个具体的行动。命令要求注意苏联政府最近已决定“加倍”增加对中国解放运动的援助，并说明了苏联增加对满洲的中国民主力量援助的性质。命令还通知说，将很快派遣一个政治指导团到满洲，以帮助执行苏联对华新政策。第二份军令则作了详细的补充，提出了莫斯科认为应当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提供的军事方面的建议。最后一封未注明日期的电文证明，按照早些时候的命令，苏联人已成功地与朱德建立了联系。电文还涉及毛泽东可能访问莫斯科的时间选择问题。^②

虽然来自布鲁塞尔的电文表明，上述文件无疑真是苏联的，但仍有相当的可能是，它们并不真的就是军事命令，而仅仅是苏联制造的假情报活动的一部分，目的是恫吓国民党，以使其同意苏联的调停建议。它们与罗申发出的要在满洲沿中苏边界建立“缓冲区”的威胁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王世杰就认为，国民党抵制苏联在1950年10月前所作的调停努力，导致莫斯科同意共产党人进攻沈阳，虽然王世杰拒绝了罗申的主动建议后，

^① 曲常（音译）自布鲁塞尔致南京王世杰，1950年11月15日，见《钱驻伊（朗）大使与俄使谈中俄邦交》，“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咨询处，[http://www.mof.gov.tw/](#)。在解释了这四份文件的内容后，曲说，这些文件是在西欧的一名叫“苏莱希奥欣察”的苏联信使那里搞到的。这位信使要求得到某种“补偿”（酬谢）以作为对文件的交换，这意味着某种政治上的“针锋相对”就如同某种经济补偿一样。

^② 这四份文件入档时标题为《斯大林在政治局秘密会议上的报告》，见“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咨询处，[http://www.mof.gov.tw/](#)。档案中有俄文原件的手写体和打印体两种，另附有英文打印体和中文手写体两种翻译文本，但在苏联外交部档案馆的卷宗里或其他什么地方，没有可予以确证的备忘录或附页。

苏联曾立即正式要求保护居住在满洲国民党占领区的苏联公民。^①

接着罗申对国防部采取的态度，就是对国民党发出直截了当的威胁：如果国民党拒绝与苏联人进行谈判，那就把满洲可能还有其他地区正式分离出去。不论其可靠性如何，苏联人所泄漏给国民党的这些文件使罗申发出的威胁变得更加严重了。因为正是斯大林大元帅本人被认为下令增加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援助以抵消美国向国民党提供的“大量援助”。如果斯大林这一讲话是真实的话，实际上就可以被看作是苏联的冷战宣言。在调停努力的背后，苏联在德黑兰、布鲁塞尔和南京所进行的外交活动都强调，国民党不要跟着美国一起进入“冷战”反对苏联。罗申向国民党提出了避免与苏联对抗的方法，并威胁说，拒绝建议的代价将可能是苏联急剧增加对中共的援助，把满洲和中国其他一些边境地区并入苏联的“缓冲区”。

不管这些文件是苏联的假情报或者是真实的苏联军令，它们是在罗申提出调停建议的期间泄漏给国民党的。这一事实表明，就像中共的资料所称的那样，苏联人实际上想要按照“南北朝”的方式分裂中国。苏联正是站在这个角度上对待内战中的国共双方的，所以苏联人压国共两党放弃军事斗争，通过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和罗申同南京的国民党领导人的外交活动，寻求一种政治解决方法。中国的两个政党均能看出，这里的含意就是或者以长城、黄河或者以长江为界分治中国。当然，中国两党都坚决反对这一方案。^②

文件的真实性

无论如何，如果不能较全面地获得莫斯科的档案，这些文件的真实性是不能确定的。当我在莫斯科进行研究工作时，由于对苏共和外交部档案

① 司徒雷登致国务院，见 刘晓前《美国对外关系史》卷 第 卷 第 页。

② 刘晓前引书说，中共无论在言辞上还是行动上都反对分裂中国。李宗仁在其返回中国大陆前撰写的回忆录里也说国民党反对南北朝。他写道：“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由此毛泽东和我以长江为界分治中国的话，那么，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一样的悲惨境地。为了生存，南方政府将会依附于美国，而北方政府则将依赖苏联。除了在不同的旗帜下自相残杀外，哪一个政府都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李宗仁回忆录 卷 第 页）

馆的限制，要确定台北档案馆发现的苏联文件的真实性就变得困难了。例如，就像前面指出的那样，继续实行的保密，妨碍了对那时的苏共驻国民党中国的主要代表、化名为“戈杜诺夫”的大部分报告的分析。而且，苏共文件中经常使用的假名使得人们在确定上述军令中提及的官员和代表的姓名时遇到了障碍。^①然而，还是有些详细的证据表明上述文件可能确实是真的。

首先，苏联领导人的口头讲话是零散的不连贯的，关于斯大林讲话的记录是符合这一风格的。^②不过，莫斯科共产党档案馆里的现存材料表明，可能对政治局开会的日期 1955年 7月 15日是有些疑问的。^③虽然，斯大林的讲话和其他文件是在相同的时间里由同一个信使送出的，但讲话的真实性仍使这些文件可以被人相信。

第二，头一份军令提到要建立政治指导团，这个指导团是建立了，而且还将包括一些居住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苏共档案馆里有一些日期从 1955年中期开始的信件，这些信件是居住在苏联的中国人写的，他们请求允许其返回“已解放了的”的中国或新中国，可能的话就作为政治指导团的成员回去。这些信件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其日期与 1955年 7月 15日的命令中所说的建立政治指导团相吻合，而且还因为有 10个中国人或者他们的俄国配偶被拒绝允许离开苏联回中国，因为他们过去有反苏的“罪行”，或者他们有亲属在美国。按苏联当时的观点，离开俄国回到“解放了的”中国，意味着这些人将离开苏联阵营，这也表明，苏联人并不期望中共把中国完全并入社会主义集团。存档的大部分信件涉及中国人或他们的配偶，他们去中国的要求遭到拒绝。档案中的信件既有请求者的请求

① 例如，斯大林有时就简单地称为“斯大林”或者按他的苏共笔名称作“菲利波夫”，如毛泽东在 1955年 7月 15日致“菲利波夫同志”的信，见苏共档案中心，全宗 166目录 1000案宗 10000页。

② 我要感谢奥德·韦斯塔对这一点的指正。

③ 根据档案材料，政治局在 1955年 7月 15日作出了任命干部的决定，但无法证实政治局确实那天召开了会议，决定可能是由政治局签署的，但不是由正式会议作出的。档案还证明，那天没有就国际问题或党内问题作出过决定。见《私人通讯》，苏共档案中心，1955年 7月 15日。

信,亦有苏共统治集团的反对信。譬如,高岗和林彪曾于 1945年 11月 15日代表一个中文名叫张思周(音译),俄文名为古伊斯科沃的中国共产党人写信给马林科夫,请求让那人的俄国妻子及一家到哈尔滨与他团聚。因为那个俄国妻子鲁博夫·波图尼耶娃有一些远亲在洛杉矶,所以不允许她离开苏联到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满洲。事实上,俄国妻子与其中国共产党人丈夫团聚的惟一有记载的事例就是李立三的妻子基什金娜,她的要求于 1945年 12月被批准。^①

第三,包括斯大林讲话在内的文件表明,苏联人将增加他们对中国“民主力量”的援助,这种援助始于 1945年春。在这之前的内战中,只有很有限的文件表明苏联给过中共援助。然而,有证据表明苏联人包括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从苏联驻满洲共产党地区的代表那里得到了详细的情报,这些情报均与上述文件有关。如巴洛诺夫于 1945年 12月初给斯大林和苏斯洛夫送去了一份来自苏联驻满洲代表的匿名情报,该情报援引了中共特别是高岗有关满洲军事冲突情况的材料。情报说,高岗坚持认为,中共能否击退国民党的侧翼进攻以肃清沈阳—长春铁路线,取决于共产党得到武器供应的速度。情报没有提出苏联提供援助的要求,但是向苏联高层领导提供了有关 1945年中共与国民党军事力量对比的详细情况。^②

接着,1945年 12月 15日,苏联代表又发来一份报告,说明中共准备进攻四平市,并说中共向苏共高层领导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援助请求。这位署

^① 这批信里的第一封信是 1945年 11月初由一个名为廖欢欣(音译)的中国共产党人写的。科瓦廖夫在 1945年 11月 15日的信中否定了他的要求,理由是他在 1945年曾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过。还有,1945年 12月的几封信包括一封有关李立三妻子的信以及 1945年后期的几封信。李立三本人则于 1945年回到中国。见苏共档案中心,全宗 156,目录 156,案宗 156,页 156-157,案宗 156,页 156-157。

^② 巴洛诺夫致斯大林和苏斯洛夫苏联国家全部情况报告,1945年 12月 15日,见苏共档案中心,全宗 156,目录 156,案宗 156,页 156-157。报告说明了美国驻北京的军事顾问人数和忠于李济深将军的部队数量,李是居住在香港但在中国南方有其助手的反国民党的军阀。据这份报告说,他的助手所控制的军队人数为 1.5 万。

名“费多洛夫”的苏联代表可以被认为就是报告的起草人。^① 费多洛夫说，共产党计划以 5 万人的兵力进攻四平，5 万人为后备队，以防国民党从长春给予增援，从侧翼发起反攻。费多洛夫援引高岗的话说，此刻要阻止共产党预定的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使国民党获得足够的时间重新集结以对北满的共产党人发起反攻（这表明苏联最初曾怀疑中共发起进攻是否明智）。高岗要求费多洛夫提供武器，特别是 75 毫米日式火炮炮弹，并且还规定了炮弹的口径和数量。高岗说，他的部队可以前往沿苏联边界的任何地点以获取武器供应。高岗强调，中共急需炮弹，如果拟议中的进攻四平想要成功的话。^② 苏联人那时并未提供这批军火，共产党人对四平的进攻以中共向北满的撤退而告终。^③

1945 年 11 月，苏联滨海地区（苏联远东）军事政治当局的苏林少将就共产党人从四平撤退后满洲的军事形势向他的莫斯科上司提出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如同前一份发自满洲的情报一样，苏林的报告中附有一份有关满洲的军事作战图及其说明，这极有可能是给苏共领导和苏军总参谋部的。^④ 由此，便可以有根据地说，苏联人就有关存在着侧翼反攻的危险向中共提出了如军事命令中所说的那些军事建议。还有，高岗要求提供日式火炮的炮弹，这与当时中共的军备状况是相符的，与下面这种判断也是吻合的，即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可以表明，在朝鲜战争之前，中共拥有任何苏式武器或军火。^⑤ 最后，高岗请求在沿中苏边界的任何地方获取所要求的

① 文件均涉及驻满洲的“费坚科”中将。在苏共档案中心的另一份案宗的表格里有费多洛夫少将的名字，这份案宗是致巴洛诺夫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遗憾的是，费多洛夫的案宗被列入了表格中，但没有这份案宗。见费多洛夫致巴洛诺夫，附表，1945 年 11 月 10 日，苏共档案中心，全宗 156 目录 156 案宗 156 页。

② 高岗指出中共仅有 5 万发炮弹，他认为，这对已计划的进攻来说是不够的。见费多洛夫 1945 年 11 月 10 日给巴洛诺夫、11 月 15 日转交日丹诺夫的报告，苏共档案中心，全宗 156 目录 156 案宗 156 页。

③ 1945 年代初林彪事件揭露后，对四平进攻的失败被毛泽东说成是林彪军事上无能的证据。

④ 苏林少将致巴洛诺夫，1945 年 11 月 10 日，苏共档案中心，全宗 156 目录 156 案宗 156 页。

⑤ 聂荣臻：《红星照耀》。

官们(包括国民党外交官——苏联大使罗申正在中国与他们积极地进行谈判)注意。这批留学生被送往莫斯科北面约 190 公里的一个名叫伊万诺沃的封闭的小镇上。留学生声称,他们曾被准许有机会在苏联首都学习,因而坚持要准许他们离开伊万诺沃前往莫斯科。一名留学生领导人抗议说,他们从中国步行 190 公里就是为了获得在莫斯科学习的机会,如果不允许他们学习,他们将步行 190 公里回中国。然而,抗议活动在两星期内就结束了,结果,学生们没有长途跋涉返回中国。在他们个别地和党组织与苏联东道主会谈后,留学生们同意留在伊万诺沃。^① 接受留学生的邀请显然是在斯大林讲话之后发出的,而且让留学生呆在伊万诺沃以不为人所注意的决定,与苏联维持同国民党合适的外交关系,同时又在 1950 年年中根据罗申在南京的调停情况打通与中国共产党人的联系的努力是相符的。

结 论

如果上述文件是真实的话,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国民党不把它们交给美国以获得美国对他们得到反共援助的请求的支持?这里有几种可能的原因。除了这些材料的出处有疑问和敏感外,把它们交给美国就会暴露国民党在美苏冷战正酣之际同苏联人所进行的外交往来。所以,让美国人知道国民党同莫斯科关系的重要一面可能损害国民党的利益。

如果上述文件是真实的话,它们就无法动摇中共有关米高扬使命的说法。相反,如果苏联人在 1950 年年中开始援助满洲的共产党而同时又与国民党进行谈判,那么,中共关于斯大林赞成把中国划分为南北朝的指责就更为可信了。文件并没有表明苏联人承担了全力支持共产党统一中

^① 苏联高等教育部部长茹琴科的报告,1950年12月10日;林彪致莫洛托夫,1950年12月15日。见苏共档案中心,全宗 15 号目录 158 号案宗 158 号卷 158 号页。林彪致苏联官员的第一封有记载的信函是 1950年12月15日致“尼古拉耶夫”同志的手写体书信,内容是有关一位在哈尔滨接受苏联医务治疗的中共官员的健康问题的。见苏共档案中心,全宗 15 号目录 158 号案宗 158 号页。这也表明,在 1950 年早期,苏联在满洲已有某种军事存在。

国的义务。相反，1950年1月16日军令中的第五条指示的措词是谨慎的：“只有在我们巩固了已解放了的土地的时候和地方，才能在今后作进一步的推进。”还有，斯大林的讲话包含着对共产党人的告诫：共产党人不要因为成功而陶醉。在他论述的亚洲部分的结尾，斯大林警告说：“有些人因为成功而过分骄傲。危险的是，我们有些同志被成功而迷惑，忘乎所以，他们夸耀说，‘世界正跪伏在我们脚下’，‘我们能做我们想做的任何事情’。不能这样，同志们，我们要再接再厉，更努力和更艰苦地工作，因为总的说来，世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事情。”

中共的材料说明，米高扬 1950年 1月访问西柏坡时就提出过这种清醒的劝告。例如，聂荣臻就把过于谨慎的苏联人与古时候的杞人相比较，杞人总是担忧天会塌下来。^①罗申也表露过类似的担忧。他曾在中共渡江前对美国驻广州的领事官员说，如果中共试图夺取全国，就会“骑虎难下”^②。

这样，如果文件是真实的话，那么，苏联就是在 1950年年中才开始援助中共的，并且还警告他们不要急于发动全面统一中国的进攻。同时，苏联人把与中共新近建立的友谊和他们给满洲“小兄弟”的军事援助当作一种工具，以支持罗申从南方的国民党那里获得让步的努力。总起来看，新的文件、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和罗申的外交活动证明，苏联宁愿中国划江而治，也不愿因使美国“丧失”在中国南方的势力范围而冒与美国发生潜在对抗的风险。

在斯大林的讲话中，谈到了欧洲潜伏的危险局势。这一讲话是在封锁柏林之前发表的。如果斯大林打算或计划在欧洲同美国对抗的话，那么，他就有更多的理由力图避免与美国在中国对抗。在苏联人看来，如果共产党人过江，那就会引出与美国冲突的幽灵。苏联人担心毛泽东成为“亚洲

^① 聂荣臻对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看法是：“斯大林有点像杞人忧天。苏联同志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经过多年的战争已大大缩小，剩下的只是数量很少的部队。”（聂荣臻：《红星照耀》）

^② 克拉克自广州致华盛顿马歇尔，1950年 1月 15日，《美国对外关系》1950年第 1卷，107页～108页。

的铁托”显然也使苏联更加希望在中共过江前结束中国的内战。

如果文件是苏联制造的假情报,那么,它们仍然是有意义的。按照苏联的档案材料,莫斯科是在 1945 年年中开始援助中共的,而根据中国的材料,在这同时,苏联人仍积极寻求与国民党谈判。这样,国民党档案馆里的苏联文件,不论其是假情报还是真文献,都说明莫斯科希望中国划江而治而不冒与美国对抗的风险。这也有力地证明,苏联人想要中国回复到军阀主义时期。而如果共产党人获胜并且归入到苏联集团,苏联就有与美国发生对抗的危险。从苏联的角度看,这种对抗是件危险的事情,因为欧洲的冷战正在炽热地进行。^①

无论如何,苏联人的真实动机和文件的真实性尚不能完全确定,这有待于莫斯科其余的档案材料的开放和对以研究为目的使用党史档案馆和外交部档案馆所加的限制的废除。较之现在的以回忆录为基础的材料和中共出版物的二手材料,中国的档案当然也能证实那些文件的真伪,并且能对整个中国内战史提供一种更全面和更可靠的解释。台湾的档案里也保存着有价值的文献材料,但它们仍作为冷战的秘密被封存,特别是涉及 1949 年代台湾海峡危机的记载。虽然,台湾“外交部”档案室现已开放,但研究人员必须申请特别许可证,而且不许复制。这使外国的研究人员感到特别困难,因为文件大多是用汉字手写的。更重要的是,能接触文件及其目录的仍是档案人员而非研究人员。即使同意研究这类文件,也只是“中华民国外交部”北美(美国)司和西亚(苏联)司档案,而不是“外交部”档案室的高度机密的档案。俄罗斯外交部档案馆虽然允许接触有关的“对象”国

^① 苏联认为中国正回复到军阀主义时期,其证据可见罗申对司徒雷登大使和克拉克领事所发表的评论。还有,在 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一开始,斯大林对宋子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广西军阀张发奎是否忠于蒋介石。在这些谈判中,斯大林还赞许地提到满洲军阀张作霖。见斯大林与宋子文会谈,1945 年 8 月 10 日和 11 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咨询处,1982 年 12 月 15 日。苏联情报机构的报告也详细描述了中国南方各军阀特别是李济深将军部队的实力。见巴洛诺夫致斯大林和苏斯洛夫,1945 年 8 月 19 日,苏共档案中心,全宗 15,目录 15,卷 15,页 15。内战时期,在苏联的传媒工具中李济深将军比毛泽东或任何中共领导人占有更显著的位置。见《真理报》1945 年 8 月 15 日和 16 日、1945 年 8 月 17 日;《消息报》1945 年 8 月 17 日。

家的档案和上面提及的“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室的那种档案,但由于中苏关系特别是苏联与中共关系中存在较多的敏感问题以及一般的电文译解问题,对文献的解密仍是一个难题。要对中国内战史和整个亚洲冷战史中的这一朦胧晦涩的一章作出全面的阐述,则有待于莫斯科、台北和北京决定解除剩余的限制,以使人们能公开接触这些有关冷战国际关系史的关键材料。

(原文载美国《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1992年
第10号,张盛发译,沈志华校。)

论中苏同盟的起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牛军

本

文的目的是研究导致 1940 年代中苏结盟的历史原因。由于中苏同盟的形成及其演变对整个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多年来学术界为研究中苏同盟及其有关的问题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近年来随着中国大量历史档案的解密和俄罗斯开放苏联的档案，学术界开始重新探讨有关的问题，并相继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新披露的历史文献和富有启发性的新研究成果，使我们得以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对中苏同盟的起源作出更为全面的解释。

(一)

回顾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对于理解战后双方关系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坚定地站在苏联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里，并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帮助。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维系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在抗战时期，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首先是中共中央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如何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一再发生分歧。从 1937 年 6 月王明自莫斯科飞抵延安起，中共与

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分歧便以中共党内斗争的形式展开。直至皖南事变发生,中共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这场斗争才基本结束。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一度拒绝了苏军统帅部关于组织八路军向华北日军发动进攻的要求。^①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此指责了中共中央,但他们已不再能像以往那样使中共中央改变其决定。这一时期尽管苏联和共产国际并不是一概不赞成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有时甚至还给予支持,但这并没有改变双方分歧的实质,即中共中央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如何维护中共党的利益,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出发点则是如何维护苏联的战略利益。

其次是维系双方关系的意识形态纽带被削弱。由不同的战略利益引起的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策略分歧,使苏联领导人对中共中央的不满逐步发展为对中共的性质产生了怀疑。1941年秋,斯大林向崔可夫陈述了他对中共的看法,即中共主要依靠农民,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这必然给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打上“农民阶级”的“烙印”,以致它对“国际主义团结感发扬得不够”。^②中共的整风运动加深了苏联领导人的成见。^③1941年远月间,斯大林在与美国官方代表的谈话中称,中共是“人造奶油”共产党,一旦经济状况改善,“他们就会忘掉这种(共产主义)政治倾向”。^④按照斯大林的说法,中共不过是一个爱国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政党,而且实际上没有多少实力。

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共面临的问题更复杂。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真诚地信仰共产主义,并非常尊重苏联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他们从实际经验中认识到,生搬硬套苏联的理论、经验和政策,将给党带来极大的危害。在思想方面,如不将马列主义中国化,就不能树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指导思想。在组织方面,如不清除王明等人的影响,中共中央与苏联的分歧将会

① 我军准备在战略上配合苏军作战,1941年7月10日;帮助苏联红军我们采取广泛游击战的方针,1941年7月15日;八路军新四军仍立足长期斗争方针,1941年7月15日。

② 瓦·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中译本),190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

③ 季米特洛夫就中国共产党内状况致毛泽东的信,1941年10月10日,载《中共党史研究》1985(4) 25页。

④ 哈里曼致国务卿,见《美国对外关系》1941年第2卷,383-384页。

不断引起党内斗争，甚至导致党的分裂。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毅然发动整风运动，标志着中共中央决心从根本上调整党与苏联的关系。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直至 1955 年底，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已相当冷淡。这一时期它们都在根据自己的判断和自己的需要自行其是。1955 年春，由于欧洲战争即将结束和苏联明显地表现出将参加对日战争，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出现新的变化。一方面是苏联经过长期的外交努力，终与美英就远东问题达成协议，它的对华政策基本明朗。在苏联当时的对华政策框架中，与处理对美和对国民党政府的关系相比，中共对于苏联领导人实在不能说是—个重要的因素，它只是在如何保持中国政局稳定和必要时可以被用来制约国民党政府这个层次上才被考虑到。

与苏联对中共的态度形成对照的是，从 1955 年春季开始，中共中央越来越关注苏联的政策和考虑如何发展党与苏联的关系。在苏联宣布中止日苏中立条约的 1 月 16 天后，毛泽东批转了中共晋察冀分局关于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的指示。这项指示的核心就是将战略发展重心从配合美军在东南沿海登陆转向在华北和东北配合苏军作战。^① 在此后不久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和战后的作用，并在大会期间第一次向党的高级干部提出了他经过长期考虑的争取东北的计划。^②

不过确切地说，“七大”期间中共中央至多是确定了或者说是在重申争取与苏联合作的原则。实际上中共领导人已经了解到苏联参战后不会直接向中共提供援助。因此毛泽东在热情赞扬苏联的同时也告诫全党，要对得不到苏联援助有所准备，要靠自力更生。^③

“七大”以后远东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中苏谈判开始后，中共中央终于确定了有可能与苏联合作的范围———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1955 年 1 月 16 日，一直在重庆负责外事工作的王若飞在延安作形势报告。他提醒与会者

① 晋察冀分局关于积极配合苏联作战准备工作的指示，1955 年 1 月 16 日。

②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解放日报》1955 年 1 月 16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见《党的文献》1986（10），15 页；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55 年 1 月 16 日。

③ 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55 年 1 月 16 日，赫利利、斯大林会谈情况》，1955 年 1 月 16 日。

苏联将与国民党政府签约,而且绝不会是“苏联自由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条约”。但苏联的妥协也不会超过两个界限:其一是苏联不会允许在中国出现一个亲美的法西斯政府;其二是苏联不会限制中共的发展,尽管它可能不愿援助中共。^①王若飞的报告基本上反映了中共中央的看法,即在促使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和防止中国内战方面,苏联与中共有共同的目标,中共在发展自己的力量时不至于受到苏联的限制。

在抗战即将结束时,苏联和中共之间关系的发展处于一种不均衡的状态。一方面是苏联在制定其对华政策时,将中共放在一个不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是处理对苏关系已经成为影响中共中央重大决策的关键因素之一,但中共面临的现实是他们只能在既定的和相当有限的范围内得到苏联的合作,而且这种合作也还要经过努力才能实现。

(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斯大林便打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中共与国民党谈判解决国共两党间的矛盾。斯大林的电报揭开了战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帷幕。中共与苏联的政策最初像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很难发现有多少共同点。苏联当时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的条款变成现实的格局,以及如何维护它在这个格局中的利益。斯大林给毛泽东打电报就是在履行苏联在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交涉中承担的义务,利用它与中共的特殊关系,促使中共承认美苏之间的谅解。

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考虑党的战略和策略时,主要是依据他们对战后美苏关系发展趋势的判断,而非对《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了解。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后,毛泽东一度认为,美英苏的战时合作在战后可能会维持下去,受其影响国共在战后可能继续合作,中国有

^① 王若飞同志报告记录,1945年8月15日,存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号远研44号

可能走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发展道路。^①此后尽管国共关系时紧时松，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也起伏不定，毛泽东从未根本否定过这种估计。毛泽东当时设想，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取决于两个条件：其一是苏联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和美苏在战后继续合作；其二是中共的力量获得一定的发展。抗战结束后，毛泽东并不认为这两个条件都已经具备了。在国际上，苏联的军事胜利的确是令人鼓舞的，但在美国加强援蒋时，中共却得不到苏联的直接援助。在国内，中共的实力尚不足以阻止国民党发动内战。因此毛泽东在决心利用日本投降之机争取使党获得强大实力地位的同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防止蒋介石发动内战，而且他倾向于认为，制止内战的关键还是要有美苏之间的妥协和它们对国民党的压力。^②

然而国际压力的方向却是对着中共的。先是美国公布了接受日本投降的“一号命令”，使国民党政府得到国际承认的受降权。随后是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美国方面则以出面担保毛泽东安全的方式给予支持。这时斯大林直截了当地要求中共放弃武装斗争，向蒋介石妥协。这种无异于落井下石的做法当然要引起毛泽东的愤慨。^③

中共中央最终还是接受了斯大林的劝告。毛泽东在冷静分析形势后认为，中国在东方对于美国犹如欧洲的希腊对于英国，为其所必争，“苏联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必不能实现，因此苏联不可能公开援助中共。这就决定了中国只能走法国式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④。据此，中共中央决心作出相当大的让步，争取通过谈判实现和平。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1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毛泽东：《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1945年7月29日，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133-1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② 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1945年8月15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08-109页；毛主席在日本投降时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室存，编号：A-100101。

③ 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的经历》（中译本），125页，北京，三联出版社，1957年；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12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

④ 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1945年8月15日。

中共领导人认真争取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并不等于他们认为肯定能达成协议。毛泽东决定赴重庆谈判时,更多的是依据对美苏对华政策的分析,而且他清楚地知道中共面临的困难。这决定了他一方面决心改变“七大”制订的联合政府的方案,准备在政治上作更多的让步;另一方面对谈判的结局持相当保留的态度。^①进一步说,在毛泽东对战后国共妥协的构想中,中共必须将主力向华北和东北集中,造成控制大片根据地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局面。这种构想本来就与得到苏联的支持有密切的联系。毛泽东在赴重庆之前,中共中央已经大致确定了向北收缩力量和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从这种战略布局看,中共中央决定与国民党谈判,可能也包含着协调与苏联的关系,以换取苏联在更大的战略方面的支持。正是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中央开始实施争取东北的战略。

1945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提出了夺取东北的战略方针。^②战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也因此出现了新的转机。战争期间,苏联主要是通过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协调政策来实现它在东北的目标,即在与苏联东面接壤的地区造成一个安全缓冲带,防止其他大国势力进入,以致战后形成对苏联安全的新威胁。苏联在与美国和国民党协调政策的过程中,并没有考虑过中共这个因素。甚至在苏军制定对日作战计划时,也未考虑如何与控制着大片华北和东北接壤地区的中共军队合作,以致苏军参战后在华北和东北不同地区对前往会师的中共军队作出了相当混乱的反应。直到1945年8月上旬中共军队到达沈阳后,当地苏军还要向莫斯科请示政策。^③

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后,苏联最初持谨慎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担心中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1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 刘少奇:《目前形势与战略部署》,《刘少奇选集》第1卷,165-1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③ 亚·米·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中译本)下册有关部分,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
谢·马·什捷缅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中译本)下册有关部分,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
另见程耿关于我军已与苏联红军会师向中央的报告,1945年8月15日;曾克林谈进军东北和四保临江的有关问题,见《党史通讯》,1981年。

共的行动会影响苏联与美英的关系。^① 一些地区的苏军对前往接应的中共军队表示友好，不过是他们长期接受政治教育的自然反应。1945年8月14日，东北苏军代表前往延安，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了苏军统帅部的口头通知，即在苏军撤出之前，中共军队不要开入东北，已进入大城市者请自行退出，苏军撤出后，“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由中国自行解决”^②。

然而时隔不久，苏联开始调整它在东北的政策。苏联政策的变化主要是由美国的行动引起的。美国由于担心苏联会利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完全控制东北，一再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③ 加之1945年8月14日开始的伦敦外长会议未就对日管制问题达成协议，而且美军开始在华北港口登陆，并大规模向华北和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这些情况导致苏联大幅度调整其东北政策，其主要表现就是全力支持中共夺取东北。1945年9月初，苏军向中共东北局和中共中央建议，抽调10—15万军队进入东北，守住东北大门，苏军将向中共提供大批军事装备。9月下旬，苏军代表进一步鼓励东北局，在东北“应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迅速派人“接收工业中心及城市工业”，苏军并可协同中共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苏军代表甚至建议，最好将中共“党的中心移到此间”^④。

苏联东北政策的变化对中共的战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苏联出兵东北后，中共中央由于无法确切了解其政策，迟迟未下全力争取东北的决心。1945年8月中旬苏军代表访问延安后，中共中央虽然提出了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但它当时的设想只是军队抢先进入东北或部署在靠近东北的地区，而且进入东北后部队应部署在东北的东部、西部和北部，控制苏军未驻扎的乡村和一些中小城市，大发展的时机是在苏军撤出以后。^⑤

① 谢·冈察洛夫、约·刘易斯、薛理泰：《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100页，斯坦福，1983。

② 中央关于东北情况及与苏军代表谈判问题的通报，1945年8月14日。

③ 《美国对外关系》1945年第7卷，226—228、230—231页。

④ 东北局关于与苏军交涉经过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5年9月18日；辰兄态度积极关系皆好，1945年9月18日。

⑤ 军委关于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1945年9月1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02—103页。

至 1945 月下旬,在东北苏军的鼓励下,中共中央下决心“竭尽全力,霸占东北”,准备在南满和热河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性决战。^①为此中共中央进一步向苏联方面提出推迟苏军撤出东北及阻止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港口登陆和接受政权等要求。^②苏方尽管表示推迟撤军有困难,但同意在撤军前不准国民党军队空运长春。另外苏军还准备向中共军队提供武器装备、通讯器材和运输工具,允许中共军队在国民党军队登陆地区自由行动,在长春除市长外,政府部门领导人均可由中共更换。^③苏军从营口和葫芦岛撤出后,即协助中共军队占领了这两个地区,致使国民党军队一直未能在那里登陆。

这一时期中共与东北苏军关系的发展对双方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苏联为了巩固它在东北的实力地位,除了支持中共争夺东北外,没有更好的选择。中共要实现其争取东北的计划,没有苏联的认可和支助也是不可能的。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与苏联形成了一种战略关系。此后尽管苏联一再调整其东北政策,但中共与苏联在这一地区形成的战略配合关系从未根本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时期中共与苏联在东北的关系的发展,是战后双方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此后双方关系发展的一块基石。

(三)

中共与苏联在东北形成的战略关系毕竟是局部性的,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双方面临的外部压力,一旦促使双方合作的外部因素发生变化,它们的关系必定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1945 年 11 月中旬,国民党政府由于接收东北受阻,蒋介石决定中断与

^① 中央关于集中主力拒止蒋军登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 年 10 月 18 日;中央军委关于 11 月份作战部署的指示,1945 年 11 月 1 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页 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81、182、183、184、185、186、187、188、189、190、191、192、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1、202、203、204、205、206、207、208、209、210、211、212、213、214、215、216、217、218、219、220、221、222、223、224、225、226、227、228、229、230、231、232、233、234、235、236、237、238、239、240、241、242、243、244、245、246、247、248、249、250、251、252、253、254、255、256、257、258、259、260、261、262、263、264、265、266、267、268、269、270、271、272、273、274、275、276、277、278、279、280、281、282、283、284、285、286、287、288、289、290、291、292、293、294、295、296、297、298、299、300、301、302、303、304、305、306、307、308、309、310、311、312、313、314、315、316、317、318、319、320、321、322、323、324、325、326、327、328、329、330、331、332、333、334、335、336、337、338、339、340、341、342、343、344、345、346、347、348、349、350、351、352、353、354、355、356、357、358、359、360、361、362、363、364、365、366、367、368、369、370、371、372、373、374、375、376、377、378、379、380、381、382、383、384、385、386、387、388、389、390、391、392、393、394、395、396、397、398、399、400、401、402、403、404、405、406、407、408、409、410、411、412、413、414、415、416、417、418、419、420、421、422、423、424、425、426、427、428、429、430、431、432、433、434、435、436、437、438、439、440、441、442、443、444、445、446、447、448、449、450、451、452、453、454、455、456、457、458、459、460、461、462、463、464、465、466、467、468、469、470、471、472、473、474、475、476、477、478、479、480、481、482、483、484、485、486、487、488、489、490、491、492、493、494、495、496、497、498、499、500、501、502、503、504、505、506、507、508、509、510、511、512、513、514、515、516、517、518、519、520、521、522、523、524、525、526、527、528、529、530、531、532、533、534、535、536、537、538、539、540、541、542、543、544、545、546、547、548、549、550、551、552、553、554、555、556、557、558、559、560、561、562、563、564、565、566、567、568、569、570、571、572、573、574、575、576、577、578、579、580、581、582、583、584、585、586、587、588、589、590、591、592、593、594、595、596、597、598、599、600、601、602、603、604、605、606、607、608、609、610、611、612、613、614、615、616、617、618、619、620、621、622、623、624、625、626、627、628、629、630、631、632、633、634、635、636、637、638、639、640、641、642、643、644、645、646、647、648、649、650、651、652、653、654、655、656、657、658、659、660、661、662、663、664、665、666、667、668、669、670、671、672、673、674、675、676、677、678、679、680、681、682、683、684、685、686、687、688、689、690、691、692、693、694、695、696、697、698、699、700、701、702、703、704、705、706、707、708、709、710、711、712、713、714、715、716、717、718、719、720、721、722、723、724、725、726、727、728、729、730、731、732、733、734、735、736、737、738、739、740、741、742、743、744、745、746、747、748、749、750、751、752、753、754、755、756、757、758、759、760、761、762、763、764、765、766、767、768、769、770、771、772、773、774、775、776、777、778、779、780、781、782、783、784、785、786、787、788、789、790、791、792、793、794、795、796、797、798、799、800、801、802、803、804、805、806、807、808、809、810、811、812、813、814、815、816、817、818、819、820、821、822、823、824、825、826、827、828、829、830、831、832、833、834、835、836、837、838、839、840、841、842、843、844、845、846、847、848、849、850、851、852、853、854、855、856、857、858、859、860、861、862、863、864、865、866、867、868、869、870、871、872、873、874、875、876、877、878、879、880、881、882、883、884、885、886、887、888、889、890、891、892、893、894、895、896、897、898、899、900、901、902、903、904、905、906、907、908、909、910、911、912、913、914、915、916、917、918、919、920、921、922、923、924、925、926、927、928、929、930、931、932、933、934、935、936、937、938、939、940、941、942、943、944、945、946、947、948、949、950、951、952、953、954、955、956、957、958、959、960、961、962、963、964、965、966、967、968、969、970、971、972、973、974、975、976、977、978、979、980、981、982、983、984、985、986、987、988、989、990、991、992、993、994、995、996、997、998、999、1000。

^② 要求苏联红军再留驻热河两个月,1945 年 10 月 10 日;与国民党会谈方针及要求苏军缓撤,1945 年 10 月 10 日。

^③ 在彼所知情况,1945 年 10 月 10 日。

苏军的谈判。此时正值魏德迈来华视察形势，致使苏联怀疑蒋介石在东北的外交行动受到美国的指使。苏联方面认为，美国表面上不介入国共斗争，“但内部任务 极其庞大，有垄断全（中）国，甚至侵入东北的企图”。按苏联方面当时的估计，美蒋全力争夺东北尚需两个月时间作准备。^①

苏联显然不希望在东北与美国形成对抗的局面，所以它立即采取行动缓和中苏关系。在国民党东北行营宣布撤退第二天，苏联即向国民党政府表示希望继续谈判解决接收东北。8月中旬，斯大林向访苏的蒋经国说明，苏联无意介入国共斗争，不过国民党政府必须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并绝不允许美国人进入东北。^②

苏联在缓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的同时，也开始限制中共在东北的行动。8月15日，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说，上级已经决定长春铁路沿线城市全部交国民党政府，中共军队必须撤退到铁路沿线 50公里以外，并不得进入苏军驻扎地区，苏军撤出东北前不得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苏军代表还声称，为了维护苏联的利益，“必要时不惜用武力”驱逐中共军队。此后不久，苏军进一步要求中共交出已掌握的政权，并禁止中共在大城市中采取有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行动。^③ 这表明苏联已决定用直接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的政策取代帮助中共控制东北。

对于苏联政策的变化，中共中央最初的反应是复杂的。在接到苏军通知前，中共中央已经注意到东北外交形势的变化，认为中苏关系“处于危机之中”，东北局必须有所准备。^④ 在获悉苏军的要求后，中共中央立即指示东北局，对苏军的决定“只有服从”，同时应争取苏军尽可能推迟国民党政

① 魏德迈在华任务，1945年 8月 15日。

② 唐纳德·吉利恩和拉蒙·迈尔斯编：《在满洲的最后机会：张嘉异日记》，1972，152页，哈佛，1972；蒋介石：《苏俄在中国》，150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2。

③ 满洲不准作战，1945年 8月 15日，陈云：《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1945年 8月 15日，见《陈云文选》1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④ 在苏军预定方针不变情况下重新部署力量，1945年 8月 15日；中央关于东北的工作方针等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 8月 15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册，152-153页。

府进入东北的时间,并让中共继续控制锦州至山海关地区。^①这时中共中央毕竟还抱有一线希望,认为虽然已无法独占东北,但仍有可能在苏方的帮助下,在东北大城市取得一部分政权。东北局也相信会在“不久的将来里应外合,收复这些大城市”^②。一个偶然事件加强了中共中央的信心。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东北行营要员张嘉璈在重庆会见董必武,要求中共让出北宁路。中共中央据此推测,苏联在东北一方面是要阻止美军进入东北,另一方面是便利中共与国民党谈判。中共中央于1945年11月上旬指示东北局,要争取苏联出面促成国共合作接收东北大城市。^③

在如何理解苏联改变政策的动机方面,中共中央和东北局这时都较多地强调了苏联与美蒋斗争的一面。他们认为,苏联改变政策主要是为了同美国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外交斗争。这是中共中央一度指望在苏联帮助下取得或部分取得东北大城市的主要原因。当时处于东北前线的陈云、高岗和张闻天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在1945年11月10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苏联政策的目的是“保持远东和世界和平”,苏联在东北对国共的政策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因此中共在东北必须作长期斗争的准备,“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④他们对苏联政策的目的分析尽管仍然是不全面的,但毕竟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即苏联的政策是为其战略利益,而不是为中共服务的。

随着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恢复和1945年12月下旬美苏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就中国问题达成协议,中共中央终于认识到,苏联限制中共在东北的

① 中央关于让出大城市及长春铁路线后开展东满、北满工作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1984年,195页。

② 中央关于撤出大城市和主要铁路后东北的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0日;东北局关于撤出大城市后工作任务的指示,1945年11月1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1984年,195页。

③ 中央关于再开谈判之门给董必武、王若飞的指示,1945年11月10日,见中央统战部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1987年,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与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0日;中央关于争取我党在东北的地位及策略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1984年,195页。

④ 陈云:《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1945年11月10日,见《陈云文选》,1984年,195页。

发展，并不是一般性的和临时的策略行动，中共不仅不能独占东北，也不能再指望得到苏联的帮助，在东北大城市“插足”。1945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北工作的重心转向在远离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①

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从形式上看是中共在苏联改变政策的情况下迫不得已作出的选择，但从更深层次上考察，可以说它包含着中共领导人在认识对苏关系方面的新发展。苏联一再不顾中共的困难自行其是，使中共中央不能不从极为现实的角度考虑与苏联的关系。

在1945年初的国共谈判中，由于美国特使马歇尔的介入，中共中央多次设想邀请苏联参加国共谈判。在中共中央看来，苏联不过是在谈判中用来平衡马歇尔和向国民党施加压力的一个因素。中共领导人对邀请苏联参加国共谈判的意义说得一清二楚：“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互相牵制来保持独立的，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果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② 10月中旬国共谈判转入讨论东北问题后，中共中央不再认为苏联参与谈判是必要的了，因为苏联为了表示其公平，“可能要我对国民党作更多的让步”^③。11月间，由于美英和国民党政府掀起反苏浪潮，苏联在东北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又趋强硬，中共中央立即利用这一机会，争取东北苏军将部分地区交中共接收。鉴于以往的教训，中共中央告诫东北局务必交涉清楚，因为“将来苏联在经济合作问题解决时，可能再对蒋表示好感”^④。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中央一直对苏联的政策采取配合和适应的方针，除了策略方面的考虑外，也同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对战后国际形势的看

① 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945年10月15日，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1960～1961页；刘少奇关于应以主要力量建立东、西、北满根据地致彭真电》，1945年10月15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1541～1542页。

② 中央关于提议英国苏联参加国共谈判问题的指示，1945年11月11日。

③ 中央关于东北停战谈判情况致东北局电，1945年10月15日，见《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2卷，158页。

④ 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指示，1945年11月15日。

法有密切的联系。他们认为美英苏战时结盟形成的“世界新秩序”在战后将继续下去。在这个“新秩序”中,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与之相联系的是各国的内部问题也将通过妥协来解决。^①抗战结束后,中共领导人认为,战后国际问题的中心是美苏之争,中国的国共斗争是美苏斗争的反映。^②可以说中共领导人一直是在美苏合作格局的前提下考虑党的战略的,使党的政策不断适应苏联政策的变化则是这个大思路的必然结果,尽管他们已经意识到苏联政策经常是对中国革命的束缚。

1945年春,伴随冷战格局的形成,美苏在东北的斗争也进一步尖锐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绝不甘心东北由国民党政府一家独占。苏军在即将撤离时建议中共可在长春铁路沿线“放手大打”,并表示支持中共在苏军撤出后夺取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③苏联的支持对中共领导人正是求之不得的,但他们也深知东北问题“中外瞩目”,而且国共谈判正处在关键时刻,一旦在东北夺取大城市,必须考虑其后果和国际上的反应。

1945年7月间,正当国共争夺长春之战白热化之际,毛泽东在一份仅供党内部领导人传阅的文件中指出,认为美苏妥协仍是一种总的发展趋势,但它们的妥协并不意味着各国人民必须“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更重要的是美苏妥协只能是各国人民对美斗争的结果。^④按照他的看法,各国人民只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才是合乎逻辑的。1945年8月至9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中,根本修改了他以往对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的看法。他认为战后国际政治的中心不是美苏之争,而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美国在没有征服“中间地带”以前“是谈不到进攻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解放日报》1945年4月8日。

② 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9月1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155-156页。

③ 中央关于控制长春、哈尔滨及中东路保卫北满给东北的指示,1945年7月18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154-155页。另见“可把我不占沈阳不断电源作为同国民党谈判资本”,1945年7月18日;“速向苏方交涉力争我接管长哈齐”,1945年7月18日;彭真关于苏军撤退日期致李黄电,1945年7月18日。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155-156页。

苏联的”，因此处于“中间地带”国家中的人民革命不论对于维护世界和平，还是对于保卫苏联，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形势下，中共的方针就是“战争的方针”，以战争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①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主要是针对党内不同意见和为党制定政策而提出的，但不能因此低估其与当时苏联的国际战略思想的分歧以及毛泽东在谈话中将以中国为代表的民族革命运动置于超过苏联的战略地位之上，对以后双方关系的潜在影响。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重新估计表明，中共中央已经不再认为美苏关系对中国政治形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中共不仅将摆脱美苏格局的束缚，而且将不再受苏联外交战略的束缚。

(四)

中国内战爆发后，苏联最关心的是防止美国的介入。苏联一面利用一切场合，揭露和抨击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一面向美国表示，苏联仍有意与美国协调对华政策。1945年10月，斯大林告诉罗斯福的儿子说，苏联在“远东问题上愿意和美国实行共同的政策”^②。莫洛托夫给马歇尔的一封信表明，斯大林所谓的“共同的政策”，就是指1945年10月三国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③这一时期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中共不可能在内战中取胜。

当中共领导人下决心以战争手段彻底打败国民党时，他们实际上也下定决心要维护中国革命的利益，打破远东以美苏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这时毛泽东对苏联与美国搞的雅尔塔体系已经极为反感，对苏联总是要求中共为配合苏联的对外政策而对国民党妥协十分不满。1945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政治小组讨论会的发言中，重申了他在1945年10月提出的观点，并批评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右倾”，认为法共和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1964年，1964页；《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的谈话》，1945年10月18日。

② 《斯大林文集》1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③ 美国学者阿尼金：《外交史》（中译本）第3卷上册，1979年，北京，三联出版社，1982年。

意共热衷走议会道路是导致那里的革命力量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他还表示特别赞赏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策,认为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上了波茨坦和雅尔塔的协议的当,只有南共坚持武装斗争才取得了胜利。^①毛泽东这时或许并不知道法共和意共的政策与苏联有直接的关系,但不管怎么说,他的这番评论都构成对苏联的批评和挑战。在 1949 月的中央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醒全党,要“靠自己,不靠外援”^②。

中共在军事上的胜利导致苏联领导人开始重新考虑与中共的关系。1949 年 10 月 16 日,斯大林在会见南共代表时,第一次公开承认,他在判断中国形势方面犯了错误,形势的发展证明中共领导人是正确的。^③同年春季,苏共中央决定接受中共的请求,帮助修复东北的铁路。缘月间,斯大林告诉受命前往援助中共的科瓦廖夫,苏联将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共,只要“两国走上同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就能得到保证”^④。苏共中央的决定和斯大林的谈话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如果说在此之前苏联与东北中共控制地区保持贸易联系是地区性的和策略性的行动,那么此后对中共的援助则是带有战略性的考虑了。苏联铁路专家小组为东北铁路交通的恢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中共东北部队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可以说苏联在东北及时向中共提供援助,成为此后双方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契机。

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前后,毛泽东显然认为需要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加强与苏联的关系了,因此他向斯大林提出了访问莫斯科的设想。尽管这一设想由于双方的种种考虑在内战期间始终未能实现,但它毕竟表明了

① 陈毅传达毛主席十二月中央会议谈话,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存,编号:远科科图藏

② 陈毅传达毛主席十二月中央会议谈话,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存,编号:远科科图藏

③ 前引《苏南冲突的经历》,38页。

④ 前引科瓦廖夫:《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见《国外社科信息》1989(5),10页。

中共领导人加强与苏联的关系的迫切愿望。^①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开始加紧与苏联发展全面关系的政治和思想准备。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恶化后,中共中央迅速于 7 月 16 日通过决议,表明中共站在苏联一边。^② 7 月 15 日,刘少奇发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提出在两大阵营激烈斗争的时期,“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不论哪个民族是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③刘少奇的文章既是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也是在向苏联表明中共中央的立场。这一时期中共与苏联在东北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东北局在处理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政策上,也在相当程度上考虑了苏联方面的要求。

7 月初东北全境解放后,斯大林显然感到有必要更全面地了解中共党内的情况及其各项政策。据科瓦廖夫回忆,1949 年 7 月他从莫斯科重返中国后,他的任务已经从组织对中共的技术援助转为向斯大林报告中国局势和中共党内的情况,并保持斯大林与毛泽东个人之间的联系。而且从这时起,斯大林开始亲自掌握对华政策。^④ 7 月 15 日召开的苏共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访苏的问题,斯大林在会议上决定派米高扬访问西柏坡。^⑤

7 月 16 日米高扬到达西柏坡。在随后的三天里,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与米高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米高扬则立即将谈话内容报告斯大林,并向中共领导人转达斯大林的指示和意见。从目前所能了解到的情况看,双方讨论的主要内容包括:(1)中共的战略和各项政策。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指出,解放军不久将打过长江,美国军事干预的可能性不大。中国革命胜利后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并在对外政策上“一边倒”,在经济建设中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米高扬对于中共的基本政策没有表示异

① 关于毛泽东访苏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可见前引《在历史巨人身边》147 页;聂荣臻回忆录》下册,125 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3 年;安·列多夫斯基:《1949 年 7 月- 8 月米高扬秘密访华》,《远东问题》1982 年。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1949 年 7 月 15 日。

③ 《人民日报》1949 年 7 月 15 日。

④ 前引《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27 页。

⑤ 《1949 年 7 月- 8 月米高扬秘密访华》,27 页。

议。(圆)毛泽东向米高扬介绍了中共中央与王明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以消除苏联的误解。米高扬在此之前已得到指示不会见王明,这表明了苏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不介入中共党内斗争的立场。(猿)毛泽东在东北港口、新疆和外蒙古等问题上婉转地转达了希望苏联改变其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奉行的政策。米高扬则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阐明了苏联的原则。在东北港口问题上,米高扬转告毛泽东,斯大林认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中共掌握政权后,苏联主张签订对日和约后从旅顺撤军,如中共不赞成,苏联亦可立即撤军。关于新疆问题,米高扬表示苏联不支持那里的独立运动。关于外蒙古问题,米高扬转告毛泽东,斯大林主张维持《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决定。①中共领导人与米高扬的会谈表明,双方在中共的现行政策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在涉及未来双边关系上的分歧并未解决。

中国学术界对于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争论最多的问题是,米高扬是否代表斯大林劝阻中共不要打过长江。近年来俄罗斯公布的有关档案已使这一问题基本上得到澄清。员月 苑日,即在苏共政治局决定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之前,斯大林将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建议转告毛泽东,并附上苏联草拟的给国民党政府的复文。复文称“苏联政府一向主张中国停战建立和平,但在同意调解之前,苏联政府希望知道对方(中共)的意见”。斯大林还附上一份为中共拟就的答复,在其中强调了中共希望和谈,但反对美国参与调处。员日,毛泽东复电斯大林说,苏联的答复会使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参与调处“是适当的事”,国民党也会以此为借口指责中共“是好战分子”,而且此时接受国民党的和谈建议,会在革命队伍内部引起思想混乱。毛泽东据此修改了苏联给国民党政府的复文,要求苏联明确表示不参与调处。在毛泽东复电以前,斯大林向毛泽东发出了第二封电报,解释他前电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共在政治上取得主动。在接到毛泽东员日的电报后,斯大林立即打电报向毛泽东详细解释了他的看法。他估计中共如同意谈判可能会发生两种情况:其一是在没有外国参与的情况下,国民党会拒绝谈判,如此它将承担战争责任;另一种情况是国民党同意

① 前引《在历史巨人身边》猿猿-猿愿;另见 猿猿年 员-圆月米高扬秘密访华》。

谈判，那时中共可提出自己的条件，估计国民党是不会接受的，这样中共仍可取得主动。斯大林还表示这只是建议，毛泽东接受与否都不会影响双方的关系。同一天毛泽东根据斯大林 5 月 1 日的电报，复电称完全同意斯大林的意见。5 月 2 日斯大林电告毛泽东：“这件事结束了。”^①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往来电报表明，米高扬没有必要再与中共领导人讨论解放军是否过江的问题了。当然，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证明的并不仅仅是这些。在斯大林草拟的给国民党政府的复文中，透露着他真正关心的问题，即防止美国的介入。根据他的一贯看法，国共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是避免美国干涉的最好办法了。这时国民党政府的基本方针就是要争取国共“两分天下”、“隔江而治”，而和谈是达此目的的惟一手段。在这种背景下笼统地提出“停战”与“建立和平”，其后果可想而知。说斯大林不理解中国政治形势的复杂性是没有道理的，他这样做多半是对美国可能的干涉过于担忧了。

以上对斯大林的评论毕竟是推测。不过不论斯大林对中国政治的复杂性是否理解，中共领导人肯定知道此时一般性地谈论和平的后果。而且根据他们战后与苏联几次介入国共斗争的经验，很容易认为苏联是又一次要求中共妥协，而其含义只能是与国民党“划江而治”。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要告诉斯大林，用什么方式决定中国的前途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和中共不必再用迂回战术了。毛泽东一再向米高扬强调，解放军可以不费力地打过长江，而且美国不可能进行军事干涉。这表明他确实认为——也有理由认为，斯大林曾经有意阻止解放军打过长江。

米高扬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对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苏联方面，这种积极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斯大林极大地增加了对中共的信任。中共领导人在制定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面临的难题之一，就是他们在处理与美苏任何一方的关系时，必定会受到另一方的牵制。一旦中共决心密切与苏联的关系，它就必须准备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付出代价。而恰恰是在这一敏感的问题上，斯大林主动给了中共回旋的余地，即

^① 斯大林致毛泽东，1945年5月1日；毛泽东致斯大林，1945年5月1日。斯大林与毛泽东的这些来往电文存于俄罗斯总统档案馆。

赞成中共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发展贸易和建立外交关系。斯大林指示科瓦廖夫转告中共领导人,苏联无意干预中共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① 源月间,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为了防止美国在中国制造分裂,中共应提出以其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为条件,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②

猿年初是中共领导人开始为未来的新中国设计外交蓝图的重要时期。在 员月上旬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不必忙于要帝国主义承认,我们是打倒它,不是承认它”,“忙的是与苏及新民主主义国家通商建立外交关系”。^③ 不过这还仅仅是一种设想,会议通过的决议基本上没涉及外交问题。中共中央在会议后发布的有关指示也主要是针对如何处理西方国家外交机构的问题。米高扬的访问及随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发展促使中共中央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在猿月初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热情洋溢地称赞苏联对中共的帮助和支持,称“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④。他在会议的正式报告中实际上宣布了新中国的外交将“一边倒”^⑤。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共中央最终确立了与苏联结盟的政策。

这时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发展不可能不影响它与美国的关系。但是这种影响达到什么程度和导致什么后果,还取决于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处于何种状态。在中共领导人的观念里,在美苏尖锐对立的世界格局中,任何政治力量都必须决定自己站在哪一方。但政治原则毕竟不是外交政策,它们是可以区分的。新中国与美国可以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只不过要排在苏联的后边,而且美国必须放弃敌视中共的政策,并以被认为是平等的态度对待新中国。内战爆发后,中共对美国实行的基本上是一种防范政策,即防止美国的军事干涉。中共领导人实际上认为美国既没有能力进行大

① 《不确定的伙伴》猿猿-猿猿页。

② 《不确定的伙伴》猿猿页。

③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猿苑猿页。

④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猿苑猿页。

⑤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猿猿年猿月猿日，见《毛泽东选集》第源卷，猿猿-猿猿页。

规模的军事干涉，对国民党的援助也相当有限。直到 1949 年 7 月在处理沈阳美国领事馆事件时，中共领导人并不认为取得全国政权后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是不可能的。^① 但此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使中共对美政策强硬起来。

7 月间，一位叫雷文和的美国记者告诉中共代表说：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是如何在新中国政权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美国政府有意承认新中国，条件是政府中要有美国可以接受的反对派，以及允许美国有在上海和青岛的驻军权。毛泽东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认为美国政策已从单纯支持蒋介石转变为一面支持国民党进行军事抵抗，一面在革命队伍内部组织反对派，故必须粉碎美国的“政治计划”^②。1949 年 7 月 15 日中共政治局通过的决议特别强调要警惕美国的两面政策，击破“帝国主义的阴谋”^③。

解放军占领南京后，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代表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经数次会谈。司徒雷登在会谈中表示，美国目前不可能承认中共政权，而且希望新中国政府“尽量吸取一切民主开明人士参加”。在会谈期间，司徒雷登竟在南京外交界张扬他已经与中共方面建立了联系。^④ 他那种傲慢的言论和轻浮的举动必然引起中共领导人的反感。美国方面一再对新中国政府中是否有反对派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只能推动中共中央更坚定地实行与苏联结盟的政策。如果说司徒雷登与中共代表的接洽给中共外交政策带来了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使中共与苏联结盟带上了更鲜明的与美国对抗的色彩。

(五)

解放军打过长江后，中苏结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7 月间中共中央即

① 中央关于挤走美英法领事馆问题给东北局电，1949 年 7 月 14 日。

② 毛泽东：对“雷文和谈话摘要”的批语，1949 年 7 月 14 日；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 年 7 月 14 日，见《毛泽东选集》第 3 卷，543 页。

③ 目前形势和党在 1949 年的任务，1949 年 7 月 15 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册，547-548 页。

④ 黄华与司徒谈话内容，1949 年 7 月 14 日。

决定刘少奇组团访问莫斯科。远月猿日,在刘少奇前往苏联的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重申新中国将坚决“一边倒”向苏联阵营。^①早在源月愿日,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一次谈话中就已经详细地阐述了这篇文章中的主要观点。^②他选择在刘少奇访苏前公开予以发表,显然也是为了一步消除斯大林的疑虑。

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后,起草了一份给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书面报告。从报告的内容看,中共代表团至少希望在下列问题上与苏联达成一致意见,即:(员)使苏联了解并赞成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大政方针;(圆)在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方面与苏联协调;(猿)新中国成立后争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尽快予以承认;(源)在实现中国统一的斗争中得到苏联的帮助,包括解决新疆和台湾问题;(缘)争取苏联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远)废除员源年苏联与国民党政府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代之以新的中苏同盟条约;(苑)确定处理中苏两党关系的原则。^③

斯大林对凡是涉及中国国内政策的问题,基本上表示赞成。在处理两党关系的问题上,斯大林强调要平等和互相尊重,并称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领袖”,苏联和欧洲共产党人应向中共学习。对于中共希望得到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斯大林也都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惟独在外交方面,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的答复相当复杂。他明确表示一俟新中国成立,苏联立即予以承认。但在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问题上,斯大林一方面承认该条约是“不平等的,因那时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另一方面对该条约涉及的有关问题——如苏联在旅顺驻军和中东路等,他的态度是模棱两可和试探性的。^④

刘少奇对苏联的访问使中共在建国前基本完成了与苏联结盟的准

① 《毛泽东选集》第源卷,员猿-员猿页。

② 余湛邦:《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一次重要谈话》,见《中共党史资料》第源期,员-猿页。

③ 前引《在历史巨人身边》猿-猿页;另可参阅朱元石:《刘少奇员源年秘密访苏》,见《党的文献》员(猿)苑-苑页。

④ 前引《在历史巨人身边》猿-猿页;《刘少奇员源年秘密访苏》苑-苑页;《不确定的伙伴》圆-圆页。

备,剩下的就是如何处理旧的中苏条约和是否签订新条约了,而这正是双方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中国革命的胜利意味着战后东亚国际关系经历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它不仅摧毁了这一地区以《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且迫使有关各国面对一个在战火中崛起的新型的革命国家。苏联要与新中国建立同盟关系,势必要进行两方面的调整。首先苏联需要理解,中共在中国革命中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中国革命的胜利对远东国际格局意味着什么。斯大林给予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的前所未有的热情赞扬足以证明,他在这方面的理解力要比美国领导人深刻得多。其次,苏联必须重新考虑如何处理它从以往的国际格局中获得的好处。与新中国结盟苏联将得到的战略利益是显而易见的,问题的关键是苏联是否情愿放弃它在东北获得的权益。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显然不如向中共领导人赠送“马克思主义领袖”这类头衔那么慷慨痛快。

中共领导人对处理 1945 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态度也是相当复杂的。他们在早年都走过一段由爱国而革命、而信奉共产主义的道路。促使他们决心“走俄国人的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苏联在 1917 年和 1945 年两次宣布放弃沙皇统治时期在中国侵占的土地和攫取的一切特权。对于他们来说,“走俄国人的路”不仅意味着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而且意味着建立一种新型的国际秩序。对于 1945 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共领导人肯定极为不满,当时中共报刊对该条约的赞扬既是策略性的,也是有范围的,即只是肯定它在维护远东和平方面的积极意义。^①

当中共领导人决心与苏联结盟时,他们对苏联在此问题上将持何种态度并无把握。苏联在战后的表现使他们有理由怀疑,斯大林是否会真的履行总是挂在嘴上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解放军过江前,中共领导人已经在向党外人士打招呼,告诉他们“对外条约有的废除,有的则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以保持”^②。所谓“要加以修改”或“可以保持”的,只能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了。中共领导人作这种准备本身就表明,他们在内心深

^① 见 1945 年 8 月 15 日、8 月 16 日重庆《新华日报》社论。

^② 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的报告》，1945 年 8 月 15 日，见《周恩来选集》上卷，14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

处对苏联将如何处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不信任的。

刘少奇访苏期间曾就处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向斯大林提出三种解决方案：一是保持该条约，新中国予以承认；二是废除该条约，重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三是两国政府换文，说明暂时维持该条约的现状，但准备在适当时机重签新约。刘少奇同时还提到蒙古和战后苏联从东北搬走的厂矿设备问题。斯大林除许诺重订新约外，对签订新条约的原则、时间和有关的具体问题均未表示明确的态度。这使条约问题成为后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的焦点。

1950年1月1日，毛泽东在到达莫斯科的当天便与斯大林会谈，讨论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斯大林在会谈中称，目前不宜改变《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合法性，否则会牵涉到千岛群岛。他建议就旅顺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即可。在毛泽东坚持要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斯大林才表示两年后可对条约作大的修改。^① 1月1日，毛泽东通过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提出两个方案，即：(1)周恩来来莫斯科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2)双方广泛讨论有关问题，不必达成协议。^② 但在1月1日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中，斯大林避而不谈毛泽东的建议。显然斯大林这时根本无意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其原因无非是既不愿改变远东地区（包括外蒙古前途在内的）既定的格局，也不愿失去苏联从这个格局中获得的权益。

直到1950年1月1日，苏联方面的态度出现了关键性的变化。当天毛泽东在与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会谈时提出三个供苏方选择的方案：(1)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简短的公报，说明双方在重要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3)发表一项共同声明，说明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当即表示第一个方案最好，可请周恩来到莫斯科来谈判。^③ 毛泽东在会谈后立即电告周恩来准备赴苏谈判，不过他这时对新

①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167—168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

② 前引《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对话》，167页。

③ 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谈判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50年1月1日、1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125—126页。

条约的内容持相当保守的估计，认为与旧条约相比，新条约只是“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①。

1950年10月周恩来到达莫斯科。10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会谈，确定了新条约的基本内容。此后谈判进入具体讨论阶段。一些间接的资料表明，双方在新条约的关键问题上，如中东铁路、旅顺、大连等，进行了有时甚至是尖锐的“讨价还价”（毛泽东语）。此外斯大林还以提供军事援助为由，坚持就东北和新疆限制其他国家进入达成一项《补充协定》。^②最后达成的协议对于双方肯定都不是令人满意的，它是一系列协调和让步的结果。10月27日中苏签署《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以此为标志中苏同盟终于诞生。

综观战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发展及新中国领导人与斯大林谈判的全部过程，可以说中苏结盟是在双方不断协调战略利益并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中完成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双方关系达到了最高潮，为以后17年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历史的进程也表明，苏联领导人的行为也在中苏结盟的同一时刻为后来中苏同盟破裂埋下了种子。

（本文系作者提交1995年11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① 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谈判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50年11月10日、11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225-226页。

^② 前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0），161-162页；另见《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1950年11月11日，见《国外中共党史研究》1992（4），161-162页。

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 谢·冈察洛夫
美国斯坦福大学 约·刘易斯、薛理泰

员

1959年源月初,毛泽东不断向科瓦廖夫讲述党内斗争的历史,并强调其结果常常是党的领导人被驱逐和遭到清洗。科瓦廖夫的印象是,毛试图使他确信,毛本人并没有伤害到亲莫斯科的任何中共领导人。此外,每次谈话期间,毛都以开玩笑的方式说,他是斯大林不信任的人,被看作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被认定是以王明为首的“莫斯科派”的敌人。在所有这些场合,毛都表现出他对于不久即将不可避免地斯大林面对面进行会晤感到忧虑。^①

但是,毛也利用这些机会强调,对于苏联高层领导他是一个陌生人。在中共领导人中,唯独他从未去过莫斯科,也没有会见过除米高扬以外的任何苏联政治局委员。尽管明显地有疑虑,毛知道他不得不去(苏联)。于是,1959年源月底,渡江战役正在进行时,毛告诉科瓦廖夫,他准备飞往莫斯科。

科瓦廖夫顺从地转达了毛的要求,斯大林再次拒绝了毛:“你不要急于

^① 除非另有注释,此处及下面五段的情况引自科瓦廖夫:《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远东问题》1959年员-猿期合刊,1959年10页(以下简称“科瓦廖夫(圆)”)。又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1959-猿园页,北京,1959年。

访问莫斯科。由于南方局势复杂，由于中国实际上还没有建立政府，而这种状况对革命事业有一定危害，所以目前你不能离开中国。”虽然这个答复在表面上似乎与斯大林在 1955 年 5 月的答复相同，但毛泽东这次收到电报后却表现得完全不同。他的反应是如释重负，甚至兴奋。他三次振臂高呼：“斯大林同志万岁！”

科瓦廖夫立即察觉到，毛如此感叹是由于斯大林明确地承认他是中国的领导人，并由此推论正值中国内战行将结束的最后关头，斯大林并没有试图剥夺他的权力。为了与斯大林沟通，这位主席决定派以中共领导人中第二把手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去莫斯科。^①

此外，斯大林的这封电报在两位领导人之间一系列通信中并不是对许多悬而未解的问题取得的惟一一次共同的意见。

夏天，就在刘出访之前，毛提到了另一个影响中国与苏联关系的敏感地区——新疆。由于这个西部地区是从苏联到中国最短也是最安全的路程，毛告诉科瓦廖夫，在“与帝国主义进行一场新的战争”的情况下，这一地区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毛顺便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计划在 1954 年—1955 年将国民党赶出这一地区。

毛显然知道斯大林为了把新疆置于苏联控制之下而进行的长期努力，并且可以肯定斯大林不会轻易采纳他的计划。毛不断告诉科瓦廖夫，并通过他告诉斯大林，他的目标是与苏联利益一致的，新疆可以成为双方军事合作的基地。我们没有发现任何斯大林反对毛在这个地区的军事目标的记录，而在刘访问期间，毛从前的告诫成为关于新疆的重要协议的出发点。

此外，刘出访之前，毛和斯大林就有关未来中国共产党国家的一些问题达成了协议。据说毛在 1955 年 5 月的电报中表示他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加快建立中央和地方权力机构，不要按照苏维埃组织的模式建立这些机构，而要更多地注意工业的发展。同时，在科瓦廖夫及其小组的直接参与下，双方制定了一项关于苏联对中国进行经济技术援助规模和形

^① 毛在 1955 年 5 月初作出关于刘出访的决定。师哲：《我随同毛主席访苏》，载《远东事务》（莫斯科）1955 年 10 月 15 日，第 15 页；《新中国诞生前夕》，载《缅怀刘少奇》，第 167 页，北京，1983 年。

式的初步协议。^①

有些事情毛与斯大林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虽然其中一些问题在刘出访之前得到了某种澄清。问题的症结是蒙古的前途。毛在 9 月曾向米高扬提出蒙古问题，后来中国人又一再向科瓦廖夫提出同样的问题。在一次讨论政府组成中的中国少数民族问题时，毛问科瓦廖夫：“为什么不让内蒙和外蒙在自治基础上统一起来而加入中国的民主共和国呢？”苏联顾问回答说，他无权处理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内部事务，但他认为蒙古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自治”^②。

苏联对中国贷款的可能性是另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在 9 月的一封电报中，斯大林说他准备安排同中国进行易货贸易，但无法马上满足毛提出的贷款要求，因为任何贷款必须通过最高苏维埃批准。他提出，他不反对立即提供贷款的想法，但是在有关条款制定之前不能批准。^③

斯大林对于解决中国人提出的问题有他自己的安排，他并不顾虑刺探毛所要得到的答案。在米高扬访问期间，毛曾提出中国要求无偿取得在中国长春铁路中苏联股份的可能性问题，此后斯大林多次要求科瓦廖夫试探中国对 1952 年铁路协议的真正立场。斯大林特别渴望了解中国领导人是否认为这个协议是互利的。当科瓦廖夫与高岗和陈云谈到这件事时，他们都坚持认为条约是平等的和令人满意的。然而，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提出他个人的看法，即中国人暗中想要全面控制铁路，实际上他们正在尽力从苏联人手中夺取这条铁路的管理权。^④

随后，刘少奇带着这些曾在原则上达成协议并可以进行详细讨论的问题，以及那些基本上仍无法解决的问题飞到莫斯科。例如，边界问题、在新疆的合作问题、贸易问题和援助国家建设问题属于第一类。蒙古的前途和中国长春铁路问题属于第二类，即留待以后毛与斯大林最高级会谈时解决的问题。还有一些不明确的地方，包括像贷款这样一类问题，可能在

① 科瓦廖夫未公布的回忆录。

② 此处及下段引自科瓦廖夫《回忆录》。

③ 电报的有关部分见科瓦廖夫未公布的回忆录。

④ 科瓦廖夫《回忆录》，文件可见科瓦廖夫私人档案。

刘访问期间解决，或留待最高级会谈解决。

1959年 缘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派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的决议。这次访问主要任务有三项：第一，刘将向苏联人详细介绍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国武装斗争的经验。第二，他将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影响的观点。最后，他最迫切的任务是取得苏联的理解和同情，并且在人民解放军获得胜利后使中国得到苏联的援助和国际的支持。^①

中国人非常重视这次访问的结果，他们立即积极地进行准备工作。这项工作由党的领导人王稼祥主管，他是后来的驻苏大使、前面各章中提到的苏联问题专家之一。1959年 苑月 圆日代表团从北平出发，大约一个星期后到达苏联首都。^② 代表团离开莫斯科是 愿月 愿日。^③

当王稼祥正处于准备的最后阶段时，毛 远月 猿日发表了她的“一边倒”宣言。苑月 远日《真理报》发表了毛的讲话，为几天后刘少奇的到来定了调子。^④ 斯大林与中国代表团会见了 远次，这一事实说明他对会谈非常重视。^⑤ 就在刘到达前夕，斯大林正在他的战略计划中重新安排中国的位置，并且作出决定，中国将成为他的一个负有自己那份责任的盟友。

刘少奇一行到达后不久，斯大林在他的别墅孔策沃设宴招待代表团，苏联最高层领导人全部出席。招待会结束后，中国人便着手制订一份包括他们认为需要解决的所有重大问题的书面报告，这样斯大林就可以作好

①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猿猿页。

② 刘少奇代表团乘火车悄悄地离开北平，在旅顺转乘飞机途经北朝鲜，大约在 苑月 愿日到达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有高岗、王稼祥、徐介藩和师哲。雷民（管译）：《毛泽东、斯大林会晤前后》，111页，成都，1983。朱元石：《刘少奇 1959年秘密访苏》，《党的文献》1983（4），苑1- 苑2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猿猿- 猿4页。据师哲说，代表团是在 苑月 愿日或 怨日到达莫斯科的，但科瓦廖夫标明 苑月 苑日的文件中有“到达莫斯科后不久”的记录。见科瓦廖夫未公布的回忆录。

③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111页。

④ 《真理报》1959年 苑月 远日。西园地 贾丕才（《苏中关系》）猿1页，莫斯科，1959。注意到苏联还出版了毛讲话的单行本。

⑤ 师哲：《新中国诞生前夕》，111页- 112页；《在历史巨人身边》，111页。有些中国资料认为会谈进行了 缘次。如见黄冈周：《张爱萍与海军：共和国海军初创纪实》，111页，北京，1983。

准备逐条回答他们的要求和问题。这个文件显然没有保存下来,但是我们从参加会谈的中国人那里得到一份文件的概要,可以查出与此有关的部分。^①正如可以预料到的那样,代表团决定采用与毛同米高扬的谈话以及在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完全相同的语言描述中国革命和未来国家的状况。

在这个对斯大林来说非常重要的时刻,该报告表达了中国领导人关于美国干涉中国革命可能性的最新考虑,报告认为,“帝国主义者派遣上百万军队打入中国的大规模的武装干涉似乎没有可能”。无论如何,“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即使到来,“也只能推迟中国革命胜利的时间,而不能扑灭和阻止中国革命”。作为对斯大林 9月长电的回答,中国人宣称,帝国主义者可能派遣一支“一二十万人”的军队占领几个海港或作一种扰乱性的袭击,但是“我们对此已作了准备”。这种估计显然与毛同米高扬的谈话不同,那时毛全面估计了美国干涉的可能性。

报告谈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革命对其他国家和革命运动的国际影响。报告说,中国向其他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提供了经验。这个经验包括农村包围城市以及配合合法斗争进行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通过对这一独特历史的特别关注,中国人正在表明他们渴望在世界事务中处于独立地位,并且希望——如果不是决定——成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领袖。在斯大林与刘少奇的交谈中,关于世界分工的话题也是一个焦点。

谈到对外政策,这个报告基本上重申了毛在二中全会上报告的路线(不同于他与米高扬谈话时更为强硬的说法)。报告在一定深度提到外国承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中国永远不接受任何“捆住我们手脚”的承认,但“如果帝国主义国家选择了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政策,那么我们将准备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到这时,我们希望苏联将在这些国家之前承认中国”。

至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和其他协议的问题,中国人说,“我们准备重新审查,分别处理。其原则是: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与民主有

^① 下面的讨论基本上引自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猿猿-猿猿页。

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

对于国民党签订的条约的这种处理方案并没有令人惊奇的地方，但是附加条件的细微差别中有两点很重要。第一点是现存条约必须“有利于中国人民”的要求。这个限定符合党的官方路线，中国共产党毫无例外地不承认任何不平等和屈辱的条约，这条路线当然要求改变 1957年 8月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报告中的第二点是党准备“承认和继承”被断定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国民党签订的所有条约。要理解这段话的含义，我们必须想到这个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语言中，苏联是“和平与民主阵营的领袖”。中国人一直告诉斯大林，他们愿意保留 1957年条约的某些条款以及他与蒋介石签订的苏联认为对其利益必不可少的其他协议。这种变化再次反映出 8月和 8月的改变更加现实和灵活了。

这种变化事实上已成为毛“一边倒”政策的基础。他愿与莫斯科结盟，并依靠它的帮助抹去中国对外关系中一切不平等的痕迹。为此，他准备付出暂时承认苏联利益的代价，同时以尽可能小的损失争取与莫斯科更加平等的关系，这种双重立场构成了刘报告的基础。

该报告有一部分专门谈到这一立场，代表团在这里回顾了如 1957年与国民党人结盟、苏联在旅顺的军事占领，以及蒙古的独立这样一些问题，并表明：“当中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毛泽东准备对苏联进行一次公开访问，希望苏联考虑一下（访问的）时间和形式。”

我们不知道报告中如何处理，甚至是否处理了那些最棘手的问题。虽然概要提到这份报告的作者出席了会谈，但他的著作很少触及这些事情。他仅仅在结尾提到刘少奇表示中国政府愿意接受蒙古的独立，这只是在反复试探莫斯科对这一问题态度后所作的重大让步。^①

直到 8月 26日，斯大林才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中国代表团。到这时，他已经读过了中国的文件，并准备深入地进行讨论。^② 他一开始便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方针，然后说：“新中国一成立，苏联立即

①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源页。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源页。

就予以承认。苏中条约是 1945 年签订的,因为那时我们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待他到莫斯科后我们将解决(条约的)问题。”^①这是中国人最想听到的话。这对中国代表团来说是最大的成果,对于保证其基本民族目标有很大帮助,同时把所有难以解决的细节谈判留给了毛。

但是斯大林并不想接受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所有要求,他注意到他们的目标已经超出了边界问题,尽管他们只是以某种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告诉他们:“苏联在旅顺的驻兵是抵制美蒋军事力量的自由力量。既保护苏联,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眼下中国人肯定是满意的,他要取得他们理解,又说:“一旦对日和约签订后,美国从日本撤兵,苏联便可以立即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国同志要求,苏军现在就可以撤兵。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现在大连港口应为中苏两国共同使用。这是实际情况。”

科瓦廖夫对斯大林发言的回忆实际上与此相同,但还有一些内容:“我国政府认为美军从日本撤退以后,苏联可以考虑从旅顺港撤走我们的军队。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立即从旅顺撤走苏军,为了使中共能够得到政治上的好处,苏联准备立即从旅顺撤退。”^②

斯大林讲话的矛头所指,在双方翻译看来都是很明显的。它显然是针对中国人提出的“立即撤出”旅顺这一要求的。斯大林向中国人提出两点建议:一点是允许有一个过渡时期,这是他所希望的。另一点是立即撤退,这是毛所要求的。苏联外交官 馮蘭階 曾把两者之间的分歧归结为这样一点:“斯大林对毛泽东不信任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是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问题。毛被他所取得的全面胜利而陶醉,想要立即改变一切。斯大林则要毛看到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危急状况,要他正确估计美国的威胁。因此,他强调需要一个过渡时期。”^③

斯大林是把旅顺问题放在全球背景之下加以考虑的。他认为这个海

① 此处及下段内容引自《在历史巨人身边》,源页(但这里引证有误,师哲原文是“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不平等的”,而引文没有“不平等的”几个字。——译者注)。

② 科瓦廖夫(圆)源页。

③ 源页并源页采访费丕才。

军基地是对抗美国的安全地带中一个单独的组成部分，也是针对日本的一个关键地区。在如此重大问题上让步是不可能的。因此，提出立即从旅顺撤退这样一种选择，与其说是向中国人提出的真实建议，不如说是一种威胁。如果他们作出这样的选择，斯大林就会认为不能把他们当作可靠的伙伴，并且会相应地对他们采取措施。^①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斯大林表态后，刘少奇没有给予答复，尽管选择立即撤军显然符合中国人所宣称的目标。

全球战略问题如何严重地影响了双边关系，恰恰在 7 月 31 日新一轮中国代表团与斯大林的会谈中表现出来。^②在这轮谈判中，高岗建议苏联通过在旅顺增派军队和向青岛海军基地派遣战舰来加强其在中国的军事力量，以此对抗美国的威胁。在一个曾引起师哲质疑的记述中，科瓦廖夫回忆说，高岗结束他的发言时建议满洲成为苏联的第 15 个加盟共和国。^③虽然多数苏联政治局委员热情地称赞高岗的主意，但斯大林显然意识到他的话没有权威性。当斯大林盯住高岗看的时候，出现了一刻有点尴尬的冷场，斯大林回话时，称他为“张作霖同志”，这是一个满洲有名的土匪的名字。他认为这个建议华而不实，且有害处，所以置之不理。^④

高岗的同事后来攻击他。刘少奇被他这种厚颜无耻的行为所激怒，称他是叛徒。会谈结束后，刘少奇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事件，毛泽东命令高

① 据科瓦廖夫未公布的回忆录和科瓦廖夫 (19) 页。

② 7 月 31 日会谈的情况，见科瓦廖夫：《斯大林同毛泽东对话》，载《远东问题》(19) 页以下简称科瓦廖夫 (19) 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 页。

③ 科瓦廖夫 (19) 页。苏联后来把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划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行政区（称为卡累利阿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在一次公开的访问中，师哲宣称，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刘少奇是惟一的发言人”，高岗没有机会提出关于东北地位的任何建议。[李海文：《歪曲的历史：关于科瓦廖夫回忆访问师哲》，载《中国史学家》(19) 页]问题在于师哲讲述的只是“大约 7 月 31 日”举行一次宴会的情况，估计他没有参加那天的会谈，参见下面的注释。

④ 除专门加注外，这里及下一段讲述的情况引自科瓦廖夫 (19) 页。由于得到外国，特别是日本的支持，张作霖 (19) 从 1928 年起在满洲巩固了他个人的权力，他的势力甚至扩展到中国的北方和长江流域。

岗立即回国。^①斯大林通过为高岗举行一次盛大宴会而尽力缓和对他的打击,他鼓动其他中国人为这位丢脸的同事祝酒。^②

高岗显然是竭力通过讨好斯大林来提高他的地位,但事与愿违。事实上,当斯大林表明了他对“立即撤军”的态度时,高岗已彻底陷入危险境地,高岗不仅赞同斯大林的立场,他还有更远大的目标。这位满洲领导人似乎只是在理解到斯大林如何看重苏联在东北的永久统治之后,才决定冒险提出他的大胆创议的。斯大林在这件事情上的举动也值得注意。他开始批评高岗,接着又保护他,至少是使他暂时免于被清洗,这样实际上表明他多么重视高岗的忠诚以及他的建议的好意。

在这次会谈日程表的国际部分中,除了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外,还有其他敏感的问题。在 苑月 贰日会见期间,斯大林告诉中国人:“你们不要担心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更不要担心帝国主义国家对你们的态度。你们有同帝国主义国家开展贸易的很好的行动方针。他们那里已经开始发生经济危机。我认为这会加速(他们的)承认。”^③

这个议论显然是对刘少奇报告中一段话的回答。报告说,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准备与任何一个愿意在平等条件基础上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斯大林曾一再表明,他不欢迎中国与莫斯科的主要对手过早地建立外交关系。斯大林一心要把中国纳入他的国际战略,因而希望将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联系置于自己的严格控制之下。

这个苏联独裁者还向中国人表明,他不会允许他们打乱他的战略计

① 高岗于 苑月 肆日离开莫斯科回北平。薄一波前引书, 猿页。据科瓦廖夫说,同一天,斯大林在与刘少奇会晤时说:“我对高岗同志过于严厉了,您也一样,没有任何根据。请把我的意见转告毛泽东同志。”刘少奇这样做了,因此使高岗免于陷入麻烦。他仍然是东北的领导人,在同科瓦廖夫谈话时,毛泽东反复强调,他一向支持高岗,甚至当有人企图除掉他时曾挽救过他。[科瓦廖夫(苏) 猿页]

② 当高岗听说毛泽东已决定让他回国时,来找科瓦廖夫,用俄语说,他想通过苏联译员进行一次秘密谈话。他说,他的目的是告诉俄国人毛泽东及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战友的反苏和“托洛茨基右派”倾向。当科瓦廖夫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斯大林时,他命令科瓦廖夫不要同高岗谈这些事,因为高岗必须回到中国,务必不要让中共方面认为是他们介入了中共党内斗争。[科瓦廖夫(苏) 猿页]

③ 科瓦廖夫(苏) 猿页;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 猿页。

划。当刘少奇在 7 月 16 日提出“解放台湾”的问题时，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据科瓦廖夫说，中国人曾要求苏联对“解放台湾”给予军事援助，但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① 当刘少奇现在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时，斯大林当即拒绝了意见。^② 因为苏联对进攻台湾给予军事援助将冒与美国海军和空军作战的风险，并且为发动一次世界大战提供借口。尽管在早先给毛的电报中，斯大林勇敢地说，战争“对帝国主义者不利”，“我们不怕战争”，但现在他告诉中国人，由于战争，苏联已经承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失，没有任何理由再冒这个险。斯大林表露了他对战争的真实感受，又说：“如果我们领导人这样做，俄国人民不会理解我们。不但如此，由于我们对战时和战后的困难和灾难估计不足，以及轻率地采取行动，他们还可能把我们赶走。”

中国人的意图无法与斯大林所承受的压力抗争，他要避免采取可能会刺激西方的行动。刘少奇估计，美国参与中国内战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这可能更加强了斯大林拒绝中国所要求的军事援助的决心。

斯大林建议把援助事宜提交一个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讨论，那里可以请高级军事领导人和一些部长参加。7 月 16 日，他邀请中国代表团到中央委员会总部，刘少奇、高岗和王稼祥参加了会议。^③ 除了全体政治局委员以外，尼古拉·布尔加宁和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也参加了。^④ 斯大林重复了他早些时候建议和要求中国人不要发动（战役）的看法。在发言结束时，刘少奇宣布撤回请求援助的要求，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⑤

当这一事件发生时，如果斯大林认为他首先要承担风险，就会采取强

^① 见科瓦廖夫私人档案中的文件。在中国代表团离开北平前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毛泽东再次要求斯大林对台湾登陆战役给予空中和海上支援。

^② 此段及以下很多情况引自科瓦廖夫（页 188 页）及科瓦廖夫未公布的回忆录。

^③ 师哲的回忆只是说 7 月 16 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举办了一次盛大宴会。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源 101-102 页。据科瓦廖夫说，苏联领导人试图缓和与高岗与其他中国人关系的那次宴会是三天以后举行的。科瓦廖夫未公开的回忆录里讲的这一情况似乎与下面发生的事情是一致的，我们这里采取他的说法。

^④ 薄一波前引书，页 187。

^⑤ 科瓦廖夫（页 188 页）科瓦廖夫未公布的回忆录。很可能是刘少奇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了斯大林拒绝支援人民解放军进攻台湾，从而导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撤回请求援助的要求。

硬和不妥协的态度。如果他的战略设想与中国人的相吻合,他就会采取热情和合作的态度。在新疆问题上——苑月 员日谈话中提到的问题,斯大林表现出他本性中良好的一面。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告诉刘少奇,据他的情报来源,美国和英国正在新疆积极策动少数民族暴乱,以扩大他们对那里的影响。^① 斯大林建议人民解放军加速解放中国西部地区,并阻止西方的进一步渗透,他答应为此提供物质援助。^②

收到刘少奇的报告后,毛泽东决定提前攻占新疆的日期,并指示代表团的政治秘书邓力群尽快赶到新疆的伊宁。^③在那里,邓力群在建立与毛泽东大本营的联系,提供情报,以及结识和拜访当地可靠的领导人等方面,得到了苏联的帮助。由于这些援助,当年稍晚便采取平稳和比较和平的方式解决了新疆问题。^④

所有这些例子说明,这两位领导人处理的主要问题都是对于两方最紧迫的问题。双方都有长远的战略考虑。他们互相之间满足对方要求的限度取决于他们对全球问题观察的一致性,以及他们对这种合作是否符合他们长远目标的认识。他们的战略考虑与他们在双边问题上的合作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在一些最根本的国际问题上达成谅解,他们努力寻求在最有争议的特殊问题上取得可能的合作。如果没有那些谅解,甚至在最简单的问题上也会互不相让。

苑月 员日的谈话中,刘少奇问斯大林对第三次世界大战、世界发展趋

① 除特别注明外,这里及下段的情况引自邓力群:《新疆和平解放前后:中苏关系史上的一页》,载《近代史研究》1982(5);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1981-1982页;张志安:《对和平解放新疆的一些看法》,载《实事求是》1982(5);选录-选录页;朱培民:《关于和平解放新疆问题的探讨》,《社会科学》(乌鲁木齐)1982(5);选录-苑页;朱培民:《和平解放新疆始末》,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12);苑页;朱元石:《刘少奇 1953年秘密访苏》,载《党的文献》1982(10);苑页。

② 斯大林说:“至于派遣战斗机到新疆,用于同马步芳家族的骑兵作战的问题,这很容易做到。我们可以派出一个空军师,1架-1架飞机。”见科瓦廖夫私人档案文件。

③ 在毛泽东原来的时间表上,占领新疆是 1953年。1953年 愿月初,毛泽东指示彭德怀(一野司令员)调查在年底以前占领新疆的可行性。[彭德怀:《就占领新疆安排彭德怀给毛泽东的电报》,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12);苑页]

④ 关于邓力群在新疆的活动以及苏联在解放新疆中所起作用的详细情况,见邓力群:《立群电台》收发的电报选编》,载《中共党史资料》1982(12);员-苑页。

势及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变化的看法。^①这三个问题引出了相关的问题，而斯大林的回答表明了他关于中苏关系不得不卷入其中的全球结构的观点。斯大林对世界和平一直抱有乐观的看法，他重复了他的理论：至少在 1950 年内很少有可能爆发世界大战。像他在早些时候给毛的电报中所说的那样，只有当“疯子”在西方掌握政权的时候，才会爆发世界大战。斯大林总结说，必须利用和平时期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又说，制止战争的主要因素是世界人民反对进行一场新的战争的斗争。

苏联核武器计划取得的进展加强了斯大林关于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信心。科瓦廖夫回忆说，刘少奇要求参观苏联的核设施，但斯大林拒绝了。^②作为替代，斯大林安排了一部关于苏联在“靠近北极圈附近某地”进行核试验的纪录影片。看过电影后，斯大林夸耀苏联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及苏联不久将有能力制造更先进的武器。^③由于苏联第一次核试验在几个星期后并没有进行，我们不知道 1950 年底这部电影实际描绘的是什么。不过，这场电影引起斯大林对刘少奇说：“苏联现在已经非常强大，不怕美国的核讹诈。”^④

斯大林避免战争计划中的另一个支柱是中国本身。在 1950 日谈话期间，斯大林宣称中国革命的经验具有特殊的有益价值，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从欧洲转移到东亚，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亚洲履行其革命义务：

你们必须懂得你们所处地位的重要性，你们正承担着具有空前意义的历史任务……让我们加上中国的 10 亿人口，加上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人口。如果这些国家的人民信服你们，日本人很可能也将信服你们……亚洲人民正满怀希望注视着你们，世界上没有其他党有如此广泛的影响。你们有大量追随者。^⑤

① 这段资料引自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195页。

② 科瓦廖夫未公开的回忆录。

③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195页，朱元石前引文 197-198页。

④ 科瓦廖夫（圆）195页。

⑤ 科瓦廖夫未公开的回忆录，科瓦廖夫（圆）195-196页。以同样语气讲的另一番话见科瓦廖夫（圆）195页。对斯大林讲话的这种描述总的说来与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195-196页）的描述是一致的。

我们还必须从斯大林自己的全球战略观点来分析他的讲话。在欧洲，任何扩张举动都将导致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冲突，面对西方，他必须有 1945 年的和平时期来加强自己的力量。斯大林后来向毛泽东解释这种形势时抱怨说，很多国家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引证了奥地利的例子，尽管那里有苏联军事占领，资本家仍然得到了政权。他总结说：“欧洲仍然没有为社会主义作好准备。”^①

亚洲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势力范围仍然没有确定的地方，很多亚洲国家“准备实行社会主义”。此外，共产党中国的崛起给那些不需要苏联直接介入的主动性进攻提供了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如果在整个亚洲重演，能够给斯大林带来极大的政治、军事上的好处。

从全球战略出发谋求最大限度地加强这种优势又转过来需要一种组织上的分工。当中国人问斯大林他们是否可以加入共产党情报局时，斯大林向刘少奇一行表达了这种看法。苏联领导人回答说，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因为欧洲与亚洲的情况根本不同。^② 他建议中国人应建立一个亚洲共产党联盟，并在其中起领导作用。^③ 他又说，苏联既是一个欧洲国家，也是一个亚洲国家，因此也要参加这个联盟。

斯大林向中国人展现他们新的全球性作用的轮廓逐渐明确了。中国人将有他们自己的责任和影响，但他们将在莫斯科的全面控制下采取行动，这样才不致危害到苏联的目标。中国人受到鼓舞而在亚洲变得更加活跃和富有进取心，但被限制在他们没有无意中把莫斯科卷入的范围内。这就为中苏联合策划并采取行动奠定了基础，而且导致了朝鲜战争的爆发。

对于中国人来说，斯大林的观点既有好处又是挑战。对于在苏联战略中至少能保持一种独立性并起到不可缺少的作用，他们显然感到高兴；他

① 1945年 1月 1日采访贾丕才。

② 除非另有注释，此处及下一段的情况引自科瓦廖夫《回忆：在历史巨人身边》，莫斯科，1987年。

③ 在其他一些场合，斯大林也提到了让中国组织这样一个联盟的思想。例如 1945年 1月，他向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提出这个建议。见林力：《稼祥同志的革命历程……》，载《回忆王稼祥》，北京，1987年。科瓦廖夫《回忆：在历史巨人身边》。科瓦廖夫回忆中是“东亚共产党联盟”，但在后来的文件中，他（像中国人一样）使用的名称是“亚洲共产党联盟”。

们仅仅欢迎斯大林对他们革命的普遍性的承认。同时，像后来情况所表明的，他们感到不愉快的是被如此明确地纳入了苏联的全球战略。

苑月 苑日会谈时，刘少奇交给斯大林一份要求帮助中国军队和国防工业实现现代化的文件。这个文件没有提到台湾，斯大林和苏联最高统帅部经研究接受了这一要求。几个星期之内，苏联军事顾问开始到达中国。斯大林还接受了中国人关于为其创建空军提供大量援助的要求。为答复另外一个要求，斯大林派出空军布防在旅顺到大连之间，这些俄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成功地制止了国民党对上海和其他城市的空袭。

此外，双方还同意在情报及反间谍方面合作。刘少奇一行到达莫斯科不久，科瓦廖夫告诉斯大林，高岗和刘少奇曾向他抱怨苏联情报组织在中国的活动。他们没有同中国商量便扩充了情报人员，甚至那些经过协商后雇用的人也摆脱了中国共产党的监管。高岗和刘少奇说，问题在于大部分在中国的苏联情报网已经靠不住，并且正在为美国和蒋介石工作。他们要求停止这些无法控制的间谍的活动。斯大林回答说：“形势要求我们把我们的情报机构联合起来，我们准备立即这样做……让我们采取联合阵线的行动！”^①

斯大林似乎也急于谈到中国人正在制定的筹建政府的计划。刘少奇告诉他准备工作已经开始，并说毛泽东计划在 苑月 苑日宣布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考虑了一会儿以后，斯大林表示他反对这个日期。斯大林说，他不同意，因为外国人可以利用中国没有正式的共产党政府作为进行干涉的理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没有正式政府的情况下存在这么长时间，他建议毛泽东立即采取行动。他的建议通过电报送到北平，于是中央委员会立即决定建国日期定于 猿个月后即 苑年 苑月 苑日。^②

为此，斯大林同意帮助建立国家政权机关并按商定的计划派 苑名苏

① 科瓦廖夫未公布的回忆录以及他的私人档案。

② 师哲：《我随同毛主席访苏》，156页。

联政治专家与刘少奇代表团同车去中国,其他专家几天后也启程前往中国。^① 苏联人将帮助设计中央政府的建制并制定新的法律制度的细节。有些专家将帮助中国人修复那些经过选择的极大型企业,并开始运转。

斯大林通过在访问期间的所有活动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来向中国人证明,他们决定采取一边倒的政策是英明的,并符合中国的利益。他积极地解决了刘少奇提出的几乎所有问题。然而,斯大林并没有作出这一切不可改变的许诺。他为将来与毛泽东会谈打下了基础,但并不很多,如果毛泽东不接受后来苏联提出的要求,他很容易改变一切。他已经作出姿态,现在轮到中国人报答了。而这种报答的具体内容要等待毛泽东到莫斯科来解决。

[本文选自冈察洛夫、刘易斯、薛理泰合著：《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斯坦福,1987)一书,沈志华译。]

^① 第一个在中国的苏联专家组总计 100 人。见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源页，北京，1983；师哲：《我随同毛主席访苏》，198 页。另有材料说第一批顾问组是 100 人。见朱元石前引文，198 页。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谈判：愿望和结果

(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材料)

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 沈志华

俄罗斯联邦外交部 谢·冈察洛夫^①

在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进行了长达两三个月的协商、谈判,终于签订了替代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新的条约和协定,从而将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无疑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重大的外交活动。

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公布有关这次外交谈判的档案文献。只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开始有一些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

^① 1987年夏天,俄罗斯驻华大使馆首席参赞谢尔盖·冈察洛夫向我提供了一批关于1950年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的俄国档案文件,并提出合写一篇论文,我欣然从命。后来,冈察洛夫奉召回国,出任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副司长。临行时商定论文由我执笔,完稿后两人再找机会进行讨论和修改。但是,当我完成论文并将其寄出后,一直没有得到回音。于是,我用我们两人的名义将该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并说明由我个人对文章负责。后《东欧中亚研究》1988年第3期再载该文时,编辑部以冈察洛夫未授权署名为由,要求只以我个人名义发表,我接受了这个意见。

的电报、信函,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公布于世,使我们得以对这次中苏谈判的过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是,我们仍然无法依据现有的文献和材料,肯定地、明确地回答下述问题:对于签订这样一个新的同盟条约,中苏双方各自的立场、方针和设想究竟是怎样的?在他们的协商和谈判中到底存在哪些分歧和争论?签约双方作出了如何的让步才形成了最后的一致意见?总之,缺乏对于中苏谈判过程具体的和详细的考察,我们就很难正确地判断中苏签订新约的最终结果是否符合他们最初的愿望,也就很难准确地理解在这个新条约基础上形成的中苏同盟的历史地位。

不久前,我们在俄国解密的档案中发现了一批关于这次《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的历史文献,共有 700 多件,其中包括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记录,毛泽东、周恩来与苏联其他领导人的会谈和谈判纪要,中苏双方各自拟定的有关条约或协定的最初文本和历次修改稿,以及苏联有关部门和专家呈报的对于条约、协定的建议和意见。当然,这还不是全部文件,但经过对这些文件的整理和研究以后,我们认为,把俄国的解密档案与中国发表的有关文献和回忆录结合起来,已经可以对 1950 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的主要内容及其过程作出比较清楚的描述。^①这是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也是本文预期达到的目的。

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历史背景

所谓 1950 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相对 1945 年 8 月 14 日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大连的协定》而言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斯大林确定了战后苏联在远东的两个战略目标:把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独立出来,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苏联的这一要求通过 1945 年 8 月 14 日斯大林与罗斯福会晤以及《雅尔塔协定》

^① 关于这个问题,德国联邦苏联东欧研究所迪特·海因茨希教授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据他告诉笔者,他的专著《苏联与共产主义中国(1945-1950)》即将在德国出版,其中一章专门论述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问题。

得到了美国方面的保证。为了迫使中国政府接受苏联的条件，美国和苏联两面夹击，软硬兼施。在苏联军队已经大举进入中国东北之后，蒋介石终于被迫同意签订了这个城下之盟。^①

这个有效期为 10 年的条约及相应协定充分保证了苏联在远东的一切权益：已经在 1905 年卖给伪满洲国的中长铁路重归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和共同经营；中长铁路局设局长一人，由苏方派员担任；宣布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方派员担任；经大连港和中长铁路为苏联运输的进出口货物均免除关税，而经该港为中国其他各地运输的进出货物则需缴纳进出口税；旅顺口作为仅供中苏两国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该基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派任；旅顺市主要民事行政人员的任免应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的同意，等等。^②直到 1949 年以前，在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生死斗争中，苏联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其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在雅尔塔体系的范围内保证实现上述权益。

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东方集团。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安全利益以及未来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考虑，显然也要求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在这一点上，斯大林与毛泽东有着目标一致的共同愿望。然而，如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实现这一愿望，中苏之间却有不同的设想。斯大林希望与新中国结盟的方式和表现形式不致破坏雅尔塔体系及损害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而毛泽东考虑的则是如何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如何以中苏新型关系的表现形式为榜样废除旧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一分歧集中反映在是否需要签订一

^① 对于这一观点的详细论述见拙文：《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载《历史研究》1993 年第 1 期。有关这次中苏谈判的详细过程，过去只有台湾方面公布的材料。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向大会提交了一批共 1000 多页的综合档案文献，其中包括大量美国和俄国保存的关于中苏谈判的原始文件。目前正在对这批文献进行翻译和整理，不久即将发表。

^② 有关文件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3 册，1963 年，136 页，北京，三联书店，1981 年。

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上。

中苏双方最早接触到这个问题是在 1950 年初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期间。不过,双方开始都采取了慎重的和试探性的方针,而且是从具体问题谈起的。据俄国的档案文献,关于旅顺海军基地的问题,毛泽东通过中国民主人士之口向米高扬提出,“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后,苏联再在旅顺口保留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但毛泽东还表示,中国共产党人“主张保留这个军事基地”,“待到中国十分强盛,有能力抵御日本侵略了,那时苏联本身也就不再需要旅顺的基地了”。毛泽东用这种委婉的说法,表明了对于旅顺口中国应该收回而目前暂不收回的立场。斯大林得到米高扬关于中国对这个问题立场的报告后,在 1950 年 10 月 23 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后,形势就根本改变了。苏联政府已经决定,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而且美国也从日本撤军,苏联就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军。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立即撤出旅顺地区为宜,那么苏联准备满足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对此,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立即表示,不能马上撤出苏联军队和撤销旅顺口基地。毛泽东还说,中国人民感谢苏联的这个条约。当我们强大起来时你们再离开中国,到那时我们再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中苏互助条约。不过,米高扬对此的感觉是,“他有自己的策略考虑,但他没有明说”^①。

斯大林特别关心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据随同米高扬到西柏坡的科瓦廖夫回忆,在会谈期间,斯大林“不止一次以无线电报向我询问,中国同志对中长铁路条约的真正态度如何,他们是否认为中长铁路条约是真正平等的条约”^②。米高扬在会谈时则坦率地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不认为有关中长铁路的协定是不平等的,“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国出资建成的”,“可能在这个条约里,平等的原则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我们准备与中国同志友好地讨论并解决这个问题”。对此,毛泽东作了一番令人费解

① 列多夫斯基:《米高扬访华的秘密使命》,载《远东问题》1952(4),第17页;1952(4),第18页。

② 冈察洛夫:《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载《远东问题》1952(1),第17页。

的含糊回答，最后表示同意让高岗和科瓦廖夫共同研究并汇报这个问题。^①

这时，双方都还没有直接谈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本身的问题。但至迟到 1950 年 9 月，中共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如何处理旧中国签订的对外条约问题了。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向中国民主人士谈到，过去的“对外条约有的废除，有的则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以保持”^②。这里谈到“要加以修改”或“可以保持”的条约，显然是考虑到了 1945 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50 年 12 月至 1 月，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时，则直接提出了如何处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在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刘少奇表示新中国政府愿意继承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同时又提出，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需要对这个条约加以处理。刘少奇列出了三种处理方式：（一）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二）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条约。（三）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时机重新加以签订。斯大林在该报告上批道：“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③

看来，当时中、苏双方领导人都还摸不透对方的本意。

新中国成立以后，解决中苏之间的同盟条约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开展外交活动和形成外交决策的当务之急。因此，毛泽东在外交问题上首要考虑的就是直接与斯大林进行会谈，而且明确地向斯大林透露，会谈的目的是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50 年 12 月 1 日，在致莫斯科的电报中，毛泽东表达了出访苏联的愿望，还特别说明在访问期间要提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电报又补充

①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100 目录 15 卷宗 100 卷 100 页，转引自《远东问题》1950 年第 1 期，100 页。

② 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1950 年 9 月 1 日，《周恩来选集》上卷 100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③ 刘少奇致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1950 年 12 月 1 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100 目录 15 卷宗 100 卷 100 页。

说,如果要签订条约,周恩来将前往莫斯科签字。^① 1950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给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电报也说明了同样的目的。^② 在此期间,身为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的科瓦廖夫也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曾经告诉他,打算出访三个月,第一个月在苏联,与斯大林会谈,要签署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第二个月访问东欧,第三个月在苏联南方养病。因此,中国人希望斯大林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事情放在日程安排的前面。^③

毛泽东去莫斯科的目的,一是要与苏联结成同盟,二是要以一个新条约的形式表现这种同盟关系。这一点是清楚的。^④ 然而,毛泽东似乎感觉到了斯大林的意图,所以对于这次莫斯科之行是否能够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没有任何把握。出发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刘少奇和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谈到去莫斯科如何处理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时,毛泽东只是说“可以谈谈看”^⑤。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感觉是正确的。

二、是否需要签订一个新的条约

毛泽东于1950年12月15日到达莫斯科,远个小时之后便与斯大林举行了正式会谈。根据俄国档案中的会议记录,这两位领导人的第一次对话便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当毛泽东谈到刘少奇访苏后中共中央研究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立即接过来来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但他强调,“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这个条约的”,所以苏联领导人“决定暂时不改动这个条约的任何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4000,目录 100,卷宗 100,案宗 100,原页 100,转引自《远东问题》,原页 100。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原页 100,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原页 100。

③ 冈察洛夫前引文,《远东问题》,原页 100。

④ 过去认为,中苏莫斯科会谈初期出现不愉快的原因是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的意图,或双方产生了误会,现在看来这种理解似乎是没有道理的。

⑤ 徐则浩:《王稼祥传》,原页 100,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原页 100。(笔者在编辑本文集时发现,当时引证此文由于粗心而导致严重错误:毛泽东与刘少奇谈话是在 1950 年 12 月,即刘少奇访苏前夕,而不是在 1950 年 1 月。笔者借此机会向学界同行道歉。)

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条，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斯大林的设想是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这就明确表示了苏联不准备签订一个新条约的立场。对此，毛泽东只得表示可以保留“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的现状”，“眼下不必修改条约”。但同时指出，“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毛泽东接着又提出，“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对此，斯大林显然不高兴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需要周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①

毛泽东在 8 月 5 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讲述了他对这次会谈结果的理解，即苏联认为“不宜改变原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合法性”，苏联租用旅顺口 30 年“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表示苏联同意从那里撤军。电报中还讲到一段俄国档案没有记录的内容：尽管毛泽东提出中国的社会舆论认为原条约已经失去了意义，斯大林的答复仍是：对原条约的修改，大约要到两年以后。斯大林还坚持不要周恩来去莫斯科。于是，毛泽东请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条约的问题并提出意见。^②

8 月 10 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毛泽东说，政治局会议的意见是如果“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周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③。显然，在中国方面看来，这次中苏最高领导人会谈能否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实无把握。

毛泽东对第一次会谈的结果很不满意。按照科瓦廖夫的观察，那几天毛泽东“闷闷不乐地呆在别墅里”，“情绪不好，心神不安”。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方面的态度，他于 8 月 14 日邀请科瓦廖夫去谈话，并要求把谈话

①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3 年 8 月 5 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158，目录 1 卷宗 100022-100023。

②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151 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1949-1956）》下卷，100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

记录转给斯大林。根据谈话记录,毛泽东提出下一次会见希望安排在 8 月 14 日或 15 日,并向斯大林提交了下一步谈判的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等问题,其中包括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按照这个方案,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履行协议签字手续。第二种方案是对第一方案中的各种问题从多方面进行磋商,但暂不履行相应的签字手续。这样,周恩来就不必马上来莫斯科。毛泽东在交谈中不止一次地强调,所有这些问题均由斯大林定夺。^①毛泽东对此抱有极大希望,他在第二天凌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谈道:“已与斯大林约好 14 日或 15 日谈一次。在这次谈话后可以确定方针电告你们。”^②

然而,在 8 月 15 日举行的第二次会谈中,主要是谈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兄弟党的事情,斯大林根本没提《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毛泽东对此大失所望。^③这一次毛泽东真的动了气,他后来曾向苏联大使尤金谈起当时的情况:“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斯大林还是找借口拒绝了。“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毛泽东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毛泽东还拒绝了科瓦廖夫和费德林关于去苏联全国游览的建议,而宁可“在别墅里睡觉”^④。

根据汪东兴的日记,8 月 15 日中午斯大林曾来电问候毛泽东,15 日和 16 日毛泽东与其他苏联领导人继续进行过会谈,此后直到 1953 年 1 月 1 日前,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没有任何接触。^⑤莫斯科的空气显得凝重而

① 冈察洛夫前引文,《远东问题》第 101 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67 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 1 页。可惜的是,在目前中俄两国公布的档案中均未见到关于这次会谈的文献资料。

④ 帕·尤金:《毛泽东谈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中国政策》载《远东问题》第 101 页。

⑤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第 1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

紧张，看来，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在等待对方作出让步。

1956年元旦这一天，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奉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之命拜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向他声明，因身体不适，“准备完全静养一周，彻底恢复正常的睡眠”。毛泽东还强调，他“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并且取消了在苏联各地旅行的计划。最后，毛泽东提出“想提前一个月，即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回国”。在谈话中，毛泽东还向苏联方面透露了一个消息：最近几天，“收到北京的报告，说缅甸和印度政府表示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只要缅甸和印度政府接受中国政府的条件，“他们可以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毛泽东还告诉罗申：“不久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也将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明显步骤。”^①

毛泽东并非是无意地谈到这两个问题的，而是在以一种东方式的外交语言向斯大林表示不满和提出警告。

首先，毛泽东不是真的要休息养病和提前回国。尽管他在私下表示了这种意见，但在第二天，即1月2日，毛泽东就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公开向外界声明他来莫斯科的目的首先是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问题，并表示逗留苏联的时间，“部分地取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毛泽东还说，“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② 这无疑是在向斯大林表明要签订新条约的决心。

其次，英国和缅甸也不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承认中国的问题的。早在1955年1月1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时就透露，“英国政府倾向于承认我国”。而1月15日周恩来已复电缅甸外交部长，同意在缅甸政府与国民党残余力量断绝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中缅外交关系。^③ 毛泽东选择这个时候向苏联传递这些信息，显然是在外界传闻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

① 罗申与毛泽东会谈纪要，1956年1月1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0000目录，卷宗10000案宗10000-10000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10000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56）》上卷，1000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禁”、中苏关系出现紧张状态的背景下向斯大林施加压力。无论如何,当中苏谈判陷入僵局时,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转机,对苏联无疑是一个刺激。^①

总之,到 1 月 10 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的僵持局面开始打破了,作出让步的是斯大林。1 月 10 日晚 8 时,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别墅,特地询问他对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事项的意见。毛泽东讲了三个方案:(1)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公报,说明两国对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交换了意见,而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下来;(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是讲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马上表示同意第一方案。毛泽东又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毛泽东当即说出了他的安排:“我的电报 1 月 10 日到北京,恩来准备 11 天,1 月 12 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 13 天,1 月 15 日到莫斯科,1 月 16 日至月底约 15 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1 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② 根据汪东兴的日记,1 月 10 日这一天,毛泽东“精神特别好”,“有说有笑”。^③ 显然,这是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出现转机的结果。

三、苏方精心准备的条约及有关文件草案

中苏之间签订一个新的条约以代替 1945 年条约的问题,在原则上似乎解决了。然而,在签订一个什么样的新条约这个具体问题上,中苏谈判又出现了分歧和争论。这时,中苏谈判双方各自的方针发生了一种戏剧性的变化。此前,苏联坚持条约的形式不能改变,即保留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对实际内容可以进行修改。但在确定废除 1945 年的条约以后,苏方最初提出的新条约完全沿袭了旧条约的内容。相反,中国以前同意保留 1945 年条约的实际内容,而在形式上必须以新条约取而代之。但

① 毛泽东本人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过:“斯大林的立场发生变化,也许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帮了我们的忙。”见尤金前引文,《远东问题》莫斯科版,第 15 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14 页。

③ 《汪东兴日记》,第 1 页。

在确定要签订一个新条约以后，中方最初提出的涉及双方实际利益的协定文本与旧条约的内容大相径庭。

毛泽东 1 月 21 日与维辛斯基和 1 月 22 日与科瓦廖夫谈话时，强调的仍然是“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同时表示在具体签约时，会考虑苏联与《雅尔塔协定》的关系，中国政府“将依据包括蒋介石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在内的一切现存条约为起点，重新进行谈判”。^① 毛泽东对条约和有关协定的具体内容似乎还没有充分考虑，而作为中方谈判主角的周恩来则正在准备赶赴莫斯科。与此同时，苏联方面对条约及有关文件草案的准备工作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了。

1950 年 1 月 23 日，苏联外交部起草了名为《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第一稿草案，除了在政治上保持友好同盟关系的条文外，该草案第七条明确指出：“缔约国双方承认，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继续有效。”^② 显然，苏方最初的设想是签订一个新条约而同时保留 1945 年的三个协定。

1 月 22 日，苏联外交部条法司司长格利巴诺夫、远东司副司长费德林、驻华大使罗申等人联名呈报了他们起草的条约草案第二稿。其中第六条将“友好合作”改为“巩固和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第七条则改为：“缔约国双方声明，根据《苏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规定，完全保留 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中苏大连港协定和 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旅顺口协定及其附件，并使其成为本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③ 这里，苏联外交部排除了中长铁路问题，而把它转给交通部去解决。

基于斯大林曾答应中国在对日和约签订后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维辛斯基对草案的第二稿提出了修改意见。根据这一指示，格利巴诺夫等人于 1 月 24 日又提交了条约草案的第三稿，其中第六条增加了“彼此

① 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纪要，1950 年 1 月 21 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585 号，目录 1585 卷宗 1585 案宗 1585 号，页 1585。1 月 22 日毛泽东与科瓦廖夫的谈话，见冈察洛夫、刘易斯、薛理泰：《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战略与战术》），莫斯科，2004 年，第 158 页。斯坦福，1986 年。

②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585 号，目录 1585 卷宗 1585 案宗 1585 号，页 1585。

③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585 号，目录 1585 卷宗 1585 案宗 1585 号，页 1585。

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一句,第七条改为:“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 圆-猿年内撤出,员缘年愿月 员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在规定的期满后应重新修订。”^① 这里显然是有矛盾的,既然已决定苏军提前撤出,为什么该协定还要等到 圆多年后再重新修订?于是,外交部再次修改了草案,在第四稿中把第七条中重新修订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日期提前到“签订对日和约以后”,而在第五稿中,则把苏军“撤出”改为“缩减或撤出”。^②

员月 员日,维辛斯基将外交部最后的文本(第六稿)呈报给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其中第七条确定为:“缔约国双方同意,目前在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苏联军队自本条约生效之日起 圆-猿年的期限内全部撤回苏联境内,撤军将于 员缘年开始。缔约国双方还同意,中苏之间 员缘年愿月 员日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以及大连港协定议定书在签订对日和约后重新审议。”这一草案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即该文本将条约的名称由《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改为《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便沿用了这个名称。^③ 鉴于前文提到的毛泽东在 员月 员日和 员月 远日的会谈中都曾使用了“友好同盟条约”的说法,显然,维辛斯基最后改变条约名称注意到了中方这一说法。^④

在此期间,苏联条约法律专家杜尔金涅夫斯基在致维辛斯基的备忘录中提出建议:“在同一问题上‘吸收’了以前条约相似内容的条约可以被认为具有并行效力。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以前的条约就一定失效了。但由于可能出现各种解释,所以,对保留与新条约不矛盾的一部分旧条约作补充说明是适宜的,这样的补充说明可以写在新条约的文本或签字议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苑苑目录 圆缘卷宗 员愿案宗 圆缘圆-圆- 圆缘页。

②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苑苑目录 圆缘卷宗 员愿案宗 圆缘圆-圆- 圆缘猿-猿页。

③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苑苑目录 圆缘卷宗 员愿案宗 圆缘圆-圆- 苑页。

④ 师哲回忆说,是周恩来提出在 员缘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名称上加上“互助”二字的。见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源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员缘。

定书以及专门的照会中。”^① 其意图当然是考虑如何保留旧条约的内容。或许正是采纳了专家的建议，维辛斯基还在同一天向莫洛托夫提交了《确认中国长春铁路协定有效的议定书》和相同内容的《声明》，特别说明“完全根据 1924年 10月 15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国长春铁路协定中指明的期限确定该议定书的有效期”。同时以《补充条款》的方式声明：“本条约的缔结不承担苏中双方在以前条约中各自的债务。”^② 显然，苏联外交部是要把中长铁路的问题与条约和旅顺、大连的问题区别开来。

11月 15日，苏联交通部提出了对于中长铁路和大连港协定的修改建议和草案文本。交通部长贝舍夫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说明了他们的主要修改建议。

关于中长铁路协定：

1. 重新规定中国长春铁路的资产组成。1924年的协定没有把位于南线（哈尔滨—大连）上的工厂及其附属的由日本人建造和改建的企业列入铁路的资产组成，而新修订的条款应规定将上述这类企业，即确保铁路正常营运所必需的企业，列为苏联和中国共同拥有，而不论它们建立的时间。

2. 规定由中苏双方人员轮流担任铁路局的理事长、监事长、局长和总稽核等职务及其副职，每三年轮换一次。而以前这些职务是固定由中苏双方人员分别担任的。

3. 新增加的条款是，对中国长春铁路及其所属企业和机关所需的进口货物免征海关税、各种特别税及其他货运税。

4. 将旧协定中国长春铁路应与中国的国营铁路一样向中国政府“缴纳税捐”一句改为“缴纳同样数额的税捐”。

关于大连港协定：

1. 尽管大连港未被列入中长铁路的组成部分，但在原协定的第三条中已指明港口主任由中长铁路局局长从苏联人员中委派。

2. 为了共同经营大连港和大连的工厂，建议组建一个中苏合营的远

① 杜尔金涅夫斯基致维辛斯基，1954年 11月 15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00，目录 100，卷宗 100，案宗 100，页 100。

②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00，目录 100，卷宗 100，案宗 100，页 100。

东海运公司,并将该公司苏联方面的领导权委托给苏联海军部。

贝舍夫在报告的最后特别说明了要把在 1953 年以前属南满铁路管辖的地段列为中长铁路资产组成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因为这段铁路“每年都能产生很大利润,1953 年其利润是 1 亿 2 千万卢布”,“从 1954 年开始,在确保中国长春铁路正常营运时,它每年都可以得到上述数额的利润”。而目前“满洲地区工业的恢复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满洲与中国其他地区经济联系的扩大,正在引起货运量和旅客运输量的增长,特别是在南线即哈尔滨—大连的铁路线上”。^①

1953 年 10 月 10 日,葛罗米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贝舍夫、科瓦廖夫、罗申等 4 人向莫洛托夫、米高扬和维辛斯基呈上了委托他们起草的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决议的草案和中长铁路两个议定书的草案。其要点是:确定将外交部起草的重申 1953 年协定有效期的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草案作为苏中谈判的基础。

关于从 1953 年 10 月开始恢复对中长铁路实行共同经营和共同管理的事宜,必须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

确认根据交通部的建议起草的关于中长铁路补充议定书所述各项条款,并且必须就有关条款的修改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

在确定中长铁路的全部资产前,在与中国政府谈判时,应提出将铁路的固定资产列为苏联和中国共同所有的建议。为确定转为苏中共有的资产,批准成立苏中联合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团。(附“固定资产和转交苏中两国共同所有和共同经营的资产清单”)

委托外交部维辛斯基和交通部贝舍夫,就上述两个议定书草案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

决议的落款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和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巴马兹涅夫。^②

^① 贝舍夫致莫洛托夫,1953 年 10 月 10 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00 目录 100 卷宗 100 案宗 100 号,1-2 页。

^② 葛罗米柯等致莫洛托夫等,1953 年 10 月 10 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00 目录 100 卷宗 100 案宗 100 号,1-2 页。

看来，苏联方面认为中国接受条约草案不会有什么问题，因此把注意力集中在与苏联的远东战略利益有更直接关系的中长铁路问题上。

1950年10月，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将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16个草案呈报斯大林，其中包括《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苏中关于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苏中贷款协定、关于成立苏中航运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石油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关于苏中易货和支付的议定书、关于苏联与新疆贸易的议定书、关于苏联专家的费用支付条件的协议、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机构和苏中合营股份公司共同管理的满洲和辽东半岛地区内不动产的决议、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派遣苏联专家和教师组到中国工作的决议。联共（布）中央立即批准了这些草案。^①

苏方最后确定的《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议定书草案与外交部和交通部呈报的草案没有原则上的变化，只是将条约第七条的内容单独列出，形成了《苏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但这里有一个特别应当引起注意的问题：上述提交斯大林的16个草案几乎包括了中苏谈判可能涉及的所有问题，却唯独没有旅顺口、大连港协定和中长铁路协定本身。原因何在？显然，根据苏方的设想和愿望，这两个协定根本没有必要重新起草，因为原中长铁路协定继续有效，原旅顺口协定和大连港协定要等到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后再重新审议，而苏联提出的有关修改部分已经体现在两个协定的议定书草案中了。

归纳一下苏联方面最后形成的草案：关于《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除了在原则上确定了中苏联盟的关系外，没有涉及双边实际利益的内容。关于中长铁路问题，与1924年的协定相比，不仅保留了原来的25年有效期，而且其修改部分除领导职务采取轮换制以外，其他如资产确定、免征海关税和货运税、缴纳铁路营业税等规定都是更有利于保障苏联利益的。关于旅顺口和大连问题，除规定苏联驻军应从1952年开始撤退，并在条约生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466 目录 00001 卷宗 155 案宗 00001 来源 156 页。

效后 圆年至 猿年内撤退完毕外 ,其余一切照旧 ,要等到对日和约签订后再行审议。

以上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谈判开始之前苏联方面的全部设想和准备 ,而此时周恩来才刚刚到达莫斯科。

四、中苏外交谈判中的分歧和争论

员月 圆日 ,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莫斯科 ,并于 圆日参加了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正式会谈。在这次会谈中 ,毛泽东与斯大林就几个原则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 :第一 ,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应当修改 ,重新签订。第二 ,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依然有效 ,此后苏军撤出旅顺。第三 ,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基础 ,而实际上进行适当的修改。第四 ,苏联放弃在大连港的权利 ,由中方决定大连的问题。第五 ,中方原主张中长铁路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局长的职务由中方担任 ,后同意采取轮换制。第六 ,周恩来提出修改双方对中长铁路的投资比例 ,把中方的投资比例增加到 缘豫 ,后同意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此外 ,还讨论了贷款协定、新疆贸易等问题 ,并决定委托米高扬、维辛斯基、周恩来、李富春进行具体谈判。^①

员月 圆日 ,中苏双方代表进行会谈 ,并首先讨论了苏方提出的草案。员月 圆日 ,毛泽东、周恩来等研究苏方的草案 ,并拟出了中方修改后的文本。^② 员月 圆日 圆时 ,由中国大使馆参赞戈宝权将中方修改后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递交给苏方谈判人员库尔久科夫。我们把双方的草案进行了仔细的对比后发现 ,中方的草案除调整了一下段落安排和增加了个别修饰词以外 ,从名称到内容 ,与苏方的草案没有任何原则上的区别。^③ 这一点与中国方面有关回忆录和研究著作中的说法完全不同。以

①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 ,员月 圆日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 ,全宗 缘,目录 员卷宗 猿- 猿页。

② 《狂东兴日记》,员页。

③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全宗 圆,目录 圆卷宗 缘,案宗 圆,猿- 猿页。

前都认为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最初文本是周恩来起草的，或苏方按周恩来的意思起草的。^①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缺乏依据的。

总之，就条约本身而言，中苏双方没有什么分歧。尽管后来双方又有两次对条约文本的修改，但都是个别文字的改动或调整。^②对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条约所述的防止日本及其盟国的侵略、加强双边的协商与合作等内容，都是中苏双方的共同愿望和要求。真正涉及双方利害冲突的是在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等问题上。

经过双方接触以后，苏方在上述提交给中方的草案的基础上，又于 11 月 10 日提出了一个关于大连港协定的草案。其内容主要是：(1) 中国政府同意从大连港内划拨出一些码头和仓库转租给苏联；(2) 凡经大连港的苏联的进出口货物，或苏联为港口设施提供的材料和设备，均免征关税；(3) 大连的行政管理机关隶属中国，但港口主任和副主任的职务则由中苏两国人员轮换担任；(4) 原在缔结对日和约前，大连港实行同旅顺海军基地一样的军事管制；(5) 该协定将在对日和约生效后重新审议。^③看来，苏方对于涉及实际利益的关键问题不仅考虑周全，而且不断加码。对此，中方的设想却完全不同。

经过两天的研究和讨论，11 月 11 日中方提出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的草案。该草案首先在形式上与苏方草案不同，即将几个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放在一个统一的协定中解决。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苏方关于在签署对日和约后再重新审议有关协定的意见，而是要求立即一揽子解决所有协定的重新审议问题。在内容上，双方设想的差距就更大了。关于旅顺口、大连港和中长铁路领导职务采取轮换制的问题，中方没有异议。针对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中本来已经

①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1985 页；周恩来年谱（1949—1959）上卷，104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06 页。不过，伍修权的回忆录承认“条约最初文本是苏方起草的，没有原则变动”。（伍修权：《回忆与怀念》，106 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②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 104 目录 154 卷宗 104 号，104 页；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04 目录 104 卷宗 104 号，104 页。

③ 葛罗米柯致米高扬和维辛斯基，1950 年 11 月 10 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04 目录 104 卷宗 104 号，104 页。

确定的苏军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撤出旅顺口的原则,中方草案增加了补充条件:“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定生效已超过三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则苏军将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最要害的问题是中方提出了苏方草案完全不曾设想的问题,这主要是:第一,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第三,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①

除旅顺撤军问题外,中方的草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的原有设想。这是苏联方面感到非常意外的,以至收到周恩来的草案后,苏方进行了反复研究和修改。我们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中方这一草案的四份不同的修改稿,其中有两份删改之处非常多,特别是斯大林本人批阅的文本,几乎把中方草案的内容全部勾划掉了。不过,不知什么原因但显然是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苏方于 1950 年 10 月 15 日交给师哲的协定修改稿已经很接近中方的协定草案了。在苏方的这个协定草案中,没有提苏联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并增加了由中国“偿还苏联自 1945 年以来用于旅顺口修复和建设工程的费用”的条款。除此以外,苏方接受了关于旅顺口的条款(不包括移交财产),也接受了大连的行政完全隶属中国管辖、立即由中国政府接收大连(不包括旅顺口)的一切财产的条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方还接受了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或不迟于 1950 年末无偿地向中国移交中长铁路的权利及全部财产的条款。不过,苏方在同时提交的该协定的议定书中又增加了三条:对于苏联运入、调出旅顺口的物资和原料免征一切税收;上述物资和原料免受中国海关检查;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②

1950 年 10 月 16 日,中方又提出了根据苏方草案相应修改的关于旅顺口、大连

①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1950 年 10 月 15 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00 目录 100 卷宗 100 案宗 100 号,第 100 页。

②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00 目录 100 卷宗 100 案宗 100 号,第 100 页。

和中长铁路协定及议定书草案。对于协定，中方几乎没作改动，但在议定书中，针对苏军沿中长铁路调运的问题，中方提出增加一项条款，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自由地沿苏联境内的铁路调运。^①就在这个问题上中苏双方在谈判中发生了争论。

11月17日至11月21日，米高扬、维辛斯基与周恩来连续进行了三天会谈，会谈涉及中苏双方提出的所有问题。维辛斯基关于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显示，中苏双方对条约文本只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以及贷款、航空、贸易、派专家等协定也没有原则性的分歧，问题就出在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的议定书上。对于中方提出的增加中国军队和军用物资沿苏联铁路调运的条款，苏方表示坚决反对。一方面，作为让步，苏方在修改议定书时根据中方的愿望对第一条作了改动，规定只有在远东地区出现反对苏联的战争威胁的情况下，才能沿中长铁路调动部队。但另一方面，苏方认为中国军队从满洲沿苏联铁路向新疆调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合理性，中方的建议实质上是对苏联建议的“反提案”，是“隐讳地反对苏联这一建议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没有任何必要，也绝对不会被接受”。周恩来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说明中方提出这一条款是因为苏方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坚持必须在议定书中列入这一条款。米高扬随即指出，如果这样，那么就取消苏方的这一建议，而把议定书中已经缩短的中长铁路协定有效期再保留50年。显然，苏方是在以取消已经形成的谈判结果相要挟。周恩来无法再表示反对，但提出要向毛泽东报告。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周恩来接受了苏方的条款，只是要求苏联口头承诺，在必要的情况下，中国可以沿西伯利亚大铁路调运军队。米高扬对此表示可以接受，但是再次对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惊讶。他气愤地说：“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包括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466 目录 00001 卷宗 0001 案宗 0001 档案号 0001。

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①

至此，中苏谈判大局已定。圆月缘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将已经定稿的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议定书，贷款协定和议定书，以及关于外蒙古独立和废除盟旗制等项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照会等文件发回，要求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进行讨论并通过。^②

五、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结局

根据俄国档案材料，圆月源日至月猿日，双方代表进入了一轮新的谈判，又举行了三次会谈。

圆月源日，中国代表团收到莫洛托夫转交的一个新协定草案，其中规定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的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这些国家的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公司和团体的经营活动。这就是所谓的《补充协定》。会谈中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个协定的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几处不大的意见。比如，将“协议如下”改为“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将“租让”改为“租让权”。周恩来还提出，中国准备采取经济措施，逐步减少外国公司和组织在东北和新疆境内从事的经济活动。^③会谈还涉及有关条约和协定的签字和公布问题。周恩来要求签字仪式在圆月源日同时举行，并提出贸易协定、航空协定以及石油和有色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不能签字，因为关于这些协定的文本尚需进一步协商和明确。周恩来还说，他和毛泽东商议的意见是，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所有协定都应公开发表。这显然是针对《补充协定》

^①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月猿年圆月员日、圆日、猿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猿目录缘卷宗猿猿-猿页；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苑目录缘卷宗猿案宗猿源-猿页。

^② 周恩来年谱（员源-员苑）上卷，圆-猿页。

^③ 这一记录显然与以前在中国流行的一些说法不同。中国有材料说，毛泽东开始不肯签署这个协定，只是在斯大林的一再坚持下，“为了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只好让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猿页；《在历史巨人身边》，猿页。

而给苏方出的一个难题。维辛斯基表示这样的问题必须加以讨论，并答应向苏联政府汇报。^①

1950年1月1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通知说中国政府和政协负责人会议同意就有关条约和协定签字。^②当晚，斯大林和毛泽东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随后，两国的报纸刊登了有关的条约和协定。^③但双方都没有公布有关的两个议定书和那个《补充协定》。

中苏同盟关系的建立，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于中苏双方无疑都是有利的，但是从经济和外交的角度观察，中苏两国各自的理解就有所不同了。应该说，1950年1月正式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文件，在总体上讲还是符合中国的愿望的，这一举措为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开启了大门。尽管有些条款尚有不尽人意之处，但中国在1945年失去的主权和利益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完全收回了。而对于斯大林来说，这意味着苏联在战后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现的远东战略目标——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至迟到1950年底将不复存在。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为了尽可能地弥补这一损失，斯大林才要坚持签订秘密的《补充协定》，其目的无非是要通过消除美国、英国和日本势力在这两个与苏联接壤地区的渗透和影响，保证苏联在亚洲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

（原文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0期，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校订与补注。）

①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1950年1月1日；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1950年1月1日；维辛斯基日记，1950年1月1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046目录1046卷宗1046案宗1046来源-727页。

② 《刘少奇年谱（1949-1959）》下卷，1046页。

③ 正式发表的文本见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1046-1047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

中苏同盟与美国 战争、政策与理解

(1949-1955)

挪威诺贝尔研究所 奥·韦斯塔

对

于中苏联盟来说,与美国之间的冲突既是产生内聚力的要素,又是出现争论的焦点。在朝鲜的反美战争促成并加强了中苏之间的联盟,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苏联和中国在 1949 年时都没有预料到的。另一方面,从 1950 年起,与华盛顿进行全球性对抗的战略意见分歧导致了中苏联盟的分裂。从这一点出发,人们可以更加充分地理解中苏友谊的内容首先是作为一种反美联盟,或者说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反资本主义制度的联盟,它将矛头直接对准了战后美国在亚洲的出现,以及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

虽然中苏领导人都意识到自身陷入了与美国的持久冲突之中,但是双方对于冲突内容的理解却相差甚远。对于毛泽东及中国领导阶层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冲突在于美国企图控制中国这一地区,他们还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大量可以说明美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证据。而对于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来说,主要问题在于莫斯科的全球性角色如何得到普遍承认,以及寻求一种与华盛顿之间可以控制的,或者至少是带有某种结构性质的冲突。这些不同的理解使中苏联盟在对外政策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如

台湾、印度、东欧以及中东问题等。

如果我们认为中苏之间的合作首先是一种反资本主义制度的联盟，其矛头是直接针对美国本身以及它在全球政治中的霸权地位的，那么我们就需要解释为什么中苏联盟的分裂恰恰是在华盛顿巩固了它在亚太地区的控制之时。是像一些人猜测的那样，因为美国对中国施加了压力而促成了这种分裂吗？中苏在预测与美冲突问题上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对联盟的中苏双方之间相互理解与信任的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一、美国与中苏联盟的形成

在中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认识到他自己需要一个国际性的联盟来共同反抗国民党与美国之间的联合。毛泽东认识到苏联是他寻求联盟伙伴中的最佳选择，因为双方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世界观，而且在 1949 年春天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出现了破裂。毛泽东从日本投降后与苏联在满洲合作陷入的麻烦中认识到，相同的世界观并不足以使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之间保持联合，他需要向斯大林提供一些蒋介石所不能给予的东西，即希望苏联能在中国产生长期的影响，以及双方联合起来直接反对美国。意识形态和实用性这两个因素共同为联盟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土壤。^①

如果说在国内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是联盟产生的土壤，那么对美国的怨恨就是形成并培育联盟的气候条件。对于毛泽东来说，在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战斗的最后阶段，华盛顿已经证明自己是革命的残酷敌人，由于寻求对中国的控制，它将威胁到中共政权的生存。对于斯大林来说，美国是资本主义阵营中的首领，而且是拒绝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在全球的势力范围这一活动的领导者。令美国惊讶的是，中国成为苏联无须冒险战争风险就能报复美国的一个区域，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就是与中国共产党人结成联盟，尽管这个党在几次重要关头使斯大林陷入困境，并且

^① 韦斯塔：《冷战与革命：中美敌对及中国国内革命战争的起源》（纽约，1965）。

使他因此而不信任大多数其他兄弟党了。^①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50 年初签署正式联盟协议的决定性的几个月中,中苏双方出于各自的目的都强调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侵略企图。莫斯科强调的是,美国的计划是要重新武装日本以及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控制东南亚地区。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则强调说,美国仍然企图颠覆中国新生的革命政权,他们不但对国民党在台湾的残余势力提供援助,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大陆组织和建立反革命组织。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国的行为迫使他们需要尽可能快地建立中苏之间的正式联盟。^②

美国企图分裂莫斯科和北京的计划进一步加强了这一需要,即通过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会谈签订一项条约,从而有力地向帝国主义者证明苏联对新的共产党政权的军事支持。1950 年 1 月,李克农作为中国共产党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与苏联大使的联络人,在苏联大使馆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美国有一个“策划中国共产党响应铁托集团的计划”,并且企图扩大他们“在中国的影响,以破坏中苏之间的友谊”。按照李克农的说法,帝国主义者宣传的重点是指责苏联正在“窃取中国的食物和资源,并且攻击 1950 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帝国主义条约,其结果导致中国丧失了广东及在满洲的所有工业设施”^③。

毛泽东提供的信息具有并不十分难以琢磨的两重性,他既不得罪苏联大使罗申,也不得罪其在莫斯科的主人,但这一信息肯定是促使斯大林开始考虑重新签订条约的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斯大林可能也认识到,随着苏联对中共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加强,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作某些修改,是苏联为在国际力量的角逐中于中国获得强有力的地位所要付出的

① 冈察洛夫等:《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及朝鲜战争》(斯坦福,1950),页 140;陈兼:《中国通向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公开敌对的形成》(纽约,1950),远 27 页。

② 1950 年 1 月 1 日罗申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515 号,目录 100 卷宗 100 号案宗 100 号,页 10。另见周恩来在 1950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 卷,100-101 页。

③ 1950 年 1 月 1 日罗申与李克农谈话备忘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515 号,目录 100 卷宗 100 号案宗 100 号,页 10 (文中“广东”疑有误,似应为“东北”——译者注)。

代价。1959年下半年，苏联在试图进一步推迟中苏最高级会谈时，对中共方面多少有些敷衍，但当周恩来明确传达了毛泽东坚持要到莫斯科访问的意见后，斯大林没有再冒险拒绝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参加其70寿辰庆典的请求。^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几个月当中，中国的新领导人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到如何对待美国的威胁上面。他们主要担心那些由美国支持的国内破坏力量，特别是在那些中国共产党尽管已经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感到无力控制的城市中，以及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尤其是印度支那建立的反共基地。毛泽东想通过驱逐所有在华的美国人——外交官、传教士和商人来减轻美国支持中国的反革命力量这一威胁。毛泽东也想派出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到印度支那地区的越南一线作战，以打击法国人和那里的国民党残余力量，毛泽东怀疑他们正在为法国及美国政府效力。周恩来向苏联大使解释说，印度支那是中国军事力量准备作战的一个最优先考虑的地区，甚至比解放台湾还要重要。^②

或许毛泽东早就希望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即讨论有关这些问题的对策，但斯大林未等毛泽东到来就先拒绝了所有这些计划。从1959年春天起，他就反复建议说中国不应拒绝与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新政府也不应拒绝苏联方面关于中国同西方国家恢复外交关系的提议。斯大林还特别强烈地反对中国派中国人民解放军前往越南，他强调说，这一行动无论是从时机上考虑，还是就条件而言，都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极为不利。后来有人猜测，斯大林采取这样的态度，主要是为法国左派在即将到来的国内大选中的政治地位着想。无论如何，当毛泽东这位中国领导人1959年12月10日到达莫斯科之后，并未能能在议事日程之中与斯大林讨

^① 1959年12月10日罗申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0000，目录100卷宗1000案宗1000号-1000页，毛泽东1959年12月10日致王稼祥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100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6年。安德烈·葛罗米柯致斯大林，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0000，目录100卷宗1000案宗1000号-1000页。

^② 安德列·列多夫斯基：《米高扬访华的秘密使命》，载《远东问题》1959年（1），100-100页，《远东问题》1959年（1），100-100页，1959年12月10日罗申与周恩来谈话备忘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0000，目录100卷宗1000案宗1000号-1000页。

论安排他自己的外交政策。^①

当毛泽东开始他在莫斯科的谈话时,在其心目中,只是想为中苏关系塑造一个新的形象。毛泽东想要把同苏联的联盟固定下来,以便在与美国发生战争时得到莫斯科方面的援助。在中国的经济和国防建设方面,他也需要苏联的帮助。但是除了这些实际需要,毛泽东告诉斯大林说他还需要一些“好看的”东西,比如说废除 1950年莫斯科与蒋介石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一致认为,这一条约令人想起过去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②

过去有关这次中苏莫斯科会谈的文章指出,美国是“斯大林与毛泽东谈话中无形的第三者”^③。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无形的参与者怎样影响了这次会谈。冈察洛夫、刘易斯、薛理泰强调说,斯大林为了使中国进一步依靠苏联,而采取了加剧中国与西方紧张关系的背信弃义的策略。但在会谈记录中很难找到论据来证明这一点。恰恰相反,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斯大林扮演了一个令人赞赏的角色,即他是一位谨慎的政治家,由于对国际形势有超人的理解,故而能够向他的中国伙伴提出指导性策略。

毛泽东和斯大林在如何对付美国这个敌人的问题上持有不同态度,是基于对美国进攻他们国家的可能性这一点看法有所不同。毛泽东确信美国会突袭中国——他只是不能确定此事会在何时发生。他的情报首脑李克农 1950年 10月 10日拜访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谢巴耶夫时——当时双方在莫斯科的真正谈判刚刚开始,说中国共产党“已经得到消息……美国将在 1950年 12月 发动一场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将在太平洋地区开始军事活动,并将利用日本、台湾和南朝鲜”^④。此信息令苏联的这位外交官惊讶不已。虽

① 韦斯塔:《失败、机会和神话:美国与中苏联合的起源》,1950年 12月 10日,即将在《外交史》杂志发表,笔者在莫斯科对米哈伊尔·贾丕才的采访,笔者 1950年 10月 10日在奥斯陆与格奥尔基·科尔年科的谈话记录。另见 1950年 10月 10日谢巴耶夫与李克农谈话备忘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4000目录 1950卷宗 1400案宗 140018页。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1988年 12月 10日,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③ 冈察洛夫等前引书,1950年 12月 10日。

④ 1950年 10月 10日谢巴耶夫与李克农谈话备忘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4000目录 1950卷宗 1400案宗 140018页。

对谈判一项新的协议不再犹豫了。斯大林让莫洛托夫将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 1 月 5 日的讲话读给毛泽东听,莫洛托夫强调,艾奇逊暗示一方面美国将不在军事上进攻亚洲大陆,一方面华盛顿想在中苏友谊问题上制造麻烦。毛泽东认为,这是中国和苏联都要对付的一种挑战。^①

二、朝鲜战争, 1950-1953 年

朝鲜战争不仅是金日成及他的北朝鲜同胞们真正想要的战争,也是由于斯大林的优柔寡断和判断失误而导致的战争。在冷战时期,朝鲜战争是美国与另一个大国之间的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热战。尤其是在战争的前 18 个月中,朝鲜经历了非常紧张和危险的时刻。战争毁灭了朝鲜半岛,同时也加强了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②

这次战争也使中苏联盟确定了一个比莫斯科谈判期间更加具体的敌人形象——美国已经表明他们愿意而且也有能力在亚洲大陆发动一场战争。如果美国可以入侵朝鲜,那么它也可以进攻中国,只要美国政治领导人决定这样做。尽管战争的结果使毛泽东和大多数中国人确信中国现在能够成功地在它的“本土”上抵抗外来侵犯,但对于北京来说,朝鲜战争证明,美国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是迫在眉睫的,至少到 1953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还是这样看的。

毛泽东还认识到,苏联的援助有助于提高中国与美国的作战能力,尽管这种援助,至少在最初阶段,远远低于中国人所希望得到的。虽然毛泽东误认为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前的外交活动对革命热情是有害的,但他还是相信这次战争表明,苏联在从意识形态角度对维护东亚革命所承担的义务上是“真诚”的。当然,毛泽东得出这番结论的真正意义在于,苏联以及它的核能力是抵制美国直接进攻中国的长久而有力的防御力量。

^① 1950 年 1 月 5 日莫洛托夫与毛泽东谈话备忘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58 号,卷宗 158 号,案宗 158 号,页 1。

^② 我对朝鲜战争的研究是以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部保存的最近解密的俄罗斯档案材料为基础的。另见凯瑟琳·威瑟斯比:《1950-1953 年的朝鲜:进攻还是不进攻》,载《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1993 年第 1 期。

对于斯大林来说，朝鲜战争表明，中国具有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是他事先所没有想到的。中国人的英勇行为使斯大林得以在幕后无忧无虑地对战争施加影响，而不必被迫面对由于给金日成的进攻开绿灯所造成的结局。中国人的表现很可能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尽管毛泽东坚决反对在 1953 年结束战争的态度已经惹恼了这位苏联领导人，但是斯大林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中，还是计划通过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合作使中苏联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实际上，正如北京和莫斯科都看到的，反美战争进行得相当顺利。在北朝鲜发动进攻后的最初几天里，中苏双方就已经开始讨论如何支援金日成了。在苏联大使罗申与中国情报部门首脑邹大鹏之间召开的会议中，邹讲述了如何通过山东半岛的港口将北朝鲜的军队运送到南朝鲜，以及北京如何将中国的“专家”送到南朝鲜的战场上去帮助前进中的北朝鲜军队。^①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无论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不再认为他们那一方能够在这场冲突中取胜了，主要问题是如何实现停火。斯大林于 1953 年夏在莫斯科与周恩来会晤期间，首先在口头上支持毛泽东自去年以来所坚持的立场，但同时强调指出，中国和北朝鲜不应该直到停战协议签订后还发动进攻并拖延解决战俘问题。斯大林知道战争给中国的经济和资源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他原以为毛泽东可能会考虑接受停火。但是当这一切发生时，斯大林坚持要控制谈判的进程，这个谈判本身使战争延长了至少几个月的时间。^②

三、中苏合作的高潮，1953 年—1954 年

斯大林的逝世不仅全面缓解了国际紧张状态，而且也为中苏之间更

① 1953 年 7 月 1 日罗申与邹大鹏谈话备忘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000 目录 100 案宗 100 卷宗 100 页，及其附属文件。

② 1953 年 10 月 10 日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00 目录 100 案宗 100 页。

加密切的合作带来了希望。这位独裁者的去世令人感到意外,但是使新的苏联领导人越来越渴望与外国的关系更加稳定,与西方的联系更加密切——克里姆林宫里越来越多的为权力而竞争的对手似乎都将他们的主张建立在这些前提之下。斯大林去世后,苏联与中国之间的联系——也就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继承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平等、稳固,更加有利于双方。看来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平静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东西方都需要进一步的内部融合,这代替了冷战早期的外部斗争。

日内瓦会议似乎标志着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新精神。被战争拖累的中国不仅同意了苏联关于越南冲突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且毛泽东也赞成将周恩来的外交技巧应用到越南共产主义者身上,使他们确信他们本国的暂时性分裂状态不仅对他们自己有利,也有利于世界革命。莫斯科得出结论说,即使有机会,中国共产党也无意与帝国主义作战。莫斯科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有一个更好的联盟国。^①

毛泽东对于新的国际形势有三个忧虑:第一,作为革命运动的拥护者,越南被迫接受国家分裂这件事令他忧心忡忡,而且,他还必须接受台湾从祖国大陆长期分离出去这一现实。第二,他仍然担心美国与中国的反革命力量联合起来突然袭击中国。第三,至迟到 1955 年初,当中国共产党政府开始对其内政外交进行规范化管理时,毛泽东开始考虑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将如何发展的问题。^②

上述这些考虑可能有利于毛泽东作出决定,对国民党占据的中国沿海一带的几个岛屿发起进攻。然而,引发这种进攻行动的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蒋介石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毛泽东担心这样一个条约会使台湾从大陆永久地分离出去,成为美国为发动侵华战争作准备的基地。此趋向不能不促使中国方面提出挑战。不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向中国军事领导人

^① 翟强:《中国与 1955 年的日内瓦会议》,《中国季刊》1982 年第 1 期,页 1-10 页。同时参见 1955 年 7 月 2 日苏驻京代办瓦斯科夫与毛泽东谈话备忘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58 号,目录 158 卷,宗 158 案,卷 158 页。

^② 王炳楠:《中美会谈九年回顾》,页 1-10 页,北京,1955 年。

及苏联方面详细解释这一问题时却显得过于谨慎小心，以至于所提出的目标显得过于狭小。进攻的目的只是为了占据这些沿海岛屿来“抗议”美国与国民党之间的条约。^①

虽然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沿海岛屿问题的策略感到困惑，他们发现这一策略对于美国及国民党双方都会产生反作用，但是他们并没有反对中国的这一行动。在 1950 年 10 月 10 日和 10 月 11 日毛泽东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会晤中，后者接受了北京方面关于无论如何都会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保证。1950 年 11 月当美国第七舰队驶入这一海域保护国民党在金門马祖的供给线时，毛泽东并没有在国民党撤离大陈岛后试图进攻这两个岛屿，从而缓和了危机。以后，周恩来于 1950 年在万隆宣布说，如果美国愿意停火，中国准备停止进攻。根据苏联的材料，周恩来的声明似乎正是在莫斯科准备告诉北京应该罢手的时候发表的。苏联人对中共外交政策的信心已经大大动摇，尽管由于日内瓦会议的召开，这种信心后来有所加强，但他们依然有些犹疑。^②

1950 年中至 1952 年中是中苏关系友好的高潮阶段，在这三年期间，中苏联盟更加稳固，而且开辟了一些新的合作领域，例如在核工业方面。这一时期也是东亚国际局势的平静时期，或许是从 1950 年到冷战结束期间惟一的一段平静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通过大规模农业集体化来加速中国的革命进程，并且制定了工业化计划，尽管这个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苏联模式制定的，但其设想的速度使苏联的经验都黯然失色。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逐渐改变了关于美国即将发动侵华战争的观念。帝国主义者已经接受了在朝鲜和越南停战的协议——尽管此协议仅是暂时性的，毛泽东认为中国对台湾的行动也给了华盛顿一次教训。如果两国

① 张少书和何迪：《1950—1952 年美中在金門马祖冲突中避免了战争：偶然，运气还是阻力？》，《美国历史评论》1982 年 10 月第 92 卷第 3 期，150—151 页。

② 1950 年 10 月 11 日苏联大使尤金与周恩来的谈话备忘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000 目录 1950 卷宗 1000 案宗 1000-1000 页；另见 1950 年 10 月 11 日周恩来的声明，《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0 卷 1950—1951 页。关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的情况来自俄国档案管理人员；另参见 1950 年 10 月 11 日尤金与毛泽东谈话备忘录及所附概述，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000 目录 1950 卷宗 1000 案宗 1000-1000 页。

关系能进一步得到改善,这位主席很希望美中日内瓦会谈将导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让步。只要毛仍然对与华盛顿达成解决台湾问题的协议寄予希望,他就会继续在言论上支持赫鲁晓夫的国际缓和政策。^①

1956年初的苏共二十一大使中苏关系更加复杂化,并且影响了两国的对美政策。对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及苏联过去的批评,毛泽东最初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他意识到他最终也可以用1956年苏联对待他的那种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怒气了。虽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没有事先向中国共产党通报(而是事后才与毛商量)这件事感到不快,但是他认为,这次讲话使中国共产党得以自由地塑造自己的历史,并且使他由此作为理论上和政治上的领导者而与赫鲁晓夫处于平等的位置上。在共产主义集团内部及东南亚地区的国际事务中,中国可以取得一个新的重要地位了。

尽管毛泽东有一种从苏联的长期监护下获得解放的感觉,但是就他于50年代末着手的政治试验而言,他对非斯大林化现象的看法却在1956年秋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匈叛乱之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东欧事件直接加深了毛对美国援助中国反革命势力的担忧,并使他进一步靠拢像刘少奇和邓小平那样的较为“保守”的领导人。这些人从一开始就比这位主席更加怀疑赫鲁晓夫的计划。毛还认为1956年“百花齐放”运动中公众对共产党领导的公开批判,是美国制造的阴谋的一部分。由于中美会谈缺乏进展及对美国反华言论的大力驳斥,毛在1956年末显然断定,任何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可能都不在考虑之列,至少暂时是如此。^②毛泽东对尤金大使抱怨说:“1956年远月到1957年远月这段时间,无论在国际事务还是在国内事务方面都是一个困难时期。”^③

在1957年10月莫斯科共产党会议期间,毛泽东想要强调对美国的戒

① 1956年10月10日尤金与毛泽东谈话备忘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0000目录 200卷宗 2000案宗 2000-100页(原注如此,日期与前注矛盾——译者);何迪:《最受尊敬的敌人:毛泽东的美国观》,载迈克尔·亨特和牛军编:《1949-1957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历史》(华盛顿特区威尔逊中心,1988) 100-101页。

② 奥·韦斯塔:《毛泽东与非斯大林化》,即将发表。

③ 1956年10月10日尤金与毛泽东谈话备忘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0000目录 200卷宗 2000案宗 2000-100页。

备及其反美决心，以此方式来突出中国对从美苏缓和中获取自身利益——特别是台湾问题——的需求。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的主要问题是，他要强调给苏联对外政策以全面支持，并由此使苏联确信，支持中国的目标不会威胁到他们缓和与美对抗的尝试。但是苏联领导人对毛泽东关于不惧怕核战争的谈话感到震惊，并且在同其他兄弟党的会谈中，贬低这位主席对国际关系的论断。毛决心不在他第二次访问莫斯科期间蒙受羞辱，他坚持要中国代表团对最后决议案提出几种修正案，增加对美国的批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妥协方案，苏联领导人接受了中国所提建议中的几点意见。毛看到中国在这次会议上至少取得了部分胜利，由此在归途中，他确信自己已经居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位置上了。

四、联盟的结束，~~1958~~—~~1959~~年

可以从中美关系没有改进及中国对于美苏缓和越来越不存幻想这一点，来理解~~1958~~年中国沿海岛屿发生的第二次危机。与此有关的还有，毛泽东希望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扩大自己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以及为支持这位主席的经济试验“大跃进”而进行的全国动员。

危机发生的时间的选择——这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关系到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以及他对美国在中东地位受挫的看法。毛泽东在党内及与苏联人的谈话中用黎巴嫩来比喻台湾问题：阿拉伯国家的人民在中东地区打击了美帝国主义，通过进攻沿海岛屿加入这场斗争是中国的责任。这是对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挑战，因为中国告诉他们，如果无视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主张，那不过是在冒险——赫鲁晓夫是拿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来冒险，而艾森豪威尔的冒险则在于他制造了一个永久性冲突，无论何时美国在其他地区出现问题，这种冲突都会扩展到那里。

在~~1958~~年到~~1959~~年期间，毛并没有打算与美国发生战争，也没有打算进攻台湾本岛。就像毛一生中常常经历的那样，这是一次带有政治目的的军事行动。然而他却低估了苏联对这次挑战的反应。台湾海峡的新危机是紧随赫鲁晓夫对西方的“和平攻势”，及其~~9~~月底访问北京之后发生的。在这次访问中，赫鲁晓夫保证要把中国纳入自己对西方的政策之中。

毛事先没有告诉赫鲁晓夫中国要炮击金门和马祖。相反,在北京讨论时的中心议题却是中国要求苏联进一步提供援助,以及苏联的计划要适合中国的战备体制。尽管苏联方面再次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虽然不包括全面分享核技术这一核心问题——但中国坚决反对苏联关于在中国北部建立联合指挥的潜艇舰队及军事报警系统的军事计划。赫鲁晓夫认为他访问北京之后,中国再次进攻这些海岛是中国采取的一种强制性手段。^①

愿月 愿日进攻一开始,苏联就迅速作出了反应。当苏联警告美国反对它与中国发生战争的同时,克里姆林宫也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批评,指责他们的做法“对敌人有利”,同时“也错误地判断了国际形势”。为了强调这一点,苏联甚至从中国撤出了一部分军事专家。中国外交部长陈毅答复说,中国有能力控制危机,并请求苏联提供援助,以便在谈判解决台湾问题时给华盛顿施加压力。怨月底双方开始在华沙进行磋商,此后,中国领导人通过减少对那些岛屿的炮击简单地缓和了危机。毛泽东向周恩来建议说,我们可以“逢双日一律不打炮,使蒋军可以出来活动,晒晒太阳,以利持久”^②。

第二次海峡危机对毛泽东关于国际关系的观点有两个主要的影响。第一,它使毛泽东确信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大大减少了——他在 愿缘年 愿月谈到,“美国资产阶级已感到恐慌,感到被动”。毛泽东甚至想出了一个更加灵活的战术来对付华盛顿,例如在他拒绝陈毅发表文章谴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观点时说:“杜勒斯生病,近日美政府对我无多攻击,目前发

① 愿缘年 愿月 苑日毛泽东对苏联请求在中国建立特种长波无线电台问题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苑册,愿缘-愿远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愿园年愿缘年 怨月 愿日中国驻莫斯科代办张伟路(音译)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函电,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愿园国目录 缘卷宗 源案宗 猿缘-猿页。

② 愿缘年 愿月 猿日尤金与陈毅谈话备忘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愿园国目录 缘卷宗 源案宗 远愿愿-愿远页,愿缘年 愿月 愿日毛泽东关于苏共中央来信等问题给周恩来的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苑册,源愿-源页;愿缘年 愿月 猿日毛泽东关于金门逢双日不打炮给周恩来等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苑册,源愿页。

表此项谈话，似不适宜。”^①

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也感到他们已经把中苏关系推到了边缘，现在正是后退一步的时候了。但是由于“大跃进”政策带来的混乱局面，以及随后毛泽东在 1959 年 8 月提出辞去国家最高领导人职务等情况，干扰了这种想法。1959 年 9 月间苏共召开二十一大时，周恩来的贺电中没有任何对苏联对美政策的批评。毛泽东的讲话也回到了向苏联学习，以及在宣传中国经验时要“谦虚”这一题目上。^②

然而，中苏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和并没有持续下去。在第二次海峡危机期间，苏联领导人已经开始担忧他们与中国的核武器合作可能带来的后果。1959 年 12 月底，赫鲁晓夫通知中国，为了支持在东亚地区建立一个无核区，苏联决定单方面撤销剩余的合作项目。几个星期之后，毛泽东进行了回击，他在党内第一次给苏联领导人戴上了“右倾分子”的帽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怀疑赫鲁晓夫中止核合作项目很可能与他即将访美有关。^③

我们仍然不明白，中国领导人为什么决定通过戏剧性地使中印边界冲突升级的做法来消除由于苏美会谈给中国带来的消极后果。12 月底，就在毛泽东使赫鲁晓夫确信他也认为即将到来的访美会谈是“苏联和平外交政策又一次重大的胜利”之时，中国军队占领了一个印度边境哨所，并宣

① 1959 年 9 月 19 日毛泽东对《陈毅外长答新华社记者问，驳斥杜勒斯诬蔑中国的谰言》一文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534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总的说来，毛泽东是区别看待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他对艾森豪威尔较为温和，而对杜勒斯，“我不用事先看他的讲话就知道他要说什么”。见 1959 年 9 月 19 日尤金与毛泽东谈话备忘录。在限制海峡危机方面，毛泽东也考虑到了美国的政治。在 1959 年 9 月 19 日，他通知周恩来说：“建议明三日（逢单）大打一天，打一万发以上，对一切军事目标都打。以影响美国选举，争取民主党获胜，挫败共和党。”见 1959 年 9 月 19 日毛泽东建议金门炮击大打一天给周恩来等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534 页。另参见 1959 年 9 月 19 日毛泽东对驻英代办处关于英国同美、法、西德等国矛盾发展的初步总结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534-535 页。

② 1959 年 9 月 19 日毛泽东对中央外事小组文件和中央转发这一文件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535-536 页。

③ 中国驻莫斯科大使的报告，引自 1959 年 9 月 19 日毛泽东的指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535-536 页（核此篇为毛泽东对一份关于苏联建设中遇到问题的材料的批语，该批语及该材料中均无作者所写的内容——译者）。

称印度侵犯了中国主权。中国的行为令苏联观察家感到迷惑,他们认为北京的目的在于动摇苏联与印度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作为对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会晤的惩罚。苏联决定在冲突中采取中立的原则——塔斯社一项声明指出,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继续保持友好关系”^①。

赫鲁晓夫由美国返回之后,立即从莫斯科抵达北京,其目的是为了与毛泽东讨论他的美国政策及中印关系问题。我们一直没有得到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但是这次会晤导致了两位领导人之间个人关系的最终破裂。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毛泽东无法无天,出尔反尔,不懂礼貌。”而毛泽东则坚持说:“赫鲁晓夫是一个非常幼稚的人,他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很容易上帝国主义者的当,如果他不知悔改,那么从现在起几年(愿年)之内他就会完蛋。他害怕两件事情: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共产主义。”^②

1959年 10月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第一次警告中国人,企图破坏苏联的外交政策会影响到双方关系的各个方面。^③

1959年底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为中国提供了一种直至 70年代末还发生作用的思维模式。在 10月的一次有趣的讲话中,毛认为苏联“修正主义”会“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 50年以上)”。毛泽东提醒自己记住与莫斯科接触的那段复杂的历史,他在提纲中强调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多次企图贬低他。“我们批判了朋友。……(但是现在)我们的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他指出,中国会被孤立很长一个时期,但是它将“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即使处于孤立状态,“愿年内,中国(也会)完成工业体系的初

① 1959年 10月 15日毛泽东给赫鲁晓夫的信(应为 10月 10日——译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8册, 1993, 199页;对贾丕才的采访记录(贾丕才在 1959年之后仍然问道:“为什么他们不像通常那样,在台湾海峡减少炮击或者别的什么?”);《真理报》1959年 10月 10日。

② 杰罗德·谢克特翻译并编辑:《赫鲁晓夫回忆录:公开的录音磁带》(波士顿, 1969), 159页。

③ 1959年 10月 15日契尔沃年科与刘少奇会谈备忘录,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10000目录 15卷宗 1500案宗 1501-1502页。

步建设……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①

中苏联盟没有在 1959 年冬季彻底分裂的原因在于中国政治的发展。由于“大跃进”的结果，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层的政治地位继续下降，而其他领导人当中还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将这一冲突公开化——尽管他们也和毛泽东一样对苏联人非常不满。毛泽东在挑起莫斯科与北京之间公开分歧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谨慎，也许他希望苏联能通过一些戏剧性的行动明显地迈出第一步。1959 年 9 月《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第一次让公众感觉到中苏之间存在分裂的迹象，该文集中攻击苏联不愿意承认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发生战争的危险性就存在这一点。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苏联方面很快就反击说：“现代左倾分子把实现和平共处、停止军备竞赛及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人民友谊的政策看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国际形势的任何一点儿恶化都被他们用来证明他们观点的正确性。”^②

毛泽东的策略制定出来了，其表现方式却比这位主席预料的更加戏剧化。10 月 1 日苏联政府通知刘少奇，苏方已经命令所有在中国工作的科技人员必须于 10 月底以前返回苏联。苏联的这种行径充其量是使中国领导人一致起来并团结在毛泽东周围，就像危机期间出现的情况一样（甚至超过了毛本人以前建立的统一）。陈毅在 10 月 1 日告诉苏联大使：“这是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陈说：“我们不是南斯拉夫，如果你们想要像对待南斯拉夫那样对待我们，我们是不会接受的。”中国将继续与美国斗争。这位外交部长宣称：“中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甚至在二三十年后都不会消失。”^③

令人感兴趣的是，当 1959 年中苏分裂进一步加深时，毛泽东本人却置身事外，而让他的同事，即曾经批评他的国内政策以及本来并不赞成加深中苏紧张关系的人——如彭真、邓小平，去执行这次最严厉打击的任务。

① 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1959 年 9 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5 册，1289~1290 页。

② 《红旗》杂志 1959 年 9 月；《苏维埃俄国》1959 年 10 月 1 日。

③ 契尔沃年科与陈毅会谈备忘录，1959 年 10 月 1 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在那一年他与苏联大使惟一的一次会谈——1950年12月16日祝贺他生日的拜访中,毛试图使自己置身于中苏争论之外,可能以此作为他对已感觉到的党内斗争的一种保险政策。毛强调说他不再主持政治局会议,他“实际上再也不在中央委员会上发言了”。同年秋天,195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毛泽东强调他支持该会议所形成的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妥协的文件。毛说:“这些文件在我们共同的敌人——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混乱。”

五、革命及反资本主义制度的联盟

作为一种总体思想,有“共同敌人”并不足以保持联盟继续下去。问题在于把各自优先考虑的政策与对“敌人”的认识结合起来,而这两者都可能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美日联盟中,各国优先考虑的政策在一个共同体——由于市场全球化而带来的经济统一体中发生了变化。这种共同体加强了这些联盟,即使是在对敌人威胁的理解完全不同的时候。

像中苏合作这样的反资本主义制度的联盟并没有上述那种联系的纽带,因而更多的是依赖于对敌人、敌人的潜在能力、其意图及获胜决心的共同理解。他们需要有他们的一个或几个对手的相当完整的形象,这个形象是由他们完全同步发展着的认识、观念勾勒而成的。如果他们对这一形象不能形成一致的看法,要保持这种长期的联盟是非常困难的。

1950年代后期的中苏联盟正是如此。莫斯科和北京对于美国的潜在能力和意图的理解不再一致了。涉及许多方面的对世界的不同看法表露了分裂的过程,至少当争论公开化的时候是这样。此外,双方对于完全接受他们所感受到的新主张都显得有些犹豫不决——赫鲁晓夫考虑缓和与毛考虑指责和冲突时一样,是很谨慎的。但是到1958年第二次海峡危机发生之后,这一切碰到一起了,联盟开始破裂。

那么在形成这些观念的过程中,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的“楔子策略”起了什么作用呢?约翰·加迪斯认为,杜勒斯到1950年代中期为了扩大中苏分歧而“建议采用一种高压战略”。加迪斯说:“更加明显的事实是,当中苏联

盟差不多在 1950 年之后开始破裂时，其分裂的方式正如杜勒斯所预见的那样：是由于在美国对人民共和国施加最大的压力时，俄国人拒绝满足中国人在军事和经济上提供援助的要求。”^①

我认为，中国和俄国材料中真正令人感到惊讶的地方在于：美国未能向北京表明它拟想中的不断增加的进攻意图和决心。相反，在 1950 年代后期，即第二次海峡危机形成高潮时，毛泽东认为美国的威胁正在减弱而不是增长，从避免受到美国全面进攻的角度说，中国当时比建国初期要安全得多。恰恰是这种理解，使中国领导人通过固执地推行一项针对华盛顿的更具挑战性的策略，来让他们的苏联盟友共同承担风险。如果毛泽东坚持认为美国对他的党和政权的进攻迫在眉睫——他从 1950 年直到 1958—1959 年的第一次海峡危机前，或多或少都持有这种观点——那么让他苦心建立的这一联盟去冒险就太愚蠢了，这也不符合毛的战略观点。

但是，如果毛泽东没有觉察到美国的威胁即将来临，那么他为什么需要冲突呢？主要问题在于台湾，美国已将重新统一的道路封死。毛不能接受美国的观点，即让台湾处于华盛顿的保护之下。重新统一已经成为他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他硬要把自己对苏联和美国的认识与他对实现统一的需要一致起来。

有趣的是，从 1950 年因其他地方的革命需要而自愿推迟征服台湾，到 1950 年代后期使重新统一成为国家建设项目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和多数中国领导人优先考虑的具体的对外政策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了变化。对于革命政权来说，这种对外政策选择的不稳定性是普遍的，这也许与领导阶层内部发生的认识变化有关，这时，国家的需要来自于作为其考虑重点的国际阵线或国际联系的种种动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台湾问题已经成为从毛泽东到江泽民及其以后领导人思想观念转变的最强有力的象征。

（本文系作者提交 1995 年 1 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李丹慧译。）

^① 约翰·加迪斯：《长久和平：冷战的历史问题》，580 页，纽约，1987 年。

苏联的对华援助及民间合作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黛·凯佩尔

导 言

无论是从规模上说,还是就其雄心而言,缘年代苏联顾问在中国实施的计划也许堪称是史无前例的。在缘年代,来自从黑色冶金到体育部门等各行各业的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到中国去帮助那里的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管这一计划十分庞大,但有关这方面的书,尤其是从曾在中国工作过的顾问的角度写成的书很少。最近,俄罗斯公开了以前未对外开放的档案,也实行了较为宽松的政策,这使我们可以对这一重要计划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并对这一计划对中苏关系的影响重新予以评价。

改变研究状况的可能性有助于我们对原来的事实有一个新的理解。例如,我们在本文将看到苏共中央不仅控制着在中国实施的苏联顾问计划,而且同时在苏联国内也使用同样的管理方法。苏共中央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是自上而下地发布指示,而几乎根本不考虑其指示和决定所影响到的部门或事情。苏共中央对安全问题表现出一种狂热,但是缺乏对下级部门的监督。

苏联顾问计划受制于来自上级的命令,即受制于苏共中央的各个部门。苏共中央是一个复杂的官僚机构,对所出现的问题反应很迟钝。它在苏联社会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也是很孤立的,往往难以掌握最新

的或者是真实的信息。苏共中央自以为它知道对其问题而言什么是最好的解决方法，苏联档案馆的材料揭示了这一点。就连影响到中国前途和未来的重大决策方面，档案中也几乎只字未提中国的参与。

此外，苏共把精力集中在安全问题上，这制约了政府和人民之间本来很简单的联系，而且降低了工作效率。苏共中央尽管在选择顾问问题上实行了严格的程序，对他们进行详细的安全检查，确保他们有正确的“立场”，但当这些顾问一旦到了中国，对他们的监督和管理也就随之结束，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方向可言。

学习苏联史的人对这些情况都不会感到意外和吃惊。在外交事务中这些特征也没有经常被视为重要的因素。现在人们还有理由指出是，众所周知的地缘政治因素导致了中苏结盟的瓦解，而本文要说的是，苏联的这些管理特征也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许许多年以后我们才能够找到所有的证据，写出一部具有结论性的书，全面阐述 1950年代民间合作的历史以及中苏关系之所以在苦涩中告终的原因。新近公布的一些材料揭露苏共中央在顾问计划管理上出现过失误，我们应该承认这也是导致举世闻名的“中苏友谊”结束的一个原因。

新旧资料

随着苏联解体而出现的政治形势为学者提供了大量的未曾面世的资料，这使得我们可以对已有的文献进行评价和扩充。例如，几乎所有的苏联时期的资料都表明在 1950年至 1955年期间苏联把一万名专家派到了中国，不过所有这些资料都没有说明这一数字的出处。^①此外还有许多有关苏联顾问所产生的影响的统计数字，但同样还是没有说明出处。^②尽管苏联学者长期用一万名顾问这个数字来说明苏联对在华所履行义务的重视

^①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的清单见对 阿·阿·阿尔希波夫的采访，《变化世界中的苏联与中国》（莫斯科，1993），来源：来源页。

^② 阿·阿·阿·索夫和 阿·阿·阿·拉斯科夫：《苏中关系，1950-1960年》第 4 版，特别是第 4 章，莫斯科，1963；阿·阿·阿·托夫：《1950-1955 年苏联对中国科学技术援助的经济评估》，莫斯科，1960。

程度,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一部与此有关的真正的学术著作或文章。

在苏联时期,曾到过中国的专家顾问确实撰写过在华的经历,但除个别以外,绝大多数文章中都没有细节的描述,而是大讲特讲苏联对中国所作的贡献。^① 戈尔巴乔夫政权以来,出现了一些简单描述 50 年代中苏关系的文章,可是这些文章更加着眼于毛泽东—斯大林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顾问的实际工作。^② 中国方面现有的与此有关的资料也大致如此。^③

仅仅是参与者的数目以及这一计划的庞大的规模——彻底重建中国——就使人们难以相信迄今为止居然还没有人对苏联顾问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认真的研究。本文想在这方面作一初步的尝试。本文不是从中苏关系的地缘政治观点来研究两国间的关系,而是从那些曾被派到中国工厂、企业和学校与中国同行们并肩劳动的顾问和技术人员的角度,在微观组织层次上来探讨两国间的关系。这种方法,即调查、了解这一联盟的低层次参与者的作用,将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中国和苏联更全面的联系。

本文所依据的部分档案资料是从控制着顾问计划的前苏联共产党的档案中找到的。^④ 要正确评价这一计划,仅仅依靠这些档案资料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些资料表现了苏共自己的偏见,并有所删节。^⑤ 首先,当时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地位决定了它所获得的信息是有偏见的。有关中国的信息来源包括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形色色的外交官、苏联政府官

① 最好的回忆录是 阿·罗奇科的《红色中国的苏联专家》,安德鲁·麦克安德鲁译(纽约,1959)。其他还包括 鲁·阿尔森切夫的《红星照耀中国》(辛菲罗波尔,1953); 昂·巴本的《扬子江上的彩虹》(莫斯科,1953); 昂·费德林的《中国回忆录》(莫斯科,1953)。

② 昂·费德林:《斯大林与毛泽东》,《近现代史》(莫斯科),1951,第 1 页; 阿·科瓦廖夫:《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远东问题》(莫斯科),1951,第 1 页,及《远东问题》(莫斯科),1951,第 1 页。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北京,1981); 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北京,198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北京,1981); 师哲:《伴随毛泽东》,《远东问题》(莫斯科),1951,第 1 页。

④ 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组织,如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也参与了这个计划。1951 年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试图去查找那里的档案,但还是失败了。

⑤ 我查阅资料的地方是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圣彼得堡),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圣彼得堡)以及苏联外交部档案馆。

员、克格勃、报刊、党的工作人员、青年组织以及工会干部。所有这些都明白，他们是在正式地向苏共中央作汇报。

苏共中央的第二个问题，坦率地讲，是其组织自身。苏共中央在 1950 年代是极其官僚化的。有时有几个委员会、部门和分支机构在管理着同一个领域。这造成它们之间联系迟缓，因为它们都陷入日常的文牍工作中。任何一个有待于解决的细小问题，只要涉及苏共中央和另外一些有关部门，如苏联外交部，就会变得复杂棘手。此外，这些部门的成员特别谨小慎微，并且很不情愿作出决策，从而阻碍了他们对中国形势进行客观的估计。

不过，有关苏联顾问计划的官方档案中有一些资料来自计划的参与者，这些资料更加翔实，更具有个人色彩，它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背景。我找到并采访了其中的 10 多位，从而丰富了苏共中央有关这一计划的资料。^① 这些档案材料也有不足之处，原因在于每个苏联顾问在中国的经历各有不同。有些接受采访的人年事已高，这不能不加以考虑，因为他们愿意从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来说明自己。他们的个人回忆录情况也是如此，我在一定程度上也参照了他们的回忆录。

我在本文中所使用的资料包括档案资料、我所进行的采访以及回忆录，其目的在于让人们有一个有关顾问计划的总印象。我们不必完全相信这些资料，不过它们确实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以前不曾知道的一个侧面。我尽可能把它们结合起来，互为对照地进行检查，其结果就像一个蹩脚的手工织品或花毯。虽然有些部分加工处理得不够精细，但从总体来说，它为苏联顾问计划勾勒了一幅较从前更为全面的图画。

关系开始

1950 年 2 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② 这标志着中苏友谊的

^① 1950 年 2 月，我通过在《真理报》和《莫斯科真理报》作广告而找到了这些前顾问。我接到了几百个电话，这使我在采访时能够对其行业和在华工作的时间进行选择。

^② 条约的英文本可见黛·凯佩尔：《一个红色工厂的梦想：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遗产》（纽约和伦敦，1950 年），页 115-116。关于秘密协定的讨论，参阅谢·冈察洛夫、约·刘易斯和薛理泰的《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页 115-116。

正式开始。在最初几年里,苏联派遣一些代表团和顾问到中国去讲学。^①但是中苏联盟并不像两国希望世人相信的那样密切,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猜疑和敌意。只要斯大林在世一天,苏联提供给中国的帮助就是最低限度的,主要限于零散的讲学以及苏共官员的对华访问。在1950年至1953年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俄文翻译成中文的书本和文章的指导。^②

两国之间缺乏密切关系这一事实无意中被记录在苏共官方的档案中。从当时中央的组织形式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地位并不比别的人民民主国家高。众所周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苏联马上予以承认。然而,对处理对外关系负有监督责任的苏共中央一直到1953年仍然由一些处理与其他非共产党国家关系的部门和分支机构来处理中国问题,而对于其他的人民民主国家的事务则有专门的对应部门。一直到1953年11月苏共中央机构改革以后,中国这一名字才出现在其组织机构图中,那时它被合并负责蒙古、朝鲜和日本事务的部门中。这似乎表明在很长时间里苏共中央一直认为不值得把中国的地位提高到人民民主国家应享有的高度。^③

随着斯大林的去世和赫鲁晓夫的上台,两国关系中的个人障碍得以消除,这至少持续了几年的时间,两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个真正帮助中国重建的计划开始了,苏联几乎所有的重要部门都派出顾问到中国工作,苏联人开始帮助中国在各地修筑铁路,发展工业,建造桥梁和工厂。

① 苏中友协官方杂志经常介绍代表团的访问情况。请参阅《人民中国》,北京,1950-1953年。

② 参阅《一个红色工厂的梦想》。

③ 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全宗缘目录(全卷宗,苏联案宗,1950-1953年,11月),195-196页。

苏共中央与顾问计划

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阿尔希波夫^① 的领导下，苏联顾问计划开始松散地实施。阿尔希波夫是斯大林亲自挑选的在华最高经济顾问^②，于 1951 年开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交往。这位未来的苏联顾问计划的首脑在中国呆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返回莫斯科担任黑色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直到 1953 年 1 月。斯大林死后，他再次被派到中国，这一次是去指导苏联扩大对中国经济恢复的援助。从 1953 年底到 1954 年初开始，苏联为其援华顾问计划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这一期间，有更多的苏联人被派到中国。同时我们还可从保存在苏共文献中的费德林^③ 1954 年 7 月呈送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到在华的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工作情况的详细描述，这样的描述还是第一次。^④ 这份报告和其他类似材料一样使我们得以从内部来了解这一计划，了解苏联当时在中国介入的规模。

中苏关系的动力，至少从苏共中央的角度来说，是很清楚的。这个关于苏联顾问在华工作情况的描述反映了苏联在解决问题时是通过指令自上而下地进行的，同时也反映了苏联无视其决定所涉及的参与者，即中国方面。

从费德林的报告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未曾提及的由高级官员组成的小组的内部工作和活动情况，这些人被称为苏联高级顾问。他们首先讨论了如何改进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工作质量，以及如何同中国各个部门的领导建立起更为密切更为事务性的关系。他们接着把注意力集中在他

① 他是个工程师和机械工，并从 1924 岁开始就成为一名党员。他在 1928 岁时成为乌克兰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克里沃伊县党的第一书记。

② 在 1952 年 10 月 10 日在莫斯科采访阿尔希波夫时，我问他在中国时，他在哪个政府部门，他答道：“我不为任何人工作。”后来他解释说，他是斯大林的私人使者。

③ 费德林早期担任阿尔希波夫的翻译。1951 年以后，他深感痛惜地说：“苏中两国关系的发展在专家们毫无觉察的过程中结束了，这些中国问题专家是一批了解中国历史和现状以及中国人民精神生活的人。”见《斯大林与毛泽东》载《近现代史》1989 年第 1 卷，第 100 页。

④ 1954 年第一季度苏联专家顾问在华的工作情况，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全宗 156 目录 156 卷宗 156 号案宗 156 号（1954 年 1 月）员 100 页。

们认为的中国的紧迫问题上。讨论内容涉及苏联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角色和作用,发展一些工业部门,特别是铜和焦炭生产的可能性,以及发电站的建造。这些高级顾问们还讨论了许多他们认为是中国薄弱环节的有待于解决的问题,例如,在项目计划方面,在地质勘探方面,而这些方面在许多地方被指责是妨碍了建设。他们在这些领域制定了目标,中国在城市规划上也进行了努力,其目的在于促进他们计划的未来项目的工作。在其他方面,他们还讨论了改进销售工业产品的方法,以及创造一项铁路运输发展和水路运输发展为一体的计划的途径和方法。

报告中还说,高级顾问们听取了曾经到新疆调查畜牧业问题的苏联专家对情况的说明。此外,他们还听取了一个苏联能源专家在华工作情况的详细汇报。该报告中包括许多苏联专家在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他们的批评。之后,高级顾问们提出了一些旨在改进工作的建议。

苏联高级顾问是如何就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决定同中国同志进行交流的呢?如果说中央的报告是可信的话,那么所有这些决定都是由高层的苏联顾问作出的,很少有中国人参与其讨论,其中未提起任何一个中国人。报告简要说明,在讨论了中国的诸多问题之后,苏联高级顾问们就此提出了建议,并马上通知了中国有关部门的领导人。苏联人立即把自己以为是中国的最紧迫的问题的建议通知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领导。费德林在报告中说,高级顾问们以为这将有助于其建议以较快的速度得以实施。这个报告还列举了一个“成功”的例子,从苏联人的立场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这个例子说的是在苏联顾问的建议下,中国方面迅速采取了行动。这个小组的苏联人显然在早些时候就指出中国在劳动力方面需要进行改革。呈送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说到,苏联在 1953 年 1 月,在苏联方面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命令劳动部、中华全国商业协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劳动力问题上进行合作。据该报告说,中国政府迅速指示各部门要加强工人的劳动纪律,建立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和保护劳动者的法律,以此来改进劳动法,以便消除现有的工资制度中的混乱现象,特别是取消最重要的部门和行业的工资等级制。苏联顾问注意到,中国的劳动标准在迅速提高,其速度比苏联还要快,因此也建议中国对此予以修正。

中国生活和工作非常方便,摆脱了官僚主义,也能迅速对各种询问予以答复。毫无疑问,大多数苏联顾问在其所在的工作领域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说中苏联盟初期中国的宣传是可信的话,那么这就是个例子。许多在中国工作过的顾问都说,苏联顾问的工作态度十分认真,他们努力回答各种疑问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不过,那些被派到“秘密”或“保密”部门——如核电开发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却是不幸的。他们遇到了许多困难和不安。瓦连年呈送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几位以教师和教育家身份被派到中国的人从未被告知哪些东西可以透露和哪些东西不该透露。报告说,由于害怕承担泄露机密的责任,他们“决计保持被动,或者只说中国早已从报纸甚至从苏联报道中了解到的东西”^①。

新近开放了的苏共档案的确使我们了解到曾将众多的苏联人派到中国工作的这一计划的规模。根据瓦连年上报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在该年第一个季度,已在中国的源猿个人在以下各部委和行政机关里工作:燃料工业部 源人;重工业部 源人;建设工业部 猿人;第一机械工业部 圆人;第二机械工业部 猿人;地质部 怨人;轻工业部 远人;纺织工业部 圆人;农业部 缘人;水利部 源人;木材工业部 源人;铁道部 猿人;交通部 远人;民航局(翻译) 源人;国家计委 愿人;政法委员会 员人;财政部 员人;贸易部 远人;全国合作总社 圆人;人民银行 圆人;卫生部 猿人;高教部 员猿人;教育部 猿人;中共中央委员会 圆人;文化部 猿人;外交部 员人;“鞑靼”西班牙语教师 圆人;体委 员人。

在这源猿人当中,有猿愿人在北京工作,源猿人在哈尔滨,愿人在沈阳,苑人在鞍山,猿人在大连,源人在天津,猿人在上海,怨人在华南地区,愿人在乌鲁木齐。从大体上看,约有源猿的苏联顾问在工业和交通运输部门工作;猿猿的人在教育部门工作,愿猿的人被安排在政府和党的各机构。这些苏联顾问对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奇怪的是,苏共中央档案中关于他们的记载非常之少。毕竟是苏共中央在负责这个计划。或许这方面的资料保存在其他尚未解密的私人档案中,但这方面资料的缺乏使

① 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全宗缘目录,源猿卷宗,愿圆案宗,源(瓦连年,源,源月),源页。

我们难以全面地了解这一计划。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是怎样从工作部门被挑选出来的，他们对去中国都作了些什么准备，他们为什么要去，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人的，有着兄弟般友谊的两国公民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我采访了近 100 位原苏联顾问，并试图从中找到答案。这些人来自不同的行业，其中有生态学家、工程师、外交官、播音员、造船工人、学者、党的干部，据一位受访者说，他带着 10 岁的儿子和妻子到哈尔滨去工作，但上级不允许他带女儿，因为只允许上小学的子女随行。

苏联女顾问人数只占总数的一小部分，不过有许多夫人还是随同其丈夫一起到了中国。只有极个别夫人在中国逗留期间也工作。一位顾问的夫人在苏联驻沈阳领事馆工作，开始她是个图书管理员，后来变成了一个行政官员。这位顾问解释说，他的夫人之所以找到了一份工作，因为她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大多数夫人都不是党员，因此也就不工作。他说：“当时的情况是这样：一个人是否长着个脑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不是一个党员。”几乎所有人所说的话都表明，苏共在 1950 年代决定派谁去中国工作的问题上负有完全责任，选择顾问的首要标准是他是不是党员。这在当时是谋取一份国外工作的主要条件。时至今日，我所采访过的顾问们都感到拥有党籍是最重要的资格。首先，他们认为党员总是可以信赖的。其次，如一位顾问所说的：“对党员的要求要比对非党员的要求更加严格。”另外一位顾问解释说，拥有党籍很重要，因为这在工作中给党员提供了两个渠道。这就是说，他们不仅可以与技术上的同行进行联络，而且还可以与共产党干部取得联系。

大多数顾问是在工作岗位上被调走的。如果一个人在与军事有关的部门工作，那么，他要被传唤到苏共中央委员会进行谈话。这是个特殊的时刻，大多数有此经历的人甚至在 1990 年以后的今天回忆起此事时还记忆犹新。一位空军工程师还记得 1950 年 10 月他被传唤到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情景。那里的人告诉他，将派他到苏联正在帮助中国重建的沈阳的一个兵工厂。他说，他们没有给他一个拒绝这份工作的机会。

一个曾在 1950 年代在《真理报》担任局领导职务达 10 年之久的人说，这个过程开始阶段是填写一些表格，然后政府对每个人的背景及其家庭

和亲属情况进行认真调查。当一个人通过了这一关后,他才有可能被召到中央委员会去进行谈话,然后分配工作。另外一个人记得,当时党组织通知在寻找一个有丰富经验和正确立场的人,这个人必须是个党员,最重要的是,他在外国不能有任何亲戚。他感觉受到的是最后通牒。但是既然党提出了要求,他们也就接受了。

虽然许多人都说是迫于共产党的压力才接受了在中国的工作,但几乎有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对此感到过后悔。原因之一在于共产党对他们在华工作这段时间给予了补偿。有些人说他们所得到的补偿至少是其平常工资的五倍。对在华工作两年时间的补偿的费用有一部分就存放在莫斯科。一位接受采访的人说,在他们看来,在中国工作是件极好的事情,因为战前和战后时期俄国的商品奇缺。他们到中国后发现专门用票券购物的商店。克里沃祖勃说,他挣了一大笔钱,给女儿回国后的生活留下了相当大的一笔钱。

为去中国作准备

尽管共产党在选派顾问的问题上倾注了大量的注意力和精力,但是大多数被挑选出来的顾问对中国的情况还是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没有人发给他们一些关于中国形势的材料,而他们自己对中国的历史、政治甚至革命几乎是一无所知,也没有人要求他们到中国后学一些最基本的汉语知识。

少数几个人自己找了一些资料。克里沃祖勃是个学者,去中国以前读过毛泽东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但是大多数人则是对即将面临的事情毫无准备。曾在沈阳一个兵工厂工作过的朱达可夫对中国人的印象是典型的俄国式反应。他记得,他觉得所有的人都很肮脏。他说:“他们连洗澡堂是什么都不知道。”他记得到附近一个农村,那里每个家庭“大约有八个孩子”,孩子们都是赤身裸体,流着鼻涕,看上去肮脏不堪。他夫人在看到这种情景后决心下次再来时给他们带一些肥皂。她这么做了,那些孩子当面接过肥皂吃了起来。“他们不知道肥皂为何物,”他一面说着,一面摇摇头。

另外一个人到过满洲的农村，他对那里的村民形容了一番：“开始我看他们长得都一样，很脏。我想我对那里的第一个印象很不好。他们很穷，都在一个锅里吃饭。”

就连被派到中国教育部门去工作的人们也是毫无准备。1956年 9月一份呈送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及了此事，并建议让以后要到中国去的教师了解一些关于中国的情况，比如中国怎样，那里的工作条件如何。该报告说，马上要到中国去的教师甚至都没看过刚从那里返回苏联的专家写的在华工作总结。^①

苏联顾问的无知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两国人民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两国关系破裂的最初阶段开始表面化，其时苏联决定减少在华工作顾问的数量。1956年 9月 20日，苏联方面有关人士同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进行了一次会谈，向他递交一封苏共中央决定减少苏联在华专家人数的信。邓在会谈中提到造成一些问题的原因在于苏联顾问对中国的情况和中共政治特殊性缺乏了解和认识。他说，还留在中国的顾问（大多数已撤走）如果能够了解情况的话，这将有助于他们“避免出现错误，更加正确地执行他们的任务”。^②

谁 在 负 责？

如果说苏共把最好的专家派到了中国并对其进行了仔细审查，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就像控制苏联社会那样，苏共善于自上而下地发布命令，而不愿意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就中国情况而言，那些顾问是经过认真筛选的，但他们到了中国以后，便无人对他们进行监督。大多数顾问都觉得他们在中国是独立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顾问发现工作单位的组织状况不好。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都各不相同，但大多数人都在汇报中讲他们仅仅是依照经验行事。许多人对其拥有的独立性和缺乏监督感到满意。有个人在报告中说，他喜欢在中国工作，因为在这里他可

① 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全宗 缘目录 源 卷宗 源 案宗 源（1956年 源 9月），页 。

② 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全宗 缘目录 源 案宗 源（1956年 9月 20日），页 。

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有一种自尊和被需要的感觉,他觉得所做的工作很有价值。

这个问题的消极的一面是对工作质量的控制。那些顾问没有受到严格的监督,莫斯科也没有一个专门组织来强迫国内企业或国家部委与他们进行合作。

缺乏支持和监督很成问题,有时颇令人难堪。1952年11月,共青团组织中央委员会书记谢列平就一个曾到过中国的青年代表团问题给苏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详细讲述了他在中国时见到的几个苏联顾问的情况。他写道,许多人仅仅是在履行自己技术方面的义务,并不关心与其共同工作的中国人的教育问题。他说,一些顾问对自己的专业领域的情况了解甚少,这简直是个耻辱。例如,他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一个正在中国黑色冶金部工作的苏联顾问,这个顾问对苏联的主要的工作方法几乎一无所知,对中国冶金行业的情况更是知之甚少,他感到莫大的耻辱。他在报告中还说,在上海造船厂工作的苏联顾问反映难以从国内本单位搞到所需的零部件和设备。他们告诉他说,收到的设备又缺少必需的零件和技术说明书。他们说最后一批发自列宁格勒本单位的货物中还包括不必要的螺栓,甚至还有垃圾。他们抱怨说即便在他们向国内提出疑问后,也从来没接到过答复。^①

我们生活在舒适的俄式房子里

尽管表面上高唱友谊加兄弟的高调,但实际上苏联和中国都不鼓励促进两国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大多数接受采访的人都认为在实际工作中的关系是真诚的。顾问们都谈到他们对中国人的工作感到满意。一个接受采访的人说,他以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特征就是:工作就是设定目标并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许多人都喜欢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工厂或工地,所有的中国人,不管是工人,还是厂长,或者是总工程师,都身着同样的服装:棉

^① 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全宗 缘目录 卷宗 缘案宗 猿猿(猿猿年 猿月 猿日),猿猿-猿猿页。

制服、棉帽子和棉鞋。没有人穿西装，打领带。就个人而言，大多数苏联顾问都觉得在中国工作时中苏之间是存在着友谊的。不过他们都认为这种友谊是有限的，无法变成个人之间的友谊。格拉兹林曾为一组寻找铀的地质学家担任过翻译，他说，即使在两国友谊的鼎盛时期，中国在表面上是非常友好的，但实际上同时也保持着警惕。“我们都一样，他们是共产党，我们也是。在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这里有一个说法，捷克人、斯拉夫人、波兰人，我们一起出去，这很正常。但是在中国，从不这样，实际上恰恰相反，有一种陌生的感觉，我们之间仿佛有一堵墙，尽管是透明的，但还是看不透……”

人与人的交往也很有限。例如，所有的苏联专家无论在哪里都是同住同吃在一起。有些人认为这样做从安全的角度讲更容易控制些，另外有些人认为真正的原因是限制他们和中国人之间的交往。

有些顾问常常抱怨，如果和一个中国公民保持密切关系的话，就会引起麻烦。大多数人都觉得这是中共的错误。一位顾问说：“中国人待我们很诚实，但是在那些固定的人群里总有党的干部，他们满脸微笑，但目光却令人不寒而栗。他们控制着一切，限制着一切。记得我对一个中国姑娘很友好，我并没干什么事，甚至都没拥抱过她，我们只是偶尔调调情，结果呢，他们（中共代表）狠狠地批评了她，把她训得直哭。”另外一位顾问回忆起“那里的一个勇敢的捷克妇女”，她很喜欢一个中国男子，而这个男人最终陷入了来自捷克和中国官员两方面的麻烦。所有的顾问都说在中国期间受到过跟踪。一个人说：“毛发布命令，即使你上厕所，卫兵也必须跟着站在旁边。”此人记得苏联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单独行动。跟踪他们是强制性的。他记得有一次离开房间后不久又意识到忘了点什么东西。他返回房间时看到一个人正在翻他的箱子，他假装没看见便离去了。当问道他为何要装假时，他答道：“因为我知道他在干自己的工作，我肯定他是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再说，在我们国家，这种事也是时有发生。”他接着说：“我们在中国就像被关在监狱里，一个被高墙环绕的监狱。他们不让我在未加监督的情况下到别的地方，也不许我们干任何事，就是这样。”

一个曾在中国工作过的记者回忆说，所有的苏联人都被跟踪过，甚至是在公开地。中国人要他们提前以书面形式提出自己的问题。他刚到北京后不久，一个中国同志告诉他，苏联人必须每周就每个记者的情况写一封信。苏联人正在做什么，提了些什么样的问题，见了些什么人等，都要记录在案。

一个专门报道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记者在北京附近的一家工厂经历了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他正在同厂长谈事，“话题完全局限于新闻兴趣，没有别的意思”。突然，陪同他一起到工厂来的中国同志伸手夺过他手里的笔记本，撕成碎片，大声喊道：“不许问这个问题，也不许你报道这件事。”他说所有在场的苏联人都感到难堪，不知该怎么办。他们都假装没有发生过这件事，那个记者没再提任何问题。

并非所有的苏联顾问都认为被监视是件坏事。一个曾在哈尔滨工作的人说，有人陪着绝对是需要。陪同的“向导”给他们带路，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大多数苏联人需要向导的帮助，因为他们不懂汉语。

中国变了

关于中苏决裂的原因，众说纷纭。许多当时在中国工作的俄国人都将此归咎于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会上的所谓秘密报告，当时他谴责了斯大林。一个曾在北京外语出版社工作、后来身居要位的苏共党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和朱德坐在一起。听完赫鲁晓夫的发言后，他问朱德有何想法，他清楚：“在未同毛泽东交换意见之前，朱德当然是不会发表看法的。不过朱德说：‘你知道，斯大林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因此他是属于所有的共产党的。你们没有同我们商量就对他进行批评。’”

有一位顾问，~~苏联人~~ 1954年时正在北京。他记得中国对此的反应是强烈的反对。他说，当时毛的威望已经很高，好似“一个翻版，只不过是中國对苏联斯大林崇拜的翻版……”对斯大林的谴责是公开而声势浩大的，这使得中国感到不安，原因在于他们怎么能对斯大林的崇拜进行批评而同时继续树立毛的威望呢？他说，那时，“中国信仰共产主义，盲目地信仰毛泽东，盲目地相信他是个神，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活生生的神。有一次在天安门举

缘年代后期在中国工作的苏联顾问更加感觉到两国关系的日益疏远。一位顾问记得当他们小组于 1956 年 12 月抵达中国时，中国人在周围拍打着他们乘坐的火车，高声喊道：“哈哈，苏联专家来帮助我们了。”起初这种友谊看上去是真诚的，因为中国人很留意苏联的节假日，甚至苏联专家的生日。但在以后的一年里，两国关系变得非常紧张，他们的邮件常被拆开。一年后的 1957 年 12 月，这个小组的专家离开了中国，其时两国间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紧张的顶峰，以至于中国人都不愿开车把苏联专家送到火车站，是捷克专家们开车把他们送走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苏联顾问都认为是外国的政治事件削弱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有些人认为，苏联和中国两国人民之间从来就不曾有过真正的友谊，中国人一直都是内向的。一位顾问说，中国人永远不可能是任何人的真正的朋友，根深蒂固的原因在于“他们看不起汉人以外的人”。他还举例说明，中国人对苏联人所给的帮助从不领情。他说苏联人到中国建立了一个水果、蔬菜和鱼肉罐头加工厂，他们教给中国同志上千种制作方法，中国人学会以后开始添加其他配料，生产出来的产品明显地要优于苏联人生产的产品。可是当苏联方面向他们索取改进后的配方时，却遭到了中国方面的拒绝。

大多数 1957 年以后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顾问都指责是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干扰并打断了他们的工作，破坏了两国的关系。那个年代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使得许多苏联顾问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令人不快的延误和耽搁。

一位顾问曾在一个科学院工作，对此深有感触，大为恼火，因为中国人总是在晚饭以后开长会，不许他参加。他知道主持会议的官员正在“做中国同事的说服工作”。他听说一个领导在许多场合当众自我痛斥，说做错了事，是“半个资本家”，向组织索取得太多，等等。他还发现他在华工作期间，有关一切问题，包括非常细小问题的决定，如学校开学的时间，都被看作具有政治意义，只能由党委会来决定。行政官员和教师不得不听任共产党为他们讨论并决定一切。如此耽误时间，有时使他们连续数日都上不了班。

结 论

从概念上讲,苏联的援华顾问计划确实宏伟庞大,因为它计划要在短短的几年里完全彻底地重建一个社会。整个工作最后没有完成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它最终要受制于两国领导人之间长期存在的不信任,受制于两国在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中所出现的问题以及实施中所遇到的困难。

新近公开了的苏共中央档案使我们能够了解苏共是如何看待中苏关系的。很显然,一直到斯大林逝世以后,中国对苏共来说才成为最重要的伙伴,也是从这时起苏联顾问计划才全面展开。档案还揭示了控制着顾问计划的苏共中央如同管理苏联社会那样对其在华人员进行着管理。苏联自上而下地发布命令,在事关中国自己国家的发展问题的重大决策上不让中国参与,过于注重安全问题,对大多数苏联顾问所工作的最基本的情况毫不了解,等等,都可在此找到原因。

这些倾向像主旋律一样贯穿在两国关系中。在两国友好关系的开始阶段,有些问题被忽略了,或者是没有注意到,但几年以后,这些问题有时成为烦恼和障碍的焦点。有些事明显地反映了苏联的决策者们毫不了解中国的情况,这说明这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方法是有问题的。同样,苏联在就中国问题作出重大决定时也同中国方面进行商量。

苏联喜欢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这也引起了一些问题,因为顾问们总担心泄露国家机密,因而无法有效地同中国同志进行交流。此外,苏共中央毫不重视苏联顾问在华的工作情况,这也引起了许多令人尴尬的问题。苏共中央似乎没有意识到,苏联顾问和技术人员对中国而言就意味着中苏友谊,而这些人所在的国内单位的情况及对中国的兴趣都受到中国方面的密切关注。

现在,俄国人愿意并且能够自由地谈论过去的生活,这为苏联和俄国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来源。曾经在中国做过顾问、技术人员和专家的苏联人的观点进一步丰富了苏共对那个年代历史的官方记载。从那些顾问那里,我们了解到苏共对其在华工作人员的那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方法增加了两国关系中的难点。拥有党籍是去中国的最为重要的条件,所有的顾问都受到了严格的审查,但一旦到了中国,他们就变得随心所欲。一个

人的工作质量取决于他自己的素质，有些人尽心尽力，而有些人则是干得少，享受得多。

顾问们都认为苏共中央对他们在中国的停留几乎未作任何准备，随着两国关系在 1950 年代后半期开始恶化，这种无知也变得更加令人难堪。苏联方面不鼓励其人员和中国人民保持友好关系，因为中苏间的友谊不同于苏联与其他如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等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友谊。据顾问们说，苏联官方是反对其人员同中国人保持密切关系的。另外，苏联人总是单独地住在专门设有餐厅的大院里，这进一步阻碍了他们在工作以外的时间里和中国人的交往。许多人记得，一些希望和中国人友好交朋友的苏联顾问遇到了不愉快的事情。所有的顾问都说被中国安全部门人员跟踪过，这也限制了自由交往。

1953 年赫鲁晓夫作过谴责斯大林的发言之后，早已潜伏在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开始变得表面化。苏联官方档案明确表明苏共中央在快速有效处理这些问题时显得准备不足。甚至在苏联驻华使馆人员写信公开指出一些困难时，国内所给予的答复仍然是迟缓拖拉，不切实际。

苏联顾问、技术人员以及专家在中苏联盟的最低层，然而他们从来不能参与影响着他们的一切决策，也难以改变自己的工作条件。也许他们是在两国友谊成功的背景下被共产党选派到中国去的，因此，他们都坚信党最了解情况，因而就连最聪明的人当然也不会对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任何怀疑。

几乎每一个 1950 年代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人都对中国人民表示同情，感到在华工作这段时间是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许多人认为中国和俄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某种友谊，但是这种友谊被限制在最低水平，最终也未受到重视。虽然在华工作的苏联人多达一万人，但是这种友谊也没能因其良好的意愿而长存下来。从根本上来讲，中苏友谊，如同苏联社会一样，无意中成了苏共中央错误的管理方法的牺牲品。

(本文系作者提交 1985 年 1 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张丽华译，沈志华校。)

中苏经济合作的瓦解 (1950-1960)

——从文化心理角度所作的解释

美国马里兰大学 张曙光

中

苏论争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 ,而在 60 年代初才公之于众。除了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因素外 ,文化方面的因素也值得认真注意。这对于理解中苏联盟的分裂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他们的苏联同志 ? 中苏经济合作的衰落 ,在造成联盟的紧张关系中 ,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 ?

在论及这些问题时 ,多数学者是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来研究的。一些学者认为 ,联盟破裂的原因是中国不满意苏联的援助。苏联给予中国的技术转让和贷款相对地较小 ,因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相对不大。较之苏联给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规模的援助 ,这种有限的苏联援助 ,被疑为因此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不满和愤怒 ,形成了使联盟关系紧张的潜在原因。另一些学者恰恰持相反的观点。不是中国人的不满 ,而是苏联对于在这种关系上所承担的经济负担感到愤怒 ,使联盟关系趋于紧张。持这种主张的人提到这一事实 ,即中苏经济关系对苏联基本上是无利的。苏联方面日益增长的一种忧虑认为 ,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以苏联经济增长的缓慢为代价的 ,因为 ,对“中国的贸易意味着将消费的增长强迫转移到他们 (苏联)不可

能再生的资源的消耗方面”^①。

虽看似有其可信之处，但两种争议仅提供了部分解释。只考虑纯经济利益方面的计算当然是重要的，然而许多与文化心理相关的因素或许更重要，包括信仰、形象、感觉、态度和期望。毕竟，国际联盟关系的保持和增强，不仅是以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为前提，也始终在人民，尤其是在领袖的头脑和心里得以增强。利益和感情常常不可避免地互相影响。中苏联盟的经历也不例外。

(一)

由于感觉到外部对其政权的威胁，中国共产党领袖把东亚看成是一个冷战对抗的焦点，因而坚信需要与苏联联盟。而且，中国人需要以（与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居领导地位并有威慑力的力量）结盟的形式来平衡所受到的威胁。^②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外交政策观点特别值得研究。毛相当懂得政治力量的平衡。以他的看法，战后的国际政治陷入了全面、长期的两个“阵营”——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集团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1949年10月建立起共产主义国家政权后，毛认为美国是其主要的威胁。这种看法主要由于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对政策。华盛顿在（1949-1950）中国的内战中，公开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尽管早在1949年以前，其直接的调停努力已告失败，但面对蒋政权不可挽回的崩溃，美国仍然觉得难以接受而又无可奈何。毛认为，华盛顿对中共的长期敌对，是想置中国于它的控制和影响之下。对于美国会以何种手段达到这一目的，毛在1950年10月说了三种可能性：“第一，他们可能派遣偷渡特务来制造冲突和捣乱；第二，他们可能煽动中国的反动派，甚至动用自己的

^① 亚历山大·埃克斯坦：《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外贸政策的含义》，1952-1953年，纽约，1953年。

^② 斯蒂芬·瓦尔特：《联盟的起源》第15章，纽约，1985年；罗伯特·杰维斯和杰克·斯奈德：《多米诺和货车队：欧亚间的策略信仰和强大竞争》前言，纽约，1985年。

武装来封锁中国的港口 ;第三 ,如果他们想要冒险 ,他们将派一些武装部队侵入和骚扰中国边防前线。”所有这些 ,毛断言 ,“不是不可能的”。^①

毛对美国威胁的分析 ,使他和他的同事相信 ,“倚靠”苏联一方是对中国安全的基本保障。在 1945年 12月 13日 ,中共政治局会议分析战后国际形势时 ,毛即指出“存在着 (另一场世界)战争的危險”。因此 ,他主张“我们应当努力利用全世界人民的力量来阻止战争的发生” ,对此 ,苏联应得到优先考虑。这是因为“苏联领导的世界民主力量已超过了 (美国和英国)反动派的力量 ,并将继续增长”。如果和平能维持 1945到 1949年 ,毛设想 ,世界大战就可能“永远打不起来了” ,因为“如果苏联和东欧国家能保持和平 ,集中精力搞 1945到 1949年 (经济)建设 ,苏联的钢产量将提高到年产 1800万吨。到那时 ,没人能超过它”。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过去 4年了 ,“我们应当和苏联集团的其他国家一样 ,抓紧剩余的 1949年这一段可能的和平时间”。^②

毛确实很快就说服斯大林与毛政权结盟了。夺取蒋政权的首都南京后 ,全国的胜利有了保证 ,1949年 12月 ,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几个外交步骤 :中共副主席刘少奇于 12月秘密访问了莫斯科 ;毛于 12月公开宣称向苏联“一边倒” ;1949年 12月 ,主席本人亲访莫斯科。就中苏关系进行了全面认真的谈判 ,毛打算与斯大林讨论“所有我们中央委员会关心的 (未决)问题” ,至少“把我们的意思 (对苏联)表达清楚”。但是 ,毛首先考虑的是签订友好条约 ,其中“基本精神……应该是阻止日本及其盟国 (美国)侵略中国” ,“使我们能以此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来对付全世界的帝国主义”。^③ 毛在莫斯科达

① 毛泽东 :《在新政协会议预备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选集》第 2卷 ,1953页 ,北京 ,1953年。

② 毛泽东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1945年 12月 13日 ,载《党的文献》1983(12) 14-15页。

③ 毛泽东致中央委员会的电报 ,1949年 12月 13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册 ,1983页。

到了这一目的。^①于是，毛在 1950年 9月 声明：“自人民政府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成绩之一就是签订了友好条约……（因为）世界上仍然有帝国主义存在，我们因此而需要朋友和盟国……现在这个条约确定了苏联与我们的联盟关系，如果国家准备侵略我国，我们就有一个好帮手了。”^②

这并不是说，毛可以容忍中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相反，他希望莫斯科对北京以平等伙伴相待。追求平等、国家统一和主权支配着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这或许比对付外部的威胁更重要。这种倾向，在反对外国影响的民族斗争中自然而然明显地表现出来。1840-1860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西方国家对近代中国侵略的开始。从那时起，一种主要的推动力就是寻找一条不受西方欺压的生存之路。这就使中国陷入了一场异常艰苦的反对自卑、抵制洋货和“民族屈辱”的斗争。那些“洋鬼子”、外国战舰、不平等条约，以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志，深深地播下了不信任和仇恨外国人的种子，形成了对帝国主义造成的民族苦难和耻辱的永久记忆。同时，求生存的斗争也创造出新的理念，如“自力更生”和“在斗争中学会斗争”，“以暴力反抗暴力”，“组成联合战线反对外国侵略”。要求“民族自由”再建独立主权的中国、恢复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力量成为多数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

在中国人这种渴望“一个新中国”的焦虑中，毛领导的革命诞生和发展起来。通观他的政治生涯，毛的主要目标是要把中国社会从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他和他的同事们认定，新中国应该恢复它在国际间应有的地位。为了避免执行外交路线时出现错误，早在 1950年 8月 15日，中共已就外交工作作出了专门指示，规定“我们必须首先坚持民族主义原则”。这

^① 谈判开始时，俄国人不愿答复中国人的所有要求。周的一大难点是要苏联同意，当中国受到侵略时援助中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一稿的内容为：如果一方遭到第三方侵略，另一方“可以提供援助”。周不满意，他努力要一个清楚的条款：“可以”改为“必须尽全力”。这使周和助手们花了很多功夫才得到。中国人为此感到高兴，该条款为“如果一方受到第三方的攻击，另一方必须尽全力提供军事和其他的援助”。见伍修权：《在外交部的八年：1950年 1月～1957年 12月》，187页，北京，1993。

^②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 9月 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册，185页。

进一步解释为：

在中国几百年的外交关系史上，存在着两次错误理解的民族主义。一次是出现在义和团运动之前，排外情绪高涨。另一次是出现在此之后，对洋枪洋炮的普遍恐惧心理。从五四运动到北伐，这种恐外情绪已被高涨的民族主义精神压倒了。

指示指出，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为了避免这两种错误，一方面，我们应该树立起民族自尊精神，欢迎外国人到中国来；另一方面，我们应当知道怎样处理与他们的关系，以便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又不恐惧和抵制他们。这才是正确的民族主义。”^①正是这种思想倾向，为中国共产党对待苏联的政治经济关系中的态度和政策加了脚注。然而，这同时又使中共领导人陷于自相矛盾之中：政治独立要求中国在经济上不依靠苏联，而中国沉重的经济问题又迫使新政权尽可能地寻找外部援助。在处理与苏联的联盟关系时，怎样把握好既获得苏联的经济援助，又避免完全依靠苏联，这对中共领导人确实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除了安全问题外，经济建设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其政权建立初期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共产党面临几个明显的困难。经历了几十年国内国际的战争之后，国家的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据中共的粗略估计，1949年中国的工业产量仅为全国最高水平的1/10，轻工业和农业还不到1/10。运输系统几近瘫痪，数千多英里的铁路线残缺不全，数千座铁路桥梁和隧道被严重破坏，不到1000英里的公路几乎不能用，航空和水路运输能力降到零点。^②中共更为担心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封锁会进一步损害国家的经济。中国持亲苏联的姿态，是因为毛早就预料到，美国可能“用他的武力来封锁中国的港口”。作为主管经济建设的高级领导人陈云曾认为，几乎不可能从帝国主义国家得到援助或保持贸易关系，因为美国会施

^① 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第100-101页。

^② 《当代中国基本建设》第1卷，第100-101页，北京，1983。

压,不准与中国(共产党)做生意。^①中共也缺少经济方面的经验和人才。为使党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毛在 1950年 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说,全党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学会管理工业和商业”。通过教育、“宣传”和“(指导)文章”,毛强调,“这个任务必须完成”。^②

然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毛和他的同事相信,新政权不惧怕这些困难。毛推论,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其经济恢复不必完全依靠外援和对外贸易。“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构成了国家经济总产量的 20% 而现代(工业)经济还不到全国总产量的 10%”。他断言,“自力更生”是中共取得经济建设成功的关键。^③毛于是作出决定,“两个基本政策”是引导恢复经济建设,进行国内建设和对外贸易的原则。^④毛的助手周恩来也明确表示,“我们需要的大部分物资(在经济建设中)可以自己解决,一部分可以从朋友那里解决”,因此,大可不必惊慌失措。^⑤

中国共产党断言,美国搞的经济封锁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这不仅引起了中国人民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爱国情绪,也能使中国得到广泛的同情,还可以给中共有足够的时间在国内制约亲西方的因素。“让他们封锁我们吧!让他们封锁我们八年十年吧!”毛在 1950年这样说,“到那时,中国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经过了最后三年(内战)严酷的考验,取得了胜利,难道就不能战胜今天这些困难了吗?离了美国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吗?”^⑥于是,毛决定“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周恩来详细地解释了这一政策,“先把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在中国)清除一下,否则会

① 毛泽东：《在新政协会议预备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237 页；陈云：《克服严重的财政和经济困难》，《陈云文选》，第 1 卷，北京，1995 年。

②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0 年 12 月 18 日，载《党的文献》1993 年第 5 期，第 5 页。

③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关于人民民主监督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3 卷，北京，1960 年，第 1300 页。

④ 《毛泽东选集》（北京，1960 年），第 1300 页。

⑤ 周恩来：《当前的财政和经济状况和新中国经济的不同关系》，1950 年 12 月 15 日，载《周恩来文选》第 3 卷，第 157 页。

⑥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300 页。

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①。因此,为避免纠缠于过去耻辱的外交惯例,中共于 1949 年 1 月就外交事务作出规定,“我们必须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维护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这种态度是不能妥协的”。这一指示详细规定:我们不承认任何以前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和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和其他外交代理机构……不承认任何外国的投资、经济特权、工业和供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家个人享乐的商业企业。但是,对这一点,我们将不作出禁止、恢复或没收的表示。我们将作出一项决定,禁止外国进行有损害我国主权的投资,如内河航运方面。我们不会停止外国银行的业务,但规定他们必须向我们报告其资金、账目和日常业务,并要得到我们的批准,对保险公司也是同样,特别是海运保险公司……我们将不急于建立和恢复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正常贸易,像签署贸易协定之类。我们只与某些生产我们必需物资的国家作暂时的、个别的、经济上有利的进出口贸易。^②

毛坚持,这并不意味中国将对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外国政府采取“封闭”政策。他认为,苏联绝不会驳回另一个共产党国家对经济援助的要求,而且会平等对待中共政权。“苏联和其他民主力量是反对反动力量的”,更重要的是,“苏联的政策是不干涉别国内政”,毛在 1949 年 1 月向政治局这样解释。^③毛高度寄希望于此,期望苏联的援助能解决国家的经济困难;同时,他明确地警惕苏联想控制中国的可能。最后他是以复杂的感情承受着与苏联在几个重要经济领域的合作。

中国共产党迅速与苏联建立了贸易关系。早在 1949 年 1 月,中共东北局与苏联当局在大连就以粮食换衣服、药品和其他日用品来稳定当地市场。这些最初的努力没能说服苏联同意进行除衣服以外的贸易。然而,到 1949 年底,零散的小规模的贸易开始了。^④ 1950 年初,经过多达 15 轮的

① 周恩来:《我们外交的任务和原则》,《周恩来文选》第 1 卷,1953 年,107 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卷,1953 年,107 页。

③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9 年 1 月 1 日,载《党的文献》1982 年第 1 期,107 页。

④ 中共东北局关于东北财经任务的报告:《东北贸易公司的财政经济任务》,1949 年,辽宁省档案馆,资料编号 100 号,107 页。

谈判之后，中国人促使苏联进行了更多的贸易。^① 当年夏天，中共中央领导明确地要求增加对苏贸易。同年 7 月，刘少奇向苏联提出，中共愿意“促进（对外）贸易关系，尤其是与苏联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但是须在平等和互利的前提下”^②。斯大林对此似乎是理解和支持的。他建议采取易货贸易这种比资本主义世界的现金方式“更适合”的方式，并向刘承诺，将补偿中国在以低价农作物换取高价机械制品时的损失。^③

受斯大林积极态度的鼓舞，毛赞成了 1950 年 1 月 15 日中央委员会关于外交政策的决定，即明确表明优先发展对苏贸易。决定说：“我们对外贸易政策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将与苏联和其他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进行进出口贸易，只要他们的需要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或者是他们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只有在苏联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不做的情况下，我们才与资本主义国家做一些贸易。”^④ 在一项同时发给北方局、天津和北平市委的指示中，中央委员会指出，“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国家经济……我们将立即开展新中国的对外贸易”。指示要立即建立外贸局，以便管理所有的对外贸易，“以符合我们的需要和能力”。如果有可能和必要时，该局将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派出代表和设立商务处。并负责决定：（1）准予进口的物资，以高关税进口的物资和禁止进口的物资；（2）准予出口的物资，以高关税出口的物资和禁止出口的物资；（3）进出口物资的附加关税税率；（4）调整国内产品和贸易单位以符合进出口贸易的特殊需要；（5）使进出口计划与进出口需求和国内经济相符，为节约外汇而调整贸易，决定应与哪个国家建立贸易关系。

新政府还宣布了有关规定程序，规范“国内和外国船只进入港口，停泊，装卸货物，租用港口，通过海关和接受检查，外币兑换，惩治走私、逃税和违法者”。为增加对苏联的出口，中央委员会指示所有的当地政府，要

① 中共东北局关于东北财经任务的报告：与苏联贸易谈判的最终决定，1950 年，辽宁省档案馆，资料 206 卷。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1997 页。

③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1997 页。

④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东北局，1950 年 1 月 15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卷，206 页。

“ (尤其) 注意生产棉花、大豆、煤、盐、花生、烟草、丝绸、猪鬃、毛皮和手工艺品 ”^①。

1953年 9月 30日签订的中苏贸易协定,使两国间的贸易形式正式确定下来。^② 中共的宣传强调,“旧的帝国主义贸易”一去不复返了。新的对外贸易“完全是建立在我们国家经济需要的基础上”,并实行一种“合理的价格体系”,使之成为一种“互利”的贸易。^③ 但是,存在于中共领导人中的不满情绪正在不断增加。中国人抱怨,作为低价商品,大量的中国农产品和原材料仅换回少量的苏联机器和工业物资。更甚的是,所有的易货价格都在签订合同时固定了,不能随世界市场价格浮动。根据 1953年海关的报告,许多苏联货物仅比世界市场略便宜一点。^④ 尽管中共领导人一直提醒苏联官方斯大林所作的许诺,但中国仍然得不到苏联政府应给予的补偿。^⑤

对于经济援助,中共领导本可以向苏联要求更多一些,但他们没有这样做。1953年初,克里姆林宫同意在 5年中以 1%的年息提供 10亿卢布的借款。这是毛原先所期望的。他在 1953年 7月计算着,“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以后几年不要借得太多了”^⑥。毛出身于中国的一个农民家庭,他认为借款就是欠债,而债务迟早都应还的。他也担心大量的苏联贷款会加强莫斯科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影响力。^⑦ 然而紧迫的经济问题,迫使中共必须充分利用苏联的经济援助。北京把贷款集中用于在东北建设能源、机械和国防工业。第一步是计划在 1953年春季开始建设或改造 50个项目 (后改为 55个),包括 10个煤矿、5座电站、10个钢铁企业、10个非金属企业、5

① 中共中央决议:《外贸(政策)》,1953年 9月 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5卷, 520~521页。

② 中国和苏联的贸易协定,1953年 9月 30日,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 1卷,北京,1955。

③ 狄超白:《中苏经济关系的方式和内涵》,《人民日报》1953年 9月 30日。

④ 1953-1954年关于我们和苏联各自港口的贸易报告,摘自孟彦章:《中苏贸易史资料》,52-53页,北京,1955。

⑤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1957页。

⑥ 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53年 7月 3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册, 144页。

⑦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1957页。

个化工厂、苑个机械厂、苑个国防企业和 员家造纸厂。其中多达 猿个项目将建在东北（满洲）。整套的机械、设备、材料和技术都将从苏联以贷款方式买进。^①

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和随后中国的参战，严重地影响了该计划的完成。直到 员缘年夏战争停止时，莫斯科才同意恢复这项援助计划。^② 尤其使中国人失望的是，在战争期间，北京不得不使用大量的苏联贷款来购买武器、弹药和其他中国在朝鲜战争所需的军事装备。中国人民解放军前总参谋长徐向前回忆说，由于苏联没有向朝鲜派出军队，中国领导人认为莫斯科不应该对那些总是延误交货的大量劣质废品要钱。^③ 中国人更为不满的是，苏联红军在 员缘- 员愿年占领东北期间，几乎将所有的重工业机器设备都搬走了，莫斯科应当归还它们，然而苏方不仅不还，反而要中国人为在该地区重建这些被毁坏的工业付钱。中国领导人觉得苏联人对待他们太冷酷无情了。^④

当苏联人坚持要在中国建立 源个合资企业时，中国领导人的民族感情受到了更严重的挑战。 员缘年 猿月，莫斯科同意援助中国的石油和非金属制造工业，但条件是要拥有至少 缘%的所有权，分享至少 缘%的利润和负责全面管理。中国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实力，便只得接受所有的条件。不久之后，两个合资企业就建立起来了——一个是两国间的民航业，另一个是造船业。^⑤ 这些“合资企业”使中国人怀疑苏联人是在乘人之危，谋取利益。这很容易使人想起了沙俄是怎样企图在中国扩大经济影响的，中国人感到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继续实行旧沙俄“帝国主义”的政策。^⑥

这种感觉在朝鲜战争中进一步加强。由于西方加紧了对苏联集团的贸易禁运，莫斯科大量需要稀有金属，如：锡、锌、钨、铋和钼，故而要求中国

① 《当代中国基本建设》，员- 员页。

② 《当代中国基本建设》，员- 员页。

③ 王林生、陈玉杰：《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北京，员愿），怨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缘页；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北京，员愿），第 圆卷，苑苑- 愿页。

④ 《当代中国基本建设》，员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源页。

⑤ 《中苏贸易史资料》，缘- 缘页。

⑥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源页。

运去自己的全部稀有金属。在 1959 年夏末,北京还接受了斯大林的要求,在海南岛建立了橡胶工厂,以帮助苏联集团“粉碎帝国主义对战略原料的封锁”。同时,中共为苏联从斯里兰卡购买了大量的他们急需的橡胶。^①中国人不可理解的是,北京为苏联帮了这么多的大忙,莫斯科却没有一点感谢的表示。

另一个当时盛行的不满情绪是关于苏联专家的。中共领导人最初对苏联专家寄予相当高的期望。它的政权需要有经验的顾问来帮助重建经济和增强军事力量。早在 1958 年 7 月,刘少奇就直接向斯大林提出了苏联向中国派出经济和军事顾问的要求。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大批苏联军事顾问于当年年底来到中国:多达 1000 名的空军专家来训练人民解放军的飞行员,总数为 100 人的海军专家来帮助解放军建立现代化的海军。^②之后不久,一个苏联经济专家先遣小组来华“调查中国对经济援助的需求”。莫斯科同意对华援建 10 个工业项目之后,有 10 个顾问组在 1959 年之中抵达中国。第二年又有 10 个顾问组被派到中国东北。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设计和管理“重建(援建)项目”^③。

中国人本来是非常欢迎苏联专家的帮助的,但是由于苏联同志要求在华享受特殊待遇,他们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伤害和屈辱。作为对刘少奇要求派出苏联专家的回答,斯大林本人坚持:“(苏)(中国)必须保证为所有苏联专家提供全部居住和工作条件,即:必须为他们支付高薪和提供最好的住房和办公室;(苏)在华工作专家们的配偶们(尽管他们选择留在苏联)要由中国政府支付相当的薪水,她们来华探亲时,中方必须负责她们的旅行和居住;(苏)专家在华工作时间的长短,由实际情形和基本需要来决定;(苏)如果苏方人员犯错误或违反(中国的)法规,他们只服从苏联的司法权,中方对在华工作的苏联人无(合法)裁定权。”^④当斯大林在莫斯科会

①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100-101页。

② 陈兼:《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17-18页,纽约,1999。

③ 《当代中国基本建设》,107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107页。

④ 《当代中国基本建设》,107页。

见毛时，他重复了这些规定，并强调，除非中国同意这些规定，否则莫斯科不会派专家去中国。中国以坚定的决心要废除过去曾忍受多年的“帝国主义治外法权”的耻辱，毛几乎不相信斯大林会将这些歧视性条款强加于他的国家。他开始相信，“（尽管是一个外高加索人）斯大林的泛俄罗斯主义甚至比其他俄国人更强。列宁过去对斯大林这种意识的批评证明是绝对正确的”。毛的俄语翻译师哲是这样回忆的。尽管非常痛苦，但是毛没有直接与斯大林对抗，而是保留了反对意见。^①

与莫斯科的联盟关系，毛主要是想让苏联参与保卫中国的安全。对于重振经济，他知道中国不能，或是不应该只依靠苏联的援助。为恢复和重建国家的经济，中共的宣传机构于 1952 年 7 月提出，联合起三种力量是最好的方式：“现存的生产方法，特别是我国广大的劳动力”；第二，“勤劳勇敢的（中国）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不仅能保证供应城市需求，还能提供剩余物资来换回我们需要的其余物资”；第三，“我们能从苏联的优惠贷款中得到新的机器和设备”。^② 这就是中共最大的希望，实际上，北京正试图从莫斯科得到最好的结果。

更有意思的是，这在起初就能注意到，中苏经济合作已经出现强烈的不满情绪和痛苦的表现。这使得指望苏联人能以平等伙伴相待，与中国建立互惠经济关系的中国领导人感到了困惑和失望：一个盲目爱国主义的斯大林并不比沙皇帝主义好多少；苏联人主要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毫不犹豫地乘中国人之危捞一把。尽管非常不满苏联的态度又十分警惕苏联别有用心，然而北京无力要求苏联人改正他们的行为。相反，他们把怀疑、不满和愤怒埋在心里，这些情绪虽缓慢但肯定要爆发的。

① 《当代中国基本建设》1952 年 1 月 1 页。

② 狄超白：《中苏贷款协议的重大意义》，《人民日报》1952 年 7 月 1 日。

(二)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共领导人立即准备改善中苏经济关系。由于东亚地区的国际环境比1949年前更加稳定,北京政权急于加速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提高国防能力。再者,为了最大限度地缩小西方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的影响,中共懂得苏联经济技术援助的重要性。尽管斯大林1953年9月逝世后,似乎使毛和他的同事解脱了长期忍受的精神折磨,中共领导人仍然对苏联隐忍着一些复杂的感情——不安、期望、疑虑和警惕。

由于在朝鲜战争中作出了极大的牺牲,中共认为,中国应从苏联得到更优惠的援助,因为苏联在中国对朝鲜的干预问题上欠了情。的确,中国为其军事干预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多达150个步兵团(占解放军兵力的1/3)、10个炮兵团、10个坦克团、10个飞行团和10个警备师在朝鲜作战,还有成千上万的后勤人员和民工配合作战。这场战争总计有150万作战及非作战人员参加。按中国的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消耗了约150万吨的作战物资,包括10架飞机和1000辆汽车。人民共和国为此用去了超过100亿人民币。^①所有这些人力物力资源本该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的。

尽管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在中国领导人中间出现了一种乐观的情绪。因为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中国能宣告成功地抗击了一个主要的西方强权。中共的宣传媒介提醒中国人民,仅在几十年前,一些组成“八国联军的西方国家”曾经征服中国(1900年的国际干涉),还有100万日本军队曾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日本1937年的侵略)。但在朝鲜“三年激战后”,中国驻朝武装部队司令彭德怀表示:“由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工业国的第一流武器武装的军队被迫(与中国军队)停战,退回原地(他们入侵北朝鲜)。”在他看来,这个结局表明:“过去几百年来,仅凭海岸的几门大炮,

^① 《抗美援朝战争》,144-145页,北京,1950;《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第1卷,第145页,北京,1950;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144-145页,北京,1990。

使得西方帝国主义侵占东方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①

中国对朝参战的成功,使北京政权觉得,中共应该得到莫斯科的尊重,从而使得苏联愿意援助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后来回忆,只是在中国参战后,斯大林才对中共的勇气和决心表示了钦佩。中国领导人还注意到,苏联采取措施修改了对华援助的谨慎政策。1950年12月,中国副总理李富春访问莫斯科期间,克里姆林宫主动提出帮助中国建设国防工业。几乎不用谈判,米高扬和李就签订了一项协议,协议中苏联表示愿意提供技术和全套设备,帮助建立15项适合中国国防工业的工程项目。^②毛对苏联改变了态度感到高兴。在12月15日拍给克里姆林宫的电报中,他称赞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承诺”,因为两国政府间的一项长期援助协定,仅在第一轮谈判后就签署了。有了苏联的技术和经济援助,毛向莫斯科保证,“我们将使中国工业化……以使中国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一个重要的角色”^③。

1950年12月,中苏关系开始改善。赫鲁晓夫在控制克里姆林宫之后不久就访问了中国,从12月15日一直呆到12月25日。在12月25日至28日期间,毛与赫鲁晓夫数次会见,而其他领导人就与苏联合作的前景进行了“充分理解”的对话和谈判。在一系列的会谈之后,发布了两个公报——一个是对当前国际形势的评估和对策;另一个是对日本的政策。更重要的是,双方就关于“帝国主义经济封锁”的问题交换了意见,重申“粉碎”封锁的决心。此时,苏联似乎比以前更愿意援助中国经济建设了。^④

其结果是苏联增加了对华援助。1950年12月,赫鲁晓夫同意提供另一笔总额为1.5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在以前已同意的“援建”项目的基础上,又增加15个由苏联提供全套设备和技术人员的新项目,以建立中国的

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1985页,北京,1985

② 姚旭:《一个英明的决定:抗美援朝》,载《党史研究》1982(12),15页;当代中国对外贸易》,1982-1983页;当代中国基本建设》,1982-1983页。

③ 毛泽东给苏联政府的电报,1950年12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145-146页;关于朝鲜战争后中苏关系讨论,见约翰·吉廷斯:《中国军队的作用》,1982-1983页,伦敦,1982

④ 《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8日。

能源、原材料和半成品工业。^① 1953年7月,莫斯科和北京签署了一项新的援助协定,是关于增加15个完全由苏联援助的工程项目。这些新项目旨在建设国防工厂、造船、原材料和半成品工业。尽管后来作了一些调整,在北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期间,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了多达15个工厂。^② 莫斯科还帮助中国在1950年代获得了东欧国家的大量援助,其中包括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这些国家同意承担为建设15家工厂提供全部设备和为另外15家提供部分设备。^③

对中国来说,苏联和东欧经济援助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现代工业和军事技术援助。1953年7月签订《中苏技术转让协议》后不久,北京从东欧国家得到了同样的承诺。这些协议将使中国获得1500多项技术。东欧提供的主要是农业和林业技术,苏联承担的是提供先进技术,包括冶炼、洗矿、石油勘探、蒸汽机车制造、水力和火力电厂、水轮机制造、机械工具、优质钢生产和真空仪器技术。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都不用付专利费,中国只需补偿苏联和东欧国家复制技术图纸的微薄费用。北京实际上是免费获得了这些技术。^④ 此外,为保证中国人能最终掌握这些生产和科学技术,苏联和东欧国家在1950年代派出了1500多名顾问和专家去中国,还接受了多达1500名的中国人进行培训和学习。^⑤

新的苏联领导人似乎也开始对中国人的民族情绪有所理解,他们开始改正斯大林对中共所犯的错误。1953年7月,赫鲁晓夫访华时,他对中共在涉及主权和独立问题时的极度敏感表示理解。他向毛建议,建于1950-1952年的四个合资企业,包括在新疆的石油工业、非金属制造厂和大连的造船公司将由中国人独立拥有和管理。赫鲁晓夫还向前迈出了一步,接受了中国人提出的要求,即把苏联武装力量从旅顺海军基地撤出,并保证在1953年7月1日之前全部撤出;其后中国将恢复对这些基地的完

① 《当代中国基本建设》,151-152页。

② 《当代中国基本建设》,151-152页。

③ 《当代中国基本建设》,151-152页。

④ 《当代中国基本建设》,151-152页。

⑤ 《当代中国基本建设》,152页。

美国。^①

毛回国后不久,变得更加急于使中国的工业力量赶上英美两国了。1958年9月,他嚷嚷说:“或许不用像我们预计那么长的时间,就能赶上帝国主义国家的工农业产量了。”他的这些企盼促使中共领导人计划在7年内超过英国,在15年内赶上美国。一个月之后,毛向高级军事将领保证:“我们肯定将在7年内超过英国,15年内赶上美国。”^②毛梦幻般的热望导致了“大跃进”运动,号召在15年内提高钢产量15倍、发电量15倍、煤炭产量15倍。受乐观主义的鼓舞,中共领导人坚持提高产量这一目标,希望取得超常的增长率。^③

莫斯科对中国的热望一直持怀疑态度,使北京感到不满和泄气,因为其本来的期望是得到苏联的全面支持。1958年初,苏联在远东经济委员会上回顾远东经济发展时,令人难堪地批评了中国的经济政策。(报告指出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几个错误”引起了震动,北京的外交部在1958年11月1日,以备备忘录的形式向莫斯科提出抗议。关于苏联发现“(中国的)农业集体化遭到了农民的反反对”,中国人争辩道,“我国的农业集体化速度,已由刘少奇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作了全面的解释,完全驳斥了这一指责”。对中国物价问题的讨论,外交部发现苏联的评估是“故意歪曲和抹煞我们的基本成绩……反而夸大了我们个别的缺点和错误”。外交部备忘录展示的长篇解释,说明该报告“所犯的错误是,仅凭我们出于不同目的而发表的统计数字来作出比较”。对于这些错误,北京断定,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的经济成功“不帮助,反而作出错误的结论”。^④

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成功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使毛感到特别不愉快。他认为莫斯科仍然瞧不起中国人,并怀疑一个工业化的中国将会形成对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权的严重挑战。1958年11月,在与一个

① 《党史研究资料》1985(9), 151页;另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卷, 125页-126页。

②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卷, 126-127页。

③ 约翰·坎曼纽尔:《现代中国的崛起》, 125-126页, 纽约, 1960。

④ 中国外交部给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备忘录, 1958年11月1日, 俄国外交部档案馆, 全宗 159(1958), 目录 161, 案宗 161卷宗 源。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联合代表团的谈话中，毛表示了对莫斯科不相信中共的痛苦感觉。他告诉客人们，斯大林认为，“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另一个在中国，虽然他并没有公开表示认为毛泽东就是铁托”。尽管中共“不反对苏联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因为这对社会主义运动有利”，毛指出，“当时，一些人（在莫斯科）一直怀疑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否能建设成功，他们坚持断定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假的。（我们）怎么办呢？这些人吃饱睡足后，怀疑中国共产党不是真的共产党，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失败。对他们来说，如果（中国）建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才是不可信的”。因为中国的成功会引起严重的关注，“中国有可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继美国、英国和法国之后的第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尽管）中国现在几乎没有工业，因此还没有可能（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但（中国）将在一百年之内变得强大起来，成吉思汗可能会复活，结果使欧洲遭难，南斯拉夫将被占领”。毛强调，“绝不能让‘黄祸’复活”，因为中共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① 他断言，莫斯科没有理由怀疑和不信任中国。

由于莫斯科坚持不信任中共，毛开始怀疑苏联可能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紧紧控制和利用中国。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期间，毛已经坦率地排除了中国经济将成为苏联—东欧经济体系一部分的这种可能性。对于赫鲁晓夫的建议——中国应该成为东欧经济集体的成员，以便在相互援助、贸易和生产方面进行合作，中共主席简明地答复，“没有这种必要，因为（这种安排）对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没有真实的意义”。相反，把自己与苏联和东欧体系联结起来，会产生许多麻烦，这会互相缠在一起，致使（中国）进展将可能停顿和受阻。^②

更有意思的是，北京认为，苏联已经基本希望中国依靠自己去战胜西方的贸易限制了。1960年代后半期，苏联的机械制造产品对华出口量急速增长，这使中国人认为，苏联的工业得依靠中国的市场。^③ 更重要的是，

① 毛泽东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59年12月，《毛泽东外交文选》，1983年~1984年，北京，1984年。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1984年，1984年。

③ 《当代中国对外贸易》，1984年。

1950年以前的中国对苏出口是原材料,尤其是那些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原料,包括钨、锡、锑、锂、铍、钽、钼、镁和硫磺矿砂。占年产量 90%以上,产于中国海南岛的橡胶,以“特惠价”售予苏联。中国人知道,这些战略物资对苏联发展导弹核武器是“不可缺少”的。^① 因其与香港、斯里兰卡和其他非共产党国家的特殊关系,中国能得到在西方贸易禁运单上的一些物资,然后再向苏联提供。1950-1952年间,中国为苏联进口了总价值为 1.5亿美元的大量橡胶、黄麻、椰子油和黑胡椒。另外,中国领导人还认为,中国的农产品,如大米、豆、花生、菜籽油、盐、牛肉、猪肉、羊肉、鸡蛋、水果,占中国对苏出口的 80%以上,这对苏联努力抵制西方的贸易封锁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同一时期,中国还以黄金和硬通货偿还了苏联贷款。知道苏联缺少美元,北京付给莫斯科总额为 1.5亿美元的现金。^②

由于担心苏联进一步利用中国,北京从 1952年 7月开始与莫斯科谈判,要求苏联进行补偿,并修改他们在中苏贸易中“不合理的价格制度”和“不平等的付款条件”。中国批评莫斯科违背了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原则,并对苏联以“沙文主义”的态度对待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国家,表示了“严重的”关注。在中国的压力下,莫斯科退还了曾在中苏贸易中多收的钱,并接受了一个“较为平等的”价格和付款方式。^③

出于古老中国礼尚往来(在互惠的基础上殷勤待人)的待人信条,中国领导人觉得他们应从莫斯科得到更优惠的待遇,尤其是在发展核武器方面。1953年赫鲁晓夫在北京期间,毛已经试探了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赫鲁晓夫坦率地答复,中国应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建设,“不要发展这种武器”。他主张,中国有苏联的核保护就够了,再这样做对中国就是“巨大的浪费”。如果中国要发展核动力工业,苏联“可以帮助建立一个小的原子反应堆”,但这是以科学研究和培训为目的。毛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这种奇特方式明显感到失望和怀疑,毛答复“让我们考虑之后再作决

① 《当代中国对外贸易》,195页;《当代中国外交》,195页,北京,1956年。

② 《当代中国对外贸易》,195页。

③ 《当代中国外交》,195页。

定”^①。

毛很快就发现，苏联只是乐于把中国置于其核保护伞下，并不想帮助中国人制造原子弹。1955年初，莫斯科派出了一组地质专家来华，勘查寻找铀矿，并在1955年1月15日，签订了一项中苏共同开发铀矿的协议。由于中国的要求，苏联领导人在1955年9月底，同意向中国提供技术和设备，建立一个重水反应堆和一个回旋加速器。1955年10月，他们还答应帮助中国人建立一个核研究实验室。所有这些由苏联提供的核技术仅用于“和平目的”^②。

对于中共希望建立自己的核弹，苏联明显地表示不满。1955年10月，主管军工和核工业的聂荣臻元帅率团访问莫斯科，以期促成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工业。聂此行的结果是中苏在10月又签订了一个议定书，即苏联同意提供一个原子弹及相关设备的培训模型。但苏联一直拖延交货，拖延具体的交货的方式和时间。当聂要求一个肯定的答复时，苏联领导人回答：“我们不准备讨论这些条款，我们近期未准备好。”^③ 1955年10月，莫斯科确实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到北京，对转交苏联核技术作出具体的安排。然而，中国领导人发现，“这些苏联人尽量设法找出理由不帮助我们”。1955年后期，尽管莫斯科派出了10名导弹专家和交出了1枚苏式孕原短程地对地导弹，但从未打算满足北京对原子技术和设备的要求。^④

与苏联对待中国人制造原子弹的态度相反，莫斯科却有企图将中国的海岸武装力量划入它的东亚防务体系。1955年10月15日，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在写给彭德怀的信中，建议“共同”建立强大的长波电台，以在东亚将中国海军和苏联海军联结起来。马林诺夫斯基明确表示，苏联将提供技术和此项所需的大部分费用。^⑤ 10月15日，苏联大使尤金在北京与毛会见时，也以赫鲁晓夫的名义提出建议，苏联愿意建立一个核潜

①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124—125页。

② 《当代中国核工业》114—115页，北京，1988。

③ 《当代中国核工业》115—116页。

④ 《当代中国核工业》116页；李明生：《飞向外层空间》116页。

⑤ 马林诺夫斯基给彭德怀的信，1955年10月15日，引自《当代中国外交》116页。

艇舰队,与中国“共同防卫远东”。尤金解释说,俄国的海岸条件不适合苏联海军新建的潜艇,而中国有一个漫长的海岸线和良好的港口条件,适合我们先进的(核)潜艇来展示力量。^①

莫斯科的建议使中国领导人认为,早就受到怀疑的苏联控制中国的企图暴露出来了。面对苏联“联合电台”的建议,毛在 1950年 12月作了指示,“中国必须补上苏方不足的费用。如果苏联人‘采取独断的’(态度对待我们),我们将不答复(他们的要求),让它拖一段时间,(我们)中央领导讨论后再答复”。不管两国政府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他强调,“中国必须承担对这个电台投资的责任;中国在这件事里是有责任的。(我们)只好请苏联同志帮助建设和装备起来,但全部花费必须由我们以现金支付。建成后(我们)将共同使用,这应该以两国政府间的一项协议来决定。这是中国(政府)的决定,不只是我个人的”^②。12月 15日,毛指示彭,将北京的决定电告马林诺夫斯基,中国欢迎苏联的主动提议,但坚持只接受俄国的技术援助。^③

毛尤其被尤金的“联合舰队”建议惹恼了,毛与尤金在 12月 15日作了一次长时间会谈。“昨天你走后,我睡不好觉,也吃不下饭”,他告诉尤金,“今天我请你来多谈谈,给(我)治一治病:(和你谈过之后),我今天下午可能就能吃能睡了”。毛立即把话题转到了苏联要求中国和苏联建立联合核潜艇舰队的问题上。他对于“共同所有”和“共同管理”的建议特别感到不安,因为“所有权的问题早已解决”,但现在又重新提出来。他坚决地作出了结论:

你们不相信中国人!你们只相信俄国人!(你们)俄国人是上等的(人),而中国人是愚昧的下等人。因此(你们)提出要共同拥有和管理的建议。好啊,如果(你们)要共同拥有和管理,那就全部都管理起

① 毛泽东与尤金会谈记录,1950年 12月 15日。毛清楚地说:“首先,我们应该建立原则,即我们将只对你们援助的项目负主要责任。”(《当代中国外交》,154页)

② 毛泽东对苏联要求在中国海岸建立一个特殊长波电台的要求的指示,1950年 12月 15日,《毛泽东外交文选》,167-168页。

③ 彭致苏联国防部长,1950年 12月 15日,《当代中国外交》,154页。

来吧！让我们共同管理（我们全部的）陆军、海军、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吧！或者，（你们）可以有（中国）全部的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让我们只保留一支游击队。以几个原子弹，你们就以为可以通过联合拥有来控制（我们）了。除此（这些原子弹）之外，其他（你们还有）什么来提出（你们的要求）呢？”

毛随后又回到了老问题。“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我们容许）东北和新疆成了两个受（苏联）影响地区，四个（新建）工厂成为共同所有和管理。”自从1955年，赫鲁晓夫取消这些（决定）后，毛告诉尤金，“我们很感激”。但是，“你们（俄国人）从不信任中国人民，尤其是斯大林”。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第二个铁托”，把中国人民“作为一个落后的民族”来对待。尽管“你们（俄国人）常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他指出，“一些俄国人却看不起中国人民。”因此，至今为止，“在各国共产党中间，绝不存在所谓兄弟般的关系，（你们的领导人）只是嘴上说说，从未这样做。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两党间的关系仍被形容为父子关系或猫和老鼠的关系”。毛提醒尤金，他曾私下向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提出这个问题，他们“都承认这种父子关系”是不应该忍受的。但是，正如米高扬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贺词所证实，现行的苏联领导人并不想改变这种关系。因此，“我有意拒绝出席当天的会议，以示抗议……因为，（米高扬）以他是老子的行为，把中国当成了俄国的儿子”。

毛明确指出，莫斯科以忘恩负义来回报友善。“对于和平发展问题（的不同观点），我们从未公开讨论（这些分歧），也未在报刊上发表过（它们）。我们一直很谨慎，我们选择了内部交换不同意见的方式……（因为我们对苏联领导的公开批评）会损害赫鲁晓夫同志的（政治地位）。”就国际关系来说，“我们反对任何伤害苏联的（行为）。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针对苏联的大量的批评”。甚至，中国“对你们（俄国人）没有秘密可言……我们相信你们的人民，因为你们来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是列宁的儿女”。中共领导甚至还帮助莫斯科解决波兰争端。“我曾经说服波兰人民，（我们都）应该向苏联学习。”毛认为苏联把中国的支持当作是理所应当的。

在毛看来,莫斯科从不打算理解和体谅中国人的感情和自尊。“(我们)军事学院有一个(苏联)顾问,”他告诉尤金,“此人在探讨战例时,只允许(中国学员)谈论那些苏联的例子,而不是中国的,只准他们谈苏联的十大攻势,而不是(我们)在朝鲜战争中的例子。”国防部长彭德怀支持毛的意见,指出,一些苏联高级军事顾问“态度粗暴,方式生硬”,他们几乎不能容忍对苏联军事原则和理论的任何不同意见。毛随后变得激动和愤慨起来:“请允许我们讲(我们自己的战争经验)!老天爷,我们打了四年的仗,在朝鲜又打了三年!”他还劝告尤金和苏联专家,“到我们的各个省里去多看看,可以了解人民和获得第一手资料。”只有这样做,苏联人才能更多地了解中国人民。

最后,毛强调,他绝不接受苏联任何有关“共有”的建议。正是他决定,中国“将不和你们搅在一起,我们必须是相互独立的”。他告诉尤金,这些评论,“可能不大好听。你可以谴责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者是第二个铁托。我的反对意见是,你们已把俄国民族主义扩展到中国的岸边了”。赫鲁晓夫已经取消了一个工厂的共有权;“但到底(你们俄国人)为什么现在要建立一个共有的海军呢?你将怎样对世界上其他国家解释,你们建议(在中国)建立一支‘共有的’海军呢?你怎样对中国人民解释呢?”如果莫斯科企图通过经济这种武器来控制中国,毛断言,“我们不会使你们都满意的,甚至一个小指头也不(给你们)”。尽管北京早就拒绝接受苏联关于帮助中国建造潜艇的援助,他向尤金保证,“(我们)还是有可能在其他许多事情上进行合作,我们不可能破裂。我们将自始至终地支持苏联,尽管我们会关起门来吵架”。而且,苏联也没有满足中共的每个要求。“因为,如果你们撤回对我们的援助,(你们)实际上将迫使我们更加努力地工作(自力更生);如果我们什么都依靠你们,(长远来看)我们将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毛要尤金把他的话转告赫鲁晓夫:你必须原样向他转告我的意见,不要作任何改动,让他(赫鲁晓夫)感到难受。他批评了斯大林的(政策)路

线，但现在又采取了与斯大林同样的（政策）。^①

这些争论直到赫鲁晓夫 1956年 7月访问北京时才得以解决。苏联领导人为缓和中共的关注，确认了苏联仅为建立该电台提供贷款和技术，而由中国完全拥有。赫鲁晓夫还向毛解释，莫斯科绝没有在中国建立联合核舰队的打算，尤金转达了错误的信息，于是产生了“误会”。^② 1956年 10月 10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刘晓汇报，苏联领导开始显露修改其错误的对华态度，更加重视中国了。对于国际形势，赫鲁晓夫几次“强调我们对付战争的正确的态度，即绝不害怕战争和不乞求和平”。苏联人“在理解和评价我国在国际斗争的重要作用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方面，已向前迈出了一步；……在有些问题上，他们逐渐地（在他们的经济工作中）结合中国的经验”。此外，赫鲁晓夫开始“强调加速（经济）建设以赢得时间”。刘强调，这些变化是正面的，但进一步的改变将“依赖苏联内部和外部的相互影响”。^③

北京欢迎这些改变，并采取措施来鼓励苏联方面进一步的改进。毛支持刘晓大使 1956年 11月 15日的建议，中国应该“多体谅”和认真考虑苏联情况，不要太严厉；“中国领导人”应不在媒介和公开场合批评苏方或披露自己与苏联不同的观点；“（我们）应该多理解在华的苏联专家们，（我们）须以谦虚的态度对待他们”。^④ 10月 15日，毛在“对中央关于在对外关系中切实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稿”中作了补充说明，“（我们）必须继续强调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一切适合我国情况的先进经验”。^⑤ 毛还在 10月 20日他与苏联及其他 10个社会主义国家大使的会谈中指出，“你们都是我们的老

① 毛泽东与尤金会谈记录，1956年 7月 10日，《当代中国外交》，565页；毛泽东与尤金会谈记录，1956年 7月 10日，《毛泽东外交文选》140-141页。

②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的记录，1956年 7月 15日，《当代中国外交》，565页。

③ 刘晓致外交部的备忘录，1956年 10月 1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册，565-566页。

④ 刘晓致外交部的备忘录，1956年 11月 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册，56-57页。

⑤ 毛泽东的指示，1956年 10月 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册，56-57页。

师,苏联是其中最重要的老师”,并表明中国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功,部分地是由于得到了苏联的援助。^① 1959年,北京的确把从莫斯科得到军事—技术援助的要求提高到最大限度。尽管中共不信任赫鲁晓夫,但仍提出大量的订货单,要求援助和派出顾问。俄国外交部档案馆的资料显示,毛和他的同事不是要得少了,而是更多了。^② 1959年这一年,中苏之间贸易增加得最快,总额达 10.85亿美元,是 1958年的贸易额的 2.4倍,中苏的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 1/3。^③

然而,中苏恢复友谊的时间并不长。尽管中国明显地需要苏联的援助,中共领导仍表示,中国绝不模仿苏联的那些与中国所重视的革命传统相违背的方式和原则。按毛的观点,不是外国援助,而是革命的自力更生和吃草根精神,支持了经济建设,保证了中共在国际国内的所有问题上取得的成功。^④ 特别是针对西方的经济制裁,毛认为中国已取得了胜利。1959年 10月 10日,他会见两位巴西记者时,被问及西方贸易禁运的效果,中共主席答道:“(禁运)并没有损害我们什么,反而使我们受益匪浅。”一个明显的益处是,毛解释说,帮助中国人民消除了“盲目迷信外国人”。清除这种“盲目迷信”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毛断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都将这样做”,中国一定会继续“根除这种迷信”。^⑤ 毛还在 10月 10日

① 毛泽东与 19名大使会谈时的讲话,1959年 10月 1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册,1085-1086页。

② “要求 10名顾问”的备忘录,中国外交部给苏联驻北京大使馆,1959年 10月 10日,俄国外交部档案馆,全宗 100,目录 10,案宗 100,第 10号;要求 10名有关国防情报和保密工作的苏联顾问”的备忘录,1959年 11月 10日,同上;“要求增加 10名军事顾问”的备忘录,1959年 12月 10日,同上;“要求 10名孕原导弹专家”的备忘录,1959年 12月 10日,同上;“要求增加 10名苏联高级军事技术顾问”的备忘录,1959年 12月 10日,同上。

③ 《当代中国对外贸易》,108页。

④ 约翰·刘易斯、薛理泰:《中国的战略海上力量:核时代的政治力量现代化》,108-109页,斯坦福,1959。

⑤ 毛泽东与两位巴西记者的谈话记录,1959年 10月 1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册,1085-1086页。

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谴责了“盲目迷信外国人”。谈到西方经济禁运在中国起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时，他坚持“禁运十分有益于我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包括食物、衣服、住房和交通（衣食住行），还有我们的（经济）建设（钢铁产量）”。以他的观点，禁运迫使中国人民“依靠他们自己”进行了大跃进。“极大的益处是（禁运）帮助（我们）甩掉了依赖思想和消除了盲目迷信（外国人）。”毛断言，禁运时间越长，中国生产的钢铁产量就越高，中国就越强大，而且将最终粉碎禁运。

中共领导人很快发现，莫斯科显得十分怀疑他们拟想中的成绩。1959年10月刘晓大使汇报，苏联领导人“对我党在（经济事务）中运用的策略和战术，以及我们在（经济）发展中产生的新思想和新问题缺乏明智的理解”。像“人民公社、中国走向共产主义、（主张）按需分配和我们当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理解的”。^① 1959年10月10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又报告，“最近在一些苏联干部，特别是与我国有工作关系的苏联干部中，广泛流传着一些谣言，即中国（经济方面）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苏联人）经常提到一些（关于我国经济）未公布的统计”。这些人避开中国的“主要成就”不谈，“只关注（我们的）缺点”，得出了“中国共产党犯了重大错误”的结论。毛明显地非常关心这个报告，并加了批语，“一些苏联同志正批评我们的大跃进（运动），（我们）必须研究这件事”。^②

毛早就担心，赫鲁晓夫像过去的俄国沙皇一样，想利用他的经济武器来控制中国。1959年10月，赫鲁晓夫取代布尔加宁成了苏联总理。毛更加关注赫鲁晓夫一旦巩固了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地位，就会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尽管他对赫鲁晓夫的接触和了解是有限的，毛很容易将个人的厌恶转为政治上的不信任。在1959年中共中央的庐山会议上，毛免去了彭德怀元帅的职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彭德怀及其追随者受到了苏联的

^① 刘晓致外交部的备忘录，1959年10月1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155页。

^② 中国驻苏大使馆给中国外交部的报告，1959年10月10日，毛泽东的批语，1959年10月1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155页。

支持,“阴谋推翻”毛的领导,而欲置中国于莫斯科的直接控制下。^①当赫鲁晓夫 1959 年 11 月底“突然”访问北京时,则引发了更大的冲突。在与毛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于 12 月 10 日作了 7 个小时的长时间会谈之后,这位苏联领导人指责毛对台湾海峡的危险政策和北京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好战态度。赫鲁晓夫压毛考虑实行一个独立的台湾和对美国采取一种更缓和的政策。会议记录的细节至今仍未公布。虽然毛不感到意外,但仍感到很严峻,因为这次会谈“严重地破坏了中苏关系”^②。

毛很难过,他断定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正变成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严重威胁。1959 年 12 月,毛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与他的高层同事们讨论国际形势。他激烈地指责莫斯科一直企图控制中国,并历数了自 1949 年 1958 年 12 月的 10 次例证。毛还指出,赫鲁晓夫陷入了他的致命弱点:第一,“(他)很幼稚,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第二,“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1961 年之后)”。第三“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因为“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第四,“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他的态度)”。在毛看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历史遗传下来的”,列宁“没有来得及改造(这些问题)”。这位主席断言,这种“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③同月,还召开了另一个会议,毛在会上概括了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第一,“(他)把中国当成苏联的儿子来对待。第二,他不愿让学生超过老师。第三,(他)总是搞小动作(‘留一手’)。第四,(他)背后搞鬼(阴谋反对现任的

① 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概要,1959 年 11 月 15 日;毛在中央政治局关于国际形势会议上的讲话概要,1959 年 12 月。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1283-1284 页。

② 《当代中国外交》,1984 年,150 页。

③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关于国际形势会议上的讲话,1959 年 12 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1283-1284 页。

中共领导人)。① 因此，毛对赫鲁晓夫已失去了全部的政治信任感。

尽管有这些对赫鲁晓夫不利的怨言，但毛不想使中苏关系立即破裂，也未预料到赫鲁晓夫会用经济讹诈的手段来对付中国。1959年7月15日，苏联“突然”通知北京，所有在华的苏联顾问和专家必须在7月31日前离开中国回国，同时克里姆林宫取消了早就同意的派出100多名专家的决定。一个月内，多达1000名苏联专家回国，莫斯科撕毁了10项经济技术援助协议，取消了100多个科技合作项目。②

中国领导感到震惊和愤怒，撤走全部苏联顾问和专家，取消所有援助项目，这会对中国造成巨大的损失：许多关系到国防和高技术的优先项目只完成了一半。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潜在的损失，北京在7月16日首先向莫斯科表示，想说服克里姆林宫重新考虑它的决定，或者至少让专家们工作到合同期满。7月29日副总理兼外长陈毅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指出，由于苏联已使中国经济遭受了损失，莫斯科必须停止“损害两国友谊”的行为。我们可以就“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国际问题上的分歧进行辩论”，陈希望，双边经济关系“不再坏下去”。③

当北京看到苏联并没有改变其政策时，其态度开始强硬起来。在7-8月份一系列的对苏联外交部的“外交照会”中，中共攻击莫斯科“严重违反指导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共同原则和规定”；中国绝不会被“社会帝国主义的讹诈吓倒”。④ 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在会见一个苏联高级代表团时，明确指出，“中共中央绝不接受两党或两国政府间的父子关系。你们撤回专家，使我们遭受了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上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尤其是经济和外贸计划只能重新安

①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257页。

② 《当代中国外交》，156-157页。

③ 《当代中国外交》，156-157页。

④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外交部照会，1959年7月15日，俄国外交部档案馆，全宗10000目录10案宗15卷中国外交部致苏联外交部照会，1959年7月15日，同上；中国外交部致苏联外交部照会，1959年7月15日，同上。

排,中国人民准备承受这些损失,决心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弥补这些损失并建设国家”。中苏分裂成为现实。

(三)

中苏冲突中一个最为明显的特点是源于经济关系的持续不断的摩擦。经济上的矛盾构成了中苏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种经济关系使一方获益远大于另一方,而使对此不满的伙伴只能撤出吗?是因为像威廉·格里菲斯认为的那样,因毛决定“中国应成为一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超级力量”,而使苏联领导决定阻止它吗?^①还是有其他的什么原因?

无论是理性的思考,还是大量的估算,都不像源于文化背景的心理因素那样重要。显然,文化的思维方式之谜与原因、印象与实际——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对苏经济政策的核心。毋庸置疑,两国经济关系已建立了模糊地相互依存的方式。据此,双方或多或少都能有所收获:中国急需援助和技术、专家和工业产品,苏联打入了中国市场,建立了一条外部通道,以获取被西方禁运的物资,从长远来看,还能把中国并入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经济体系。经济的相互依存应使双方都满意。

然而,北京对莫斯科的不满和反对多来源于其领导人对同盟者的种种感觉,出于他们对“外国鬼子”和“民族屈辱”的强烈情绪,中国领导人难忘记本世纪以来的俄国“沙文主义”。即便是相同的意识形态,共同关注安全问题,相互的经济利益也不能减轻中国人的这种情绪和增加对“俄国傲慢自大”的忍耐力。在过去斯大林时期所受的委屈,以不平等条件为基础的苏联援助和贸易,在华苏联专家的特权,莫斯科勉强提供的先进(特别是原子)技术,“合资企业”,还有粗鲁、公开地批评中国的经济政策,这些都导致中国领导人怀疑苏联领导人就像老沙皇一样,继续蔑视中国人,阴谋控制和利用中国。毛的情绪化倾向最为明显,除了他极端的民族主义外,他容易让感情和情绪影响制定政策和把个人的厌恶转为政治上的不信任。

中国的强烈愿望也是一个因素。由于非常警惕美国的威胁,中国领导

^① 威廉·格里菲斯:《~~苏联~~ 1945-1955年的中苏关系》,页,剑桥, 1966

人感到迫切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树立一个可敬畏的强大形象。此外，尚未从过去虚弱的中国在面对外国挑衅的卑下地位中解脱出来，毛和他的同事一直希望，如不能完全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要在社会主义集团中有一个正确的地位。为达到这一目标，毛只能加快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其中钢铁和原子武器是一个强大形象的显著特征。实现这些目标不可避免地要依靠莫斯科广泛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毛认为，克里姆林宫理所当然地应该提供这些援助，因为一个工业化和强大的中国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因此中共领导采取了密集劳动和极端的经济政策来加速发展，结果是产生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显然苏联领导人是从非常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世界未来格局的，对中国的现代化努力有着明显不同的期望。当莫斯科要北京修改其“过早的前进”、“不负责任的行为”和“卤莽的政策”时，中共将苏联的政策与传统的外国干涉和胁迫相比较。

从一开始，中国就很夸张地宣称要成为一支超级力量。对于与苏联的关系，北京最大的希望是成为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非此是不能接受的。一种固有的说法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国家，有勤劳智慧的人民，毛及其同事毫不怀疑中国能靠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方式生存下去。尽管重视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他们在一段时期对自己的成功显得过于乐观，对自己的尊严过于敏感，而没有对苏联采取一种弹性的怀柔策略。中国领导人以一种民族情感来处理对外事务。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即以他们自立的经历、印象、记忆，有时又是期望的多棱镜来看待客观世界。于是他们就更可能以对外部威胁的感知来调整自己对付对手每一个行动的策略。指责赫鲁晓夫对中国文化缺乏理解和不了解中国的同时，毛从未自问他对俄国文化理解多少，或许是他对俄国人的思维方式缺乏了解而造成了错误的理解、错误的结论和最终的摩擦。

有趣的是，赫鲁晓夫最终以经济武器来对付北京的挑战。他是如何又为何选择了这种做法？他想达到什么目的？他认为他的“经济讹诈”能起到什么作用？这些问题的圆满答案还有待于发现。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西方对中国的封锁在中苏分裂中有多大的影响？这些问题超出了本文的目的，而需要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关于利用经济制裁来达到对外政策的目的

标——一个 20 世纪国际关系中有趣又十分重要的现象,这项工作必将成为当代国际历史研究中的焦点。^①

(本文系作者提交 1985 年 1 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焦小红译,李丹慧校。)

① 见罗斯曼:《国际经济制裁:古巴、以色列和罗德西亚案例》,新墨西哥,1968;巴里·卡特:《国际经济制裁:改进美国法律制度的偶然事件》,剑桥,1968;玛格丽特·道西:《国际制裁的现代前景》,伦敦,1968;宫川牧尾:《经济制裁有效吗?》,纽约,1969;大卫·鲍德温:《经济策略》,普林斯顿,1968;玛·道西:《经济制裁和国际性强制》,伦敦,1969;玛·道西:《制裁有效吗?》,《国际前景》1969年 7-8 月号,1卷,1-5 页;理查德·波特:《经济制裁:来自罗得西的证据和理论》,《和平科学杂志》第 17 卷第 4 期(1968 年秋季号),2卷,15-17 页;哈里·斯特拉克:《制裁:罗得西亚的例子》,西那库斯,1968;杰姆斯·巴伯和迈克尔·斯派塞:《用制裁对付南非——可供西方选择》,《国际事务》第 14 卷第 1 期(1968 年 7 月号),1卷,1-5 页。

中苏分裂的军事因素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

研究所 谢·冈察连柯

讨

论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几年前就有大量研究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文章和论述问世，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许多学者回避或者忽视了这一问题。避开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似乎是缺少可靠的资料。此外至少还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有关的两国政府对于深入研究这一问题不感兴趣。其一，有关双方（中国和苏联）还不愿意把这一敏感问题的全部内容公布于众。其二，一些有关军事合作情报的公开发表会暴露两国军事力量方面的秘密。北京和莫斯科都认为这样做在冷战时期是不允许的，那时中国和苏联为了维护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与西方处于冲突的状态。尽管这一合作伙伴在 20 年代的互相指控中暴露了许多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和细节，但对这一问题均保持沉默。

俄国现在对历史学家们评价 20 年代中苏关系的问题，似乎较以前开放了一些。因为许多有关的事实和数据已经搞清楚了。众多研究的结果更倾向于中苏军事合作始于 1937 年，即苏联红军解放日本占领下的满洲时。那一时期的双边关系主要受莫斯科政策的影响。当时莫斯科虽然正式承认蒋介石政府，但在事实上帮助了中国共产党。

背 景

军事合作的重点是要使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更加强大,逐渐发展成一支在冷战条件下能单独抗衡美国和日本的力量。这就是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1945 年代建立军事合作的基础,也是二战结束后莫斯科转向毛泽东的政策形成的基础。1945 年中国开始内战。那时,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全力反对美国 and 国民党,尽管后来从 1950 年代中期披露的资料中得知,即便在当时,莫斯科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信任中国共产党。当时苏联政府高级领导人米高扬奉斯大林的直接指派,于 1959 年 1 月至 2 月秘密访问中国之后,在 1959 年他写给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信中,就提到这一点。有趣的是 1959 年 1 月,即在米高扬访问前不久,毛泽东在跟他的俄国医生奥尔洛夫的谈话中还强调:“我们必须把这一问题解决好,以使我们的政治方向能与苏联保持一致。”^①

同样有趣的是,在与奥尔洛夫医生的那次谈话前不久,更确切地说是在 1959 年 1 月 20 日,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表明了莫斯科对中国革命胜利后多党参政方案的意见。斯大林写到,他不同意各党派必须离开政治舞台。“我们认为各反对党在中国代表着中国人口的中间阶层,他们是反对国民党的,并将会长期存在下去。共产党必须与它们合作,去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但必须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领导地位。如果可能,有些党派的代表还要进入人民民主政府,政府亦应称作联合政府。这样就扩大了政府的基础。”^②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采纳了这一主张,改变对资产阶级党派的政策。

上述摘录就是毛和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莫斯科主张的证据。1959 年 1 月 20 日,毛在西柏坡与米高扬的秘密谈话中,坦率地评估了苏联的对华军

①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档号全宗 156 全宗 156 卷 156 页 156 页,有关米高扬秘密访华的材料有俄著名学者安德列·列多夫斯基挑选出来并发表在《远东问题》1959 年第 1 卷第 1 期上。

②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档号全宗 156 全宗 156 卷 156 页 156 页,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学者有不同看法,参见薛衔天、王晶:《关于米高扬访问西柏坡问题——评“米高扬访华秘密的使命”》,载《近代史研究》1992(4)——编者注。

事援助：“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几乎不能取得今天的胜利。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说不能不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苏联对满洲的军事援助占你们援助总额的 50%。这些援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①因此，中苏军事合作是建立在苏联对满洲军事援助的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重要心理基础。

苏联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满洲基地，这在后来成了支援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基础。1945年 8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苏军驻防大连、旅顺港及中长铁路的协定后，苏联实际上已占领了整个东北，使国民党军队不能从海上进入，并帮助毛泽东在当地建立起武装组织。随后又为其装备了日制和苏制武器，还帮助中国恢复了军事和经济方面的通讯联络。

苏军于 1945年 9月从满洲撤出。而在整个 1945年 及 1946年 期间，林彪的军队从苏军手里得到了现代化的武器。那些援助包括总数超过 1000 门的大炮、迫击炮、掷弹筒，100 辆坦克，100 架飞机，约 100 挺机枪，100 座各种军火库，还有孙盖河舰队的船只。^②苏联历史学家奥·鲍里索夫全面研究了该条约后这样写道：“这些援助，使人民军队成为强大的力量，并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这一观点在苏联作者论中国现代史的专集中作了详细说明。该书 1950年在莫斯科出版。^③

移交武器是随着中共军队的经常性调动进行的。至 1945年 10月中旬，该地区的武装力量已发展到 100 万人，而到 1946年 10月下旬，已增至 150 万人。“满洲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极大地影响了政治斗争，即 1945 年代后半期的内战和社会经济的改变均受到了苏联的有力影响。”^④

苏联和后来的俄国学者认为，中苏军事合作是两国复杂的关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苏联研究人员在关于中苏关系的科学著作中所作出的至少两个结论令人感兴趣的原因。

第一，他们毫不怀疑莫斯科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援助的利己目的和这

①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档案号全宗 员全宗 100，第 100 页。

② 奥·鲍里索夫：《苏联和满洲的革命根据地》，105 页，莫斯科，1945 年。

③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近代史，1918—1945 年》，100 页，莫斯科，1950 年。

④ 《中国近代史》，105 页。

一援助的性质,他们没有强调提出下述事实,即援助的主要目标是把中国共产党军队改变成攻击型的军队。但是,即使在给予援助的当时,就很明显的是,援助不仅意味着保护中国(共产党)免受外部攻击,也提高了其在内战中的进攻能力。

第二,莫斯科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是有目的地给予宣称追随斯大林和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的。这意味着更多地用于内部武装斗争,反对那些非共产党(主要是国民党)及追随蒋介石的组织。本文不是旨在揭露毛与蒋当时及后来的矛盾。但是,当我们展开论述时有必要指出,中共和苏共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接近,是苏联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基础。问题在于苏联学者不愿抓住这一事实,而只是描述了一个避免引起争论的明显的事实。

为了在远东战线建立起桥头堡,苏联认为毛和中共不仅是一个可能的盟友,也是意识形态上的同志加兄弟,这有助于苏联反对美国这一冷战时期的主要对手。即使这样,斯大林仍然不肯完全信任毛,而认为国民党不仅统治着中国,还是一支有相当影响力的政治力量。莫斯科的这一政策使得毛直至 1956 年代中期还重提此事来谴责斯大林相信国民党胜过相信共产党。

“1956 年,当反蒋武装斗争全面展开,我们的军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之后,斯大林仍坚持要我们与蒋介石和谈,因为他怀疑中国革命的力量。他这种怀疑态度一直保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毛在 1956 年 5 月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这样谴责了斯大林。^①

然而,尽管莫斯科持有某种程度的戒心,两国还是开始了军事领域的合作。

一、信任的基础

1950 年代后半期,苏联与中共建立了在满洲实行军事合作基础上的相互信任。莫斯科表示,它准备将军事合作问题作为两国关系中一个独立的重要问题来考虑。毛赞同。有一点很清楚,即 1950 年代这两个共产党国家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档号:全宗 100,卷宗 100,页码 100。

的军事合作是在和平时期，而不是在战争状态下开始发展的。这里可以谈几个影响莫斯科作出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的决定的重要情况。

首先，苏联注意到中国军队的军事训练水平很差。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 1953 年 10 月 10 日与刘少奇会谈时说：“苏联军事专家对我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部队的指挥员不是其所辖兵种的内行。比如，有些空军战斗团的团长没有当过飞行员，而炮兵团的军官没当过炮兵。”“刘少奇同志说，中国的指挥员也应该接受培训，以便他们能够管理机械化的部队。”^① 在与苏联大使坦率的谈话中，中国高层领导人并不掩盖人民解放军在军事训练中存在的问题。

其次，中苏之间发展军事合作是在大陆与台湾保持战争状态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有着特殊的含义。一旦苏联公开援助中国，就意味着与美国开始冲突。朝鲜战争之后，亚洲出现了脆弱的和平，这种情况足以表明苏联面对国际社会的不利状况。此外，当时苏联新领导人公开宣称要致力于缓和。这就是说，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只能秘密地进行，而不给西方有谴责苏联企图发动新的战争的借口。或许，这也能解释苏联大使与中国高层领导人会谈时所用的那种语调了。

刘少奇在 1953 年 10 月 10 日与苏联大使尤金会谈时这样说：“中国的远程火力可以打到这些岛屿（马祖和金门），但是我们现在不打他们，因为在布置这些武器的附近地区，既没有铁路可运送武器和弹药，也没有飞机场可停降飞机，以便利用空中火力来支援地面炮火的打击。现在铁路和机场正在建设中。先让蒋介石的追随者在那里呆一段，以后他们一个也跑不掉。如果现在增强炮火，他们就会跑掉的。”^② 从会谈的内容可以知道，尤金大使听取了刘的谈话，但未作出反应。随后，他将此次谈话记录呈送莫斯科，也未作任何附加评论。

第三，莫斯科打算把双边的军事合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关于旅顺和大连港的协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涉及两国间的军事合作条款，这可以用来作为双方接触的模式。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档号：全宗 192，卷宗 1000，第 100 页。

②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档号：全宗 192，卷宗 1000，第 100 页。

根据 1945 年签订的这一条约,中苏同意采取所需的一切的手段,制止由日本及其盟国发动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破坏和平的侵略行为。当条约的一方受到日本或其盟国攻击,进入战争状态时,另一方立即采取军事或其他任何有利的方式来进行帮助。^①

在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特殊政治环境下,莫斯科实际上成了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独立的担保人,并在中国受到可能的侵略时,成为它的保护伞。此外,按照 1945 年的条约,一旦远东发生战争,苏联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这样实行了几年,在 1950 年,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建议修改这一条款,因为这是一种“单边原则”^②。

远东在 1945 年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战败,推翻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组成毛领导的中国新政府等),这使中苏双方在像中长铁路、旅顺港这些问题上,有可能建立一种不同以往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合作关系。

苏联政府通过了无偿移交该铁路和与铁路相关的全部财产的协定。协定涉及苏联军队从双方共用的旅顺海军基地撤出和移交基地设施的问题。莫斯科并不急于撤出军队,认为还需要签署一些文件来确认双方的立场(于 1950 年 9 月签订)。1950 年 9 月,中国政府建议苏联军队从辽东半岛撤出,莫斯科考虑了几个月后,于 1950 年 10 月撤出。^③

1950 年 9 月 15 日,签订了苏联向中国提供 3 亿美元的贷款协定。此项贷款规定苏联在 3 年内将提供相当于这一数额的设备和机械。中国政府同意从 1950 年起,用 3 年的时间偿还。

在 1950 年 8 月周恩来访问莫斯科期间,作出了组成一个接管长春铁路委员会的决定(苏联占用的中东铁路是在 1950 年底完全交给中国的),延长共同使用旅顺港海军基地协定的原因是由于远东的紧张局势。双方还签订了建设穿越蒙古连接中苏的铁路。

① 《真理报》1945 年 9 月 15 日。

②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档号:全宗 100,全宗 100,目录:100。

③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档号:全宗 100,全宗 100,目录:100。

二、斯大林之后：方向一致的新道路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外交政策有了一些变化。但没有立即发生后来所谓的“非斯大林化”。这些变化是重新确定苏联自1917年列宁在世时开始的对东方、中国和印度的政策。苏联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发展至少有两个主要方向。这两个方向都直接涉及中苏关系。

第一个方向的拥护者（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是其中之一），虽然原则上意识到“冷战”状态需要“突破”，但仍然坚持从这样一种事实出发，即基于内部斗争将继续存在和不可避免的思想，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应该保持不变。尽管苏联领导人宣称“社会主义将取得最终胜利”，但苏联仍然是脆弱的，比以往更需要加强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支持第二种方向的人（其中有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最高苏维埃主席米高扬）从较为乐观的估计出发，坚持认为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平衡力量已经在全世界出现。他们意识到和平共处及在第三世界国家存在“和平阵营”的可能性，这一点从1953-1954年开始引起了对苏联外交的密切关注。在苏联上层领导内部斗争中的这样两种战略，有助于解释苏联在外交上及在国际间寻求新的处理方式和策略行动中经常出现的不协调动作。这在中苏军事合作关系上也显现出来。

苏联新领导人开始与中国和南斯拉夫建立新的关系，努力缓和苏联与西方的紧张关系，并重新评估他们关于第三世界处于中立状态的观点。这时另一个重要情况出现了。莫斯科担心在斯大林这个被狂热崇拜的领袖去世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危机。莫斯科也害怕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需要借用毛泽东的影响力的可能性。

1953 莫斯科急于拉拢北京

苏联与中国接近，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头几个月里就开始了。苏联新领导人接管权力之后，其对外政策活跃起来，几次海外之行与几个友好国家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赫鲁晓夫在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等党和政府领导人的陪同下，首先访问了中国。

中国领导人懂得，苏联想借用毛来加强其在斯大林之后的影响力，也

打算利用这次机会签订许多条约,主要是经济条约,来满足自己的利益。于是,长期谈判未果的贸易协定,于 1950 年 3 月 12 日得以签署。为建立现代化的中国基础工业,苏联的援助促进和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力量。这可能就是中苏 50 年代的军事合作与苏联援华创建工业基地这两者密不可分的原因。

1950 年 3 月,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3 月 12 日,米高扬和李富春签署了一项协定,由苏联通过贷款为中国至 1952 年底的建设提供设备和帮助,援助中国建立和恢复 156 个大型企业。这些企业包括几家冶金企业集团、非金属制造企业、煤矿、炼油厂、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发电厂。随后又作了有利于中方的反复修改。

1950 年 3 月,苏联提交给中国政府的备忘录中,两国的军事合作受到了很高的重视。苏联将帮助进行设计工作,为 156 家新的国防企业提供设备和援助,而不是像先前计划的重建这些企业;援建另外 156 家新的工业企业,包括一家为年产 1200 门防空高炮的企业生产控制系统的工厂;为炮兵阵地提供设计、安装和使用发射装置设备的援助。莫斯科作出了提供当时的现代化装备的建议(米格 15 喷气机,防空高射炮,坦克发动机等)。① 这些中国工厂(尤其是那些生产国防物资的企业)得到的苏联先进设备,就连苏联自己的多数工厂也尚无配备。

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苏联大使尤金认为,有必要注意北京对莫斯科建议作出的积极反应。苏联大使 1950 年 3 月 12 日写道:“我拜访了毛并转交了赫鲁晓夫同志的信,告之苏联在以下方面的援助:(1)建立 156 个军工企业和 156 个军事工业研究所;(2)建设一条从乌鲁木齐到中苏边境站的铁路。毛要我转达他对苏共和苏联政府深深的谢意。”②

1950 年 3 月 12 日,在北京签订了向中国工业增加提供总计 15 亿卢布的设备,及援建另外 156 个企业的议定书。苏联政府批准了又一项 15 亿卢布的对华长期贷款。③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档号全宗 156 全宗 156 卷 156 号。

②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档号全宗 156 全宗 156 卷 156 号。

③ 《真理报》1950 年 3 月 12 日。

1955年5月15日，在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期间，还签订了关于共同使用旅顺军港的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同意苏联军队从旅顺港撤出，海军基地的设备无偿移交给中国政府，撤出和移交工作将在1955年8月完成。两国间的科技合作协议也在当时签约。随后中国又要求苏联援助国防和燃料工业，派一批高级地质专家来华。有关的书面要求信件由周恩来通过苏联大使转交布尔加宁。^①

1955年8月，米高扬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华。8月25日，签订了援建15个大型企业的协议。^② 还有其他一些广泛合作项目也得到了批准，其中包括军事合作项目。我们认为下述问题需要重视。

中国利用苏联援助来加强自身的国防力量。我们重温一下1955年8月中国外长陈毅与苏联驻华大使的谈话：“我们中国在研究苏联的经验，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而我们正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军队也必须学习苏联军队丰富的战斗经验。一旦朝鲜半岛发生战争，苏联远东地区就是前线，我们这里是后方。当山东省发生战争时，我们这里是前线，你们就是后方。”^③ 因此，中国认为，与苏联的军事合作是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工业强国的重要因素，这个国家将在全球局势中发挥重要的政治影响力。

陈毅在1955年8月15日与苏联大使谈话的几天后又说：“需要加强两国军队在和平时期的合作，以对付未来将发生的战争。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苏联有责任帮助中国。”^④

这是中国方面的需求。当然，苏联也希望加强中国的军事实力，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其战后自身的经济困难等问题，苏联不可能对华提供各种武器和装备等物资，因此，关键在于帮助其建立起现代化工业，使中国自己能生产出先进武器。这样的军事合作以前几乎没有过，在其之后也不会再有。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陈毅全宗，远全宗，来源：漏页

② 《真理报》1955年8月15日，翻译：贾丕才：《苏中关系》，页码：107，莫斯科，1955

③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陈毅全宗，远全宗，来源：漏页

④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陈毅全宗，远全宗，来源：漏页

中国希望把莫斯科和自己捆在一起,台湾问题导致中国在战略上进入了苏联的核保护伞

国民党人逃到台湾以及中国革命取得了 1949 年的胜利后,北京立即宣布了其统一中国的决心。从那时起,中国提出了以下口号:“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绝不允许台湾独立和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情况下,承认了台湾的政治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多年来,北京提到台湾问题的形式已有所变化,但基本原则仍未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同阶段,中国领导人对台湾问题的提法也不同。在 1950 年代,这成了置中国于苏联核保护伞下的重要手段。

1950 年代后半期,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台湾附近的岛屿时,台湾周围的局势又紧张起来。美国派出了第七舰队,苏联也没有旁观,而是支持了北京。

实际上,美国的行动是对北京企图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反应。莫斯科没有直接支持北京的行动,但也没有公开进行指责。而是以一种十分明确的方式让华盛顿知道,它不允许美国卷入这场冲突,也不让华盛顿施加任何压力。莫斯科以此方式显示了它在远东的地位及影响局势的能力。对于北京来说,它利用莫斯科的反应,在核保护伞底下站稳了脚跟。

1950 年 12 月 10 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传达了信息,他呼吁美国放弃它那种经常在全世界这里或那里不断制造严重冲突,目前正导致远东局势紧张的“侵略政策”。他强调,“核讹诈既吓不倒我们,也吓不倒中国”。还说,“不仅美国有,别人也拥有原子弹和氢弹,并具有相应的运载工具,如果中国遭到核攻击,侵略者将立即受到同样的打击”。^①

赫鲁晓夫认为有必要强调“攻击中国就是攻击苏联”,他以一种很像最后通牒的方式,发表了莫斯科解决冲突的观点:“必须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海军必须从台湾海峡撤出,美国兵必须离开台湾撤回国内去。否则,远

^① 《消息报》1950 年 12 月 10 日。

东不会有持久的和平。如果美国不停止行动，人民中国只有拿起武器，它从哪里来，就把它赶回到哪里去。我们完全站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边。我们现在和将来都支持他们的政策。”^①

在 1950 年 9 月 15 日这一天，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证实了苏联对这一问题的态度。葛罗米柯呼吁支持印度代表团关于恢复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议，说“美国政府不应对它在远东引起的混乱如此轻描淡写，从而掩盖它扩大侵略中国沿海岛屿的事实。侵略者应该离开中国领土，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越早越好”^②。葛罗米柯的讲话还有这样一段：“被美国非法霸占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属于中国，它们终将得到解放。”^③

围绕台湾问题产生的紧张局势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这促使莫斯科更加明确地阐述它的立场，这次不是关于台湾问题的，而是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的立场。由此，这一态度在表面上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转入到其他方面。1950 年 9 月 15 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在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说，如果中国遭到美国和日本的进攻，苏联将准备向中国提供援助。“我们不能允许敌人有这样的错觉，即如果中国遭到美国或日本的进攻——这是最有可能的，或是遭到其他任何国家的进攻，苏联却只是一个消极的旁观者……如果苏联让原子弹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中国为此牺牲了无数儿女，而苏联有一种具有威胁性的武器能够制止并击败我们共同的敌人，却不向你们提供这种援助，那么，这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对于我们而言，可以说进攻中国就是进攻苏联。”^④

中国对此经党内渠道提出的声明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在 1950 年 9 月 15 日苏联官方公开表态之后，9 月中旬北京即对莫斯科作出了官方的答复。当时赫鲁晓夫宣布说，“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外部攻击，更准确地

① 《消息报》1950 年 9 月 15 日。

② 《消息报》1950 年 9 月 15 日。

③ 《消息报》1950 年 9 月 15 日。

④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档号：全宗 20，目录 10，卷宗 10。

说是遭到美国进攻,苏联将予以援助”^①。毛主席 1950年 10月 16日给苏共中央的答复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他说,对于你们为马列主义原则和国际主义而作的无私奉献,我们深受感动。我代表中共中央向你们表示诚挚的谢意。^②

这样,毛使中国安然纳入苏联核保护伞下的国家行列之中。这一情况对世界政治力量的平衡起了重要作用,造成了新的力量组合。此外,它还使中国可以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核计划,而不必去理会西方。这是很重要的,当 20世纪 70年代中苏关系冷淡时,中国仍然可以在苏联的核保护伞下舒适地乘凉,因为苏联从未公开推翻过自己的承诺。

三、军事合作的一般情况:倾向与发展

鉴于 20世纪 50年代后半期亚洲和中国本身政策的政治性变化,中国对这种合作的必要性的理解

在 20世纪 50年代前半期,中国领导层想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苏联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和平友好互助条约的国家。以 20世纪 50年代的观点来看,尚未对这一举措作出高度评价。让我们注意,正是由于苏联当时在积极参与反法西斯联盟的国家中享有崇高的国际威望,有苏联的支持这一事实,才使中国在 20世纪 50年代末和 20世纪 60年代初很快即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这包括缅甸、印度、英国、芬兰、挪威等国。而与此同时,一直支持蒋介石的美国则采取众所周知的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各种步骤,在国际上孤立北京。

1950年 10月,朝鲜战争开始。朝鲜事件给杜鲁门总统以派出第七舰队去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的借口。^③多年来,美利坚合众国一直坚持奉行支持国民党政权的政策。当时,美国总统宣称,美国“一直在考虑”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国的可能性。迪安·腊斯克(当时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① 《消息报》1950年 10月 16日。

②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档案号全宗 28全宗 1950年 10月 16日。

③ 哈·杜鲁门:《考验和希望的年代》,1950年 12月 1日,第 100页,纽约,1950年。

允诺美国将帮助国民党政权夺回大陆。^① 美国政府宣称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进攻没有实现，因为华盛顿知道这要在很大程度上冒苏联干涉的危险。尽管美国没有下定对中国实施武装侵略的决心，却对其采取了歧视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对中国、香港、澳门实行全面禁运（1950年宣布），通过对朝鲜的武装干涉来削弱共产党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声望，以及为在亚洲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与外部的反共力量提供直接援助。^②

事实上，中国已发现自己在国际上几乎处于孤立的境地，并被迫寻找出路。在当时的环境下，惟一真正的出路就是寻求与共产党国家意识形态上的结盟及获取他们的帮助。

当年，中国领导人急需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关系，特别是与苏联建立紧密、信任的关系。莫斯科也准备迁就北京，而与此相对照的是，华盛顿则采取一系列步骤反对中国。这足以使人回想起美国同亚洲一些国家签订的条约，其中包括与蒋介石签订的条约，以及 1950年在美国的积极参与下，“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个军事集团的成立，等等。

美国相信，他们与蒋介石的联合是在向中国表明，美国政府认为，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任何进攻行动，都是对美国自身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他必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消除这种威胁。^③

1950年，由于担忧蒋介石不能保住靠近中国东南沿海的金门、马祖和大陈等小岛，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保卫福摩萨（台湾）的决议案。该决议案授予美国总统在这一地区使用武力的权力。与此同时，美国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能正是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因素促使北京要与苏联进行军事合作，而且，可能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使中国领导人坚定了进行这种合作的决心。

1950军事合作的几个阶段

在今天来看，这一合作至少有五个阶段：

① 《国务院公报》，1950年 5月 10日，1页。

② 哈·杜鲁门前引书，1页。

③ 与“中华民国”的共同防御条约，《外交关系委员会报告》，1页，华盛顿，1950。

预备阶段。从二战结束到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初始阶段。始于 1950 年代初期,止于 1950 年代中期。

主要阶段。从 1950 年代中期至 1960 年 10 月台湾海峡危机结束。这一阶段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似乎是最关键的,由于中国国际环境的恶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作用更为重要,这也表明中国需要经过专业训练的、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员。

冷淡阶段。1960 年 10 月至 1970 年代初,所有苏联专家从中国撤出。

终结阶段。从 1970 年代初至 1970 年代中期,军事合作终止。

当然,这种划分是相对的,但它反映了在双方合作的领域中一些事件的主要进展过程。每个阶段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各阶段所发生的事件的性质依双方的政治意志而定,而提供和接受技术援助的程度则依它们各自的经济水平而定。然而,愿望和可能发生的情况并不总是一致的。

四、中国在苏联的战后亚洲政策中的位置

分极是战后亚洲的主要特点和苏—美争斗的结果。中国在其中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尽管这个角色可能并不如中国所要求的那样主动、活跃。

总而言之,苏联—蒋介石政府 1945 年的条约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 年的条约,其实质都是反日条约。因此,中苏联盟的建立本身就是反日和反美的,后者美国是日本国家安全的保卫者,它同时有军队驻扎在日本。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创立使苏联相信,加强与中国的联盟是正确的选择,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 1950 年 2 月签订后仅几个月,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便爆发了,冷战分界线由此变得更加明显。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先后卷入到东西方国家的角逐之中。与莫斯科的结盟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有助于为它的领土、安全和独立提供保护。当中国就军事力量而言还很软弱,并且又忙于在 1955 年亚非新独立国家召开的万隆会议

期间和之后树立自己新的政治形象时，苏联给了中国以重要的政治上的支持。

只是在 1956 年代后半期，莫斯科的对华政策才开始动摇。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公开指责无疑是苏联开始民主进程的重要一步。对中国来说，这一进程中最重要情况是，苏联在斯大林之后的统治者不是合适的领导人。中国还认为，莫斯科 1956 年秋对匈牙利的政策，当时苏联军队镇压了那里的反革命叛乱，也是源于这同一种情况。

此时，苏联与中国开始争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中国似乎对 1956 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宣言极为不满，当时会议推选苏联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此外，中国敦促苏联利用它的领导地位和权力积极反抗西方，而令中国气愤的是，与此相反，苏联却宣扬与西方“和平共处”的政策。

1956 年台湾海峡危机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莫斯科表示，它宁愿对其盟国（中国也在其中）的行动实行紧密控制，也不愿意让它们能自行其是。就其在 1956 年 10 月声明中的申辩而论，苏联政府强调说，中国 1956 年炮击诸岛时未征询苏联的意见，尽管按照《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应该这样做。莫斯科还谴责中国有意挑起 1956 年与印度的边境冲突，企图破坏全球紧张局势的缓和。1956 年莫斯科宣称，中国曾着手进行一些尝试，即设想苏联将支持它的军事行动，由此而毁掉其对美国的缓和政策。^①如此，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使用军事力量的方式开始缓慢地、但又不可避免地不为苏联所接受。这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构成了苏联与中国关系破裂的基础。

五、军事合作的特殊情况

根据俄国档案馆的材料，中苏在军事工业方面的合作始于 1956 年。我们按苏联驻华使馆的意见，认定这一年为合作开始的时期。根据苏联大使馆 1956 年的报告，中国政府在 1956 年底正式向苏联政府呈送了一份关

^① 《真理报》1956 年 10 月 1 日。

于增加和加快援助中国一些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项目的请求书。周恩来在 1953 年 5 月 21 日给布尔加宁的信中请求苏联派 15 名专家来华帮助中国的国防和燃料工业建设。^① 中国当局迅速意识到,苏联有意在中国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开始依自己的利益来利用莫斯科的政策。

根据苏联专家的某些估算,苏联援华设备中约有一半是提供给综合企业和国防工厂的机器设备;苏联对华出口总量的 1/3 是设备、黑色金属、交通工具和石油产品。^②

两国 50 年代军事合作的重要特点是,这种合作是单方面的。即苏联是援助国,而中国是受援国。基于这些档案材料,我们可以搞清下述合作方向。

苏联和中国在特殊军事区域中防空领域的合作

1953 年,外贝加尔斯克与沈阳军区签订了一个相互通报防空情况的协定。1954 年,上述双方又签订了在作战力量和作战方式方面进行内部合作的协定。但是,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的说法,苏方在协定签订后不久即流露出明确的退缩之意,由此产生的实际影响给中国方面制造了麻烦。^③

1955 年夏赫鲁晓夫和苏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华逗留期间,彭德怀向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彭德怀还提出,由苏方派一个代表团来华就此事进行协商。这个代表团于 1955 年 6 月末抵达沈阳。

苏联援建一些特殊企业

到 1955 年,中国的重工业基础建设已全部完成。中国领导人在相当实际地评估了本国的潜力之后,已经决定优先发展自身的国防工业,并准备实际运作起来。从那时起,他们更加有条不紊地要求苏方在发展国防工业方面予以合作和援助。以下两个事例可以清楚地说明这种情况。

例 1: 1955 年 5 月,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信给赫鲁晓夫先生,要求苏联政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项目中的 15 个项目的建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1953 全宗 100 全宗 100 卷 100 号

②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1953 全宗 100 全宗 100 卷 100 号

③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1955 全宗 200 全宗 100 卷 100 号

设,提供技术援助。信中明确提出,请苏方人员帮助设计这些项目,并强调说,苏联有必要为所有这些工业项目提供最重要的设备和机器,而这意味着苏联在交付的这部分机器和设备,其价值将超过一亿卢布。^①

要求苏联提供设备的那些项目的细目表则进一步显示出,这些项目中包括有中国国防力量所赖以为基础的那些企业。其中有河南铝厂(年产一万吨铝);湖南稀有金属厂,包头稀有金属厂,该厂生产多种稀有金属;特殊五金厂,年产一万吨优质电线,建滩军工厂年产一公里军用电缆的电缆车间,精密电子仪器厂、整流器厂和其他企业。^②

例一 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国政府通过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向苏联政府转达了一项关于援建中国几家导弹生产企业的请求。这几家企业和一些生产导弹附属设备的工厂将在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投入生产。中国想在苏联全面的帮助下生产新一代的装备,而如果没有苏联的参与和援助,这将是不能完成的。^③

中国人建设国防企业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苏方有时无法按时实现中国的全部愿望和要求,这常导致苏联专家的工作跟不上趟。而苏方专家延迟来华行期的原因则在于,所需的这类人员必须急切地、实实在在地从全苏联范围内进行挑选。

中国方面将苏联专家工作中的所有弊病通报给苏驻华使馆,使馆再向莫斯科报告。根据惯例,上述情况将报告给苏联外交部的远东司,远东司传阅后再转交给有关部委。政府部门通过苏联使馆将处理结果通报给中国,苏联外交部是一个点,负责在华特殊项目管理工作的苏联各部委和各部门的所有答复,都将汇总到那里。俄国档案馆保存有一部分这类材料。

我们来展示一个有趣的例子,这是一九五九年八月三日,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在通信中给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副司长利哈乔夫的答复。信中提到向中国一四二厂交付“特殊装备”(指与军事有关的装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列宁全宗 猿全宗 源卷, 源四一—源四二。

②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列宁全宗 源卷, 源四二—源四三。

③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列宁全宗 猿全宗 源卷, 源四四—源四五。

备,甚或是武器)一事,该厂负责生产坦克发动机。阿尔希波夫解释说,延期向该厂交付特殊装备的原因在于,苏联工业在设计和制造这种设备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困难。^①

年代后期,苏联国防工业的能力已跟不上中国国防工业发展的速度了,上述例子并不是惟一的现象。苏联驻华使馆一秘扎尔科夫在他提交给使馆的关于对包头和大同市苏联援建项目的访问报告中,列举了有趣的证据。他写到,根据苏联专家们的陈述,苏联部长会议国防工业委员会忽略了向客户提供技术文件的有关问题。这位苏联外交官指出,包头第一兵工厂有时收到苏联方面的低质量文件,那些文件似乎是从苏联的工厂中仓促搜集来的,由此不得不在中国重新修订它们。^②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常见的敷衍马虎的情况。比如,提供给吉林电焊条厂的机器设备的生铁外壳内有水,结果其中一部分机器的外壳在西伯利亚被冻裂。^③

苏方无法达到中方关于加快速度的要求。中国工厂的总工程师赵阳要求苏联专家早于预定时间来华,尤其坚持要苏联的总工程师尽快来华帮助组织生产。^④

1955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1955—1959年苏联向援建和计划援建的海外企业提供设备及材料的输出量的决定。照此计划,苏联拟为其在华援建企业提供的设备和材料的输出总量为:1955年1.25亿卢布,1956年1.5亿卢布,1957年1.75亿卢布,1958年2.0亿卢布,1959年2.25亿卢布,1960年2.5亿卢布,1961年2.75亿卢布,1962年3.0亿卢布。^⑤但是,尽管按此计划作了安排和预期准备,这点是重要的,该计划却未能幸存下来。

苏联对华技术援助及其在中苏军事合作中的作用

苏联有关材料所显示的确切数据,反映了合作的量的方面的问题。我们认为,苏联外交部远东司这份由司长库尔久科夫签名的1955年12月10日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列宁全宗, 100全宗, 100, 100。

②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列宁全宗, 100全宗, 100, 100。

③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列宁全宗, 100全宗, 100, 100。

④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列宁全宗, 100全宗, 100, 100。

⑤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列宁全宗, 100全宗, 100, 100。

日的记录材料是极为可信的。相同的内容在该部以后的文件材料及苏联其他各部委的文件材料中，也曾出现过。

这份记录表明，根据苏联与中国之间签订的政府内部的协议约定，设想苏联方面将为中国 100 个企业及 100 个单独车间和工厂提供总价值为 20 亿卢布的设备并完成工程项目。1953—1957 年，苏联方面履行了自己的约定，有 100 个企业建成投产，100 个企业部分建成。此外，100 个单独车间和工厂已经投入生产。苏联各部门须向中国提供 10 亿卢布的设备。1953—1957 年期间，有 100 名苏联专家在华工作，其中包括工程师、工人、工长等。^① 在苏联援助下建成的企业都配备了先进的苏联机器，有些是苏联企业也尚未装备的。北京灯泡厂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该厂于 1957 年开始投入生产。^②

中国代表在与苏联官员的会见中，强调了苏联援建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因此，1958 年 1 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说，到 1957 年底，将有 100 个企业建成投产，其中有 100 个是苏联援建的，此援建总数以后增至 100 个。他还指出，实际上，投产企业的数字要比报纸公布的数字多。^③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中方从军事合作一开始就想限制苏联专家在中国的政治影响。我们认为，有必要就此问题援引苏联大使尤金与刘少奇在 1957 年 10 月 10 日的一次谈话。刘指出，顾问们在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作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因为他们对“所工作着的这个国家的特色很不了解。一些顾问们的政治性建议有时会带来相反的结果”。根据刘的意见，苏联专家培训各地人员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到了提出他们回国问题的时候了。^④ 这实际上是一个策略，稍后即产生了作用。到 1957 年，苏联专家的人数已减少了 100—100 人。^⑤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1953 全宗 100 全宗 100 卷 100 页 100。

② 贾丕才前引书，100 页。

③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1958 全宗 100 全宗 100 卷 100 页。

④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1957 全宗 100 全宗 100 卷 100 页。

⑤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1957 全宗 100 全宗 100 卷 100 页。

合作中的一些裂痕

1959年春,俄国的大众媒介发表了几份谈及 50年代中苏军事合作的记录材料。其中有两份看起来最有意思,它们勾勒出了苏联如何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导弹部队的图景。

第一份材料说的是 1959年 10月 20日,一枚防空导弹在北京上空击毁了一架台湾军队的高速飞机。这枚导弹是由中国的一支特种部队用 防空导弹发射装置发射的。武器的准备和人员的培训都是由苏联军事顾问进行的。随后在 50年代,这些装置用于越南,它们发射的导弹使美国空军损失了 一架军用飞机。^①

第二份材料也很有意思。它刊登在 1959年 10月 20日的军方报纸《红星报》上,讲述了苏联军人是怎样在 50年代后期帮助中国建立他们自己的导弹部队的。

几名苏联火箭专家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司令员指挥。他们由曾经参加过二战,任副旅长之职的经验丰富的专家亚历山大·萨韦列夫上校率领,他作为使用地战略导弹作战的总顾问,在中国几乎呆了一年。

萨韦列夫上校领导一支独立的专家小组,该小组直接隶属于帕维尔·巴托夫将军。后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官,他曾是二战的军事领导人之一,当时是苏联在华军事总顾问。

萨韦列夫上校虽然正式归巴托夫将军指挥,而且军衔比将军低好几级,但他实际上可以不执行巴托夫将军下达的那些与他从莫斯科接到的指示不一致的命令。换言之,在星级将军帕维尔·巴托夫面前,萨韦列夫上校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这或许不是偶然的,特别是在关于活动半径超过 1000公里的战略战术导弹技术不转让给中国这一问题上。而该项技术的转让正是巴托夫将军所一再坚持的,但萨韦列夫上校找到一个机会设法避免了执行这一命令,因为此命令与莫斯科的指令不符。这是上校自己当场作出的决定。上校使命的重要性表现为,他的莫斯科上司是两位导弹部队的指挥官,即炮兵元帅米特罗凡·涅杰林和陆军中将米哈伊尔·尼克尔

① 《莫斯科共青团报》1959年 10月 20日。

斯基。这只是许多这类事例中的一个例子，在当时有限的军事合作中，莫斯科将它关注的重点大量放在向中方转让技术材料的“量”的问题上。

1952年秋，萨韦列夫上校抵华数天之后，涅杰林元帅被任命为苏联国防部负责特种装备和火箭技术的代表，并从1952年10月起领导建立了战略导弹部队。萨韦列夫上校从莫斯科获得的援华权力仅限于 洲际弹道导弹 和 潜射弹道导弹，这种导弹的总设计师是谢尔盖·科罗廖夫，他是负责设计第一个人造宇宙飞船的富有实践经验的著名学者。

在北京的“导弹小组”由苏霍多尔斯基少校率领，他是卡普斯京亚尔火箭试验地的测试工程师。该小组人员主要负责向此工业项目介绍军事代表，并将建立在中国东北的试验基地转往戈壁滩。萨韦列夫上校对小组的工作进行总指导。

中国方面对苏联专家的专业技术培训工作评价很高。“苏联用新的、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我们的军队，还帮助我们掌握这些武器，苏军司令部派出了一名最好的导弹专家来华，”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欢迎萨韦列夫先生的宴会上说。^①

中国人认真研究了苏联火箭专家的经验，包括部队建制方面的经验；他们研究火箭各部分的使用次序，一个师及其所属部队的战斗序列，了解部队驻地的选择问题。苏联专家建议以一个团为建制单位。中国人接受了此项建议，并于一年的时间内在中国组建了 4个 导弹团，配备有 洲际弹道导弹 和 潜射弹道导弹。

总的看来，在评价苏联援助中国建立导弹部队的问题时，似乎有必要考虑到两种重要的情况：第一，苏联无意帮助中国建立或部署现代化的进攻性火箭系统。第二，在华苏联火箭系统的建立受到两国总的政治关系的影响。当这种关系结束时，两国之间在这个领域的合作也即告终止。

在发展核能领域中的合作

这项合作在双方关系中占有特殊的位置。1952年 7月 14日，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 5个）扩大了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中的合作，

^① 《红星报》1952年 7月 14日。

于莫斯科附近的小城杜布纳建立了联合核研究所。

作为该研究所的发起国,所里的建设费用和日常开销,绝大部分由苏联(1954)和中国(1954)承担。原俄罗斯科学院核研究所、电和物理实验室都被纳入到这个新研究所中。上述实验室拥有巨大的原子核研究加速装置、世界上最大的同步回旋加速器等。稍早一些时候,1954年10月26日,苏中两国政府签订了一个协定,拟由苏联帮助中国进行核物理研究及以和平利用为目的的核试验。计划不仅要在1954-1955年帮助中国设计和建造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而且还要无偿提供有关原子反应堆和加速器的科学技术资料,帮助装配原子反应堆并使之正常工作。合作很快即见成效。1955年10月15日,在距北京不远的地方,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功率1万千瓦)和1兆电子伏特回旋加速器建成启用。^①中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在建成典礼上讲话,强调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投入使用,适应了工农业生产高速发展的需要,并将有利于生产力的高速发展。^②然而,苏联并不准备把制造核武器的技术传授给中国。

二、双方核合作中的问题

这些问题在双方军事合作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它们还不是主要的问题。莫斯科准备与中国共同使用那些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及其他装置。

(一) 中国急于获得核武器及苏联对这一问题的态度

即使今天,我们仍在争论中国对核武器问题所持的态度,以及这个国家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想研究核武器的真正动机。然而,中国明白,要完成这一领域的研究项目,没有苏联的帮助,虽然不是不可能,但会很困难。这或许就是很多当时的有关材料无法使用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1950和1950年代,学者们分析中国战略部署的惟一方法就是研究中

^① 1954年10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原子核物理研究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协定规定由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功率为1兆千瓦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兆电子伏特的回旋加速器。在苏联专家协助下进行选点工作,确定以北京某地为一堆一器的建设基地。1955年10月,一堆一器建成。参见《当代中国的核工业》,1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校者注

^② 《消息报》1955年10月15日。

国的公开声明和来自西方情报部门的有价值的报告。

苏联领导集团似乎最终也未弄清楚中国为什么需要核武器。中国领导人回避就不使用这些武器问题作出明确声明，而代之以一些含糊的解释。时至缘年代，中国人民还有员年革命胜利时的喜悦感。中国领导人不能不考虑到这个事实，并相应地作出适当的声明。

在缘年代，莫斯科注意到了这些声明，但通常是回避对此作出任何反应。但到后来，在缘和远年代，中苏之间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激烈之时，莫斯科开始在宣传中利用这些声明来披露中国领导人的哲学和思想认识。我们可以摘引毛在员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来作为一个有趣的例证。这些话被刊登在苏联员年缘月的大众传媒上。毛说：战争，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害怕战争。如果发生战争，就有人民被杀害……我认为原子弹并不比大刀更可怕。即使在这场战争中人类有一半丧生，也没有关系，只要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活着，就没有什么可怕的。^①

苏联领导人感受到了中国当时存在的这种情绪，使他们对将核武器研制技术转让给北京持否定态度，因为这项技术将会给北京以制造自己的原子弹的机会。

(圆) 双方核合作的最初阶段和对随后而来的限制问题的看法

在今天看来，似乎有这样几个阶段，其中有的阶段很重要。

第一，缘年代中期。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已转入社会主义体制，苏联援助它发展它们自己的核计划不会损害苏联本国的利益。大约与此同时，中国作出了一系列决定，这些决定证实了中国要研制这种炸弹的意图。当中国已经有了一项核能计划并开始实施时，苏联很快即向它提供了一个原子弹样品 (员年)。^②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获

^① 《真理报》员年缘月员日。

^② 根据员年员月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但事后苏方以种种借口拖延不给。员年远月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提出暂缓按协定向中国提供上述物品和资料，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参见《当代中国的核工业》页。——校者注

得核武器，中国把这一计划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

第二，1950年代末期。中国试图用苏联核武器的威慑力来增加自己的政治分量。这点在1955年 12月中国外长陈毅的讲话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他强调说，中国打算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苏联在1955年 12月间的台湾海峡危机中支持中国，并宣称它将不允许美国或日本进攻中国。同时，苏联也让北京知道，它不打算支持中国借苏联核武器的援助来实现其对台湾海峡的政治目的。

台湾海峡危机结束之后，莫斯科对援助中国制造核武器问题的态度流露出一种不幸的迹象。鉴于中国的经济实力还很薄弱，莫斯科知道，即便在中国搞出自己的核武器之后，它也仍需多年才能形成一种足够的打击力量。例如，能够幸免于敌人的第一次核打击。正是由于此原因，莫斯科认为，中国拥有核武器，从政治角度看，将有助于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方面的转化。

第三，1950年代初期。在这一阶段，苏中政治关系已经趋于冷淡，莫斯科认为没必要再帮助中国发展它的核计划了。不过这并未严重影响到中国的这一计划，因为中国专家已经弄清了苏联和美国是如何解决那些理论技术问题的，并着手解决工程问题了。

根据查尔斯·霍尔诺的论述，苏联提供的反应堆（装置在北京附近）是中国1955年时仅有的核装置，到1956年底，中国已能从100公斤的铀里提取足够的浓缩铀，约为制造一颗原子弹所需的量。霍尔诺先生认为，中国在燃料供应上要依赖苏联生产的浓缩铀这一点，是中国开始寻找自己的浓缩铀资源的原因。所以，霍尔诺认为，中国在1956年 12月完成第一次核试验期间所使用的浓缩铀，是由建在甘肃兰州的铀浓缩厂生产的，几乎没有苏联的帮助。^①

中苏核合作中止之后，1956年 12月中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事实，部分为周恩来的下述谈话所证实。1956年 12月，周恩来在会见一名美国记者时谈到中国原子弹爆炸之事，他说：“感谢苏联撤走专家的行动，中国

^① 查尔斯·霍尔诺：《核武器的生产》，载威廉·惠特森主编：《1950年代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力量》，1956页。

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了。^①

(俄) 苏联决定中止与中国核合作的原因

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惟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想失去自己的核垄断地位。由于意识形态相同，莫斯科开创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由政治性偏见而致分化的先例。另外，在中国与苏联决裂及其拥有核武器的事实已被知晓之后，这个国家的方针开始主要倾向于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然后是南斯拉夫。

第二，或许，尽管没有公开说，苏联害怕中国利用其拥有核武器的事实，先对小国，而后是其他国家进行核讹诈。

第三，如果对中国的核技术转让使之制造出它自己的原子弹，那么对苏联的国家安全来说，则前景堪忧。

莫斯科试图将中国对苏联及其卫星国进行伤害的危险，减小到最低限度。

结论：对合作的政治评价

缘年代苏中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相当密切，尽管其过程没有公开报道。对苏联来说，这种合作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完全可以说，苏联在中国建成的 圆个工业企业，构成了中国经济及国防建设的基础，但耗用了苏联自己相当大一部分经济潜力。战后，在苏联的技术援助下，中国建立了 圆个企业，已有 圆个投产，其中的 圆个（圆个）是工业企业。^②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中国国家计委副主任顾卓新这样说，至 缘年底，有 圆个大型工业企业部分或全部投入生产。^③

莫斯科统计，苏联援华企事业建设项目的出口总值为 怨亿卢布，其

① 《纽约时报》缘年 缘月 圆日。

② 《缘年来的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缘页，莫斯科，缘年。

③ 《真理报》缘年 缘月 圆日。

中所提供的设备的出口值总计达 100 亿卢布,技术援助的出口值为 10 亿。^①在 1955 年,出口价格 1 个卢布约等于国内价格 1 个卢布。考虑到 1955 年苏联的国民总收入约为 1000 万亿卢布^②,这些建设费用也即约占苏联年国民收入的 0.01%。

可以从另一角度看这些数字。1955 年,苏联当局作出一项决定,开始为公民修建每套价值 100 万卢布的小公寓。这样,苏联在中国工业企业建设中投入的资金能够修建 100 万个公寓。这对解决住房问题会是一个重要贡献,而这个问题即使到现在, 1980 年代中期也仍未解决。

上述提到的苏联送交中国的全部设备中,约有一半是建造军事企业和工厂所需的设备。据苏联专家言, 1950 年代末,国防费用约占中国国家预算的 10%。^③这是一笔庞大的支出预算项目。

在中苏关系冷却时期(1960-1970 年代),苏联传媒声称,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不可能生存。中国则相反,贬低苏联援助的重要性。对同一问题持这样两种极端的观点,几乎无法改善两国的关系,而且实际上进一步导致了分裂。作为一个原则,作者在中国和苏联发表论文时,都回避把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命题。至少这种合作是双方受益的:苏联为它在远东的盟国创建了工业实力,而中国则增强了自己的国防力量。两国实际上是在 1960 年代初终止军事合作的。另一个重要的事情是,在合作结束时,中国从中得到了很多,并没有被“困住”。

(本文系作者提交 1995 年 1 月“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张丽华译,李丹慧校。)

①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1955 全宗 100 全宗 10000 卷 10000

② 根据 1955 年 1 月 21 日《真理报》赫鲁晓夫的文章中提供的数字计算得出。

③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1955 全宗 100 全宗 10000 卷 10000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远东与苏中关系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 塔·特罗拉科娃

引 言

在冷战时期，苏联远东地区对于苏联来说具有独特的军事意义，它作为东亚地区的一个社会主义堡垒必须予以坚守，为此，“国际局势要求远东地区人民保持战斗准备，加强地区防御，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①。

历史上，苏联政府将其远东地区看作是一个需要永远进行军事保护的脆弱的边境地区。尽管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1955 年曾经有过一个苏中友好的短暂开放期，但此后，苏中的人民之间、国家企业之间和政府机构之间没有自由交往。直到 20 年代末，这一地区仍然较少受到外来影响，处于相当隔离的状态。

20 年代至 50 年代期间，苏联远东地区与其邻国之间经济上的联系极为有限。地区经济完全适应于军工生产的需要，适应于建立自给自足经济的需要，以使该地区在成为战争前线时具备支撑战时状态的经济能力。随赫鲁晓夫时代的到来，苏联远东地区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服从于满足国家

① 《苏共滨海组织的历史评述》，第 107 页，符拉迪沃斯托克，1986 年。

总体需要的任务。这即是说要首先集中发展某些部门,开发其特有的、最经济的自然资源。这个计划在赫鲁晓夫 1959 年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南萨哈林斯克、共青城和 1962 年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系列访问活动中开始实施。

本文的目的在于考察赫鲁晓夫时期苏中关系对苏联远东地区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影响。文中首先考察可供参考的资料和书籍,然后对苏联远东地区的状况及其与中国东北地区交往的发展情况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文章结束部分将探讨对这一地区具有积极影响的一些因素。

资料来源

本文资料来源于档案文件、当地出版发行的报刊、前官员的回忆录及访谈录。滨海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的资料揭示了苏联远东地区与中国东北地区关系发展的过程。

最有价值的是有关共产党地方组织活动情况的材料,因为每一个步骤的实施都须经过边疆区地方党组讨论决定。所有关于这些活动的材料都是保密的。笔者在利用这些材料研究此类活动的过程中,曾遇到过种种障碍。1985 年,不仅在滨海边疆区,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有关共产党的文件资料也交给了区的国家档案馆。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前苏共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仍被留用,到 1988 年档案资料的解密工作已基本完成。而滨海边疆区苏共档案馆的所有职员却不幸地遭到解雇,由于新聘人员缺乏工作经验,致使档案文件的修订及解密工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这里有两种途径可以接触到秘密档案资料。第一种是获得特别允许,即以一种公开研究的方式查阅档案文件。第二种途径是向滨海边疆区国家档案馆解密工作委员会递交一份报告书,批复需待几个月,但学者总还是能够获得若干有用的材料。

有几份资料是 1959 年 5 月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访问符拉迪

沃斯托克和哈巴罗夫斯克期间的会谈速记记录^①，其中包括关于渔业状况、地方贸易组织，以及在该地区经济领域中使用中国劳工等问题的讲话。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存有帕沃尔·沙宁的个人档案资料，其中包括日记、笔记本，还有他从 1953 年至 1955 年作为木材加工业的领导人，和哈巴罗夫斯克执行委员会（边疆区委员会）代理负责人期间的有关活动纪要。我曾就帕沃尔·沙宁在 1953 年访问黑龙江省，参与苏中科学家考察阿穆尔河的工作，以及在 1954 年为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访问做准备工作等问题，对他进行过一次采访。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存有一份关于赫鲁晓夫访问哈巴罗夫斯克计划的文件，1954 年 10 月 20 日区地方党组会议曾讨论过这个计划。^②

我第二次采访了尼古拉·舒拉诺夫，他是 1953 年共青团市委第一书记，曾在 1954 年 10 月 1 日与赫鲁晓夫有过一次私人会谈。舒拉诺夫还是苏共二十大的代表，并在 1953 年至 1955 年期间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代表。上述这两个经验丰富的人现居住在哈巴罗夫斯克。

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有关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期间苏中关系的文件资料还包括有代表团互访、苏中友协活动、边境贸易以及科学合作等方面的文件。这些文件表明，苏联远东地区的苏中关系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严密控制下受到限制。苏联代表团的名单以及与外国开展的任何形式的活动，都须经由地方党组根据莫斯科的指示讨论决定。由于缺少中央有关决定出台过程的材料，所以分析当时的形势是较为困难的。根据规定，所有这些有关指示、命令的文件都被送交莫斯科。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档案馆仅存有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关于经济问题的决定。另外，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有一份关于俄罗斯—苏联—中国关系文件的特别目录。^③

① 滨海边疆区国家档案馆，类号 孕-152，序号 1，卷号 1-1954，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类号 孕-152，序号 151，卷号 151。

②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类号 孕-152，序号 151，卷号 151-151。

③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哈巴罗夫斯克文件目录“1953-1955 年远东地区的中国人”，1953 年（手稿）。

利用其他材料创作一幅苏联远东地区的多彩图景是有必要的。《历史问题》杂志 1955 年至 1956 年连载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中就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细节。^① 例如，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提到了苏联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使用中国劳工的计划。遗憾的是，我在查阅地方档案的过程中，没有找到有关在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使用中国劳工的任何文件，以及赫鲁晓夫所说的苏联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有 100 万中国劳工的材料。^②

地方报纸《红旗日报》(滨海边疆区)和《捷库金斯之星日报》(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是最便利和有效的信息来源。报刊上的标题、消息和文章有助于观察到苏共和苏联政府政令出台的发展过程。正如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谈道的：“我们有一种习惯性认识，即我们的报刊仅有权公布允许披露的材料，而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一切都受到来自中央机构的控制。”^③ 例如，滨海边疆区《红旗日报》关于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 1955 年 10 月访问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情况的报道，即是转载自《真理报》的一则题为“苏联政府代表团回到莫斯科”的消息。^④ 然而，1956 年后，当赫鲁晓夫成为“伟大领袖”时，报纸则大量报道并刊登有关他访问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消息和图片。1956 年 10 月，地方出版社专门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赫鲁晓夫在滨海》的小册子，收录了赫鲁晓夫的讲话和以“今天我很高兴”、“这些事情令人难忘”为题的普通老百姓的评论。^⑤

由于有关地方一级苏中交往情况的消息和材料的大量公布，较容易从中了解到苏中关系发展的水平。而报纸上关于苏中关系的官方报道则仅为两国间的谈判、1955 年和 1956 年苏联对华援助一类的消息。1956 年，地方报刊报道了更多的具体事例。例如，一位苏联医生拯救了一个患病的中国女孩子的感人故事。作者描述了一个美好的结局：“从苏联伊曼市的虎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连载于《历史问题》杂志 1955(4)、1955(5)、1955(6)、1955(7)、1955(8)、1955(9)、1955(10)、1955(11)、1955(12)、1956(1)、1956(2)、1956(3)、1956(4)、1956(5)、1956(6)、1956(7)、1956(8)、1956(9)、1956(10)、1956(11)、1956(12)。

② 《赫鲁晓夫回忆录》，载《历史问题》1955(10) 367 页。

③ 《赫鲁晓夫回忆录》，载《历史问题》1955(10) 367 页。

④ 滨海边疆区《红旗日报》1955 年 10 月 10 日，第 1 页。

⑤ 《赫鲁晓夫在滨海》(1956 年 10 月 10 日)，见《红旗日报》1956 年 10 月 10 日，第 1 页。

头镇上，可以听到中国姑娘唱着俄罗斯的歌曲，这是友谊的象征。”^① 1952年夏天，《涅库金斯之星日报》报道了一些“来自中国的客人”的情况，因为这是第一个来自黑龙江省的官方代表团。^② 在以后的几年中，地方报刊报道了更多有关苏中之间地区性交往的消息。诸如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和共青城与长春和哈尔滨之间，工人、教师、共青团员和工会代表团的互访；一些地方博物馆和工厂展出“中国朋友”赠送的礼物，地方友好协会从1952年起举行一些会议和宴会，举办中国工人“大跃进”成就展，来自哈巴罗夫斯克和共青城的工厂的援助等消息，都刊登在这些报纸上。1950年代苏中敌对的紧张关系改变了报纸报道的内容和方式。无论发生哪种情况，苏联的报纸只陈述官方对事件的看法。

赫鲁晓夫时期，有关苏联远东地区发展的政策性指令直接反映在已出版的书籍中。《苏联远东史》一书中即有大量关于这方面的材料。^③ 该书由苏联远东人民历史、考古及民族学研究所研究人员集体撰写，于1955年出版，注有“仅供官方参考”的表示保密等级的字样。这是典型的勃烈日涅夫时期的产物。1953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历史研究所的学者们举办了一次特别辩论会，讨论关于本地区1947年12月至1953年12月历史进程的新构想。辩论结果刊登在《俄罗斯和太平洋》杂志上。^④ 1953年底将准备讨论关于俄罗斯远东历史的新译本。这部最近出版的由约翰·史蒂芬撰写的《俄罗斯远东史》^⑤，是一部基础性的、有用的著作。作者了解对于俄国的远东来说，什么是正常的和进步的。然而，这毕竟只是美国人的观点。

① 瓦莫洛佐夫：《发生在边境的故事》，《红旗日报》1952年1月1日，第176版。

②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涅库金斯之星日报》1952年1月1日，12月12日，12月18日。

③ 《苏联远东史（从原始公社时期到当代）》，战后苏联远东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第1卷，第12册，苏联社会主义的决定性胜利，1953年～1953年12月，符拉迪沃斯托克，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人民历史、考古及民族学研究所，1955。

④ 《关于俄罗斯远东1947年至1953年历史进程的新构想》，载《俄罗斯和太平洋》杂志1953年12月17日。

⑤ 约翰·史蒂芬：《俄罗斯远东史》，斯坦福，1953。

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远东

1956年12月赫鲁晓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这是苏联历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始。赫鲁晓夫政治权力的逐渐巩固,有助于他战胜斯大林主义,实现民主改革的设想以及经济结构的非集中化。

赫鲁晓夫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他认识到应该停止强烈的军事力量的对抗,以适应新的国际形势。作为共产党的领袖,他首次出国访问即是以庆祝中国革命胜利五周年的名义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苏中两国领导人签署了几份重要的文件。^①

在从中国返回苏联途中,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访问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南萨哈林斯克、赤塔、安加尔斯克、伊尔库斯克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此前,党的领导人从未访问过这些地区。这次访问,对赫鲁晓夫来说是一个好机会,使他能够了解到当地的情况,取得当地的支持,或是撤换地方党的领导干部。1956年12月,苏共中央委员会作出了一项关于“加强远东领导班子”的特别决议。阿维尔基·阿里斯多夫被从哈巴罗夫斯克召回莫斯科。德米特里·美尔尼克由于不执行命令,被解除了在滨海边疆区的职务。滨海边疆区委领导人的职务,1956年由 霍沙塔林担任,1957年至 1958年由特伦蒂·什特可夫担任。

当时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氛,报纸没有就此事透露消息。在苏联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之后,官方才于 1956年 12月 14日报道了此次代表团之行。与此同时,在未发布代表团回到莫斯科的消息之前,《真理报》发表了一篇《东部地区正在开发其资源》的社论,地方报刊予以转载。^②这篇社论简要阐述了发展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规划,呼吁人民共同参与这一计划的实施。显而易见,这是赫鲁晓夫此次访问过程中讲话的主题。赫鲁晓夫 1956年 12月 14日在哈巴罗夫斯克讲话的副本,内容为对该地区发展问

① 更详尽的材料可见 符拉蒂米洛夫:《1945年代至 1955年代的苏中关系》,第 1-14页,莫斯科,1956。

② 《红旗日报》1956年 12月 14日,第 1页。

题的建议。其中有一项关于改善该地区渔业和贸易状况，立即采取步骤，通过提供渔产品和本地农产品改善当地人民食品供应的指令。^①

在 1953 年 10 月 1 日至 3 日的 3 天当中，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视察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乘“加里宁”号巡洋舰参观了俄罗斯岛和那霍德卡港，观看了海军演习，并组织了一次与当地领导人和渔民的会见。赫鲁晓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讲话的副本至今仍然是保密的。1953 年 10 月初，滨海边疆区委书记 1953 梅尔尼克曾谈到，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同志的批评意见和指示对区党组未来的工作部署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这也是关于农业发展规划的一次最直接的意见和指示。^②

苏联远东地区是一个缺乏劳动力资源的地区。1953 年赫鲁晓夫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讨论了关于在苏联远东地区使用中国劳工的计划。^③米高扬在哈巴罗夫斯克谈及这一设想时说：“我们与中国有着兄弟般的友好关系，我们计划加强这种关系。这其中有一个协议仍未公布，那就是中国将向我们提供劳动力，我们也将计划协调满洲与远东地区的经济关系。”^④

然而，这个设想没有真正地落实。赫鲁晓夫解释说：“我们决定停止将中国劳动力迁移到西伯利亚和苏联远东地区。”^⑤就我的看法，赫鲁晓夫是在 1950 年代中国敌视苏联这种状态的强烈影响下作此表述的。帕沃尔·沙宁在哈巴罗夫斯克曾参与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的会见。1953 年沙宁已是哈巴罗夫斯克林业部门的领导人，他谈到当时有一项为中国工人准备住房的特殊命令。但是后来又接到新的指令，为从国内中央地区来的移民提供住房。^⑥尼古拉·舒拉诺夫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1953 年至

①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类号 孕-猴，序号 远，卷号 圆，页码 远，1953 年 10 月 1 日。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同志参加的苏共边疆区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副本，1953 年。

② 《红旗日报》1953 年 10 月 1 日，第 1 版。

③ 《赫鲁晓夫回忆录》，载《历史问题》1953（第 1 卷）第 1 页。

④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类号 孕-猴，序号 远，卷号 圆，页码 远。

⑤ 《赫鲁晓夫回忆录》，载《历史问题》1953（第 1 卷）第 1 页。

⑥ 1953 年 10 月 1 日，在哈巴罗夫斯克采访帕沃尔·沙宁同志。

1955年期间,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没有中国工人,当时只有来进行临时性专业培训的中国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小组。^①那时的地方报刊未报道过有关中国工人在工厂和农场的消息。此外,一些报纸仅在1955年至1956年报道过这个地区从中国来的客人的材料。如果能找到有关中国为苏方生产建设项目和社会文化设施建设项目,以及开发苏联远东地区森林资源提供劳动力的合作协议书文本,将是有用的。

赫鲁晓夫为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风光所陶醉,他说:“这是美丽的地方!把城市设置在山岗上真是太妙了,还有风景如画的港湾,岛上覆盖着翠绿的草皮,美妙的大自然!”^②当地居民仍然把赫鲁晓夫当作恩人记在心中。1955年,根据“关于大力援助符拉迪沃斯托克房屋、公共和文化设施建设的措施”的特殊决定,市政基础设施的重建开始了。但是,这还是不够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仍在等待赫鲁晓夫1955年10月的下一次访问。1956年,又一个城市改造方案出台。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之后,则诞生了将符拉迪沃斯托克变成第二个旧金山的计划。

“赶超美国”的口号在那个时期非常流行。与“关于赫鲁晓夫同志访美结果”及“关于赫鲁晓夫同志访美成果的说明”等文件精神相应合,从1955年10月10日起,苏联远东地区掀起了宣传运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存有一份1955年10月的文件,这份有意思的文件是“赫鲁晓夫同志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访问和停留的计划”^③。帕沃尔·沙宁和尼古拉·舒拉诺夫谈到有关为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1955年12月来访作周密准备的情况。仅在12个月之中,哈巴罗夫斯克就重建了两幢住宅和一些宾馆,并重新修筑了通往机场的道路。^④1956年春苏美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时,重建工作没有因此而停滞,哈巴罗夫斯克为此次会面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在太平洋镇,当地一些学院的教师向赫鲁晓夫发出了一

① 1955年10月10日,在哈巴罗夫斯克采访尼古拉·舒拉诺夫同志。

② 《红旗日报》1955年10月10日,第17版。

③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类号孕-猴,序号苑,卷号1955,页1-5页。

④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类号砸-1956,序号员,卷号1956,页1;1955年10月10日在哈巴罗夫斯克采访帕沃尔·沙宁;1955年10月10日在哈巴罗夫斯克采访尼古拉·舒拉诺夫。

封邀请信，这封信登载在《堪库金斯之星日报》上。^①但是，赫鲁晓夫没有，艾森豪威尔也没有访问哈巴罗夫斯克。

远东地区的重要性有所增强。然而，尽管有发展该地区渔业、建设新工厂和增加人口的种种决定，苏联远东地区经济发展的步伐与其他地区相比还是缓慢的。在 1951年至 1953年期间，苏联远东地区人口的增长主要是通过移民来实现的。地区行政部门组建了负责移民和征募劳动力工作的机构。来自于国内中央地区的移民大多受到了诸如“我们这个发展综合性工业经济的边疆区成为国家最富裕和最美丽地区的日子就在眼前了”等种种宣传的吸引。^②

俄罗斯、乌克兰、摩尔达瓦、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等民族构成了这一地区的主要民族。本地人如朝鲜人和中国人是这里的少数民族。在苏维埃政权统治的几十年当中，苏联远东地区形成了以俄罗斯为中心的社会氛围。

1951年至 1953年期间，苏中关系以特有的方式飞速发展。主要目标是开发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并帮助发掘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阿穆尔州与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经济潜力。

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1951年 12月 15日 裕尔根斯基第 10号决定，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决定批准与中国朋友会谈的计划。^③这是一份带有官员姓名的详细的会谈进程计划。1951年 12月 15日至 12月 16日，以中共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冯纪新同志为首的 12名党的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哈巴罗夫斯克、共青城、比罗比詹，然后又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起草了一份有关中方共产党代表团此次之行的特殊报告，送往莫斯科。^④

苏联官方代表团于 1951年 12月从哈巴罗夫斯克启程前往黑龙江省。

① 《堪库金斯之星日报》1951年 12月 16日，第 1版。

② 滨海边疆区国家档案馆，类号 1000，序号 15，卷号 1，页。

③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类号 孕-1000，序号 16，卷号 1，会议记录部，1951-1951页。

④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类号 孕-1000，序号 16，卷号 1，1951-1951页；1951年 12月 16日苏共边疆区第 10号会议记录材料，1951页。

1952年12月15日中央才批准了此行的代表团的名单^①,代表团的领导是阿烈克赛·车尔尼依,1952年他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第二书记,1950年至1952年为该区第一书记。帕沃尔·沙宁在当时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的代表,1952年12月他也访问了黑龙江省。当问到他对此访问的印象时,他说:“我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我们国家在那里建造了那么多工厂,送去了新的设备(在我们的工厂里没有新的设备),但是那些工厂里却没有有效率的工作,因为中国缺乏高素质的工人。”^②在1952年12月我们的会谈中,沙宁谈到他仍然对中国人抱有一种消极的看法。

1952年,沙宁当时也随同科学考察队一起在阿穆尔河工作过,他还撰写过有关使日本海的暖流流向鄂霍次克海的科学设想。^③1952年至1950年,苏中在流体力学、地质学、土壤学和植物学的科学研究方面加强了合作。阿穆尔综合考察工作可以称之为是加强苏中两国科学家之间和地方官员之间友好关系的一个事例。^④

1952年苏日声明的签署和1952年贸易协定的签订,促进了苏联远东地区对外贸易和旅游业的发展。根据1952年12月15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决定在哈巴罗夫斯克组建一个旅游机构。^⑤

但不管怎样,对外部敌人保持高度警惕仍然是远东地区奉行的持久性方针。约翰·史蒂芬以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例^⑥,描述了这种“边境社会”。1952年至1950年期间,地方当局还就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1952年12月15日哈巴罗夫斯克当局作出了“关于协助边防部队保卫国家边境”的决

①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类号孕-猿猿,序号猿,卷号猿,第122号会议记录部,22页。

②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类号砸-1950,序号1,卷号1,22页。

③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类号砸-1950,序号1,卷号1,22页。

④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类号1,序号1,卷号1,22页。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会议记录“关于共同参与边疆区主办的阿穆尔河综合考察队的工作……”22页。

⑤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类号孕-猿猿,序号猿,卷号1,22页。

⑥ 约翰·史蒂芬:《俄罗斯远东史》,22-23页。

定，并采取了组建当地居民特种联防队等措施。^① 1952年 6月内务部边防军部门领导人奥尔洛夫在谈到关于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内发生的几起渗透事件时说：“去年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逮捕了一名入侵者，经揭露是美国间谍，他从南朝鲜经过中国进入苏联。第二件事发生在 1952年 8月 20日。苏联境内的居民受好奇心的驱使，或者由于爱情事件闯入了中国边境一侧。这是什么？被视为侵略行径还是流氓行为？”^② 这番话是“边境社会”和“保持高度警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1952年 12月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讨论了阿穆尔河上“施托姆”号船侵犯边境的事件。该船队在一个岛上救了 12名中国人，但他们没有将此事向有关当局报告。与这条船有关的第二件事是，该船于 1952年 12月随船队在阿穆尔河上拦截原木，并将这批原木卖掉。苏联边防军要求船队将原木买回并送往中国一侧。当局为此事将这艘船的船长撤职。^③

然而，在我个人看来，当地边境居民擅自闯入邻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而河流分界线的不明确则演化成为 2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乃至恶化的根源。

黑龙江省和吉林省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贸易伙伴。边疆区从中国东北地区进口消费品和食品，将工业产品出口到中国。一份消费商品目录就是反映 1952年边境贸易水平的一个例证：从中国进口的食品——100卢布，消费品——100卢布。从苏联远东出口的食品——100卢布，消费品、汽油和木材——100卢布。^④ 中央政府通过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该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苏联对发展边境贸易

①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类号 孕- 獾，序号 苑，卷号 缘，有关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决议执行情况的小册子：《关于协助边防部队保卫国家边境的决定》，1952- 1952页。

②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类号 孕- 獾，序号 苑，卷号 缘，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检察院、法院和内务管理局工作人员共同召开的边疆区会议速记记录，1952- 1952页。

③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类号 孕- 獾，序号 苑，卷号 缘，记录第 缘号，1952页。

④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类号 孕- 獾，序号 苑，卷号 缘，记录资料第 缘号，1952~ 1952页。

感兴趣源于其对多种消费品的高度需求。进口多种商品,主要是考虑到这有助于满足当地居民对消费品、水果和蔬菜的需求。

结 束 语

苏联远东地区与毗邻的中国地区相比,经济上更为发达。这两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均受到各自中央政府的强有力的控制。然而,俄罗斯和中国民间的直接交往却以互利的形式发展着。赫鲁晓夫的解冻政策,对苏联远东地区发展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一个良好的机遇。但是,苏联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在成功地访问了美国之后,赫鲁晓夫前往中国出席中国国庆十周年典礼。在这期间,滨海边疆区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代表团访问了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与此同时,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巴罗夫斯克举办了庆祝中国国庆招待会。遗憾的是,就这个地区而言,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开放期,不久,两个毗连国家人民之间的一切联系就都中断了。1955年苏联和中国之间官方关系的恢复是东亚地区最具发展意义的一件事情。

(本文系作者提交 1995年 11月“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李丹慧译。)

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杨奎松

世

界各国的共产党，曾长期集合在莫斯科的周围，接受同一个指挥中心——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社会主义的苏联，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在各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毫无疑问曾长期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身为共产党人，并且极大地受益于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毛泽东，在这方面自然也绝难例外。中国革命刚一胜利，毛泽东就主动宣布新中国将向苏联“一边倒”，并迅速与苏联建立了互助同盟关系，清楚地反映出苏联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但是，曾几何时，中共与苏共之间竟反目为仇，双方关系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本改变。众所周知，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毛泽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何以会有如此之大的改变呢？简单地把这一切归结为毛泽东的民族主义观念，严格说来并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事实上，毛泽东对苏联看法的改变过程是曲折的，而导致他改变对苏联看法的原因也是相当复杂的。如果概括起来说，至少应该从四个方面来解释。第一，是历史上的恩怨；第二，是毛泽东独特个性的作用；第三，是民族利益上的矛盾；第四，是革命理念上的歧异。以下仅就这四个方面的分别加以分析说明。

关于历史上的恩怨

毛泽东与苏联的关系一向很复杂。青年时代,他就深受俄国革命的影响,当年的青年学子几乎无不想方设法留日、留法、去南洋,而他想的却是“不如留俄”,“因为俄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文明国”。^① 加入共产党之后,毛泽东又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提出“欲拯救中国惟有靠俄国的干涉”的共产党人。^② 当 1927 年中国革命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时,同样又是毛泽东最鲜明地主张,“打到苏联边界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军事上(得到)飞机大炮”,再来向东发展。当 1937 年抗战胜利前夕,中共已经相当壮大时,毛泽东对苏联更是寄予厚望,以致有“苏联援助一定会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的公开承诺。^③ 由此不难想像,当 1949 年中国革命眼看就要夺取全国政权之际,毛泽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应当访问苏联,向斯大林当面请教建国方略并缔结互助同盟。他甚至力排众议,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公开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外交路线。

说起来,在毛泽东的成长道路上,俄国人也确实助力颇多。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最早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称赞的一份中共文献。“朱毛红军”一度是莫斯科报纸上有关中国革命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名词。毛泽东的文集更是俄国人出版的第一部中共领导人的著作集。因此,不管 1920 年代初期毛泽东在党内的境况如何,俄国人始终在报纸上把他视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领袖,共产国际甚至公开颂扬他是世界革命仅有的几位“旗手”之一。以至于,一方面中共党内某些领导人想方设法排挤毛泽东,另一方面共产国际领导人却出面干预,肯定毛有丰富经验,让

^① 毛泽东给陶毅的信,1920年 8月;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1920年 7月 15日。见《新民学会资料》,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② 有记录可查的这种谈话即有两次,1927年 12月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在另一次毛强调:“要帮助中国开展运动,惟有靠俄国的积极支持(外交和军事上的)。”见李玉贞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194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3。

^③ 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 7月 15日。

毛进入了政治局，最终并且公开出面支持毛泽东做了中共的领袖。

但是，至少在毛泽东自己看来，与他对苏联的期望值比较起来，莫斯科实在做得太少。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不了解《真理报》对“朱毛红军”的态度，不清楚共产国际和苏联是否肯定过他的功绩；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即他长期感受到少数言必称苏联的留苏学生的歧视、压制和打击。他确信，他和中国革命不仅没有得到过莫斯科任何直接援助，而且往往被怀疑、被阻碍。这些断断续续发生在 1940年代前半期和 1950年代中后期的不愉快往事，给毛泽东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这里惟一的例外只有一个季米特洛夫，对这位共产国际后来的总书记在来自莫斯科的王明等人企图取得党的最高权力时，于 1955年公开出面支持了他，使他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感念至深，但仅此并不足以使他对莫斯科领导群体的能力产生由衷的崇敬之情。他显然渐渐得出结论，莫斯科虽然确实有“好人”，却未必比他更懂得中国革命。^①

领导中国革命的高度自信，导致毛泽东在取得对中国共产党的完全领导权之后，迅速走向了独立自主。1950年代初，面对国共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冲突，和莫斯科极力要求他与国民党妥协的做法，双方终于发生了意见分歧。

毛泽东早在抗战开始之际就提出过一系列关于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防人之心不可无”之类的策略原则，强调自我保护。后来，因为这一观点不能得到党内和军内多数领导人的理解与拥护，再加上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带来共产国际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指示，毛泽东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一度致力于巩固与发展国共之间的统一战线。^② 随着 1955年以后中共在敌后大规模独立发展局面的出现，国共之间围绕地盘和政权问题的摩擦与冲突愈演愈烈，毛泽东不能不重

^① 在 1955年秋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对曾经负责和指导过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领导人作过详尽的介绍，毛泽东明确肯定了斯大林、莫洛托夫、季米特洛夫等人的积极作用，但给他们的评价仅仅是：“好人。”

^② 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1987年，188-18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新开始高度重视与国民党的斗争问题。而 1939 年秋天欧洲战争爆发前后,共产国际重新举起反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旗帜,为他在思想上否定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强调斗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观点表现出相当高度的政治热情。想不到,一年以后,德国威胁再度迫近苏联,共产国际重又强调统一战线,极力主张国共缓和。这种把苏联利益置于中共利益之上的做法,使毛泽东难以理解。双方之间的意见分歧即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围绕着 1939 年初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被歼一事而发生的争论,是毛泽东有生以来与莫斯科之间第一次直接发生重大意见分歧。他的确早就估计到国民党要有所动作,并一再提议对此作出反应,但莫斯科就是不相信。事变后他再度主张进行反击,又接连遭到拒绝。面对自己千辛万苦在江南发展起来的这支近万人的部队被国民党一举消灭,莫斯科方面甚至不愿作出任何毛泽东所期望的反应,毛泽东自然深受刺激。联系到抗战初期被迫放弃自己的意见,他明显地意识到,莫斯科并非像他那样关心中国革命的前途。维护中共利益的想法,促使他下决心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这一年 12 月苏德战争爆发以后,他拒绝在军事上采取莫斯科所建议的针对日军的战略牵制行动,清楚地显示出他与莫斯科的分歧所在。^①

为了推行一条旨在自我保护的独立自主路线,毛泽东不得不乘 1949 年俄国人自顾不暇的机会,发起了一场党内整风运动。这场运动原本只是为了让党的高级干部通过党史成败的对比来了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会有今天,就是因为毛泽东克服了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在高级干部中间整风所揭露出来的教条主义的种种劣迹,显然进一步激励了毛泽东破除迷信的勇气。当然,出于意识形态上的继承性,毛泽东没有也无法根本改变对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某种崇敬心理。他之所以大量印发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有关指示作为全党整风学习文件,继续使用相当尊敬的语言谈论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以及苏联党的地位和作用,如同他自己后来所说,正是因为他那个时候仍旧相信,只有斯大林才是世界

^① 参见拙作:《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獭源·獭源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因此,即使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当已经不再是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出面干预毛泽东对王明的处理的时候,他也依旧表现出相当的尊重。既是出于对季米特洛夫地位的尊重,也是出于对季米特洛夫的感谢,他曾再三提道:“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的忙。抗日战争中他帮助我们抵抗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①

使毛泽东最为不满的是,斯大林显然没有把他和中国共产党放在应有的地位上。就在他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满怀信心地在中共七大上向全党宣布战后苏联一定会援助我们夺取革命胜利之后不久,苏共中央竟于愿月发来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逼着他去与蒋介石讲和。^②愿年,苏联方面更建议中国共产党学习法国共产党的经验,放弃独立武装,去当议员,去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到了愿年,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明显地能够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时候,俄国人却又公开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③。这些情况都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的感情,使他还在建国之前,就对斯大林和苏联开始在感情上存在隔阂。斯大林逝世后他曾明确讲,还在他去莫斯科见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因为斯大林给人的感觉“是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④这也就难怪,当斯大林逝世之后,毛泽东几乎对每一位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要大谈中共党内斗争的历史,讲当年俄国人如何相信王明那些留苏学生,不相信他,压制他,打击他。十分明显,他内心深处对历史上来自俄国人的那种压制和猜疑,始终

① 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愿年愿月愿日;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电,愿年愿月愿日、愿月苑日。见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愿,目录号苑,卷宗号猿。前引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毛泽东接见新西兰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愿年愿月愿日;等等。

② 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愿年猿月猿日[除中文记录外,并见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远东问题》愿年版]。

③ 前引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另外,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愿年远月开除南斯拉夫之后,以蒋南翔为团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曾访问过波兰和苏联。他们注意到,在波兰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的代表们起立欢呼几乎每一位国家共产党领袖的名字,就是不欢呼铁托和毛泽东的名字。据留苏学生反映,苏联党这时经常有人在机关和学校作报告,说中国党走的是南斯拉夫道路,搞富农路线。见林利:《我对中苏关系的几点回忆》,愿年苑月。

④ 《毛泽东外交文选》,愿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愿年。

耿耿于怀。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亦显而易见。

关于独特性格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第一、第二号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相继访问莫斯科。但是,这两次访问给两个人的印象却大相径庭。9月,刘少奇率团访苏,他很自然地在与斯大林的交谈中把自己摆在一个“学生”的地位,对斯大林的任何说法乃至自我批评,都采取十分谦逊的态度处之。^①而毛泽东几个月后访苏时的态度,则与刘少奇颇为不同,他很明显地想要把自己摆在与斯大林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讨论问题。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刘少奇初见斯大林时使用的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寒暄与问候,第一次交谈的话题也尽量避免涉及敏感问题;毛泽东初见斯大林时却了无顾忌,当斯大林用俄国人的方式开门见山地赞扬他的客人之后,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却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结果,做惯了所有人的领袖的斯大林很容易和刘少奇沟通,和毛泽东的接触却颇多误会与猜疑。根据毛泽东自己回忆和陪同他前往莫斯科的俄文翻译师哲的回忆,可知在访苏期间,毛泽东仅发脾气“大吵”就有三四次之多。^②当然,毛泽东与刘少奇访苏所负的使命各有不同,斯大林的想法也经常会变,几个月前与几个月后也不尽相同,因此毛、刘二人的境遇也可能不尽相同。但不难断定的是,即使在遇到同样麻烦的时候,由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个性不同,他们处理起来所得到的结果与印象也会有所不同。

毫无疑问,在中苏两党关系当中,领袖个人的性格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毛泽东的个性是很突出的。他是那种极好强,易敏感,爱冲动,不大能掩饰其内心感情及好恶的人。早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的这种个性就表现得相当充分。1928年,因与党内意见不合,他曾一度负气回乡达数月之久。1927年末在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党代表时,他与军长朱德在相当一段时间

① 刘少奇致毛主席并中共中央电,1949年9月16日、9月18日。

② 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1949年9月18日;毛泽东与契尔沃年科的谈话,1949年9月18日;师哲:《在历史巨人的身边》,源泉,195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6。

里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冲突。猴年代初在江西苏区时，他又先后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批领导人发生过争执。在一些中共的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到对他个性方面的一些尖锐批评，比如说他动不动就“咆哮起来”，甚至“骂起娘来”，说他“态度（脾气）不好”，“好揽权”，“排斥异己”，“过于威严，使群众和同志‘个个怕他’，等等。以至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都得出印象，知道毛泽东“好争吵”，因此告诫中共中央“要尽量发挥毛泽东的作用，但不要让他进书记处或进常委，因为不能把党的工作机关变‘争论不休的讨论俱乐部’”。^①

毛泽东的这种个性，同他的经历有关。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他猴岁读小学的时候，就曾因为不愿挨打而离家逃学，竟至“流浪了猴天”。到了猴岁的时候，他已经敢于公开顶撞父亲，甚至当着客人的面与父亲争吵。据他说，有一次，“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②。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就敢于顶撞严厉的父亲，甚至以死相威胁，其个性之强，可想而知。

毛泽东的这种突出个性，促成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格。他很小就有鸿鹄之志、鲲鹏之梦。其少小离家求学之初抄录的诗句“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反映了他早有很强的抱负心。他从小聪明过人，学业出色，但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中颇多不顺。在学校被城里的和富裕的学生看不起，在学历上仅及中专未能入高等学校深造，本来有机会像大多数同伴一样出国留学，又因为热心国内政治运动未能喝上洋墨水，所有这些都给这位从韶山冲出来的自尊心极强的农家子弟带来了心理上的压抑感。毛泽东回忆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的情况时，那种压抑感就跃然纸上。他说：“由于我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

^① 前引中心档案，全宗号 猴猴，目录号 猴猴，卷宗号 猴猴，延安整风期间，博古等曾明确谈到共产国际代表当时对毛泽东的看法。

^② 《毛泽东自述》远愿页，北京，人民出版社，猴猴。

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①即使在投身革命之后,他也每每感到压抑。特别是在他创造了中国红军和根据地,开创了革命的正确道路之后,不仅不受信任,而且备受歧视与打击,好不容易从逆境中崛起,做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甚至在中国打出了一片天地,却还是得不到莫斯科的信任,并被疑神疑鬼,这些都极大地强化了他的这种受压抑的心态。比较一下毛泽东风华正茂时渴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壮年时笑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自诩“风流人物”的诗句,不难想像志向至大至远的毛泽东对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巨大差距,会抱有何等强烈的不满。它们无疑会更加加强毛泽东性格的特点,并促使他变得高度敏感。而越是在意气风发之时,他内心里在这方面也就越难平衡。这也就是为什么,1959年10月1日,已经做了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他,见到斯大林的第一句话,竟是充满怨气的宣泻。

毛泽东的经历及其性格,使他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了“小人物”、“下等人”、“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地位,并形成了一种对“大人物”、“上等人”、“富人”和“压迫者”的极端轻蔑与反感。革命期间,即在苏联还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外部支柱的情况下,他都很难压抑自己的这种个性,在成为具有12亿人口的亚洲头号大国的主人,尤其是在整个政权日渐巩固之后,在与处处习惯于把自己摆在师长地位的苏联党的关系当中,他的这种个性特点就越是容易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比如,毛泽东在莫斯科访问时几次发脾气,大都是由此而发。他一次发脾气,是因为发觉斯大林冷落他,把他摆在旅馆里一周时间不露面。另一次发脾气,则是因为约好苏中两国以官方名义声明驳斥美国国务卿的一次谈话,苏联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而他则习惯性地以中央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了谈话,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竟因此拐弯抹角地批评了他,使他深感自尊心受

① 前引《毛泽东自述》146页。

到伤害。^① 又比如，1956年代初，毛泽东请苏共中央派个理论家来中国进行考察并帮助他修订著作，他本意多半只是想让斯大林了解他，对他放心。想不到这个理论家来到中国之后，竟大放厥词，声称：我们苏联都没有使用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你们有什么必要提“毛泽东思想”呢？毛泽东当时并不认为把自己的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提并论是恰当的，但俄国人的指手画脚严重地伤害了毛泽东的自尊心。毛泽东指示取消了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以后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八大开会时也正式从党章中删去了这个用语。^② 然而，毛泽东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共八大召开期间，他有意对苏共中央政治局派来的代表米高扬态度冷淡，甚至在米高扬致祝词的时候故意不露面，在党内明确讲是对米高扬的祝词贬低中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贡献一事不满，以此“表示抗议”。不仅如此，利用会议叙餐的机会，他更借着批评斯大林时代党与党关系不平等为名，有意当着米高扬的面，大谈当年苏共如何把自己当成“老子党”，把别人当成“儿子党”，“一方面发号施令，一方面就得俯首贴耳，唯命是从”，声称：“过去我们憋了满肚子的气，现在可要出气了。”这个时候，苏共已经召开过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秘密批判过斯大林，毛泽东已经没有什么可忌讳了。既然不必忌讳斯大林，自然更容不得资历远在他之下的赫鲁晓夫等人对他指手画脚。因此，借着批评斯大林错误的机会，他这时多次向外国党领导人表示，他最不能容忍别人站在自己头上发号施令，党与党之间绝不能再搞“老子党”与“儿子党”那一套。^③

同苏共新中央的关系严格说来应比同斯大林的关系好处一些。从1956年到1957年，苏联内部及东欧国家集团内部问题层出不穷，赫鲁晓夫要求助于毛泽东的地方很多。表面看上去，双方的关系应该很容易走向互

^① 谢·冈察洛夫著，马贵凡译：《科瓦廖夫谈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的最初态度》，载《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82（1）；前引《在历史巨人的身边》，1982，198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7），1982，198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198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1982，1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③ 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12月；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6年12月15日。见《毛泽东外交文选》，1987。

信、互助、互通有无。但是,毛泽东很快发现,苏中两国,一个强,一个弱,仍旧很难讲平等。而最困难的在于,双方的强弱已经不同于当年的情况。当年苏共是什么都强,而如今,他相信,苏联强的只是物质力量。从“苏联是今天惟一能对付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资产阶级害怕苏联,不害怕中国”这个角度看问题,毛泽东仍旧主张“一个人不能有两个头”,强调苏联还应当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总司令”,中国至多只能算是个“副总司令”。可是,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从实际的革命斗争经验的角度,他却相信赫鲁晓夫所差甚多,认为中共要起主导作用。这种情况的出现,无疑使他的心态更加难以平衡,因为毕竟中国在物质方面求助于苏联的要多得多。这使得他在双方交往方面明显地比过去变得更加敏感。1956年,中国军方表示希望苏联能够提供核潜艇,苏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后提议两国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在核武器以及核动力都还属于世界尖端科学的时期,苏方如此建议并非不可想像。但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竟大发雷霆,扬言苏联方面粗暴地触犯了她的自尊心。他厉声质问苏联大使:“你们还不是因为核潜艇是尖端科学,有秘密,认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我知道‘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从斯大林到你们都是一样。‘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①其实,赫鲁晓夫当时的本意并不是要控制中国,若比较斯大林当年迫使毛泽东接受的那些不平等条款,赫鲁晓夫这时的建议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何况要求是中方提的,苏方提出自己的设想还可进一步交流与谈判。毛泽东发脾气后,赫鲁晓夫又亲自赶来中国,向他解释并寻求谅解。事情原本不至于闹得这样大。毛泽东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会产生如此激烈的反应,无疑与其个人的经历和敏感的性格有关系。而恰恰是这件事,后来竟成为导致两党矛盾迅速暴露,两党领导人之间感情迅速恶化的一个导火索。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对于1956年以后中苏关系走向恶化,毛泽东个人的性格确实是有影响的。

^① 毛泽东接见英共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10月15日;毛泽东接见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10月16日;前引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07页。

关于民族利益的分歧

毛泽东对斯大林和苏联的诸多不满，有相当一部分是同民族利益联系在一起。只不过，在建国前与建国后，他对民族和国家的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在建国前，毛泽东通常更喜欢用“人民”这个字眼儿来说明他的利益所在和追求的本质。比如说军队是“人民军队”，说政权是“人民政权”，说国家是“人民共和国”，等等。而他在这里所讲的“人民”，指的其实是“劳动人民”。而建国后，在与苏联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除了继续用带有阶级色彩的“人民”概念界定民族和国家以外，极大地影响着毛泽东感情的“强”与“弱”、“大”与“小”、“穷”与“富”这样一些上与下等、贫贱与高贵的尊卑观念，显然也成为他判断国家关系以及党的关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只有了解了这种情况，我们才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的世界观和民族观。

毛泽东与俄国人最早的摩擦，发生在1945年秋。当时正值欧洲大陆沦陷不久，国际形势对抗战不利，国共关系亦高度紧张，他估计蒋介石有与日军联合夹击中共的阴谋，因而提议派15万精兵先发制人，由西北打入国民党西南基地，抄其老窝。^①此电自然受到莫斯科的坚决反对，双方为此争执甚久。1945年皖南事变发生之后，毛泽东决心对蒋予以报复，而无论是莫斯科，还是重庆的苏联大使及苏方军事顾问，都明确反对。为此，毛泽东再度与俄国人发生争执，他直截了当地要求苏联务必立即“停止接济重庆武器”，立即准备“公开接济我们”，特别是“援助我们夺取兰州”，接通苏联，取得飞机大炮，占领甘肃河西走廊，进而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②同年12月，日本军队大举进攻山西中条山一带的国民党军队，由于国共关系还未能从皖南事变沉重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同时八路军也因1945年底的百团大战损伤了元气，因此，中共中央没有按照国民政府的命令部署靠这一地区的部队采取积极的救援行动。苏联顾问对此颇为不满，以至说三道四。对此，毛泽东十分恼怒，专门去电重庆，强硬地警告苏联顾

① 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的信，1945年12月19日。

② 毛泽东致恩来电，1945年12月19日。

问“不要随便乱说”^①。在这里,毛泽东一切策略考虑的出发点,都是要保存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政权。在形式上,毛泽东这里的许多做法似乎不利于当时中国的民族利益,但在他的观念里,民族也是有阶级的,他要保护和争取的,却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而它才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把中共的军队与政权视为中国人民,乃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这就使得毛泽东对牺牲国民党政权之下的那个“中国”毫不痛惜。像明显地有损中国利益的《苏日中立条约》,以及《维尔塔协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中共中央当初承认起来毫无困难。在他们看来,这里损害的根本上是国民党的利益,因为它恰恰是国民党无能的表现。他们相信,一旦轮到他们掌权之日,所有中国曾经失去的权益都会很容易地被收回,只有到那时,中国才会有真正的独立与尊严。但是,涉及他们自己的那个“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几乎是寸步不让的。苏德战争爆发后,他之所以拒绝派他的军队去采取牵制行动,就是这种态度的一种反映。他对此解释得很清楚,即:“由于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②毛泽东在整风期间讲过一句话,最能反映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这是在他批评王明时说的。他说,王明错误的关键,就是替别人(苏联)想得太多,替自己(中共)想得太少。在很大程度上还必须要依靠苏联的情况下,毛泽东的这种心态,或者可以归结为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但需要注意的是,他的这种“民族主义”仍旧是建立在列宁主义阶级观基础上的,他仍旧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与苏联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他与俄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同的。驻延安的莫斯科联络员伏拉基米洛夫相信,没有苏联,就没有中共,大河没水小河干;而他相信,没有小溪不成其为大河,中国革命对苏联也是一种支持。因此,毛泽

① 毛泽东致恩来电,1955年5月15日。

② 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电,1955年7月15日。

东这里的“民族主义”与一般所说的民族主义并非毫无区别。^①

既讲阶级利益，又讲民族利益，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毛泽东相信它们是一致的。他有一个说法，叫作“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因为他理解的“国际主义”，概括成一句话，就是“革命时外援，胜利后援外”。这里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首先是要外部援助而不是去援助外国，但它在胜利之后，就应当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援助外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义务。因此，在革命期间，毛泽东格外重视来自苏联的援助，而对以牺牲本国革命利益来援助苏联不以为然，更不满意俄国人在援助中共的问题上总是瞻前顾后，斤斤计较。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在建国后批评俄国人“自私自利”和“民族主义”时反复举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他所谈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特定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产物。

他们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批评俄国人出于自私的目的，在抗战期间把武器统统给了蒋介石，只给延安送了些药品和马列书籍。另一个例子是批评俄国人在抗美援朝的问题上，一面鼓动中国出兵援朝，主动向中国提供大量武器装备，一面却在中国无偿地大量损失生命财产的情况下，要求中国为苏联的武器装备付款。^②出于同样的道理，毛泽东也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俄国人对那些尖端技术总是那么神秘神秘的，生怕中国人拿了去。不就是那么点儿东西吗？朋友之间，同志之间，有什么了不起？

^① 在 1949 年代苏联开始批判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之前，中共党内曾经使用“民族主义”这个概念，但在大多数场合下是加上“革命”两个字的，因为要区别于一般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叫“革命民族主义”。苏联批判南斯拉夫之后，“民族主义”一词成了专指那些只考虑本民族利益，自私自利，不讲国际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用语。因此，毛泽东从不认为自己是民族主义者。

^② 根据徐焰披露的资料，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 1 个陆军师和 1 个空军师的装备，除 1 个陆军师的装备和 1 架米格 15 战斗机是斯大林无偿提供给中国志愿军的以外，其余都是有偿提供的，并且一部分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给苏联的租借物资。这段时期中国仅欠苏联的军火款就有 1 亿人民币，约相当于 1 亿美元。见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与回顾》，第 1 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年。另外，毛泽东自己讲，中国欠苏联的账总共 1 亿多卢布，其中只有 1 亿美元是借款，其余都是朝鲜战争买武器的钱。（毛泽东与日共中央委员的谈话，1953 年 1 月 10 日。）

在这里,明显地表现出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就像中国人在朋友吃饭时习惯于一个人请客,而一些欧洲国家习惯于各自付款一样,毛泽东对援助问题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应当遵循中国传统道德中的“重义轻利”的原则。中国的古训所谓“不患贫而患不均”,“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讲的都是一个“义”字。朋友之情是为“义”,个人钱财是为“利”,同样,国际主义是为“义”,武器技术当为“利”。因此,他极其鄙视那种重“利”轻“义”的行为,崇尚“君子不言利”。建国以后,毛泽东的做法自然与苏联极其不同。至少在整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政府为援助亚、非、拉美各国革命运动,不仅倾其所能,而且往往不计结果。尤其是在与苏联关系破裂后的 60 年代,这种援助更是无所不尽其极。就是在 50 年代初,中国经济严重困难的几年里,其援外金额仍超过其偿还苏联债务十几亿美元的总额。光是中国援助越南的金额,就超出抗美援朝战争费用两倍还多。在这方面,毛泽东从不主张讲中国国家民族之“利”。他的原则是,“不论是共产党,还是民族主义者,只要真正反帝,我们就支持”。即使因此会损害中国的某些外交关系,也在所不惜;中国的建设、老百姓的生活要受影响,勒紧裤腰带也要干。他为此再三向外国党的领导人说,援助就是无偿的,“要买、要还账,这没有道理,不是国际主义”^①。

那么,毛泽东是否不讲民族之“利”呢?当然不是。问题是,他在许多场合更多地还是从“义”上来看这个“利”的问题。比如,建国前后,毛泽东几度与苏联讨论过归还抗战结束后被苏联占去的诸如中长铁路、旅顺港等问题。他提出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当年你们占去这些权益是对的,因为它们当时是国民党的,而现在天下已经是我们的了,共产党当然不能占共产党的东西,否则别人会说闲话,说你叫什么共产党?毛曾明确讲苏联当年控制中国东北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是对的,“因为当时是国

^① 在中共党内,在许多年里,任何敢于对毛泽东这种严重损害中国自身利益的对外援助表示异议者,均受到打击。王稼祥 1960 年就因为写报告向毛详细说明这种援助对国家损失太大,而遭到贬斥。当然,在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为了对抗苏联,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和做法才有所改变。因此本文不涉及与苏联决裂之后的问题,故略之。(毛泽东接见朝鲜代表团的讲话),1960 年 9 月 10 日。)

民党的中国”。而中共夺权后则应该归还了，“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了”。^① 这里所表现的思维特点仍是强调一个“义”字。因此，当他在莫斯科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为归还苏联占去的中国权益问题不得不三番五次地讨价还价时，其内心极感困惑。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兄弟党之间围绕着这样一些“利益”问题讨价还价，“实在不光彩”^②。不难想像，毛泽东 1959 年底到莫斯科去，原本是希望斯大林能够痛痛快快地从兄弟之情和国际主义的大义出发，主动废除中苏两国间以往的一切不平等协定，想不到，斯大林不仅不是他希望的“谦谦君子”，而且简直就是中国人眼中那种斤斤计较的“小人”^③。自然，围绕着苏方提出的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不许苏联以外的国家及人员进入；中苏必须合办合营公司，苏联的股份必须占到 50%；苏联有权利用中长路运兵等明显地强占中国人的便宜的种种要求，毛泽东更是极其不满。

在 1950 年代中国与苏联的交往中充满了相互不信任的例子。在中国方面，最多的批评就是俄国人对中国人态度傲慢并颇多戒备，事事向中国方面保密。^④ 毛泽东在 1950 年代多次说他对一件事不理解，即我们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可是俄国人卖给我们设备时常留一手，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就是不告诉我们，在这方面他们甚至还不如日本与欧洲的那些资本家，因为从日本或欧洲进口设备，资本家都是把全部资料给我们的。其实，比这严重的事要多得多。还在 1959 年，毛泽东就曾向刚刚上台的赫鲁晓夫抱怨说，在中苏合营的公司中，苏联方面不仅在技术上对中国严密封锁，在人员使用上对中国技术人员加以排斥，就是在公司的利润问题上也总是搞小动作，让中国方面大吃其亏。这件事，就连赫鲁晓夫也不得不承认苏方的行为实在过分，很快将有关合营的协定废止了事。但是，类似的事件

① 见前引《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1 页。

② 米高扬就 1959 年 11 月中国之行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载《远东问题》1960 年 1 期。并见前引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毛泽东与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等。

③ “谦谦君子”一词出自中国古代《诗经》，以后泛指讲仁讲义之人。故中国从来有“君子言义，小人言利”之说。

④ 师哲：《回忆刘少奇同志的国务活动》，1980 年 1 月。师哲在 1950 年代担任过中方俄语翻译的林利，在 1959 年写的有关中苏关系的回忆中，也突出地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

根本就禁绝不了。因为不仅当年苏联对所谓“兄弟国家”的政策明显地带有利己的成分,而且大多数苏共领导人还把独立色彩甚浓的中国看成是一种威胁,至少也是一匹无法驾驭的野马。^①因此,对中国“留一手”的事几乎是司空见惯的。1956年的“联合舰队”问题之所以会被提到主权问题的高度上来,引起毛泽东那么大的火气,就是因为自赫鲁晓夫试图与美国缓和关系以来,对中国的事情指手画脚太多,刺激了毛泽东的自尊心。^②在毛泽东看来,只要是出于“义”,主动地把自己家的东西送给朋友,都毫不足惜。可是,如果恃强凌弱,反客为主,赖着主人的东西不放,并总是对主人的家务事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就算是朋友,也绝难容忍。他之所以始终认为苏联搞“老子党”,搞“大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③,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看不惯俄国人重利轻义,总是企图指挥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占这些兄弟国家便宜的政策和行为。

关于革命理念的歧异

如果说民族问题是利害之争,那么,革命问题则是义理之辩。义既然高于利,那么,在毛泽东与苏联党的争论当中,关于革命理念的争论究竟占有多重的地位,应该不难了解。

我们已经知道,无论从历史上的恩怨出发,从个人的或民族的情感出发,毛泽东对斯大林都有一肚子的怨气。照理,赫鲁晓夫 1956年公开反对斯大林,应该得到毛的欢迎和支持才对。但是,事情恰恰相反,毛坚持要对斯大林“三七开”^④,明确认为赫鲁晓夫公开批评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丢了一面革命的旗帜。结果,历史上的恩怨也好,个人的或民族的情感也好,统

① 根据已知的资料,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中央里公开对中国表示赞赏并主张其强大的,多半只有莫洛托夫等少数几个人。前引师哲回忆。

② 这包括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批评他提倡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反对他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观点,等等。

③ 所谓民族沙文主义,其实就是指民族主义。他明确认为,“民族主义”就是“沙文主义”。

④ 即把斯大林的错误和功绩总和为十,肯定其错误只占十分之三。

统都成为次要的了，围绕着要不要斯大林这面旗帜的问题，毛反而同赫鲁晓夫以及苏共越来越尖锐地冲突了起来。由此一点即不难看出，毛泽东缘年代末至年代初与苏共关系之破裂，究竟何为主，何为从。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不满，说来说去，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信任与否的问题。为什么要求得到斯大林的信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毛泽东相信他和斯大林一样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在他批评斯大林的各种言论之中，分量最重、重复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指责斯大林当年曾经不许他革命。这是指的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之后，斯大林接连发来电报，逼着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承认蒋介石的统治那件事。几乎在每一次谈到苏联、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的时候，他都要提到这件事，并强烈地表示他的反感。最典型的如 1956 年 7 月 15 日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中，他气愤地接连四次提到斯大林在当时“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这件事。^① 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犯下的一个很难宽恕的错误。而在此之后对斯大林的看法，也大都同这个问题有联系。像毛批评斯大林不该在 1948 年延安失守时提议与蒋和谈，不该在 1949 年 1 月人民解放军已经准备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时还要中共停下来与南京谈判，尤其不该怀疑他可能是中国的铁托，如此等等。同样，围绕着 1950 年朝鲜战争中国出兵的问题，斯大林再三求助于中国，并且因为毛泽东决定出兵而对毛泽东改变看法，这又使他十分满意，以后多次提到这件事。这些情况都说明，毛泽东把斯大林的信任看得很重，同时也表明，他对斯大林虽有不满，但多属于个人情感上和一般利益上的矛盾，本质上并无恶感。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保持对斯大林的某些好感，无疑是因为他们在思想体系上是基本一致的。这个一致，正如他在 1956 年形象地说明的那样，就是在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②。有了十月革命这一暴力革命的榜样，又有了主张阶级斗争的列宁主义作为指导，中国才会有共产党，才会有毛泽东，才会有它的 1956 年，这是一个显而易

① 见前引《毛泽东外交文选》1956 年 7 月 15 页。

②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56 年 12 月 1 日，见《毛泽东选集》，1956 年。

易见的逻辑关系。不论斯大林有怎样的问题,不论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多少错误,斯大林毕竟是列宁主义的捍卫者,是少数能够理解中国革命特殊意义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之一。特别让毛泽东欣赏的是,中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斯大林就当着前去访问的刘少奇等人的面,高度评价中国革命对落后国家革命的榜样作用,肯定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中心,中国应当担负起领导亚洲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责任,等等。这样的评价,对于毛泽东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太精辟了!实际上,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不少中共领导人就公开宣传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独特贡献,对整个亚洲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具有指导意义,但是,有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这些人在,毛泽东始终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自觉思想尚未成体系。如今斯大林明确加以肯定,这无疑让他深受鼓舞。毛泽东是那种总是保持着强烈的进取姿态,一心希望对中国、对世界有所贡献的政治家。因此,他非常看重他的革命在理论和实际上的历史贡献。而这个时候,区别于俄国革命的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可以说是毛泽东最值得骄傲的成就。毛泽东把他的这一贡献称之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里所讲的“马列主义”就是指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而所谓“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则是指区别于俄国十月革命通过中心城市群众起义夺取政权的方式,走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独特形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很显然,毛泽东相信,至少希望,他所开创的这一新的革命道路能够对大多数国家,至少是那些落后国家的革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因此,当毛泽东得知斯大林高度评价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时,他自然深受鼓舞。正因为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过一个月,毛泽东就颇为自信地指示有关部门宣传中国革命道路的榜样作用了。^①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发现他引以为自豪的革命经验和理论贡献正在遇到挑战。这让他感到非常不安。最开始发起这种挑战的是英共。1953年11月10日,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致信中共中央,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的一篇文章时,需要删去毛关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

^① 前引冈察洛夫文。

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等论断。英方认为，这个原则在英国已经不适用了。否定这个原则的普遍性，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因为它不仅和他的经验不同，和他的理念不同，而且几乎等于要否定他的革命经验和理论贡献的普遍适用性。因此，他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联络部告诉波立特：“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他并且告诉波立特，苏联同志在发表他的这篇文章的俄文版时，也没有对这个观点提出任何异议。言外之意，苏联党也是赞成他的这个观点的。^①但英共依旧我行我素，毛泽东的那些论断在英文版《毛泽东选集》发表时还是被删掉了。一年以后，当波立特来到中国时，毛泽东对这件事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并当面强调“工人阶级只有用武装才能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取得政权”，告诫英共绝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把自己和工党混为一谈，去奢谈什么“议会道路”与“和平过渡”。当然，波立特也是不以为然。^②

英共对武装斗争以及暴力革命的态度固然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但他最初还只是把它看成是孤立的现象。他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作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思想发源地的苏联也会产生同十月革命方式背道而驰的“和平过渡”思想。这个冲击之大，使他倍感吃惊。当赫鲁晓夫在 1956 年 9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肯定世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需要和平共处，并且肯定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之后，毛泽东的不安看起来比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还要严重。在苏共二十大尚未结束，中共中央还不了解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际，毛泽东就明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对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观点有不同意见。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紧接着苏共二十大之后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上，毛泽东会因为米高扬的祝词没有称赞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理论贡献而大动肝火。当赫鲁

^①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即《战争和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01—1302 页；毛泽东关于不同意英译本《毛泽东选集》第 4 卷所作删节的批语，见 1956 年 9 月 16 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0 册，第 1301—1302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

^② 毛泽东接见波立特的谈话，1956 年 9 月 16 日。

晓夫的秘密报告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由反斯大林主义到反苏反共的政治事件之后,他更是直接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和鼓吹“和平过渡”联系起来,强调“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这把刀子不能丢”。为此,他当即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人集体发表文章,主张“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并断言:谁不走十月革命道路,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十分明显,保卫十月革命道路,说到底,其实就是要保卫他所开辟的新的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①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明确告诫党内:要警惕苏联的错误倾向,因为,批判斯大林等于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提出“和平过渡”观点,事实上等于连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不要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就等于否定无产阶级革命,也就等于否定共产党。^②在这种情况下,1956年因号召整风而诱发的批评共产党的国内政治风潮,更是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的神经。

如果仅仅从民族利益的角度和同志关系的角度,赫鲁晓夫等人要比斯大林好得多。斯大林坚持要把中国东北和新疆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坚持要保持在中长铁路上的部分特权,坚持要中国同意接受条件不平等的合营公司……所有这些,赫鲁晓夫上台后都主动放弃或废除了。甚至,在1955年和1956年,中苏双方甚至接连签署了由苏方帮助中国制造导弹、发展最新宇航技术和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图纸资料,以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的重要协议。同时,因为需要毛泽东的支持,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任何不满,通常都采取个人协商的办法加以解决,其态度一般也比较谦恭。这些在斯大林时代是不可想像的。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使毛泽东建立起对赫鲁晓夫的信任感。相反,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等人越来越不信任了。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在与苏共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接触中,他吃惊地发现,他和这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共同语言已经越来越少了。他尤其意想不到的,包括苏联在内的大多数欧洲国

^①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源页-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原页-原页;《毛泽东外交文选》,原页。

^②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0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原页-原页。

家的共产党，对自己的力量毫无信心，几乎已经没有任何革命的愿望！

毛泽东是讲唯物论的，但在他的经验里，一定的物质条件具备之后，没有什么不是由人心所决定的。人心向背，不仅可以决定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同样也应该可以决定世界帝国主义的垮台。更何况共产党人还握有绝对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他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为什么像波兰这些早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国家共产党，竟连在国内宣传反对美国的勇气都没有。^①他因此不能不再三为那些对美国怀有深深的恐惧的共产党领导人打气，强调：“物质力量的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政治是决定一切的”，“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因此，从制度上讲，从人心向背讲，应当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用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②

1957年12月，当世界各国共产党集会莫斯科时，毛泽东已经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以为根本的许多东西，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苏联和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抛到脑后去了。他不能不把这一切归罪于斯大林的继承者赫鲁晓夫。在无法劝说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根本改变对革命的看法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逐渐开始考虑将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中国来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同国家实力联系在一起。不管他表面上怎么讲原子弹是纸老虎，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力量对比问题，“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事实上他却不能不承认：你没有东西，人家就看不起你。

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从来就相信“观念造成文明”的毛泽东，终于按捺不住了。不就是比谁有原子弹，看谁钢铁多吗？中国有的是人，人多智慧多，热情高，干劲大，又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性，为什么不能调动起这

^① 哥穆尔卡告诉毛泽东说，他关于加强反帝反美的宣传的建议，在波兰就行不通。波兰人要是搞无记名投票，结果共产党肯定下台，东德的情况就更糟。

^② 毛泽东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12月15日，《毛泽东外交文选》，1983年~1984年。

几亿人的积极性，来一个经济上的“大跃进”呢？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他们准备用 15 年的时间赶上美国，毛泽东当即表示，你们 15 年赶上美国，我们可以在 10 年赶上英国。10 年后英国可能达到 1 亿吨万吨钢，那时我们可以达到 1.5 亿吨万吨钢。因此，从 1958 年初开始，毛泽东就憋着一股劲儿，到处宣传“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道理，声称过去因为对工业一窍不通，所以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有很大的迷信，其实几年过来也就懂得了，有什么了不起！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①。于是，在毛泽东关于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公开号召下，一个赶英超美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掀起来了。由于把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粮食、钢铁和原子弹这几样东西，因此，从城市到乡村，几亿中国人被组织起来大办农业，大办工业，去大炼钢铁，甚至大造原子弹。从用 15 年赶上英国，到用半年时间，又变成了用 7 年超过英国，10 年赶上美国。^②

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充其量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赫鲁晓夫把毛泽东看成是一只“好斗的公鸡”，毛泽东则把赫鲁晓夫看成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企图通过抹煞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与和平共处的“懦夫”。实际上，还在 1958 年 8 月中共召开八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就印发了《马列论不断革命的语录》，在内部开始批评苏共中央。当 1959 年 8 月赫鲁晓夫得到美国总统向他发出的访美邀请之后，苏美这两大敌对阵营核心国家之间明显地出现了走向缓和的重要迹象，中苏两国之间自然不可避免地进一步走向观点上的对立。^③

真的能够实现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以及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之间的和平共处吗？如果对立的阶级之间能够和平共处，那还革什么命，还要共产党干什么？毛泽东对苏联党不要

① 彭继超：《原子弹爆炸前的彭德怀》。

② 谢春涛：《大跃进狂潮》，苑子、苑昂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③ 赫鲁晓夫著，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1989，137页，上海，东方出版社，1988。

革命，还反对别人革命的做法极端不满。他开始明确提出：共产党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革命的，在今天，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主要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不革命还算什么共产党？”不反帝，尤其是不反美帝，“这还算共产党吗？还算马克思主义者吗？”什么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不过是“因为资产阶级压力太大，有些党就要找寻方便”罢了。“被压迫的民族跟帝国主义就无所谓和平共处”。其实，“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阶级斗争不经过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明知如此，为何还要提和平手段？”当然，毛泽东不反对讲一讲策略，问题是，他认为，不能自欺欺人，而赫鲁晓夫的做法，根本上“就是向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屈服”。^①

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在思想上已经和苏联党完全分道扬镳了。

结 论

毛泽东与苏联党之间的矛盾是多方面的，有历史上的积怨，有个人性格上的冲突，也有民族利益上的对立，所有这些矛盾冲突都不可避免地在双方之间造成了隔阂，特别是促成了毛泽东在心理上和感情上与苏联日渐疏远。这些矛盾冲突，在不同的时期，也分别起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双方关系的作用。但是，所有这些矛盾或冲突，都不曾也不能根本改变毛泽东对双方关系本质的看法。概括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评，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主要不满是哪些呢？归纳毛泽东的历次谈话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 斯大林始终不信任他，先是在中共党内扶助支持留苏学生王明等人，长期压制他，打击他，以后他仗打胜了，又怀疑他不是列宁主义者，而是另一个铁托。

(二) 抗战时武器给了国民党，不支持共产党；~~1945年~~抗战胜利了，可以推进中国革命了，斯大林竟又强迫他去与蒋介石谈判，“不许革命”；以后仗

^① 毛泽东接见澳共总书记的谈话，~~1953年~~ 1953年 8月 14日；毛泽东接见委内瑞拉客人的谈话，~~1953年~~ 1953年 8月 14日，等等。

打起来了，斯大林始终怀疑中国革命胜利的可能性。

(8) 斯大林总是盛气凌人，摆出一副教训人的样子，处处凌驾于他人之上，大摆老子党的架子，在他访苏时有意冷落他、教训他，让他憋了一肚子的气。他始终不喜欢斯大林的书和文章，也是为此。

(9) 批评斯大林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要中国为苏联建橡胶园，将东北、新疆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不许第三国染指，建合股公司，要控股权等。

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上述怨言可以看出，他的感受过程大致是：斯大林先是不信任他、压制他，不支持他，然后又不许他革命，仗打起来不相信他能胜利，仗打胜了又怀疑他是民族主义者，冷落他，摆架子，最后是不能真正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不能平等对待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在这几个方面，毛泽东讲得最多，感受最深，也是最不满的，其实主要是前三项，即压制他、不许革命和冷落他。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为什么对斯大林有怨言，不喜欢，最后却还要尽力地维护斯大林？就是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根本利害之争。换言之，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分歧，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就其主要方面而言，甚至也不是民族主义方面或国家利益方面的。毛泽东的不满集中表现在：他认为斯大林早就应该支持他、信任他、帮助他，并且能够平等地对待他。因此，当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决定出兵援朝之后，斯大林开始频繁地与毛泽东互通信息，交换意见，毛泽东对斯大林的看法迅速好转了。照他自己的说法，斯大林从此终于相信他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地改善了。

从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变化的过程来看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关系变化的情况，我们看到事情发展的方向正好相反。如前所述，赫鲁晓夫上台后尽力与毛泽东搞好关系，在民族利益方面尽可能满足毛泽东的意愿，修改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提供各种可能的援助，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中苏关系逐渐恶化的趋势。当毛泽东发现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原则之后，他很快就开始对赫鲁晓夫抱以不信任的态度。后来引起毛泽东大发脾气的联合舰队问题，无论如何不能与斯大林当年在中国东北、新疆问题上的恶劣态度和坚持搞合股公司，要控股权，要中国为其搞橡胶园这些事相提并论。毛泽东当时的怒气可以说是不打一处来，但说来说去，根本上还是一个由积怨引起的信任问题。

只是，使毛泽东根本失去对苏联信任，导致双方关系迅速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还是革命理念上的歧异。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否定毛泽东过去一切成功实践和一系列正在进行的新的革命尝试，就是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可忍，孰不可忍！

(本文系作者提交 1957 年 1 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学术讨论会论文。)

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

(来源: 人民网)

当代中国研究所 李丹慧

在

两极对抗的冷战格局中,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中苏关系,由于双方决策层以各自的执政党为主体,就导致了中苏两国关系突出地表现为中苏两党关系:党的关系密切,国家关系就友好;党的关系终止,国家关系也即名存实亡。而在中国和苏联当时的政治体制下,领袖作为决策者,高度介入外交活动。可以说,新中国与苏联的外交关系自毛泽东宣布“一边倒”的政策,并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首脑外交或领袖外交。^①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下,中苏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个人的思想认识活动,特别是他们各自对本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的理解和探索,便成为确定中苏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双方关系中任何重大决策和重要变化都离不开他们的感知、感情甚或情绪的影响。过去

^① 据中国老一辈外交人员和当时在中央工作的翻译人员回忆,建国年代中国与苏联之间交往的有关事宜均是由最高领导人亲自处理的。与处理其他国家的问题不同,凡有关苏联的问题,毛泽东都是直接作出决定,从来不通过外交部和中联部。苏联驻华大使有事也是直接找毛泽东(后来也通过周恩来转毛泽东)商谈(引自笔者1992年苑月采访荣植和朱瑞真同志记录)。

评述较多的是赫鲁晓夫搞现代修正主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对中国搞突然袭击，从而破坏了中苏关系。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应该进一步说明的是，毛泽东本人对苏联认识的发展变化，事实上决定了中国的对苏政策，也从一个方面左右着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出发，分三个阶段对 1953 年至 1956 年期间的中苏关系展开论析。这 3 年是双方关系由鼎盛转而冷淡直至分裂的时期，是中苏矛盾在新的基础上发生、发展，并开始走向对抗的时期。

（一）

第一阶段 1953 年苏共新的领导集团调整对华政策至 1953 年 12 月苏共二十大召开前。中苏关系进入历史上的最佳状态。

回顾 1953 年初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存在着很多不平等因素，斯大林虽然在旧条约基础上作出了许多让步，但事实上仍然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保证了苏联的战略需求。此后，由于中国人民在朝鲜战争中无私无畏的英勇表现，新中国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相对提高，而斯大林的去世又为中苏关系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性和新的转机，苏联第二代领导人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1953 年 12 月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后，即开始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华政策，而其对华政策基础的根本性转变，对此期中苏“蜜月”型关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首先表现为苏共和苏联政府在外交斗争中全力支持中国。如支持中国政府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立场，在联合国内外采取种种行动，积极配合中国反抗美国侵略台湾的斗争；一再主张接纳中国参加大国之间的国际会议，并终于促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日内瓦会议讨论国际问题，使中国获得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合法地位”，并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担负起“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①

^① 新华社电讯 1953 年 12 月 15 日。

另一方面,苏共和苏联政府还从政治、经济上进一步加强苏中双边关系。这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赫鲁晓夫在处理同中国经济关系问题上的积极主动态度和他首次访华期间所做的几件事情。1959年初,中国向苏联提出加速大规模援建重工业项目的请求,以及在庆祝新中国建国五周年之时中苏签署经济协议和把旅顺港移交中国的协议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意向。据此,赫鲁晓夫着手重新审理每一个援华工程项目,对于苏共领导层有人提出的实施这些项目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本国经济造成不良后果的种种论据,逐一进行了批驳。他努力使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明白,目前正处于苏中最高级重要会晤的前夕,这次会晤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发表政治宣言、声明及外交议定书,需要的是经济基础,那样才能够巩固两国的联盟与友谊,进一步发展双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其他领域的密切合作。1959年9月赫鲁晓夫率团启程访华之前又召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此行苏中协议的最后文本及其他有关文件的内容。他在会议上强调指出,如果苏中两国间的友谊不是建筑在实事求是、互相需要和彼此负责的坚实基础上,那么任何国家之间的条约都不能长久。“如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建国五周年之际,请求我们帮助克服其几百年落后状态这一重要时期,不帮助中国在未来的五年内实现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工业的根本大计,那我们就将错过同中国建立和巩固友谊的历史时期。”^①面对一些反对意见,赫鲁晓夫不作原则性让步,使主席团成员相信他的决定是正确的,最终统一了苏共领导层的思想。

1959年9月19日至10月10日,赫鲁晓夫率苏联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访华,参加新中国建国五周年庆祝活动。这期间,他主动表示将以往苏联在双边关系中非正常占有的一些权利归还给中国。中苏双方签署了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将该基地归还中国,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移交中国政府,将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国,为中国提供10亿(旧)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15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等7个文件。苏联代表团在华期间还赠给中国两项

^① [苏]康·伊·科瓦利:《关于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会谈》,载《中共党史研究》1985年(4) 151-152页。

“礼品”：一是提供组建拥有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所必需的机器和设备，并派专家来华帮助建设这个农场；一是将正在中国展览的苏联机床和农业机器无偿赠给中国。^①此后不久（1953年 9月），中苏双方在1953年 9月签署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签订了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中国以帮助的协定，苏方并请中国参加莫斯科国际原子能研究机构，促成中国建立起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为中国原子能工业基础的建立提供了条件。另外，赫鲁晓夫此次访华期间还向中国领导人表示，苏方可以考虑放弃1953年 9月苏中双方签订的秘密《补充协定》。1953年 9月 15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提出该协定已不符合苏中之间现有的友好关系的精神，建议予以废除。中国复照表示同意。至此，苏联正式放弃了其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两个“势力范围”。应该说，赫鲁晓夫所采取的对华新方针和新措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和积极的意义。这次赫鲁晓夫以扩大援华为目的亲自率团访问中国，一反斯大林时代由中共领导人前往莫斯科拜谒的惯例，其本身就反映了一种对华关系的平等姿态，表明苏联承认中国是其在亚洲和世界事务中的平等伙伴，以及新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具有决定性发言权的大国地位。

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也确使毛泽东感受到了与苏联交往中前所未有的平等气氛。过去斯大林在世时，对待中国的态度是不平等的：迫使中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补充协定》，实质上是想长期控制中长铁路和旅顺口，把中国的东北、新疆作为两个势力范围；在建立中苏合营公司时，断然拒绝中国方面为利于掌握控制权而多占一点股份的提议；以一般物资援华，换取中国的稀有金属等战略物资，签订橡胶协议时，要求中方在未生产出橡胶前须从国外购买再转给苏联，而价格不得超过国际市场价格，若不能如约供应，就减少对华汽车援助；朝鲜战争中瞻前顾后，出尔反尔，尽由中国人在前方流血牺牲，自己则躲在幕后作壁上观，等等。特别是斯大林在历史上就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本人有一种错误认识和错误态

^① 《人民日报》1953年 9月 15日。

度,使毛泽东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而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苏联采取的极为苛刻的做法和不平等的方针,更令毛泽东感到是处于一种忍气吞声的屈辱地位,憋了“一肚子气”,认为斯大林不平等待人,“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①而赫鲁晓夫对中国所作的许多实质性让步,使斯大林时期遗留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毛泽东得以一吐长久压抑心中的充当斯大林“小伙伴”的怨气,在对苏交往中真正挺起了腰板。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一点时曾说,“第一次与赫鲁晓夫同志见面,就很谈得来”,他取消了有损中国主权的“合作社”,“建立了信任”。^②对于赫鲁晓夫的平等合作精神及扩大对华援助的做法,毛泽东深表感谢,他在 1955 年 5 月 15 日致函周恩来时专门提到,在中苏签署的有关文件发表时,“要写社论一篇”,以示对此事的重视。^③两个星期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又在参观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时作了长篇题词,热情赞扬这种“情同手足的友谊”^④。

作为对赫鲁晓夫新方针的有效回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这一时期的对苏政策上也表现出充分信任和精诚合作的态度。从 1955 年至 1956 年间,中国在苏联与东欧七国政府缔结华沙条约、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交、与美英法签订对奥和约、与西方举行裁军谈判、发表和平宣言等诸项外交活动中全力支持苏联。此外,中国政府还响应赫鲁晓夫改善苏南关系的决定,与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关系。

除了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保持与苏联外交政策步调一致外,在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毛泽东也是基本上照搬苏联的模式,甚至把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选择用宪法形式明确固定下来。在对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草稿)》作修改时,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我们宪法草案中所宣布的“道路”,就是苏联所走过的“道路”,这在我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15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25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

② 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1955年 5 月 15 日。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25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55年 5 月 15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死比深厚的伟大友谊》的社论。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257页。

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①毛泽东认为苏联具有“三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将有助于中国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许多错误和少走许多弯路”。^②因此对苏联的经验抱着高度信任和真诚请教的态度。1953年10月1日毛泽东致函赫鲁晓夫，送上全国党代表会议刚刚讨论通过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和陈云同志关于“一五计划”的报告，“请求”苏方“替我们加以审阅，提出修改的意见”。毛泽东在信中还特别说明，即将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公布的计划“自然”“不应当和我们送给你们看的这个计划一模一样，有些机密的部分，我们是不准备公开的”。并向赫鲁晓夫表示歉意说：“要求你们看这样麻烦的文件，实在是过分的请求，但是你们的经验比我们多，为了少犯错误起见，还是请你们替我们看一下吧。”^③当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领导中国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时，对于苏联的经验更是依赖和重视。尤其是在1953年的农村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当党内一些同志根据苏联曾在农业集体化问题上犯过急躁冒进错误的教训，对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合作化的步骤、速度等问题提出正确的不同意见时，毛泽东指责他们是“利用苏联的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毛泽东的结论是，“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短期内基本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可能的”。^④

总之，赫鲁晓夫实施对华新方针，纠正斯大林在中苏关系问题上的错误做法，使毛泽东得以在较斯大林时期所处地位更为有利的基础上与苏联进行合作，胸臆直抒，振奋喜悦，直接促成了这一阶段中苏关系日趋密切，以达鼎盛。而此期中苏关系亲密无间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一，新中国创业伊始，百废待兴，特别是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亟须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从事经济建设，在毛泽东看来，苏联作为同一阵营的社会主义强国和邻国，是中国最可靠的安全保障；其二，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在领导中国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实现工业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囿于当时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138 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138 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138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5 年。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138 页。

的国际局势,只有苏联有能力并有可能大规模援助中国,因此只能以获得苏联经济援助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其三,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对立中,中苏有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安全利益。毛泽东认为,中苏两国的合作“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的合作”,在这个合作下,“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没有不能被粉碎的”^①;其四,赫鲁晓夫执政发轫,刚着手对苏联的内政外交进行改革,毛泽东于新政权建立之初,尚处在全面学习苏联的阶段,双方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上还没有发生矛盾,这也从主观上为中苏共度“蜜月”提供了保证。如此种种,决定了毛泽东要将中苏友谊与团结“无限地发展与巩固起来”^②。此外,从苏联方面看,赫鲁晓夫当时在国内的领导地位尚未稳固,非常需要寻求中国的支持,因而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对华政策,以博取中国好感。这从客观上为中苏关系进入最佳状态提供了条件。

(二)

第二阶段,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至1959年底莫斯科会议召开。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分别开始各自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面探索,这时双方的探索既有趋同性,又有背离性。其趋同性使此期的中苏关系显露出友好的、有时甚至是极亲密的表象,而其背离性又导致在亲密的表象下蛰伏着越来越多的不和谐因素,双方关系开始隐隐出现裂痕,由亲密无间转呈求同存异的状态。

1956年9月15日至20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提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战争并非注定不可避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可能通过议会道路过渡等问题,结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关于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六五”计划指示的报告中所强调的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和平的经济竞赛等问题,苏共领导核心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这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5 册, 367 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5 册, 367 页。

一苏联对内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总路线。在大会即将结束之际，1956年9月14日夜至15日晨，赫鲁晓夫又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并谴责关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为克服多年来斯大林模式造成的政治、经济上的弊病，迈出了冲破思想桎梏的决定性一步，这标志着苏联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全面探索的开端。对于苏共二十大的成果，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只是在全盘否定斯大林等问题上持保留态度，特别是在对斯大林评价的问题上，表明了与赫鲁晓夫的不同观点。毛泽东是在是年10月14日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就明确提出，斯大林不是在所有问题上，而是在一些问题上犯了错误。^①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时认定“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根据“这个分寸”撰写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又补充写道：“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②但是，对于二十大制定的总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则一开始就表示支持与赞同，并对赫鲁晓夫尖锐揭露斯大林所犯错误的历史意义予以肯定。10月16日《人民日报》以《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为题发表社论评赫鲁晓夫的苏共二十大总结报告，社论指出“赫鲁晓夫在总结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创造性的发展’，苏共二十大‘为整个国际工人运动指出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稳步地、全面地向前发展的方向’”。是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时又讲到“苏共在不久前召开的二十大上‘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并断言苏共的工作‘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③刘少奇所作的、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八大政治报告评价苏共二十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提出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而且对于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争取世界和平和

① 原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笔记，见《国外理论动态》1956年12月19日，第10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0册，第100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0册，第100页。

人类进步的斗争,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①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则指出,苏共二十大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对个人神化严重恶果的揭露。^②是月,毛泽东在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也谈到苏共对斯大林的批评问题,认为“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③。其后,赫鲁晓夫为了贯彻苏共二十大的方针路线,在 1956 年 2 月 21 日至 23 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组织了对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批判。毛泽东对此也表示认同,24 日中共中央即致电苏共中央,支持全会作出的决议。是日,米高扬奉赫鲁晓夫之命来华向毛泽东通报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经过,介绍“反党集团”成员的错误及他们同赫鲁晓夫等人在内外政策上的分歧。毛泽东表示支持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立场,并说:“对于苏联在内政、外交上的措施,我们是满意的。”^④1956 年 10 月 25 日,毛泽东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会上发表讲话,评价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奋斗纲领”,是苏共“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解决实践中的任务”的“一个范例”。^⑤11 月 15 日,毛泽东又在莫斯科 1956 年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明确指出,赫鲁晓夫同“莫洛托夫集团”的“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一条是比较正确的路线。斯大林死后这四五年,苏联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就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⑥。总之,这一阶段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拟定的内政、外交方针总体上是支持和赞同的,并强调与其保持一致性。

此期中苏两党的关系方面,经中共参与苏共对东欧局势的处理,双方在政治上的合作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956 年 10 月波兰局势进一步恶化后,苏联对哥穆尔卡出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横加干涉,欲动用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158 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28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

③ 《毛泽东外交文选》,158 页。

④ 毛泽东与米高扬的谈话,1956 年 2 月 24 日。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158 页。

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158 页。

武力解决苏波分歧，并要求中共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商谈处理办法。毛泽东在接见尤金大使时表示不同意苏联的做法，建议苏联承认以哥穆尔卡为领导的波共中央，争取把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①此后，刘少奇受命率团赴苏与苏共领导共同商讨波匈事件的处理方针。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十分尊重，刘少奇和邓小平甚至可以参加苏共主席团会议，双方的合作可谓发展至极。东欧局势平定后，赫鲁晓夫由于在处理和兄弟党关系问题上的大国、大党主义错误，陷入孤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批评赫鲁晓夫的错误的同时，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1956年11月15日，周恩来在华沙同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举行会谈。哥穆尔卡通报了赫鲁晓夫在处理波兰问题中的恶劣作风，甚至鄙夷地形容他“像一个小丑”。周恩来则在指出苏共以父子关系对待兄弟党的做法是错误的同时，强调说以苏为首是主要的，而它在平等原则上所犯的错误是次要的。中共认为还不应公开谈论苏共的“父子党”问题，不能削弱苏联。周恩来还提醒哥穆尔卡：不要鼓动起波兰人民的民族情绪，目前首要的问题是以苏共为首，团结对敌。^②此后，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苏联的威信，帮助赫鲁晓夫摆脱困境，又做了许多工作。毛泽东在1956年12月莫斯科会议期间进一步指出：我们这里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没有中心，没有苏联共产党，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他赞成哥穆尔卡所说的“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③并主张我们应该帮助赫鲁晓夫等同志，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兄弟，支持他们。^④赫鲁晓夫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⑤中苏两党密切合作，保护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稳定及不受侵犯。

①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2卷，176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49—1956）》，27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② 波中会谈记录，1956年11月15日和16日，波兰问题档案第19号，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编：《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英文本），1956（卷），196—197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卷，176—177页。

④ 毛泽东与哥穆尔卡的谈话，1956年12月15日。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卷，176页。

在两国领导人交往时的外交礼仪上,中苏双方也都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安排。1952年11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为表示波匈事件后中国对苏联的支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亲往机场迎接,并破例安置伏罗希洛夫住进中南海,礼仪规格之高超过了1951年对赫鲁晓夫的接待。而1952年11月15日毛泽东率团抵苏时,也是下榻于以往从未接待过外国代表团的克里姆林宫,其境况更是大异于1951年末1952年初毛泽东访苏之时。

这一阶段中苏关系能够保持热烈友好的表象以及政治上的趋同性的原因在于:

第一,毛泽东认为巩固同苏联的团结是“基本利益所在”^①。在对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上,毛泽东的基点在于,保卫中国革命胜利果实的外部条件,“特别重要的是苏联的存在和声援”,“没有苏联,我们都可能被人家吞掉”。有了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中国才不会孤立。^②毛泽东在1952年莫斯科会议期间反复谈到,就钢产量、卫星、核武器等经济和军事实力而言,只有苏联可与美国相抗衡,苏联是维护世界和平、制约战争的重要因素。^③强调要迫使西方退让,首先须依靠苏联,这是大局,其他的小别扭是小局。要看大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④以利于中国争得和平环境,抓紧进行国内建设。在对国家经济利益的考虑上,毛泽东仍然十分重视苏联的经济援助,他特别把苏联的援助与东欧和亚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区别开来,认为前者才是巨大的援助。进而强调“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谁对中国援助大就学谁。他认为“如果拒绝同苏联友好相处,那就只能损害本国人民的真正利益”^⑤。正是出于这种对国家基本利益的关注,毛泽东认为中苏之间还可以求同存异,继续合作。因此,当苏共二十大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385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384-385页。

③ 毛泽东与英共主席波立特和总书记高兰的谈话,1952年11月15日;毛泽东与哥穆尔卡的谈话,11月15日;毛泽东与陶里亚蒂的谈话,11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385-386页。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386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385-386页。

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隐约显出多中心的趋向时，他表示赞成一元论，坚持奉苏联为中心。^①

第二，在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初，中国与苏联在改革或调整经济方针的方向上是一致的。赫鲁晓夫在苏联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认识到触动斯大林模式的迫切性、改革的势在必行。毛泽东则在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揭露之后，结合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认识，看到了走自己道路的重要性。应该说，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建设问题的探索是在思想获得解放的前提下，吸取苏联此前对斯大林模式进行调整的经验，借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新的经济建设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开始的。双方探索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工业化方针、经济管理体制等问题上。苏共二十大提出苏联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急速发展农业生产，大大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在此指导思想下，赫鲁晓夫继续减轻对农民的剥夺，提出增加肉类生产和收购任务、取消集体农庄庄员私人产品义务交售制、建立工农关系及城乡关系新体制、扩大垦荒面积等措施，并提出要在几年内使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奶类、油脂和肉类产量赶上美国的口号。^②而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也主张“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绝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提出了要以重工业为主，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工农业“同时并举”的中国工业化的指导方针。^③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吸取了斯大林“把农民挖得很苦”，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实现工业化的教训，根据本国国情认识到农业与农民问题这个在东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关键性环节的重要性。毛泽东提出的“工农业同时并举”的

① 毛泽东与哥穆尔卡的谈话，见《毛泽东传》第10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00页；毛泽东与米高扬谈话，见《毛泽东传》第10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00页。

② 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所编：《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1956年11月～1957年10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沈志华、于沛编：《苏联共产党 1956年～1957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周尚文、叶书宗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

中国工业化道路与赫鲁晓夫提出的苏联工业化道路,在方向与目标上均无背离,都是一种工农业全面发展的战略。同时,他们从根本上都是仍然坚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农业,都没有最终突破斯大林经济发展战略的框架,没有对重、轻、农的比例关系作出实质性调整。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赫鲁晓夫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下放一部分企业管理权,改变过去管理权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各加盟共和国在管理和经营方面的主动权,以调动企业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和工人的劳动热情。^①毛泽东也主张改变过分集中的现象,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力,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不能只顾一头。^②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都在试图对传统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但他们也都未能从根本上打破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框框,正确处理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综前所述,此期毛泽东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赫鲁晓夫的改革有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基本上是同步发展的,即如后来毛泽东自己所总结的:“1956年 9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只是方法有所不同。”^③可见,正是这种对经济模式探索的趋同,保证了毛泽东对苏联内政外交政策的肯定及中苏关系的基本协调。

第三,在一些政治问题上,苏共对中共的观点表示认同。如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问题上开始转而向毛泽东及中共的立场趋同。赫鲁晓夫毕竟是斯大林时代培养出来的干部,如同他无法冲破苏联传统的经济模式一样,他也无法完全摆脱斯大林政治的影子。二十大秘密报告的出台带有匆忙和冒险的性质,导致了对斯大林的评价缺乏历史性、全面性。形势的变化迫使赫鲁晓夫进行重新思考。特别是波匈事件后,赫鲁晓夫一度陷入

① 《苏联共产党 1956年 9月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6年 10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6年 11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6年 12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7年 1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7年 2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7年 3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7年 4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7年 5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7年 6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7年 7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7年 8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7年 9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7年 10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7年 11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7年 12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8年 1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8年 2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8年 3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8年 4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8年 5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8年 6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8年 7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8年 8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8年 9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8年 10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8年 11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8年 12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9年 1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9年 2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9年 3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9年 4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9年 5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9年 6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9年 7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9年 8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9年 9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9年 10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9年 11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59年 12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60年 1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14日 15日 16日 17日 18日 19日 20日 21日 22日 23日 24日 25日 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31日 1960年 2月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7日 8日 9日 10日 11日 12日 13日</

孤立。苏共上层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的活动，使他的政治领导地位受到威胁，亟须寻求中国的支持，从而转向认同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的立场。1956年9月中国《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后，苏联《真理报》即予以转载。苏联国内也中止了深入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活动。^①10月19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后，莫斯科广播电台由全苏最著名播音员反复播送该文，赫鲁晓夫并向刘晓大使表示对这篇文章诸字诸句都同意。^②1956年11月15日赫鲁晓夫在中国驻苏大使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发表讲话时进一步明确谈道：“斯大林本人是同伟大的共产党员称号不可分割的”，他“英勇地、毫不妥协地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我们批评斯大林“是因为他有一些偏差和不良的品质，是因为他犯了严重的错误”。12月29日赫鲁晓夫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上又指出：“作为忠心耿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坚强的革命家，斯大林在历史上将占有应有的地位。我们党和苏联人民将记住斯大林并且给予他应有的评价。”^③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对赫鲁晓夫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政治方针的趋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双方之间的隔膜。

然而，这一阶段的中苏关系并非完全表现为这种趋同性。在上述热烈、友好气氛的表象下，遮掩着愈益增多的不和谐因素，裂痕已开始形成。与趋同性并存的是不断扩大的离异性。

这种离异性首先表现在毛泽东不再迷信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开始逐渐摆脱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援助的方针。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就反复强调，对苏联的经验“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④。是年10月15日和19日，毛泽东在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修改中又进一步强调，中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

① [苏]罗伊·梅德韦杰夫：《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中译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

② 笔者1992年10月15日采访荣植的记录。

③ 《苏联共产党70年》，莫斯科，1987年。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1953年，157页。

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提出,中国的建设也要以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一切依赖外援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① 1956年10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大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讲道:“那种以为不必建立我国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专门靠国际援助的依赖思想,是错误的。”^② 1956年10月,周恩来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关于苏联援助我国“二五计划”建设项目谈判情况的报告时指出,“苏联在某些方面还留一手”,赫鲁晓夫两年前来中国时就说,苏联帮助中国不是无私的,也是为了自己。因此“要去掉依赖思想”,“我们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③ 是年10月,毛泽东在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第六稿时,则干脆删去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一句。^④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探索自己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已经开始出现对苏联建设经验和经济援助的怀疑和离异,这种状况与1953年和1954年对苏联的完全信任和依赖已大不相同。

毛泽东在政治上也开始对苏联表示不满。如前所说,对于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提出的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毛泽东早就有不同意见。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又对赫鲁晓夫及苏共的“老子党”和大国主义作风多次提出批评,促使苏联政府于1956年10月14日发表宣言,承认过去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方面犯了错误,宣布今后苏联将始终贯彻列宁的各国人民平等的原则,表示准备讨论一些措施,以消除破坏国家主权和平等互利原则的任何可能性。^⑤ 此后,毛泽东在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对苏联的批评大为升格。1956年10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责赫鲁晓夫:“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并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156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103-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

③ 《特殊而复杂的课题》,125页。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156页。

⑤ 宣言全文见《新华月报》1956年第10号,156页。

“列宁这把刀子”，“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相当多了”。^①毛泽东还开始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公开了中苏关系出现的矛盾，并表示了对苏联和赫鲁晓夫的极大不满。1956年11月10日，他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到中苏关系时说：“我看总是要扯皮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并透露他曾给在莫斯科与苏共会谈的周恩来打电话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毛泽东讥斥说：“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马克思主义者”！“这有什么了不起”！“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毛泽东还指出：“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手里还留了一把”。对于中苏关系状况表示“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②可见，中苏关系依旧非常友好的表象，实际是由“大体过得去”的状况暂时支撑着的。

与前期明显不同的是，这一阶段中苏之间热烈友好的关系已不是由以往单纯的意识形态认同和真实的感情交往使然，其间已经搀杂了许多各自的实际利益和利害关系——苏联的对华援助及中国的对苏批评都注意各留几手，并开始相互提防。表面上的亲密恰恰表明了过去无间的关系已一去难返。例如，1956年11月17日米高扬受赫鲁晓夫派遣率团访华，向毛泽东及中共解释苏共二十大的方针政策，同时代表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协定，增加援建156个新的工业企业，即已带有施以经济利益，换取中国对苏共新方针支持的意向。再如，1956年11月伏罗希洛夫访华，中国极力想向他了解苏联领导集团的矛盾和变化情况，但在衔命随同前来的费德林的全力“陪护”下，竟然找不到与伏罗希洛夫单独接触的机会，结果一无所获。又如，1956年12月间，苏方非常希望毛泽东能参加将于12月举行的莫斯科会议，帮助赫鲁晓夫及苏共彻底渡过难关，因此，尤金大使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1961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1984年，157页。

频繁打电话询问毛泽东是否能去。但由于当时正在莫斯科进行的中苏关于导弹等国防新技术援助问题的谈判尚无结果,中国迟迟不对苏方给予明确答复。而当双方关于该项援助的协议草案拟就之时,赫鲁晓夫即直接向中国代表团团长聂荣臻提出:苏方可以向中方提供国防新技术资料和样品,不过,毛泽东是否能出席莫斯科会议?毛泽东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刻明确答复:去。给赫鲁晓夫这个面子。但还是待 1959年 6月 15日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后,才正式宣布将由毛泽东率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①这样,双方经几个回合的讨价还价,才实现了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及苏共的大力维护。而此时毛泽东提出的“以苏为首”,已经不是无条件的了,其“最大的必要性是对付资本主义国家”。^②这充分表明此时中共对苏联的支持实质上已成为应付西方世界进攻的一种权宜之策了。

此期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产生不信任感、中苏两党之间裂隙生成并伏下隐患的原因有四:

其一,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对毛泽东而言,也是一次极大的思想解放。苏联建设模式弊端的逐渐暴露及赫鲁晓夫所作的各项改革、提出的“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促使毛泽东感到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开始以苏为鉴,着手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虽然初期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探索具有方向上的趋同性,因而双方在对内经济改革方针上并无根本分歧,但毛泽东这时反复强调的是不以教条主义态度学习苏联经验,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对于苏联来说,这种做法突出显示了一种离异趋向,从而加深了对中国的戒心。“以我为主”的发展思路当然是积极的,但是反右派运动开展之后,毛泽东改变了经济建设探索的方向,从而与苏联的改革方针产生分歧。1959年 6月 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对中共中央 1958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批评,认为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

^① 引自笔者 1982年 6月采访荣植和朱瑞真同志记录;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下, 1988年 12月,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9年。

^② 毛泽东与哥穆尔卡的谈话, 1959年 6月 15日。

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① 这种方针的调整自然使苏联感到不满和不安。

其二，毛泽东在进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探索时，对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等根本问题的估计和处理，一开始就与赫鲁晓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有所不同。这种背离现象的不断扩大，深刻影响了毛泽东的对苏认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开始的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批判，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指出斯大林“~~广泛地~~关于苏联愈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越尖锐的错误公式”不符合苏联社会的实际情况，它作为“粗暴地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大规模进行镇压的论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党和国家内的民主的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苏共的新提法是，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苏联的阶级斗争矛头已主要转向了国际舞台，苏联国家消亡的过程已在进行之中，“国家管理的职能正在改变”，强制性国家机关“目前主要是防止外部敌人的阴谋的机关”。^② 毛泽东对此本来就有保留意见，特别是在波匈事件发生以后，东欧局势的动荡和国际上反共高潮的掀起，对毛泽东造成极大震动。他断言“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③。毛泽东把匈牙利事件与中国国内出现右派分子活动的情况联系在一起，发动了反右派斗争。为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毛泽东指示要“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在各个机关、学校去演习，“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以利于“挤出脓疮”。^④ 由此，毛泽东转而否定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的正确结论，也即否定了他过去对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正确认识。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⑤ 毛泽东在把主要精力从经济建设逐渐转向阶级斗争的同时，对苏共二十大及赫

①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 157 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年。

② 《苏联共产党 40 年》第 157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57 页。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第 157 页。

⑤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 157 页。

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本意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产生了怀疑,对苏联的非斯大林化现象由喜大于惧转为惧大于喜,增加了对苏联的戒心,也影响了中国对苏政策的制定。

其三,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上也存在着矛盾。对于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战争可以避免等方针,毛泽东一开始即持保留态度。经过波匈事件,特别是了解到国际资本主义力量对匈牙利反动政府活动在舆论和物质上给予支持和援助的情况,毛泽东不仅在国内问题上将注意力重新转向阶级斗争,而且在对外方针上也开始明确表示关于和平共处等问题,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强调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强调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在他看来,不能为了求得和平而放弃斗争,同敌人妥协,限制无产阶级革命。由此认为,苏联领导人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的结果,是使帝国主义拿它来杀人。^①不过,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这方面的矛盾此时尚未发展为对外根本战略上的重大分歧,还能够求同存异。只是在“存异”的过程中,双方的隔阂逐渐增大,加深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疑虑。

其四,中国参与对波匈事件处理的结果是,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大大提高,而赫鲁晓夫和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则受到相当冲击。这一点在 1956 年 10 月莫斯科会议上体现得极为明显。例如,毛泽东及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受到特殊待遇:各代表团均被安排在宾馆下榻,只有中国代表团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各代表团均须将发言稿提交苏共中央批准,只有毛泽东是准备了提纲,而无须事先提交发言稿;各党代表发言均须站在讲台上,只有毛泽东可以坐着讲话。^②再如,以往这种会议都是由苏共准备宣言草案,而这次大会讨论的是中苏两党共同起草的草案。会议召开前,毛泽东拒绝接受苏方提出的宣言草案等文件,中苏双方在交换意见时针锋相对,发生激烈争论,苏方被迫作出退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 149 页。

② 《俄》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关系》,载《党的文献》1992 年第 1 期 13 页。

让双方达成协议，才产生了提交各代表团讨论的宣言及声明。^① 还有，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一再否定或拒绝苏共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也纷纷在会上找毛泽东交换意见，而毛泽东在维护苏联地位的同时，提醒他们不要抄袭、照搬外国经验，要根据各国的需要，因为苏联的需要与中国及各国的需要不同。强调要服从真理，不服从大国。如果真理在一个小国而不在苏联，那也得服从前者。^② 总之，这次会议表面上以苏为首，而实际上是中苏共同主事。在中苏两党密切合作的表象下，毛泽东精神振奋，谈笑风生，说话算数，而赫鲁晓夫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只能勉强屈从，忍气吞声。这无疑也为中苏结怨埋下了种子。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中苏关系已开始走下巅峰，进入表面热烈，实质冷淡，大体过得去，求同存异的状态。

(三)

第三阶段，从1956年初至1959年末。这三年，在表面上维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口号下，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不断朝相互拆台的方向发展，双方关系一年比一年冷淡，直至走向公开分裂。

此期中苏矛盾不断激化、裂痕逐步加深并最终呈现分裂局面的表现是：

其一，政治路线和观点的分歧继续扩大并且公开化。对于批判斯大林问题，毛泽东的否定态度进一步加强，从对斯大林有批评地维护，发展到对斯大林的基本认同。此前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还是持“三七开”认识的，批评斯大林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呼吸这样的空气是不行的。他已经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成吉思汗”，并赞扬赫鲁晓夫勇敢地掀掉了苏联问题的“锅盖”，“及时地防止了爆炸”。^③ 这时则认为

① 毛泽东与哥穆尔卡的谈话，1956年1月15日；毛泽东与波兰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1月16日。

② 毛泽东与印共总书记高士的谈话，1956年1月16日；毛泽东与哥穆尔卡的谈话，1956年1月15日。

③ 瓦西里前引文，190页。

中国党内有人“对赫鲁晓夫打死斯大林这种压力”“随声附和”，“对反个人崇拜感兴趣”。还指出个人崇拜有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两种，并说“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①对于苏联的经验，毛泽东则进一步强调要择善而从，要有独创精神，要打倒贾桂，不做奴才。^②到了1956年9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毛泽东开始公开指责有人拿原子弹吓人，“拿苏联吓人”。批评中国的工业、军事“没有苏联就不能活”的观点，指出“此论不通”。^③从1956年9月《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开始，中苏两党就时代、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问题在报刊上展开了互不指名的公开论争，直至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组织对中共的围攻，中苏两党关系进一步恶化。

其二，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发展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矛盾。1956年9月至10月，中国领导人就苏联提议在中国合建大功率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问题与苏方发生争执。毛泽东认为这两件事都是涉及主权的政治问题，强调说明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并在1956年10月16日同尤金大使会谈时严厉指出：“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要租借权”，“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还指责苏联“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④10月16日赫鲁晓夫专程赶到北京就此事向毛泽东作解释，不承认苏联曾建议与中国搞共同海军，否认要将自己的方针强加于人。毛泽东则坚持认为苏方是在讲政治条件，不共同建设就不给帮助。毛泽东表示“我们一万年不建设海军也没关系。你们去搞原子弹，我们去打游击战。我们没有原子弹，没有军舰，将来索性把全部海岸线都给你们，叫你们打好了。”^⑤应该说，苏联此时提出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建议固然有为了本国安全利益、漠视他国的主权的倾向，但赫鲁晓夫的本意还不是想要控制中国，其主旨是要在与美国对抗的冷战中在远东地区把握住有

①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0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15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156页，157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157页。

④ 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1956年10月16日。

⑤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谈话，1956年10月16日。

利的形势及条件。而毛泽东对此事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表露出他对相邻的这个核大国具有极度的不信任感和戒心，并由此敏感地认为“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赫鲁晓夫是要控制中国，中国的主权、独立受到了威胁。^①

其三，中苏在重大的国际行动中开始各行其是，互不通报，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协调一致、同舟共济的局面已不复存在。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蒋介石集团控制的金门、马祖。毛泽东采取的这一“直接对蒋，间接对美”^②的外交决策直接向赫鲁晓夫与美国缓和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挑战，而中国在决定采取此项重大行动之前，未像以前一样向自己的军事盟友、社会主义阵营的首领苏联通报情况，即使在8月16日至8月21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进行的四次秘密会谈中，也未就此透露半点信息。赫鲁晓夫对此极为不满，只是在得到中国自己对此事件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的明确保证之后，才两次致函艾森豪威尔总统，表明了对中国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苏联将完全履行《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所承担的义务的立场。^③这与1958年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时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苏联主动倡议由苏、英、印度召集会议，邀请中、美、法等六国参加讨论消除台湾海峡危机问题，中国公开表示支持和响应。^④这次对于苏方提出的召开中、美、苏、印度等国最高级会议，研究缓和台湾海峡国际紧张局势问题的相同建议，中国却予以拒绝。毛泽东复函赫鲁晓夫，对其来信中所作的承担条约义务的允诺加以婉辞，申明了中国要独自处理由台湾海峡危机所引起的国际问题的意向。^⑤1958年8月中印边境冲突发生后，苏联则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明显地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并将中苏分歧公之于世。8月20日中苏两党就中美关系和中印边界问题举行会谈，赫鲁晓夫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以及与印度冲突、西藏问题上的立场提出指责，中

① 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1958年8月18日。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8册，345页。

③ 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函，1958年8月21日、23日，见《人民日报》1958年8月21日和23日。

④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国际事务概览》1958-1959，25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58。

⑤ 《特殊而复杂的课题》，345-346页。

苏双方发生激烈争论。显然,中苏两国在国际冲突中已无法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其四,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已经影响到两国关系,并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利益。1959年12月,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日内瓦进行禁止核试验的谈判,惟恐西方国家获悉其在核技术方面援助中国,从而“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①。苏共中央以此为借口,于12月16日致函中共中央,单方面撕毁了中苏1957年10月15日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一年以后,苏联为迫使中国低头就范采取了撤走技术专家、撕毁经济合同等更为极端的措施,从而先行迈出了国家关系破裂的第一步。此后,中苏边境纠纷随之肇始。所谓中苏同盟已经名存实亡。

造成这一阶段中苏关系上述走向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苏两党在内政外交政策方面出现了重大背离,而这种背离又导致了国家利益的严重对立。1956至1959这三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由1956年的局部性失误发展为严重错误。而这种错误又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毛泽东的对苏认识及中国对苏政策的变化。在这一阶段初期,毛泽东谈到中苏关系时还认为没有出现紧张局势,双方的一致和分歧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不同意见可以采取内部交谈的办法解决,“不能以怨报德,恩将仇报,公开骂苏”^②。而到1959年,中苏两党已经在时代、战争与和平、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等一系列根本理论问题上进行公开争论。毛泽东进一步突出强调目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也即右倾机会主义,彻底改变了他1956年对苏共二十大路线的肯定性认识,开始不指名地将赫鲁晓夫归入了与南斯拉夫“同流合污”的现代修正主义行列。^③中苏两党的分歧日益扩大为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分道扬镳,相互间的不信任继续加深,双方合作的基础发

① 《特殊而复杂的课题》,267页。

② 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1959年12月16日。

③ 见1959年12月16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

生根本性动摇，终于导致了分裂局面的出现。

(四) 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左”倾错误的发展使他不仅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局限，而且在一些具体做法上比以前的苏联走得更远。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急于求成，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年初，在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共八大所确定的反急躁冒进的正确方针进行了愈益严厉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了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的片面性口号，从而导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迅速蔓延。毛泽东又重新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重新肯定对农民剥夺以实现工业积累的方式，否定了1956年的正确探索。到1958年庐山会议，毛泽东又终止了他于1956年末开始的对“左”的偏差的纠正，转而再次反右倾，促成了1958年的第二次大跃进。与此相反，赫鲁晓夫在这一时期则继续推行权力下放地方和企业、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增加农业投资和农业贷款、完全免除私人农产品义务交售制、鼓励农产品自由买卖、缩短劳动日、调整工资等消除经济管理体制弊病、重视发展农业、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①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经济建设方针问题上探索的距离越拉越大，相互之间的指责也越来越激烈。1958年10月《经济消息》第140期刊载《财经各部委党组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认为苏联过分强调平衡，强调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而不是首先强调发展速度，计划和比例关系绝不能束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该文经毛泽东批示，在武昌会议上作为文件印发。^② 毛泽东把全面实现全民所有制、公社分配制度中供给部分逐步增多、商品经济范围逐步缩小等问题看作是共产主义因素和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条件增长的过程，认为苏联忽视甚至阻碍这个过程，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将来是不适当的。^③ 而苏联对于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向共产主义过渡、吃饭不

① 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1964年第140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0册 158—159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0册 158页。

要钱等“新事物新思想”不理解、不支持。^① 1959年7月,赫鲁晓夫在波兰一个生产合作社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谈苏联过去的公社,指出苏联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建立公社未获成功,是由于当时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毛泽东认为这篇演说是抬出马克思的原则当法宝,“祭起来打我们”,指示将它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②

(四) 在国内政治方面,中苏两党的发展方向也是背道而驰的。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重又认为右倾问题已成为当时的主要危险,转而发动大规模反右倾斗争,并将党内关于不同意见的争论上纲为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③,开始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发展。而此期苏共对政治体制改革上的探索则向相反的方向延伸。赫鲁晓夫在1959年9月的共青团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人民自动调节”的思想,并在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会上提出,在苏联社会主义已取得完全彻底胜利的情况下,“国家组织发展中的主要方向是尽力发展民主,吸引全体公民参加领导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工作,参加管理社会事务的工作”。国家消亡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社会自治组织的问题”^④。这即已提出了由无产阶级专政向人民民主(以后发展为“全民国家”理论)过渡的意向,进一步否定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方式。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在搞现代修正主义;而赫鲁晓夫则把中共的政治方针指责为教条主义。

(五) 在对外政策方面,中苏双方的外交战略思想发生了全面性和根本性的重大分歧,从相互合作走向相互竞争,甚至相互拆台。赫鲁晓夫为进一步改善国内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于1950年代后期提出了举行东西方首脑会谈、展开和平竞赛、实施核裁军计划等缓和同西方关系的对外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556页;瓦西里前引文,227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44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556页。

④ 姚海:《赫鲁晓夫时期的政治体制改革》,载《苏联历史问题》1988(1),144-151页;《苏联共产党1989年》,140页。

方针，而中国在朝鲜战争以后，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正处于无法调和的尖锐对立状态，毛泽东的方针是以斗争求生存，要利用国际紧张局势的压力，调动国内的一切积极因素加速大跃进，以争取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增强国力、军力，超英赶美，与帝国主义相抗衡。中共批判苏共的对外方针是美化帝国主义，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①赫鲁晓夫则不断发泄他对中共炮击金、马及处理中印边境冲突政策的不满，不点名地攻击中共“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等等。^②

① 与此同时，中苏双方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从盟友变成了对手。毛泽东在鼓动超英赶美的同时，也密切关注苏联的发展动向，研究赫鲁晓夫 1956 年 10 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关于增加农产品生产任务的报告，开始暗中与苏联较劲。^③ 1956 年 12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搞出万吨钢，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④ 即已表露出要压过苏联的意向。是年末，毛泽东又在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认为经过高速发展的大跃进，中国有可能比苏联先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⑤ 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方面使苏联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威胁，令本已对苏中能否继续长期合作提出疑问的赫鲁晓夫更生出“养虎为患”的担忧，从而着手收缩对华经济与军事技术援助；另一方面刺激赫鲁晓夫也开始强调加速建设^⑥，并于苏共二十一大会上提出了超越国情的冒进的“七年计划”（1959—1965），以防备中国迎头赶上，将其抛到后面。

总之，1956 年至 1959 年中苏关系由亲密向分裂的发展变化，主要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以及中苏两党从本国立场和利益出发，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估计以及对对方探索方式的认识相联系。这种估计和认识构成了中苏两党两国制定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及对外方针政策的基础，而这一

① 《特殊而复杂的课题》325 页。

② 《特殊而复杂的课题》325 页。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 册 259 页。

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 册 369 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 册 325 页。

⑥ 中国驻苏大使馆的报告，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 册 369 页。

系列政策的趋同或分歧又反过来造成了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或对立。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一致,相互之间还以信任为主时,中苏关系就表现为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发生背离,双方的基本利益背离,相互间猜忌、戒备胜过信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淡,乃至趋向分裂。在这里,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都未把握住共同探索的机遇,选择了相互离异的道路,并直接影响了中苏关系数十年。

(原文载《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5期;收入1983年11月“中俄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战后中苏关系走向(1949-198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修订。)

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的兴衰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杨奎松

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 陈 兼

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紧接着,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的毛泽东访问了苏联,两国政府于1950年1月27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和苏联正式结为同盟国。

苏联是当时除美国外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就其版图和人口而言,至少在亚洲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国家。中国与苏联结盟,不仅极大地影响着新中国内外政策的倾向性,而且对世界政局也不可避免地要产生重要影响。在1950年到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中国出兵抗美援朝,迫使不可一世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坐到谈判桌上来,承认与中国人打了一个平手,这在表面上是中美两国的较量,实际上却是美国与结为盟友的中苏两国的较量。中苏同盟的作用和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由于中苏两国事实上一弱一强,互助同盟更多地表现为援助与被援助的关系,因此,这种同盟关系从一开始就受到中苏两国、两党利益上和认识上的差异的影响和牵制。特别是毛泽东长期以来相信,中国革命是在没有得到苏联多少帮助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既然如此,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当然不会把新中国的命运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恰恰相反,对苏联强大助力的需要,反而刺激着他要求政治上和经济上平等等地位的强烈政

治冲动。而中苏两国实力悬殊、地位迥异的现实，结果只能使两国关系陷于相对敏感的政治氛围之中。处于这样一种极其复杂的关系当中，毛泽东为迅速改变中国自身地位和根本改造中国社会而发起的一系列政治变革与政治斗争，不可避免地会对中苏同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严重估计，是中国 共产党人决心与苏联结盟的重要前提之一

新中国同苏联建立同盟关系，主要取决于两大原因：其一，是作为中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同样作为苏联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具有一致性；其二，是当时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与巩固政权的现实需要。前者属于“心心相印”，后者属于利益驱动。

意识形态在中共与苏联关系当中的重要性，可以用“一脉相承”四个字来说明。毛泽东在 1949 年 9 月，即新中国成立前夕，曾经公开说明过双方思想上这种联系的历史渊源。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国革命的真正起步，均得益于十月革命和俄国人，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模仿俄国人的方式，“走俄国人的路”。^①

什么是俄国人的方式、俄国人的路？简而言之，就是搞阶级斗争，就是通过激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造成被压迫阶级推翻压迫阶级的暴力革命，最终武装夺取政权，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为特点的革命方式和革命道路，是列宁缔造的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所独有的。因此，俄国革命胜利后，作为由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建立和领导的世界共产党组织——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之一，中国共产党自从其成立以来，始终就是以列宁主义的继承人和捍卫者自居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而列宁主义则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即是说，世界上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都必须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来认识世界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年。

和改造世界。

中国共产党人是通过坚持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方法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也正是因为他们始终坚持了这样一套政治法宝，他们才自信中国共产党与高举列宁主义大旗的苏联共产党人有着共同语言。不论苏共领导人怎样怀疑多数为农民出身的中国共产党人可能是“人造奶油式的共产主义者”，或是有着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铁托主义者，但是，在将近 1949 年充满血雨腥风的革命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始终保持着鲜明的阶级革命的意识。在与国民党两度合作的过程中，在某些具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小党派的相互支持中，以及在谋求美国政府支持的外交努力当中，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都须臾没有忘记阶级路线问题。其实，斯大林难以理解的，多半只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娴熟的统战政策。所谓统战，根据毛泽东的归纳，就是共产党人在阶级斗争中对“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的具体运用。因此，即使在与国民党关系最好的时期，如 1945 年抗战爆发、两党第二次合作之初，中共中央在公开表示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在内部并没有忘记告诫党的高级干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始终存在着谁吸引谁的问题，国共两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①。即使是对内战爆发后曾经努力与自己站在一起并肩反对国民党的各小党派，毛泽东也明确地把他们视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主张在“利用”的同时应有所“限制和改造”。^② 同样，即使在苏联方面怀疑中共与美国人的关系过于密切的 1950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内部也并没有忘记提醒全党注意，“每一国的资产阶级都恨死本国共产党”，因此“美国对我们的态度，（我们保持）很深的警戒是对的”。^③

①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5 年 12 月 28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5 年 12 月 29 日。

② 据米高扬讲，毛泽东甚至在 1949 年 12 月 28 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提出：“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之外，所有政党都要离开政治舞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国革命。转见列多夫斯基：《米高扬秘密赴华的使命》，载《远东问题》1950 年 1 期。对于这则资料，目前国内还有不同理解，甚至有批评其为假造者，但这种判断似乎武断了些，详见下文。

③ 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记录，1950 年 12 月 15 日。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不管中共领导人对苏联以及共产国际可能抱有怎样的不满,双方之间可能存在着怎样一些不愉快的事件,稍加分析即可看出,这些隔阂与障碍,说到底,更多的只涉及领袖个人之间的一些恩怨,只反映出具有独立精神的中共领导人,对莫斯科不顾中共需要一味强迫中共服从,在情感上及利益上引起的某些疑惑的甚至是逆反的心理,这并不影响中共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也并不影响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把中国革命看成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把莫斯科看成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从毛泽东 1940 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胜利“绝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到 1956 年他在七大上宣布苏联是“全世界共产党的总司令”,一直到 1959 年他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宣告“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这种一贯性,丝毫不因在此期间双方关系中所发生的一些不愉快事件而中断。^① 即使是在毛泽东以党内教条主义为对象,在延安发动整风运动,狠整惟莫斯科之命是听的王明等人之际,他仍不忘要求全党必须以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的教导为整风的依据,并频频向莫斯科保证:斯大林和苏联在中国共产党内受到普遍的爱戴和尊敬。他甚至同时告诫党的领导人,不要试图把矛头指向共产国际和苏共,因为王明等人自称“国际路线”,但这是不对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不是没有错误的,有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然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路线是不错的,王明等人的路线“并不是共产国际的路线”,而是“自造自卖的道地货色”,“这一点是断乎不可以不辩的”。^②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急于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当然不只是因为双方观念上的这种一致性。毕竟,从延安整风暴露出来的严重分歧,表明在

^① 前引《毛泽东选集》,来源:来源页码;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上关于选举方针的报告,195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983 年编辑出版《毛泽东在七大报告和讲话集》时,将有关内容删去了。

^②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 192,目录号 192,卷宗号 192。毛泽东:《第三次左倾路线》,来源:来源页码。

双方的关系当中意识形态的一致并不具有决定一切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有着各自的利益范围。在中国共产党幼小无知，还需要苏联牵着手走路时，恰好有共产国际这种组织形式，架构了一种有助于其生长的父子关系。当中国共产党逐渐长大，有了自己的家业，自我意识和个性形成之后，它自然渐渐不能忍受一个“老子党”总是对自己的事指手画脚。但不论中共与苏联之间有着怎样的矛盾与争吵，纵使是闹到自立门户的程度，意识形态上的继承关系仍旧会像血缘关系那样，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继续把苏联看成是“自家人”。只不过，已经长大成人、独立自主的中共领导人，在自己已能够“成家立业”之际，是否还需要打出苏联的招牌，加入苏联麾下的那个大家庭，以加强其资本，保障其安全，就不是单纯的血缘关系可以决定得了的了，而要取决于他们对自身实力和政权基础牢固程度的判断，取决于他们对内外形势以及完成任务的前景的估价。从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一再表示担心美国勾结那些有“崇美”、“亲美”倾向和自由主义色彩的小党派，从内部破坏联合政府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中央决心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确有其超出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实际利益的现实考虑在内。

在蒋介石国民党成为残兵败将以后，毛泽东会对那些手无寸铁的小党派忧心忡忡，听起来仿佛是天方夜谭。但这确是事实。在农村同国民党打了将近二十年仗之后，马上坐到大城市里去，去同那些明显地与共产党格格不入的各色人等打交道，去收拾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去搞那些自己一窍不通，却又不得不搞的工业、商业、金融业，中国共产党人显然准备不足。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表示，不要急于占领中心城市，因为干部们久已习惯农村工作，对进入大城市还没有准备好。直到1949年10月与米高扬谈话时，他仍旧表示，他在一两年内都不急于占领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说共产党基本上是农民组成的，在大城市里不仅没有干部，党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即使上海的工人，多数也还拥护国民党。何况这些大城市的金融、生产、燃料、粮食等都已陷入严重危机，暂时不去占领只会增加居民对国民党的反感与不满，现在就拿到自己手里，未必对自己有利。关于这种情况，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交谈后也看得很清楚。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里指出：他

所会见的这些领导人其他方面谈起来都头头是道,但是,由于他们身居偏僻农村,远离城市,“在经济问题上素养很差。他们对工业、交通和银行的概念很模糊,没有任何有关在同国民党作战后所没收的日本财产的材料;不知道在中国有哪些重要外国企业,它们属于哪些国家;没有关于外国银行在中国活动情况的材料。他们甚至不知道哪些企业属于他们要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其中有多少在被解放了的地区,处于什么状态。他们所有经济计划都带有总目标性质,即使对于在解放区内由他们支配的计划也没有加以具体化。……他们对于他们打算作为国家经济支柱来掌握的企业(大银行、大工业等)也没有具体的计划”^①。

共产党人有句话,叫作:“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毛泽东很清楚,光会打仗还不行,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必须自己能统治,会建设才行。否则,结果必定和国民党一样。还在 1949 年初整个迁到北京城之前,毛泽东就特别提醒全党注意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入城的教训,并重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② 这突出地反映出他的担心所在。毕竟,与动员和率领几百万农民打仗相比,治理与改造一个有 1 亿人口的大国穷国,并且将它建设改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强国,对主要是农民组成的共产党人来说,确实困难异常。毛泽东在 1949 年 9 月及 1949 年 10 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几次提到这个问题。他清楚地意识到,要想治理和建设好未来的国家,光靠自己的农民干部不行,他将不得不利用大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也不能不和那些代表着这些人利益的“民主派”合作。但同时他显然对这些人不放心。他十分鄙视地把这些人称之为“微生物”,说“乡村的微生物较少,但到了城市就多了”。今后对待所谓民主人士的问题,“成了严重问题”,很麻烦。因为这些人习惯于“看风势”的,谁势力大就给谁捧场;同时,这些人是看不起中共的,认为共产党干部文化低,只会扭秧歌,要管理国家,离不开他们的“高级文化”,因而未必能够搞到一起

① 毛泽东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插话,1949 年 9 月;《高扬秘密赴华的使命》。

②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写的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之后,由于首领腐化和内讧迅速失败的情况。此文原发于 1949 年 9 月,毛泽东见后即专门印发,“叫同志们引以为鉴戒”。见《毛泽东书信选集》,1984 年 1 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

去，“危险很大”。^①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危险”，归根结蒂就是所谓“内部破坏”。在1949年建国前夕，他多次谈到过对未来政权遭到“内部破坏”的严重担心。这里所讲的“内部”，主要指的就是统一战线内部的中小资产阶级势力及其政党。1949年10月15日，斯大林明确表示，应当允许代表中国广大中间阶层的政党长期存在并加入政府^②，而毛泽东在当年10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却仍旧强调：建国以后，在经济上暂时可以不没收中小资产阶级的财产，继续保持联合的政策，但“政权上根本不要它”。他所以不愿意照斯大林的话做，原因就在于，在他看来，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虽然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却相应地突出起来了。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长期占据着城市，即使共产党进了城，控制了政权及文化事业，要在经济上与占有优势地位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竞争也未必能够成功，经济上的竞争一旦失败，政治上的优势也难以继续，“政权也可能变成铁托，那就又需要一次流血革命”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进入政府，资产阶级的优势更大，情况对共产党只能更加不利。因此，1949年10月初他见米高扬时，甚至对是否应当及早建立中央政府，也表示怀疑，称没有政府对革命更有利些。他的理由仍旧是，现在要建立政府，就得照斯大林的提议，吸收小党派代表的中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那时共产党做事就不能不去和政府内的这些小党派相商，等于自找麻烦。远不如乘现在不受束缚之时，先把该办的事情办好。出于几乎同样的担心，他甚至对建国以后是否要同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建立外交关系也颇为犹豫。他提议，即使成立了新政府，也不急于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发生关系。我们的革命是带反帝国主义性质的，帝国主义恨死了我们，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失掉了威信，它一定会利用阴险的手段从内部来破坏我们。同它们发生外交关系肯定会给我们的新政权带来很多麻烦，不如等相当一段时间，等到我们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和它的“社会基础”统统搞掉之后，再说承认的话。他对此有一句很形象的话，叫作“打

①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0月。

② 前引《米高扬秘密赴华的使命》。

扫干净房子再请客”^①。

毛泽东这时对国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势力的这种严重的担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下面这样两个原因促成的。

首先是汲取了苏联的经验和理论。毛泽东自从开始设想建国问题，就有针对性地重读了几本有关苏联建国经验及理论的书，并明确要求党的各级干部学习这些著作，其中像《国家与革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联共党史》等，都突出地强调了苏俄建设初期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如国内地主资产阶级勾结外国列强进行武装干涉、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叛乱、知识分子的动摇、农民小生产中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以及党内反对派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顽强阻挠，等等。这些内容给了毛泽东以及中共领导人以深刻的印象。正是苏联的这些经验和由此而产生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使他们把来自统一战线内部的这种威胁看得相当严重。毛泽东之所以强调要把政权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要公开宣传“赤色独裁”的极端必要性，提议不要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参加政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试想，从列宁关于小生产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的经验和理论出发，就够中共领导人伤脑筋的了，如果再让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发挥作用，岂不更麻烦？刘少奇曾明确告诉米高扬说：“我们一直记着列宁的指示：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源泉”，而“中国最复杂的问题就是小商品生产者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像汪洋大海一样，其危害自然比苏联要大得多。^②

其次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身的经验和观察。还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就积极与各小党派建立统战关系，相互支持，协调对国民党的立场。这种统战关系一直延续到抗战结束以后。然而，在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亲自来华调处国共关系以后，多数小党派与中共的关系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动摇。特别是在前燕大校长，在中国知识界颇有声望的司徒雷登博士充任美国大使，开始利用旧关系，在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派”中展开活动，力图在中国扶植亲美的自由民主派起而成为第三种势力之后，不靠国民党，也不靠共

① 前引《米高扬秘密赴华的使命》，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见《毛泽东传》卷四，月，远日。

② 前引《米高扬秘密赴华的使命》。

共产党走“第三条道路”的呼声竟一度演为一股不小的声势。由于在各小党派中，有不少共产党的同情者，因此这些小党派领袖与美国人和反蒋的国民党将领之间密谋“第三条道路”的情况，每每均为中共中央所侦知，这自然要引起他们极大的反感。即使在内战爆发两三年后，“第三条道路”渐成泡影，多数小党派又转向共产党，司徒雷登仍未停止其活动，许多美国人甚至公开宣传要在中共新政权内部扶植反对势力，这自然更加加重毛泽东等人对那些所谓“民主人士”的不信任感。故中共中央领导人这时一面仍旧主张对小党派施以联合之策，肯定“要胜利，就要统一战线”，一面却在内部主张对这些人要提高警惕，必要时要在群众中揭破他们“反动的一面”。毛泽东从1947年8月下旬至10月中旬为新华社一气写成的五篇狠批美国对华政策白皮书的评论文章，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这些仍旧对美国抱有幻想，并从侧面不断地劝说中共不要过于激进的所谓“中间派”、“中间阶层”、“落后分子”、“自由主义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之流而发的怒气。在他看来，这些人就是司徒雷登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等人用以实施孙行者钻进牛魔王肚子的阴谋的“社会基础”。而具有这种“错误思想”、“糊涂思想”、“反人民思想”的人，在中国还占相当数量，因而颇为危险。只是，“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因此对他们还只好联合，只好用和平的方法去说服。^①在打倒了帝国主义反动派之后，这是毛泽东认为在建国问题上最麻烦的一件事了。

当然，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担心与厌恶，并不仅仅停留在对巩固新生政权的渴望上面。对于毛泽东来说，巩固政权乃至发展生产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在把中国建设成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强国的同时，通过对社会和对人的根本改造，把中国引入到具有普遍正义与平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世界中去。毛泽东显然认为，中国革命不间断地前进，必然要引起统一战线内部的种种反抗。这种情况对毛泽东下决心与苏联结盟，是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000页。

斯大林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对毛泽东的支持和信任,是中苏同盟进入蜜月期的关键

对建国后国内政治形势的严重估计,也是同对国际上帝国主义,特别是同对来自美国的威胁的严重担心相联系的。根据苏联建国的经验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国内和国际的阶级敌人通常是串通一气、内外勾结来搞破坏的。像俄国十月革命后发生的十四国武装干涉,就是阶级敌人内外勾结破坏共产党政权的一个相当明显的证据。毛泽东尖锐批判国内那些“中间派”的“崇美”情结和“恐美”心态,清楚地反映出,他深信,一旦出现美国武装干涉的情况,这些本来就“崇美”、“恐美”,又习惯于“看风势”的中间派别和阶层,难免不会成为与美国人串通的“第五纵队”。

来自美国的威胁,对于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肯定是最直接,也是最严重的。对美国的敌视,同样是从阶级斗争的理论和自身的体验当中总结出来的。自从 1949年 10月他第一次提出帝国主义使世界联成一口气,中国与世界革命密不可分的观点^①以来,在他 1949年 12月、1950年 1月、1950年 2月、1950年 3月、1950年 4月、1950年 5月、1950年 6月、1950年 7月、1950年 8月、1950年 9月、1950年 10月、1950年 11月、1950年 12月、1951年 1月、1951年 2月、1951年 3月、1951年 4月、1951年 5月、1951年 6月、1951年 7月、1951年 8月、1951年 9月、1951年 10月、1951年 11月、1951年 12月、1952年 1月、1952年 2月、1952年 3月、1952年 4月、1952年 5月、1952年 6月、1952年 7月、1952年 8月、1952年 9月、1952年 10月、1952年 11月、1952年 12月、1953年 1月、1953年 2月、1953年 3月、1953年 4月、1953年 5月、1953年 6月、1953年 7月、1953年 8月、1953年 9月、1953年 10月、1953年 11月、1953年 12月、1954年 1月、1954年 2月、1954年 3月、1954年 4月、1954年 5月、1954年 6月、1954年 7月、1954年 8月、1954年 9月、1954年 10月、1954年 11月、1954年 12月、1955年 1月、1955年 2月、1955年 3月、1955年 4月、1955年 5月、1955年 6月、1955年 7月、1955年 8月、1955年 9月、1955年 10月、1955年 11月、1955年 12月、1956年 1月、1956年 2月、1956年 3月、1956年 4月、1956年 5月、1956年 6月、1956年 7月、1956年 8月、1956年 9月、1956年 10月、1956年 11月、1956年 12月、1957年 1月、1957年 2月、1957年 3月、1957年 4月、1957年 5月、1957年 6月、1957年 7月、1957年 8月、1957年 9月、1957年 10月、1957年 11月、1957年 12月、1958年 1月、1958年 2月、1958年 3月、1958年 4月、1958年 5月、1958年 6月、1958年 7月、1958年 8月、1958年 9月、1958年 10月、1958年 11月、1958年 12月、1959年 1月、1959年 2月、1959年 3月、1959年 4月、1959年 5月、1959年 6月、1959年 7月、1959年 8月、1959年 9月、1959年 10月、1959年 11月、1959年 12月、1960年 1月、1960年 2月、1960年 3月、1960年 4月、1960年 5月、1960年 6月、1960年 7月、1960年 8月、1960年 9月、1960年 10月、1960年 11月、1960年 12月、1961年 1月、1961年 2月、1961年 3月、1961年 4月、1961年 5月、1961年 6月、1961年 7月、1961年 8月、1961年 9月、1961年 10月、1961年 11月、1961年 12月、1962年 1月、1962年 2月、1962年 3月、1962年 4月、1962年 5月、1962年 6月、1962年 7月、1962年 8月、1962年 9月、1962年 10月、1962年 11月、1962年 12月、1963年 1月、1963年 2月、1963年 3月、1963年 4月、1963年 5月、1963年 6月、1963年 7月、1963年 8月、1963年 9月、1963年 10月、1963年 11月、1963年 12月、1964年 1月、1964年 2月、1964年 3月、1964年 4月、1964年 5月、1964年 6月、1964年 7月、1964年 8月、1964年 9月、1964年 10月、1964年 11月、1964年 12月、1965年 1月、1965年 2月、1965年 3月、1965年 4月、1965年 5月、1965年 6月、1965年 7月、1965年 8月、1965年 9月、1965年 10月、1965年 11月、1965年 12月、1966年 1月、1966年 2月、1966年 3月、1966年 4月、1966年 5月、1966年 6月、1966年 7月、1966年 8月、1966年 9月、1966年 10月、1966年 11月、1966年 12月、1967年 1月、1967年 2月、1967年 3月、1967年 4月、1967年 5月、1967年 6月、1967年 7月、1967年 8月、1967年 9月、1967年 10月、1967年 11月、1967年 12月、1968年 1月、1968年 2月、1968年 3月、1968年 4月、1968年 5月、1968年 6月、1968年 7月、1968年 8月、1968年 9月、1968年 10月、1968年 11月、1968年 12月、1969年 1月、1969年 2月、1969年 3月、1969年 4月、1969年 5月、1969年 6月、1969年 7月、1969年 8月、1969年 9月、1969年 10月、1969年 11月、1969年 12月、1970年 1月、1970年 2月、1970年 3月、1970年 4月、1970年 5月、1970年 6月、1970年 7月、1970年 8月、1970年 9月、1970年 10月、1970年 11月、1970年 12月、1971年 1月、1971年 2月、1971年 3月、1971年 4月、1971年 5月、1971年 6月、1971年 7月、1971年 8月、1971年 9月、1971年 10月、1971年 11月、1971年 12月、1972年 1月、1972年 2月、1972年 3月、1972年 4月、1972年 5月、1972年 6月、1972年 7月、1972年 8月、1972年 9月、1972年 10月、1972年 11月、1972年 12月、1973年 1月、1973年 2月、1973年 3月、1973年 4月、1973年 5月、1973年 6月、1973年 7月、1973年 8月、1973年 9月、1973年 10月、1973年 11月、1973年 12月、1974年 1月、1974年 2月、1974年 3月、1974年 4月、1974年 5月、1974年 6月、1974年 7月、1974年 8月、1974年 9月、1974年 10月、1974年 11月、1974年 12月、1975年 1月、1975年 2月、1975年 3月、1975年 4月、1975年 5月、1975年 6月、1975年 7月、1975年 8月、1975年 9月、1975年 10月、1975年 11月、1975年 12月、1976年 1月、1976年 2月、1976年 3月、1976年 4月、1976年 5月、1976年 6月、1976年 7月、1976年 8月、1976年 9月、1976年 10月、1976年 11月、1976年 12月、1977年 1月、1977年 2月、1977年 3月、1977年 4月、1977年 5月、1977年 6月、1977年 7月、1977年 8月、1977年 9月、1977年 10月、1977年 11月、1977年 12月、1978年 1月、1978年 2月、1978年 3月、1978年 4月、1978年 5月、1978年 6月、1978年 7月、1978年 8月、1978年 9月、1978年 10月、1978年 11月、1978年 12月、1979年 1月、1979年 2月、1979年 3月、1979年 4月、1979年 5月、1979年 6月、1979年 7月、1979年 8月、1979年 9月、1979年 10月、1979年 11月、1979年 12月、1980年 1月、1980年 2月、1980年 3月、1980年 4月、1980年 5月、1980年 6月、1980年 7月、1980年 8月、1980年 9月、1980年 10月、1980年 11月、1980年 12月、1981年 1月、1981年 2月、1981年 3月、1981年 4月、1981年 5月、1981年 6月、1981年 7月、1981年 8月、1981年 9月、1981年 10月、1981年 11月、1981年 12月、1982年 1月、1982年 2月、1982年 3月、1982年 4月、1982年 5月、1982年 6月、1982年 7月、1982年 8月、1982年 9月、1982年 10月、1982年 11月、1982年 12月、1983年 1月、1983年 2月、1983年 3月、1983年 4月、1983年 5月、1983年 6月、1983年 7月、1983年 8月、1983年 9月、1983年 10月、1983年 11月、1983年 12月、1984年 1月、1984年 2月、1984年 3月、1984年 4月、1984年 5月、1984年 6月、1984年 7月、1984年 8月、1984年 9月、1984年 10月、1984年 11月、1984年 12月、1985年 1月、1985年 2月、1985年 3月、1985年 4月、1985年 5月、1985年 6月、1985年 7月、1985年 8月、1985年 9月、1985年 10月、1985年 11月、1985年 12月、1986年 1月、1986年 2月、1986年 3月、1986年 4月、1986年 5月、1986年 6月、1986年 7月、1986年 8月、1986年 9月、1986年 10月、1986年 11月、1986年 12月、1987年 1月、1987年 2月、1987年 3月、1987年 4月、1987年 5月、1987年 6月、1987年 7月、1987年 8月、1987年 9月、1987年 10月、1987年 11月、1987年 12月、1988年 1月、1988年 2月、1988年 3月、1988年 4月、1988年 5月、1988年 6月、1988年 7月、1988年 8月、1988年 9月、1988年 10月、1988年 11月、1988年 12月、1989年 1月、1989年 2月、1989年 3月、1989年 4月、1989年 5月、1989年 6月、1989年 7月、1989年 8月、1989年 9月、1989年 10月、1989年 11月、1989年 12月、1990年 1月、1990年 2月、1990年 3月、1990年 4月、1990年 5月、1990年 6月、1990年 7月、1990年 8月、1990年 9月、1990年 10月、1990年 11月、1990年 12月、1991年 1月、1991年 2月、1991年 3月、1991年 4月、1991年 5月、1991年 6月、1991年 7月、1991年 8月、1991年 9月、1991年 10月、1991年 11月、1991年 12月、1992年 1月、1992年 2月、1992年 3月、1992年 4月、1992年 5月、1992年 6月、1992年 7月、1992年 8月、1992年 9月、1992年 10月、1992年 11月、1992年 12月、1993年 1月、1993年 2月、1993年 3月、1993年 4月、1993年 5月、1993年 6月、1993年 7月、1993年 8月、1993年 9月、1993年 10月、1993年 11月、1993年 12月、1994年 1月、1994年 2月、1994年 3月、1994年 4月、1994年 5月、1994年 6月、1994年 7月、1994年 8月、1994年 9月、1994年 10月、1994年 11月、1994年 12月、1995年 1月、1995年 2月、1995年 3月、1995年 4月、1995年 5月、1995年 6月、1995年 7月、1995年 8月、1995年 9月、1995年 10月、1995年 11月、1995年 12月、1996年 1月、1996年 2月、1996年 3月、1996年 4月、1996年 5月、1996年 6月、1996年 7月、1996年 8月、1996年 9月、1996年 10月、1996年 11月、1996年 12月、1997年 1月、1997年 2月、1997年 3月、1997年 4月、1997年 5月、1997年 6月、1997年 7月、1997年 8月、1997年 9月、1997年 10月、1997年 11月、1997年 12月、1998年 1月、1998年 2月、1998年 3月、1998年 4月、1998年 5月、1998年 6月、1998年 7月、1998年 8月、1998年 9月、1998年 10月、1998年 11月、1998年 12月、1999年 1月、1999年 2月、1999年 3月、1999年 4月、1999年 5月、1999年 6月、1999年 7月、1999年 8月、1999年 9月、1999年 10月、1999年 11月、1999年 12月、2000年 1月、2000年 2月、2000年 3月、2000年 4月、2000年 5月、2000年 6月、2000年 7月、2000年 8月、2000年 9月、2000年 10月、2000年 11月、2000年 12月、2001年 1月、2001年 2月、2001年 3月、2001年 4月、2001年 5月、2001年 6月、2001年 7月、2001年 8月、2001年 9月、2001年 10月、2001年 11月、2001年 12月、2002年 1月、2002年 2月、2002年 3月、2002年 4月、2002年 5月、2002年 6月、2002年 7月、2002年 8月、2002年 9月、2002年 10月、2002年 11月、2002年 12月、2003年 1月、2003年 2月、2003年 3月、2003年 4月、2003年 5月、2003年 6月、2003年 7月、2003年 8月、2003年 9月、2003年 10月、2003年 11月、2003年 12月、2004年 1月、2004年 2月、2004年 3月、2004年 4月、2004年 5月、2004年 6月、2004年 7月、2004年 8月、2004年 9月、2004年 10月、2004年 11月、2004年 12月、2005年 1月、2005年 2月、2005年 3月、2005年 4月、2005年 5月、2005年 6月、2005年 7月、2005年 8月、2005年 9月、2005年 10月、2005年 11月、2005年 12月、2006年 1月、2006年 2月、2006年 3月、2006年 4月、2006年 5月、2006年 6月、2006年 7月、2006年 8月、2006年 9月、2006年 10月、2006年 11月、2006年 12月、2007年 1月、2007年 2月、2007年 3月、2007年 4月、2007年 5月、2007年 6月、2007年 7月、2007年 8月、2007年 9月、2007年 10月、2007年 11月、2007年 12月、2008年 1月、2008年 2月、2008年 3月、2008年 4月、2008年 5月、2008年 6月、2008年 7月、2008年 8月、2008年 9月、2008年 10月、2008年 11月、2008年 12月、2009年 1月、2009年 2月、2009年 3月、2009年 4月、2009年 5月、2009年 6月、2009年 7月、2009年 8月、2009年 9月、2009年 10月、2009年 11月、2009年 12月、2010年 1月、2010年 2月、2010年 3月、2010年 4月、2010年 5月、2010年 6月、2010年 7月、2010年 8月、2010年 9月、2010年 10月、2010年 11月、2010年 12月、2011年 1月、2011年 2月、2011年 3月、2011年 4月、2011年 5月、2011年 6月、2011年 7月、2011年 8月、2011年 9月、2011年 10月、2011年 11月、2011年 12月、2012年 1月、2012年 2月、2012年 3月、2012年 4月、2012年 5月、2012年 6月、2012年 7月、2012年 8月、2012年 9月、2012年 10月、2012年 11月、2012年 12月、2013年 1月、2013年 2月、2013年 3月、2013年 4月、2013年 5月、2013年 6月、2013年 7月、2013年 8月、2013年 9月、2013年 10月、2013年 11月、2013年 12月、2014年 1月、2014年 2月、2014年 3月、2014年 4月、2014年 5月、2014年 6月、2014年 7月、2014年 8月、2014年 9月、2014年 10月、2014年 11月、2014年 12月、2015年 1月、2015年 2月、2015年 3月、2015年 4月、2015年 5月、2015年 6月、2015年 7月、2015年 8月、2015年 9月、2015年 10月、2015年 11月、2015年 12月、2016年 1月、2016年 2月、2016年 3月、2016年 4月、2016年 5月、2016年 6月、2016年 7月、2016年 8月、2016年 9月、2016年 10月、2016年 11月、2016年 12月、2017年 1月、2017年 2月、2017年 3月、2017年 4月、2017年 5月、2017年 6月、2017年 7月、2017年 8月、2017年 9月、2017年 10月、2017年 11月、2017年 12月、2018年 1月、2018年 2月、2018年 3月、2018年 4月、2018年 5月、2018年 6月、2018年 7月、2018年 8月、2018年 9月、2018年 10月、2018年 11月、2018年 12月、2019年 1月、2019年 2月、2019年 3月、2019年 4月、2019年 5月、2019年 6月、2019年 7月、2019年 8月、2019年 9月、2019年 10月、2019年 11月、2019年 12月、2020年 1月、2020年 2月、2020年 3月、2020年 4月、2020年 5月、2020年 6月、2020年 7月、2020年 8月、2020年 9月、2020年 10月、2020年 11月、2020年 12月、2021年 1月、2021年 2月、2021年 3月、2021年 4月、2021年 5月、2021年 6月、2021年 7月、2021年 8月、2021年 9月、2021年 10月、2021年 11月、2021年 12月、2022年 1月、2022年 2月、2022年 3月、2022年 4月、2022年 5月、2022年 6月、2022年 7月、2022年 8月、2022年 9月、2022年 10月、2022年 11月、2022年 12月、2023年 1月、2023年 2月、2023年 3月、2023年 4月、2023年 5月、2023年 6月、2023年 7月、2023年 8月、2023年 9月、2023年 10月、2023年 11月、2023年 12月、2024年 1月、2024年 2月、2024年 3月、2024年 4月、2024年 5月、2024年 6月、2024年 7月、2024年 8月、2024年 9月、2024年 10月、2024年 11月、2024年 12月、2025年 1月、2025年 2月、2025年 3月、2025年 4月、2025年 5月、2025年 6月、2025年 7月、2025年 8月、2025年 9月、2025年 10月、2025年 11月、2025年 12月、

①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 12月 26日，《毛泽东选集》1卷 137页。

② 毛泽东：《论新阶段》，1949年 12月 1日，《解放》第 7期，1949年 12月 1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中国文化》1949（1）；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9年 12月 1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9年 12月，《毛泽东选集》2卷 136-137页。

发生外交关系的尝试，又受到赫尔利“扶蒋”政策的沉重打击^①，使中共中央领导人对美帝国主义“反动本质”愈加深恶痛绝，到了美苏冷战格局已经形成，两大阵营的轮廓已经分明，南斯拉夫的模式^②已经受到批判的1949年代末，毛泽东更是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共产党“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③

每一个人都只能用他自己的方式和经验来看问题。毛泽东的方式是阶级斗争的，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即将诞生的弱小的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得出“一边倒”的结论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毛泽东的经验中，最重要的恰恰是充满血雨腥风的残酷的战争体验，这种经验告诉他的是：“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因此，“从古以来，反动派对于革命力量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反动派无一不坚持这条原则。我们的政策也必须是，对反动派，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④。从这种体验出发，毛泽东当然不会相信，自1949年底以来就顽固支持国民党政权的美国政府，会轻易承认它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尽管在即将夺取全中国的1949年里，他把美国军事干预的可能性事实上摆在第二位，而把美国利用王介石、张介石来实施“孙行者”钻进牛魔王肚子的“内部破坏”术的危险放在第一位，但他在实际上还是做了两手准备的。他致力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个基本原因就是为对付来自美国等国的威胁。他在1950年初签订条约回国之后即明确讲，缔结这样一个条约，就是要用法律的方式使苏联承担起援助我们的义务，使

① 赫尔利，美国总统特使，1945年12月受命来华参加调处国共关系。在此之前，美国部分外交官和美国陆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曾努力与中共建立起了较好的关系，并尝试着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赫尔利来后迅速加以制止，撤换了所有对共产党表示好感的外交军事人员，并企图诱使中共交出军队。

② 在二战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铁托领导的游击队曾与英国人密切合作，共同抗德，战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无力与共产党抗衡，因而铁托政权的建立，以及与苏联的若即若离，都同这一经历有关。

③ 《毛泽东选集》，1956年，1956年版。

④ 《毛泽东选集》，1956年，1956年版；毛泽东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9月。

我们获得一个可靠的同盟军,“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使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换言之,“帝国主义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①

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美国直接对新中国进行军事干预的危险虽然已不那么严重,但退据台湾岛的国民党人在美国的支持下对沿海地区的袭扰,和美国在南朝鲜、日本、菲律宾的军事存在,以及支持法国在靠近中越边境地区展开对越南胡志明政权的战争,所有这一切仍旧使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政权高度重视来自美国的威胁。而尤为重要的是,在毛泽东几度决心实施渡海作战,彻底清除来自国民党的威胁时,他发现,进攻台湾的问题竟成了一个国际问题。这不仅因为当时台湾的归属还要视美国的态度才能最后决定,而且因为中共军队没有渡海工具,苏联人又因为害怕与美国发生战争不肯施以援手。^② 这种情况更加激起毛泽东对美国强烈的敌视态度。

毛泽东不是那种轻易服输的人。他经常表现出一种不畏强手的挑战意识。所谓“纸老虎”的理论,就是他的这种意识的鲜明写照。关于“纸老虎”的说法是他在 1956 年秋天提出来的,在他看来,当时正面临国共关系的转折关头,是战是和,亟须定夺。由于美国政府明显地支持蒋介石国民党,苏联又经常表现出反对中共开战的态度,向国民党开战就意味着必须准备独自向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挑战,其危险之大,使得党内众多干部对和战决策顾虑甚多。然而毛泽东就是不信那个邪。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就是他在这个时候,为了扫除党内存在的“恐美”心理而提出来的。^③ 基于这样一种心态,在成功地取得了对有美国撑腰的国民党的军事胜利之后,面对建国前后国内“中间派”以及苏联所表现出来的对美国的种

①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 10月 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卷,144-145 页。

② 中共中央至少曾两度向莫斯科提出过援助的要求,希望苏联提供帮助新中国进攻台湾的技术手段或志愿驾驶人员,但均遭委婉拒绝。见冈察洛夫:《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载《远东问题》1956(4),斯大林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1956年 10月 1日。

③ 《毛泽东选集》,1956-1957 页。

种疑惧，毛泽东确实更容易表现出这种挑战意识。正因为如此，他一度并不在乎莫斯科赞成与否，积极准备进攻台湾。只是在通过金门之战发现解放军确实不具备跨海作战的技术条件之后，他才放弃了自力更生夺取台湾的军事计划。但这只能促使他进一步抱怨斯大林过于谨慎，并加强争取苏联帮助的工作。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进攻台湾的计划被迫中断，并且严重地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但这同时也给了毛泽东一个同美国较量的机会。既然迟早要同美国交手，在既靠近中国工业区，又靠近苏联的朝鲜与美国进行陆上作战，远比在台湾海峡同强大的美国海军进行海上较量要有利得多。多年以来，毛泽东一直强调，与美国的关系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因而对党内、国内存在的“崇美”、“恐美”倾向深恶痛绝。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机会痛打美国，不论是由中国同志，还是由朝鲜同志来做这件事，那么，这些“崇美”、“恐美”心理，必然随之扫除干净，美国这个“麻烦”也将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不会困扰自己了，共产党的威信必将极大提高，其政权亦会极大巩固。何况，这场战争又是苏联人支持的，就连斯大林也明确认为，现在是教训不可一世的美国人的最好机会。因为“美国目前还没有做好进行一次大规模战争的准备”，日本更没有可能派军队援助美国，即使美国感受到战争威胁，在朝鲜问题上，他们也只好屈服于受到苏联这个盟友支持的中国，甚至被迫撤离台湾海峡。只要经过严重的战斗，并显示出强大的力量，中国就可能迫使美国作出全面让步，甚至为解放台湾创造条件。在 1950年 10月初中国作出参战决定的关键时刻，斯大林热情洋溢地为毛泽东打气，声称：即使美国为了它的面子倾其全力进行战争，我们也“不必惧怕，因为我们联手来将比美国和英国更强大”。斯大林并且明确表示愿意出动苏联空军为中国志愿入朝作战部队提供空中掩护。^①

有关美国人的神话太多了，毛泽东始终对此表示怀疑。解放战争那一幕幕气吞山河的大手笔，使毛泽东对任何神化美国的做法都极端反感。如果有条件、有机会，他未必不想同美国人较量一下。朝鲜战争就提供了这

^① 斯大林给什特科夫转金日成的电报，1950年 10月 29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号 158，目录号 10，卷宗号 100，页码 27页。

样一种重要的机会,而斯大林又保证为中国充当物质后援,他对同美军作战自然有相当信心。在战争开始后不久,他就迅速开始向中朝边界运送部队,并明确表示,即使美国在朝鲜投入 ~~猿至 源~~ 个师,只要中国军队加入作战,就不难将它们大部消灭掉。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必将极大地便利世界革命的爆发,且有利于中国和苏联的长治久安。因此,当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后,一接到斯大林 ~~员月 员日~~ 的求援电报,他就明确主张出兵援助。在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简单地讨论之后于 ~~员月 圆日~~ 凌晨起草的一封电报中,他肯定地说:“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尽管,他知道,出兵朝鲜很可能引起美国宣布与中国处于战争状态,轰炸甚至进攻中国沿海的某些重要城市及工业基地,不仅将使中国的经济建设计划遭到严重破坏,而且会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一部分人民对共产党的不满,然而他确信:“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的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因此,在他看来,只要苏联能够确实满足中国军事领导人最为关心的飞机大炮等项技术装备的需求,就有战胜美国军队的相当把握。^①

尽管,由于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中央领导人和军委领导人纷纷表示了反对出兵的态度,毛泽东一时改变了态度^②,但这更多地还是出于谨慎和对多数同志的意见的尊重,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放弃想要利用这个机会教训一下美国的内心打算。对他来说,关键的问题在于致胜的把握有多大。人民解放军从没有与美国军队正式交过手,毛泽东对美国军队的蔑视是从他成功地打败全副美式装备和美式训练的国民党正规军的经验中得

① 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 ~~员月 圆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员卷, ~~猿- 猿~~ 页。

② 斯大林 ~~员月 猿日~~ 收到苏联大使转发的毛泽东的另一封电报,内容与该电相反,表示因中共中央许多同志认为必须谨慎行事,因此暂不出兵,直至有把握时再说。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号 ~~猿~~ 目录号 员卷宗号 ~~猿- 猿~~ 页。

来的。但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的战斗力是不是就与美国军队差不多呢？有关美国一个军配备有各种型号的大炮，超过解放军百倍以上的情报确实让毛泽东有所担心。然而，从国家安全和政权巩固的长远观点来考虑，他显然很清楚，与美国人的这一仗是迟早要打的，如果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在朝鲜给美国人以教训，让美国人压到自己的边界上来，以后的日子会更难过。因此，当1950年10月15日斯大林发来电报，坚决表示愿意和他联合起来抗击美国人之后，毛泽东仍旧下决心出兵朝鲜对美作战。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白：“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因为“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①

毛泽东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他急于教训美国人的心态了。最初共15个军、15个步兵师和1个炮兵师的志愿军分批秘密进入朝鲜时，从毛泽东到部队指挥官对美军的空中优势都颇为担心，不知“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因此，毛泽东最初明确主张部队应“暂时避开（如果可能的话）美英军，以免被其胶着”。只是在歼灭几个伪军师之后，“然后再打美英军”。^②但在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个多月，接连取得歼灭和击溃部分与美军协同作战的南朝鲜军的胜利之后，毛泽东又很快开始鼓动自己的指挥官大胆对美军作战了。在夜以继日地对美军指挥及作战行动作了大量研究之后，他确信美军指挥漏洞甚多，战术呆板，并不难打。因此，刚刚进入1950年10月，他就开始要求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以半个月为限，设法歼灭美军1个师。^③恰好在这时，志愿军第三十九军一部夜袭美军骑八团成功，从1950年10月15日至17日共歼灭美

①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50年10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257页。

② 毛泽东致彭、邓并告高电，1950年10月15日；毛泽东致德怀同志并告高电，1950年10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258-259页。

③ 毛泽东致彭、邓并告高电，1950年10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259-260页。

军 员四万余人,击毁和缴获坦克 员辆、火炮 员门^①。据此,毛泽东不仅要求志愿军司令部像解放战争那样,“精心组织”大举歼灭美军有生力量的大战役,而且明确告诉部队说:“美国军队并不像有些想像的那么可怕,‘美国人是可以战胜的,美国军队比起蒋介石的某些能战的军队其战斗力还要差些’”^②。

员月下旬,彭德怀开始组织第二阶段作战。毛泽东极为乐观地提出:“西线争取歼灭五个美英师及四个南(朝)鲜师,东线争取歼灭两个美国师及一个南(朝)鲜师,是完全可能的。”并强调:“此次是我军大举歼敌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极好时机。”^③ 尽管第二阶段作战没有完全实现毛泽东一举歼灭美军几个师的设想,但此次作战歼灭美军约两万人,仅俘虏美军即达 猿四万余人。^④ 这仍旧刺激了毛泽东彻底打败美国人的强烈愿望。他一方面要求部队打过三八线,再歼灭几个美军师,一方面兴致勃勃地发布文件,通告全党说:“志愿军的作战经验证明,我军对于具有高度优良装备及有制空权的美国军队,是完全能够战胜的。”^⑤ 按照毛泽东后来的说法就是:战争开始后,“(我们)能不能打(美国军队)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发动的第三次战役,一举将美国军队赶过了三七线,并占领了汉城,这更进一步鼓舞了毛泽东,以至当他得知美国通过联合国于 员缘年 员月 员日提出了

① 曾接替麦克阿瑟担任驻远东美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的李奇微记述说,此役美军损失 员四万余人, 员门榴弹炮、 员门无后坐力炮、 员辆坦克和 员多辆卡车。见李奇微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朝鲜战争》, 猿- 猿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员年。

② 中央军委致十九兵团等电, 员年 员月 员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员卷, 员页。

③ 毛泽东致彭、邓、朴、洪等电, 员年 员月 员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员卷, 员- 员页。

④ 美方资料承认此次战役美军损失 员四万余人,中方资料统计为歼灭美军 员四万余人。转见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猿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员年。

⑤ 中央军委致各中央局、大军区,并转所属各分局、军区,各省市区委、军区,兵团及军,并告军事学院, 员年 员月 员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员卷, 员页。

⑥ 毛泽东:《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 员年 员月 员日,《毛泽东选集》第 员卷, 员页。

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先停火后谈判的建议之后，竟很快指示周恩来复电予以回拒，声称除非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否则没有停战可能。据此，志愿军总部明确提出，准备“连续作战，一气呵成，全歼敌人，全部解放朝鲜”^①。

毛泽东的激情直到第四次战役志愿军被迫撤出汉城，特别是第五次战役一战损失愿万余人之后，才重又冷静下来，先是提出将国内部队调入朝鲜轮番作战，以休养兵力、训练部队，打长期战争的思想，继而承认：“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因为“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等到每个美英师都有三四个营被干净歼灭，士气降低，那时再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三个整师的计划。^② 在他给斯大林的电报中，也明确提出，由于志愿军缺乏空中掩护，后勤补给困难，与敌装备相差悬殊，部队减员过大而后备兵力不足，“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因此，“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③

毛泽东这时对朝鲜战争的估计看来还是过于乐观了。战争的进一步发展证明，单靠中国志愿军的力量，即使全部用上苏联先后提供的数十个陆军师的装备和空军师的装备，坚持再打上几年，也还很难将美国军队赶出朝鲜。考虑到战争已形成僵持局面，双方不能不在三八线上和下来。但对于毛泽东来说，能够把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赶回到三八线以南，使之不得不远离中国边境，这毕竟是一个极大的胜利。而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战争考验了中苏同盟，它不仅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责任感，而且使自己赢得了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尊重。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毛泽东满意地发现，他与斯大林之间过去的许多隔阂不复存在了，双方有了许多共同语言。没有斯大林的坚决支持，他就

① 前引《第一次较量》237页。

② 毛泽东致德怀同志电，1953年5月1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158—159页。

③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3年7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卷，158—159页。

很难作出出兵朝鲜的正确决策，没有斯大林的大力援助，志愿军就很难在对美国的这场战争中取得那样多的胜利。不仅如此，通过战争中与斯大林频繁的电报往来，他清楚地意识到，他已经取得了斯大林的充分信任。因为事情很明显，几乎在所有问题上，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意见都是那么不谋而合，而且不论问题大小，斯大林几乎都要首先征求毛泽东的意见。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一直对历史上莫斯科的不信任耿耿于怀的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感到了满足。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也因此进入到了一个蜜月期。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抗美援朝”，实际上也是抗美援朝，这就从道义上使毛泽东获得了一种对苏联真正的平等感，甚至是某种优越感。

三年跨入社会主义使毛泽东雄心勃勃， 苏联的经验和援助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除了免除来自美国的威胁以外，巩固政权的经济需要在中国共产党人与苏联结盟的考虑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在 1950 年 1 月初米高扬来华时，双方领导人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来自苏联的经济技术援助问题。毛泽东明确讲：“我们认为只能从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得到这种援助。”当年 2 月，在得到斯大林有关如何建立新中国的一系列建议之后，他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突出强调的还是一个请求苏联援助的问题。他特别说明：建国以后，最重要的就是国家的经济建设，我们在这方面“很需要你们的帮助”，“请您满足我们的请求派遣苏联专家给我们”。3 月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在莫斯科访问期间，与苏方人员集中讨论的议题仍是苏联对中国的援助问题，为此，刘少奇回国时成功地带来数百名苏联技术专家。4 月 25 日，毛泽东到莫斯科见到斯大林的第二天会谈中，所谈的头一个问题，仍旧是中国的经济建设与苏联援助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无比，正如毛泽东对苏联人所说的，是因为“不解决这一经济建设的任务，我们便不能巩固革命的果实，便不能完成革命”^①。

朝鲜战争的爆发，打断了计划中经济恢复和建设的过程。但是，刚刚

① 《米高扬秘密赴华的使命》；《毛泽东年谱》下卷，252 页。

发生政权更迭的中国社会，迅速转入战时状态，却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重新整合与动员，有利于被战争破坏的经济生产在加速运转中实现复苏。多数军队因为战争需要全面更新装备、补充弹药和各种武器装备，而现代战争更需要大批技术兵种和装备，战争和国防上的这种迫切需要自然极大地推动和加快了工业生产的发展。当然，所有这一切离开了苏联的大力援助，是不可想像的。

没有哪一位中国领导人不了解，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与美国人打成平手的。事实上，从整个战争的情况看，苏联方面的武器弹药、飞机、大炮、汽车的供应，以及对后勤补给线的空中掩护，都明显地跟不上战争的需要，使得在朝志愿军大规模战役行动和机动作战能力受到严重削弱。如果离开了苏联的援助，要让缺乏飞机、大炮，尤其是无力保障大规模作战的后勤补给线的中国人自己，像当年与国民党作战那样，靠“小米加步枪”和人拉肩扛小车推，来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人较量，要想把美军赶过三八线并坚持住，几乎是不可能的。通过朝鲜战争，毛泽东受到了一次关于现代化的深刻教育。在向参战指挥官详细了解了美军装备及作战特点之后，他已经多少承认，志愿军之所以不能像当年打国民党那样成师成团地歼灭美军，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美国军队的现代化水平高出自己太多太远。即使不从其他方面来考虑，仅仅从国防建设的角度来考虑，毛泽东也不能不开始高度重视经济建设问题了。

在毛泽东的经历中，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很少踏出国门，想像不出欧美国家经济如何发达。即使在国内，他因长期生活战斗在农村里，对工业生产也很少了解和认识。几十年革命和战争的体验，共产党的成长，革命武装的发展，乃至新中国的诞生，全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几个人开始，依靠正确的思想指导和灵活的策略方针，一步步创造出来的。因此，在他看来，世界万物中，只有掌握了正确思想的人才是惟一重要的。人的因素第一，有了掌握正确的思想武器的人，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到的。何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革命是怎么来的？是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革命的目的，就是创造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从而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因此，在毛泽东的观念里，在革命的任务

彻底完成之后,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与飞跃应当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甚至,他并不满足于把生产力的发展停留在资本主义的水平之上,从“不断革命”的思想出发,他自建国伊始就迅速提出要以资产阶级为主要斗争对象,“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强调必须加速各行各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步伐,因为“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①,在他看来,将中国迅速引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将会更有利于发掘中国人口众多的优势来发展经济、增强国力。

当然,经济工作以及工业生产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中共领导人来说,毕竟是十分陌生的领域。因此,借助苏联之力,是一种必然的选择。而在毛泽东看来,中苏两党两国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基础,苏联人没有理由不帮助中国。从他 1951年初由苏联回国路经东北时介绍访苏情况时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苏联帮助中国建设发展的期望值是相当高的。他说:我参观了很多地方,特别感兴趣的就是苏联建设的历史。看了它的工厂、农场,询问了它们的发展历史,苏联同志告诉我说,在革命前,他们的工厂其实也是很少的,过去连飞机都不能修理,更不要说造飞机。但是,在革命若干年后他们就能造些飞机了,现在更是大批制造飞机。同样,革命前他们制造的汽车比丹麦还要少,现在一年能生产几万辆汽车。他兴奋地说,苏联的经验证明,中国革命胜利后,它的建设与发展也会有一个日新月异的局面,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中国落后而悲观。他特别高兴地告诉与会的东北局干部说,苏联同志已经向我保证,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他们的经验,利用他们的专家,这样,中国很快也会像苏联一样的,会造飞机、造汽车了。^②

从以后的情况看,中国主要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础,确实都是在苏联承诺援建的 156 个项目上发展起来的。在 1953 年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苏联还应中方要求,开始陆续提供各种尖端技术,如制造原子弹、导弹以及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256 页。

② 毛泽东在东北局的讲话,1951 年 1 月 10 日。

宇航的技术等。^① 这种情况说明，中苏关系最初确实是在按照毛泽东以及多数中国领导人期望的那样发展的。毛泽东很明确地表示，在建设问题上必须老老实实地向苏联同志学习。就连这个时候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以及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他也都是抱着极大的热忱——向苏联方面请教的。毛泽东最为关心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等问题，就是全面参照了苏联的做法。当时党内相当多的领导人已注意到苏联在农业集体化问题操之过急和过于简单化是一个教训，因而反对急躁冒进，毛泽东却从苏联的经验中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来，相信在短期内基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可能的”^②。事实上，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包括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在内的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一鼓作气只用了猿年左右的时间就全面完成了，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原来计划要用比苏联更长的时间来完成，反倒比苏联提前了将近 1/3。^③

已经习惯了独立自主和标新立异的毛泽东，并非喜欢跟在苏联人后面亦步亦趋地爬行。在毛泽东看来，这几年学苏联，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小学生“交学费”的阶段。问题在于多快可以学到本事，自力更生。显然，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使毛泽东或多或少地相信，他过去担心的问题看来不再存在了。他开始变得雄心勃勃了。在 1956 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已经显示出不仅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速度上超过苏联，而且在经济发展速度上也要努力超过苏联的想法了。他在谈话中一方面强调苏联的经验比我们多，为了少犯错误，少走弯路，经济上的问题，还要尽可能向苏联同志请教和学习，另一方面已开始强调以我为主的思想了。既然

① 毛泽东在 1955 年明确讲：“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即原子弹）。”见《毛泽东选集》第 3 卷，104 页。关于双方商定由苏联帮助培养原子弹、导弹和宇航技术专家，以及提供有关制造模型、图纸、技术的情况，可见乌索夫：《毛泽东的 1955 年次警告》，载《俄》《新时代》1993 年（3），彭继超：《原子弹爆炸前的彭德怀》，载《中华儿女》1993 年（9），第 10 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3 卷，104 页。

③ 在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计划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曾经估计，如果说从 1953 年苏联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到 1957 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止，苏联人花了 4 年的时间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工作，那么中国作为一个更落后的国家，这个时间应当更长一些，或者要花上 5 年的时间才行。

社会主义改造能够走出自己的路子来,经济建设有什么理由不能快马加鞭呢?出于赶超苏联经济发展速度的愿望,他开始给不熟悉经济问题的自己,同时也给全党打气说:想一想,1949年建党时,我们不过只有几十个人,那样渺小,还不是把强大的敌人给打倒了?对自然界还不是一样?“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看《封神榜》就知道,哪有一个法宝不是不能破的呀?”“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因此,他呼吁全党努力,变外行为内行,主张大家都来“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①。毛泽东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基于这种愿望,试图摆脱苏联经济建设模式,从而赶超苏联经济发展速度的一种尝试。

“人定胜天”,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的一个响亮口号。在他看来,改造一种社会制度是如此,创造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是如此,推进生产技术的革新改造和经济上的大跃进,也没有理由不是如此。重要的是要“敢想、敢说、敢做”,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生产关系既然已经是最优越的社会主义的了,难道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和束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吗?他在一段时间里几乎逢人便讲:你经济上不行,人家就看不起你。美国为什么总是张牙舞爪,不就是因为它有一亿多吨钢和几颗原子弹吗?“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吗?”“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②

到1958年莫斯科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召开时,中共中央与包括苏联党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在诸如世界和战争前景的基本估计等问题上已经开始存在某些重要的观点分歧,但是,毛泽东仍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158页-159页。

②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16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158页-159页。

旧是有自知之明的。因为他很清楚，在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实力。中国不仅还需要苏联的援助，而且也还需要靠苏联的国防优势来与美国抗衡，因此，他对苏联的作用仍旧相当重视。他在会上突出宣传，各国共产党一定要以苏联为首。因为，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国家，只有苏联在经济上是个大国，能够以其“全副武装”对付“全副武装”的敌人，否则，“没有苏联，我们都有可能被人家吞掉”。毛泽东这么说，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很清楚，无论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抗美援朝的成功，还是新中国的建设和巩固，作为自己盟友的苏联的强大，都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尽管毛泽东很反感苏联人以及一些东欧国家共产党过分强调美国的可怕，在会上突出强调他的“纸老虎”的理论，强调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说钢铁多，武器好，未必强大，因为“物质力量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力量的对比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的。^①但是，他在背后还是不能不承认：你没有东西，人家就看不起你。

在莫斯科，得知苏联准备花 15 年的时间赶上美国，毛泽东按捺不住了。自从 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已经无法从继任的赫鲁晓夫身上找到与苏联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心地位相适应的思想和威望了。因此，苏联领导人对美国的恐惧，和对兄弟国家的不平等态度这种明显的反差，早就在刺激着毛泽东。不就是比谁有原子弹，看谁的钢铁多吗？从来相信“观念造成文明”的毛泽东下决心要搏一搏了。他在莫斯科公开表示的是，你们 15 年赶上美国，我们 15 年赶上英国。但他真正想挑战的目标却是苏联。他心里想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就走在苏联人的前面，社会主义建设同样也可以走在苏联人前面。中国有的是人，人多智慧多，热情高，干劲大，又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性，为什么不能调动起这几亿人的积极性，来一个经济上的“大跃进”呢？

从莫斯科一回来，毛泽东就憋着一股劲儿，到处宣传“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道理，声称过去因为对工业一窍不通，所以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卷 255—256 页。

秘得很,有很大的迷信,其实几年过来也就懂得了,有什么了不起!说“原子弹就是那么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①。于是,在他关于“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公开号召下,一个赶英超美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掀起来了。由于把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粮食、钢铁和原子弹这几样东西,因此,从城市到乡村,几亿中国人被组织起来大办农业,大办工业,大炼钢铁,甚至大造原子弹。从1956年赶上英国,半年时间又变成了1957年超过英国,1958年赶上美国。毛泽东明确要求,1958年的钢产量要在1957年1080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而1959年后,即1960年的钢产量指标竟被定到了1000万到1亿吨的水平。轰轰烈烈地试验了半年,他一下子又发现“人民公社”是一个走向共产主义的好形式。因此,他又开始提出要通过“人民公社”这种形式,超过苏联,率先跨入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主张。^②

围绕究竟谁是列宁主义捍卫者的激烈争论 最终促使两党两国走上了激烈对抗的道路

建国数年之后,新中国先后同国内和国外的敌人进行了种种较量,当年与苏联结盟的安全考虑,渐渐地不复存在了。1958年,毛泽东下令炮轰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③,却对苏联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充分显示他对苏联的撑腰作用已经看得很淡。而相信“政治是统帅”,“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相信“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相信只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就可以创造一切人间奇迹,相信“新生事物不可战胜”,更进一步打破了他对苏联经验的神秘感,对苏联的援助也渐渐地不十分看重了。当然,造成双方关系疏远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赫鲁晓夫在苏共

① 彭继超：《原子弹爆炸前的彭德怀》。

② 毛泽东一度对此十分自豪,但同时又强调要给苏联留面子,说是一定要给苏联先过去,否则苏联脸上无光。参见谢春涛：《大跃进狂潮》，78-79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787页。

二十大上发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及公开赞同“议会道路”、“和平过渡”的演说，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损坏了作为中苏同盟重要基础的联系中苏两党关系的那根意识形态的纽带。

赫鲁晓夫的报告是在 1956年 9月 12日晚至 13日清晨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的。赫鲁晓夫在这个报告里，向大会代表以及包括中共代表团在内的外国党代表团的成员，详细地揭露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及由此所造成的骇人听闻的个人独裁和目无法纪的严重危害。^① 当这个报告初到中国之际，毛泽东多少感到出了一口怨气，他甚至赞同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上的说法，即苏共二十大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②。但在内心里，毛泽东却未必满意这件事。他从一开始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对苏共二十大有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总路线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表示不是那么舒服。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在发表关于“十大关系”问题的讲话时，已经明确表示对赫鲁晓夫做法的不满了。尽管这时的批评更多的还只是道德层面的，是看不惯“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而到这一年的 10月以后，他的批评就明显地不仅仅是从道德层面上来谈问题了。他越来越严厉地在党内发表谈话，把赫鲁晓夫的问题同抛弃列宁主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联系起来。他讲得很清楚：我们干革命跟谁学的？就是向列宁、斯大林学的，向十月革命学的。提出资本主义走“议会道路”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丢掉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都可以不讲了。^③

① 拉齐奇著，夏平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末》，载《观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② 关于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最初的赞赏，还可见尤金与毛泽东同志的谈话记录，1956年 10月 10日。

③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 10月 1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 10月 12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 10月 15日。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5 卷，1956年 10月，100-101页。

如果说过去毛泽东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时，没有具体说明他得到的是什么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现在他对此有了清楚的说明。他明确告诉人们：“我们搞阶级斗争是从十月革命学来的”，“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什么资本，“无非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因为是列宁主义为他们提供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观点和策略方法。自1949年以来，毛泽东将近20年的光阴都是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度过的。他最为熟悉和擅长的，也是阶级斗争。而他最为骄傲和自豪的，就是根据列宁的暴力革命观点，在中国独创的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方法。显然，在他看来，斯大林是真正能够认识和肯定其独特价值的最重要的人物，因为除了1949年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一致宣传他的这一独特贡献具有普遍意义以外，在国际上，只有斯大林曾正式肯定，中国革命对落后国家革命具有榜样作用。显然，这正是他坚持把他并不喜欢的斯大林引为同道的重要原因。^①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很快发现，他引以为自豪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经验正在受到公开挑战。1956年11月，英共主席致信中共中央，提出他们正在翻译的《毛泽东选集》中的一段话，即“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必须删去，因为它在英国已经不适用了。毛泽东对此明确表示不能接受，他代拟中共中央宣传部复信称：“毛泽东同志在该文章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即使苏联同志在发表他这篇文章时，也没有对这个观点提出任何异议。^②如今，想不到苏联同志竟然也转

^① 由于斯大林曾经在1953年11月强迫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和平，不许他革命，1956年在他访苏期间又颇为怠慢并且在一些问题上坚持不平等要求，对于这些，毛泽东始终感到对斯大林有“一肚子的气”。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1987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等，1987年。

^② 毛泽东这段话见于《战争和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1956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关于毛泽东不同意英共主席意见的批语，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0卷，1996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而站到英国共产党一边去，奢谈起什么“议会道路”与“和平过渡”来了。如果这条道路走得通，那么中国革命的经验和道路岂不毫无价值？不仅毛泽东的独特贡献化为乌有，就连他以为理论、经验和思维模式的阶级斗争观，也只好束之高阁了。甚至中国革命是否必要也都成了问题了。这当然不能够被毛泽东所接受。

同样，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也让一向比较敏感的毛泽东有了一种后脊生风的不安全感。得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毛泽东多次讲“革命道德”问题，批评赫鲁晓夫说，“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这叫“缺乏革命道德”。^①很明显，他在很大程度上也在担心自己的身后，关心自己所开创的事业是否能够得以延续和发展。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当然领袖斯大林尸骨未寒竟能遭此厄运，一旦来日他有个三长两短，会不会也有中国的赫鲁晓夫跳出来把他也“贬到地下九千丈”？尽管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没有明确提出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的那种耸人听闻的警告，但是，已经逐渐开始把党内斗争同社会上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头脑中权力斗争乃至阶级斗争的弦，自然又绷紧起来了。

恰在这时，~~1956年~~的波匈事件和~~1957年~~国内反右运动相继发生，进一步为毛泽东提供了阶级斗争的新灵感。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等人明确批评斯大林“~~1956年~~关于苏联愈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的错误公式”，“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党和国家内的民主的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而波匈事件，特别是毛泽东想发动群众为党整风，意想不到引出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激烈批评共产党领导的情况，使他不能不对赫鲁晓夫的这种说法表示严重怀疑。他开始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②，并因此明确指示发动反右派运动，“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以利“挤出脓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 36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 365 页。

疤”。^①从此,毛泽东再度举起了阶级斗争的旗帜,党内的、国内的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一切矛盾冲突,都被他涂上了阶级斗争的色彩,并纳入到阶级斗争的轨道中去。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起他的高度警惕。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越走越远,是不可避免的。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对于这种用行政手段和群众运动,来创造经济奇迹和实现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做法,苏联领导人从一开始就表示了怀疑的态度,并且暗中防止中国方面向苏联人进行这种激进的宣传。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本来就对苏联不满的毛泽东的更大的不满。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思想当中,再也找不到任何对苏联的迷信和神话了。他公开告诫党的高级干部,不要迷信苏联。要打倒贾桂,不做奴才,反对“拿苏联吓人”。称苏联那些顽固分子有什么资本,“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这叫作“利令智昏”!说什么中国的工业、军事“没有苏联就不能活”,是“此论不通”。^②

大跃进运动固然失败了。但是,这并不足以使毛泽东放弃其热情,改变其观点。他革了一辈子的命,搞了一辈子的阶级斗争,自信受到过种种压制和打击,如今是他最能够无拘无束地实现自我抱负的时候,他当然不会在意这一时的挫折。恰恰相反,大跃进运动进一步激发了毛泽东那种近乎乌托邦的革命幻想和充满浪漫色彩的革命激情,他显然更加重视到自己在维护和发展列宁主义,实践列宁世界革命理想方面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重要作用。在赫鲁晓夫刚刚在国际上掀起过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浪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又正式通过决议反对个人崇拜的情况下,他还是毫不掩饰地表示欣赏关于“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9 卷, 296 页。

②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1958 年 1 月,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296 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9 卷, 296 页。

要到盲目的程度’的说法。肯定对自己的崇拜^①，这清楚地反映出他决心要把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坚持到底。可以想像，在对苏联领导人已经失去以往的尊重和信任的情况下，毛泽东再也不能容忍俄国人表现出任何一点儿哪怕是无意的居高临下的态度。

1958年，莫斯科接连在两件事情上惹恼了毛泽东。一件是关于建立长波电台的问题。当时苏军方为便利与其太平洋舰队的通讯联系，向中国军方提出由苏军方出资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的要求。因电台设在中国，故中方认为应由中方出资建设，所有权归中方，共同使用，情报互享，苏军方因考虑电台使用仅为苏方联络自己舰队所用，故坚持苏方要出资。另一件是中方向苏方提议请苏方帮助加强中国海军和海防，苏大使转达苏方意见，称希望能够设立两国联合核动力潜艇舰队。毛泽东得知后大发脾气，睡不着觉，认为俄国人不相信中国人，认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所以才要合营，管住中国人。这两件事都被他视为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是对中国人自尊心的严重伤害。实际上，这两件事如果同当年斯大林坚持把中国东北和新疆划入苏联势力范围的做法比较起来，纯粹是小巫见大巫，毛泽东所以对这两件事反应激烈，显然是双方关系的基础已经完全不同的结果。对于毛泽东来说，那个曾经被看作是新中国强大后盾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庞然大物已经不存在了。联系到1958年8月毛泽东指示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印发马恩列斯论“不断革命”的有关论断，愿月炮击金门不和苏联打招呼，以及他日渐增多的对苏联政策的拐弯抹角的批评，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已经在怀疑苏共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资格了。

1958年10月15日，苏共中央突然致函中共中央，声称由于苏联正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日内瓦谈判禁止试验核武器问题，因此不得不推迟两年，视国际形势进一步发展以后，再考虑根据双方在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议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这件事几乎立刻就被毛泽东同苏联领

^① 前引《飞跃进狂澜》167页。

领导人极力谋求缓和同美国关系的事态联系起来。^① 美国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也是毛泽东心目中与社会主义阵营势不两立的帝国主义的头子,赫鲁晓夫在宣扬“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之后,进一步以牺牲它同兄弟国家关系的代价来讨好美国,这让中国领导人感到异常愤怒。当赫鲁晓夫从美国回来,带着他从美国人那里取得的谅解转往中国,要求中国释放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含蓄地表示希望中国谈判解决与印度的边界纠纷^②,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时,几乎立刻就遭到了包括在场的中国领导人的尖锐批评。而最让毛泽东感到恼怒的是,赫鲁晓夫不仅坚持国际缓和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根本利益,而且强硬地宣称,中共的所作所为正在损害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③ 甚至,赫鲁晓夫一行刚一离开中国边界,就在海参崴的一次会议上含沙射影地把毛泽东比作“好斗的公鸡”^④。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不仅两个大国的盟友关系难以继续下去,就是保持与苏联正常的外交关系都变得有些困难了。这是因为,苏联领导人有更多的干涉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内部事务的历史,中国党内发生的任何不同意见的争论,都可能被人们同苏联人的干涉联系起来。

一个颇为典型的例子是,这一年缘月,当时担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从东欧访问归来,向毛泽东汇报,在谈到南斯拉夫铁托反苏后,众叛亲离,身边有几十个人跑到阿尔巴尼亚去的情况时,毛泽东非常敏感。^⑤ 苑月上庐山开会时,彭德怀又就大跃进及人民公社政策失误问题向毛泽东上书,提出善意批评,毛泽东当时就把彭德怀的信同赫鲁晓夫此前在波兰一次公开讲话中反对搞“人民公社”的讲演联系起来,怀疑彭德怀“闻了人家对大

① 这段时间美苏除了日内瓦谈判以外,苏联的副总理和美国的副总统都在互相访问对方的国家,赫鲁晓夫也在远月间接到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访美邀请,并立即表示接受邀请。参见赫鲁晓夫著,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缘圆-缘缘页,上海,东方出版社,缘缘缘。

② 当时中印之间开始发生边界冲突。

③ 苏斯洛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缘缘年 缘月。

④ 前引《特殊而复杂的课题》,缘缘页。

⑤ 据彭德怀说,“此时毛泽东脸色顿时发红”。见李锐:《庐山会议纪实》,缘缘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缘缘缘。

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不过，开始时，毛泽东在彭德怀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敏感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真的疑心彭与赫鲁晓夫有什么牵连。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彭德怀位高权重，却对毛泽东长期不驯服，不称“主席”，不叫“万岁”，不唱《东方红》，这使得这时公开表示赞同“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到盲目的程度”的做法的毛泽东，对彭德怀不能不深怀戒心。第二，在理论上较有系统，又在毛泽东做领袖之前做过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张闻天，也公开与彭德怀一唱一和，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不安。第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已经被毛泽东视为他自创造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以来，改造中国、超越苏联的重大尝试，赫鲁晓夫的反对已经引起他的强烈不满，如今彭、张等人又公开与赫鲁晓夫遥相呼应，他无论如何都必须反击。但随着毛泽东对彭德怀上书作出激烈批判，彭德怀的问题就迅速被同“里通外国”联系在一起了。当揭发材料披露出有人背后把毛泽东同晚年的斯大林相提并论时，毛泽东明显地更加愤怒，大谈要“准备后事”，声称“苏联鞭死尸（指斯大林问题），我们这里闹分裂的人要鞭我的活尸”。于是，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问题迅速升级，最终成了“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的”“反党集团”。^①

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同苏联干涉乃至颠覆活动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使中苏关系处于更加尴尬和绝望的境地。1959年，苏联宣布撤退专家，停止各项援助，双方关系出现了全面破裂的严重迹象。尽管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曾试图与苏联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但是，围绕着究竟谁是列宁主义捍卫者的激烈争论，最终还是促使两党两国在1960年以后逐渐走上了全面对抗的道路。

从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经历了从全面结盟走向全面对抗的曲折过程，毛泽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考察毛泽东从主张向苏联“一边倒”到决心与苏联决裂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影响毛泽东决策的有这样几个重要方面：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卷，349—350页，前引《庐山会议纪实》，34—35页；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1月10日。

第一是意识形态问题。当 1949 年代末 1950 年代初毛泽东作出“一边倒”决策时，同苏联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显然是这一决策的主要基石。随着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开始实行非斯大林化，中苏两党迅速开始在革命与战争等一系列关系到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问题上发生分歧。这种分歧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存在而变得复杂化。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思想观点来影响各国共产党及其人民，使苏共不能不怀疑中共意想取代自己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领袖地位，因而极力排斥毛泽东；而苏共对各国共产党的强大作用和严密控制，则使毛泽东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忧心忡忡，因而必欲与苏共一争高下。结果，两党之间围绕着意识形态问题的某些争论，竟成为两国关系走向破裂的重要动因。

第二是国家利益问题。中苏结盟，在毛泽东看来，根本上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既贫且弱，还需要来自意识形态相同的强大苏联的援助。但是，随着新中国政权的日益巩固，特别是抗美援朝教训了对新中国安全构成最主要威胁的美国，经济建设又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苏联结盟渐渐地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不再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了。不仅如此，中苏两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反而使毛泽东逐渐开始把双方利益上的歧异，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联系起来，这不能不促使毛泽东在内心深处渐渐把苏联看作是对自己国家利益的一种潜在的威胁。

第三是不间断革命的观念问题。毛泽东当初决定与苏联结盟，除了对国家利益的现实考虑之外，显然还包含有他对革命后中国未来发展前途的长远考虑。新中国毕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它的未来发展方向必然是走向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因此，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清楚地意识到不间断革命的必要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内部反抗和外部颠覆的危险性。同社会主义苏联结盟可以说是他未雨绸缪的一种万全之策。但是，毛泽东所特有的挑战意识与他不间断革命的观念，只会促使他日渐远离苏联。这是因为，毛泽东从不满足于已有的胜利。由于一举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他注定了会把苏联作为自己的赶超目标，而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非议，反而会加剧他对苏联的轻视和不满。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受到严重挫折，党内出现尖锐批评意见，毛泽东只会对苏联更

加反感 ,甚至怀疑苏联有干预中国内政之嫌。在这种情况下 ,中苏关系发生变化是难以避免的。

(本文系首次发表。)

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与中国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北京大学 牛大勇

对

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半期中国政治的发展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问题,中外学者多年来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其中,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的著作,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对中共领导层的决策过程,以及影响这一过程的国内外因素,作了深入的研究,在西方同行的著作中最有代表性。^①

然而,产生于 70 年代中期和 80 年代初期的这两卷本大作,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受“文革”时期流传的资料的影响,较多地强调了 70 年代后半期面对苏联东欧风云变幻,中共领导人之间的政策分歧和权力斗争。此外,在某些尚缺乏足够资料证明的问题上,作者作了大胆的推论和猜测。全书所论述的这段历史,带有很浓厚的宫廷政治色彩。尽管如此,这部大作(欣闻第三卷即将问世)的分析方法和观察视角,对中国学者仍有参考价值。

近十年来,中国方面又有一批新的史料出版。根据这些新资料,我以为,前人的某些(不是全部)推论和猜想已被推翻或证实。实际上,很多“分

^① 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译本)第 1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 年。

歧”被那些“文革”中的资料夸大渲染，甚至无中生有。新的资料表明，至少到 1966 年代后半期，中共领导核心之间，政策基本一致，没有重大分歧。即使稍有分歧，刘少奇等领导人也是立即以毛泽东的意见为准。尤其在对斯大林逝世后苏东风波的回应等对外问题上，中共领导核心完全听从毛的决策。我还以为，就探讨“文革”起源而论，比权力斗争和政策分歧更值得重视的一个因素，是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例如他那一整套辩证法、矛盾论、斗争观、两点论、两分法等。

本文将中共领导核心视为一个整体，探讨其怎样在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指导下，在对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等国际风潮的回应中，一步步走上了“文革”之路。对于缺乏确凿史料论证的问题，宁肯置而不论。

毛泽东的“文革”政治理念，鲜明地表述于 1958 年 12 月 21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编辑部联合发表的一篇经他本人审定的社论中。^① 社论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将其归纳为六个要点：

(一)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二)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充分注意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① 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文革”中的“两报一刊”社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宣传方式。这篇社论中的黑体字，引号内是毛泽东已发表过的话，引号外是毛以前未正式发表的话。个别引号外的黑体字虽非毛的原话，但基本符合毛的原话精神并经他此次亲自审阅批准。参见龚育之：《关于“继续革命”的几个问题》，《教学与研究》1981 年 12 期。

(缘) 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园) “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以上论点是对毛泽东“文革”理论的经典概括,而第一点是这个理论的哲学基础。选择苏联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日来阐释这个理论,是意味深长的。社论提醒人们注意这个理论缘起的国际背景:“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现代修正主义篡夺了政权,逐步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给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提供了很深刻的历史教训”,“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从内部来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① 尽管中国内部各种矛盾的发展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但一些国际因素也影响了中国内部矛盾的发展和“文革”的发生。反对美国某些政治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防止苏联“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在中国取得政权,这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反应,也是中国“文革”缘起的国际背景。我们通过考察毛泽东等人对各种冷战国际因素的回应,可以从新的角度认识“文革”运动和理论的起源。

一、以苏为鉴 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矛盾

自两极对立的国际冷战格局形成后,中国共产党人鉴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敌对态度,作出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选择。尽管如此,中国领导人并不情愿照搬苏联模式,而试图独立自主地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以和平方式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这种独创性的一例。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中共面临的下一步的战略任务就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这个时期的国际冷战形势趋向缓和,但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对中国实行围堵和禁运政策。中国只能在苏联的援助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同社会主义改造相比,中国在建设方面的独创性较小,基本照搬苏联

^① 《人民日报》1956年 6月 29日。

模式。然而，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相继发生捕杀贝利亚、平反冤假错案、加强农业、围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展开争论、转变对南斯拉夫的态度、更换斯大林选拔的接班人等事件。这使中共领导人意识到斯大林和苏联的建设模式中存在一些错误。毛泽东在“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从1956年10月开始听取各个部委的汇报，进行调查研究，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①

恰在此时，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贯彻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争取同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等一系列重大决定。赫鲁晓夫还在会上作了揭露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泄露后引起国际轰动，并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引发了非斯大林化的风潮。

中共中央政治局获悉苏共的通报后，对这一事件高度重视，反复开会讨论。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此举，一是揭了盖子，破除了对苏共和斯大林的迷信，有利于中国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值得感谢；二是捅了漏子，秘密报告的内容和方法都有严重错误，应予补救。对于斯大林问题，毛也持两点论：一方面欢迎批判斯大林的严重错误，特别是他曾经四次错误地干预中国革命，都直接针对着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毛现在得以一吐旧怨；另一方面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认为更要强调斯大林的伟大功绩，任何政党和个人都难免犯错误。毛泽东的意见引起政治局常委们的共鸣。邓小平着重谈了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毛提议发表文章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并说明中共一贯主张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刘少奇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迷信，从根本上说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毛也同样指出这一点，并亲笔在文章中加写了相应的论述。^②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1991年10月，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55页。

② 中共中央的这些观点集中反映在《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中。见《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日、10月4日。两篇文章皆经过毛泽东亲笔修改。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1987年12月，155-156页；吴冷西：《忆毛主席》，1995年12月，北京，新华出版社，155页。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和政治局讨论,毛泽东理清思路,源月缘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论列了中国面临的十大矛盾关系。他论述每个问题时,都把苏联和斯大林的错误引为教训,对照总结中国的经验。按照当时听众的记录,他对斯大林的批评比后来发表的版本更为尖锐。而他对于美国和西方的长处,则持学习、借鉴的态度。^①例如,论及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关系时,他指出苏联的办法不好,把其他党派都搞光,只剩下共产党,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中国共产党则采取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谈到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抓到一个就杀一个,结果犯了大错误。斯大林说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毛认为“这在一定时间是真理”,“过了这个时间就不是越斗越尖锐”。谈到党内外的的是非关系,毛泽东批评斯大林“错误与反革命界限不分,错杀了很多人。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②

中共领导人这时努力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什么矛盾和怎样处理这些矛盾。他们最初并不认为阶级矛盾和斗争在这个阶段上还占有重要地位。经毛泽东和政治局审定的对苏共二十大的表态文章,列举了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革新与守旧、先进与落后、积极与消极、唯心论与唯物论、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等矛盾,但是没有提到阶级矛盾。^③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最初版本,也未谈及阶级矛盾。^④这以后的一些谈话表明,他当时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阶级斗争已经完结或“基本解决”了。他对斯大林混淆矛盾、阶级斗争扩大化等错误,抱有

①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源圆-源圆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远册,员缘-员远页注员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远册,愿-员愿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源圆-源圆页。

③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员缘年源月缘日。

④ 《学习资料》(员缘年员-员缘年),员圆-员圆页,“文革”时期出版,编者、出版者不明;红宣兵汇编:《东方红》,愿-员愿页,宝岛,员缘年;《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源缘-源圆页。正式版本中毛的相应论述,应是后来整理文稿时增补的。

高度警觉。^① 不幸的是，他后来由于各种很复杂的原因，又在某种程度上重蹈斯大林覆辙，原因之一就是对于冷战中的国际事件的领悟与回应有失误。

无论如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者们在 1956 年已经察觉到，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矛盾的性质各有不同，处理方法也应不同。究竟能不能正确处理这些矛盾，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二、对苏波匈事件的回应：扩大民主 与区分两类矛盾

中共领导人试图用扩大民主的办法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防止斯大林的错误在中国重现。^② 针对苏联以前在学术批评中的教条主义和乱扣政治帽子的做法，毛泽东 1956 年 2 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重申：艺术问题上要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要百家争鸣。^③ 随后他又在 1956 年 2 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公布了这个“双百”方针。

周恩来 1956 年 2 月在上海党的会议上指出，从国内情况和苏联犯错误的经验来看，扩大民主具有更本质的意义。他从国家制度方面提出一些改进办法，扩大人大代表批评政府工作和检查公安、司法工作的权利。^④

1956 年 9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充分肯定并扩展了民主化的尝试。与某些传闻和推测不同，毛泽东事前以充分的时间多次审阅和修改了大会的政治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周恩来与彭德怀的发言稿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等，所以这些文件中的原则性内容都是经他审定的。^⑤ 以

① 毛主席与美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纪要，1956 年 10 月 15 日；毛主席与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话纪要，1956 年 10 月 16 日；《学习资料》（1956 年 10 月 16 日），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一），第 103 页，《东方红》，第 104 页。

② 《学习资料》（1956 年 10 月 16 日），第 104 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简称《中共年表》），第 10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

④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04 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104 页；《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104 页；《学习资料》（续一），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二），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三），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四），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五），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六），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七），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八），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九），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十），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十一），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十二），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十三），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十四），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十五），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十六），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十七），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十八），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十九），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二十），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二十一），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二十二），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二十三），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二十四），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二十五），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二十六），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二十七），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二十八），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二十九），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三十），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三十一），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三十二），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三十三），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三十四），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三十五），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三十六），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三十七），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三十八），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三十九），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四十），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四十一），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四十二），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四十三），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四十四），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四十五），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四十六），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四十七），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四十八），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四十九），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五十），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五十一），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五十二），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五十三），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五十四），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五十五），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五十六），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五十七），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五十八），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五十九），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六十），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六十一），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六十二），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六十三），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六十四），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六十五），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六十六），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六十七），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六十八），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六十九），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七十），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七十一），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七十二），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七十三），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七十四），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七十五），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七十六），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七十七），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七十八），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七十九），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八十），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八十一），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八十二），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八十三），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八十四），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八十五），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八十六），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八十七），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八十八），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八十九），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九十），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九十一），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九十二），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九十三），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九十四），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九十五），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九十六），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九十七），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九十八），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九十九），第 103 页；《学习资料》（续一百），第 103 页。

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为例,原稿提出中共特别需要各民主党派的监督。毛泽东增改为“首先是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原稿另一处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说成同“党内的自我批评”和“劳动人民的监督”似乎一样重要,毛泽东将论述改写为:后两者的批评监督“是主要的一面”,而前两者的批评“常常是从右的方面出发的”。^①半年后的整风运动似乎不幸地验证了他的这个见解。

政治报告还指出: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认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反复审阅这个报告和决议草案时,对这些论断没有提出任何异议。^②

扩大民主的努力还体现在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根据毛泽东“不要个人突出”的原则,这两个文件要求全党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并从党章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③

这一时期,非斯大林化运动在共产主义阵营接连引起思想、政治和社会动荡,波兰、匈牙利先后发生群众性的示威和骚乱,对中共认识和解决社会矛盾、扩大民主的进程造成很复杂的影响。中共中央密切关注局势并不断作出反应,仅在 1956年 9月中旬到 10月上旬 16天内,中央常委和政治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7册, 152页、153页;刘少奇注:“毛刘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似乎同麦克法夸尔教授的有关论断恰恰相反,参见《“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译本)第 1卷第 2章,第 4节。”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 103页;《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年。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7册, 153页;《邓小平文选》第 1卷, 104-105页;八大的党章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年。

局连续开了十几次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及有关问题。^①

关于波兰事件，中国驻华沙大使最初认为这是一场反革命骚乱。当地新华社记者谢文青的报告则认为波兰事件具有革命性质。毛泽东赞成谢文青的看法。^② 波兰统一工人党 7 月 15 日召开的七中全会认为：引起罢工和动乱的极大部分责任要归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官僚主义和愚昧无知，事件表明党同人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存在着重大错误。对此，波兰党积极采取措施，克服缺点，扩大政治民主，改善人民生活。中共中央赞赏波兰党的做法，认为他们比较有力量，能控制局势，使群众的不满逐步得到解决。^③

当苏共中央发来准备武装干涉波兰的电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 7 月 15 日紧急开会，一致同意向苏共中央发出紧急警告，坚决反对武装干涉。毛泽东随即召见苏联大使，劈头便说：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这样做，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竟然不顾我们的劝告，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就是这几句话，请你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情况紧急，时间无多，谈话就此结束。请你赶紧去办。苏联大使满头大汗，诺诺而退。^④ 应苏共中央 7 月 16 日来电邀请，中共中央 7 月 16 日派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等人组成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协助苏共处理波、匈事件。^⑤

这时匈牙利事件愈演愈烈，执政党处置不当，矛盾激化，局势失控，后果严重。中共中央认为由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策动，匈牙利事件已变为“反革命复辟”的性质，执政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已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在此情况之下，苏中两党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似乎各有新的理解。苏共决定从匈牙利撤军。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7 月 16 日向苏共

①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256—257页。

② 李慎之先生采访记录，1989年7月15日。

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257页。

④ 《忆毛主席》，16—17页。

⑤ 《忆毛主席》，16—17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257页。

中央表示反对,严厉地指出这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社会主义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罪人。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了一整夜的会,最后决定武装干涉匈牙利。^①

中共中央更为关注的是波匈动乱原因和经验教训。代表团回来后,政治局连日开会讨论这个问题。8月16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也以此为主要议题。毛泽东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犯的错误的概括为:对外的大国主义、对内的大民族主义、对人民的专制主义。^②

刘少奇在全会上报告了他对匈牙利事件起因的看法: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在执政后没有发动群众去进行阶级斗争,去反对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经济建设中过多地建设重工业,牺牲轻工业和农业,一直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以致激起群众不满,被反共势力所利用。他认为应吸取的教训有: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③

毛泽东在全会的总结讲话中,再次从政治哲学角度指出: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问题。斯大林的错误具体表现为否定矛盾,实际上是主观主义,否定群众,个人崇拜,个人独裁。波匈事件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有问题、有矛盾存在。革命就是解决矛盾。今天中国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一般来讲,不是对抗性的,可是如果解决不好,就可能变成对抗性的矛盾。为了防止这样的变化,他宣布明年要进行一次大的整风,主要是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④。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关于“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的言论,铁托对“斯大林主义分子”的激烈抨击,引起中共中央的极大反感和警觉。在政治局

① 《忆毛主席》,原载《炎黄》。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原载《炎黄》。

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原载《炎黄》;《中共年表》,原载《炎黄》。

④ 《学习资料》(原载《炎黄》,原载《炎黄》),原载《炎黄》。毛提出“三害”的排列顺序后又加以改动,致使中共文件和其他领导人的讲话出现差异,我不认为这能表明中共领导层存在麦克法夸尔教授所推测的那种政策分歧。参见《“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译本)第1卷,原载《炎黄》。

的集体讨论中，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形成区分“敌我”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思想。^①他在1956年1月1日给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信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敌我之间用镇压的方法，人民内部用说服和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这里流露出他在波匈事件后对阶级斗争问题的再思考。^②

根据政治局的反复讨论和毛泽东的归纳，《人民日报》编辑部1956年1月19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开篇即提出应把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为观察国际问题的“根本立场”。文章认为匈牙利事件和杜勒斯的言论提醒人们，不能忘记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和国际冷战中的两极对抗。然后论列了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区别、产生原因和处理方法，接着谈到这两类矛盾会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③

在国际冷战背景下总结出来的关于两类矛盾问题的政治哲理，很快被运用到中国内部问题上。其中关于敌我对抗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却被逐步扩大，成为从民主整风转向反右运动以至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理论源头。

三、匈牙利事件的阴影： 从民主整风到反右运动

中国在国际风潮的影响下，1956年下半年也频频出现群众闹事。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8月到1956年11月，全国发生几十起罢工、请愿事

① 《忆毛主席》，1957年11月17日。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0册，1996年12月。

③ 《人民日报》，1956年1月19日。

件,共约 1 万人卷入。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也共有 1 万多人。农村也连续发生闹社的风潮,如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 1 万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有十一二万户退社,等等。有人在闹事中公开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①

闹事的原因,据刘少奇的调查研究,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政治性质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很少发生。“总起来讲,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人民内部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②毛泽东也认为:“如果我们不警惕,不改正官僚主义作风,结果就可以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脱离人民,甚至最终为人民所打倒。”^③

1957 年春,中共开展的以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是用民主方法处理党和群众之间矛盾的一次尝试。毛泽东 1 月 30 日作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2 月 27 日又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这两个讲话当时虽未立即发表,但在很广范围内传达了,起了鼓励党内外人士向中共的领导作风发表意见的作用。^④

整风之初,毛泽东强调允许互相批评,马克思主义不怕批评,老干部不怕批评,批评政府不犯罪。中共中央内部也出过坏人,也能产生官僚主义,所以对共产党的缺点也应揭发。“放”有百利而无一害,“收”是错误的。他甚至“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看作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认为群众闹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清除官僚主义,“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

①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232-233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262-265页。

③ 《学习资料》(1957年),262页。

④ 毛泽东 1 月 30 日的讲话,先后修改 3 次。反右运动开始后,才于 2 月 27 日正式发表。同原稿相比,讲话发表时有很多增删,最重要的变化是增加了强调阶级斗争的论述。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262-265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232-233页。2 月 27 日的讲话也多次修改,直到 1957 年 2 月才发表,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262-265页。

效”。^①

根据他的讲话和中共中央指示，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除布置党员学习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外，还邀请甚至组织党外人士批评中共政府的缺点错误，举行各种会议进行“鸣”、“放”，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各种批评意见。整风很快从“小民主”走向“大民主”，毛泽东的战略发生了急剧变化，从缘月中旬开始，采取“引蛇出洞”的“阳谋”，诱使“右派”们“放”。继而动员党内外力量大举反击，民主整风变成急风暴雨般的反右运动。

发生这一急剧变化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原因是苏共二十大和波兰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给中国决策者造成的心理阴影。

苏、波、匈事件的接连出现及其在中国社会引起的波动，使中共领导人认识到，阶级矛盾、敌我矛盾仍在一定范围（至少在国内意识形态领域和在国际上）存在，而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尤其是“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已经相当突出，不及时加以正确处理，就会发生全国规模的群众骚乱，所以有必要进行整风。另一方面，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以前没有进行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没有彻底镇压反革命，中国则进行过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较彻底的镇反运动，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反革命基本肃清了，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拥护中共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所以中共有可能用民主整风的办法去处理党和群众的矛盾。^②

然而，言路放开后，针对中共领导和政治体制问题的意见之多，批评之尖锐，出乎整风发动者的意料之外。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随之动摇，以至巨变。他认为党内的右派正在乘机“猖狂进攻”，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他断言：“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比“教条主义”更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③“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页 100；《学习资料（续一）》页 100。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页 100；《学习资料（续一）》页 100；《毛泽东选集》第 5 卷，页 100；《中共年表》，页 100。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页 100。

‘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①从‘防止’匈牙利事件到‘主动引出’匈牙利事件,分割歼灭之,战略的转换就这样实现了。

用扩大民主的方法解决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这一设想很好。但如果只是在人治或党治的条件下实行民主,则难免忽纵忽控,予取予与。只有在法治社会中,公民行使民主权利,才不至因言获罪,更不至因被扣上某种政治帽子而遭受各种形式的迫害。^②公民的言行是否危害社会,是否应受惩处,要由司法机构而非任何政党组织和群众来裁定。这次民主整风,没有健全的法制保障,中途转向反右运动,后果严重而深远。

后果之一,是“官僚主义”、“特殊阶层”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未能根本解决,反而积累下去,形成了一个循环模式:为解决矛盾、防止动乱而发扬民主,批评领导者的错误,又因民主批评越“轨”而惹怒执政者,以为匈牙利式的反共动乱迫在眉睫,于是调转矛头反“右”,限制民主。党群关系中的问题未能消除,尔后又新的发展,引起新一轮循环。当这种循环递进到某一个新的层次,毛泽东断然改变运动重点,决心放手发动群众“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动因。

后果之二,是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被当成敌我矛盾处理,大批对中共领导的方针、政策、作风和体制等问题提出批评和不同意见的人,被当作阶级敌人对待。缘万社会精华陷于冤案,历史创伤很难平复。^③

后果之三,是把社会主义社会本来已经基本解决的阶级斗争引入共产党内。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反对党内“修正主义”的任务。他认为,党内“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 296 页。

② 中央有关部门选择了较知名的 20 名右派分子作为“标兵”,将其绝大多数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或实行监督劳动,仅两人免于处分。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 292 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2 年。中央树起“标兵”后,各地纷纷仿效,对 20 万“右派分子”作了类似处理。

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 296 页;《回忆与研究》下册, 292 页。

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所主张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路线，“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①

后果之四，是在理论上修改中共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开始逐步走向阶级斗争扩大化。1957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中国城乡仍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②接着，在1958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③这就改变了中共八大的有关论断，改变了以经济建设为主要任务的指导思想，走向把处理只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为主要任务甚至是一切工作之“纲”的错误道路。这种受冷战国际事件和国内暂时的政治风波的影响而修改党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的做法，也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后果之五，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群众斗争方式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从此成为处理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包括党内）矛盾的一种武器。^④

后果之六，是在经济建设方针上也开始反右倾保守主义。毛泽东在一系列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周恩来等人1957年提出的“反冒进”的正确主张^⑤，从而为1958年的大跃进开了道，并因经济建设问题引发了党内新的争端。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来源待考，来源待考。由于我们尚不能看到毛泽东的原稿和历次修改稿，只能推测毛泽东有关反对党内修正主义的论述，是发动反右运动后才加进原文的，也可能是1957年代增补的。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来源待考。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来源待考。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来源待考。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来源待考。

四、赫鲁晓夫的幽灵：大跃进与庐山会议

1957年10月和1958年1月，苏联率先成功发射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这一成就鼓励了苏联人在经济、国防和科技领域赶超美国的雄心，也引起社会主义阵营赶超资本主义阵营的竞赛热潮。中国的大跃进就是在冷战两大阵营的经济竞赛推动下产生的。

1958年11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宣称，苏联的经济建设将在1962年后超过美国。毛泽东也立即在会上宣布，1962年后中国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他当时主要指的是钢产量。^①刘少奇1958年10月10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于是，“以钢为纲”，“全民大办钢铁”的工业大跃进就这样开始了。“超英赶美”的时间表在大跃进中一再缩短，后来一度想要两年超英，六七年超美。^②

工农业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引起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也引起领导者间的意见分歧。从1958年11月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接连召开许多会议，试图纠正冒进的错误。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也是为此目的召开的，基本精神是要纠正“左”倾冒进的偏差。但是，因为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认真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经验教训，结果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将会议矛头转向批判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并且挖出了一个由几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反党集团”。这简直是两年前的“整风—反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0册，255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0册，255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250—251页。

右”模式在中共领导层的重演。^①

为什么一封信会惹这么大的祸？这同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历史成见有关，也同毛泽东对这封信的国际背景的猜疑有关。本文要谈的是后者。

苏美两个阵营的大多数国家都对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持怀疑和否定态度。毛泽东对此种国际压力很不满，尤其不满赫鲁晓夫的态度。^②彭德怀五六月间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东欧，途经苏联时同赫鲁晓夫碰过面，在阿尔巴尼亚访问时也会过两次面。他回国后即参加庐山会议，并以写信方式提出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意见。毛泽东视彭此举为“下战书”，是想在中共中央树一面纠集反对派的旗子，于是毅然迎战，将彭的信起名为“意见书”，印发与会者讨论。毛泽东等人怀疑彭德怀出访时“摸了国际气候”，“大概在莫斯科取了点经吧”，“闻了人家对大跃进、公社看法的气味”，“是否同国际朋友（指赫鲁晓夫等人）的影响有关系？”联系到彭德怀以往反对个人崇拜的言论，认为他自苏共二十大以后，就很佩服赫鲁晓夫，现在又乘国内外、党内外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议论纷纷之际，向党向毛泽东进攻。而彭本人在向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指出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不良后果时，也曾多次讲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彭的支持者还在激愤之下说过，毛泽东的一些做法“很像斯大林的晚年”，“翻云覆雨”、“一手遮天”。凡此种种，都使毛泽东认为问题的性质很严重，非反击不可。^③

两年多以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不良后果已清楚地显示出来，全党都在努力弥补、纠正。可是，彭德怀的冤案仍不能平反。为什么？一位中央主要领导人解释说：“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在于彭是

① 《庐山会议实录》1980年增订本，183-184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0册，125-126页；第41册，183-184页。

③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125-126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批判资料》，183-1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

“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带领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直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彭德怀的冤案才得以平反，以上不实之词全被推翻。国际背景对中共党内斗争影响之深，于此可见一斑。

庐山会议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迈上一个新台阶。一方面，毛泽东由此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他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①于是，中央领导层就成为未来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另一方面，毛泽东把怎样评价大跃进、人民公社，看成是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持什么立场的问题，从而助长了“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只能“鼓干劲”，不许“泼冷水”的风气。^②

庐山会议后，全党接着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各级组织中的干部、党员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达100万^③，大都是敢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人。^③继1959年反右派运动后，这一大批党内精英又一扫而去，全党全国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的路线，就只有顺从而很难形成牵制力量了。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156 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 册，156 页；157 页。

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156 页-157 页；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156 页-157 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

五、从反对美国的‘和平演变’到防止中国的‘赫鲁晓夫’

1953年上台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开始大力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和平攻势”。国务卿杜勒斯宣称要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实行“解放”政策，“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这些话曾引起过毛泽东的注意，认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策略有变化。^①

自1953年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发生一系列的原则分歧。1953年苏美关系开始改善，两国首脑在戴维营举行了高峰会谈。而在此前后，苏中关系继续恶化，波及两国间的国家关系问题。1953年11月，中国拒绝了苏方建立共同舰队和以近1亿美元的投资建立电台的要求。^②1953年12月，苏方片面撕毁协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在中印边界纠纷中，苏联偏袒印度。苏、美等国领导人和报刊还对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大量的指责，被毛泽东视为“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这时又加紧宣扬“和平取胜战略”。这些情况促使毛泽东深入思考美国政策的目标与手段、苏联变化的性质与原因等问题。

1953年12月14日，毛泽东在对各协作区主任的一次谈话中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要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他的讲话。^③

1953年12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议，讨论国际形势。会前他让秘书找出杜勒斯近年来的三篇讲话重新阅读，然后同秘书谈了对这些讲话的看法，由秘书根据他的谈话内容对每篇讲话各拟一个批注，连同杜勒斯三篇讲话的全文印发给与会者。12月14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进一步分析了杜勒斯所说的“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句话，指出：“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

①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153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144-145页。

③ 林克：《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载《党的文献》1986年12期，15页。

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要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对杜勒斯 1955年 11月 16日在纽约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毛泽东评论说：“杜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笑声）“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毛泽东总的看法是：“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希望大家看一看印的这个文件”。^①

反和平演变的战略任务，从此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

从 1956年起，中苏分歧进一步加剧。中共报刊开始点名批判南斯拉夫的铁托，实际上是不点名地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在党内，则明确指出苏联已经变修，要吸取他们的教训，并认为中国也已经有了“修正主义者”，就是彭德怀等人。^②

在 1956年 1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指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中国党内也有些人“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而且“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③

到了 1956年 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进一步作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提出“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还提出把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改称中国的修正主义。^④ 全会公报指出：“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⑤

在 1956年至 1959年的中苏公开论战中，关于帝国主义的冷战压力与

① 同前文，载《党的文献》1986（6），139-140页。

②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151-152页；《人民日报》1956年 12月 12日。

③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0册，127-128页，北京，国防大学，1982年。

④ 《学习资料》（1956-1959），152页。

⑤ 《人民日报》1956年 12月 12日。

“和平演变”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和修正主义篡权的外部原因的观点，得到进一步的阐述。^①中共连续发表 19 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其中分析了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演变”战略，指出南斯拉夫就是经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苏联正从各方面学习南斯拉夫的榜样，走上了同样危险的道路。^②

在 1959 年 7 月发表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中，中共全面总结了苏联的教训，认为：“在今天的苏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完全适应美帝国主义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需要”。这篇文章将毛泽东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系统地归纳为 15 个要点，其中已经含有后来被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即“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基本要素。文章最后强调，毛泽东指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性，“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文章在列举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时，每一条都把赫鲁晓夫作为反面教员加以对照，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警惕到了何等程度。^③

这时，越南战争逐步升级，美国把战火烧向越南北方。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中共中央 1959 年五六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突出地强调了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修正主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从反修防修和防备世界大战的总体战略上布置了各项工作。刘少奇谈到南斯拉夫和苏联变修的教训，提议也想想我们会不会搞修正主义？毛泽东说：已经搞了。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拿在我们手里。他郑重号召：省、地、县传下去：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中央，各省要顶住。

此后，毛泽东等人对全国各级领导权“和平演变”的程度，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性，越看越严重。他 1959 年 8 月在一个批示中又提出中

① 《人民日报》1959 年 7 月 1 日。

② 《人民日报》1959 年 7 月 1 日。

③ 《人民日报》1959 年 7 月 1 日。

国有“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接着，在中共中央 1958 年 11 月 1 日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①

至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及其理论根据已经基本形成。一年后，毛泽东终于确定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是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哪些人，“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

结 语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开始以苏为鉴，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两极对立的国际冷战形势下，中共一方面要回应苏联东欧掀起的非斯大林化风潮，一方面要应付美国发动的“和平攻势”。他们看到，社会主义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的矛盾正日益暴露，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又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严重威胁。毛泽东依据其政治哲学（对立统一是根本规律，矛盾、斗争、转化是核心内容），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矛盾，可分为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的性质，应以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

毛泽东等人虽然试图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矛盾，但是在实践中以阶级斗争为取向，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共拟以扩大民主来缓解党和群众间的矛盾，可是对于矛盾的严重性显然认识不足，对整风鸣放中的批评感到意外和震惊，因而转取阶级斗争模式。结果，一方面造成社会上层与下层的矛盾积压，没有适当的解决机制；另一方面逐步将人民内部、党内、中央内部的矛盾视为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反映。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毛泽东认为党和国家领导层的“修正主义”已异常严重，必须彻底清理，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中共决策层对国际冷战事件和形势的反应，基本一致，越来越趋于“反帝反修”的战略取向。在国内重大问题上，决策层 1950 年代的分歧较 1960 年

^① 《中共年表》第 6 卷，第 10 页。

代为多，但实际上也从未达到毛泽东估量的那种严重程度。“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矛盾性质和程度错误估计所致，其中对某些国际冷战事件与形势的领悟与反应有无失误？是否因此引起对国内党内矛盾的错误估量与处理？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系首次发表。)

苏联外交部对分裂前夕苏中关系的估计

美国哈佛大学 马·克莱默

员

1959年12月初,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指示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米哈伊尔·齐米亚宁为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准备一份有关中国的详细的背景材料,因为赫鲁晓夫定于当年12月底和1960年初对中国进行访问,参加中国国庆十周年的庆典。葛罗米柯十分清楚,苏联领导人此次访华旨在弥合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日趋增长的裂痕,只是这一裂痕尚未公开化而已。起初,赫鲁晓夫访华意愿比较勉强,因为当时他还有其他一系列事情尚待处理,但是在同苏共其他领导人讨论后,他决定必须与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高级领导人进行面对面的会谈,认为这才是“驱散阴云”,保持友谊的惟一途径。^①

1959年12月15日,齐米亚宁完成了一份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地位》的长达140页的绝密报告。也是在这一天,赫鲁晓夫开始访问美国。12月18日,也就是赫鲁晓夫即将访华的前一天,赫氏结束访美归国。在他回国途中,他拿到了齐米亚宁的报告。现在这份报告保存

^① 尼·赫鲁晓夫:《回忆录》(总卷本)第3卷第3部分,第27-28页,莫斯科,1970-1971年。

果联系,这也是许多西方分析家强调的一个主题。^①

尽管齐米亚宁在这份文件中的结论是积极的,认为苏中之间兄弟般的友谊和富于成果的合作建立在持久的基础之上,并一年比一年增强和扩大,但他的分析毫无疑问地说明,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趋于恶化。

在这份报告中有四个方面特别值得关注:

首先,这份报告承认苏中这两个共产党国家一直存在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双方发展关系的初期。尽管齐米亚宁没有指出中国在缘年代早期一直仅仅是莫斯科的一个“勉强和持怀疑态度”的盟友,但他强调“苏联在斯大林时期曾经侵犯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利益”,并曾

① 有关这一问题的颇不相同的两种论述,见唐纳德·扎格里亚:《中苏分裂:缘-缘年》(普林斯顿,缘)和斯蒂芬·戈尔茨坦:《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中苏关系》,载于托马斯·鲁滨逊和大卫·香博编:《中国外交政策:理论与实践》(牛津,缘),缘-缘页,特别是缘-缘页。扎格里亚认为,中国对于其他国家(包括苏联)的政治主要是决定于在中共领导层内部到底是由“左派”还是“右派”控制局面。戈尔茨坦则将中苏合作的失败归结于“毛的国内政治原则的一个基本改变”,即将“民族主义”的考虑置于“国际主义”的考虑之上。虽然戈尔茨坦并没有忽视中共内部派别的因素,但他仍然认为,“毛能够自己决定中国政治的音调和日程表”,而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正是在“毛在缘-缘年间对于国内状况的考虑有着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发生变化的。对此持反对意见的,见约翰·吉廷斯:《世界与中国,缘-缘年》(纽约,缘)。与扎格里亚和戈尔茨坦及其他许多人不同,吉廷斯认为外部危机导致了中国国内政策的变化,而非相反。持同一论点的还可见迈克尔·亚胡达:《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角色》(纽约,缘)特别见缘-缘和缘-缘页。奇怪的是,很少有西方学者把苏联对华政策的变化同苏联的国内政策联系起来。亚历山大·达林在《苏联外交政策的国内根源》一文对此有过简略的概括,载于休厄林·比亚勒编《苏联外交政策的国内环境》(博尔德,缘),缘-缘页,但他没有特别关注苏联与中国的联系。卡尔·林登则在《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层》(巴尔的摩,缘)一书中对苏联上层政治对赫鲁晓夫对华态度的影响作出了一些评论,维克多·巴拉斯也曾对缘-缘年间苏联上层政治对中国的影响作过一篇短文,题为《中国和赫鲁晓夫的崛起》。见《当代共产主义研究》第缘卷,第缘和第缘期(缘年春-夏),缘-缘页,但巴拉斯和林登的观点大多为猜测,不完全可信,特别是林登的观点。即使是詹姆斯·里克特所写的比较好的《赫鲁晓夫的双重困境:国际压力与国内政治联盟》(巴尔的摩,缘)一书,虽然关注了苏联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的联系,但也绝少提到苏联对华政策。在中苏关系中,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在某种程度上,其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都是相互联系的,也许,在苏联方面,这一联系相对较弱,但这毕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空白。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苏联的一个卫星国来对待”。^① 尽管齐米亚宁这些对斯大林时期对华政策的批评是受到当时苏联反斯大林的政治环境的影响，但他在报告中列举了 1953 年至 1955 年时期，莫斯科方面的“消极”行动阻碍了苏中关系在全面平等、互助和信任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②

他的这些观点十分有意思，而且与 1950 年代初期美国情报机构的结论相类似。尽管莫斯科和北京双方都竭力给外界一种友好和睦的形象，但当时美国官员已经感觉到在中苏 1950 年 2 月 17 日签署同盟协定的过程中，双方已产生了些许不愉快。据一份秘密报告称，毛泽东“对苏联方面的要求非常不满意”，周恩来也说他“宁肯辞职也不愿接受这些条件”。^③ 尽管双方的官员在以后几年中，竭力隐藏双方的不和谐，但“在共产主义中国和苏联之间存在紧张和困扰”的传闻还是不时传到华盛顿，这些紧张和困扰正如齐米亚宁所写的那样。^④

苏中双方官员一般认为苏中关系破裂起源于双方对 1956 年 2 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报告的不同认识。^⑤ 但齐米亚宁的报告与众不同，他把双方交恶的起源追溯到了斯大林时代。直到最近，还有许多西方和俄国的学

① “勉强和持怀疑态度的盟友”这一段取材于戈尔茨坦最新的两本著作，这两本书揭示了中国由于对美国的仇视而在 1949-1950 年“被迫”与苏联结盟。见其《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104 页及其后诸页和《1949-1950 年的中苏联盟：意识形态与团结》以及由哈里·哈丁编辑的即将出版的《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合作方式》一书。

② 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态度问题的更多的评论见《回忆录》第 2 卷第 1 部分 13-14 页。此外还可以见安德雷·葛罗米柯的《永志不忘》（莫斯科，1965 年第 2 卷），106-107 页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③ 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致美国驻法国大使的备忘录，1950 年 2 月 17 日，存于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50），第 2 卷第 1 部分，中国 103 页，华盛顿特区，1952。

④ 艾森豪威尔—邱吉尔—贝当会谈备忘录，1950 年 2 月 20 日（秘密），存于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1950-1951 年，第 2 卷第 1 部分，中国 103-104 页。

⑤ 如见《苏共领导人与我们分歧的根源和发展》，《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的《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56 年 2 月 20 日，《北京周报》第 2 卷第 1 期（1956 年 2 月 20 日）2-3 页。

者认为 1959年或 1960年是中苏交恶的转折点。^①但现在看得很清楚,不管是齐米亚宁的报告还是其他的一些证据(见下文)都说明,双方紧张关系的起源要早得多。

但这并不是说,中苏关系的全面破裂,特别是 1960年代中期至末期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从历史回顾的角度来看,大多数事件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但当时的现实通常是非常复杂的。在 1950年代前半期,中国并不是苏联的一个“勉强和持怀疑态度的盟友”相反,毛泽东希望全盘照搬苏联经验,并以国际共产主义的名义与莫斯科建立牢不可破的全面的关系。尽管如此,后来的回忆和档案,包括齐米亚宁的报告都揭示出,早在 1950-1955年,中苏冲突的萌芽就至少以某种形式显露出来了。

其次,在强调中苏交恶的根源始于斯大林时代的同时,齐米亚宁的报告还强调由苏共二十大和中国“双百运动”所引发的各自国内的反思和批评也对双边关系产生了不利影响。齐米亚宁认为中国领导人曾在苏共二十大后“全面支持苏共清除个人崇拜及其影响”,但他也指出北京方面对斯大林的评价“与我们有很大不同”,而且苏共二十大促使“中国朋友……对苏联的机构、专家的著作和苏中关系的其他事项发表批评意见”。按齐米亚宁所说,更具破坏性的是中国“双百运动”的影响。他列举了在中国出现的范围广泛的“充满敌意的言论”和“对苏联和苏中友好的指责”。他写道:“这种大鸣大放是不容辩解的。”他在报告中表达了对一些针对苏联的领土

① 把 1959年作为冲突起点的著述很多,包括扎格里亚的《中苏冲突》;威廉·格里菲斯的《中苏分裂》(剑桥,1959);弗朗索瓦·费尔多的《中国—苏联,1949—1960年的联盟与冲突》(巴黎,1960);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苏联阵营:团结和冲突》修订本(剑桥,1960);~~猿猿~~猿猿页和猿猿-猿猿页;让·瓦比的《1950-1960年的中苏大论战》(巴黎,1960);~~猿猿~~猿猿页;赫德森、理查德·洛温塔和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编著的《中苏争论》(纽约,1960)“导言”,猿猿-猿猿页以及托马斯·哈特的《中苏关系:对正常化前景的重新估计》(奥尔德肖特,1960)。而与此不同的观点,见戈尔茨坦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猿猿-猿猿页,认为导致 1960年中苏关系转折的主要因素是毛泽东对国内问题的重新考虑,这一因素要大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 1960年作为中苏冲突起点的著述包括亚胡达的《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角色》,猿猿-猿猿页;艾伦·怀廷的《中苏分裂》,收于由麦克法夸尔和约翰·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 猿猿卷:《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部分,猿猿-猿猿年中国革命的兴起》(纽约,1960),猿猿-猿猿页;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 猿猿卷《跃进》,猿猿-猿猿年(纽约,1960)猿猿-猿猿页、猿猿-猿猿页。

要求的特别关注。^①

第三,如一些人所想到的,齐米亚宁对中国大跃进时期开始出现的中苏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相当关注。在 1958 和 1959 年,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存在的裂痕主要表现在对待人民公社、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马列主义问题的分歧上。而在以后的几年中,在领土要求和全球战略方面的尖锐分歧也爆发出来(这里还不包括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个人之间的冲撞),但到 1959 年 9 月时,这些问题尚未主导两国关系。因此,这也就不用奇怪齐米亚宁在当时把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突出出来。他的报告进一步证实了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远要比地缘政治方面的分歧严重得多。

最后,在齐米亚宁报告中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忽略,有必要作一简短的分析,因为这有助于人们对这份报告有更好的理解: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关系。尽管齐米亚宁认为苏中关系中的问题始于斯大林时期,但他在报告中没有说明在 1959 年 5 月毛泽东对苏联进行的为期两个半月的访问中,斯大林是如何对待毛的。这一忽略是遗憾的,因为斯和毛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只有简短的评论。苏中官员在此方面提供的一手资料都是相互矛盾的。其中一个最有偏见的描述见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

当时斯大林(对中国领导人)不屑一顾,既不会见毛,也不让别人去招待毛,也没有人敢去见毛。我们开始听见一些传言,说毛泽东如何不高兴,好像他被关了禁闭,没有人理睬他。毛想让人们知道,如果这种状态继续下去,他就要拂袖而去。……这样,斯大林埋下了中国

^① 有关领土问题的文献和分析,见丹尼斯·杜林编著的《中苏冲突中的领土要求:文献和分析》(斯坦福,1958),乔治·金斯伯格和卡尔·平克莱斯的《1950-1959 年的中苏领土争端》(纽约,1960),宰理道格拉斯的《俄中边界:和平接触还是潜在冲突的地区?》(纽约,1960),安泰苏的《中苏领土争端》(费城,1960),页 1-3;卢克·张的《中国的边界协定和领土争端》(纽约,1960),页 1-3。认为领土问题并不是导致中苏分裂主要原因的观点,见克劳斯·梅奈特:《暴风雨后的中国:报告和评论》(斯图加特,1960),页 1-3。尽管梅奈特的观点总的说来是有说服力的,但齐米亚宁的报告还是为前一种观点提供了新的佐证,即中国的领土要求对中苏关系破裂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至少苏联方面是这么看的)。

反苏、反俄的敌对情绪的种子。^①

另一个相似的描述来自安德烈·葛罗米柯，他在回忆录中也提到，~~1959~~年~~10~~月的一天，斯大林设晚宴招待毛泽东，当时的气氛十分“压抑”，两位领导人“好像在个人方面没有什么共同点使他们无法建立起一般的关系”^②。由于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所看到的与众所周知的斯大林的一般习惯相一致，因此，在西方他们的描述被广泛接受。

不过，最近苏联驻华使馆译员尼古拉·费德林和中国外交部译员师哲却为人们提供了有关斯—毛关系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当时他们两人前者是斯大林的译员，后者则是毛泽东的译员，在~~1959-1960~~年期间参与了所有中苏间的高级会谈。^③ 尽管他们也承认斯—毛之间在一些问题上有所争论，但他们都强调总的来说关系是友好的。费德林的回忆特别是针对赫鲁晓夫的说法来的：

后来有人说斯大林几乎有一个月没有接待毛泽东，而且一直对毛没有给予应有的礼貌。但我要说，这些说法是错误的，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当时在场，两位领导人的行为举止和会谈的总体气氛完全不像那些人说的那样。……从首次会谈开始，斯大林就向其中国同事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在同毛泽东的会谈中，斯大林一直以平静、节制、礼貌的态度对待他的客人。他对会谈全神贯注，并没有漫不经心。

师哲也作了相似的描述：“斯大林主动地迎上前去并不住地向毛表示问候。”师对西方盛传的在中苏谈判同盟协定的紧张阶段“斯大林把毛软禁起来”的谣言给予了澄清。

但即使有了这些新的文献，要想辨别他们的真假还是十分困难的。~~1960~~年~~10~~月~~21~~日和~~1960~~年~~11~~月~~14~~日毛泽东和斯大林私人会面的记录副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2~~卷~~第~~部分~~第~~页。

② 葛罗米柯：《永志不忘》第~~1~~卷~~第~~页。

③ 师哲：《伴随毛主席》和费德林：《斯大林与毛泽东在莫斯科的会谈》，载《远东问题》~~1960~~年~~10~~月~~14~~日和~~1960~~年~~11~~月~~14~~日第~~1~~源板发表的费德林文章的节选《夜间会谈：历史的一页》。

本也许是有用的。^① 这两个副本向人们揭示了斯—毛关系的大量内幕（并不只是证实了两次会谈相隔的时间），但它们却不能，事实上也不可能全面反映出斯大林对毛的态度，比如握手、寒暄甚至是互相赞扬等细节都在速记中被有意无意地省略了。这种情况在东欧阵营中其他国家的文献中也经常发生，即把双方的分歧不予记录。^② 而且这两个副本也不可能告诉人们在正式会谈以外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虽然参与斯—毛会谈的双方随员的回忆可以作为有益的补遗，但对这些回忆也要相当谨慎，特别是对那些事隔多年之后才出版的回忆录更要谨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发表于斯—毛会谈的 1956 年后，而葛罗米柯、费德林和师哲的回忆则发表于那次会谈的 1957 年以后。即使有人认定（也许是含糊的）上述回忆录都是依据当时他们的亲历，但这么多年后，也难免有记忆上的失误。^③

不过，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可以使人觉得费德林所述要比赫鲁晓夫所述要更为可信。第一，费德林和师哲参加了斯和毛之间所有的私人会晤，而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只是参加了公开的会见。^④ 第二，可以想见的是赫鲁晓夫乐于过分贬损斯大林的行为（他这样做也许是下意识的，或者是一直想把苏中关系破裂的责任推给斯大林）。相反，费德林则在 1953 年（戈尔巴乔夫时期）没有什么理由要为斯大林说什么好话。人们因此可以认为

① 约·维·斯大林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毛泽东 1953 年 7 月 16 日会谈记录，第 15 号文件；约·维·斯大林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毛泽东 1953 年 7 月 18 日会谈记录，第 15 号文件。

② 比如 1953 年 7 月在华沙举行的五国首脑会议波兰的会议记录和 1953 年 7 月 18 日苏捷首脑在蒂萨河畔切尔纳举行的两次会议捷克斯洛伐克方面的记录。在前者中，双方在正式会议休会期间的非正式会谈没有被写进最后文本，但在与会的一个关键人物彼得·谢列斯特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一省略被认为是很重要的，因为双方讨论了对捷克采取军事行动的问题。而在后者中，谢列斯特对一名犹太裔捷克官员的侮辱言词在最后文本中也被省略了。不过幸运的是，被省略的部分被当时与会的一些人（包括谢列斯特本人）记入了他们的日记。

③ 对回忆录的使用要谨慎，见马克·克莱默：《记住古巴导弹危机的教训：难道我们要轻信口头传说吗？》，载《国际安全》第 15 卷第 1 册（1957 年夏），104—105 页；马克·克莱默：《莫斯科的档案研究：进程和陷阱》，载《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第 1 期（1957 年下半年），15—16 页。

④ 文件的副本揭示了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人中，除斯大林外，还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维辛斯基、米高扬、布尔加宁等。

费德林的描述是接近事实真相的。

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从后来发现的大量文献、证词来看,支持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观点的要多于支持费德林的。其中之一是当时斯大林的亲密战友莫洛托夫的回忆,莫氏是斯大林的坚定捍卫者,即使是在 1956 年被赫鲁晓夫赶下台以后还是那样。他说 1956 年 10 月,中共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在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两次会见之间,毛不得不坐了几十或是几个星期的冷板凳。^①这与赫鲁晓夫的回忆大体相同,也与上面提到的两个副本所说的相吻合。赫鲁晓夫的说法还被另一位苏联将军伊万·科瓦廖夫的回忆所证实,科瓦廖夫这位高级军官曾在 1958 年至 1960 年代初作为斯大林的私人特使访问中国。在 1960 年的一次长时间采访中,科瓦廖夫描述了毛当时经历的磨难和非礼:

毛(在 1959 年 10 月)与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会见,他们轻率地拒绝了毛要与他们共进晚餐的请求,认为这样做不合外交礼仪。他们又以相同的借口拒绝了毛要与他们一起在其乡间别墅休闲的请求……毛显然被这种冷遇搞火了。也就是在同一天,斯大林会见了毛泽东,但此次会见并不像毛所期待的那样富于建设性。此后,毛就在其别墅中打发无聊的日子,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都不来看他……当时我与毛天天接触和见面,我看得出他焦躁不安。^②

科瓦廖夫还提到,1959 年底,毛请他给斯大林带个正式的口信,希望再安排一次会见,并说“所有的事,包括(毛的)业余时间和医疗保健等一切都可以听从(斯大林的)安排”^③。据科瓦廖夫说,这一建议没有被理会,而且“与从前一样,毛实际上仍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尽管当时毛“采取了报复行动,拒绝会见苏联驻华大使”,但这一举动并没有对斯大林产生什么影响。科瓦廖夫强调“直到周恩来在 1959 年 11 月来到莫斯科后,谈判才最后

① 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 1956 次谈话》,1956 年,莫斯科,1956 年。

② 《历史与当代:斯大林与毛泽东对话》,载《远东问题》,1960 年(10),1960 年。引自历史学家谢尔盖·冈察洛夫对科瓦廖夫采访记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以及科瓦廖夫的经历背景见《远东问题》,1960 年(10),1960 年。

③ 《历史与当代》,1959 年。

取得了成功”。科瓦廖夫上述所说进一步支持了赫鲁晓夫的回憶。

此外，赫鲁晓夫有关斯—毛关系的回忆也被最近发现的一个新的未经证实的说法所佐证，这一佐证实际上来自于毛泽东本人。在 1956 年 7 月末，毛泽东私下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时，曾苦涩地提到 1955 年他在莫斯科所感受到的“尴尬的处境”，以及斯大林对中国领导人的“极大的不信任和怀疑”。毛还提到了他在同斯大林进行初次会晤后所受到的“令人屈辱”的待遇：

从那时起，斯大林总想躲着我。我曾试图给他打电话，我被告知他不在家，并说如果我有事可见米高扬。我感到受了伤害，我决定什么事都不做，就在别墅里休息。后来我同科瓦廖夫和费德林有过一次不愉快的谈话，他们建议我到全国各地走走，我当即表示拒绝，我宁肯在屋子里睡大觉。^①

毛还把这些“问题和困难”向他的中国同事作了谨慎的表白。在 1956 年 7 月成都会议上的一次秘密讲话中，毛断言 1955 年前他被斯大林逼到了屈辱的地步：“1955 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就两国军事同盟问题、长春铁路问题、建立合资企业问题和边界问题吵了两个月。我们的态度是，当他提出我们不能接受的条件时，我就表示拒绝，但当他坚持时，我们就让步。我这样做是出于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②

毛没有追究斯大林把蒙古和新疆当作苏联“殖民地”的做法，毛对此曾表示出特别的憎恶。这一点在齐米亚宁的报告中也有反映。^③ 在成都会议及以后的一些讲话中，毛反复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和“缺点”，把长期受

① 1956 年 7 月 7 日与毛泽东会谈记录，苏联驻华大使尤金 1956 年 8 月 2 日的报告第 4 页，绝密，见现代文献保管中心，云藏韵卷宗，查阅网址：<http://www.gd.gov.cn>。费德林的文章为科瓦廖夫与毛的会谈提供了佐证，但没有指出毛发现了令其不愉快的任何事情。

② 毛在成都会议上的三篇讲话首次发表于 1956 年由中共中央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集子里，1956 年 10 月。这里引用的是 7 月 7 日的那篇。其英文译文首见于《问题与研究》（台北）第 2 卷第 4 期（1956 年 10 月），22 页。

③ 毛曾经就此问题与尤金在 1956 年 7 月进行过一次长时间讨论，提到东北和新疆已经成为“受苏联影响的地区”。见 1956 年 7 月 7 日与毛泽东会谈记录，23 页。

压抑的对这位苏联独裁者的怨言都倒了出来。^①

事实上,如果不是疏忽的话,即使是在费德林和师哲的回忆文章中,也表现出斯—毛关系并非从始至终一直都那么热情。他们两人都承认,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斯大林拒绝对中国共产党提供更多的支援,中苏关系在 50 年代初仍受到这一“后遗症”的影响。^② 这种状态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双方领导人关系的紧张,就像毛 1959 年 7 月对苏联驻华大使以及此后在成都会议的一次秘密讲话中所说的那样:

中国革命的胜利出乎斯大林的意料……当我们革命成功后,斯大林不相信。我们也没有表示抗议。^③

师哲也回忆了在 1959—1960 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受到冷遇期间,斯大林也是闷闷不乐。根据师哲的说法,当时很明显,中苏谈判僵持不下,斯大林反复想试探毛的意图,但没有成功。师哲补充道,由于两位领导人交流不畅,使毛在某种程度上不无嘲讽地表示,在中苏关系上,斯大林“想把尿盆子都扣到中国身上”。与之相似的是,费德林也指出当时斯大林对谈判表示出极大的怀疑态度,“阴谋”、“诡计”等字眼不断地脱口而出。这种行为为说明斯大林并不像费德林开始描述的那样好客。

① 毛的秘密讲话的目录,见蒂莫西·奇克的《说教:对毛最新著作的评论》,收在由麦克法夸尔、奇克和尤金·吴共同编著的《毛主席的秘密讲话:从百花齐放到大跃进》,哈佛当代中国丛书第 2 卷,剑桥,1969 年,第 15 页。

② 对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苏联对华政策曾有过很多有价值的文献,对斯大林的政策提出了不同的评价。在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有由俄国档案保管和研究中心主编的多卷本文献选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的民族革命》,其中第一卷出版于 1992 年,收录了 1959—1960 年的有关文献。而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关于这方面的文献也陆续发表于最近几期的《远东问题》杂志上。也许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米高扬在 1959 年 11 月 10 日访华后致苏共中央的一份很长的备忘录,此外,还有安·列多夫斯基发表在 1992 年第 1 期第 27—30 页和第 3 期第 37—40 页上的有关佐证材料。而从 1959 年初起的一系列重要文献作为米高扬备忘录的重要补充,已由俄罗斯著名学者谢尔盖·齐赫文斯基编辑以《来自俄罗斯总统档案馆的材料:1959 年初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往来电报》为题发表在《近现代史》(莫斯科)第 3 期(1992 年 7—8 月)第 15—16 页。其中包括斯大林与毛泽东在 1959 年 1 月间的远电报往来,现藏于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云冈学卷宗 1992 年 15 页。

③ 7 月 15 日的讲话,15 页。有关毛在 1959 年 7 月会议上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评论见 1959 年 7 月 15 日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92 年 15 页。

尽管有这么多丰富的史料，但在斯—毛关系方面仍有许多没有解开的谜，对这些文献和一手材料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的回忆似乎已被后来的史料所证实，但费德林和师哲的回忆至少到目前为止也是严肃认真的。而齐米亚宁的分析与赫鲁晓夫的描述虽然一致，但也没有在此问题上提出任何富于结论性的证据。

——~~1956年~~ ~~1956年~~ 10月波匈事件。在 ~~1956年~~ 苏联和波兰关系冷淡期间，中国领导人全力支持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并反对苏联武力干涉波兰内政。最终，赫鲁晓夫在波兰问题上接受了一项和平的解决办法。而当 ~~1956年~~ ~~1956年~~ 10月 ~~19日~~ 日，中国代表团应邀到莫斯科就匈牙利事件紧急磋商时，中国方面起初劝阻苏联不要出兵匈牙利。尽管当时赫鲁晓夫及其同事已不再相信“匈牙利的工人阶级”还能“重新控制局势并依靠自身的力量平息动乱”，但他们还是同意了不对匈牙利进行进一步的干涉。^① 不过，不到 ~~1956年~~ ~~1956年~~ 10月 ~~19日~~ 小时，苏联政府改变了先前的决定，决定对匈进行大规模的干预。^② 当毛泽东得到这一通知后，他立即表示出对苏联的强烈支持，因为当时匈牙利领导人伊姆雷·纳吉在 ~~1956年~~ ~~1956年~~ 10月 ~~19日~~ 日（也就是苏联决定出兵后的一天）宣布匈牙利要脱离华约，成为中立国。

中国后来成了苏联出兵匈牙利的坚定支持者，并公开支持 ~~1956年~~ 远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2~~ 卷 悦部分 ~~156-157~~ 页；邱部分 ~~156-157~~ 页。赫鲁晓夫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被 ~~1956年~~ ~~1956年~~ 10月中国人出版的一本不公开的读物所佐证。中国媒体在 ~~1956年~~ ~~1956年~~ 10月 ~~19日~~ 日前一直对匈牙利事件态度积极，但到 ~~1956年~~ ~~1956年~~ 10月 ~~19日~~ 日，也就是纳吉宣布匈牙利退出华约后一天和苏联决定出兵后两天，中国的报刊突然开始谴责匈牙利的“反革命”。而其他一些新的文献，包括前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韦·米丘诺维奇的回忆录《莫斯科日记》，也对赫鲁晓夫所说提供了佐证，这本书已由大卫·弗洛伊德翻译，于 ~~1956年~~ ~~1956年~~ 在纽约出版，见该书第 ~~156-157~~ 页。赫鲁晓夫的说法与中国 ~~1956年~~ ~~1956年~~ 10月 ~~19日~~ 日的官方声明并不矛盾，它们都说明苏联领导层在如何处理匈牙利事件问题上一度犹豫不决。中国的声明没有提到中国官员在匈牙利事件之初是否也犹豫不决，但这是毫不奇怪的，也是与赫氏的说法不矛盾的。中国的声明进一步确认了中国领导人“坚持以一切必要的手段镇压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并坚决反对匈牙利放弃社会主义”。这一结论与赫氏关于毛泽东在苏共中央 ~~1956年~~ ~~1956年~~ 10月 ~~19日~~ 日作出出兵决定后极力表示支持的说法是一致的（由于中国的声明省略了一些时间，因此它给人们一种印象，好像毛泽东是在苏共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就支持对匈出兵，但实际上是苏共决定在前，毛的支持在后）。简而言之，即使中国的声明在各个方面都准确无误，也并不意味着它与赫氏的说法相互矛盾。

② 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云 ~~1956年~~ 卷宗 ~~1956年~~ 来源 ~~1956年~~ 来源 ~~1956年~~ 来源 ~~1956年~~ 来源

月对纳吉的处死。但正如中国官员后来所说,整个事件对北京产生了巨大的震动。齐米亚宁在他的报告中突出地提到了 1959年 5月 14日苏联的声明,但是他没有就这份声明的前因后果作什么分析。

——中苏关于第三世界的政策。5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开始积极地支持和促进在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反帝斗争”^①。这一战略反映了当时中国国内政治的激进色彩。这在毛的讲话中也有所流露,1959年 5月,他首次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而根据毛的阐述,苏联在远程核导弹方面的突破,将有效地阻止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势力的镇压。而苏联领导人在此问题上,与其中国同伴相比,至少在口头上要谨慎得多,主要是因为苏联方面清楚东西方军事平衡并没有得到改善,这一点许多中国官员也这么看。苏联领导人不时地提醒说,如果超级大国直接介入的话,第三世界的地区冲突中有可能升级为极具破坏性的世界大战。

而在实际政策中,苏联和中国在具体做法上的分歧却很小。^②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是苏联而不是中国一直给予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尼、马来西亚、越南、危地马拉、菲律宾和古巴)的共产党以主要的军事援助。^③而中国领导人虽然都显得很好战,但在把言论转换到具体政策上时往往很迟缓。中国代表在同苏联官员的私下交谈中,辩护说他们的“谨慎”是有理由的和必要的,他们只对那些“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军援”^④。

中苏两个共产党大国的政策除了在一些本质问题上的相似外,在其他方面似乎注定要产生分歧。1959年 7月,伊拉克一个反对其亲西方政府的左派组织制造的动乱使中东经历了一个短暂但是剧烈的危机,导致美

① 关于这方面的西方分析,见彼得·内斯的《革命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北京对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帕克利,1959)。

② 许多西方分析家都夸大了 50年代苏联和中国在对第三世界做法上的分歧,实际上苏中是口头分歧多于实际做法上的分歧。

③ 见克莱默:《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武器运输和军事支援》,收于由尼尔·麦克法兰和库尔特·坎贝尔编著的《戈尔巴乔夫的第三世界困境》(伦敦,1983),27-50页,特别是 28-30页。

④ 现代文献保管中心,云藏韵卷宗 猎阅读范编编

国和英国派遣部队到黎巴嫩和约旦。不管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中国官员都敦促苏联对“美帝国主义对中东地区的入侵”给予坚决的回击，由于中国缺乏实力，因此这一任务是中国自身所不能完成的。然而与北京的期望相反，苏联领导人很快意识到这样做将一无所获，而且还要冒东西方直接对抗的风险。^① 苏联没有像北京要求的那样向伊拉克新政权派遣“志愿者”，并给予公开的军事支援，而是更多地依靠外交手段，呼吁联合国召开一次特别会议来解决危机。尽管到 1955 年 7 月底赫鲁晓夫访华时，危机的高潮已经消退（而且中苏间的分歧也已极大地消失），但中东地区持续紧张的形势仍然是赫氏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一个重点。^② 这一次富有成果的交流部分导致了苏联对几星期后中国“炮击金门”行动的大胆支持。

从 1955 年到 1956 年初苏联外交部远东司的各种各样的文件中判断，毋庸置疑，齐米亚宁十分清楚中国对苏联在 1955 年中东危机头十天的做法非常失望。这一事件标志着中苏在第三世界政策方面的首次分歧，尽管是短暂的。^③ 非常奇怪的是，齐米亚宁的报告中没有提到这次危机，也没有提到中苏两国在此事件上的政策分歧。

——1955 年台湾海峡危机的教训。在 1955 年 7 月间赫鲁晓夫访华后不久，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从 1955 年 7 月 10 日开始召开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两个月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关于在 8 月底解放被台湾国民党当局占领的沿海几个小岛的作战方案。这一战役的目的旨在削弱和动摇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基础，使其“反攻大陆”的行动变得苍白无力。^④ 赫鲁晓夫访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2 卷 1 部分 256-257 页。

② 《真理报》1955 年 8 月 10 日第 1-2 版。这一点在 1955 年 8 月 10 日对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前苏联驻华大使，1955 年赫氏访华时的外交政策顾问）的采访中也得到了证实。

③ 《北京与莫斯科》168-170 页，斯图加特，1970 年。克劳斯·梅纳特认为中苏在中东危机期间的分歧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他的分析仅适用于 7 月 10 日以后的那段时间（也就是中东危机爆发 5 天后）。他没有就危机开始的阶段作出分析，而实际上，正像文中所显示的那样，苏联和中国领导人真正发生分歧主要是在事件的起始阶段，即如何作出反应。

④ 艾伦·怀廷：《1955 年的金门危机：毛的估计错误》，《中国季刊》第 1 期（1955 年 7 月）104-105 页。关于这一行动的真实目的并不像后来毛在 1955 年 8 月秘密讲话中所说的那样（毛的说法只不过是避免承认失败）。

华时并不知道这个方案,但他被笼统地告知,中国正计划“解放台湾”的行动。^①苏联领导人欢迎这个行动并给予中国以政治和军事的支援。在愿月的头几周,苏联向中国运送了远程大炮、水陆两栖作战设备、空对空导弹和战斗机,中国希望运用这些武器给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以决定性的打击。^②苏联还向中国派遣了军事顾问,并随时准备在需要时加入战斗。

尽管中苏领导人断定(至少是希望)这一行动不会导致美国方面直接的军事回应,但他们从一开始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当中国在愿月 圆猿日 开始“炮击金门”并武装封锁了金门和马祖以断绝其补给后,美国立即作出了反应,派一支海军分队到台湾海峡。同时,美国高层领导人,包括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都公开重申保护台湾免受中共的侵犯。^③ 怨月 源日,美国宣布武装护卫台湾运输船执行向金门岛的补给,美国的海军直升机也待命准备支持台湾空军建立对台湾海峡的制空权。在以后的一系列空战中,台湾飞行员驾驶的美制飞机与中国飞行员驾驶的苏制米格式飞机进行了面对面的较量,使人们对中国飞行员的素质和米格式飞机的质量产生了怀疑。^④“炮击金门”行动失败的耻辱使毛泽东和几位高级军事指挥官在此后的一连串国内争论中陷于被动的地位。^⑤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缘卷 鄢部分, 苑圆- 苑猿页。在 员圆缘年 员月 远日对苏联前驻华大使、赫氏 员圆缘年 访华时的外交政策顾问特罗扬诺夫斯基的采访也证实了这一点。

② 同上, 苑猿页。

③ 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维护和平, 员圆缘- 员圆远年》, 圆猿- 圆源页, 纽约, 员圆缘年。

④ 理查德·比斯卡尔:《共产主义中国的空中力量》, 缘- 缘页, 纽约, 员圆愿年。

⑤ 毛泽东在 员圆缘年 员月 怨日成都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麦克法夸尔等翻译编辑:《毛主席的秘密讲话》, 源圆- 源员页。

美国意想不到的反应使中国和苏联领导人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① 怨月缘日,毛在出席中国最高国务会议时私下表示,他“简直难以想像,中国对金门和马祖进行几次炮轰,世界将变得如何动荡不安”^②。面对美国军事报告的威胁,毛泽东放弃了在当时占领那几个沿岸小岛及进攻台湾的计划。^③ 尽管中国在怨月和愿月初炮击了向金门运送补给的有美国护卫的运输船,但这都是为了配合外交解决危机的辅助手段。令人瞩目的是,怨月远日,周恩来提出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的主张,而到愿月远日,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临时停火方案,从而使危机结束。虽然后来对金门的炮击也冒着战火扩大的风险,但中国领导人一直把风险控制避免美国直接军事干预的程度。毛泽东的后退使他的一些同事感到失望,因为以前他曾说过美国仅仅是“纸老虎”而已。在愿月底的一次中国官员会议上(也就是在金门危机平息后几周),毛认为有必要对“党内外那些没有理解纸老虎问题的人”进行批判。^④

而苏联领导人一直到怨月末,仍然相信中国对蒋介石政权的打击一直在正确的轨道上。当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危机发生后不久秘密访问

① 有关中苏在危机中动因的有力的评论见莫顿·霍尔柏林和邹说的《~~怨缘年~~的金门危机》,收于霍尔柏林主编的《中苏关系和裁军》(剑桥,怨缘年),愿缘-猿猿页。他们的结论与西方分析家的一般观点不同,一般认为造成这一进退两难境地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富于侵略性和苏联的胆小怕事。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观点见约翰·托马斯的《有限的联盟：~~怨缘年~~的金门危机》,载《轨迹》杂志第远卷第员期(怨缘年春季)猿愿-源页。约翰·加迪斯提到当时美国官员“把炮击金门视为中苏的一项联合侦察行动,旨在试探西方处理危机的能力”。见《不共戴天的仇敌：美国和国际共产主义,怨缘-怨缘》,《长期的和平：对冷战历史的研究》(纽约,怨缘),愿远-愿页。加迪斯似乎认为这一观点不太准确,但实际上这些证据足以证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说法。

② 见《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怨缘),愿页,毛的“进行几次炮轰”的说法是笼统的,事实正如他后来在愿缘年源月的一次秘密讲话中提到的仅在愿月愿日就向金门发射了愿园园枚炮弹。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炮轰第一天的发射量接近源园园枚。而不管哪种统计更精确,都表明对金门的炮轰绝不仅仅是“几次”。

③ 正如怀廷所指出的(见《~~怨缘年~~的金门危机》愿远-愿页),没有证据表明毛有意攻击台湾,事实上,他只想动摇国民党政权。

④ 《毛泽东思想万岁》,愿页,同时见怀廷：《~~怨缘年~~的金门危机》愿远-愿页。

北京时,毛仍表达了“以牙还牙”的决心。^①在听取葛罗米柯的汇报后,赫鲁晓夫决定兑现他对中国给予支援的承诺。当 10 月 20 日,美国开始护卫对金门的补给后,苏联立即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警告说对大陆的任何攻击,都将被视为对苏联的攻击。两周后,苏联又发表了一份声明,称对中国的核打击,都将招致苏联对美国的核打击。大多数西方分析家认为苏联的这两份声明都是做样子的,尽管赫鲁晓夫在口头上表现得很强硬,但实际上他并不认为存在着战争的危险。在其发表首次警告后的一星期后,赫鲁晓夫秘密召见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告诉刘,他对中国对台湾发动决定性的打击仍然抱以期望。^②特别是在美国飞机对中国大陆的偷袭失败后,赫氏更有理由相信(至少是希望)美国没有能力履行其保护台湾的承诺。而后来,当毛决定从危机中后撤后,赫氏在 10 月末和 11 月初终于感到自己被愚弄了。^③

从某种程度上说,金门危机是以中苏之间的分歧而结束的。大多数西方分析家曾认为中国在“金门危机”后期之所以从原有立场上后撤,主要是由于苏联没有满足其对台湾的“侦察支援”^④。但新的材料说明情况截然相反,在金门危机中,苏联作了它所承诺的一切,事实上是中国想洗手不干,而不是苏联。^⑤这也就是为什么此后赫鲁晓夫总是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因为他不想再上中国领导人的“第二次当”了。如何对待金门危机的教训也成为 1958 年秋季赫氏访华时中苏分歧的一个核心的方面。^⑥齐米亚宁对苏联在金门危机时期的政策所作的简短讨论没有提到苏联领导人在这一过程中所感到的尴尬和日后对赫氏对台湾政策的影响。

① 葛罗米柯:《永志不忘》第 10 卷,154-155 页。

② 这一点请见约翰·刘易斯和薛理泰的《中国的海洋战略:核时代军事现代化的政治》,15 页,斯坦福,1982 年。

③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3 卷,第 1 部分,154-155 页。

④ 这也是 1958 年中苏论战时中方提出的一个主题,但 1958 年以后可靠的文献证明了中国在论战中对苏联提出的指责缺乏说服力。

⑤ 有一种不同的解释,见怀廷的《中苏分裂》,152-153 页。

⑥ 见上注和赫鲁晓夫 1958 年 11 月 20 日在北京的谈话记录(绝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154-155 页。

人“上过当”，苏联领导人不希望被拖入一场违背其意志的大规模冲突中。^① 像齐米亚宁这样的苏联官员是完全清楚这一分歧的，但奇怪的是他的报告中对此没有直接的反映。

此外，齐米亚宁的报告也没有对苏中在东西方裁军问题上的分歧给予反映。缘年代末期美苏就全面禁止核试验问题进行谈判，中国对此谈判疑虑重重。中国领导人担心中国将受到这项协定的牵制（尽管他们没有参加这项谈判），而且将极大地限制中国成为核大国。^② 缘年春美苏开始禁止核试验，加上缘年员月缘日苏联给中国的密信（在这封信中，禁止核试验成为苏联不向中国提供模拟核弹头的的原因之一），加强了中国对裁军谈判影响其核计划的恐惧。^③ 齐米亚宁当然也清楚这一分歧，但他还是没有提及。

——中国与印度的矛盾激化。中印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若干年中一直很好，但自缘年代末期由于西藏问题和中印在喜马拉雅地

①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缘卷第部分，苑-苑页。此外还见于葛罗米柯：《永志不忘》第圆卷，员-员页。

② 关于此点，见《中国制造导弹》，源-源页；沃尔特·克莱门斯：《核试验和中苏关系》，收于霍尔柏林编辑的《中苏关系和裁军》，员-员页。此外，还见于中国官方缘年发表的声明：《中国政府关于全面、彻底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声明》，载《北京周报》第远卷第猿期（缘年愿月缘日）苑-愿页；中国政府发言人的声明：对苏联政府愿月猿日声明的评论》，载《北京周报》第远卷第猿期（缘年愿月缘日）苑-苑页，特别是第愿-愿页以及《中国政府发言人的声明：对苏联政府愿月缘日声明的评论》，载《北京周报》第远卷第猿期（缘年愿月缘日）苑-苑页。上述这些文章都收录于缘年年底由北京外文出版社编辑的小册子《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全面、彻底禁止和销毁核武器！》。

③ 缘年员月缘日全国人大通过决议表示，只有在中国参加裁军谈判并有发言权的前提下，中国才会接受任何裁军协定。

区的边界问题而急剧恶化起来。^① 1959年春中国平息了西藏叛乱并在中印边界地区增加了兵力部署,此举被印方视为威胁。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中印边界争端升温,最终导致1960年10月发生严重的军事冲突,中国军队袭击并重占了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尽管双方对此事相互攻讦,但导致这场冲突的原因部分是由于中国领导人希望在赫鲁晓夫访华前对印采取强硬立场。

当中印矛盾激化后,中国官员曾暗地里敦促“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尽最大可能地发起反对印度的宣传攻势”,揭露帝国主义支持西藏动乱的图谋。^②但这些呼吁没有得到回应。相反,苏联采取了谨慎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并在10月10日发表声明希望中印两国能本着“其传统友谊”的基础和平解决争端。^③在塔斯社发表这份声明前曾征求中方的意见,中国官员尽最大努力劝阻苏联不要发表这份声明,这不仅毫无成效,相反,中国的最后抗辩使苏联提前一天发表了这份声明。^④毛泽东和他的同事对此深深失望,认为在一个共产党国家与非共产党国家的争端中,苏联没有站在共产党国家一边。于是他们在10月15日向莫斯科发出了一份严厉的抗议指出,“塔斯社的声明向全世界公开了中苏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的分歧,使亲者痛,仇者快”^⑤。而在此后两天苏联和印度签署一项协定,苏

① 关于这一问题的背景和不同的看法请见斯蒂芬·霍夫曼:《印度和中国危机》,1959年,第1-10页;柏克利,1959年;威廉·波赫哈默尔:《西藏边界争论》(法兰克福,1959年);阿拉斯泰尔·拉姆:《中印在拉达克的边界问题》(哥伦比亚,1959年);塞克伦:《印度的对外政策和与中国边界争端》修订本(海牙,1959年);内维尔·马克斯维尔:《印度对华战争》(纽约,1959年);源,1959年;艾伦·怀廷的《中国的心腹之患: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安拉伯,1959年),第1-10页;理查德·詹姆斯主编:《中国—南亚战略》,1959年;《圆卷本》(新泽西,1959年),第1卷:印度,1959年;《中国的边界条约和边界纠纷》,特别是第1卷,1959年;玛格丽特·菲谢尔、利奥·罗斯和罗伯特·胡腾柏克:《喜马拉雅战争背景:中印在拉达克的争夺》(纽约,1959年);阿贝卡 and 戴维卡编辑:《中国与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关系文件》(1959年)(纽约,1959年),第1卷,1959年,特别是第1卷,1959年;亚瑟夫·韦茨柏格的《外交决策的错误认识:1959年的中印冲突》(傅尔德,1959年)。

② 现代文献保管中心,云藏韵卷宗,1959年,第1卷,第10页。

③ 塔斯社声明,《真理报》,1959年10月10日第1版。

④ 麦克法夸尔:《跃进》,1959年,第100页。

⑤ 舒拜里和月拉索夫:《中苏关系,1959年:中国特写》,1959年,第100页,莫斯科,1959年。

联在今后 缘年内向印度提供 猿猿.5 亿美元的贷款，此举更使北京大为恼火。

在齐米亚宁起草其报告时，中印边界争端仍然十分尖锐，也许让他就此事作出判断为时尚早^①，但奇怪的是他居然对此事一点儿都没有提及，而这一事件对赫鲁晓夫访华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不利的影响^②。

齐米亚宁的报告与苏联决策

齐米亚宁给赫鲁晓夫的报告是苏联对华关系发生微小但复杂变化的指示器之一。在整个 缘年代，苏联处理对华关系及对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关系主要是依靠党的系统。^③但在对华关系决策方面，外交部也并非被排斥在外。在一些问题上，如恢复中共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外交部就是惟一起重要作用的部门。同样，苏联外交部长当时也扮演着一个关键的角色，在 员缘年夏天，葛罗米柯进入中央主席团，主持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同毛探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国际形势和美帝国主义的政策”^④。尽

① 在赫鲁晓夫访华两个半星期后，员月未发生了严重的事件，怨名印度警察在与中国军队在拉达克（在克什米尔东北，邻西藏边界）的空喀山口遭遇时被杀，另有 员人被抓。苏联政府对此事件仍严格保持中立，使中国方面更加不满。

② 对赫鲁晓夫访问的影响见其《回忆录》第 缘卷 郎部分，苑愿- 愿页。至于中国官方的观点，见《苏联领导人与印度勾结反华真相》（北京，员猿年）。

③ 现代文献保管中心，云缘韵卷宗 愿，序” 苑页。

④ 葛罗米柯：《永志不忘》第 圆卷，员愿- 员猿页。根据葛罗米柯的说法，会谈主要集中于台湾海峡形势的最新发展，而且没有什么成果。他对毛泽东提出的一旦美国军队入侵中国，苏联应对其实实施核打击的建议感到“惊讶”。葛罗米柯对这一事件的回忆在 员缘年问世后引起了争议。以西方著名的中国政治和军事问题专家约翰·刘易斯为代表不同意葛罗米柯的说法（见《中国的海权战略》，员远页），但他未能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予以反驳。中国在金门危机中的谨慎态度（如上所述）也使人们对葛罗米柯的陈述产生怀疑，总之，要么是毛说过类似的话，要么是葛罗米柯的笔误。毛在 员缘年 怨月 缘日一次中国最高国务会议的秘密会议上曾说中国准备打一场“氢弹战”，“如果需要打，我们就打，即使是死了一半人，也没什么可怕的”（见《毛泽东思想万岁》，圆页）。如果按照毛的上述讲话，毛有可能对葛罗米柯说出同样的话。持这种观点的人是苏联前驻华大使、员缘年曾以顾问身份随赫鲁晓夫访华的特罗扬诺夫斯基。他在 员缘年 员月 远日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大学接受采访时曾说：“我记得在金门危机发生后我听说过毛这样说，事实是 员缘年 员月在莫斯科会议上毛就这样说过，当时我们都感到震惊。”

管如此,大部分时期,外交部的作用还是有限的。除了一般的外交辅助工作外,在赫鲁晓夫以前对中国的两次访问中(1953年10月和1954年7-8月)及其对其他共产党国家的访问中,外交部的作用都十分有限。其访问的大部分准备工作都是由苏共中央的有关部门和赫氏本人的助手完成的。

而1954年赫氏对中国的访问,外交部却扮演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角色。在这次访问中,外交部在准备工作中举足轻重,这部分要归功于葛罗米柯在对华问题上取得了更大的发言权的缘故。当葛罗米柯让齐米亚宁为赫鲁晓夫准备有关中国问题的报告时,这位外交部长已知道他 will 陪同赫氏对美国进行两周的访问,这一使命将增加外交部及其本人在其他问题上的分量和影响力,特别是在中苏关系方面。由于8月末赫氏对美和对华访问的间隔时间非常短,对中国有关情况的简要报告不得不安排在飞机上进行。葛罗米柯清楚当时有一个由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定于8月15日至20日访华,而这时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还在美国。因此,这位外交部长认为他将作为陪同赫氏8月15日至20日访华的惟一高级官员。^①(当然,葛罗米柯将会充分利用这个绝好的接近赫鲁晓夫的机会。)^②

在这种情况下,由齐米亚宁起草的关于中国的报告,就成了赫氏访华时的主要参考资料,它同不久前中国军队的人事变动报告(也是由齐米亚

① 《真理报》1954年10月15日第1页。

②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3卷 第二部分 78-79页，赫氏写道，他“非常尊敬在当时和以后担任外长工作的葛罗米柯”（第78页）。

宁起草的)一起提交给赫氏。^① 齐米亚宁和外交部的其他一些官员作为顾问也被安排同赫氏一起访华,而在赫氏前两次访华时,没有作过这样的安排。^② 尽管苏共中央处理共产党国家间关系的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和其他一些部门的首脑也随团访华,但外交部在这次访问中的作用却前所未有地突出出来(对于葛罗米柯本人来说也是这样,他是除苏斯洛夫外,惟一个参加过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和周恩来所有会谈的苏联官员)。^③ 因此,齐米亚宁的报告被认为是很有影响的。

不过,尽管如此,外交部作用的突出并没有改变中苏关系的进程。

① 这份人事变动报告是指 1956年 12月 15日中国宣布由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此外还包括公安部长罗瑞卿接替黄克诚任总参谋长,以及免去国防部副部长肖克、李达和一些低级将官的职务,他们和外交部的两位副部长都被认为与彭德怀 1956年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集团”有牵连。这些指控是在 12月中旬的庐山会议上作出的,起源是彭德怀在 12月中旬致毛泽东的“万言书”,严厉批评毛的经济路线“混乱”、“有缺点”、“浮夸”和“浪费”。这封信在 12月下旬的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公开,毛认为这是对其权威的一个极大威胁,并给予激烈的反击,让政治局委员们划清界限,要么站在他一边,要么站在彭一边,尽管许多高级领导人同情彭,但他们不愿站在反对毛的立场上,在 12月末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随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彭的命运就被决定了。有关彭德怀事件的分析请见朱尔金·多梅斯:《彭德怀:其人其事》(斯坦福,1958年) 27- 35页;麦克法夸尔:《飞跃》,1958- 1960年;什科托夫斯基:《彭德怀:大事回顾》,《中国季刊》第 1卷(1956年 1- 2月),1956- 1957年;弗雷德晨克·戴维斯:《中国的政治和肃反:党的原则的修正和蜕化》(纽约,1958)第 2章。另一颇有价值的文献是彭德怀关于此事件的“回忆录”,他是彭德怀在“文革”期间受审时以自传形式书写的,在他死后结集出版。其英文本题为:《中国元帅的回忆录:彭德怀自传》(1958- 1959)(北京,1959)。这本书包括了有关庐山会议的所有章节(1958- 1959年),并有一个彭在 1956年 12月致毛的信件的附录。至于其他佐证材料见《彭德怀事件》(1958- 1959)(九龙,1958)。与西方一些猜疑相反的是,没有理由认为彭在军事问题上对毛发起了挑战,也没有与苏联勾勾搭搭。彭毫无疑问地对中苏摩擦感到不安,因为他知道中国对苏联军事科技有所依赖,但他从没有把此问题引入他与毛的争论。此外也没有证据表明彭德怀“里通外国(苏联)”,达米德·查尔斯曾在《彭德怀元帅的解职》一文中断定彭德怀致毛泽东的信都是由莫斯科准备的,并且说“赫鲁晓夫不肯就以这种方式干预中国内政向中国表示道歉,从而使中苏争执突然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但这些断言最多不过是猜疑而已,这篇文章收于《中国季刊》第 1卷(1956年 1- 2月) 28- 35页。

② 关于外交部远东司高级官员陪同访华一事,见《真理报》1956年 12月 15日第 1版,《真理报》(莫斯科)1956年 12月 15日第 1版。陪同访问的共有 10- 15人,包括外交部长、所有副部长和其他官员,其中就有齐米亚宁。

③ 《真理报》1956年 12月 15日第 1版。

1959年9-10月间的这次访问仍留下了许多关键的问题没有解决,而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交锋更为尖锐。在赫氏访华归国后不久,苏联开始悄悄地从中国撤出其主要的军事技术人员。^①在以后几个月中,紧张程度迅速增加了,到1960年中国领导人在纪念列宁诞辰40周年大会上发表长篇报告时达到了顶点。^②这份报告题为《列宁主义万岁》,使苏联官员和外交官彻底认识了两个国家存在的裂痕到底有多大。^③不久,1960年2月初,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工联理事会会议上,中国官员对苏联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这使所有东欧国家都感觉到了中苏之间的冲突。几星期后,争执进一步升级,赫鲁晓夫曾向中共发出几封密信,但遭中共拒绝,中共要求苏联重新派持有更富有建设性的信件的代表团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试图对中国的批评和要求进行反击,当时在场的中共高级官员彭真只作出了温和的反应。^④

在积怨继续增加的过程中,苏联在1960年7-8月,从中国撤走了全部军事技术人员和顾问,与此同时,也开始召回上千名非军事人员,并取消在中国的许多大型经济和技术项目及科研计划。^⑤尽管1960年在莫斯科有100个共产党参加的“国际会议”上,中苏官员曾试图缓和矛盾,但不久争论和矛盾又重新开始,并变得愈加尖锐。此后,当中苏交恶的消息传遍全世界时,赫氏和毛泽东曾努力尝试协调矛盾,但裂痕继续扩大。重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希望已化为泡影。

① 《聂荣臻回忆录》英文本,340-341页,北京,1988。聂长期负责中国战略武器计划,他的回忆录中文本首次发表于1988年。

② 《列宁主义万岁!》首次发表于《红旗》第8期(1960年2月21日),后经翻译发表于《北京周报》第3卷第8期(1960年2月),3-4页。这篇文章及其他几篇文章都经翻译后收于由赫德森、洛温塔尔和麦克法夸尔编辑的《中苏争论》一书,还被收在约翰·吉廷斯编著的《中苏争论调查,1958-1960年》(纽约,1962),102-103页。这本书还以1960年代初的一些大事为主线,收录了1958-1960年间的部分重要声明。

③ 如见《红星报》1960年2月21日,2页。

④ 有关布加勒斯特会议的生动记述,包括那些在官方文本中被省略的部分请见爱德华·克兰克肖:《新冷战:莫斯科对北京》(巴尔的摩,1960),102-103页。

⑤ 米哈伊尔·克洛奇科:《苏联科学家在红色中国》,3-4页,蒙特利尔,1960。原作者为事件亲历者,此外还见《红星报》1960年2月21日,2页。

赫鲁晓夫 1959 年访华后中苏关系的迅速恶化使苏联对华关系决策也趋强硬起来。苏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方面的高级官员，特别是列昂尼德·伊利切夫和米哈伊尔·苏斯洛夫，掌握了对华关系的决策权。在 1950 年代末（包括 1950 年代初），苏斯洛夫曾是苏联对华亲善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但当中苏关系迅速恶化后，他投入了反华阵线。而苏共中央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奥列格·莱克曼宁在对华关系上的发言权也有所增加。^① 他对中国问题的熟悉及其对毛泽东思想的强烈反对大大地影响了苏共领导人对华关系的决策，导致苏联对华强硬的政策。

当中苏关系恶化时，外交部的作用也开始消减。尽管苏联的驻华外交官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联络和搜集情报的角色，但在 1950 年代外交部远东局的作用已大为失色。1956 年 1 月，齐米亚宁离开了这一部门，而被任命为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大使。此后，在勃烈日涅夫时期，齐米亚宁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并在苏共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1956-1957 年任《真理报》总编，1957 年起任苏共中央委员，并从 1957 年起任苏共中央书记。

像齐米亚宁一样，其继任者 阿图加里科夫，在担任远东司司长前，也在外交部综合司任职，但图加里科夫到 1957 年 1 月卸任时一直默默无闻。接替他任远东司司长的苏达里科夫则不是从综合司来的，这说明这一部门影响力的减弱（苏达里科夫在远东司呆了 1 个月，在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后一个月即 1957 年 1 月，他被调到综合司）。总之，在 1950 年代中后期，外交部在对华关系决策中的作用与 1952 年 12 月时相比要小得多。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1950 年代中期，此后远东司一分为二，一司负责中国、朝鲜、蒙古，二司负责印尼、日本和菲律宾。^② 一司由中国问题专家米哈伊尔·凯比萨负责^③，他在这一岗位呆了 1 年，1956 年被任命为外交部

① 莱克曼宁当时观点的一个最好佐证是其以笔名 阿图加里索夫写作的《1950 年代中关系史》（莫斯科，1955）。尽管这本书写作时间有点晚，但他的观点在以后几年中一直具有连续性。莱克曼宁还写过几本关于中国问题的有价值的书（包括使用上述笔名写的书），见 阿图加里索夫和 阿图加里索夫所著《苏中关系，1955-1956 中国特写》（莫斯科，1956）

② 所有其他东南亚国家都在外交部东南亚司的管辖范围内。

③ 有关凯比萨及其与莱克曼宁交往的背景材料见吉尔伯特·罗兹曼：《社会主义的错误：苏联对中国的批评》（1956-1957 页，普林斯顿，1958）

副部长。尽管建立了新的独立的部门,但一司在决策中地位仍一般,因为它的许多业务领域与党的有关部门是相重叠的。直到 1950年代,当中苏开始改善关系后,外交部才重新取得对华关系决策的主导地位。这种地位的改善最早是从 1950年开始的,到 1952年,也就是谢瓦尔德纳泽任外长时得以增强。而到 1953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访华,外交部已占据了对华关系决策的主导地位。

在葛罗米柯任外长期间(1953-1955),外交部在对华关系问题上作用一直不十分突出,但在中苏分裂前夕的 1955年其远东司的影响曾有短暂的扩张。齐米亚宁的报告象征着戈尔巴乔夫时代以前,苏联外交部在对华关系方面所发挥作用的巅峰。

附:齐米亚宁报告《苏中关系》(节录)

人民革命在中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以一致利益和在各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目标为基础的苏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

当我们讨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初三年间苏中关系发展中的总体成就的时候,也不应当忽略双方关系中的一些消极因素,这些因素不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利和最高利益。这些消极因素反映在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签署的一些双边协议中,例如关于禁止外国人进入满洲和新疆地区的协议(1950年 04月 05日),建立苏中联合股份公司以及为国家银行规定卢布和人民币元汇率的协议(1950年 07月 05日),以

及其他这类文件。^①

自 1955 年起，苏方采取措施，全面摒除了那些旨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苏联关系中处于一种从属地位，因而阻碍了以完全平等、互助和信任为基础的苏中关系的成功发展的各种做法。自那时以来，对上述协议中那些不符合兄弟般友谊精神的内容进行了修订，或是予以废除。1955 年 6 月，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对于在两国之间建立更加紧密、更加信任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那次访问的结果，双方签订了有关苏中关系、国际形势以及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公报。^②此外，双方还签订了关于苏方将苏中联合股份公司中用于科技合作项目的基金转让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关于建设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的协议、关于建设天津—乌兰巴托铁路的协议，等等。^③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被认为对于进一步改善苏中关系起到了巨大作用。这次会议创造了一种气氛，有益于更经常更友好地相互坦率交换观点。中国朋友开始更公开地谈论他们的计划和困难，同时还站在一种友好的立场上，表达了对苏联机构、苏联专家的工作以及其他有关苏中关系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共中央全力支持苏共清除个人崇拜及其影响的做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尽管没有直接说明，但在对于斯大林活动进

① 不允许外国人进入满洲和新疆地区的禁令并没有在 1954 年 6 月公布，事实上直到齐米亚宁起草他的报告时都没有公开发表。人们最初得知这一协议的存在是在 1955 年，当时出版的一本题为《毛泽东思想万岁》的选集中发表了毛于 1955 年 6 月的一次秘密讲话（1955 ~ 1956 页）。这一讲话的英译本发表在《问题与研究》（台北）第 10 卷第 4 期（1956 年 6 月），125 ~ 128 页。毛强调这些涉及满洲和新疆地区的禁令带有“殖民地”的意味。齐米亚宁报告中提到的其他文件见 1955 年库尔久科夫、戈罗尼基福洛夫、奥列佩列韦尔泰洛编：《1954-1955 年苏中关系文件汇编》，1954-1955 年，莫斯科，1955 年。有关这些文件的进一步评价，见《中国的边境条约和领土争端》，125-128 页，对于联合股份公司的不平等性质当时的详细评估，见苏联驻北京大使馆苏共支部书记 曼加瓦齐诺夫 1955 年 6 月 15 日的绝密备忘录，现代文献保管中心，云源韵卷宗，125 页。

② 《1954-1955 年苏中关系文件汇编》，1954-1955 年，125-128 页。

③ 《1954-1955 年苏中关系文件汇编》，1954-1955 年，125-128 页。

行评价的时候,却是同我们的立场并不一致的。^①稍后,中国同志们再次检讨了他们对于斯大林功过的评价,这反映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发表的讲话中。^②例如,他说过:“……总而言之,对于斯大林的评价,我们现在的观点是同苏联共产党一致的。”在几次讨论中,毛泽东对于斯大林的错误给予了批判性分析。

苏共二十大以后不久,中国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和被称为“百花齐放”的运动。^③与此相关,中国的出版物开始越来越经常地对苏联哲学家、自然历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的著作以及有关学术观点进行批评。这无疑

^① 齐米亚宁的这一结论有一点小小的错误。早在 1956 年 1 月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几周之后),毛在同苏联官员的私下讨论中就开始谴责“斯大林所犯的巨大严重错误”,包括他在对华事务中所持的错误和病态的态度。见 1956 年 1 月 20 日尤金第 10 号报告《1956 年 1 月 20 日毛泽东会谈记录》,现代文献保管中心,云韵卷宗 10,阅读页 23-25。只是在 1956 年 10 月至 11 月的东欧动乱发生之后,中国领导人才对非斯大林化运动表示出强烈的保留态度。但齐米亚宁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即毛从一开始就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感到不快。鉴于前面讨论过的原因,毛对于诋毁斯大林的厌恶大概并非出于他个人对于这位已故苏维埃独裁者的脉脉温情。毛不满于非斯大林化运动的最可能的原因大约三个方面:(1)他对于赫鲁晓夫在作秘密报告之前没有同他接触表示愤怒;(2)他担心对于“个人崇拜”的冲击会影响到他自己在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英明领袖形象;(3)他相信斯大林主义的主要内容,特别是 1930 年代进行的大规模工业化运动,对于中国仍然是基本适用的。此后,当中苏公然分裂时,中国重新燃起支持斯大林的热情,无疑是为了反击赫鲁晓夫。关于 1956 年中国保卫斯大林的一篇长文,见《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评论员,1956 年 10 月 1 日,《北京周报》卷四,第 10 期(1956 年 10 月 1 日)愿 1 页。

^② 指毛 1956 年 10 月的旅行,他自 1956 年初以来第一次访问莫斯科(也是他第一次出国旅行)。

^③ 1956 年 1 月,中国当局推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1956 年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开表示欢迎各界批评之后,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趁机表达了对于共产主义政权的批评意见,这些意见相当尖锐,远远超出了毛所预期的范围。经过六个星期的骚动之后,当局又在新的“铲除毒草”的口号下发动了一场反击运动。千百名“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遭到逮捕,另外 100 多万人被判处强制劳动或是其他惩罚。关于这一幕历史的有价值概述,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编《百花齐放运动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纽约,1956),其中包括极其丰富的文献以及一篇长篇论述。关于中国的百花齐放运动和苏联后斯大林时期的“解冻”的不同宗旨的分析,见 1956 年 1 月 20 日:自然“解冻”期的人造花朵》载于多那尔德·特里高尔德编:《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异同》(西雅图,1956) 100-101 页。通过毛在 1956 年 10 月中旬至 10 月下旬的 10 个秘密讲话,可以窥见他本人发动“百花齐放”运动的目的,见麦克法夸尔等编:《毛主席的秘密讲话》,1956, 100 页。

给那些反对苏联和苏中友谊的右派分子的反苏态度提供了推动力。右派分子指责苏联没有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并断言，苏联的援助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是低水平的。他们还宣称，苏联没有偿还从满洲掠走的设备的费用，还坚持说，苏联正在为朝鲜战争中援助的武器向中国榨取钱财，而中国志愿军在那场战争中已经付出了大量鲜血。^①除此之外，他们还对苏联提出了大量的领土要求。很难确认在反右斗争中公开发表这一类言论的目的，即使是考虑到我们的朋友们的战术意图也仍然不易理解，他们当时正在准备揭穿右派分子的假面具，以便对其所有观点发动一场决定性的反击。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过右派分子的叫嚣，中国朋友却从来没有在正式出版物中公开提出过所谓“对苏联的领土要求”。

苏联政府 1954年 5月 14日的声明在中国受到极大欢迎。^② 1954年 5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苏联，签署了一项苏中联合声明。^③ 声明着重指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团结一致是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大团结的重要因素，声明还驳斥了关于“苏共与中共为争夺国际共产主义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的毫无根据的流言。根据这一声明，苏联承诺采取具体措施，以利于进一步发展苏中两国建立在平等、互利和完全

① 这些特别的抱怨是由中国的一位高级军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龙云将军，在 1954年 2月 15日的《新华日报》上表达的，其时正值“百花齐放”运动的尾声。他宣称，“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担负朝鲜战争的全部经费是非常不公平的”，请注意，中国确实被强迫支付它从苏联得到的全部军事物资的货款。龙云用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更为合适”的举动同莫斯科相对比，当时美国把盟国的债务一笔勾销。他还强调中国欠苏联的债务可以由苏联在 1945-1949年间从满洲地区运走的大批工业设备来充抵。龙云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中国政府继续偿还这个总价值接近 10亿美元 的债务。直到 1954年，这笔债仍然没有完全还清。在“百花齐放”运动之后的反右斗争中，龙云因直言受到惩罚，但在 1954年 5月又恢复了他在国防委员会中的地位。

② 《真理报》1954年 5月 14日。关于苏共中央常委决定发表声明的情况，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云鹤韵卷宗 289，来源：俄罗斯档案馆，1994。齐米亚宁关于中国政策的表述是准确的。中国当局立即为苏联的声明欢呼，而且在以后经常引用其中的内容。例如，中国总理周恩来在 1954年 5月访问莫斯科、华沙和布达佩斯期间，反复赞扬 5月 14日声明证明了莫斯科“决心消除它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的不正常形象”。

③ 《1954-1955年苏中关系文件汇编》1954-1955页。齐米亚宁对于联合声明的性质描述（见下句）是准确的。

信任基础上的友好与合作关系。

在 1957 年，苏共中央与中共中央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磋商，探讨了有关世界局势及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状况和具体问题。中国朋友积极参加了 1957 年 11 月召开的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的筹备活动。^① 当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时候，毛泽东满意地谈到这些磋商的成功经验，并表示中国同志已经作好充分准备，再度就有关事务进行共同讨论。^②

苏联重新组织国民经济管理体系的步骤在中国受到热烈欢迎。中共中央全力支持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和其他各次全会的决定，虽然中国报刊并没有对于这些会议决定作出官方评论或反应。当反党集团的具体活动情况在中共中央公布以后，中国朋友们在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态度更加坚定。毛在莫斯科宣称：“如果莫洛托夫的路线在苏共内部获胜，那不仅会

① 这是指 1957 年 11 月 15 日在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四十周年之际于莫斯科举行的由两部分组成的大会。全部 15 个执政的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接到了参加 11 月 15 日和第一阶段会议的邀请，但南斯拉夫一开始就拒绝参加任何以后的会议。正如茨冕宁在下面准确地指出的，中国同其他参加者一道起草了一份文件，以重新确定苏联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地位。见《真理报》1957 年 11 月 15 日。南斯拉夫官员拒绝赞同 15 家共产党的文件，但他们同意参与大会的第二个部分，那是紧接着在 11 月 17 日举行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总共 15 个共产党参加了这部分会议，会议最终发布了一个所谓“和平宣言”。

② 《真理报》1957 年 11 月 17 日；又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3 卷 10 部分，101-102 页。

给苏联带来危险，而且也会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带来危险。”^①

鉴于修正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和帝国主义者的宣传攻势，鉴于他们试图利用 1956 年在中国进行的几次思想战线的运动——特别是“百花齐放”运动和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的发表——来煽动分裂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调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紧密团结和苏联共产党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向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发表讲话时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上述内容（1956 年 5 月），并且在同南斯拉夫官员谈话时，以及在中国政府代表团会见波兰代表团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代表团时，作了详细论述。^② 1956 年，中共中央在讨论过苏共中央关于澄清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的模式建议之后，再次肯定必须长期维护这一模式。

苏中之间的持久关系和牢固友谊形成一股新的力量，在中东国际危机时期和 1956 年夏天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挑衅活动中，这一力量都发挥了

^① 这段话是毛在 1956 年 5 月 15 日的远东党会议上发言中说的，也是人们所知他惟一次直接公开表示支持赫鲁晓夫，反对“反党集团”。这次讲话的节选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但所有同赫鲁晓夫以及“莫洛托夫集团”有关的部分都被删去了。其结果是直到 1980 年代中期，西方学者仍然认为毛从未说过反对“反党集团”的话。幸运的是，在 1983 年，毛 1956 年 5 月 15 日讲话的全文被发表，连同他在 1956 年 5 月大会期间另外两次从未发表过的讲话的文本一起刊登在一本题为《毛泽东思想万岁》的选集中（同样的题目曾用于八种先前出版的毛秘密讲话汇编）。这三篇讲话都译成了英语，由米契尔·斯果诺斯介绍、注释，以《毛泽东：在 1956 年莫斯科大会上的讲话》为题发表在《共产主义研究学刊》卷二，第 10 期（1983 年 12 月），第 100—101 页。毛关于“反党集团”的评论如下：“我赞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莫洛托夫问题的处理。那是一场尖锐对立的斗争。事实表明不可能实现团结，两个方面都容不得对方。莫洛托夫集团利用赫鲁晓夫同志出国期间毫无准备，发起进攻。但尽管他们采用了突然袭击，我们的赫鲁晓夫同志却不是傻瓜，他是一个精明的人，立即组织他的力量进行了胜利的反击。这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错误路线，一条是相对正确的路线。在斯大林死后的四五年间，苏联的情况不论在国内政治领域还是在国际政治领域都有了很大的改善。这表明以赫鲁晓夫同志为代表的路线是更正确的，而站在这一路线对立面则是错误的。莫洛托夫同志是一位有着多年斗争历史的老同志，但这一次他犯了错误。苏共党内两条路线的这场斗争是对抗性的矛盾，因为两方面都不能容忍对方，要吃掉对方。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各种问题都处理得好就不会有麻烦，但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出现麻烦的危险。”

^② 《真理报》1956 年 5 月 15 日。

强大作用。在那一年中,苏中关系中最重要一个政治事件是七八月间赫鲁晓夫同志和毛泽东在北京的会见,那次会见对于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①通过交换意见,他们探讨了有关苏中关系,特别是双方军事合作的问题。^②赫鲁晓夫同志在讲话中表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攻就是对苏联自己的进攻,这一讲话在中国受到高度评价和热烈欢迎。^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我们关于将为对中国的核攻击实

① 《苏中关系文件汇编》,源卷,源页。

② 这次会晤中讨论的“军事合作问题”主要有五部分内容。首先,中国为了可能发生的与台湾的冲突而谋求在莫斯科的支持下获得新型武器和扩大军事力量(见上注)。其次,赫鲁晓夫再一次试图说服中国人同意于 1959 年在中国地区建立一个为苏联太平洋潜艇部队服务的长波军事通讯中心。这一设想最初是由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在 1958 年 9 月向中国人提出的,此后的两个月里双方为投资和管理权力问题争论不休。赫鲁晓夫和毛最后商定,通讯站由中国建设和管理,由苏联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为此双方还签订了一个正式协议(1959 年代中期,通讯中心仅建设到一半的时候,苏联撤走了他们的专家,但中国人最终自己完成了这项建设)。第三,中国总理周恩来要求苏联在发展核潜艇方面予以援助,赫鲁晓夫像过去一样,立即将这项建议搁置在一旁。第四,赫鲁晓夫再次提出关于建立联合潜艇舰队的建议,作为前提首先又要订立条约,准许苏联潜艇使用中国港口和中国潜艇使用苏联北极地区的港口。毛直接地拒绝这一想法,正如他在赫鲁晓夫访华十天以前在接见苏联大使巴维尔·尤金时所做的那样。第五,核武器合作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根据 1957 年,苏联当时正在培训中国核武器专家并提供了制造核武器所需要的信息。但不为中国官方所知的是,苏联领导人在 1955 年初就已经决定不向中国提供制造原子弹所用的样本,虽然在 1955 年的协议中有过这方面的规定。毛在同赫鲁晓夫谈话时提及此事,但没有得到许诺。这些信息分别得自: (1) 1955 年 5 月 20 日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大学对于奥列格·特罗亚诺夫斯基的采访; (2) 《中国的战略海军》,源卷,源页; (3)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5 卷 2 部分,源卷,源页。

③ 赫鲁晓夫宣布:“对于我们伟大的朋友、盟友和邻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攻将会被认为是苏联自己的进攻。为了保卫我们两国的安全,我们的国家将同中国人民一道,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履行我们的责任。”这一提法曾在许多苏联高级文献中反复出现,尽管细节略有不同。参见《苏中关系》,源卷,源页。据赫鲁晓夫回忆,苏联的这种态度刚刚发表,毛就立即怀疑苏联对其实行的诚意。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 5 卷 2 部分,源卷,源页。这一断言似乎有问题,但至今还找不到相反的证据。

行报复性核攻击的承诺极感满意。^① 作为回报，中国政府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在苏联受到攻击的时候，在全球的任何地方同它站在一起。

赫鲁晓夫同志的信和苏共中央的一些报告——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防御能力的合作条款，关于减少在华的苏联专家人数和取消苏联顾问团的问题，关于苏共中央对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计划草案的看法，以及其他问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② 值得注意的是，当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以及大会期间其他报告中反映的这一主题公开发表之后，中国朋友们虽然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在总体上给予积极评价，与此同时却几乎没有提到赫鲁晓夫同志报告的理论部分，并且认为那些部分仅仅是基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实践的。^③

以同样的腔调，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1958年9月）制定的文件涉及反

① 不久后在金门危机时期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封信中，最明显地表达出在这方面的意向，他警告说：“那些妄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原子袭击的人们不要忘记，拥有原子弹和氢弹的不仅是美国，而且有另一边的势力，当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子攻击发生时，肇事者会受同样的报复。”见《中苏关系》，1957年。当时中国当局热情地赞扬赫鲁晓夫的声明，形容它是“对我们永恒关系的最高表达方式”。见《真理报》，1958年10月10日。毛自己则说他“深切体验到（苏联）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的无限忠诚”，并想要为赫鲁晓夫在台湾海峡危机中的支持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但在几年之后，中国领导人转变了他们的看法（与争论的时间一致），对于赫鲁晓夫的信誓旦旦表示出不屑的态度，并且争辩说：“苏联领导人只是在确信绝没有爆发核大战可能性并且中国已经不再需要苏联的核武器支援的情况下，才宣布对中国的支持。”见《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答苏联政府1958年10月10日声明》，1958年10月11日，《北京周报》卷第37期（1958年10月10日），10页。新近的材料似乎证明，这些指责有失公道，赫鲁晓夫的诺言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大于中国当局后来宣称的，见《中国的战略海军》，1958年10月，和怀廷：《中苏分裂》，1958年10月。一项较早的研究也接近于同样的结论，见霍尔柏林和邹说：《1958年的金门危机》，1958年10月。

② 《真理报》，1958年10月10日，10月10日。

③ 齐米亚宁关于中国人对于赫鲁晓夫报告（特别是“共产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某些问题”那部分）的反应的表述是正确的。北京半冷不热的最初反应表现在1958年10月10日的主要日报《人民日报》上，更为详尽的评价则刊登在10月10日的理论刊物《红旗》上。

对“迷信外国”和激发人民群众的民族自尊心的问题,同时宣称大跃进的实施取得了初步成就,会议使得中国的许多骨干工人头脑发热。^①他们开始过分地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并且对于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的建议表现出对立态度。^②有些人开始宣称,苏联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停留的时间太长了,而中国则正在飞速地奔向共产主义。中国报刊相当积极地发表对于苏联正在执行的按劳分配、以职务为基础付酬等社会主义原则的批评文章。一些作者还从根本上论证公社与集体农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③

① 齐米亚宁在这里提到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意义重大,会议批准了急剧加速经济发展和理想主义狂热的“总路线”。这一新路线的基本标志在其后的几个月中显示出来,主要有:(1)大跃进,一个主要依靠中国自身资源实现工业化的膨胀规划;(2)在全国各地建立巨大的“人民公社”(“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社会单位”),并倾向于重新安排集约化农业,而且将农业与工业(包括“后院”炼钢炉)结合在一起;(3)事实上废除一切形式的私有财产;(4)进一步的社会阶级划分与对专业技能的系统化歧视;(5)对于早期人口控制的忽视;(6)军队转化成为羽翼丰满的民兵(通过人民公社)以及“全民皆兵”运动的开展要求中国军官每年至少有一个月时间下连当兵。中国领导人想要通过大跃进来实现高速增长的意图,可以从他们所制定的钢铁生产指标中充分显示出来。1958年中国的钢产量为156万吨,而1958年制定的目标则是接近翻一番,达到300万吨,而且后面一年的目标更加雄心勃勃。毫不奇怪,这些目标后来证明根本无法实现,而且为实现这些目标所作的一切努力最后都成为导致衰败的错误。公社(在1958年以后规模变小但数量更多了)同样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造成了1959-1960年初期广泛的食物短缺和大饥馑。中国的军事力量由于军官的士气低落和军事—工业联合体的混乱也受到极大伤害。许多西方学者对于那一时期中国政治与社会进行分析,特别见于麦克法夸尔的《大跃进》。

② 在1958年春天和夏天的反对“迷信外国人”(如齐米亚宁在上面一句中引用的)运动中,中国确实很流行这样的态度。虽然中国的官员和军事将领仍然希望增加苏联的军事—技术援助,但他们却想限制苏联伙伴在政治和教义方面的影响(换句话说,他们想接受苏联的武器和科学技术,但要按照中国自己的教义、战略和政治目标来使用它们)。在毛的指示下,中国官员开始谈论反对“机械模仿外国技术”和“过分依赖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并且警告“完全靠引进其他国家的现存经验是不可能的”。他们强调中国“必须努力自力更生”,而不能“简单地依赖外援”。有关这一点,还可见福特《中苏政治—军事问题的爆发,1958-1960年》,1960-1961页。见《中国的战略海军》,1960-1961页,和麦克法夸尔:《大跃进》,1960-1961页。有一个关于毛在这方面的思考的很好的例子,见他的1958年10月10日在成都会议上的秘密讲话,载于《问题与研究》第1卷第1期(1958年10月),1960-1961页。

③ 有关苏联对于这些思想争论的官方看法,见现代文献保管中心,1960年10月10日,1960-1961页。

此后，经过代表大会以后对于实际情况的研究，经历了在建立农业人民公社和实行大跃进过程中的许多挫折教训，中国共产党开始对于苏共二十一点的观点有了更现实的认识，例如关于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建立物质——技术基础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意义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物质刺激原则的地位和劳动分配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苏共的立场是，提供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准则和规律的一些原则性解释，这些准则在中国的大跃进过程中和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中被忽视了（见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一大上的报告和讲话以及其后的讲话）。苏共的这一立场帮助了中国同志，使他们正确估价形势，改正已经出现的缺点和错误。赫鲁晓夫同志关于苏中友谊持久巩固的声明扫清了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们的宣传，那些宣传极力散布我们两国相互不信任和苏中关系正在恶化。……

一项关于过去十年来苏中关系的分析证明，友好和睦与互利合作的关系已经建立在一个持久的日益广阔、坚实的基础之上。这种关系对于今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实力与凝聚力的增长以及世界和平和国家安全的巩固，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本文系作者提交 1955 年 11 月“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吴鹏、苗棣译，沈志华校。）

对 20 年代中苏论战中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薛 钰

20

年代在中苏两党之间发生的大论战,是本世纪世界政治领域里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使中苏两党从昔日的盟友变成势不两立的对手,对两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20 年后的今天,当世界进入以和平、发展为两大主题的时代时,反思这场论战,其中确有不少值得吸取的教训和需要再思考、再认识的问题。

一、中苏两党矛盾发生发展的根源

以往的论著中,一般都把中苏矛盾发生发展并导致论战的原因归结为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即由于双方对当时国际斗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不同而引发了论战。但经过更广泛更深入的考察,可以看出中苏两党矛盾冲突的真正根源还不仅仅在此。现试分析如下:

国家利益的巨大矛盾

国家利益一般统指主权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总需求,它是国家制订内外政策的基础与归宿。正如直接支配人们行动的取决于其自身的利益而

不是单纯的观念，在一般情况下，国家利益往往也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成为决定不同国家间能否建立持久稳固合作关系的真正基础。而中苏矛盾，也正是由于两国在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和战略构想，从而在国家利益方面发生了直接矛盾而造成的。

二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总变化，苏联在 1945 年代前半期对世界的认识发生了显著改变并相应调整了对外战略的总体构想。苏联认识变化的根据是：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虽仍处于继续对抗态势，但美苏力量对比开始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其表现是：在东欧、亚洲出现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出现新的高涨的大背景下，苏联在建立了东欧五国经互会的基础上，又于 1948 年与东欧七国签订了《华沙条约》，从而不仅在经济，而且在军事上完成了与美欧抗衡的重要步骤；此时苏联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并打破了美国核垄断的一统天下；以朝鲜战争为标志，处于巅峰状态的美国受到沉重打击，它的经济军事实力虽仍很雄厚，但其地位已开始呈现从顶峰下降的趋势。因此，苏共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将有可能通过竞赛战胜资本主义，并由此确定了苏联对美政策的基本目标，这就是减少对抗、寻求妥协、争取国际局势缓和，实行和平共处，为和平竞赛创造最佳国际环境。

但事实上，从世界全局看，此时真正实现和平共处，避免局部战争的条件并不成熟。当时亚非拉的民族解放战争正处于高潮，在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埃及，帝国主义忙于扑灭民族独立之火。在此情况下，为实现和平共处的国际战略构想，让美国让步，苏联在不牺牲自己利益的基本前提下，能打出的一张牌就是利用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把其他兄弟国家纳入它设计的轨道。为此，它大力加强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控制，甚至不惜牺牲其他兄弟国家的民族利益。苏联这一做法直接导致了与中国的巨大矛盾。中国并不反对美苏缓和紧张关系，但国际关系终归是一种利益关系，在认为“苏美合谋主宰世界”，出卖了中国利益的前提下，苏联的主张当然会受到中国的强烈批评。中苏认识产生巨大差距的原因是：

首先，中国此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与苏联相反，处于不利的地位。战后，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获得了有利的势力范围、战后边界和在华特权，

而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利益却受到损害。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上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和禁运；外交上当苏美首脑 1955 年举行日内瓦会晤时，由于美国发起的“不承认”新中国的运动，中国还被排斥在联合国外，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外交关系。特别是在国家安全方面，中国与昔日扶蒋反共的美国更是旧仇未解，又加新怨。朝鲜战场的硝烟刚刚消散，要对台湾承担“义务”的美国又在中国领空、领海频繁进行军事入侵；在炮击金门后，美国又在台湾海峡集结了一支拥有六艘攻击型航空母舰并配备核武器的特混舰队。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以反对美国侵略扩张为主要战略方针的中国当然不会赞同苏联的“苏美合作”方针。

在台湾和中印关系问题上，中国国家利益受到危害体现得更为明显。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中国政府希望和平解放台湾，在台湾问题上，也准备了“两手”，但苏联明确反对中国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1955 年 1 月，苏联在联合国提交的议案上呼吁，“不论何方，都在台湾周围地区避免敌对行动”^①，实际上表明默认了美国“保护”台湾的承诺，让中共容忍祖国分裂现状的存在。而这种状况，恰恰正是美国的“保护”造成的。1955 年，赫鲁晓夫在北京会谈中又埋怨中共炮击金门造成苏美交战的气氛，希望中国作出临时性让步和牺牲，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以免破坏苏联的战略构想。另外，在以 1959 年 7 月西藏叛乱为导火索的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苏联为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特别是对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印度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居然出乎中国意料地采取了所谓中立的立场，拒绝给中国以任何外交上或道义上的支持。苏联的这种做法强烈地伤害了中国的利益与民族感情，毛泽东曾认为，这是在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共产党人第一次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自己的兄弟。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统一作为自己最基本的奋斗目标。特别是在成为执政党后，它所承担的国家责任和民族责任更加重大，因此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问题上更为重视和敏感。而苏联的上述言行毫不掩饰地限制中国在本国主权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愿望

① 约翰·吉廷斯：《1949-1959 年的世界与中国》，1957 年，艾里米休思出版社，1957 年。

处理内政问题的合法权利，加之它又热衷于向中国的头号敌人摇动橄榄枝，这不能不使中国反感，认为这是早在雅尔塔就表现出的“大国协商，划分世界”行为的重演，并作出激烈的反应。可以看出：中国的切身利益与苏联国际战略需要上的尖锐矛盾，是中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现实基础与基本原因。

国家关系上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由于国际事务中矛盾的普遍性所规定，在国家关系中，相对于合作而言，冲突具有更普遍的性质。因此，主权国家间由于不同的利益需求产生矛盾或冲突是正常的，也是难免的。解决或缓解这些矛盾的办法是在承认利益差别的前提下，彼此尊重、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在同一时期，中国与其邻国老挝、柬埔寨、缅甸及印度尼西亚等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而保持了正常的国家关系。但是，为什么同一阵营的中苏盟国间的矛盾分歧却相反地急剧扩大？考察其中诸多复杂因素，苏联大国主义政策与中国独立自主原则的尖锐矛盾，是一根本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苏两党反目为仇，并非一时突变，而是两党历史上的复杂矛盾不断摩擦、积累并激化的结果。虽然从总的方面说，共产国际和苏共曾给予中国革命很大帮助，但是，由于苏共对中共领导人抱有宗派偏见，又事事从“苏联利益中心”的大国利己主义出发，因此，在中国革命，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苏共对中国革命力量及前途的估计严重右倾悲观，对中共抱有很深的误解和疑虑，甚至“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苏共继续了以往不平等的关系模式。除了上述苏联袒护印度，向全世界公开了中苏分歧外，苏联又认为在对金门采取军事行动前，中国“没有根据《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精神”同它打招呼，这样，在它看来，独立性很强的中国一旦掌握了核技术，将更加桀骜不驯，难以驾驭。于是，它又于1958年12月片面撕毁了中苏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还借口说如果中国生产核武器，会被西方国家用来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平的斗争。苏中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还突出地表现在为人熟知的中共拒

绝了苏联与中国合资共建长波电台,以改善苏联太平洋舰队的通讯指挥系统和共建潜艇舰队的建议,这使苏联深感不满,抱怨由于中国领导人采取了这种立场,社会主义阵营在自己的东南前线既没有现代化的舰队,又没有供潜艇适用的电台。所以毛泽东说:中苏关系闹翻是在 1960 年,他们要控制中国海岸,我们不干。

苏联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根源,在于苏联一向将自己的利益完全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利益,把任何兄弟党对其命令的不服从都视为反叛。这一观念被用以镇压南斯拉夫、东德、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的反控制斗争。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万隆会议上中国支持亚非利益,这已使苏联认为中国是苏联在这些国家中扩大影响的潜在威胁。在斯大林去世后,面对在各国共产党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在世界、特别在亚洲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显著作用的中国和有效地协助平息了波匈事件、威信大为提高的中共,苏联无疑担心它在国际共运中影响的缩小将削弱它在世界上的政治权力。这是它对中共加以控制的内在原因。

在近代中国遭受列强蹂躏之后,中国共产党不能不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顶住了来自苏联的种种压力;在新中国牢固地站稳脚跟,经济、国防建设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自然更不可能听命于别人的摆布。因此,从本质上说,中苏论战是中共为维护本国人民利益,摆脱苏联控制,独立自主地走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的抉择,反映了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意识形态因素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苏同盟建立的基础是:在两个阵营的对立中,两国在安全上具有反对共同敌人的一致性;有并行的利益及相同的意识形态。显然,共同的意识形态起到了融合、促进联盟运转的作用,但它并不能保证两国利益始终保持一致,特别是情况的变化使缔结联盟的原动力和一致的安全利益有所改变时。利益冲突必然导致思想及意识形态的分歧,而这种分歧不可避免地反作用于联盟本身。因此,不言而喻,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日益激化的矛盾对中苏关系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以往一

些论著已有详细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但是，正如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共制订对苏“一边倒”政策并不简单地是因为与苏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而主要地是基于国家安全、外交、经济等现实利益而作出的理智选择一样，意识形态也并不是导致中苏对抗的根本原因。苏共二十大至 1959 年苏美戴维营会谈前，中共对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及批评斯大林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还抱赞成态度，只是当两国利益冲突激化，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才逐步升级，使中苏分歧呈现为意识领域的大论战。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后来说得很清楚：所谓中苏论战，并非“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①。

综上所述，不应把中苏论战的根源仅归于意识形态、理论观点上的分歧。当然如有些国内外论著中把中苏论战原因单纯归结为文化差异、国际共运中的权力之争、地缘政治冲突、种族不和、体制缺陷及双方领导人个人性格、行为因素等也是不准确、不全面的。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正是国家利益的根本冲突、苏联大国主义政策与中国独立自主方针的严重对抗，导致了双方在现实国际政治方面重大方针政策的分歧，这是问题的核心和关键，是中苏矛盾发生发展并最终导致论战爆发的根本原因。

二、对中苏论战中几个重大问题的重新认识

中苏论战涉及国际共运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广泛而复杂的问题。在经历了 1959 年世界风云变幻的实践考验之后，有必要对双方一些主要观点的是非曲直作出冷静的反思。

1. 战争与和平问题

如何认识时代与形势、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中苏论战中最基本的分歧之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基于对整个国际形势的走向由剑拔弩张的冷战状态开始转向缓和的分析，提出了新的世界大战完全可以避免，社会主义国家应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主张，并认为“必须使两种制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1983 年 12 月，人民出版社，1983 年。

度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变成只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变成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从此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总原则。对这一观点,中共尽管对某些提法有所保留,但直到 1956 年参加起草的《莫斯科宣言》及 1956 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决议中,并未与苏发生根本分歧,但是,到 1956 年美苏戴维营会谈前后,中共的观察和评论有了变化。

在戴维营会谈中,美苏表面谈判“和平共处”,背后却激烈地进行军备竞赛。1956 年,美国发动了对印度支那的“特种战争”。1956 年 5 月美国 U-2 间谍飞机侵犯苏联被击落,四国巴黎首脑会议因而流产。苏联又在台湾及中印冲突问题上严重伤害了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自尊心。特别是中国当时处在南北西三面受敌的情况下,所处环境和面临任务与苏联截然不同,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当然也会与苏联大相径庭。基于对形势的分析,中共开始批评苏联片面追求和平共处。此时,中共的批评是正确的,态度也比较冷静。但是,在中苏公开论战后,中共的观点越来越激进,把宣传“和平共处”上纲到反列宁主义的阶级投降政策的高度,异常强调两种制度的对抗和冲突,强调时代的革命风起云涌和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

经过实践检验,对这些是非能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了:经过 1956 年的较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体系间并未发生全面大战,“帝国主义四面楚歌”的形势也并未完全出现。而且双方都已逐步认识到,在拥有“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储备情况下,如果爆发全面核冲突,那将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其结局只会给全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中共中央根据对国际形势与周边环境的冷静观察与客观分析,从 1956 年代末到 1960 年代,在外交上逐步进行了两方面重要调整,其中之一就是“改变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指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在这一正确方针指引下,中国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美建交之后,结束了中苏紧张对峙状态,争取到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大为改观。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这一新判断,对中苏论战中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极“左”理论作出了根本的纠正。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进行革命的道路问题上，苏共领导人从对战后时局的基本估计出发，认为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罹难的西欧传统民主国家厌恶战争，要求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内政治矛盾，因此，苏共二十大提出资本主义内部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观点当时得到各国共产党的纷纷赞成，中共对此却提出了异议。在对待这一问题上，虽然中共的基本观点是倾向于使用暴力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但在参加起草《1960年莫斯科宣言》时及以后的一些文件中，中共一直主张应使用和平与暴力的两手这种全面的表述方式。这样，既表明我们不是好战的，又表明我们对和平手段抱过多的幻想。对此，毛泽东曾反复说过：我们要有两手，和平的一手是为了争取群众，不给资产阶级以借口来攻击我们，这是策略性质的口号。到了夺取政权的时候，无产阶级就要用暴力来回答，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作为战略来说，我们不相信什么和平过渡。这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和平过渡方式的基本态度。但是，随着论战的进行，革命的两手逐渐倾向于只要暴力的一手，中共党内普遍认为和平过渡实际上等于背叛革命，向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屈服。同时，把参加选举和议会斗争一概看成“修正主义”，把左派党不参加选举和议会斗争当成是革命的坚定性。这些主张在一个时期给国际共运造成很大的被动。

中共对暴力革命的异常强调也是有其原因的。简单地说：中共是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容易把自己党的经验绝对化、普遍化；中国缺乏议会民主传统，对西方国家议会民主与合法斗争情况了解不多；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对核战争的承受能力明显高于发达国家；苏共把“和平过渡”作为惟一选择和普遍规律，未免失之片面，而且“和平过渡”确实还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缺乏有力的实例来充分论证。特别是从现实情况看，不仅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没有出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形势，反倒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向资本主义“和平过渡”。从此意义上说，对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论给予充分肯定还缺乏事实根据，一切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检验，由时间与历史来作出最后的回答。

但是，关于这一问题起码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说如果现在不

发达国家还难免发生暴力革命,那么,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和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广泛的社会改良,其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工人阶级生活明显提高,利用议会民主争取自己权益的可能性大大增强。这些,使劳资矛盾呈现更复杂的局面。因此,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普遍没有出现全面的暴力革命形势。这种变化表明,特别是在当今和平与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时代,和平的一手不应仅仅作为策略手段,而且应作为一种战略上的可能性来对待。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最终要得到解决,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解决的方法、道路是多种多样的,归根结底要由各国人民自己去探索,不应以某国的历史经验为模式,也不应由别国别党来设计。

对苏共二十大后苏联社会变化的评价

中苏论战基本围绕两个方面进行。除上述国际斗争的形势、道路问题外,另一方面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方针问题,即如何评价苏共二十大后国内变化及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第一,如何评价苏共二十大的反个人崇拜问题。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个报告引起的反响很大。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虽然有多方面的历史因素,但也不能不承认这是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方面。中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有保留的肯定到基本否定的过程。中苏分歧未公开化前,毛泽东认为“报告”对斯大林的“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但在波匈事件后中国国内也发生了“右派向党进攻”的情况下,中共开始认为国际共运和国内的思想混乱、震荡动乱的根源在二十大,二十大反了斯大林,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个人迷信是一个卑鄙的阴谋”^①。

现在,经过中共自身对个人崇拜进行长期曲折斗争后,史学界对“报告”有了一些实事求是的认识。但是,由于对赫鲁晓夫的评价定势在人们

^① 《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6日。

头脑中已很深刻，不少论著对苏共二十大还缺乏全面评价。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作简要分析。

首先，评价“报告”最重要的应看它是否符合苏联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战后，这种要求与过去在特定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尖锐矛盾，而苏联体制的所有弊端，几乎都与斯大林个人崇拜有关，不反对个人崇拜，任何改革就不可设想。因此，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不是偶然的，它是苏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应该说，苏共通过代表大会自己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其积极意义应该充分肯定，影响是深远的。“报告”虽有严重缺点错误，但仍获得苏联干部、群众的拥护，就是一个证明。

其次，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内部出现了一些反复和挫折，这是大变动之前，包括社会主义国家要进行改革之前的一种阵痛，在当时是很难完全避免的。这些问题、事件都有不同的政治、历史根源，其表现形式、性质也不尽相同，但最实质的根源就是苏联模式的弊端和斯大林个人崇拜本身，而不完全在于对这种弊端的揭露与批判（当然，“报告”的严重错误也有一份责任）。阵痛之后，国际共运自然地逐渐进入一个以独立自主为主流的多元化发展的新时期。因此，不应把国际共运中反复和挫折的责任完全简单地推在苏共二十大身上。

最后，“报告”揭露斯大林的错误是苏联历史和国际共运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它冲破了斯大林时代形成的国际共运“一言堂”及“苏联模式”的禁锢，从此，社会主义各国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也从实践中开始独立探索不同的建设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苏共二十大当作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制度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苏共二十大反个人崇拜引发了一次思想解放高潮。

第二，如何评价这一时期苏联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报告”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与批判，尽管有严重错误，但也为苏联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新探索提供了历史契机。应当承认，苏共二十大后，苏联领导人采取了某些措施，试图改变过去的某些模式。现在我们对其再作评价，不仅是因为过去对这种变化采取了简单否定的态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

能正确认识并吸取对斯大林模式改革的经验教训,无疑会对中国的改革带来有益的借鉴。现在,国内外有些人把中国的改革比作赫鲁晓夫式的改革,认为这也是“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更有必要对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作实事求是的评价。

邓小平说过:“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新中国在建立之初,有关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基本理论观点与斯大林是一致的。从这种基本立场出发去评价苏联冲破传统的高度中央集权模式的尝试,如强调企业利润和个人物质利益,改革农产品采购体制、价格体制,扩大农民自留地与企业、地方权限,开放自由市场等做法,不免会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资本主义复辟”。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这些做法,一方面是出自捍卫马列主义的良好愿望,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当时刚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类似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刚建立,高度集中体制的弊端还不可能被充分认识。在这种历史情况下,自然不可能像八九十年代一样理解个体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认识商品经济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既然中国当时并不存在完全变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动因,当然也就很难认可苏联某些改革尝试的意义。但是,如果只因自己没有实践,就把苏联的某些改革演绎为复辟资本主义,就很难不陷入主观推论。

任何一个国家对建设道路的探索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都会出现曲折、反复。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作出回答。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尊重别国党的选择,不是不能对 20 世纪 60 年代苏联的理论与实践加以分析、研究、评价,因为我们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我们国家今天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同样是要努力消除苏联高度集中模式的影响。评价苏联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变化是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尽管这样,撇开苏联领导人主观愿望不论,应该承认,苏联 20 世纪 60 年代发生的一些变化为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从某种意义上也给予了强大的推动力,此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第一次改革的浪潮。

三、中苏论战的影响和后果

中苏论战唇枪舌剑、旷日持久，对中苏两党和整个国际共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积极方面看，中苏论战深刻地反映了世界各国共产党改变过去国际共运中党派关系上不正常做法的迫切要求。通过论战，中国共产党不仅维护了自己的民族尊严及独立地位，打破了苏共一统天下的格局，而且大大增强了其他要求独立自主的党的信心，使平等协商、独立自主真正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这是中苏论战最显著的积极意义。

在以往的论著中，一般都把带来思想混乱和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作为中苏论战最严重的消极后果（其消极的一方面将在后面分析）。但是如果从另一角度分析，过去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就是以苏共为中心的一统天下，即一个中心、一种模式、一条道路。而在论战中，其他各国共产党无一例外地关注、参与并作出自己的判断。表面看，这也是一种混乱，但这种混乱恰恰说明各国共产党在独立思考、探讨、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论战在客观上推动了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探索本国革命和建设道路。这在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阵营未破裂前是不可能出现的。实际上，各国共产党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已逐步成熟，不需要也不应再存在统一的“大家庭”，因为任何这样的形式都会以独立自主某种程度的损失为代价。因此，论战中各国共产党就纷纷提出多中心观点、无中心论等，在当今中国等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都把不结盟作为自己的国际战略和国际关系准则，认为国际关系中的“大家庭”、“集团政治”、“势力范围”等方式，都会带来矛盾，只有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才能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这些，从根本上削弱了大国主宰世界的的能力。从这种角度说，当年社会主义联盟的破裂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试问，现在哪个国家还会愿意回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那种家长制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去呢？

从消极方面看，大论战一方面导致了有的国家共产党组织的瘫痪、瓦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极“左”思潮的局部泛滥，给一些国家共产党和国家造成严重损失。特别是中苏两国，由于全身心地投入论战，不能不影响社

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这一时期,双方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改革或中断,或变形、改向。在世界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时代,中苏两国都坐失了经济发展的良机。

在中国国内,中苏论战造成的消极影响极为深刻、长远。经济上,苏联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抨击和讥讽,强化了中共领导坚持“三面红旗”和“与苏联对着干”的决心,也促使中共领导层内对经济战略的不同意见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如毛泽东在 1960 年 8 月的一次谈话中认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忠言进谏是与外国串通起来搞颠覆活动,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向党进攻。“一个百花齐放,一个大跃进,一个人民公社,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作战。”正因为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庐山会议从纠“左”转为反右,并刺激了经济战略上大干快上的一套做法,其结果给生产力发展造成严重破坏。

在与兄弟党关系及外交上,由于在论战中把世界革命放在了高于一切的地位上,改变了统一战线策略路线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正确主张。论战中,中共一系列“支左反修”言行,造成曲高和寡,“光荣孤立”,全世界没有一个共产党、工人党中,有 20 多个先后与中共中断了关系。由于反对“和平竞赛”、批判“洋奴哲学”,中国再次对西方文明关闭了大门。正如邓小平所说:“20 世纪 60 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

在军事方面,中苏交恶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导致双方领土争端加剧与激烈的边界军事冲突。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的军事威胁迫使中国转入“时刻准备打仗”的战备状态,为适应战备要求,中国增加军费、扩充兵力、大搞三线建设,深挖洞、广积粮,百万知识青年奔赴北疆的“反修最前哨”……整个国家进入临战状态,严重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发展战略布局,大大偏离了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正常轨道。这种局面严重损害了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苏论战最为深远、严重、惨痛的恶果表现在政治方面。由于把对所谓“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激烈抨击、批判中的思路和观点来反观分析国内,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估计。与对苏共的批判、

结论相呼应，他认为“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并得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现正睡在我们身边”这样极端错误的政治论断，从而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奠定了政治依据。

毛泽东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防范应该肯定，特别是他警惕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的理论至今还给人们以启示。但是，当他过分把“中国变修”的危险加以强调后，随着对“苏修”讨伐的白热化，毛泽东对中国修正主义上台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烈，这使中国历史的车轮迅速地向与整个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深渊滑去。深渊的尽头，就是毛泽东不惜一切代价，为开辟反修防修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因为中苏论战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找到了理论根据和直接动因，为群众性的上纲上线、口诛笔伐的大批判作出了示范，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苏论战是“文化大革命”在国际共运广阔背景下的一次前哨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当今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里，回顾过去，我们不禁深深感慨：为明白现在看来一些多么浅显的观点，我们的党曾付出了多少努力与代价！更好地总结、珍惜历史的经验教训，避免悲剧的重演，这就是对 20 年代中苏论战进行反思的目的与意义。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 4 期。)

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

中央文献研究室 李捷

中苏关系，经历过“蜜月”时期，也有过“严冬”的历史。然而，正是在“蜜月”时期，就已经隐藏着不和谐的因素。

一、民族传统、意识形态与战略利益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苏关系经历了从友好合作到逐步疏远的过程。即使是在友好合作的时期，也潜伏并积累着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因素。

这首先是两国在文化和历史背景上存在的巨大差异造成的。苏联的前身俄罗斯，是一个具有很强的领土扩张野心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从近代以来，一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长期落后的国家。在二十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俄罗斯是主要的获利国之一。中国则深受其害。这对中国人民心灵上的创伤是深刻的。

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这本来可以为中苏之间建立新型国家关系奠定稳固的基础。而实际上，毛泽东为此所作的努力，也对斯大林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提出了质疑。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来处理好国家关系，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战后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中，还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如何正确

处理民族传统和国家利益的问题作过具体的论述。长期以来，斯大林把苏联的国家利益置于各国共产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之上的错误做法，又在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盛极一时。在斯大林看来，过分强调本民族的特殊性，强调本国的国家利益，就是对苏联权威的大不敬，就是民族主义。而毛泽东的革命和建设理论，恰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和民族传统的道路基础之上的。中国革命的成功，在客观上对苏联经验的惟一正确性，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早在中国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很大帮助，同时也深受斯大林干涉之苦。毛泽东说过：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违背斯大林的意愿取得的。斯大林则认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是“麦淇淋式的共产主义”，并且怀疑毛泽东是第二个“铁托”。

这种基于民族传统和革命道路的巨大差异，体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不同理解。这种理解上的差异，在斯大林时期还没有表面化，到了赫鲁晓夫执政以后，就逐渐暴露出来。

促使中苏两国在 1949 年 10 月以后走到一起，结成同盟友好关系的，是共同的战略利益。

中苏结盟，是在共同面对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实行冷战战略的形势下，两国领导人进行的一次战略选择。新中国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遏制和封锁，决定实行“一边倒”方针，作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斯大林也乐于看到苏联的东方安全又多了一个辽阔的屏障，美苏之间确定的战后雅尔塔体系，在苏联不需要为此负任何责任的情况下，被中国共产党人在东方打开了一个缺口。因此，尽管他对中国革命的胜利精神准备不足，对毛泽东心有疑虑，但是仍然以喜悦的心情接受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既成事实，并以迎接胜利者的姿态对待刘少奇、毛泽东的先后来访。斯大林在同中国结盟的同时，也默认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相对独立的地位，并把中长铁路和旅顺军港等归还中国。这种做法，在苏联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是很特殊的。

从此，中国作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东方大国出现，并成为苏联在亚洲的主要同盟者。这种关系，通过中国投入抗美援朝战争，得

到进一步的巩固。中苏关系也因此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那些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以及彼此之间的不满，也暂时被掩盖起来。

应当说，中苏两国结盟，把共同的战略利益放在首位，而将巨大的民族差异和深刻的不信任搁置一旁，双方主要决策人的考虑，都是相当冷静而实际的。

中苏结盟，对当时的国际局势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大大地加重了苏联同西方阵营打交道的筹码，极大地增加了苏联在应付冷战对峙中的回旋余地。可以说，中苏结盟给苏联带来的战略利益，远远超过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任何一国。同时，中国也得到苏联的巨大物质援助和技术帮助，并得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支持。这对中国打破西方封锁，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加速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苏联赫鲁晓夫执政后的一段时间。应当说，在赫鲁晓夫执政的一段时间里，中苏关系消除了一些隔阂，一度变得比较平等，更加紧密了。这种关系迅速发展，在 1959 年达到了顶点。

赫鲁晓夫时期，中苏关系的迅速改善，既有两国内政方面的原因，也有两国对外政策作基础。在内政方面，以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为标志，两国都试图摆脱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开始探索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对外政策方面，苏联开始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希望改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同时争取同美国等西方国家达成一定的缓和。在这两方面，赫鲁晓夫都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配合。同时，中国从朝鲜战争结束后，也开始了为国内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的努力。这样，中苏两党两国在赫鲁晓夫执政的最初的几年里，在内政和外交方面，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协调一致，为中苏关系的迅速发展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可以说，这种关系的发展是全方位的。

衰由盛始。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苏之间在原先隔阂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隔阂和不和谐，为日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争论和两国关系的破裂，埋下了隐患。

二、和谐中的裂痕

这些新的隔阂和不和谐，主要是从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归纳起来有三大分歧，即：对斯大林的评价，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苏美缓和战略。

斯大林问题，起因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闭幕前夕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毛泽东对此“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他后来说：“批评斯大林这个事情怎么看法？我看也有两重性。揭露对斯大林的迷信，揭开盖子使人解放，这是一个解放运动。但是因为揭的办法不对，没有好好分析，一棍子打死。这样的办法，在几个月里，引起世界的几次大风潮，后来又引起波匈事件，所以有它的错误。”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问题上采取了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因此，在他的主持下，先后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在1956年9月1日和10月1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这是斯大林去世以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不指名地公开表明同苏共中共的不同意见。

毛泽东对斯大林也有一肚子不满。1956年9月1日，他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说：“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交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①在斯大林问题上，他不反对进行必要的批评和揭露，并且认为：“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②他所反对的是在斯大林问题上出现的全盘否定，不加分析地一棍子打死，甚至过分追究个人责任的错误做法。

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的不平等问题，一直是苏联同社会主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19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195页。

义各国关系的症结，中国也深受其害。这个问题，发端于斯大林时期，在赫鲁晓夫执政以后，虽然有所好转，但并没有根本改观。1955年下半年发生的波兰事件，就是这种矛盾的一次总爆发。

同年12月18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约见毛泽东，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准备对波兰动用武力、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讨论波兰问题的社会主义国家会议的信件。会见中，毛泽东表示：如果苏联不动用武力，也不召开国际会议谴责波兰，而同意用和平方式解决苏波分歧，中共同意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和苏共商谈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天，毛泽东还约见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把这个答复通报波兰领导人。^①

12月28日至30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同苏共中央领导人共同解决波兰问题。会谈中，刘少奇向苏共中央领导人转达了毛泽东关于苏联同东欧各国关系的建议：对东欧各国政治经济上放手，让它们自己去搞，在军事上，征求它们的意见，问它们是否要华约，是否要驻军，或者是要华约但苏联撤军，敌人进攻时再去。赫鲁晓夫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② 12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过去的错误，表示了改善相互关系的愿望。1956年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了支持苏联政府声明的声明。

波兰事件结束后，毛泽东在12月30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的谈话中，提出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问题，并认为赫鲁晓夫提出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没有提出本质的问题。要反对主张沙文主义的个人崇拜，要反对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③。

应当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问题上，通过波兰事件，中国得了分，苏联丢了分。这是长期处于“老大哥”的中心地位的苏联领导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中国领导人希望苏联领导人从此放弃大国主义的做法，同社会主义各国平等相处，尊重别国的主权和战略利益，日后证明，这种希望也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284-285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285页。

③ 毛泽东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的谈话，1956年12月30日。

落了空。

苏联争取同美国缓和的战略，是在苏共二十大上确定下来的，表示出苏联急于集中精力解决国内建设问题的迫切愿望。这时，中国的主要注意力也在国内建设上，也在奉行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方针。两国没有在战略目标上表现出根本的分歧。但是，从1956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开始，两国在缓和问题上的战略上的不协调日趋表面化。

从1956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反复论述他对国际局势得出的一个新的基本判断：“现在我感到国际局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①

从这个基本判断出发，在战略态势上，毛泽东重申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②

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他提出要同时准备两种可能性。“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③

与此相关的，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问题。苏联从同美国等西方国家搞战略关系缓和的需要出发，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突出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毛泽东则从加强对美斗争的考虑出发，强调要同时承认存在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这两种可能性，强调要有议会斗争和群众革命斗争两手准备。1956年10月19日，他在第二次访苏前夕，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把这些意见转告赫鲁晓夫，提请苏共中央在起草《莫斯科宣言》时考虑。在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共同起草《莫斯科

① 毛泽东在莫斯科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0月19日。

② 毛泽东在莫斯科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0月19日。

③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6年10月19日。

宣言》的过程中，最大的意见分歧，就是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考虑到苏共方面一再提出希望能和苏共二十大的提法相衔接，中共代表团作了适当的让步，同时又在 1954 年 12 月 16 日向苏共中央提交了备忘录性质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表明了中共方面的原则立场。

这样，从 1953 年 12 月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开始，中苏之间围绕苏美缓和这个核心问题，在国际战略的一系列问题上，都发生了意见分歧。只是由于这一时期，苏联在缓和战略上还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中苏两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上还保持着大体一致的看法，中苏两党两国才能够互相有所忍让和克制，才达成了 1954 年《莫斯科宣言》。中国对苏联持内紧外松的态度，对苏共既有批评，又维护其中心地位；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外都需要中国的支持，虽然心怀不满，却隐忍不发。毛泽东第二次访苏，中苏两党的相互态度，就是这一关系典型的代表。

在 1953 年间，毛泽东多次说过，中国在世界上要搞好三方面的团结，而苏联是第一位的。他说：“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时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① 他还把这些称为“我们的外交政策原则”^②。

三、战略利益：从一致到破裂

1953 年以后，随着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分歧的严重，中苏两国在战略利益上的巨大差距日益暴露。双方都改变了在两国关系上的忍让和克制态度，从内紧外松逐步升级，直到矛盾公开化。

1953 年，毛泽东在国内政策上进一步“左”倾，发动了以“超英赶美”为

① 《毛泽东外交文选》1985 年 1 月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年。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1985 年 1 月版。

目标的大跃进运动。他的目标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要证明社会主义阵营优越于西方阵营，“东风压倒西风”；另一方面，也要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优越于苏联的建设道路，“学生超过先生”，“后来者居上”。后者引起赫鲁晓夫的不满。

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他不能容忍中国对苏联“老大哥”地位的挑战，更不相信中国能够在没有苏联的援助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苏联希望中国纳入它的经济轨道，遵从它的经济分工，中国则坚持走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是导致中苏两国在国家关系上从结盟走向破裂的深刻的经济原因。

1959年对于中苏关系来说，是发生关键性转折的一年。首先发生的争执，是由长波电台和共同核潜艇舰队的问题引起的。

当10月16日尤金大使把这个建议转达中国领导人的时候，得到的反响异常强烈，迫使赫鲁晓夫不得不亲自来华，当面向毛泽东等解释。10月21日至27日，经过赫鲁晓夫同毛泽东等的三次会谈，这件事才平息下来。

这个事件，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样简单。它在中苏关系已经变得复杂和脆弱的关键时刻，又促使这种关系继续向着恶化的方向发展了一步。

共同舰队的建议，首先伤害了中国的民族感情。在中国已经取得独立以后，中国领导人决不允许外国军队在中国驻扎。这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是一个政治问题。除此之外，在问题的背后，还隐藏着中苏两国战略利益的矛盾。

苏联的主要目的，是不希望中国搞自己的核武器，而是像华约成员国那样靠它提供“核保护伞”。从客观的角度讲，苏联此举，会使中国更深深地卷入苏美之间的战略抗衡，甚至成为亚洲的“华约”国家，而削弱中国独立自主的战略地位。这正是中国领导人所尽力避免的。尽管中苏之间存在着同盟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决不能以损害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为代价。事实上，从缔结《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之日起，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就一直在谋求同苏联建立一种平等的盟友关系，而不是一种战略上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领导人从自己的战略需要出发，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的要求，引起中国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就是不难理解的。

了。它证实了中国领导人的一个判断：在苏联领导人的心目中，中国并没有取得平等的地位，它的主权和战略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它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的努力并没有得到苏联的真心支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8年8月至9月，围绕中国炮击金门，中苏两国更增加了战略上的不信任。

金门炮战，起因于美国企图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为了动摇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顽固立场，向全世界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同时也打击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起金门炮战。这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战、外交战。在炮战发起之前，毛泽东提出了“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的策略。^①炮战中，美国政府迫于压力，于9月15日恢复了中美两国大使级华沙会谈。随后，毛泽东又利用美蒋在美国准备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脱身问题上的矛盾，提出“绞索政策”，在美台矛盾中打入了一个“楔子”。通过这次较量，毛泽东进一步印证了关于国际局势的新判断，并得出几个结论：第一，美国用紧张局势威胁各国人民，实际上，紧张局势对世界人民更有利；第二，谁怕谁多一点？是美国怕我们多一点，而不是相反；第三，对美斗争中采取针锋相对的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需形态”^②。

鉴于刚刚发生过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争执，也由于得到了中国方面不拉苏联“下水”的承诺^③，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在金门炮战中，一直采取克制和谨慎配合的态度。9月20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北京会见了周恩来，对中方的立场和措施表示赞同。^④9月28日，赫鲁晓夫致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呼吁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明智态度，把美国舰队从台湾海峡撤离，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和利益。^⑤这对美国确实形成了一定的压力。

①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信，1958年8月15日。

② 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外交文选》145页。

③ 杨胜群、田松年主编：《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1949—1958），14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④ 周恩来年谱（1949—1958）中卷，15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⑤ 《人民日报》1958年9月20日。

但是,这种表面的一致,并不能掩盖隐藏在深层次里的严重分歧。在急于缓和苏美关系的苏联领导人看来,金门炮战实际上是在破坏苏联的缓和战略,“实际上正好迎合了美国好战集团破坏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针的意图。北京打算借助这种行动来激化苏美关系,并利用苏中条约这部机器把冲突扩大为远东的军事对抗”^①。而且,中国领导人没有依照惯例,把炮击金门的计划事先向苏联领导人通报,也引起苏联方面的不满。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苏两国在战略问题上的不信任,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进入1958年,中苏两国的这种战略不信任进一步发展,逐步由相互怀疑走向破裂。

1958年初,苏共召开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为核心的对美缓和战略,并主动改变了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提法。不过,这种改变,并不意味着苏联主动放弃了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控制,实际上是配合缓和战略而运用的一种策略。赫鲁晓夫还敦促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苏美首脑会晤,争取在核裁军和柏林等问题上达成妥协。这和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方针和战略目标,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更为严重的是,中国领导人没有也不可能说服苏联领导人放弃既定的国际战略路线,而赫鲁晓夫又下决心不顾中国领导人的强烈反对和实际利益,强硬地推行自己的国际战略,并对中国施压,由此导致了一系列涉及战略利益的严重事件。中苏的盟友关系和战略合作关系终于破裂。

第一个严重事件,是这年12月16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1958年,苏联领导人曾经主动提出,愿意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两国政府在同年12月15日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这以后,苏联一直借故拖延不履行协定。在1958年12月16日的信中,又以苏联正在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谈判达成禁止核试验的协议、赫鲁晓夫正在准备

^① (苏)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著：《苏中关系（1949—1960）》中译本，15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同艾森豪威尔会晤为由，提出暂缓提供，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同时，苏联专家也借口回国休假，一去不复返。^① 此举表明，为了实现同美国缓和的战略，赫鲁晓夫决心在同盟关系上和中国拉开距离，以消除西方对他的疑虑。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 1959 年 10 月 15 日来信作了研究，决定“不理赫鲁晓夫那一套，我们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11 月，周恩来向负责这项工作的宋任穷传达了 this 决定。^②

中国领导人由此得出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在关系战略全局的尖端技术和核心技术上，中国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另一个严重事件，是这年 11 月 11 日苏联塔斯社发表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

从 1959 年 10 月起，中印边境纠纷逐步升级。印度政府坚持“麦克马洪线”是印中国界，并在 11 月 15 日发生了第一次边境武装冲突。就在中印两国政府为此进行交涉的时候，苏联不顾中国领导人的反对，提前一天将塔斯社声明公之于众。在中苏两国存在同盟关系的情况下，这个声明表示了苏联政府的中立立场，也就在实际上助长了印度政府的领土要求。中印边境纠纷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这两个严重事件，都发生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一方面，使得苏联在西方国家的眼里，的确同“好战的”中国拉开了距离，为赫鲁晓夫访美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又极大地损害了中苏同盟，成为中苏破裂的关键一步，这也是赫鲁晓夫急于推行对美缓和战略所付出的代价。应当说，这个代价是沉重的。中国政府认为：“苏共领导撕毁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和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这是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创造所谓‘戴维营精神’，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③

1959 年 11 月 15 日至 16 日，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美国总统山地别

①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1981 年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

② 《当代中国的核工业》1981 年版。

③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59 年 11 月 27 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3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年。

墅戴维营举行非正式会谈。这是赫鲁晓夫执政后，苏美两国首脑的第一次会晤。戴维营会谈涉及了广泛的国际问题，但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赫鲁晓夫认为：“这次会晤使得有可能保证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国际局势中出现会使各国人民免于新战争的恐惧的历史转折点。”并对“戴维营精神”大加宣传。随后，又积极为召开苏、美、英、法四国首脑巴黎会议作准备。

中国，是赫鲁晓夫戴维营会晤以后的第一站。1959年7月14日至15日，赫鲁晓夫来华访问，同毛泽东等举行多次会谈。双方谈得很不愉快。赫鲁晓夫的主要目的，是要劝说中国领导人放弃“冒险主义”路线，而纳入苏联的战略轨道。这个目的当然不可能实现。他在中国政府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还告诫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回国途中，还发表了一些攻击中国领导人的言论。这些举动，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又恰好是苏共领导人不惜破裂中苏关系，取悦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投降主义”行为。由此引出了1959年9月中国接连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揭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

此外，赫鲁晓夫还对中国的国内政策提出批评，认为中国的人民公社运动，不过是俄国原始公社的翻版，是一种幼稚的空想。同时，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还面临着彭德怀对他的批评。这更加深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戒备和反感。

这样，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由友好同盟开始走向破裂，两国间共同的战略利益和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战略利益上的严重分歧日益表面化。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革命经历、所处发展阶段和面对问题的不同，中国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人缺少足够的沟通和理解。但是，苏联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对于中国采取的大国主义作风，以及在战略分歧发生后采取的高压政策，在中苏同盟关系破裂中，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通过在战略上与中国拉开距离，虽然苏联在谋求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缓和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从长远看，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在战略利益上受到伤害的决不仅仅是中国。1959年8月美国U-2侦察机入侵苏联事件以及巴黎最高级会议流产，就是证明。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谋求缓和是必要的。各国维护和谋求各自的战略利益,也是正常的。但是,一个国家在最大限度地维护和谋求自己的战略利益的同时,不能损害别国的战略利益,更不能利用自己的战略优势,在别国需要物质的和道义的援助时,把这种要求作为要挟别国作出牺牲、同自己保持战略上的一致筹码。这正是这段历史给予我们的最大教训。

四、中苏论战的序幕：从战略利益冲突到意识形态论争

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是由两国战略利益的冲突引起的。然而,中苏同盟关系破裂以后,这种战略利益上的冲突,很快演变成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使得这场围绕国家利益的较量,蒙上了厚重的意识形态的色彩。

从 1955 年两党两国关系破裂到 1956 年中苏论战爆发之前,即中苏关系从战略利益冲突逐步发展到意识形态大论战的过程中,双方有过四个回合的交锋。

1955 年代伊始,中苏两党关系恶化就显示出严重的后果。突出的表现,就是 1955 年 1 月中国接连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以及 1 月苏联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带头对中共代表团围攻。这是中苏交锋的第一个回合,其结果是两党关系恶化导致国家关系破裂。

《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发表以前,中共中央曾经多次开会讨论,并经毛泽东审定。这三篇文章,表面上是指责南斯拉夫,实际上对苏共二十大以来的国际路线及其理论提出了系统的批评。这些批评,已经不仅仅是两党交换意见的性质,而带有公开指责的意味。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苏美首脑戴维营会谈以后,中国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人的失望心情,也是对赫鲁晓夫指责中国内外政策的回报。这三篇文章的发表,引起苏联领导人的愤怒。

1 月,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苏共中央提出,利用这个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1 月 10 日至 14 日,出席罗党三大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14 日,苏共代表团将给中共中央的通知广为

传布，对中共进行指责。会谈中间，赫鲁晓夫还对中共代表团组织围攻。中共代表团在会谈公报上签了字，同时又在 远月 圆日发表书面声明，阐明自己的观点。指出：“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赫鲁晓夫同志的这种态度和这种做法将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①

中共发表三篇文章和苏共借布加勒斯特会谈组织对中共的围攻，使中苏之间在国际战略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表面化，并展开了初次交锋。

在中共看来，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谈期间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这是苏共领导事先预谋的反华大演出，这是粗暴破坏 员缘年宣言关于兄弟党关系准则的严重事件，这是以苏共领导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②。在苏共看来，中共发表的三篇文章，“对 员缘年莫斯科会议宣言中极其重要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批评”，“采取了兄弟党关系中完全不能容忍的、只能被看成是公开分裂的新行动”。^③ 苏联决心对中国进一步采取回应措施。

苑月，苏联召回援华专家，中断援建项目，借助经济手段在政治上施压。这给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中国的中国的确形成不小的压力。在中共领导人看来，这件事表明，苏共领导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了。

当时，中共的反应是低调的。苏联撤走专家的通知传来，中共中央从苑月下旬到愿月上旬，在北戴河多次召开会议，估计由此造成的损失，研究对策和补救措施。在此前后，还通过多种方式向党内外通报情况，做好思想准备。

远月 愿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座谈会，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一些部门的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议。在会上，周恩来介

①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员缘年怨月 远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员缘页。

②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员缘年怨月 远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员缘- 员缘页。

③ 〔苏〕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著：《苏中关系》（员缘- 员缘）中译本，员缘页。

绍了中苏两党存在的若干原则分歧：(一)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和战争的根源；(二)关于裁军问题；(三)关于和平共处；(四)关于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①

苑月中旬，周恩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托，在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长篇报告。虽然是讲历史，但是联系到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背景，这篇报告是意味深长的。^②

愿月 愿日，周恩来还在民主同盟等六个民主党派的中央全会扩大会议上，作了苏共二十大以来的中苏关系的报告。随后，还要求各省市向民主人士介绍中苏关系问题。^③

这时，中共中央的估计还是比较乐观的。当时认为，赫鲁晓夫的错误是部分性质的。他们还是反帝国主义，搞社会主义，讲国际主义的。两党的争论是属于马列主义原则性的，但从整体来说，仍属于部分性质，两党两国都还没有脱离马列主义总的轨道。头脑要冷静，不能忘记帝国主义这个主要敌人。中苏的争执问题，要从最坏的方面想，争取最好的，估计有五种可能：宣传上的封锁、分裂、颠覆、威胁、帝国主义利用挑起战争。我们的旗帜是马列主义，口号是坚持立场，坚持原则，坚持团结。^④

本着这样的精神，怨月 员日，中共中央致信苏共中央，对 远月 愿日苏共中央来信作了答复，并提出了解决分歧、达成团结的五点建议。^⑤

第二个回合，是第二次莫斯科会议和为此而召开的中苏两党会谈。双方为恢复两党关系和国家关系作了最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同年 员月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是继 员缘年 员月莫斯科会议的又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前，中苏两党在 怨月 员日至 愿日举行会谈，共同商讨起草第二个莫斯科宣言。随后，又在 员月 员日至 愿日召

① 周恩来年谱（1949—1979）中卷，猿猿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② 周恩来年谱（1949—1979）中卷，猿猿—猿猿页。

③ 周恩来年谱（1949—1979）中卷，猿圆猿页。

④ 周恩来年谱（1949—1979）中卷，猿圆猿页。

⑤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1960—19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开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会议。在起草宣言和召开莫斯科会议的过程中，尽管中苏两党争吵得很厉害，但是最终双方都作了必要的让步，达成了比较接近的看法。两党两国的关系，开始有所缓和。这种情况一致维持到1959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之前。

促成这种局面的一个客观原因，是1958年缘月，接连发生了美国哉原国飞机入侵苏联领空和苏、美、英、法四国巴黎首脑会晤流产两个重要事件，苏联同西方的关系重新紧张，赫鲁晓夫的缓和战略受挫。同西方关系紧张，又使苏联领导人重新考虑同中国完全闹翻的严重后果，对中国不能不有所让步。

而在中国领导人的眼里，赫鲁晓夫对美态度重新强硬起来，证明先前的判断和估计是正确的，两党两国在反帝问题上还有战略利益一致的方面。中国领导人希望，赫鲁晓夫能够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重新回到和中国保持同盟关系的轨道上来。这个想法未免过于乐观。同时，通过这一阶段的争论，中国领导人也总结出—条经验：“在解决兄弟党分歧的时候，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是完全必要的。”这条经验，对日后中苏论战中中国方面采取的策略原则，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1959年初，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开始调整对苏战略。赫鲁晓夫作出积极反应。同年10月10日至14日，在维也纳同肯尼迪举行了会谈。这是戴维营会晤以后，苏美两国首脑的第二次会晤。这以后，苏美间的对抗竞争继续发展，高层对话协商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种背景下，中苏发生了第三个回合的争论，使两党在前—阶段的努力归于失败。

1959年10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上，继续发展了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纲领路线，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的党”。

这时，中苏两党的分歧已经暴露得比较充分。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中国是实行这些纲领和路线的最大障碍。中国领导人则认为，“这是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破坏了两次莫斯科会议达

成的原则。这些对立的观点，在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就表现出来。

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苏共领导人采取“打阿射华”的手法，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实际批评中国。中国认为这是“开创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兄弟党的恶劣先例”。

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是周恩来。中共代表团赴会的方针是，“除致贺外，还准备强调团结，强调反帝”^①。1956年10月10日，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表示：“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不公平的片面的指责，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在会下同胡志明、金日成交换意见时，周恩来还提出兄弟党关系应该遵循的三条原则：（一）对敌斗争一致，互相支持；（二）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不能干涉；（三）保持内部团结，兄弟党间的内部事务在内部解决，不能向敌人暴露。

10月15日，周恩来还同赫鲁晓夫、科兹洛夫、米高扬、安德罗波夫等进行了长达10小时的会谈，就苏阿关系、苏共二十大等问题，详细阐明中国的看法。苏联方面不接受中方的意见。双方谈得很不愉快。经中共中央同意，16日晚，周恩来提前回国，指定彭真代理中共代表团团长，继续参加会议。17日，周恩来抵达首都机场时，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全体迎接。中国以这种方式，表示出对苏共二十二大的强烈不满。

在此前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对苏斗争的总方针：“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②

10月10日至15日和16日，周恩来还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先后向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及民主人士作了关于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这是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国领导人预见到中苏争论很难避免，而采取的一个争取主动的措施。

1956年，对于中国来说，可以说是多事之年。而苏联在这一年对中国施加的压力，犹如雪上加霜。

① 周恩来年谱（1949—1956）中卷，156页。

② 转引自对外文委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1956年10月。

这一年，在中苏关系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使两国关系骤然紧张起来。一是源月至缘月间的中国新疆伊犁事件，数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苏联驻伊犁领事馆深深地卷入了这个事件，最终导致了两国领事关系的中断。二是愿月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苏联将同美国达成防止核扩散协议。这时，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离试爆时间只有两年。这件事，显露出苏联通过牺牲中国换取同美国结成核伙伴关系的用心。

另外，愿月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表现，也使中国领导人大大失望。中方认为，苏联领导人在这场危机中，先是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随后又犯了投降主义错误。苏联对美国强硬的立场，已经不复存在。实际上，这场危机是苏美两国之间的一次核赌博，也是对各自的核战争理论的一次检验。在危机中，双方剑拔弩张，都深刻体验了面临核战争边缘的震撼。这个事件成为苏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双方都在核讹诈问题上持谨慎态度，以更加积极的态度谋求缓和。同时，又设法限制别国拥有核武器，以保持两国的核垄断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更加下决心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甚至宁可因此损害到中国的国家利益。

这一年，两党来往信件开始采取公开信的方式，从交换意见演变为公开争论。源月起，苏联加大了攻击中国的力度，接连发表讲话和文章。从愿年起，愿月缘日到愿年猿月愿日，中国方面也发表七篇文章进行反驳。^①这是中苏论战前的第四次交锋，也是最后一个回合。到这时为止，中苏双方都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改善越来越失去信心和耐心。

至此，中苏关系朝着无可挽回的方向，迅速恶化下去。中苏大论战的发生，只是时间问题。

纵观中苏关系从结盟到破裂的历史过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① 这七篇文章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六) 中苏两国在结盟之前,已经有一些恩恩怨怨。这些不愉快的回忆,既有侵略掠夺造成的民族创伤,也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干涉产生的两党裂痕。同时,两党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上,也存在一些差异。

(七) 推动中苏两国结盟的,首先是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冷战压力而形成的共同的战略利益。同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八) 斯大林逝世以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在比较平等的基础上,一度有所发展,并在 1956 年达到了顶点。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又产生了新的不和谐的因素。

(九) 1958 年“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事件,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从此,两党两国在战略利益和内外政策上的矛盾分歧日益发展,展开了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这是导致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中苏关系迅速恶化的根本原因。

(十) 从 1959 年中国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苏联在布加勒斯特会谈中组织围攻中共代表团开始,双方在战略利益上和内外政策上的分歧,很快演变成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揭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特别是中国方面)都为挽回关系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两党两国关系仍然朝着恶化的方向迅速发展,到了 1960 年上半年达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十一)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中苏关系演变,总的趋势是不断恶化,但在一定时期也曾经有所改善。这种改善,除了双方为挽回关系作过最大的努力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苏关系还受到苏美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当苏美关系紧张,对抗居于主导时,中苏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也随之成为主导的方面,两党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就暂时得到控制,退居第二位。当苏美关系缓和,妥协居于主导时,中苏之间战略利益冲突就变为主导方面,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随之突现出来。这是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原文载《党的文献》1988 年第 10 期。)

回顾和思考

——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

当代中国研究所 丁明 整理

编

者按：1992年5月10日~12日，由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和美国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共同发起的“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100余名学者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来自俄罗斯、美国、德国、挪威等国学者100余人，100余名国内外学者列席会议。与会人士中除长期从事中苏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外，还有一些直接参与中苏最高层会晤的当事人，如来自俄罗斯的杰留辛、库里克，曾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的李越然、阎明复。大会共收到论文100余篇，用于交流的各种档案资料汇编100余种。论文涉及战后至1990年代中苏关系的主要方面，包括：中苏同盟的形成；中苏关系的演变、分裂及其原因；中苏关系与国际冲突；中苏经济关系；中苏领导人与中苏关系；新档案材料的发掘与利用等。由于会议组织者的努力，入选论文所阐释的新观点或新视角，大都能以新发现的材料为依据，从而丰富并深化了关于中苏关系史研究的认识。本刊将陆续选发一些文章。会议期间，组织者及时地抓住中苏关系亲历者与会的难得机遇，于5月10日下午，邀请他们就自己的所见所闻直抒胸臆，并且现场解答学者们的提问。他们的回忆不仅生动具体，而且妙语连珠，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本刊

将这次对话整理发表,以飨读者。其中两位俄国学者的发言是根据录音整理的。

主持人陈兼(大陆旅美学者,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今天下午,我们有幸请来了四位先生,他们都曾亲身经历过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我先把四位先生给大家作一个介绍。阎明复先生和李越然先生大家都很熟悉,他们曾经作为翻译,长期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工作。杰留辛先生是《真理报》派驻新中国的第一位记者,后在苏共中央社会主义联络部国际部任职,现任俄国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库里克先生长期担任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现任俄国远东研究所研究员。

今天,四位先生将和各国的专家学者们在一起,讨论中苏关系的若干重要问题。下面,先请他们每人用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围绕几个书面问题简单地谈一谈个人的看法,然后再来回答大家提出的其他普遍关心的问题。

阎明复:我先把四个书面问题给大家念一下:

(问)何时以及什么是中苏关系当中从友好走向敌对的关键性转折点?是 1956 年的苏共二十大?是 1958 年的“共同舰队”或“炮击金门”?还是 1959 年的“撤退专家”?

(问)怎样看待 1956-1959 年的中苏关系?当时双边关系的改善是表面上的还是实质性的?为什么这种改善没有导致中苏关系的全面恢复?

(问)为什么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如此不喜欢对方?在对方领导人当中,毛与赫比较喜欢什么人?

(问)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关系是否有真正改善的机会?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是否同中国国内政治的革命化有关联?

我建议请我们的苏联老大哥先来回答。

杰留辛:我们在战争时期有一个口号,叫作:共产党员冲在前面。现在我们虽然都不是共产党员了,但既然阎明复先生要求我这样做,我只好第一个来回答。当然,我只能谈一谈我所知道和了解的情况。

先谈一谈中苏冲突。关于冲突的开端有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认为

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这在中共中央的文件和信件当中可以得到证实。但是，在毛泽东的另外一些谈话当中，他还谈到过，他对斯大林的不满从1956年代就开始了。有一次，在和苏联领导人的谈话中，他说要写一本关于斯大林的书，斯大林曾经反对过中国革命。他说这本书很可怕，因此要在他死后一万年才能发表。

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开始，双方就有一些分歧。比如：我以前讲过的关于苏联提供给中国的设备的估价问题；人民币和卢布的比值问题，等等。但这些分歧在当时都得到了解决，因为中苏双方都为此作出了让步。

1956年，在莫斯科批判了莫洛托夫等人组成的反党集团，中国方面对此的反应并不热烈。同样，中国1956年9月和10月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在莫斯科也没有得到强烈的反响，尽管莫斯科发表了这两篇文章并出版了小册子。斯大林个人迷信的问题，是导致中苏分歧的一个内容，但并不是主要的内容。在某种情况下，赫鲁晓夫是愿意考虑中国同志的意见的。

我记得，1956年11月，周恩来同志访问莫斯科时，在“苏维埃宾馆”举行了一次宴会。周恩来和赫鲁晓夫坐在一起。我当时是《真理报》记者，总编辑告诉我，可以坐在他们身边，把他们所谈的事情记录下来。今天在座的李越然先生当时也在场，给周恩来当翻译。两人先谈天气如何如何。赫鲁晓夫那一天喝了很多酒，周恩来开始没有喝，后来也喝了。按照俄罗斯的习惯，赫鲁晓夫一次又一次地干杯，喝得够呛了。这时，他突然说到，不管怎么说，斯大林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听到这话，宴会厅里的所有人都感觉很惊讶。我于是把这句话记下来了。回到编辑部以后，党中央来了一个电话，说赫鲁晓夫今天的讲话应当立即在《真理报》上发表。我之所以谈这件事情，是想说明，赫鲁晓夫当时并不希望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妨碍同中国同志的关系。我认为，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关系还是好的。

如果说到有什么事情曾经把赫鲁晓夫激怒过，那么，首先是中国方面宣布要比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这件事。再就是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的政策和反对苏联和美国之间建立好的关系。但这些都

是完全可以协调,可以解决的。可是后来双方争吵起来,骂起来了,这就无法挽救了。当时我和同事们曾经议论过,大家都认为,双方在互相争吵、互相骂的时候,中国方面骂苏联可以,骂苏联共产党可以,就是别骂赫鲁晓夫本人,骂他本人就完了,就无法挽救了。邓小平有一次在和苏联领导人谈话时也说过,可以骂刘少奇,骂周恩来,骂我本人,这都可以,但不能骂毛泽东,一骂毛泽东,双方关系就不可挽救了。这些是 ~~1956~~ 年代末 ~~1957~~ 年代初的大概情况。

赫鲁晓夫有时也会突然清醒,认为和中国人的争吵应当缓和下来。于是就下令,停止和中国人的一切争论。但是不久,我们从北京得到消息,说那里又在骂赫鲁晓夫了,管他叫“赫光头”。赫鲁晓夫听了以后认为不能再忍耐下去了,争论于是重新开始。双方几乎在所有方面、在所有层次上吵起来了。开始时,我们在写文章,起草决议草案时,上边曾经规定了一条,这就是无论如何不能污辱中国人民,不能否定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取得的成就。但是在做起来的时候,往往就忘记了这一条。有一次,我碰见一个报社的总编辑,问他为什么不遵守上边的这条规定?这个总编辑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者,他回答我说,规定是规定,但并没有给我直接的指示呀。这就像我们两个国家的许多官僚机构一样,做什么事情都容易走极端。一走极端,双方的争论就过头了。在这一点上,我们两国是一致的。

尽管赫鲁晓夫有时也说,我们两国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的因素要超过把我们分裂开来的因素,但是争论的“战火”还是越烧越大。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个人的特性,例如他的文化程度不高,还有就是办事过分的主动、过分的积极,好走极端,而这一切又都不能用理智来控制,就把事情变得越来越无法挽救了。

~~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结束以后,刘少奇在苏联继续访问,并在莫斯科举行了友好大会。会前,我们给赫鲁晓夫准备了一个讲话稿,当时赫病了,由别人代他来念。讲话稿中有这么一段话,大意是:俄国的沙皇和中国的皇帝可以吵架,但绝不能容许两国人民来吵架。刘少奇回国时,经过伊尔库茨克时,也讲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他说,我们永远不能容许任何人使中苏两国人民吵起来,也不能原谅挑唆我们吵架的人。刘少奇的这一篇讲

话是在中国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苏联的报纸上没有刊登。于是我们看到这篇讲话的人就在猜测，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到的“挑唆”和“不能原谅的”人指的是谁，是指赫鲁晓夫呢，还是指其他人。

第二个问题是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分歧是如何产生的。实际上，这一分歧的产生是很奇怪，也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一开始赫鲁晓夫总想讨好毛泽东。阎明复先生曾经谈到，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特意为他安排了非常豪华的房间和床，这实际上就是赫鲁晓夫讨好毛泽东的表现。但是他的讨好做得太过分了，反而引起了毛泽东的反感。我们把这个称作“傻瓜的服务”。

后来，双方在讨论会见的时间安排时，毛泽东提出，会见在凌晨三四点钟进行。赫鲁晓夫得知后又生气了，说不要再搞斯大林那一套做法了。斯大林时代就是半夜才上班的。类似这样的小摩擦说明他们在个性上有许多不相同的地方，逐渐积累起来就会爆发。而一旦超过了一定的界限，人们就无法相互尊重了。

在他们两人的不和当中，毛泽东比赫鲁晓夫要有修养得多。赫鲁晓夫是一个粗鲁的、没有太多教养的人。

主持人：很对不起，杰留辛先生，因为每个人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想请其他几位先生也来谈一谈。下面，先请李越然先生谈。

李越然：很高兴来参加这个会。我看了前面念到的几个书面题目，觉得这都是一些很大的题目。在这些问题上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看法。咱们今天来研究这些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大致有所了解。但是要把这些问题都说清楚，给所有的人一个满意的回答，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我很赞同邓小平同志的一段话，我认为这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领袖的见解，这段话是小平同志对来访的戈尔巴乔夫讲的：我今天不是谈我们过去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问题，如果谈这个问题，我们到今天也不认为我们当时讲的都是对的。至于说哪些东西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就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事情了。

我只能按照这个书面题目，讲一讲我的个人感受。像我这个年龄，直接参与过这个事情的人，可能不多了。在座的各位学者完全可以不同意我

的看法,还是中国的那句老话,“求同存异”吧。

我认为出这四个题目的人,他的头脑中就有一个框框,总是框在 1956 年的苏共二十大、1956 年的“共同舰队”、1956 年的“撤专家”,这些实际上都是人所尽知的事情。而中苏两党的分歧,在两党关系最好的时候,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就有。毛泽东同志性格中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敢于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对斯大林都敢于讲不同意见,至于对赫鲁晓夫如何,就不用我多作解释了。

1956 年的苏共二十大,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的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方式。毛泽东 1956 年在莫斯科的时候曾经讲过,赫鲁晓夫这个人很勇敢,揭开了许多压在人们头上的盖子。所以我觉得,在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批判他的错误这样的问题上,我们从来都是赞同的。但对斯大林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把斯大林骂成“希特勒”,我们则坚决不能同意。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共中央发表的那两篇文章,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相当负责任的。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当时中共所持的立场是正确的。因为在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做法,直接引发了“波匈事件”,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很大的思想混乱。

尽管如此,在 1956 年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的这个时期,中苏两党的关系基本上还是好的。毛泽东当时在会上的讲话是我给翻译的。我记得当时毛泽东曾经对坐在他对面的赫鲁晓夫讲过,赫鲁晓夫同志,你这朵花比我毛泽东的好看,我们就是来扶你的。另外,毛泽东在我们党内也曾经讲过,赫鲁晓夫这个人多灾多难,我们应该给他以相应的支持。所以,对于外界的一些说法,例如说毛泽东不尊重赫鲁晓夫,等等,我个人是不赞成的。

到 1956 年,赫鲁晓夫来中国谈“共同舰队”问题,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了。问题已经超出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一次的翻译是由我和阎明复两人担任的。毛泽东的讲话归我翻译,赫鲁晓夫的讲话归阎明复翻译。

赫鲁晓夫等人从北京南苑机场下飞机后,便直接到会场,我记得是在怀仁堂开始会谈的。会谈开始,寒暄一番之后,毛泽东就问赫鲁晓夫,你说要和我搞“共同舰队”,这是什么意思?赫鲁晓夫于是就开始解释,他当然

也有他的一套说法了。谈到一半的时候，毛泽东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说了大半天，还是不切题，我问你，到底什么叫“共同舰队”？你是不是要控制我们？你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好了！

主持人：李老，下面该请阎明复同志讲一讲了。

阎明复：我讲的比较简单。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毛泽东对苏共新的领导层有一个观察的过程。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认为，作为苏共这么一个大党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是不成熟的。对于苏共二十大作出的一些结论，毛泽东也是不赞同的。在 1959 年的莫斯科会议上，双方把各自的观点讲透了，于是，在互相让步的基础上达成了妥协。这样才产生了《莫斯科宣言》。

我很同意刚才越然讲的观点，即：1959 年发生的“共同舰队”以及类似的事情，使毛泽东感到，赫鲁晓夫仍在继续斯大林的那样一种把苏联的利益置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利益之上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1959 年赫鲁晓夫掌握实际权力以后，开始时曾经取消了一些斯大林时期对中国的平等的做法，像从旅顺、大连撤军，把中长铁路交还给中国，取消了在新疆的一些不平等做法，等等。对于赫鲁晓夫的这些做法，毛主席是满意的。但从“共同舰队”及其他事情开始，毛主席重新怀疑赫鲁晓夫是否还在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

从 1959 年开始，主席在国内实行越来越“左”的路线，集中的表现是在农村搞人民公社，在全国搞大跃进，搞三面红旗，等等，这些做法在苏联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瞧不起毛泽东，后来逐步升级。随着中苏关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像“炮击金门”，赫鲁晓夫对此与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对于中印边境事件，苏联则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庐山会议期间，赫鲁晓夫通知中共，拒绝提供制造原子弹的技术，而此时正值彭德怀元帅在庐山批评主席，还有就是这个时期，赫鲁晓夫推行和美国改善关系的政策，而中国当时则把美国当成头号敌人。1959 年赫鲁晓夫访美后，到我国来参加国庆 40 周年的庆祝活动。在国庆宴会上，主席原来准备讲话，后来拿到赫鲁晓夫的讲话稿，越然给主席翻译，里边有这样一段话，就是“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固性”，

主席当场就决定不讲话了，临时改由总理讲话。

此后双方进行了谈判。苏方参加谈判的是赫鲁晓夫、苏斯洛夫、葛罗米柯。会谈过后，苏方给我们来了一个通知，说这次谈判是很不愉快的，希望把会议记录销毁，不要留给我们的后人。我这里有一张照片，上边有参加这次会谈的两国领导人，我和越然作为工作人员也参加了。这是 1959 年我去莫斯科的时候，俄国朋友们给我的。在这次会谈中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其尖锐程度可能超过了历次会谈。我这一次来开咱们这个会的时候，陈兼先生告诉我，说苏共中央并没有销毁这个记录。现在这个记录在俄国的档案馆已经解密了。这就是说，他们让我们销毁，而他们自己却没有这样做。

1959 年初的华沙条约政治协商会议，康生去参加了。在这个会议的宴会上，赫鲁晓夫大骂毛泽东，从此以后中苏关系就不可收拾了。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看待 1955~1959 年的中苏关系。1955 年，经过大家的努力，莫斯科会议取得了比较圆满的结果。参加会议的刘少奇、邓小平在经过中央同意后，向苏联领导人表示，双方应努力改善中苏关系。正是中国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防止了双方在国际论坛上爆发新的争论。这些措施包括把在国际论坛场合，例如把在世界和平大会上的中方代表团撤回来，在裁军大会上，采取了同苏联完全一致的立场，等等。但是，事态的发展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暂时的休战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根本解决。所以，我认为，当时的改善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质性的。

李越然：我来谈一谈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如此互相不喜欢对方？在对方领导人当中，毛与赫比较喜欢什么人？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毛与赫的关系，不是他们两人之间谁喜欢谁、谁不喜欢谁的问题。因为他们是两个大党的领袖。赫鲁晓夫这个人我是 1956 年斯大林逝世之后，在莫斯科的圆柱大厅，陪同周恩来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时见到他的。1959 年他第一次到中国来时我也见过他。1959 年赫鲁晓夫做了几件很对的事情，刚才明复同志讲了，我不在这里重复。有一次，我参加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会谈，毛泽东说，我们很感谢苏共中央、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予我们的无私援助。这完全是毛泽东发自

内心的话。赫鲁晓夫听了以后，也讲了一句非常实在的话，他说，我们对中国的援助不是无私的，是有私的。因为我们援助了中国，中国强大了，反过来也就是对我们苏联的支持。这句话说的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我个人的看法，赫鲁晓夫是一个大国的领袖，他的思想很敏锐，反应也很快。我们确实应该把他作为一个大国的领袖来尊重他。我们也不应该笼统地随便地把他否定掉。但是，实事求是地讲，赫鲁晓夫同毛泽东坐在一起，他们不是同一水平的人。我说这个话，并不是出于一般中国共产党党员对毛泽东的思想感情。毛泽东同志有不少错误，我们不能把他的错误当作真理。但是，当他和赫鲁晓夫坐在一起，我给他们当翻译时，把他们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两人之间，在思想水平上的差距是很大的。

比如，~~1959~~年的会谈，有一次是在游泳池进行的。两人在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谈到国际关系的时候，赫讲，毛泽东同志，我们对欧洲的情况比较熟悉，你们对亚洲的情况比较熟悉，还是我们管欧洲，你们管亚洲吧。毛泽东马上摇摇手说，这可不行。

还有一次，是在 ~~1959~~年，毛泽东到莫斯科以后，见到赫鲁晓夫，就问他，其他的共产党代表团都来了吗？赫答：都来了。毛接着问：南斯拉夫代表团来了没有？赫答：没有。我们给铁托发了请帖，但他回信说不参加了。这样显得他很失礼，因为我们邀请了他。他如果真来的话就好了，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狠狠地批他一下。毛泽东说，这样不行。我们在兄弟党之间不能搞这个。南斯拉夫被共产党情报局开除了，斯大林整铁托整得够苦的了。铁托一肚子气，到这里来说一说，大家沟通沟通，交流交流不是很好嘛。实际上，毛泽东只差一句话没有说了，这就是：我支持你，但是你绝不能再搞斯大林那一套了。这件事也反映了赫鲁晓夫愚蠢的地方。

主持人：下面请库里克先生谈。

库里克：谈一谈第一个问题，即中苏分歧产生的原因。中国有这样一句成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里就出现问题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分歧？为什么会在 ~~1960~~年代中期产生如此尖锐的分歧？应该指出的是，这一分歧正是两国关系发展到顶点的时候产生的。当时，相互之间的协议在一个接一个地顺利签署，成百个建设项目的协议在一个一个地付诸实施。

文化方面的各种交流也很频繁。突然,像晴天的响雷一样,双方出现了分歧。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我在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了 16 年,其中 12 年是在中国处担任处长。在这 16 年当中,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找到答案。曾经有过各式各样甚至异想天开的设想。其中之一是:双方根本没有出现分歧,而两国领导人达成了协议,要作出一种出现分歧的样子给西方人看。这个设想当然是很天真的。但是实际上,西方人确实很长时间不相信中苏两国会吵架。

许多人都曾经提出关于中苏分裂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如领袖欲望的竞争啊,经济交流关系的不平等啊,等等。事实上,我们的领袖们也不一定清楚关系恶化的原因。我听说,有的时候,赫鲁晓夫本人也很懊丧,他曾经在自己身边的小圈子里抱怨过,中苏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后来担任总理的柯西金,他的文化程度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比赫鲁晓夫要高。1952 年,柯西金曾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去越南的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我也是这个代表团的一个随行人员。我知道的很确切,离开莫斯科之前,没有任何到中国去的设想。从河内回莫斯科的路上,因为飞行技术上的需要,我们中途在杜尚别作短暂停留。因为是去参加葬礼,这一次的河内之行并不好受。大家都感觉累了,想放松放松,喝点啤酒之类的。当时柯西金在另外一间房子里,不在场,我们则围着桌子坐下来,把酒瓶子打开了。突然,这个时候,柯西金进来了,向大家宣布:大家马上集合,到飞机场去。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已经起飞了。在飞机上,大家都很奇怪,我们这是往哪儿飞呀?说是到伊尔库茨克。原来计划是回莫斯科,怎么又到伊尔库茨克去了?柯西金这时把贾丕才叫过去,他当时是苏联外交部的第一远东司司长。这以后,大家才知道我们这是在向中国飞行。本来,柯西金想在河内的时候会晤周恩来的,但不知为什么没有会见成。于是,他就从河内打电话给勃列日涅夫,请示他,说是他在河内没有能够和周恩来会面,因此想到北京去谈判。当时除了谈判,没有别的出路,两国不能老打仗啊。柯西金叫我们几个人准备一下材料,主要是边界问题。到了北京,在飞机场举行了会见。周恩来对谈判作了全面而充分的准备,而我们则只

能是准备了什么谈什么。

很抱歉，我谈了这么多，应当把话题回到分歧的起源。我想说明的是，像柯西金这样聪明的最高领导人，也不能理解分歧的实质。谈判开始以后，先谈边界问题。谈完以后，柯西金就指着我们，包括我和贾丕才等人，对周恩来说：是他们把事情搞坏了。像咱们这样高级别的领导人，所有的问题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得到解决。让我们把所有的分歧都装进麻袋里，扔进黑龙江去怎么样？周恩来在各个方面比起柯西金来都要高明得多。柯西金讲这些话时，周恩来始终装作没有听见。

中苏分裂的原因，大家找来找去，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应该说，大家还是找到了一个原因，这就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双方对于时代的性质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个很好的解释，但也还是有缺陷的。无法让人理解的是，这些意识形态的分歧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这就复杂了，变成了一个寻找原因的原因。为什么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突然间会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去呢？讲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两个党交锋的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大家都知道，苏联共产党早在1917年就取得了政权，而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也有许多年了。对于两个已经取得了政权的政党来说，为什么这一过渡的形式问题竟成了他们争论的焦点了呢？

如果我们是去寻找真正的深层的原因，而不是表面上的原因的话，那么，有很多问题，应该是可以找到答案的。当然，两国领导人的个性，还有一些其他原因都曾经起过作用，而且在一定的时期还可能成为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认为，如果要寻找真正的深层原因，那么，就需要了解一个非常简单的真理，我想所有的人都不会反对这个真理，这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是取决于它的对内政策的。根据这个真理，两国之间的关系恶化、争论的原因，应当从中国的内政和苏联的内政中去寻找。那么，这个时期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呢？应该指出，恰恰是在1960年代，在两国发生争论的这个时期，两个国家的内政越来越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我在这里仅仅提出这样一个设想。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在这里发挥了。

主持人 我们怀着极大的敬意,对于你们四位的精彩发言,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请在座的各位中外学者向四位先生提出大家所关心的其他问题。

问 刚才谈到“共同舰队”的问题,这给当时的中苏关系造成了极大的紧张。现在看来,这种紧张实际上同事情本身并不相符。我的问题是,当时苏方是否作出过努力,向中方进行解释以消除紧张?

库里克 这个问题刚才杰留辛先生已经讲了一些。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们苏联没有一种导弹能够打到美国的西海岸,军人们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想搞一个舰队,舰队要停泊在中国的沿海。这样就可以对美国实施导弹袭击。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个长波的电台。这在当时是一个设想,军人们想作这方面的准备,必要时就采用。如果这个设想能够实现的话,我看就不会出现后来加勒比海的危机。因为如果当时有这样一个舰队,就不需要把导弹运到古巴去,从中国的沿海就可以打到美国。事情是这样提出的:军人们用他们的那种心态,建议领导直截了当地提出来,即:搞一个舰队,搞一个长波电台。长波电台由我们百分之百投资。毛泽东对这件事情非常愤怒,他把苏联的这个建议当作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一种侵犯。但是苏联考虑这个舰队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考虑中国,考虑的是美国。赫鲁晓夫于是就把责任推到军人身上去了,说:我们并没有这么想。毛泽东听了以后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之间的乌云就散掉了。赫鲁晓夫赶快说根本没有乌云嘛。

我觉得以上所谈的事情,不过是一个插曲。大家都是历史研究工作者,不必把过多的精力花在这些插曲上。从历史上看,当时的许多吵架都被看成是事件,而其实不过是插曲。当然,刚才谈的这个事情,恶化了苏中关系,但它不是苏中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阎明复 我想对刚才库里克先生的发言作一点补充。我和越然都是中苏高级谈判的参加者。“共同舰队”的问题是尤金大使转告的。毛主席直接和尤金谈了两次,后来又指示少奇、总理、小平和尤金谈了一次。当时还没有提到长波电台的事情。后来,赫鲁晓夫来了。在和毛泽东、邓小平的第一次谈判中,赫鲁晓夫就说,他完全没有建立“共同舰队”的设想,这件事

是被尤金搞错了。很可惜当时尤金吓坏了，病倒了，被抬回莫斯科，因而没有参加这次会谈。

问：西德总理阿登纳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谈到，在他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赫鲁晓夫曾经建议他联合起来对付“黄祸”，即对付中国。请问两位俄国学者，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

库里克：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个文件可以证明这是历史事实，但是我也没有根据指控阿登纳先生在撒谎。我个人认为，赫鲁晓夫是有可能这样说的。赫鲁晓夫有许多著名的语录，比如说，他非常热衷于种玉米，甚至说，在北极圈里都可以种玉米。他向阿登纳提出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同他提出在北极圈种玉米一样，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再来谈谈这个问题。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如果大家相信这一点的话，怎么可能由它的领导人向阿登纳建议，使这两个国家结盟来反对中国呢？

问：1959年，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曾经和毛泽东在台湾问题、美苏会谈问题、中印边界等问题上发生了更为激烈的争吵。后来，根据双方的协议，应当销毁谈判记录。据我所知，中国方面没有保留这个谈判记录，而苏联方面则好像并没有销毁。能否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一次谈判的情况？

李越然：记录销毁没销毁我不知道。但只要人还在，就毁不掉。关于这次谈判，有必要回忆一下当时的历史事实。我读过《赫鲁晓夫回忆录》，赫鲁晓夫在这本书里任意胡说。其中，他这样写，在两党的政治局会谈上，陈毅元帅骂了他。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赫鲁晓夫这一次来华，是为了参加建国五十周年的活动。他是访美之后直接来的。当时，苏美正在宣扬所谓“戴维营精神”，全面缓和苏美关系。我清楚地知道，赫鲁晓夫改善苏美关系，我们党并不反对。在会谈中中方也谈到，你们改善和美国的的关系，这很好嘛。你们两个大国的关系应该有所改善。那么，我们反对的是什么呢？我们反对的是，苏联不管搞什么，也要求中国跟着这么搞。这是我们反对的，因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美之间有其关系当中的问题，与苏美关系不一样。

有什么事实可以证实赫鲁晓夫曾经要求我们迎合他们的需要呢？我们这些参加过当年会谈的人还在，可以回忆当时的历史事实。例如，赫鲁晓夫曾经在会谈中谈到西藏问题，他指责中国领导人，为什么把达赖喇嘛放跑了？周恩来当时回答并驳斥他说，这不是看住看不住一个人的问题。这么长的边界，怎么能保证一个人都不跑出去呢？这是一个爱国不爱国的问题。再如，在会谈中，赫鲁晓夫还谈到了中印边界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印度是入侵，我们是反侵略。而赫鲁晓夫却指责中国领导人说：你们看到我们怎么处理同阿富汗的关系了吗？把那些荒无人烟的地方让给他们不就完了嘛。并对周总理说，你是一个大外交家，你难道对这一点都不清楚？你们非要得罪尼赫鲁。得罪尼赫鲁就得罪了一大片。赫鲁晓夫在谈问题时，根本不尊重中国的立场，完全不从实际情况来谈。

在谈到我们往金门、马祖打炮的问题时，我们一再强调，这是中国的内政。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这是我们一个战略上的考虑。我们也早就这个问题向苏联方面通报过。赫鲁晓夫却一再说，他不同意中国的这个做法，认为这样做是很危险的，等等。谈到这里，陈老总开始发言了。他说，炮轰金门、马祖，这是我们的内政问题。赫鲁晓夫同志，你管这些干什么？你是不是想替国民党说话呀？赫回答说，陈毅同志，论军衔，你比我高，你是元帅，而我只是一个中将。但是我在党内是总书记。各位学者可以想一想，在两党政治局成员参加的严肃的会谈上，赫鲁晓夫说这样的话合适吗？

刚才有一位学者谈到 1959 年 7 月的会谈。这次会谈的翻译是由我担任的。这是在莫斯科，周总理与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进行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之前，周总理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周总理指出，在波匈事件的时候，你们对波兰的态度是错误的，是大国沙文主义的。动不动就要调动军队，这是不应该的。赫鲁晓夫不接受周总理的批评，坚持为自己辩解。这样就没法往下谈了。代表团往国内打电话，毛主席亲自作了指示。这个电话是我接的，毛主席说：告诉总理，我们劝他一下就行了，听不进去就算了。

后来，赫鲁晓夫在和毛主席的一次会谈中，曾经说：1959 年的时候，你们派周恩来给我们上课来了。周总理回答说，不是我们给你们上课，而是

实事求是，有意见都摆在桌面上来谈。周总理还针对赫鲁晓夫挨个说兄弟党坏话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赫鲁晓夫不承认他讲过这些话。

归纳起来，我认为，赫鲁晓夫 1959 年的中国之行，从他的言行来看，是充当美国的说客，是想说服中国和他们一道同美国改善关系。这一次的会谈，双方争吵得很厉害。毛主席的讲话不多，我记得，他对赫鲁晓夫讲过这么几句话：赫鲁晓夫同志，你这一次来，给我们带来了几顶大帽子。既然如此，我也送你一顶吧，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问：我想请杰留辛先生谈一谈，在苏联的档案里是否有关于 1959 年苏联试图对中国施行核打击的记载？

杰留辛：我当时不在中央工作了，看不到有关的文件，不知道你问的这件事。

库里克：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包括看到的文件，可以肯定地说，当时没有讨论过这件事情。退一步讲，如果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么不仅我作为国际部的中国处处长不知道，恐怕连一些政治局委员都不会知道。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是在苏联境外，有人在散布这样的谣言。

问：刚才杰留辛先生谈到，当时从北京传来的消息，说那里把赫鲁晓夫称作“光头”，使赫大为光火。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事情，曾引起赫的愤怒，或者有没有引起毛泽东生气的事情？

库里克：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类似骂赫鲁晓夫的报告，只有他本人才能看到，我们是看不到的。在莫斯科流传着这样的话：在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不算，他既不是理论家，也不是哲学家，只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赫鲁晓夫听了这些话以后非常生气。另外就是在中国搞人民公社的时候，在莫斯科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赫没有找到这条道路，这很不好。我个人认为，赫鲁晓夫之所以要召开二十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想借此来说明，他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阎明复：我插几句话。在莫斯科，我们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在住所常常不讲赫鲁晓夫，而讲“光头”。有一次，有一位苏联的工作人员，我记得叫拉

西莫夫,他问我:“光头”是什么意思?我一听就明白了,因为在我们住的地方都安装了窃听器。后来到中国大使馆,我向邓小平同志汇报了这件事情。小平同志听了以后生气了,说:谁让你们管他叫“光头”?以后谁也不许再叫他“光头”了。

这个故事的专利权可是属于我的啊,我写到回忆录里之前,你们可都不许用啊。(笑)

主持人:下面,请杰留辛先生再补充讲一讲。

杰留辛:我只想补充一句。我不知道李越然先生和阎明复先生今天有什么感觉,我的感觉是我好像坐在了被告席上。(笑)

问:刚才库里克先生讲到,对于中苏冲突究竟为什么发生,他们感到不知所措。不知道在中国方面是否有同样的感觉?或者反之,中方对此早就胸有成竹?

阎明复:我来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中苏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赫鲁晓夫奉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它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利益。1956年以后,赫鲁晓夫一次又一次地对我国采取施加压力的步骤。邓小平在1983年12月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曾经谈到,在中苏两国关系和两党关系的问题上,我们有不平等的,甚至是屈辱的感觉。今后,随着苏联档案的不断解密,大概到1992年,大家就会看到一份苏联官方在1956年的材料(保密期一般是100年)。这份材料对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作了很肯定的评估。到那个时候,大家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苏联官方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这份材料的确切内容我不清楚,但肯定有这份材料。在材料中,对中苏双方都作了批评,但是更多的,则是从苏方的角度来检查中苏关系恶化的结果,并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就是与中国闹翻,这是苏联卫国战争以来最大的外交错误。

问:195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有所改善,这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的,还是在其他人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没有干预的情况下进行的?

阎明复:我在今天一开始讲的时候,就谈到了这样一点:我是一个翻译,我参加过中苏在五六十年代的高级谈判,但我不是决策人。所以许多问题我不可能作出准确的答复。但是,你可以想一想,1956年底,莫斯科

会议以后，王稼祥同志提出来一个论点，康生后来概括为“三和一少”。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的呢？是从莫斯科裁军会议开始的。后来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在北戴河会议上，主席对此进行了批判，并且提出要调查，怎么形成了这条路线？

1959年莫斯科会议开得比较成功。少奇同志与赫鲁晓夫有一个谈话，大意是以后有什么事情双方一起来商量，避免冲突，等等。这样，代表团回来以后，就按照这样一个精神来执行了。从这个情况看来，当时主席批评王稼祥，同时也是针对刘少奇的。

问：1959年 9月，苏共中央曾向中方提出几点要求，包括：通过中国的铁路运送一个旅的战斗部队到越南去；在中越边界开辟两个机场供苏方使用；开辟空中航线运送苏联飞行员、物资；等等。我想了解，苏方提出这些要求是出于什么考虑？是想试探中方的对苏态度呢，还是明知道当时中方不会同意，而借此来挑拨中越关系，或者是第三个原因，就是真想和中国联起手来支援越南？

杰留辛：我来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需要帮助越南。在赫鲁晓夫时代，是否帮助越南，赫鲁晓夫是持犹豫态度的。他下台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决定加强对越南的援助。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和美国发生冲突。在当时的情况下，很自然的一个办法，就是通过中国的铁路和中国的航空通道，给越南提供援助。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曾这样想过，对越南的共同援助，可能会改善中苏两国的关系。因为这是和帝国主义进行的斗争。因此我们认为能够和中国找到共同的语言，找到一致的地方，来帮助越南。但是当时中国方面答复说，不愿意通过中国的领土来运送物资。得到这个答复以后，莫斯科猜想，这是中国想让苏美之间发生冲突。但我们并不知道中国方面拒绝通过中国领土运送物资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问：请问杰留辛先生，刚才您谈到的这些内容，是您个人的看法呢，还是当时您接触到的苏共中央领导人的看法？

杰留辛：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这些内容都是在当时的苏共中央国际部内部讨论过的。因为当时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中国方面拒绝了我们的

要求。

问：1959年赫鲁晓夫下台。我觉得这是中苏论战以来双方惟一有可能改善关系的机会。但是中国代表团访苏回来以后很失望，因为苏方没有表示出任何改善关系的希望。我不知道当时苏联领导人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据我看，我觉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苏联当时把同美国改善关系放在了首位。

问：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改变了赫鲁晓夫对越南的态度，加强了对越援助。当时苏共中央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两种可能性：其一，赫鲁晓夫没有全力援助越南，是因为怕引起同美国的冲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勃列日涅夫在确定援越时，已经决定了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进行争夺的方针？其二，这是否意味着是勃列日涅夫针对中国，想通过援助越南，在中国的南方确立他的势力范围？

杰留辛：赫鲁晓夫时代也曾援助过越南，但是规模不如后来大。无论从援助的规模还是从数量上看，赫鲁晓夫下台之后都大大增加了。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苏联领导人是否想改善对中国的关系？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应当顺便说一句，涉及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不能用“真诚”这个词。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对待新的领导人，我不用“真诚”，但可以用“严肃”这个词，他们是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情，是想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的。可以举很多例子。当时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有可能导致同中国的关系得到改善。特别是在党的一些会议上，在讨论赫鲁晓夫辞职的问题时，许多人都认为，与中国关系恶化的根源在于赫鲁晓夫。因此，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这不仅是苏共新领导人的意见，也是许多基层党组织的意见。这是必须要考虑到的。

十月革命节前夕，曾经考虑过派遣一个什么样的代表团去中国参加那里的庆祝活动。当时，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节，双方都是采取互派代表团的方式。赫鲁晓夫下台前，总是派一个次要的人率领的代表团到中国来参加庆祝活动。赫下台后，决定派遣当时的交通部长别谢夫率团来华，当时党中央给他指示，叫他在和中国同志谈话当中应当强调苏联新领导人的想改善苏中关系的意图。因为派遣这个代表团时，苏方还不知道，中方将

派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苏联参加庆祝活动，因此希望代表团在中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可以进行有关的谈判。后来得知周恩来将去莫斯科，别谢夫自然也就没有谈判的任务了。我当时也是这个访华代表团一个成员。代表团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参观和访问。我记得，当时在湖南同张平化，在上海同曹荻秋的会谈当中，他们都非常关心改善同苏联的关系问题。他们说，这是一场大的误会。我们也谈到，我们对于两国关系的恶化感到很难过，我们想尽一切努力来改善两国关系。

后来，大家都知道，在莫斯科发生了一个事件，即：我们军队中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宴席上讲的那番粗鲁的话。这就是说，大家都在讨论如何改善两国关系的时候，来了一个混蛋，他的一番粗鲁的讲话，就使得所有的事情都往后推了。我们当时曾经建议写一个材料给中央，谈一谈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中苏关系建设方面混蛋所起的作用，题目可称“试论混蛋的作用”。（笑）安德罗波夫不同意写，说现在还不到时候。

库里克：我想补充讲两句。马利诺夫斯基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觉得，不完全是这个事件影响了我们两国关系向好的方面转化。我记得，当时周恩来到莫斯科时，带来了一些要求，这些要求几乎就是要苏联领导人投降。具体说就是要求苏共放弃执行赫鲁晓夫时期通过的党纲。但是我们不可能这样做，不可能因为撤换了领导，便因此而改变党纲。

阎明复：会谈的时候我在场，我是翻译，周总理并没有提出要求苏共改变党纲。

我记得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总理到了以后，苏联领导人到别墅看望他，先是互相寒暄，然后总理说：我们了解一下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他们回答说：以后有机会再谈吧。但后来实际上一直也没有谈赫下台的真正原因。紧接着就是参加十月革命节的活动，红场检阅，晚上宴会。宴会是在一个大厅里，主席台的前面是一个大的桌子，领导人都围着桌子站着。另外一个桌子的旁边站着苏军的元帅和将军，总理看见后，就对贺龙说：我们过去给他们敬敬酒。因为周总理、贺老总同他们都很熟悉。

周总理、贺老总过去以后，和军人们谈得很高兴。这时，马利诺夫斯基

从另外的一个地方走过来,贺龙看见后,就说:来,来,干一杯,为我们的友谊干杯。马利诺夫斯基这时就说了那一段话: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赶走毛泽东!我翻译了以后,贺龙就跟他吵起来了。然后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马上向勃列日涅夫提出了抗议。勃列日涅夫说马利诺夫斯基喝醉了,总理说,这是酒后吐真言。

周总理并没有要求苏方放弃纲领。当时确有一个大的分歧,这就是:赫鲁晓夫在台上的时候,曾经提出要召开兄弟党的会议。苏联新领导人也坚持要开这个会议。总理反对,认为这个会议只能开成一个分裂的会议。

周总理从这两件事情,一个是马利诺夫斯基要求我们推翻毛泽东,再一个就是苏联新的领导坚持赫鲁晓夫提出的召开兄弟党会议的主张,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苏联新领导人执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后来,当双方争吵得很厉害的时候,米高扬自己也谈到: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我们与赫鲁晓夫没有区别,甚至没有细微的区别。

杰留辛:当时的情况很复杂。阎明复讲的是对的。周恩来没有直接提出改变党纲的要求。从我们那时得到的消息来看,中国方面认为,苏联新领导人把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归罪于赫鲁晓夫,并认为这是导致赫下台的原因。实际上,当时中国领导人并不清楚赫鲁晓夫被撤职的真正原因。他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赫鲁晓夫反对中国的方针上,认为他是因为这一点而被撤职的。

至于说要求苏联党改变党纲,这是毛泽东 1956 年在对柯西金谈话时谈到的。据我所知,苏方翻译顾大寿的记录上有这一点。当时柯西金说,我们不要这样无休止地争论下去了。毛主席讲,这种笔墨官司,打一万年也可以嘛。

主持人:今天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下面还有几位同志要提问题。请抓紧时间,简单地提出问题。

问:1956 年,林彪摔死在蒙古以后,苏联高层对此有何反应?

库里克:当时,首先是没有闹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谁摔下来了。因为不久以前,在中国对林彪还是大加赞扬的。我们感到最为庆幸的,是林彪没有真的飞到苏联来。

问：那么，你们什么时候确切地知道，摔下来的是林彪呢？

库里克：林彪曾经在苏联治过病，做过牙的模型。后来，我们派了一批医生去那里，给他作了整个尸体的检查，并最后根据牙的模型，确定他是林彪。

杰留辛：派去的一组医生对尸体进行了分析，然后把他的头给割下来了，运到莫斯科，拿到林彪当年治过病的医院进行对照。主要的根据，就是刚才库里克讲的，根据牙的模型。

李越然：刚才在座的学者、专家们都采取了认真细致的回顾历史的方法，对中苏关系的这一段历史进行了讨论。但是，我有一个感觉，不一定对，这就是：好像一定要找一个非常准确的，既符合历史事实，也符合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关于中苏关系从友好到破裂的原因。我个人认为，这个原因是很难找到的。因为中苏两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这两个人的特性，以及围绕他们引起的这些问题，都不是从哪一个事件中可以得到说明的。

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呢？赫鲁晓夫自从 1959 年 9 月担任了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一开始，对于中国问题还是比较重视的。他首先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太不了解了。

反过来看，对于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作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我们也缺少思想准备。

我在这里想要纠正一个不正确的说法。有人说，为什么 1959 年中苏争吵得那么厉害，赫鲁晓夫跑到中国干什么去了？他们说，赫鲁晓夫是为了反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而去的。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在那一次谈判中间根本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后来在游泳池的时候，赫鲁晓夫曾经对毛泽东说过：在斯大林的问题上，你们中国党内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刚开始时你们支持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毛泽东回答他说：并不是这样。我们支持你们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这个立场从来没有改变。但是，不同意你们对斯大林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做法。你要知道，斯大林的问题，不是你们一家的事情，而是一个国际现象。如何对待斯大林的问题，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局。赫鲁晓夫听了

以后,说:那你们为什么往我的后院扔石头?毛泽东回答说:赫鲁晓夫同志,我扔的不是石头,我是往你脸上抛金子。赫回答:别人的金子我不要。毛泽东说:要不要是你的事,抛不抛是我的事。

还有一件事。在两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会议上,苏共中央都挑起了一个争论,这就是,中共之所以要和苏共争论,就是要和苏共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我一直到现在也认为,这个论点是完全错误的,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总归一句话,赫鲁晓夫太不熟悉毛泽东了。比如,1956年,当时两党的关系还不错的时候,赫鲁晓夫就在毛泽东访苏时,在毛泽东的面前大反斯大林,指责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时期,有这样的错误、那样的错误。他打给斯大林多次报告,而斯大林根本不听,只听别人的,等等。他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指望毛泽东迎合他几句,也批判斯大林。根据我准确的回忆,当时赫鲁晓夫讲这一番话的意思很明显,这就是,如果让他指挥的话,卫国战争初期就不会遭到失败。毛泽东这时吃完了饭,回答他说:赫鲁晓夫同志,我已经吃饱了,你的南方故事讲完了没有?

卫国战争时期,赫鲁晓夫是南方战线的政治委员,仅仅是一个中将,但在毛泽东面前,偏要显示自己军事上的“才能”,这未免也太缺乏自知之明了。

这样两个人,在遇到重大原则分歧的时候,怎么能够谈到一块去呢。

主持人:各位学者,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讨论会就开到这里。谢谢四位先生,谢谢大家。^①

(原文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4期,收入本书时整理者作了补充与修订。)

^① 以上对话英文翻译均由陈兼先生担任。杰留辛先生和库里克先生的讲话,由阎明复先生亲自担任翻译。

对 1962 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

——来自中国新疆的档案材料

当代中国研究所 李丹慧

员

1962 年春夏，正值中苏关系紧张之际，在中国西北边疆的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及所属塔城地区，发生了大规模边民逃往苏联的所谓伊塔事件，远万多中国边境居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非法越过边境前往苏联。在此期间，缘月 18 日，煽惑、裹胁边民出走的少数坏人还煽动群众，在自治州政府所在地伊宁市冲击州人民委员会，围攻伊犁区党委^①，进行打、砸、抢活动。造成这起中苏关系史上重大事件的历史背景和根本原因是什么？三十多年来，无论是苏联、

^① 1962 年 7 月中共伊犁区委员会成立，受新疆分局领导，下辖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个地委。1962 年 8 月伊犁区党委撤销，伊、塔、阿地委改由新疆分局直接管辖。1962 年 10 月中共伊犁区党委重新成立，伊犁地委撤销，伊犁区党委下辖塔、阿两地委和原属伊犁地委的 10 个县党委，及代管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州委的工作。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 1966 年“文化大革命”。见中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委员会党史委编：《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上册，105 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年；伊犁自治州党委组织部、党史委、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自治州组织史料》，120 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 年。

西方,还是中国的学术界和历史学家,由于有关档案材料的缺乏,对这个问题或未能展开比较深入的论析,或是只能通过推断进行讨论。^①

今年 8 月,笔者与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沈志华先生为研究战后中苏关系问题,专程到新疆查阅资料,在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和伊犁自治州档案馆看到了有关这次事件的很多材料,并就一些问题采访了当事人和知情人士。由此,对 1959 年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边民外逃苏联这一事件发生的过程及根本原因,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现依据所掌握的材料,从历史根源、苏侨问题、国内因素和苏联因素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历史根源 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及边境问题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位于新疆的北疆地区,其西北、东北分别与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以及蒙古国为界。1955 年 9 月,伊犁哈萨克自治区成立,后改区为州,行政区包括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专区和直属奎屯市共 8 个县,并代管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全州面积 16 万平方公里,现有人口 160 万。^②

苏联对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可以远溯至沙俄时代。早在 1851 年,沙皇政府就通过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取得了在伊犁和塔城等地成立贸易圈、通

^① 1989 年 8 月,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和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一次“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挪威诺贝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奥·韦斯塔(许浩考,原名辛德)就其提交大会的论文《苏同盟是如何瓦解的?——政治、饥荒与难民》中有关伊塔事件的问题,提请与会学者讨论。韦文引用苏联大使给中国政府的照会等俄国解密档案描述了事件的起因和过程,认为事件发生的背景在于大跃进政策所造成的自然灾害和饥荒,是中国错误的国内政策使然。1959 年春天便已出现了大批边民越境的情况。最大规模的逃亡发生在春季,是因为漫长的冬天耗尽了当地边民的口粮,而且,中国边防军人从边境撤出,留下大片无人看管地区,有意协助边民外逃。据说,这种看法在西方普遍存在。

^② 中共伊犁州委党史委编:《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上册,158-159 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沿革》,15 页,中共伊犁州委党史委,1988。

商免税、设立领事馆、领事裁判权等特权，将其经济势力迅速扩展至中国新疆的天山南北。此后，沙皇政府通过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界约，侵吞了中国西部边疆的大片领土。^①沙皇的军队还曾于1871年进犯伊犁，而且驻军固尔扎（今伊宁市）达十年之久。沙俄的这种侵略行径造成了新疆伊犁、塔城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分离。1881年圆月《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前后，由于沙俄政府的策划和裹胁，到清政府接收伊犁时，该地区1万余中国维吾尔、回、哈萨克等族居民，已有苑万人左右“迁入”俄境；在1881年到1884年短短3年内，伊犁各族民众被胁迁而去者竟已十之六七，达1万余人。^②由此，伊犁境内的各民族，特别是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等民族，与沙俄境内的一些民族形成了部族及血缘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在经济、思想和文化上保持着长期并且是极为紧密的联系。

上述这种状况，为以后苏联在新疆，特别是在伊犁的特殊地位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首先，苏联长期以来关注新疆，虽然其政策时有变化，但始终不忘对新疆，特别是对伊犁施加政治影响。

从19世纪80年代起，由于斯大林在对外战略上基本继承了老沙皇实行扩张、建立缓冲地带的传统做法，苏联继续加强了对中国新疆的渗透；并在1930年代中期，通过全面援助和支持新疆的盛世才政权，排除以往英、日等国在新疆的影响，把新疆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初战失利，盛世才转而投靠蒋介石，采取种种措施迫使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全部撤出了新疆。但随欧洲战场的局势发生根本性转变，1945年夏，苏联又开始重新染指新疆，在酝酿与中国进行建立友好同盟关系的谈判时，一方面向蒋介石作出某种友好的表示，特别是表明苏联不支持中共的立场，一方面为在谈判桌上取得预想的收获，于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策动和支持少数民族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暴动。

① 有关条约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新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

② 《1881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载《新疆日报》，伊犁州公安局史志办，1985年。

三区革命时期,苏联对伊、塔、阿地区的政治、军事控制十分明显。苏方不仅掌握着三区的政权机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派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或顾问,而且还在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中大量发展情报人员,秘密搜集各种情报;三区民族军内部自 1950 年至 1951 年,排以上的军官均由苏方配备。^①

1950 年 8 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苏联为进一步加强对新疆的控制和影响,放弃支持新疆建立独立国家的方针,在幕后导演了三区政府与国民党新疆政府的和平谈判,促成了 1950 年 10 月和平条款的签字。此后,苏联虽然表面上全部撤走了苏联在三区政府部门的官员、顾问以及军队的军官等,却将大量情报人员和秘密警察派进该地区的军政各部门,建立了军事情报组织。苏联不仅保持了对该地区的紧密控制,而且还绝对排斥各种外来势力的渗透,甚至包括中共的力量。三区依然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以致 1951 年一批汉族革命者进入伊犁时,感觉就像到了外国,到了苏联一样,“苏联领事馆实际上决定着那里的一切”^②。

1951 年初,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苏联为保证其在华利益,再次调整对新疆的政策,建议新盟友中共迅速占领新疆,并在新疆和平解放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结果是,斯大林在与新中国的对话中,依然保留了对新疆问题的发言权。1951 年末至 1952 年初中苏两国谈判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期间,苏联在最后阶段要求中国签订了一个《补充协定》,其意图是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排除第三国势力,以此消除西方势力对中国新疆和东北的渗透,从而在 1950 年代,巩固和加强了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及特殊地位。^③

其次,苏联通过发展苏新贸易和苏侨企业,不断加强对新疆的经济渗透和经济影响。

在盛世才统治时期,苏联与新疆的贸易有了长足发展。据苏联海关的

① 《1950 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 猿页。

② 沈志华 1995 年 8 月 猿日采访原伊犁州统战部部长陈锡华记录。

③ 关于苏联对新疆政策变化最新研究,参见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9-1952)》一文,载《近代史研究》1995(3), 144-146页。

统计数字显示，1950年新疆对苏联出口货物为 2000 万卢布，从苏联进口货物为 1000 万卢布，到 1951 年分别增长到 2400 万卢布和 1400 万卢布，苑年中双方贸易总额增长了近 2 倍。^① 尽管由于苏德战争爆发和盛世才实行反苏政策，苏联对新疆的经济影响曾一度跌落，但以后不久，随着三区革命爆发和苏联势力卷土重来，苏联在新疆，特别是伊犁，再次加紧经济渗透。在支持并援助三区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同时，苏联开始着手在伊犁建立各种商贸公司和情报机构，搜集经济情报，垄断市场，进而掌握了三区的经济命脉。以至新疆和平解放后，苏联驻迪化领事馆竟一再建议中国政府将新疆省会确定为伊宁。其理由之一便是“新疆经济的改善主要靠的是苏新贸易的发展”，而伊宁是“苏新贸易的重要通道”。^② 到 1951 年，苏新贸易总额仍保持在 2000 万卢布，“当时新疆几乎所有的工业用品都是从苏联进口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 1950 年代中期。^③

此外，伊犁苏侨企业的发展也加深了苏联对那里的经济影响。全国解放后，当地的苏侨协会不断开办工商企业。据不完全统计，至 1951 年，伊、塔、阿地区苏侨协会开办的工商企业，资金即达 1000 万元。苏侨协会的商贸组织相当庞大，在解放初期，仅伊犁的机构即有职员百余人，并在乌鲁木齐、兰州、上海等地设有商业代办处。这些企业占有与苏联外贸机构直接订货和贸易往来的便利条件，在当地商业方面占有很大比重，几乎垄断了伊宁市场。^④ 显然，这样一支实力雄厚的经济力量，必定会对当地人民的经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苏联对新疆，特别是伊犁，有着深厚的思想文化影响。

如果说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可以因政策改变而消除，那么思想文化的影响则是难以挥之即去的。苏联对新疆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突出表现在

① 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950—1951 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 年。

② 邓力群致中央电，1951 年 10 月 10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 100 目录 猿卷号 猿猿—苑页，笔者 1982 年 10 月 15 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③ 厉声前引书 200 页；沈志华 1982 年 10 月 10 日采访伊犁自治州原机关党委书记李向庚记录。

④ 《伊犁自治州外事志》，伊犁州外事办史志办公室，1982 年。

文化教育事业上。在伊犁地区,从三区革命时期起,中小学少数民族学生所使用的教材就是苏联版本的教科书。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后沿袭下来。1956年 7 月,赛福鼎参加《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回国途经阿拉木图时,曾要求苏方为新疆少数民族提供中小学课本。苏联即把他们的学生课本直接翻印后交给中方,而通用的苏联课本上写着“祖国是苏联”、“首都是莫斯科”等,甚至把新疆说成是“东土耳其斯坦”。如此,三区少数民族的中小学生学习伊始,实际上接受的即是苏联的国民教育。这种教材直至 1956 年才全部得到更换。^①

民族语言的翻译工作薄弱,民族文字的刊物极少,致使伊犁等地区的民族群众在既不懂汉文,又看不到本民族文字书报的情况下,只有去看苏联提供的大量斯拉夫文的报刊杂志。塔城地区直至 1956 年,还有苏联的书报、杂志 10 余种。^②此外,在 50 年代,苏联方面还通过新疆各地的苏侨协会,利用各种手段大力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强对中国边民灌输“苏联优越”的思想。苏侨协会并开办苏侨学校,建立青年夜校,组织苏籍干部学习苏联的报刊文件和国家建设的方针政策,等等,加强对苏侨青年、干部的思想控制。^③

如此 10 余年苏联教育和思想文化宣传的结果是,直到 50 年代初期,在全伊犁地区大多数少数民族孩子的心目中,依然只知道有苏联、莫斯科,而不知中国是什么国家、北京是哪个国家的首都;在 10 岁以上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认为“苏联是自己的祖国”,而“中国是自己的第二祖国”,在民族干部和群众中还有人说:“中国没有乌兹别克族,我是苏联人,我的党是苏联共产党,我的祖国是苏联,我要回苏联去。”这种对祖国观念混乱、淡薄的状况,致使伊犁州党政领导机构不得不在伊塔事件之后对全州进行“三一”思想教育,即宣讲“一个党——中国共产党,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爱祖国的宣传教育,使之理解新疆伊犁是祖国的领土,维族和哈族等民族是祖国的少数民族之一,

① 沈志华 1996 年 8 月 10 日采访陈锡华记录;《1956 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146 页。

② 《1956 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146 页。

③ 《1956 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146、147 页;《伊犁自治州外事志》。

不是苏联人，宣传祖国的伟大和做中国人的光荣。^①

说到伊塔事件的历史根源，还有必要说明一下伊犁地区中苏边境的历史状况。伊犁州与苏联接壤的边界线长约 1500 公里，在此漫长的中苏边界上，基本情况是有边无界，有边无防。

所谓有边无界，即是说在很多边境地区分界线不清，双方的人员和牲畜根据多年放牧的习惯，经常来回流动，夏天到北边，冬天到南边，历来如此。^② 新疆和平解放后，由于苏联对新疆的影响以及中苏关系友好的现状，伊犁方面对中苏之间是否应该保留边界线的认识，一直建立在一种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即认为，中苏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是友好的、团结的，是互相信任的，中国之所以还要保留与苏联的边境线，主要是为了不给帝国主义者造成借口，使其造谣污蔑中国已经丧失了主权领土完整，进而乘机挑起侵略性的世界战争。正是因为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国境线才不能取消，边防力量才不能削弱。应该明确，中国不是对苏联，苏联也不是对中国，而是中苏两国共同打击帝国主义派遣特务和间谍的活动，双方密切配合，保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安全。^③

所谓有边无防，指的是在中苏边境地区中国方面长期没有军队驻防。据邓力群回忆，他在 1950 年 1 月从莫斯科到伊犁时，只需苏联驻伊宁领事护送即可，因为在中苏边境的重要通道霍尔果斯口岸只有苏方设立的边卡，而中方没有任何驻军和边境检查人员。^④ 全国解放以后，在上述对中苏边界问题指导思想的影响下，伊犁州与苏联接壤的地区实际仍旧一直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直至 1950 年伊塔事件发生时，伊犁地区只设有两个边防站和一个检查站，实际边防线仅 150 余公里，而且只有 150 的地段

① 沈志华 1992 年 1 月 10 日采访新疆自治区三区革命史资料组组长张克迅记录；《1950 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第 1 页，博尔塔拉自治州公安处边防工作会议总结，1950 年 1 月 10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00，目录 1 卷号 1000000001 页。黄金明给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的调查报告，1950 年 1 月 15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00，目录 1 卷号 1000000001 页。

② 见沈志华 1992 年 1 月 10 日与新疆学者徐玉圻、高朝明、杜瀚、周清霖等人座谈记录。

③ 伊犁军区编：《中苏边境居民宣传教育材料》，1950 年 1 月，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00，目录 1 卷号 1000000001 页。

④ 笔者 1992 年 1 月 10 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可以几天巡逻一次,有的地段一周巡逻一次,有的地方则由于交通不便,缺少通讯设备,以及人员有限,巡逻不到或无法巡逻。^①

在这种状况下,中国方面长期以来对边境地区没有实施全面的、严密的控制,边界线上留下了许多无人管理的空隙,使边民能够经常地、零星甚至小批地自由越过边界而不被发现。另外,就伊犁州的边境居民来说,伴随祖国观念的混乱,国界观念也极为淡薄。一些边民或者出于好奇,越过国界去看看苏联究竟是什么样子,或者干脆就到苏联境内去打猎、拾鹿角;少量人员和牲畜越境的事情更是时有发生。^②

中苏关系紧张以后,新疆自治区方面发现,苏方自 1950 年 1 月以来积极加强边防工作,对边境全线进行实地调查勘测,增设边防哨所和兵力,加强巡逻,加高岗楼,并从数处地方越过边界向中方推进,还在毗邻伊犁地区的霍尔果斯边防站增设武装人员,每晚进行射击训练。此时,虽然新疆各边界区县也已开始调查中苏边界情况,但面对苏方的新动向,自治区也只是要求加强边卡干部和巡逻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坚持严守边界、不越不退的原则,慎重处理一切边界纠纷和越界事件。^③

1950 年代初,由于双方都开始加强对边境地区边民越境问题的管理,除了在边界模糊地区的习惯性流动放牧外,此期真正非法越境的人只是极少数。据统计,新疆 1950 年全年越入苏境者共 100 人,苏方越入中国境内者 100 人,中苏双方为此会晤了 100 次。^④在笔者所查阅的有关档案文献中,未见有关于 1950 年冬至 1951 年 1 月大批民众从新疆西北部,也即伊犁地区非法越境去苏的记载。

① 黄金明给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的调查报告,1950 年 1 月 10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00,目录员卷号 100,100,100 页。

② 伊犁军区编:《中苏边境居民宣传教育材料》,1950 年 1 月。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00,目录员卷号 100,100 页;有关 1950 年代新疆地区中国边民和牲畜的越境情况,在新疆自治区和新疆军区档案馆所存各期“边防情况简报”中有详细报告,可惜笔者未获准进行摘记。

③ 新疆自治区人委办公厅给区党委、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国务院外办的报告,1950 年 1 月 10 日,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全宗 100,目录员卷号 100,100,100 页。

④ 伊犁州公安局关于一年来边防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情况报告,1950 年 1 月 10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00,目录员卷号 100,100 页。

通过追寻苏联与新疆关系的历史根源,可以看出:苏联不仅对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且还通过这种影响,尤其是利用苏联在民族、部族上的历史渊源及密切联系,造成了当地居民对国家、祖国认识的模糊。此外,伊犁州中苏边境地区长期处于半开放状态,特别是在中苏友好时期,当地中国政府和居民的中国边民概念模糊,边境管理不善,对边民流动现象习以为常。这就是边民外逃事件发生在新疆伊犁而不是其他地区的历史背景。毫无疑问,苏联对新疆的历史影响,以及伊犁边境的历史状况和当地居民的边界概念,是构成中国边民出走行为的一种心理因素,但是,促成伊塔事件发生的首先还不是非法越境问题,而是伴随苏联对新疆的历史影响而来,并且在新疆中苏关系中占有特殊地位的苏联侨民问题。

苏侨问题 造成中苏边民流动的基本前提

苏联对新疆尤其是伊犁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恢复 1917-1920 年代移居新疆的原苏联居民的国籍,同时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间大量发展苏联侨民。而历史上形成的伊犁境内各民族与苏联境内一些民族之间的血缘联系,使得这一地区的苏联侨民及其所构成的庞杂的社会关系网,成为苏联的影响得以广泛、深入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也构成了后来大量边民涌入苏联的基本背景。

关于新疆苏侨的来源和构成。

最初来到新疆的苏联侨民,主要有两部分人:一是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逃亡的白俄败兵和难民;一是在苏联 1920 年代驱逐富农时期不堪忍受全盘集体化的农民。中国当地政府向这批苏侨发放了侨民证,承认其归化中国,称为归化族。1925 年 5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关于恢复旅居满洲的原俄罗斯国国民以及失去苏联国籍人员为苏联公民”的命令,并宣布此项命令也适用于新疆和上海。^① 1925 年 4 月 15 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发出布告称: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凡以前失去或

^①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全宗 102,目录 10,案宗 10,卷 1,页 10。

被取消俄国和苏联国籍者及其子女,均可恢复苏联国籍;在中国境内的原白俄侨民,均有恢复苏联国籍的权利。此文稿张贴后,前往登记的人即络绎不绝。不久,苏联又延长入籍登记日期,特别是策动哈萨克、维吾尔和塔塔尔族人加入苏籍,并许诺加入苏籍者每月发给布匹一丈六尺,津贴若干元,还可免费看苏联电影。^①

此后苏联侨民人数大量增长。1950年 5 月,据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关于旅居新疆俄罗斯侨民的调查报告说,当时在新疆省居住的俄侨有 10 万人。^② 据中国档案记载的苏联领事馆发放的护照号码统计,1950 年发展苏侨 10 万人,1951 年即增加到 15 万人,1952—1953 年更猛增为 20 万人。^③ 到新疆解放前夕,据苏联驻伊犁领事对邓力群所言,当地的苏侨及其家属已发展至 20 万户,共 100 余万人。^④

新疆解放后,苏联仍然继续在当地的中国公民中大量散发非法苏侨证件,鼓动他们加入苏籍,并移居苏联。例如,从 1950 年 10 月 1 日到 1951 年 1 月 31 日,苏联领事馆共发放 10 万本侨证,其中只有 1 万户是经过伊犁州公安局批准的。1951 年 10 月,仅在伊犁州的两个县中就发现有 10 多万本非法苏侨证,一些人根本不是苏侨而是中国人,但也能得到苏侨证。^⑤ 解放后苏侨人数的变化也能说明问题。1951 年,新疆外事机构对全疆苏侨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伊犁地区的调查结果为,伊、塔、阿三个专区共有苏侨 10 万人。^⑥ 1950 年迁返苏侨工作开始后至 1953 年,伊犁州共遣返去苏

① 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49—1953)》,104—105 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年。

②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全宗 1563 目录 10 案宗 1950 10 页。

③ 黄金明给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的调查报告,1951 年 10 月 10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563 目录 10 卷号 1951 10 页。

④ 笔者 1986 年 10 月 1 日采访陈锡华记录,10 月 1 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⑤ 伊犁州外事分处、苏联外交部领事局副局长库日科夫、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一等秘书奥西波夫、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达巴申、苏联驻伊宁领事沙鲁诺夫等同志与伊犁区党委张、赵书记等谈话记录,1951 年 10 月 31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563 目录 10 卷号 1951 10 页。

⑥ 《伊犁自治州外事志》。这次调查的详细情况可见新疆外事处《新疆工作三年来的总结及今后意见》,1951 年 10 月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563 目录 10 卷号 1951 10 页。这里仅指苏侨本人,不包括其家属。此外,由于统计方法的问题,苏方的数字与中方有一些差别。

员~~数~~人,其中苏侨~~原~~人。以此言之,如果伊犁州的苏侨在此期没有发展,应该已基本遣返完毕,余下的不过~~员~~多人而已。但根据后来的统计,~~员~~至~~员~~年,全州仍有苏侨~~员~~人。^①

在发展中国公民加入苏籍的活动中,伊犁苏侨协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在三区革命时期被苏联驻伊宁领事称为‘国中之国’的社会团体,在新疆解放后势力进一步膨胀,在苏联驻新疆领事馆的支持下,从事超出其自身职能范围的活动,尤其是代行领事务,受理加入苏联国籍的申请,并在苏侨遣返工作开始后,办理苏侨回国手续和遣送苏侨等工作,利用此项工作之便,在中国公民中发放假侨民证,有的苏侨协会会长就专门做非法发放苏侨证的事情。霍城县苏侨协会并宣传说,一份护照可带~~员~~人出境。特别是有的苏侨协会还吸收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参加;有的苏协主席本人就是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并在当地民族群众中搞小集团活动;有的在地方公安部门工作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为拉拢人回苏,为那些借口将侨证上照片遗失的人乱开证明,以便于他们去领事馆换取新的护照。^②此外,由于~~员~~年伊犁地区开展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一些干部不是苏侨,但为了逃避批判,就设法搞到苏侨证,要求到苏联去,于是买卖苏侨证的行为便屡有发生。^③这种情况实际又助长了苏协非法发展侨民的歪风。

中国对苏方的这种做法是有意见的。当发现苏联在中国人中间非法发展苏侨的活动后,~~员~~年~~苑~~月~~愿~~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曾与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罗迈进经过协商,达成了苏联暂缓在新疆为来自苏联的少数民族人员恢复苏籍的协议。~~员~~年~~员~~月,新疆外事处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卡赞斯基达成协议,规定苏联在中国人中发放苏联护照

① 《伊犁自治州外事志》。

② 赛福鼎与达巴申谈话纪要,~~员~~年~~圆~~月~~猿~~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员~~目录员卷号~~愿~~页。伊犁州外事分处~~猿~~月~~缘~~日张书记同沙鲁诺夫领事谈话摘要,~~员~~年~~猿~~月~~愿~~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员~~目录员卷号~~愿~~页。

③ 伊犁州外事分处~~猿~~月~~缘~~日张书记同沙鲁诺夫谈话摘要,~~员~~年~~猿~~月~~愿~~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员~~目录员卷号~~愿~~页。

须有当地公安机关的证明。^①此后,新疆自治区于 1959 年 4 月开展了对外侨的登记工作。伊犁州的登记事务开始于 1959 年初。针对苏方在新疆非法发展苏侨之事,新疆方面曾多次与苏联领事馆进行交涉。1959 年初,赛福鼎即与苏联驻新疆总领事达巴申商谈,并明确只有持苏联政府正式颁发的护照者才是苏侨。^②是年 7 月,苏联外交部特派领事局副局长库日科夫(又译康茹科夫)和远东局一等秘书奥西波夫来新疆,先后与新疆自治区和伊犁州的领导人进行会谈,承认了苏方滥发护照的错误。奥西波夫当时表示:伊犁领事馆委托苏侨协会办理护照是不对的。苏联外交部已在不久前指示说,办理护照的各种业务只能由领事馆本身去做,并应和地方政府取得密切联系,苏侨协会是一个社会团体,而遣侨工作是由国家进行的。伊犁领事馆把领事馆的业务交给苏侨协会办理是工作中的一个错误。签证工作只能由领事馆和总领事馆及莫斯科来的同志们搞。达巴申总领事也申明:苏侨协会无权发出证件,苏侨协会干部只可做一些具体性技术工作。苏侨协会发出的不合规定的证件应该作废,持证人也不能前往苏联。^③

但是,尽管苏方作出上述表态,其非法发展苏侨的活动并未就此停止;苏联领事馆对于持假证件前往苏联的中国公民,也并未严加限制。伊犁外事分处曾在 1959 年 7 月、1959 年 8 月和 1959 年 9 月先后三次将当地公安部门没收的非法护照 1959 本退还苏驻伊宁领事馆,可至 1959 年上半年止,各地又发现了非法护照 1959 本。^④

^① 伊犁州外事分处:《伊塔事件真相》,1959 年 4 月,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959 目录 1959 卷号 1959 源 1959 页。

^② 赛福鼎与达巴申谈话纪要,1959 年 4 月 1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959 目录 1959 卷宗 1959 源 1959 页。

^③ 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自治区党委吕书记与苏联外交部领事局副局长康茹科夫、远东局奥西波夫和总领事达巴申谈话纪要,1959 年 7 月 1 日,伊犁自治州档案馆,全宗 1959 目录 1959 卷号 1959 源 1959 页。伊犁州外事分处:库日科夫、奥西波夫、达巴申、沙鲁诺夫等与张、赵书记等谈话记录,1959 年 7 月 1 日,伊犁自治州档案馆,全宗 1959 目录 1959 卷号 1959 源 1959 页。

^④ 《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959 目录 1959 卷号 1959 源 1959 页。

关于新疆苏侨的遣返问题。

苏联在战后积极提出恢复原苏联公民的国籍，并在各地大量发展苏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由于战争使人口锐减而造成的劳动力严重匮乏的问题。于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便出现了新疆苏侨回国之事。1945 年 9 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遣返在中国的苏联侨民。是月 20 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苏联决定自中国遣送 2000 户苏侨至苏联的高加索、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地开荒。外交部认为，这是一件重大复杂的政治任务，应予以大力协助。确定中国对此次苏侨回国应采取主动配合，积极协助，适当照顾，给予方便，尽快送走的方针，要求各有关部门共同协助办理，各地方成立内部的“协助苏侨回国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外事处、公安局共同抓并设立办公室。以后，伊犁自治州和各地区又成立了“迁侨委员会”。^①

据苏联驻伊宁领事沈申自北京苏联大使馆开会回来后对中共新疆分局所谈：1945 年当年，新疆苏侨仅从伊犁区遣送 2000 户，其他地区暂时不动。遣送对象不分民族、职业，主要是有劳动力、适于开荒的人。遣返办法是，由苏联领事馆发布公告，让苏侨自动报名登记，报名名额不限。然后，由领事馆从中审查挑选 2000 户遣返。计划在 3 个月内办完此项工作，9 月 1 日前全部动身，由苏联对外运输公司负责运送。为此，中共新疆分局发出紧急指示，要求伊犁地委等各地市党委谨遵中央和外交部关于“此事涉及中苏友好关系，必须主动积极协助，把协助遣返苏侨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去完成，只准办好，不准办坏”的指示，尽全力协助苏方圆满地完成此项任务。同时决定在伊犁地委统一领导下成立“协助苏侨回国委员会”。^②这样，1945 年当年伊犁共遣返苏侨 2000 户 10000 人。此后，大规模遣返苏侨逐年进行，从 1945 年至 1949 年 9 月 1 日止，伊犁州共遣返苏侨 10000 人，苏侨的中国籍家属 10000 人，合计达 20000 余人。^③

① 《伊犁自治州外事志》。

② 中共新疆分局：关于协助苏侨回国问题的紧急指示，1945 年 9 月，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全宗 1000，目录 2000 号 2000 页。

③ 《伊犁自治州外事志》。

伊犁地区的遣返苏侨工作从 1958 年开始后,即基本是在每年的春季进行。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联最初提出遣返苏侨的目的就在于增加劳动力,以完成苏方边境地区的春耕生产及其后的夏收任务和开垦荒地;一方面则是由于苏方强调冬季气候恶劣,不利于侨民的行动及苏方的安置工作。这样,每年的 1 月,苏方都有数辆大卡车开到伊宁,接苏侨、拉行李,浩浩荡荡。未走的人呼朋唤友前来领事馆送行,致使当地生产搁置,人心浮动,给伊犁地区的春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① 尽管中方对于这种状况有意见,但在 1959 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关系比较友好,伊犁党政领导机构还一直积极配合苏方的遣返工作,认为应重视苏方意图,多听苏方意见,不宜过分强调照顾当地的生产问题。1959 年,随中苏两党分歧的加深,伊犁方面曾几次向苏方建议将遣返时间改在每年的 5 月或 6 月,或在春耕结束之后进行,尽量不要安排在 1 月。但苏方总以冬季天气寒冷,苏方提供的是敞篷车,对侨民有困难,以及哈萨克斯坦夏季需要劳动力为由加以回绝。中方提出汽车可以加篷,而且路途并不远,苏方仍然坚持在春夏季遣返。^②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1960 年。

关于新疆的苏籍干部问题。

如果说,苏侨是苏联在新疆地区影响深厚的社会基础,那么,新疆及伊犁党政领导机关中的苏籍干部则是这个基础的核心,这是三区革命时期遗留的历史问题。当时,苏联派遣了大批联共(布)党员和干部到伊犁发动革命,其中许多人在当地成立的军政部门担任重要职务。此外,一方面当地苏侨几乎全部积极地投入了运动,其中一些人后来走上领导岗位;一方

^① 笔者 1986 年 1 月 1 日采访陈锡华记录,伊犁州外事分处:库日科夫、达巴申、沙鲁诺夫等与张、赵书记等人谈话记录,1958 年 12 月 1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 号,目录员卷号 10001~10002。

^② 伊犁州外事分处 1958 年工作报告,1958 年 1 月 1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 号,目录员卷号 10001。伊犁州外事分处:库日科夫、达巴申、沙鲁诺夫等与张、赵书记等人谈话记录,1958 年 12 月 1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 号,目录员卷号 10001~10002。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自治区党委吕书记与康茹科夫、奥西波夫和达巴申谈话纪要,1958 年 12 月 1 日,伊犁自治州档案馆,全宗 1 号,目录员卷号 10001。伊犁州外事分处:1 月 1 日伊犁区党委张书记与沙鲁诺夫谈话摘要,1958 年 1 月 1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 号,目录员卷号 10001。

面。1950年三区割据后很多少数民族干部被发展为苏侨。这样，三区政府中存在大量苏籍干部就是很自然的了。由于苏联控制的三区在新疆和平解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解放后，原来的三区干部大多进入了新的政府机构，而三区民族军则整体编入解放军序列。^①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政府的意见是，这些苏籍干部，尤其是负责干部尽可能继续留在中国工作，但需要解决他们的国籍问题，即希望他们放弃苏联国籍。当时，苏联方面对此采取了合作态度。1951年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时，苏联外交部曾通过中国驻苏大使馆邀赛福鼎前往晤谈，表示苏联政府同意在新疆工作的苏籍负责干部解决自己的国籍问题，并交付了一份新疆领导干部中的苏侨名单，请赛福鼎转告他们说，这是苏联政府的意见。赛福鼎当即将这一情况向周恩来进行了汇报，并表示自己愿意放弃苏联国籍。周恩来对此举表示欢迎。以后，中苏两国政府还就此事达成协议，尽量动员和争取苏籍干部退出苏籍，长期留在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方面对此问题的处理原则为：“说服教育，自觉自愿，坚决要走的批准。”^②

缘年代初，新疆自治区领导干部中的一些享有苏籍和持苏侨证的人退出了苏联国籍。但是，大部分苏籍干部还是不愿意放弃苏联国籍。特别是在伊犁地区，由于苏籍干部较多，如伊犁直属县的许多县长、科长、部长、公安局长都是苏侨，而且是苏侨协会委员，要动员他们全部退籍，涉及的面也太宽。于是，问题便拖延下来。^③ 尽管在缘年代以及远年代初，处理苏籍干部退籍的期限屡次延长，仍有大量苏侨在新疆，尤其是伊犁的党政部门中任职。至1956年以前，伊犁地区的绥定、霍城县的科、部长级以上干

① 详见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5—1950）》，曹达诺夫：《伍军的革命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8。

② 赛福鼎与达巴申谈话纪要，1951年10月18日，伊犁自治州档案馆，全宗161，目录15卷，号1812页。新疆自治区人委外事处：1951年的工作总结及1952年的工作安排意见，1951年12月15日，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61，目录15卷，号1812页。笔者，1982年10月18日采访陈锡华记录。

③ 赛福鼎与达巴申谈话纪要，1951年10月18日，伊犁自治州档案馆，全宗161，目录15卷，号1812页。笔者，1982年10月18日采访陈锡华记录；1951年伊塔事件史料》181页。

部中有 1/3 以上是苏侨 ;伊犁州级军、政领导人中也有许多是苏侨 ,甚至
是苏侨协会委员 ;在州级机关和直属县市区长以上干部中 ,苏侨占 1/3 ,
另还有 1/3 的人家庭成员是苏侨。^① 1956 年 ,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辖区
的苏籍负责干部已很少 ,只余几名 ,而伊犁州的苏籍负责干部却仍有 1/3 之
人。1957 年 ,新疆全疆开始集中力量进行推动苏籍干部退籍的工作 ,但
是该年的登记结果是 ,全自治区依然有苏籍干部 1.5 万人。由于伊犁州的
苏侨登记工作未搞彻底 ,故此数字并不准确 ,苏籍干部的实际数量应该还
要多些。至 1958 年 ,仅就伊犁州而言 ,即仍有苏籍干部 1.5 万人。^② 此外 ,
还有许多干部隐瞒了他们的苏籍身份。^③

应该说 ,在 1950 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友好阶段 ,乃至末期随中苏两党分歧
的发展 ,两国关系出现倒退时 ,在新疆苏籍干部退籍的问题上 ,苏联政府一
直基本上是持配合态度的。对于苏籍干部回苏的要求 ,苏联驻新疆领事馆
基本尊重中国方面的意见 ,如中方不同意他们回国 ,领事馆即不予批准。
对于苏籍干部多数愿意保留苏籍的状况 ,苏联方面也表示 :我们认为 ,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十年了 ,这个问题是解决的时候了。但是 ,由于极少
数苏籍干部本身就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 ,而苏联领事馆对这些人又基本
持同情态度 ,因此 ,新疆苏籍干部问题的负面影响客观上严重存在着。^④
事实上 ,也正是这部分人日后成为苏联在新疆进行各种非法活动的中坚
力量。

综上所述 ,新疆的苏侨及其为数众多的中国籍亲属 ,实际上为苏联在
当地构筑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而且由于历史的、民族血缘的纽带联系 ,新疆

① 《1959 年伊塔事件史料》猿页。

② 赛福鼎与达巴申谈话纪要 ,1956 年 1 月 猿日 ,伊犁自治州档案馆 ,全宗 1 号 ,目录 1 号 ,卷号 1 号 ,1 页。新疆自治区人委外事处 :1956 年的工作总结及 1957 年的工作安排意见 ,1957 年 猿月 1 日 ,新疆自治区档案馆 ,全宗 1 号 ,目录 1 号 ,卷号 1 号 ,1 页。伊犁区党委政法部 :1956 年全州苏侨数字统计 ,伊犁州档案馆 ,全宗 1 号 ,目录 1 号 ,卷号 1 号 ,1 页。

③ 黄金明给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的报告 ,1957 年 1 月 1 日 ,伊犁州档案馆 ,全宗 1 号 ,目录 1 号 ,卷号 1 号 ,1 页。

④ 赛福鼎与达巴申谈话纪要 ,1956 年 1 月 猿日 ,伊犁州档案馆 ,全宗 1 号 ,目录 1 号 ,卷号 1 号 ,1 页。外交部关于苏侨和苏籍干部处理问题的加急电 ,1957 年 猿月 1 日 ,新疆自治区档案馆 ,全宗 1 号 ,目录 1 号 ,卷号 1 号 ,1 页。

苏侨具有与东北、上海苏侨完全不同的特殊地位。而这种特殊地位为以后伊塔事件的发生确立了基本的前提。不过，从 1956 年代的情况来看，新疆苏侨回国是自 1956 年以来由苏方提出经中苏双方政府认可的正常现象，尽管中方对苏联采取不正当手段发展侨民有不同意见，但在中苏友好的背景下，还是服从苏联的需要，协助新疆苏侨定期回国的。同时，对中方关于苏籍干部尽量留在中国的要求，苏联也是赞同的。这即是说，当时的苏侨问题并没有成为影响中苏关系的一个因素。此外，每年春季有一批伊犁苏侨举家迁往苏联也是一个历史现象，而且是苏方坚持这样要求和安排的。

那么，为什么过去时有发生的平常现象到 1959 年初竟会酿成轰动中外的重大事件呢？众所周知，1956 年末 1957 年初，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两件大事，这就是大跃进运动和中苏关系的破裂。问题在于，这两件事对以后的伊塔事件的发生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发生了怎样的作用呢？或者说，导致伊塔事件爆发的主要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国内因素：大跃进在新疆的经济 后果及其影响

1958 年，中国大地急风暴雨般地兴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的中国主要领导人从良好的主观愿望出发，凭借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不顾客观条件，急于求成，盲目冒进。其结果导致全国性经济严重失调，对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加上 1959 年的自然灾害，引起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急剧恶化，甚至在许多省份出现了饿死人和逃荒的现象。那么，这种状况是否就构成了 1959 年新疆边民外逃的主要原因呢？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大跃进运动在新疆地区，特别是伊犁州的影响进行具体的分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于 1958 年 7 月开始部署和实施工业和农牧业生产的全面跃进计划，其显著特点与内地一样，也是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高指标，并一再修改，层层加码。最后确定，1959 年与 1958 年相比，农牧业总产值要增长 2 倍，平均每年增长 100%；工业总产值要增长 1.5 倍，平均每年增长 75%。新疆还提出，一定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把自治区建设

成为中国的钢铁、石油、有色及稀有金属、煤炭、粮食、畜牧业、棉花、制糖八大基地。1958年 9月新疆开始进行建立人民公社的紧急动员,同样是一哄而起,短短一个多月便在全自治区建成 1566 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民 135 万多户,占农户总数的 98.5%,其中自然也存在“一平二调”、刮“共产风”问题。^①

然而,从有关统计数字和笔者在当地了解的情况看,1959 年代末那场“天灾人祸”对新疆的影响要比全国其他地区小得多。在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新疆在农业方面虽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农业生产在总体上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发展速度。其中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农业劳动力有所增加,1959 年有农业劳力 1000 万人,比 1956 年增长 15%;农田水利建设发展较快,1959 年灌溉面积为 1500 万亩,比 1956 年增长 1 倍多;耕地面积和播种面积扩大,1959 年耕地面积 1500 万亩,播种面积 1500 万亩,均比 1956 年增长 15%。在畜牧业方面,尽管由于实现公社化导致耕畜量大幅度降低(1959 年为 1956 年的 70%),但牲畜年末存栏总头数却逐年增加,由 1956 年的 1000 万头增加到 1959 年的 1000 万头。在农业收成方面,于棉花、油料出现较大减产的同时,粮食总产量则大幅度增长,1956 年为 100 亿斤,1959 年为 130 亿斤。此后有所下降,但 1960 年仍达到 100 亿斤。1956 年至 1959 年,农业总产值逐年上升,按 1956 年不变价格计算,从 100 亿元增长到 130 亿元,以后两年略有减少,但 1960 年依然保持在 100 亿元的水平。^②

在这种情况下,新疆是否发生过饥荒,乃至部分边民需要出走苏联来解决吃饭问题呢?总括而言,从 1958 年全国进入“困难时期”起至 1959 年,新疆全区城乡人民生活虽然紧张一些(人均口粮标准由原来的 150 多斤减少到 100 斤左右),但是有饭吃,没有因缺粮而发生大的问题。新疆的

① 以上所引数字见朱培民:《新疆大跃进研究》,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3(4),104-106 页。朱文引用了大量目前学术著作中很少见到的统计数字,但非常遗憾的是完全没有注明出处。因此,使用时只能作为参考。

② 新疆自治区党史委、区党校编:《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上册,1984,1985-1986 页,1986,朱培民前引文,104 页。

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来人口突然大量增加而造成的。据统计,1957年1月至1957年7月,自流来疆人员达100万余人,仅1957年1月至7月就流入100万余人,其中多数为受灾地区群众。1957年至1959年7月,新疆地区收容、安置内地流入人员100万余人,接收、安置支边青年100万余人,加上人口自然增长数,新疆人口由1957年的1000万人增加到1959年的1000余万人,三年增加人口100余万人,增长了10%。^①这种自流人员不断涌入,导致人口猛增的状况,当然给新疆造成了很大压力。对此,一方面,中共中央根据新疆的要求,指示各有关省区确实安排好本地人民生活,控制人员外流;一方面,自治区党委采取积极措施,妥善收容和安置外来人员^②,从而使新疆由于外来人口压力造成的困难得以缓解。

从另一个角度观之,也正是由于新疆的人民生产生活状况较内地一些地区为好,才出现了严重缺粮省区大批自流人员涌入新疆的情况。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也在于这些年新疆的农业收成不是下降,而是有所提高。因此,尽管由于人口增加,此期新疆粮食库存量有所下降,但1957年7月全疆仍有库存粮100亿斤。不仅如此,新疆还帮助特别困难的省份解决严重缺粮的问题。如1957年底,自治区政府就专门成立了调粮委员会,组织向甘肃省调拨支援该省的粮食。在1957年至1959年期间,新疆非但未因困难而要求国家调入粮食,而且还调出粮食10000吨、肉10000吨支援国家。^③

这一时期新疆个别地区也曾出现过粮食危机,如1957年春季,南疆阿克苏地区的拜城县发生了部分群众缺粮、饥饿、生病,乃至人员死亡的事件。但究其原因,却并非真正由于缺粮所致。到1957年7月,拜城县尚有库存粮1000余万斤,分配给该县的回销指标还有1000余万斤。正如王恩茂在自治区党委7月召开的拜城县紧急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在有大量库存粮食的情况下没有解决好吃饭问题,其根源主要在于县委主要负责人

^① 《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上册,102-103、103-104、104页;朱培民前引文,104页;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1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② 《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上册,103-104、104页。

^③ 《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上册,104-105页;朱培民前引文,104页。

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错误。他们对于民间的疾苦,既不听下级反映,也不向上级汇报,从而导致了事件的发生。为此,自治区党委在下发的做好全区粮食工作的决定中特别强调指出:新疆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缺粮问题,在条件比过去更好的情况下,更不能允许发生粮食问题,尤其不能允许再发生像拜城这样的粮食问题。^①

当然,大跃进运动在新疆地区造成的影响并不平衡。与南疆相比,北疆地区粮食不足的现象较严重一些。王恩茂在 1959 年 10 月的一次会议上承认,粮食问题主要发生在北疆,那里不少地区口粮和饲料的标准都有所下降,人民在穿的、用的方面也出现了一定的困难。^②而伊塔事件恰恰发生在地处北疆的伊犁自治州,因此,就有必要对那里的情况进行专门的分析。显然,这对于探讨伊塔事件的起因,具有更直接的意义。

1958 年伊犁州开展大跃进运动以来,由于在农业生产上计划定得过高,没有留有余地,对粮食估产偏高,直属县市在完成粮食征购任务方面都存在有不同程度的浮夸虚报现象。1958 年秋收后,实际入库粮食比上报数相差 1 亿多斤,以至 1959 年 1 月清仓时发现,粮食库存比账面短少 1 亿斤。此外,在畜牧业生产上,因 1958 年冬季雪厚和 1959 年春季气候恶劣,全州牲畜死亡近百万头。进入 1959 年后,有的地方人民口粮安排不落实,发生了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人现象。但这种现象只是在个别收成较差的农场和支边人员组成的公社中出现过。同时,为了避免群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伊犁区党委及时采取措施,要求各地严格控制农村回销粮,在春播结束后将剩余种子清点转为口粮,并在城乡推广了一种做饭增量法,以解决群众吃饭问题。^③

就全州 1959 年的总体情况而言,农业方面,粮食总产量达到 1.8 亿斤,比 1958 年还增产了 1 亿 ~ 1.5 亿斤,农村牧区每人平均 1500 斤。与内地

① 朱培民前引文, 200 页;《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上册, 152 页。

② 《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上册, 152 页。

③ 《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上册, 152 页。笔者 1985 年 10 月 10 日电话采访伊犁州党史委副主任刘丹记录。三年困难时期,刘丹就在伊犁地区,对民间发生浮肿病的情况有所了解。

许多地区灾情极为严重不同，伊犁州在是年远月份虽然也有 100 余万亩地遭受冰雹灾害，以后又有 100 余万亩粮田发生黄锈病，但这种灾情在全州 100 余万亩播种面积中，所占比重较小，加之补救措施较及时，造成的损失不大。为使各县市解决好群众生活问题，伊犁区党委还于 10 月发出指示，要求以食堂为中心全面安排好人民生活。当时，全州人民公社共有 100 多个公共食堂，就餐人数达 100 万人，占农村人口的 10% 左右。同时，伊犁州还采取了压低城乡口粮供应标准，提倡推广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缓解了粮食供应紧张的矛盾。^①

到 1959 年，伊犁州的情况进一步好转。牲畜总头数增加到 100 多万头，全州粮食供应自足有余，并且外调支援乌鲁木齐市的工业建设和城市居民。当年伊犁州上调自治区的粮食达 100 万斤。^②虽然在春季，霍城、特克斯等县的支边人员中曾发生浮肿病现象，但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安置工作不当。为此，伊犁区党委发出紧急通知，着重要求各级党委立即组织人员对支边青壮年的安置工作和生活情况作一次检查，发现浮肿病人除治疗外，要在生活上给予照顾。^③总之，在全国三年困难时期，在新疆北部地区并没有出现饥荒现象。据说，伊犁地区最差的时候，人民生活安排充其量也只是所谓“三七开”，即吃 10% 的细粮、90% 的杂粮^④，根本就没有恶化到需要外流逃生的地步。全州比较平稳地渡过了困难阶段。

总之，正如上述资料所表明的，从整体上讲，在新疆，包括伊犁、塔城地区，尽管“天灾人祸”给人民的生活造成一些困难，但并不存在大批居民由于饥荒而外出谋生的动因。所以，伊犁边民大规模出走苏联应该还另有原因。

① 《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上册，102 页；伊犁州外事分处贾文郁同志与苏联领事沙鲁诺夫谈话纪要，1959 年 1 月 10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00 目录员卷宗 100 页。

② 《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上册，103 页；塔城地委关于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秘书在塔城、裕民等县活动情况的简报，1959 年 1 月 10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00 目录员卷宗 100 页。

③ 《中国共产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历史大事记》上册，104 页。

④ 笔者 1982 年 1 月 10 日电话采访刘丹记录。

苏联因素 : 中苏关系恶化及苏联 在新疆的鼓动

1958 年下半年以后 , 中苏双方经过在 “长波电台 ” 和 “共同潜艇舰队 ” , 炮击金门、马祖 , 中印边境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碰撞 , 中苏两党在 50 年代中期政治路线、外交方针上的分歧逐步发展为国家和民族利益上的矛盾。1959 年 7 月 , 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8 月 , 苏联边防人员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中苏有争议地区驱赶中国边民 , 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 , 两国的边境纠纷随之肇始。1959 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 , 中苏两国关系又因阿尔巴尼亚问题而进一步恶化。

在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这个大背景下 , 苏联对中国新疆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 , 由过去的与中方协商、配合安排遣侨事务 , 转变为积极插手这项工作。从 50 年代初到伊塔事件发生 ,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苏联驻新疆的领事馆开始利用新疆、特别是伊犁地区党和政府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 , 以及人民生活出现的暂时困难 , 积极、主动地进行挑拨性、分裂性宣传 , 加快在中国公民中非法大量发展苏侨的步伐 , 鼓动中国边民去苏联。

1959 年 , 在新疆自治区党委确定该年不大批遣返苏侨之后 , 苏驻伊宁领事馆依然做着大规模遣侨的准备工作。苏联领事指使、收买一些苏侨和中国公民中的不法分子 , 或直接给领事馆职员布置任务 , 在中国的哈萨克、乌兹别克、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公民中进行秘密串联、非法登记 , 鼓动他们向领事馆要求加入苏联国籍。如果有人没有证明其苏侨身份的文件 , 领事馆就让他们给其在苏亲属写信要证件。一些人与苏联人毫无关系 , 也被拉来登记。苏联领事并指示说 : 这些人名单搞好后 , 与中国政府交涉成功 , 就可遣返回国。面对众多申请回苏的少数民族群众 , 苏联领事还采取了挑拨的态度 , 答复他们说 : “只要中国政府同意你们走 , 我们就批准。”与此同时 , 伊犁苏侨协会总会以及阿勒泰、霍城、昭苏、伊宁市等地的苏侨协会也在领事馆的授意下 , 有计划地在中国公民中大肆进行串联登记活动。是年伊犁地区查获缘起非法登记苏侨案件 , 共查得照片 1000 多张 , 非法登记群众即有

员是苏人。^①

此外，苏联领事馆、苏侨协会和苏联国内给中国人散发各种证件的活动进一步升级。这些证件有领事馆发的临时国籍证明书、遗失护照证明；苏协发的申请加入苏籍的证件，苏联国内发的护照抄本、补发的出生证明等，以及苏联的集体农庄、地方政权组织发来的大量邀请中国公民迁居苏联、保证其在苏工作和生活的各类召唤书、同意书、邀请书、保证书。苏联方面宣传说，“持有这些证件的人都是苏联人，都可以去苏联”，并鼓动、组织他们去苏。据 1956 年的典型调查，伊犁各直属县市持有苏方所发各种证件的人占各县市居民总数的 1/3 左右，塔城专区在外侨普查登记时自愿交验的这类证件有 2 万件，为当地苏侨总数的 2 倍多。其他如乌鲁木齐、喀什等城市持有此类证件的人，为数也不少。^②

1956 年以来，特别是苏共二十二大后，苏联侨民不但自己加紧要求去苏，而且还在社会上鼓动其他人员申请到苏联去。苏联领事馆通过苏侨协会非法发展侨民的活动也更加积极。^③ 伊宁市苏协的秘书在发放无主护照时竟然宣称要“把这些护照发给那些想加入苏籍的中国公民”，“这儿粮食定量标准这么低，一定会有很多人愿意到苏联去”，“我们要把这里所有信伊斯兰教的人统统接到苏联去”。^④ 苏驻伊宁领事馆秘书在塔城等地接见苏侨和要求去苏的中国公民时也反复宣传说：苏联人民生活很富裕；凡是从苏联过来的哈萨克，不管有无苏侨证，我们均承认他们是苏侨。苏联的大门敞开着，欢迎大家去苏联，而且迟早一定要去，主要问题在中国政府是否批准，苏联方面没有什么障碍。你们完全有权利要求回国，任何人不能干涉。只要是由苏联过来的人，不管有无苏侨证均是苏联公民，过了边境就可以发给正式公民证，我代表苏联政府批准你们走，并对个别要求退

① 新疆自治区人委办公厅给区党委、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国务院外办的报告，1956 年 10 月 10 日，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全宗 15 号，目录 15 卷，卷号 15 卷 15 号，15 页；《1956 年伊塔事件史料》，15 卷，15 页。

② 《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5 号，目录 15 卷，卷号 15 卷 15 号，15 页。

③ 伊犁州外事分处关于非法领取苏侨证情况的报告，1956 年（日期不详），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5 号，目录 15 卷，卷号 15 卷 15 号，15 页。

④ 《1956 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15 页。

出苏籍的侨民进行威胁,指称:苏联政府 1957 年对外侨法令规定,不论何时苏侨都要回到他们的土地上劳动,只有少数坏分子逃跑,不愿当苏联公民。^①是年,仅伊宁市一个搞此项活动的愿人集团,就在该市苏侨协会主席的直接指挥下秘密登记了 1000 多人,收取现金 1000 余元。^②

1957 年代,苏方还能在与中方的会谈中承认非法发展侨民的错误,双方协商,解决问题。而到 1958 年代初,当伊犁州外事分处将中国外交部、公安部 1957 年 12 月 1 日“关于苏领事馆发展苏侨问题的指示”精神传达给苏驻伊宁领事沙鲁诺夫,并交付所查获的非法护照时,对方却仍然否认其非法发照的事实。^③苏联方面的这种活动已经广泛、深入地展开,在其影响下,中国边民要求去苏也已形成一股风气,问题已不是双方通过协商就能解决的了。观伊犁州的苏侨遣返情况:1957 年至 1958 年 1 年间遣返苏侨 1000 余人,随返的中国籍家属 1000 余人;而 1958 年至 1959 年 1 年中遣返苏侨 1000 余人,随返的中国公民竟达 1000 余人。^④这其中还未包括那些持有苏联各种证件而尚未走成的中国人。由此可见,当时苏方非法发展苏侨的情况十分严重。

第二,苏联领事馆改变了以往在苏籍干部退籍问题上的做法,竭力阻止此类人辞退其在中国党政机关中所担任的职务。

1957 年 12 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方面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彻底解决新疆的苏籍干部问题,本着争取他们退出苏籍留下工作、对坚持回国者予以批准的精神,向苏籍干部进行动员。由于多数人仍然要求回苏,公安部门即陆续给一些人发了出境签证。但是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却突然改变了过去的方针,对这些人多方阻挠,劝他们不要急于辞职,并给市公安局打

① 中共塔城地委《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秘书切莫合尼克在塔城、裕民、额敏、托里等县活动情况简报》,1957 年 12 月 1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00 目录 1 卷号 206 卷 206 页。

② 《1959 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100 页。

③ 伊犁州外事分处《1957 年 12 月 1 日伊犁州外事分处办公室曹洪章同志与苏驻伊宁领事沙鲁诺夫谈话情况的报告》,1957 年 12 月 1 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00 目录 1 卷号 206 卷 206 页。

④ 《伊犁自治州外事志》。

电话，表示苏方不能发给他们入境签证。^①

同期，苏联驻新疆的两个领事馆，即驻乌鲁木齐和伊宁领事馆虽然同意苏籍干部加入中国籍长期留在中国工作，但在具体受理苏籍干部退籍的问题时却设法留难，多方了解中国处理苏籍干部的方针，试图在此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以使中方作出让步，允许苏籍干部继续留在中国的国家机关中。苏联总领事曾提出：苏籍干部在党政军机关担任着各种不同的职务，尤其是伊犁苏籍干部的数字很大，他们不愿意退籍，是否就遣返他们回苏？这个问题的解决要靠本人自愿，中苏双方只能说服不能强迫。由此，从1954年7月到1955年7月向苏领事馆提出退籍申请者均未获得批准。^②

此期苏联方面发生上述变化，应该说是别有所图的。毕竟，在中国的党政军机构中保留有苏籍干部，有利于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伊犁地区有不少隐瞒自己苏侨身份的干部经常与苏联领事馆联系，汇报中方内部情况，提供各种情报，包括中共中央绝密文件。甚至有的民族干警还秘密领取苏联领事馆的工薪。个别上层人士在伊塔事件后还宣称“领事馆撤走了，我们还有地下领事”^③。在以后的伊塔事件中，苏籍干部成为坚决逃跑的一类人，其中有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或对党和政府不满者，还成为煽动、组织及胁迫群众外逃的首要分子。

第三，苏联方面开始利用苏中邮件往来及广播宣传，鼓动中国公民去苏。

50年代初，苏方通过集体农庄、区乡政府往新疆各地投递信件，提供各类非法证件，寄赠报刊杂志等宣传品，引诱中国边民去苏。苏联哈萨克广播电台对新疆的维语广播，1954年曾自动撤销，但到1955年上半年又得到恢复，经常播放去苏人员的录音讲话、访问记等，赞美苏联，煽动民族分

① 新疆自治区人委办公厅给区党委、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国务院外办的报告，1954年10月10日，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56号目录156卷号156号源156页。

② 新疆自治区人委外事处：1954年的工作总结及1955年的工作安排意见，1955年7月10日，新疆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56号目录156卷号156号源156页。

③ 黄金明给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的报告，1954年10月10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56号目录156卷号156号源156页。

裂情绪,且频率和播出时间都与中方的维吾尔广播电台相近,很易为新疆地区的听众所接收。^①

与此同时,中国越境去苏人员也频繁与其中国境内的亲友通信,或邮寄米、面等和肥皂、棉布等中国定量供应的物品,宣传苏联生活的优越,劝说他们到苏联去。特别是有的人利用亲友关系写信鼓动担任劝阻外逃工作的干部去苏,直接破坏中方进行的这项工作。^②

1959 年至 1960 年,苏方发寄来的信件、邮包猛增。如塔城地区,1959 年一季度苏方来信 1000 封,1960 年第一季度增至 2000 封,增长 1 倍;乌鲁木齐,1959 年全年苏方来信 1000 封,平均每月 83 封,1960 年 1—3 月增至 1000 封,平均每月 333 封,平均每月增长 3 倍。又如塔城地区,1959 年第一季度苏方寄来包裹 100 件,1960 年第一季度增至 200 件,增长 1 倍;乌鲁木齐,1959 年苏方寄来包裹 100 件,平均每月 8 件,1960 年 1—3 月达 100 件,平均每月 33 件,平均每月增长 3 倍。另如塔城地区,1959 年一季度收到苏联报刊杂志等印刷品 100 件,1960 年一季度增至 200 件,增长 1 倍;乌鲁木齐,1959 年一季度收到 100 件,1960 年一季度增至 200 件,增长 1 倍。^③

第四,1959 年 1—3 月,苏联方面事实上直接参与了煽动并接应中国边民外逃的活动。

1959 年冬和 1960 年春,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副领事季托夫(又译迪道夫)秘书切莫合尼克等人先后 3 次到塔城专区进行非法活动,共接见当地居民 1000 人次。特别是 1960 年 1 月 1 日,季托夫抵达塔城,一反以往先到当地政府拜会的常规,径往苏侨协会接见居民,并鼓动说:“哈族人总是要回去的,你们国家不阻挡的话,你就跑。”季托夫在 3 天时间里接见与苏侨有亲属关系的中国公民 1000 人次,并有意将 1 日约见的人推迟到 2 日下午接见,待人员集合至 100 余人时,即不经当地政府许可就擅自召开大会,煽

① 《1959 年伊塔事件史料》,原页;《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00,目录员卷号 100,原页。

② 《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00,目录员卷号 100,原页。

③ 《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100,目录员卷号 100,原页。

动群众外逃苏联；又授意苏侨代表在他走后散布“你们跑我不干涉，你们自己负责”等语。此间，季托夫曾经巴克图往返苏联两次进行联系。季托夫走后不久，塔城地区即有数百人联名上书，申请去苏，成批自称是苏侨的人到政府请愿，要求去苏，甚至扬言要大批逃跑。外逃情绪得到渲染，形成一种舆论气候，边民非法越境去苏行动随即开始。从源月中起至缘月末，伊犁、塔城地区参加外逃的总人数为苑缘人，其中非法越境去苏的有远苑人。^①

在中国边民外逃的过程中，苏联边防军一改过去与中国边防站举行会晤、遣返中方越境人员的做法，于边界上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口子，接运、安置外逃群众。库则温边防站设有临时登记点，科克巴斯塔乌设有四顶帐篷、一间毡房的临时接待站，内装电话，外停数十辆大小汽车和摩托车；各接待站配有医生、救护车、流动售货车；苏方一些党政军警和特务机关人员坐镇接待站中。当大批群众逃跑越境时，苏方在塔城、裕民和霍尔果斯、察布查尔中苏沿边境地区的边界铁丝网上开了几处口子，并于夜晚打探照灯、红绿信号弹或用汽车灯照明，指示逃跑方向；苏边防军还派出大卡车到边界线上接运外逃人员至集中点，进行登记、发钱、发粮，并很快将他们内送安置于各地的集体农庄；苏方又在边界口子上散布“缘日关口子”、“缘日关口子”等谣言，传令以后过去的人要多带牲畜财产，在口子上要等到生产队大多数人到齐后才放他们过去等，促成了几次大批边民逃苏的高潮。据伊塔事件后逃苏被苏军捕获的人回来反映，苏方对他们说：“你们中国哈族从伊犁、塔城、阿勒泰过来不少人，原因是我们从多处开了边界口子。现在我们上级通知我们，边界暂时关闭，可能是你们中国政府提出了不满的意见。”^②

边民越境事件发生后，伊犁州各级党委迅速动员各方面力量，深入边境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教育和劝阻工作。在反外逃工作初期，采取

① 《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苑，目录员卷号 苑，源苑，缘苑，缘苑，缘苑，缘苑页；
《缘年伊塔事件史料》，猿，源苑页。

② 《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苑，目录员卷号 苑，源苑，缘苑，缘苑，缘苑，缘苑页；
《缘年伊塔事件史料》，源，源苑页。

说服教育的方法 积极劝阻 制止外逃。以后由于不少劝阻干部被打伤 各地在此项工作中均以民兵作后盾 坚持“不开枪、不动武、不与群众发生冲突”的原则 继续对外逃边民进行教育、劝阻。缘月 缘日 自治区党委发出《迅速制止边境地区群众非法越境的宣传教育要点》后 各边境地区反复进行“要点”的宣传教育和解释工作 使很多群众的思想情绪稳定下来 不再外逃。与此同时 伊犁州还采取政治教育与武装力量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由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民兵举行武装巡逻警戒 维护社会治安 在中苏边境执行巡逻任务 依法惩处少数组织逃跑、谣言惑众、扰乱治安的为首分子 制止了越境事态的蔓延。^①

缘月初 塔城、霍城等地的大规模外逃行动基本得到控制后 伊宁市的群众性外逃活动仍在继续发展。缘月 缘日和 缘日 有 缘人 到伊宁苏联领事馆说：“中国政府允许我们走了。领事馆人员则讲：“那你们找到中国政府要证明嘛！”缘月中下旬 每天不仅有许多人步行外逃 而且还有不少人搭乘客运站班车取道霍城逃苏 伊宁发往霍城的班车票仅 缘日 缘日 两日即售出 缘张。缘月 缘日上午 伊宁市客运站聚集了数百名群众 等候买票去霍城。当苏联领事馆的汽车经过时 副领事季托夫等人探头向人群示意 即有人高声呼喊“我们掌柜的来了”。下午 由于车辆不足 车站暂停售票。未购到车票的人聚集达 缘人 人声鼎沸 秩序混乱 发生了殴打客运站干部 围逼前来处理问题的州长开证明去苏的情况。即之 聚集车站的群众分三路进发 前往州人委、区党委和苏联领事馆。面对要求去苏的中国边民 苏领事塔查尔金别有用心地说：“我们不管卖票 卖票是中国政府的事情 我们只办理回苏的手续。”进一步激化矛盾 使这部分人全部转往州人委和区党委。是晚 远时许 在一些坏分子、其首要都是持有苏联护照或自称苏侨的人的煽动下 群众冲、砸了州人委和区党委。直接参与这次行动的苏侨有 缘人。在缘日事件中 闹事者曾三次到苏联领事馆汇报情况和请示办法 苏方均把他们推到中国政府方面 一再申说 如中国政府同意 就让他们去苏联。促使这些人更坚决地向当地政府闹事 强迫地

^① 《1962年伊塔事件史料》苑- 苑页。

方领导人写出准许他们去苏的命令书等。苏领事、副领事、秘书等还接见了闹事的首要分子和聚集在领事馆门前的闹事群众。此外，冲击州人委的人有重点地专门抢夺外事分处的文件档案，事后的次日，苏领事馆秘书不经中方许可即带了一些邮袋回国。^①

缘月猿日，在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下，苏联边防军被迫停止接运伊犁外逃居民，封锁了边界。^②事件发生后，新疆自治区党委也迅速加强了伊犁全州的边防机构。从员源年源月至愿月，增设边防站缘个，并由生产建设兵团新设了一批国营农场，以加强边境控制力量。远月底，大批边民的外逃行动基本被制止。员愿年初，自治区党委在向各地通报中苏边境情况时，指示伊犁区党委和边境地区地、州委加强军事和边防工作，落实各项战备措施。是年末，自治区人委颁布了《边境禁区管理规定》。员愿年秋至员源年春，伊犁州又根据自治区的有关命令和规定，划定了边境禁区、边境管理县和管理区。^③伊犁、塔城地区边民大规模外逃事件至此告一段落。

简要的结论：

根据笔者发现的材料以及对这些材料的分析，可以简单归纳如下：苏联在新疆特别是伊犁的深远影响，以及苏联侨民和苏侨协会的大量存在，构成了中国伊犁边民出走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这种历史背景为员愿年伊塔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和前提条件。员愿年大跃进对新疆的影响，以及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当地居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的现实，虽然构成了部分边民向往苏联的心理因素，但就其程度而言，并不能成为大规模迁徙苏联活动的根本原因。问题的实质还在于远年代初中苏关系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中苏交恶后苏联改变了对新疆苏侨的遣返政策。尽管尚未在

① 《员愿年伊塔事件史料》，员- 员页；《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员，目录 员卷号 员源员- 员源员页。

② 《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员，目录 员卷号 员源员- 员源员页。另据《员愿年伊塔事件史料》第 愿页记述：缘月猿日，苏方出于政治的需要，封闭了边界。

③ 《伊塔事件真相》，伊犁州档案馆，全宗 员，目录 员卷号 员源员- 员源员页；《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上册，员- 员页；《员愿年新疆伊塔事件史料》，员- 猿页。

俄国解密档案中发现有关材料,可以说明苏联方面具体策划了这次大规模边民外逃的事件,但是苏联突然大量地、非法地增加发放苏侨证的数量,扩大其发放范围,并千方百计鼓动侨民和中国公民越境前往苏联的实际做法,无疑使得历史上存在的那种可能性转化成为一种现实性。这就是伊塔事件产生的根本的和主要的原因。

(原文未删节本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 3 期。)

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

——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档案的新证据

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克·奥斯特曼

1969年7月至8月的中苏边界危机是冷战中最引起人们兴趣的危机事件之一。由于苏联方面实施核打击的威胁，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处在了战争的边缘。这导致苏联在中亚的军事力量急剧增强，以及中苏之间激烈的军备竞赛。与古巴导弹危机一样，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也增强了导致冷战国际格局发生根本性改组的趋势：共产主义阵营的分化，中苏关系紧张，中美缓和及“三角外交”的形成。^①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所不同的是，有关这次危机的档案材料极少。莫斯科与北京都发表了相互指责的声明等，但是除了官方记述和新闻报道之外，中苏双方有价值的材料很

^① 关于国际格局的变化，见雷蒙德·加特霍夫：《缓和与对抗，从尼克松到里根的美苏关系》修订本，1985年，145-146页，华盛顿特区，1985年；沃伦·科恩：《苏联强权时代的美国，1945-1965年》，载《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9卷，1985年，145-146页，剑桥，1985年。

少,在美国,也几乎没有什么关于这一事件的资料。^①

这即遗留下许多问题无法解答:在1952年中苏边界事件的背后,双方各自的动机是什么?一场大规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苏联的核威胁到底有多严重?对于珍宝岛(达曼斯基岛)事件,中国领导层中是否有分歧?关于这次冲突,美国知道多少情况?这场危机是如何解决的?尽管苏联的档案正在开放,但是有关这次危机的新材料却极少见到。下列两份文件,笔者得自于“联邦档案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党和群众组织捐赠文献”,这些柏林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档案馆的档案,是关于这次危机最具权威性的、前机密档案中的一部分,由此而颇具使用价值。^②

1952年边界冲突的背景

中俄边界争端由来已久。^③双方对于领土的要求与争执可以追溯至19世纪。1858年《北京条约》的签订暂时解决了这种争端。但是,中俄文化及领土扩张的野心使边境地区的冲突持续不绝。随着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获胜,以及毛泽东选择了与莫斯科结盟(1950年),中国共产党显然接受了与俄国接壤的14000公里长的边界沿线的领土现状。^④对于苏联保护和的巨大依赖性,使中国签署了1951年《边境河流航行协定》,该协定意味着他们赞同现存的边界控制权。这包括承认苏联对阿穆尔^⑤和

① 依据美国、苏联和中国发表的材料对这次危机所作的研究成果中,最好的是托马斯·鲁滨逊的文章《中苏边界冲突》,载《国外外交:作为政治工具的苏联武装力量》,国际-猿猿页,华盛顿特区,1955年。此外,见托马斯·鲁滨逊:《中苏边界争端:背景、发展与1952年猿月冲突》,载《政治学评论》第27期(1952年12月),1952-1953页,以及他的《中苏边界局势,1952-1953年军事、外交与政治策略》,纽约,1953年。关于这次危机的其他叙述有阿瑟·科恩的《1952年中苏边界危机》,载亚历山大·乔治编:《避免战争:危机控制中的问题》,1952-1953页,西点,1953年,以及理查德·维希:《中苏政治危机:政治变革与交往研究》,剑桥,1954年。关于美国的有关文件,见国家安全档案馆编:《从杜鲁门到克林顿总统国家安全令》(1952年),1952页。

② 关于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档案的研究,见笔者《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新研究》一文,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编:《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1952年秋季号,猿猿猿-猿猿页。

③ 安泰松:《中苏领土争端》,费城,1952年。

④ 科恩:《中苏边界危机》,1952页。

⑤ 即黑龙江。——译者注

乌苏里界河以及 70 多个岛屿中的 20 余个岛屿的军事控制。这些岛屿位于东北边境地区最远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水道上。协定还要求中国在使用这些河流和岛屿之前，须经苏方许可。对于西北新疆边境省区中国牧民使用苏方所拥有的牧场问题，也作了类似的规定。边界纠纷从未停息过，不过地方当局使这种纠纷一直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上。^①

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末中苏之间裂痕的进一步扩大，以及在 1969 年布加勒斯特各国共产党国际会议上苏中领导人冲突的公开化，搁置起来的边界问题被重新提出。现在看来，边界问题显然只是中苏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的一个征兆，而不是导致这种紧张关系加剧的原因。不论怎样，中苏双方都发现，边界问题作为他们进行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对抗的工具，是极其有用的。对于中国来说，边界事件是促成其进行火药味十足的意识形态挑战并使苏联防卫的一种手段。中国方面声称，中苏边界是沙皇俄国通过削弱和瓜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的。中国领导人利用边界冲突事件揭露说，苏联的政策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并由此给它贴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标签。此外，北京希望通过边界事件向苏联宣告，中国将不再容忍苏联对边界争议地区的颠覆行为。中苏边界纠纷 1959 年在新疆肇始，20 年代初继续发生。^②

莫斯科最初拒绝接受中国关于“不平等条约”的说法，并拒绝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北京可能早在 1956 年就提出过边界谈判的要求，并于 1959 年再次提出。莫斯科肯定认为，谈判将会为现存合法的边界招致问题，打开潘朵拉的盒子。由于在古巴导弹危机风波中中苏之间的争论，以及中苏边界事件的升级，北京宣称，他们已准备在 1960 年的几次对印军事作战中投入更强的军事力量，莫斯科终于同意就边界问题进行磋商。继 1963 年 10 月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致函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之后，

① 哈维·纳尔逊：《大国与不安全因素：北京、莫斯科与华盛顿》，1973 年，第 1 章，博尔德，1973 年；奥列格·鲍里索夫、丹尼斯·科洛斯科夫：《中苏关系，1949—1960》，1960 年，布卢明顿，1963 年。

② 科恩：《中苏边界危机》，1961 年；维希：《中苏政治危机》，1961—1962 年；鲁滨逊：《中苏边界冲突》，1961 年。

1950年 10月秘密谈判开始。但是,由于中国对西伯利亚大片地区提出领土要求,以及要求苏方承认历史上中俄边界划定的“不平等”性质,谈判不久即陷入僵局。中苏双方在确定边界线问题上也存在分歧。莫斯科在准备做出让步,即以中苏东北界河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的同时,又不愿意放弃对界河上 200余岛屿中大部分岛屿的控制。当毛泽东宣布对苏论战,谴责苏联的“帝国主义”行径时,赫鲁晓夫决定中止会谈(1950年 10月)。^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导致中苏关系更趋恶化。继 1950年 10月与苏联总理柯西金的会谈失败之后,毛泽东在 1950年中断了中苏两党关系。北京与莫斯科的联系降为低水平的接触。与此同时,边界局势进一步恶化。春季,北京单方面宣布严格航行条例,控制界河上的“外国”船只(如苏联的)。是年末,沿中苏、中蒙边界爆发了小规模武装冲突。中国宣称对中国东北地区中俄界河中方一侧的岛屿拥有主权。一批中国士兵和渔民被派送上这些岛屿,他们接到指示,如果正常的巡逻路线遭到苏联边防军的阻挡,可以进行战斗。此后不久北京声称,仅在 1950年至 1952年期间,就有 200起边界事件发生。^②

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新的苏联领导集团以增加经济和军事压力来回应中国的对抗态度。在这种对抗之初,苏联停止了对中国说来极为重要的经济援助,并从中国撤走了顾问。此外,莫斯科还开始逐步加强苏联东部的军事力量。1952年后,苏联常规兵力的水平显著提高,从约 10个师扩充

^① 纳尔逊:《俄国与不安全因素》,287页(1952年苏联挑起第一次边界事件后,中国方面即明确提出,边界问题要通过谈判来解决,在未解决前应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是年 10月和 12月,中国政府先后两次主动向苏联政府建议举行边界谈判。在中国的倡议下,1950年 10月至 12月,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由于苏方不承认中国清政府与沙俄政府所签订的有关两国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不同意以那些条约作为惟一基础来解决边界问题,要求中国将沙俄时代和苏俄时代超越那些不平等条约而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也划归苏联,谈判没有取得结果。参见《当代中国外交》,180-181页。——译者注)。

^② 科恩:《中苏边界危机》,106页;纳尔逊:《俄国与不安全因素》,287页;鲁滨逊:《中苏边界冲突》,106页(1952年 12月 10日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指出,从 1950年 10月至 1952年 12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 200起。见 1952年 12月 10日《人民日报》。——译者注)。

到 1959 年的 10 个师 (1950 年代中期大约 15 个师)。^① 莫斯科还决定部署 2 枚中程弹道导弹以及 2 枚洲际和 5 枚短程火箭。另外,还积极加强对苏中边境地区的军事控制。在增加对北京地缘战略上的压力的同时,莫斯科又同蒙古签订了为期 10 年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规定联合苏蒙防御力量,苏军 10 个师由此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②

尤为重要的是,莫斯科并不回避使用核威胁,并且释放核威慑的烟幕,赫鲁晓夫早在 1959 年 10 月就曾经宣告说,苏联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包括使用“新式歼灭性武器”来保卫自己的边境。^③ 在整个边界危机期间,莫斯科或秘密或公开地反复炫耀其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可能性。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和毛泽东显而易见的“狂热”的“机会主义”,莫斯科加强了它在亚洲的核力量,并于 1959 年装置了直接针对中国的反弹道导弹系统。

尽管如此,但是,几年来中苏边界冲突并未发展至真枪实弹的交战。中国的渔民和军人继续进入乌苏里江和阿穆尔河上的边界岛屿,声称这些岛屿是中国的。苏方每次都派出边防分队将中国人驱逐出岛。双方通常均避免交火。数年来,苏联和中国都采取一种近乎公式的做法和口头原则,通过不交战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甚至在毛泽东于“文化大革命”期间转而采用“武装巡逻”政策(即必要时可以开火的政策)之后,双方仍然避免交战。北京和莫斯科显然都对进行较大范围的战争不感兴趣。^④

1959 年 10 月边界冲突

中苏边界“冷战”至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59 年 10 月)并阐明“勃列日涅夫主义”之后而转入热战。中国领导人很可能认为苏联关于当社会主

① 纳尔逊：《俄国与不安全因素》195 页。

② 理查德·所罗门和笠川正乔编：《苏联远东军备建设》，195-196 页，多佛，1959 年；阿维格多尔·阿塞尔柯恩：《苏联安全战略的演变，1953-1959 年》，195-196 页，纽约，1958 年；纳尔逊：《俄国与不安全因素》195 页。

③ 纳尔逊：《俄国与不安全因素》195 页。

④ 科恩：《中苏边界危机》，195-196 页。

义陷入危难时,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权进行干涉,以及勃列日涅夫主义也适用于亚洲的理论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一种威胁与挑战。据说,毛泽东明确的接班人林彪曾提醒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苏联将要进攻中国。10月,林彪发布了一号命令,全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如周恩来,可能还有毛泽东,显然对莫斯科准备发动对中国的战争这一点表示怀疑。^① 尽管存在这些分歧,但是中国领导人还是选择了对苏联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中国边防军被指令着军装、携带武器,如与苏方遭遇,必要时可以开火。从1959年末到1960年1-2月,中苏双方冲突愈益激烈(尽管仍未交火),直至1960年7月20日,非武力对抗才转变为火力开战。苏联给东德领导集团及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传阅的情况通报记录,提供了苏联关于1960年7月20日事件的第一次内部报道。

尽管可以断言说,7月20日事件是此前边界冲突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事件发生后几天传送给东德领导集团的备忘录,反映出苏联对中国在伏击中所展示的新水平的准备工作和武器装备忧虑不安。此档案材料表明,苏联被中国违反以往解决边界冲突的惯例而实施开火的行为弄得目瞪口呆。这是冲突的序幕,还是真正的战争?这个材料还在某种程度上为苏联叛逃者阿尔卡季·舍甫琴科所证实。舍甫琴科争辩说:“莫斯科对达曼斯基岛事件的反应如同遭受电击一般。苏共中央主席团对中国人有可能要大举进犯苏联领土的现实,感到惊恐不安。……百万中国人入侵的噩梦令苏联领导人近乎于狂乱。尽管我们的兵力占据压倒优势,但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要对付如此强大的攻势,谈何容易。”^②

苏联对中国的主要反应在于担忧边界冲突会削弱其控制力。中国在伏击与战斗中展示的进攻性姿态,显著地表明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对于莫斯科来说,7月20日事件还具有地缘战略上的意义:它暴露了“北京要与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和西德进行机会主义的政治调情的企图”。

^① 关于外交部长周恩来的作用,见韩素音:《长子:周恩来与现代中国的缔造》,78页,纽约,1983年。

^② 阿尔卡季·舍甫琴科:《莫斯科决裂》,159-160页,纽约,1963年。

文件第 8 和第 9 号披露了北京与西方的“调情”是如何在非常具体的问题上影响苏联的战略利益的：从 1950 年 1 月以来，中国拒绝将苏联的军备物资运往越南，而这是早在 1949 年 1 月苏中双方就曾达成过协议的。当然，苏联的反应也受到它为其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国遭到不断加剧的军事威胁感到担忧这一因素的影响。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领导集团由此采用了一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方针来对危机作出回应：一方面，莫斯科寻求进一步孤立北京，并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压力。10 月 10 日的冲突开始引起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激烈争论。苏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主张对中国的工业中心实施核打击；其他人则要求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袭击。^① 勃列日涅夫最后决定，进一步加强苏联东部地区常规兵力的配备（包括从西部调来轰炸机群），并且不排除在战术上使用原子武器。^② 10 月 15 日之后，苏联在动用空中力量和实施核打击之前，以重炮和压倒优势的兵力对岛上的中国边防站发动了攻击，显示了他们以优势兵力以牙还牙，进行报复的决心。^③

但是另一方面，勃列日涅夫还寻求通过恢复与中国的谈判来摆脱危机。10 月 15 日事件后不到一周，莫斯科便探求与北京重新建立联系。文件第 9 号，即 1950 年 10 月初东德驻北京使馆的电报，就是关于苏联最初进行和平试探的一份材料。这份电报报告了由苏联驻北京代办发出的一则消息，此消息说 10 月 10 日，柯西金代表苏共中央主席团，试图通过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现存的电话线路直接与毛泽东进行联系。但是北京方面无论如何都拒绝与柯西金通话。这反映了莫斯科对危机的关注，据说柯西金指出，“如果有必要”，他将同意与周恩来会见。此后，当苏联外交部向中国外交部转达苏方举行会谈的渴望时却被告知，苏共中央主席团与中共之间的直接联系已不再“有益”。毛泽东的不妥协让步，肯定缘于莫斯科只有有限的军力这样一种认识。此外，毛泽东可能还想通过冷落柯西金，来寻求

① 纳尔逊：《大国与不安全因素》，第 17 页。

② 洛厄尔·迪特默：《中苏关系正常化及其国际影响》，第 103、104、105、106 页，西雅图，1980 年。

③ 科恩：《中苏边界危机》，第 10 页。

加强他在 1952年 9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地位。^①

不论怎样,莫斯科继续主动提出进行边界会谈。7月 19日,莫斯科公开宣布要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两周后的 9月 18日,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再次提出立即恢复边界谈判的建议,但是毫无用处。于是 8月份,莫斯科将此情况通报给了它的东德盟友(文件第 8号和第 12号)。根据给东德的这些报告记录看,在整个 8月份,19日、20日、21日和 22日,中国在西部边界地区及其东部有争议的界河地区的行动达到高潮。

对于中国的不妥协让步,莫斯科在 1952年整个夏季期间,继续采取“高压政策”,进一步加强军力配备,以确保战略上和常规兵力上的绝对优势。的确,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苏联对 7月 19日战役之后沿中苏边界一带发生的冲突,特别是 8月 18日在新疆的中亚边界距扎拉纳什克尔以东 100英里的地区发生的冲突事件,负有极大的责任。^② 凭借兵力和武器装备占据优势的有利条件,苏联寻求通过频繁的边界入侵事件,向中国显示他们的决心。中国显然对苏联的方针感到焦虑不安,他们指责苏联仅在 7月至 8月期间就“蓄意”制造了 19起边界入侵事件。考虑到苏联这时作出的有可能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暗示,如托马斯·鲁滨逊所言,1952年夏季的事态可以被看作是,“莫斯科政治、军事压力和宣传声势兼施并用,迫使北京采取行动——恢复会谈,否则它就要进行对抗的一个极好的例子”^③。

就恢复边界谈判而言,苏联对边界冲突的策略是成功的。8月,中国政府通过一个照会发出了准备会谈的信号。与前些年拒绝会谈相反,10月,中国同意举行一次边境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会议,该委员会成立于 1952年。在由于中方的退席,会谈一度失败之后,11月,双方终于签订了一个新的议定书。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中国终于同意与苏联举行高级会

① 据韩素音:《长子:周恩来与现代中国的缔造》一书记述,对于局势的变化,柯西金比勃列日涅夫更警觉,他试图与周恩来联系,但是由于北京那位富于“文化大革命”精神的年轻话务员说“我们不同修正主义者说话”,而告失败(1952-1953年)。另见迪克·威尔逊:《周恩来的故事》,1952-1953年,104页,伦敦,1952年。

② 维希:《中苏政治危机》,1952年。

③ 鲁滨逊:《中苏边界冲突》,1952年;另见埃德蒙·柯乐博:《中国和俄国:“大竞赛”》,1952年~1953年,纽约,1952年。

谈。1959年10月15日，柯西金有可能在河内会见周恩来。^①

文件第 苑号，即苏联给东德领导集团的情况介绍备忘录，是一份柯西金与周恩来这次会谈的记录。有关这次关键性会谈的详细情况尚鲜为人知。根据此备忘录，这次会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实现和平解决危机目标而迈出的第一步。对于苏联方面提出的，利用柯西金赴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之机与周恩来会晤的建议，中国“相当快”即作出了答复，不管怎样，柯西金率领的苏联代表团离开河内后仅一个多小时就获悉，中国方面准备进行会谈。莫斯科对会谈的期望值在逐步降低，柯西金已抵达了苏联的中亚地区，这时又转而飞往北京。在那里，柯西金与中国领导人周恩来、李先念和谢富治进行了会晤。^②

双方集中围绕边界问题，进行了 源小时坦率的会谈。^③根据苏方的报道，周恩来声明说，“中国对苏联没有领土要求”，尽管他仍然坚持关于历史上中俄条约的不平等性问题，“认为现存的边界是根据那些条约所确定的”。当周声明中国并不打算进攻苏联时，柯西金也否定了关于莫斯科“正在准备一场针对中国的防卫性反击”的“帝国主义的宣传图谋”。双方准备进一步就边界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并就三条原则达成了一致意见：(员)维持边界现状；(圆)避免武装冲突；(猿)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柯西金还建议，扩大中苏双方之间的贸易关系和经济合作，实现铁路和航空联系的正常化。尤为重要的是，当周作出保证后，苏联总理还要求北京减弱对苏联的政治、思想批判。在关于“不做对世界帝国主义有利的事”这一点上中苏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为了给中国留些面子，考虑到会在是否“允许”采用一种“适当调子”的问题上引起争论，柯西金作了让步。

苏联领导人对柯西金与周恩来的会见将导致边界问题的解决这一点，显然相当乐观，他们甚至对这次会见将导致苏中关系的彻底改善抱有

① 维希：《中苏政治危机》，196页。

② 关于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谈一事，韩素音的《长子》一书未提及。但是可见威尔逊《周恩来的故事》，196页；西摩·托平：《两个中国游历记》，猿6页，纽约，1960。

③ 据中苏双方记载，会谈进行了 猿小时 源分钟。见柴成文：《周恩来领导我们进行中苏边界谈判》，党的文献》1985(猿)；叶利扎维金：《柯西金与周恩来北京机场会谈》第一部分，《远东问题》1960(缘) 136页。——译者注

希望。在 10 月 17 日会谈“表明中国领导集团的基本态度并未发生变化”后，11 月初，作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副主任的拉什马宁仍然向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国际关系部的高级官员布鲁诺·马赫罗指出，“边界问题的解决还有一些可能性”（文件第 15 号）。根据拉什马宁所言（据马赫罗报告），苏联认为，边界问题作为一个“关键性战略问题”，对它的解决应该“营造出一种诚挚的气氛”。莫斯科还建议“适当减少双方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宣传材料”，甚至提出以北京作为双方会谈的地点。苏联边防部队“严格命令要避免任何挑衅性行动……”

拉什马宁和大部分苏联领导人可能认为，北京同意恢复谈判是出于他们的软弱。中国国内已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国领导集团发现，他们处理对外政策问题已相当困难”。中国已在意识形态上陷于孤立，莫斯科沿苏中边界作出的强硬反应“给毛集团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但这被证明是一种错觉。在 1952 年 10 月 17 日开始延续至整个 1953 年的谈判过程中，北京顽固地拒绝解决边界问题，相反却要求以双方赞同互不侵犯为先决条件。中国的谈判立场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持续存在的苏联核打击的威胁造成的，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中国领导集团是通过赞同与苏联进行谈判来打“俄国牌”，尽力促使尼克松与之联手，协助其解决问题。1954 年尼克松访问北京表明，这个战略最终是成功的。^①

（本文系作者提交 1995 年 1 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李丹慧译。）

① 鲁滨逊：《中苏边界冲突》，1952 年，第 15 页。

中苏边界冲突：对亚洲冷战的新探讨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大卫·沃尔夫

俄

国与中国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今时代东北亚历史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冷战时期也不例外。事实上可以认为，这种两个社会主义强国从兄弟党关系到相互威胁的双边关系的巨大变化，是冷战时期大国权力平衡中的最重要的转折点。此外，这个巨大的寒流导致了从“两个阵营”到地缘政治中多极（至少是三极）世界的根本性转变。^①

在 1980 年代末，随着苏联改革的出现，有些人非常谨慎地看待 1980 年代初的中苏争端，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同一性比其差异性更具有生命力。但是，1985 年 7 月上旬发生在达曼斯基岛（珍宝岛）中苏边防部队之间的武装冲突最终向大多数讨论者证明，中苏之间的对立是名副其实的。^② 无论是中国同志把领土争议看得过于严重，还是这一争端根本没有受到苏联的

^① 例如，格里菲斯在 1985 年宣称：中苏分裂表明“战后的两极世界正在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多极结构的道路”。见威廉·格里菲斯：《中苏分裂》，141 页，剑桥，1985 年。狄特莫把 1985 年看作是从“对立三角”到“浪漫三角”转变的分水岭。见劳威尔·狄特莫：《中苏关系正常化及其国际影响》，1985 年，西雅图，1985 年。

^② “珍宝”在文字上意味着“财富”。实际上这是一块没有什么价值的沙洲。在本文中，由于大部分使用的是俄国材料和俄国名称，为了统一起见，我这里使用“达曼斯基”。该岛目前由中国人占领。

重视军队的集结和边境的紧张改变了居住在俄中边境地区数百万人的日常感受。本文将描述一些这方面的变化,然后提出一些不同于中央的地方的看法,从而向研究冷战史的历史学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从 1954 年代中期开始持续到 1960 年代,苏联“失去中国”经历了几个阶段。由于北京的转变不断地使莫斯科感到惊讶,苏共中央决意加强对中国的研究。苏共中央档案馆的文件表明了这方面的积极活动。虽然新成立的远东研究所实行政治上的集中制,这在组织方面是一个新的特殊现象,但还是可以注意到其地方主义的苗头。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如俄中边境成为敌对邻国在地理上的缓冲一样,俄国的汉学(及中国的苏联学)也成为苏联对外政策制定时感情上的缓冲。进行对比观察还可以令人感兴趣地注意到,与苏联的情况完全不同,美国“失去中国”却导致了起诉、责备,以及研究中国的机构与美国政府之间的严重分裂。

那么,1954 年 7 月 1 日早晨究竟发生了什么?① 我们不知道,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中国和俄国的士兵都在据哈巴罗夫斯克以南约 100 英里的乌苏里江的一个岛上。这个岛像数百个其他的岛屿一样,位于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宣布,按照国际惯例这个地理上的“珍宝”应该属于中国。② 然而,俄国人的理解则依据于 19 世纪边界条约的地图。中国方面为了支持自己的要求,军队和平民几年来非常频繁地登上这些岛屿,而苏联的边防士兵可能是接到了命令,避免发生对抗和冲突。③ 虽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彻底恶化,但是直到武装冲突爆发以前,双方之间那种能令人联想到中央、省和军事当局已决定使紧

① 俄国的官方观点可以见鲍里索夫和科洛斯科夫:《中苏关系,1954-1964》,第 10-11 页,莫斯科,1964。中国的观点见《北京周报》第 1 期,1954 年 7 月 1 日,第 1 页。另见马克斯韦尔:《中国对 1954 年珍宝岛战斗的描述》,《中国季刊》第 1 卷(1954 年 10-12 月),第 1-2 页。

② 达曼斯基岛本身面积有 10 平方公里。在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 10 个岛屿大约有 4 个岛是有争议的。它们的总面积大约 10 平方公里。这些岛的 1 是由大岛组成的,黑瞎子岛在乌苏里江和阿穆尔河(黑龙江)的汇合处。

③ 1954 年 7 月 1 日,《真理报》公布了据说是从一个犯境者那里得到的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给阿穆尔河渔民的指示。该指示说:“我们断定鉴于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苏联当局不会使用武力把我们的渔民赶出这些岛屿。”见鲍里索夫前引书,第 10 页。

张状态逐步升级的言词上的相互攻击，并没有加强，珍宝岛事件本来可以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尽管事后双方都提出了对方有预谋的证据。^①

然而，看来十分清楚，重要的是中国人热衷于纠缠领土问题，不论其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还是战略方面的考虑。尽管 1957年 8月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要求双方“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 1957年中苏关于《边境河流航行协定》中的言词，已经暗示出在准确划定边界线方面的分歧。在中苏和睦相处时期，双方的声明中允许两国在主航道上航行，而没有要求确定领土主权。中国人还说，在 1957年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期间以及 1957年周恩来在莫斯科期间已经提出了领土问题。因为中苏的分歧还没有公开化，作为这两次访问的结果的宣言和声明中，都没有提到这件事。1957年中国政府的试探，似乎也没有引起苏联的注意和热情。^②

于是，苏联拒绝讨论中国人不断提出的问题，可以被认为是加深了中苏之间的分歧。几年之内，随着针对莫斯科的一项总政策的出台，中国似乎已经采取了一种新的方式“全面”解决边界争端。1957年 9月，苏联的一个声明谴责中国“有计划地侵犯苏联边界。仅仅 1957年一年，中国方面就有 1000 次以上侵犯苏联边界的记录。并正在试图未经许可而‘开发’某些苏联的领土”。据说，1957年 1958年有 1000 次侵犯，有 100 万“中国平民和军人”卷入。^③ 尽管这些数字可能有所夸大，但是苏联边防军没有接到正式命令，可以用武力对付未经许可的越境者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日常边界摩擦的忧虑导致了 1957年 8月 15日北京谈判的开始。在中国谴责了禁止核试验条约（1957年 8月 15日）以及赫鲁晓夫的在世界范围内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领土和边界争端的建议（1957年 8月 15日）之后，谈判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虽然在 1957年 8月 15日会谈中断之前没有达成实质性结果，但这次会谈还是搞清了双方迫切要求得到的东西，以

① 苏联军队宣称每年有数千名中方犯境者（见后）。虽然这可能有些夸大，但很显然没有常规命令说可以用武力对付非法过境的中国人。

② 鲍里索夫前引书，第 100 页；崔春华（转引自原书译者：《70 年代的中苏边界争端》，第 100 页）；奥克维尔，第 100 页。

③ 彼得·乔奈斯和西安·凯维尔编：《中国与苏联》，第 100 页，纽约，1958 年；鲍里索夫前引书，第 100 页。

及他们之间的鸿沟。假如中国人放弃进一步的要求,俄国人准备在特定的基础上放弃一些领土。而另一方面,中国人要在《北京条约》(1860)和《璦琿条约》(1858)的基础上解决争端,同时坚持要俄国人承认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俄国人担心这样会为进一步的和更广泛的要求打开大门。

仿佛是证实了这些怀疑,毛泽东在此边界谈判期间曾向一批来访的日本社会主义者说:“大约一百年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的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堪察加等地就是苏联的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这一谈话说明,此次关于 14 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讨论可以扩大到包括一片 3 倍于此的地区。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在接待另外一个日本代表团时回答说,内蒙古、满洲、西藏和新疆都具有“非中国”的特性。显然,俄国和中国都没有准备认真讨论边界的分界线问题。然而,他们即将在广阔的俄中边境地区宣布并实施他们相互对立的要求。^①

1959年 9月 15日,当两个共产主义强国之间的冲突日益紧张的时候,尤里·安德罗波夫、鲍里斯·波诺马廖夫和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一致同意采取一些措施来应付正在恶化的局势。除了确保到中国去的俄国人将受到警告之外,他们还指示克格勃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查禁可能渗透到苏联境内的,宣传众所周知的中共领导人特殊观点的出版物,建立另外的外国资料中心,重新出版和寄送这样的出版物给苏联的单位和个人”^②。通过在边境封锁来自中国的材料,苏共中央不仅把结束边境交易活动扩大到一个新的领域,而且还加强了党对有关“公开的、加深分歧的……动摇兄弟党团结”的情况的控制。只有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中,才能使苏联人民确信需

① 俄国的建议本质上是不改变这些岛屿的边界线。俄国人拒绝进行“边界重新谈判”,以避免为其他(如日本)的要求开创一个先例。毫不奇怪,日本听众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争论中精明地得出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注释。引自乔奈斯前引书, 202-203页。关于边疆和边界线之间关系的更多的论述见大卫·沃尔夫:《地区特性:俄国与东北亚》,载《在亚洲重新发现俄国》, 202-203页,纽约, 1959年。

② 苏共中央档案馆,全宗 源目录 卷宗 202-203页。

要实行对中国态度的根本转变。^①

1956年12月15日，苏共中央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改进对现代化手段的大规模破坏进行防御的普及教育”。为了响应这一命令，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评定了他们自己的国民防御方案，并把这一方案确定为“防空准备”的标准规定。“在许多企业、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学校……简单化和形式主义”妨碍了“基本知识”的掌握。随着远东地区边防部队在这个时候得到加强，地方政府可能警觉到在他们的地区进行这些训练演习的特殊重要性，尽管与原来的敌人美国的关系已经暂时达到最友好的程度。^②

事实上，地方领导人有他们自己对于中苏关系恶化进行判断的情报。哈巴罗夫斯克区党委第一书记 叶利谢耶夫以有关地方的事务为基础描述了这一过程的发展。

1950年代初，我们边区和黑龙江省这两个边境地区的联系开始在各方面减少……1955年，中国公民停止为我们提供医疗帮助。1956年，向中国运送货物并回到阿穆尔河岸边的轮船被停运了。1957年，旅游团体的交换基本上停止。1958年，边境贸易下降为原来的 1/3。1959年，中国方面拒绝向远东运送木材，还拒绝通过火车交换货物。1960年，中国当局继续公开地背叛……^③

为了取代这些边境交往的友好睦邻活动，俄国远东地区也像接近中

① 引自 1956年12月15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见乔奈斯前引书，第107页。安德罗波夫、波诺马廖夫和苏斯洛夫与列昂尼德·伊利切夫、斯捷潘·契尔沃年科一起，也代表苏联参加了 1956年12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与邓小平、彭真和伍修权的秘密讨论。这次试图弥合鸿沟的最后努力，除了决定于12月15日开始无限期休会以外，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乔奈斯前引书，第107页。

② 哈巴罗夫斯克国家档案馆，全宗 30，目录 129卷宗 1052号页。

③ 哈巴罗夫斯克国家档案馆，全宗 30，目录 129卷宗 1052号页。切尔内从 1952年到 1959年担任犹太自治州的第一书记，而后从 1959年到 1960年回到远东任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第一书记。见约翰·史蒂芬：《俄罗斯远东史》，第107-108页。斯坦福，1960年。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切尔内注明 1959年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因为他所举的第一个例子是在 1959年。在切尔内自己的“边境地区情况调查”中可以看到，贸易额的降低也被夸大了，在那里，1959和 1960年的数字分别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 1000和 1000个卢布。

国的其他地区一样,不断地被要求开展敌对活动。例如,在 1950 年,标题为“关于加强对中国的无线电广播的措施”的第三条规定,“在哈巴罗夫斯克建立一个无线电监听站,审查北京广播电台的国内广播和资产阶级汉语台的原始广播”。

当然,不止是哈巴罗夫斯克这样做。同样的文件也发给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四个部,要求在斯沃博德内(阿穆尔州)、新西伯利亚、杜尚别(塔吉克斯坦)、伊尔库茨克也建立起相应的无线电广播站。^①随之组织起一支配备一组 20 个评论员的常设编辑队伍,并选派记者到北京大使馆为这个广播网收集资料。第三条规定还要求“1950 年要对中国进行连续 24 小时的广播”,以便“系统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进行宣传”。^②

虽然上述文件的日期是 1950 年 10 月 15 日,即在中苏关系的低潮时期,此后两个星期苏共中央就已经公开攻击“毛泽东及其一伙”的行为“在客观上帮助了帝国主义”,但对于每日对华广播的时间来说,这时已经达到了这一活动的高潮,从 1950 年 10 月 15 日的 12 小时增加到 1950 年 10 月 20 日的 24 小时。1950 年 10 月 25 日又增加到 36 小时。^③

达曼斯基岛的边界冲突发生后,俄国很快发现自己需要在远东地区为勘定边界提供专业人员。1950 年 10 月 15 日,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一个局通过了“关于在边疆区边境地区加强群众政治工作以及加强边境警戒措施”的决定,这在靠近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河的城镇和村庄中引出了许多举措。首先,地方机构“主办”边防站,提供设备、书籍和音响器材。由于组织了 10 次音乐会和会议,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第二,进行宣传鼓动,阐明“毛泽东集团的反苏、反马克思主义政策”,并公布边境“挑衅”事件加剧的真相。宣传的对象是俄国当地居民。让民兵熟悉武器并进行射击训练。最后,内务部和克格勃通过在靠近边境的地区更频繁地检查护照来

① 根据 1950 年 10 月 15 日的决定,计划(可能已经实施)在蒙古也扩大这方面的能力。见苏共中央档案馆,全宗 源目录 卷宗 源 17 页。

② 苏共中央档案馆,全宗 源目录 卷宗 源 17 页。

③ 这三次增长情况,见苏共中央档案馆,全宗 源目录 卷宗 源 17 页;卷宗 源 17 页;卷宗 源 17 页。塔什干的维吾尔语广播是 1950 年 10 月 15 日恢复的,停止了不到 1 年。见苏共中央档案馆,全宗 源目录 卷宗 源 17 页和目录 卷宗 源 17 页。

逐步加紧实施“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边境地区的边境制度规定”^①。

这种对于边境地区进行动员的需要，看来是俄中边界线定位不明确的直接结果。在达曼斯基岛冲突之后的几年中，这种状况继续伴随着陷入僵局的边界谈判和边境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漫长而毫无结果的会议存在着。切尔内报告说，1954年的几个半月的会议“毫无结果”，而1955年、1956年费时几个半月，双方竟未能在议事日程上达成协议。^②

1956年7月14日，哈巴罗夫斯克克格勃头子 隆彼得洛夫向边疆区主席切尔内的报告断言，1956年春夏界河的状况“依然是复杂的”。中国人仍然坚持把主航道作为边界线，并且抓住其他可以谈判的问题作为提出这一要求的筹码。早在春天中国人就宣布他们将维修在主航道一侧的全部航标灯，并不断这样做，进而改变甚至移动中国的和俄国的设施。但是，克格勃报告说，边界地区总的状况似乎有所改善，中国的小船抱着友好的态度向俄国船只致敬，毛的像章到处都是，而小红书看不见了。只有几次中国 1956 岁的小孩子向岸边的苏联船只投石块。^③

尽管俄国人面对中国人的这些活动不断进行自我约束，还是时有发生事件发生。例如，1956年 10月 10日，一艘中国军用快艇因撞到了一艘苏联驳船的下部而失事。俄国人指责快艇未能与驳船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中国人则指责说他们的船受到撞击，引起 3人死亡。^④

鉴于恢复贸易所得甚多而如果在边界和边境周围地区不断发生冲突则损失甚大，地方机关向中央游说，要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重开边境贸易。1956年已经开始的谈判目的在于恢复中断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边境渔业消费合作社与黑龙江省贸易公司 1956年的合同。俄国人不允许中国人继续用中国名字（伯力）称呼哈巴罗夫斯克，这反映出了一个新

① 哈巴罗夫斯克国家档案馆，全宗 孕- 猿，目录 怨卷宗 圆源页- 猿页。这种对保卫边疆的担忧，来自于对 猿年代在远东培育起来的获国家支持的“前线精神”的某种回顾。至于这方面的情况，以及当代“前线精神”更多背景的介绍，见史蒂芬前引书，猿- 猿页- 猿页。

② 哈巴罗夫斯克国家档案馆，全宗 孕- 猿，目录 猿卷宗 猿页- 猿页。

③ 哈巴罗夫斯克国家档案馆，全宗 孕- 猿，目录 怨卷宗 源卷第怨- 猿页。

④ 哈巴罗夫斯克国家档案馆，全宗 孕- 猿，目录 怨卷宗 源卷第怨- 猿页。在崔春华前引书中谈到了 猿年代发生的三次以上的边界事件（猿- 猿页）。

的敏感问题,它几乎破坏了谈判。最后终于决定草签一个不包括任何地方名字的协议。^①一份 1952 年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给莫斯科中央委员会的备忘录回顾了过去和现在与中国的贸易联系,并总结说:“按照目前的交换条件恢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境贸易似乎是恰当的。”^②

当俄中边境贸易已经非常明显地恢复起来以后,苏方 1952 年发布的一个相当强硬的声明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切尔内认为,加强边境地区的联系将:(一)“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中国人民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二)起到平衡和促进苏日贸易的作用;(三)改善对苏联远东地区的供应。切尔内还要求地方组织在对中国的贸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建议扩大社会、文化和体育方面的联系。^③

苏联对边界的要求在谈判和报刊中都得到汉学家在学术方面的支持。在达曼斯基岛冲突后不久,北京发表了一个声明说,该岛“从来都是中国的领土”还说:

1911 年以前,乌苏里江……还是中国的内河。只是到 19 世纪鸦片战争以后,那时资本主义列强相继把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乌苏里江才在 1858 年中俄《北京条约》中成为中国与俄国边界的一个组成部分。

莫斯科回答说,“这类不平等条约问题……从头到尾都是捏造的”。

为了支持这些反驳,一场全面的“学术冷战”动员学者们去进行历史研究。好在由于苏共中央在 1950 年代初采取的措施,这场文字战争的战士已经进入了角色。例如,1950 年 12 月 1 日在北京边界谈判期间,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和勃列日涅夫签署了一个关于“在苏联的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以及制图方面对苏中边界形成的历史的错误解释”的决议。这个决议要求重新出版有关边界形成和中国人在西伯利亚、俄国的远东及中亚地区影响的教学材料。决议还命令科学院“从正确的立场出发”,准备有

① 哈巴罗夫斯克国家档案馆,全宗 39, 档案目录 102 卷宗 102 卷宗 102 页。到 1950 年代初,远东贸易公司已经取代渔业联合会垄断了对外贸易。

② 哈巴罗夫斯克国家档案馆,全宗 39, 档案目录 102 卷宗 102 卷宗 102 页。

③ 哈巴罗夫斯克国家档案馆,全宗 39, 档案目录 102 卷宗 102 卷宗 102 页。当然,所有这些事情都必须采取“一种自愿的、平衡的、有计划的方式,同时在政治上保持高度的警惕和保留”。

关边界的“与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部门保持一致”的“科学材料”。^①

1953年11月15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决议已经指出，需要加强汉学专家的研究。1953年12月15日，即在北京苏联大使馆外发生大规模群众示威之后两天，苏共中央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阐明了“文化大革命”与攻击苏联是“修正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显然，苏联领导人和苏联汉学家未能预见到中国向极端主义的突然转变。这种缺乏及时提供情报的状况必须纠正。

12月15日的决定标题为《关于改进有关中国的科学研究和扩充汉学干部队伍的决定》，该决定共有15条，其中11条是安排建立“一个内部的中国当代问题研究所，附属于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所（内部的）中国处”。这个组织被授权吸收100名科研人员，“公开”的名称是远东研究所。

这个决定还向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以及符拉迪沃斯托克、伊尔库茨克、赤塔和哈巴罗夫斯克的中学“接受专门的中文教育”的大批对汉学感兴趣的人提出号召。强调对中国和“中国领导人反马克思主义观念”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在高级党校和中央团校，以及外交部、国防部和克格勃的“内部教育机构”中增设课程。最后，命令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系统地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状况，并通过一份新出版的内部杂志《中国科技》进行交流。^②

季勃特·罗兹曼在仅有的一部专门研究苏联汉学的著作中也谈到了远东研究所的建立。

作为远东研究所各部门领导的一些资历深厚的人是20年代后期被吸收到这里来的，条件是他们将在一个更具政策化和政治化的环境中工作。从一开始，远东研究所便对勃列日涅夫领导层的传统立场产生了影响。……受雇到这个中国研究发展中心的新人往往是苏联上层人物的孩子或为了进入高度机密的外事单位而经过严格筛选的人。对远东研究所进行监督的是由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和外交部的中国专家组成的一个委员会。……他们（这个委员会和远东研究所的最高领导）共同成为这一领域的统治力量。

罗兹曼加入了由拉赫马宁、齐赫文斯基、贾丕才和斯拉德科夫斯基组

① 苏共中央档案馆，全宗 99，目录 156，卷宗 156，页 156。

② 苏共中央档案馆，全宗 99，目录 156，卷宗 156，页 156。

成的政府研究机构的核心圈子,这个核心圈子“在整个中苏冲突时期毫无争议地保持着对中国研究的支配地位”^①。虽然情报机构可以在 1956-1959 年提供同样的结论,但恰恰是在珍宝岛事件之后,1959 年 9 月 15 日形成了远东研究所的支配地位。那一天,苏共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要求有关部门在“1959-1960 年”准备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共同研究和出版计划,委托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协调全部科学研究活动”^②。

汉学研究对于党和政府观察中国的影响是双向的。1956 年 12 月 15 日建立的,隶属于苏共中央书记处的“中国问题专家顾问”特别小组不过是加强了这方面的联系。通过给苏共中央和苏共中央 1959 年 10 月 15 日建立的委员会准备报告,这个特别小组可能有助于决策者形成对中国和“中国问题”的观念。在这方面,苏联汉学和汉学家在中苏冲突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③

除了把远东研究所推到一个突出的地位,1959 年 9 月 15 日批准的措施还通过建立远东研究所的远东分所(隶属于科学院远东分院),以有助于苏联汉学的发展。^④不过,只是到了 1960 年,当苏联对中美关系和解的明显信号作出反应时,俄国远东地区的汉学才通过科学院系统和远东大学迅速发展起来。^⑤

(本文系作者提交 1995 年 1 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李丹慧译。)

① 季勃特·罗兹曼:《社会主义的镜子:苏联对中国的批判》,26-27页,普林斯顿,1958。这段长长的引文没有注释,因为作为写出该研究所这段简短历史的基础的那些访问在当时是不能引用的。虽然书中通过人名提到了一些问题,例如第 157 页,但没有那些采访的名单。绝大部分口述证言得到了档案文件的证实。

② 苏共中央档案馆,全宗 9 目录 103 卷宗 103 卷宗 103 页。

③ 苏共中央档案馆,全宗 9 目录 103 卷宗 103 卷宗 103 页。这个特别小组的成员有:拉赫马宁(组长)、乌里扬诺夫斯基、伊诺泽姆采夫、阿尔西波夫、斯拉德科夫斯基、齐赫文斯基、莫丘利斯基、沃格莫洛夫、费德林、拉扎列夫、季塔连科、谢西金、沙拉波夫、罗加切夫。

④ 苏共中央档案馆,全宗 9 目录 103 卷宗 103 卷宗 103 页。

⑤ 苏共中央档案馆,全宗 9 目录 103 卷宗 103 卷宗 103 页。